

抗战与战后中国

杨天石 著

杨天石
近代史
文存

章太炎的不屑反映了近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困惑。他们失望于西方民主模式，而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能向左右。然而，向左右又是没有出路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而不是从民主复辟专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鸦片战争中，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于是转而学西方，开始学坚船利炮与声、光、

化，也，后来学民权与立宪，再后来学民主与革命。到了1911年，民主与革命的调子高唱入云，拿破仑、华盛顿这两位资产阶级革命的鼻祖也就成了“极点”。

其后是大批人出洋，章太炎本人也于1905年到了正在学习西方的日本。

有，不对了，所谓民主，不过是富人的民主，而且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怪事和丑闻。

于是，失望、愤怒之情油然而生，拿破仑与华盛顿的身份也就随之坠落。在《官制

案隐》中，章太炎激烈地指责西方的选举制度，认为所谓“代议士”、“议员”、“大

都耗资巨万，寄括营入选，与中国的“行贿得官”并无两样。他说：“民主立宪，世

人都以美、法两国为榜样，但现在法国的政治，全靠贿赂，美国人也要通过行贿才

能致身显贵，实在“累载”得很，其所以幻想手持“金椎”，以拿破仑、华盛顿的

去作为挾伐对象者，盖为此也。章太炎这个人受冲动，又不懂得历史主义，其幼

稚、偏激之处，读者谅之！”那么中国怎么办？

章太炎想来想去，觉得西方民主的喉危是议会，于是按法经营，洋洋洒洒地写了

一篇《代议然否论》，主张“代议”必不可行，议员绝不可选，同时提出了一个从多

方面“恢廓民权”、“限制元首”的方案。例如，提高法官的权力，不论是总统，还是

百官，有了过失，或者溺职受贿，法官都可以“征之”、“逮之”、“治之”。倘

若法官执法不公，老百姓可以要求“学官”集中一批法学家来共同处治法官，等等。

然而，不知道是章太炎觉得这个方案未必可行，还是因为对中国历史过于有感

情了，他有时又觉得，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也并不坏，开几、贞观年间，中国不也

治理得很好吗？于是，他又表示：“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甚至说：

学界对本书作者及其研究的评论

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是近年来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学术文章。

——胡乔木

这部《文存》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有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金冲及（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天石）以其文学的底子、哲学的素养，加上科学的方法、求真的精神，以锲而不舍的毅力，追求难得的史料，思考问题，故其发表的文章，引起同道的重视和欣赏，非偶然也。

——蒋永敬（台湾政治大学）

杨天石先生作为解放后第二代史学家中最前列的研究者之一……以学有根基的渊博知识为基础，尽可能地广收博采有关资料，分析立论敏锐而明快。

——狭间直树（日本京都大学）

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杨天石先生属于最为优秀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学者。……他具有发现重要问题，在中国乃至在广阔的海外发掘最新的资料，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独创性论文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一日可就，它的背后是敏锐的历史感和日积月累的知识与教养。

——山田辰雄（日本放送大学）

（杨天石先生）对民国史的学术贡献伟大。有史风。特别重视于揭示历史之“谜”的核心。这样的学风已有史仙之境。

——中村哲夫（日本神户大学）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李又宁（美国圣若望大学）

ISBN 978-7-300-08279-0




9 787300 082790 >

抗战与战后中国



杨天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与战后中国/杨天石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杨天石近代史文存)
ISBN 978-7-300-082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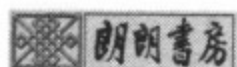
I. 抗…

II. 杨…

III. ①中国国民党—政治—研究②国共合作—研究—1937~1945

IV. D693.74 K26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5967 号



杨天石近代史文存
抗战与战后中国
杨天石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8879833		
	编辑热线:010-88879860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 (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 (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44 插页 3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40 000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著者在台湾花莲



序 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金冲及

在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众多研究工作者中，杨天石同志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

为什么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他极其重视发掘近代史中以往很少为研究工作者所了解的珍贵史料，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原始档案，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因此他常能讲出新话来。本来，史学工作者必然论从史出，这几乎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教授，曾提倡对史料要做到“竭泽而渔”。可是，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学者常有一种苦恼。和古代史不同，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研究工作者根本谈不上“竭泽而渔”，倒是常要“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要能识别并发掘出前人没有利用过的珍贵史料又谈何容易。杨天石同志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勤奋。他不仅经常深入国内一些重要档案馆和图书馆，细心搜罗；还不知疲倦地奔走于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以及台湾地区，披沙拣金。他有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就叫《海外访史录》。此中甘苦，凡多少做过一点儿这类工作的人，大概都能领会到。二是有敏锐的识别力。这需要有扎实的功力和犀利的眼光，能够分清什么是沙和什么是金。否则，再重要的史料放在那里，也可能因不认识它的价值而交臂失之。杨天石同志恰恰具有这两个条件。

第二，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他另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叫《寻求历史的谜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研究工

作,从它的本来意义来说,无非是要解开包括自己在内原来弄不清楚的谜团,寻求符合实际的答案。如果只是把一些历史事实叙述得清清楚楚,却没有回答什么人们原来感到迷惑的问题,这种著作或论文也有它的用处,但很难说是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杨天石同志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旧说中发现疑点,提出问题,经过严密的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他的论文《中山舰事件之谜》,运用可靠的原始档案,对一个人们普遍关心而又不明其所以的问题,起了释疑解惑的作用。我曾听胡乔木同志称赞过这篇文章。

第三,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明白晓畅,读起来没有沉闷的感觉,容易引人入胜。写文章,是要给读者看的,落笔时应该处处替读者着想,而不是作者在那里自说自话。如果文字晦涩,思路不清,让人看得十分吃力,甚至看不下去,再好的内容也难发挥作用。杨天石同志这个优点也是值得称道的。

这三点,也许同样是这部《文存》的特色。

这部《文存》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有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国民党曾经统治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二十多年。它的种种活动和作为,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有些还产生长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同它两度合作,一次是大革命,一次是抗日战争;又有两次破裂,一次导致十年内战,一次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作为历史对象,作为了解中国近代国情的需要,我们对国民党以及它对中国大陆统治的研究,实在太不够了。不深入进行对它的研究,中国人在20世纪是怎样走过来的,在不少方面就不容易说得清楚。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来说,如果不研究这个既是对手,又是两度合作伙伴的国民党,许多事情的认识也难以深入。

从事这样一项开拓性的又相当敏感的研究工作,谁都很难一下就

做到什么都说得准确无误或能取得所有人的同意,引起一些争议是自然的。我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和杨天石同志的看法都相同。记得有一次在美国,我对他《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那篇文章也提出过商榷性的意见。这些,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的。

杨天石同志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许多问题,经过他的潜心研究,已把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问题,虽然存在争议或有不同意见,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它对推进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这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2007年6月24日

于北京万寿路



序二 以文会友——天石与我

台湾政治大学 蒋永敬

一

我对杨天石先生(以下称天石)的神往,是读到他发表于1988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的《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以后凡是天石发表的文章,只要能见到,我都仔细地阅读。1991年9月,我到北京初次与天石见面,我们是一见如故。交往久了,我们总是有谈不完的话题。说也奇怪,近年由于听力衰退,与别人谈话,总觉听力不行;但和天石谈话,则仍正常。我问过天石,为何如此?天石说:大概是因为他的听力也较差,说话声音较大之故吧。同样情形,别人和我谈话,虽然大声,我还是听不大清楚。我想,应是我与天石“心灵相通”的原因。

自从认识天石以后,他每有新的著作问世,必定尽快送我一份。重要者有如《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民国掌故》(收入与多位学者发表的文章)等。总计有120多篇天石的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此外还有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我曾为此书作过“评介”。这次《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五卷即将出版,将天石历年来的著作,有系统地整理、收存起来,给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天石的著作,每篇都是

精心之作,有新资料、新见解,富有启发性。这部《文存》的出版,对于近代史学,也是一大贡献。天石由北京来电话,并传来《文存》的目录,嘱我为之作序,兴奋之余,愧不敢当,但也不愿放弃这一大好机会,来表白我对天石才华的钦佩。故愿借此机会来谈谈天石与我在史料、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琐事,题为《以文会友——天石与我》,以代序焉。

二

首先来谈谈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对于我的启示。我曾在台北《传记文学》介绍过天石这篇文章。在我的回忆录《浮生忆往》中也有详细的记述。大要如下:

近代史中两大疑案不易解决,一为1926年3月20日之“中山舰事件”,一为1936年12月12日之“西安事变”。此两事件均为蒋介石亲身经历之事,过去多年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当事人蒋介石对此两事件之经过,曾有多次之陈述;与此两事件相关之人士亦有各种不同之记述,还有多种其他相关文献,互有出人与矛盾,故欲了解此两事件之原因、真相,至为困难。研究者多,难有满意之结果,久为“历史之谜”。幸此两“谜”为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二杨”解开之。“二杨”者,即杨天石与杨奎松也。

杨天石首次利用中山舰事件档案数据,解开中山舰事件之“谜”。我为补正过去研究此事件之不足,乃撰《中山舰事件原因的考察》一文,刊于1989年10月之《历史月刊》第21期,介绍杨天石之发现,并就此事件之背景、原因作一考察,此时尚不识杨天石其人也。留美学者李又宁教授已访问北京多次,谈及杨天石的研究。我问天石何许人也?又

宁曰：与汝当年相似，乃“一表人才”也。

我对中山舰事件之研究，曾于1984年4月参加在台北举办之“中华民国初期历史”学术研讨会，发表《3月20日事件之研究》一文，所用资料，以国民党党史会收藏者为主。就当时情况而言，应须参考之数据皆已尽可能地利用之。评论人刘凤翰曰：“蒋教授在这篇论文中，对事件的背景、事件的发生与处理，都达到求真的目的。所用的方法与数据被史学家所接受，其结论将被史学家所肯定。”此事件之关键问题，为李之龙是否承汪精卫之命，对蒋介石进行谋害？据蒋之多次陈述，似是如此，而汪及共方则否认之。研究者苦无直接证据可资断定何方所述者合乎事实，于是成为“悬案”。一般论著对此事件资料之采信，各有不同尺度。“右”者采信蒋方之资料，“左”者采信汪及共方之资料，而对对方数据常质疑之。我之论文，两说并陈，而以第三方面之资料佐证之。凤翰评之曰：“蒋永敬教授这篇论文，写得严谨、公正，而有学术上永久价值。”但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未出现前，凤翰之言，尚难否定也。我在《中山舰事件原因的考察》一文中介绍天石对“解谜”之贡献曰：

中山舰的调动，是否为汪、共劫蒋之阴谋？尽管各方有不同的陈述，而其关键所在，李之龙（中山舰舰长，中共党员）有无矫令调舰行为，应该考察当时中山舰调动的真实情况。为了解这种情况，对于当时调动中山舰有关人员的陈述，须加以考察和对证。调动中山舰有关人员除李之龙本人于1927年在汉口发表《汪主席被迫离职之原因、经过与影响》一文中有“派舰经过”外，其他有关人员如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员黎时雍、王学臣，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军校办公厅秘书季方，副官黄珍吾等，因与调舰事有关，均在事件发生的当时留有笔录。这些文件的日期，都是在1926年3月24日到31日之间。从这些文件来看，李之龙并无

矫令调舰行为。杨天石的《中山舰事件之谜》，首次利用了这些文件，解开了此一事件多年之谜。

其后天石又发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文，对于汪精卫为何突然隐匿，既而悄然出走，蒋介石为何一路顺风，掌握了国民党和军队的最高权力，以及事件后苏联顾问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作用等问题，诚如作者所云：“史学界都还不完全清楚。”为求真相，天石运用诸多可信资料，作出精辟的解答。

天石这两篇中山舰事件研究，愿以刘凤翰对我《3月20日事件之研究》之评语“写得严谨、公正，而有学术上永久价值”，让之天石。

三

我对天石的才华，十分欣赏；但不迷信其“权威”，总想找个机会，与之挑战，以尽“以文会友”之道。

1996年，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六十万言的巨著出版了。这是一部水平很高的著作，到目前为止，在同类的著作中，难有出其右者。我曾以挑战的心情，作一“评介”，提出五点意见：一点表示肯定与欣赏，两点讨论，两点挑战。讨论不谈，先谈肯定与欣赏，再谈挑战。肯定与欣赏是认为本书有“新的资料和新的内容”，节录如下：

本卷重大特色之一，是采用了大量的档案数据。这些资料不仅包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的，还包括中共方面的；不仅包括中文

的,还包括英、俄、日文的。更重要的,还有一些当事人的“个人”资料,如《蒋介石个人全宗》、《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蒋介石日记类抄》、《冯玉祥个人全宗》、《吴稚晖个人全宗》、《张静江个人全宗》等。大多是由本书首次引用,其价值之高,可以想见。要使著作有创新的内容,就必须充分利用新的数据。人云亦云,陈词滥调,徒使读者乏味。而本书在新数据方面的利用,确居优势。(举例略)

挑战的两点,一是“抓漏”,一是“找碴”。“抓漏”方面,抓出编者的马虎,把几种不同的资料,糅合在一起。“评介”的标题为《引用资料不可马虎》。节录如下:

鲍罗廷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变化,实即标志着苏联、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变化。此一关键性的问题,从本书相关的记述中,可以清晰的看出来。例如为了迁都武汉之争,鲍、蒋之间发生了一次正面的冲突。本书对此记述(略),颇为生动。资料来源,据注是根据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载于1927年5月4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但就我手头现有的资料来查证,这段记述,并非完全出自蒋的《讲演词》。(举例略)把这几种不同来源的资料凑合在一起,未注据蒋的《讲演词》,这就显得有些马马虎虎了。同时,对于鲍、蒋两人的争执,以及是非曲直问题,著者显然认为蒋有不对之处,说“事实证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

蒋介石在武汉对鲍有无“允诺”,是须加以查证的。按鲍在1月15日(1927年)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发言中,对蒋所提意见,表示“赞同”,并认为“亦无不可”。这段发言记录,该书略而不采,今补充之(略)。“找碴”

的一点，“评介”的标题是《过度曲护有碍历史真相》。该书对武汉分共时宋庆龄坚持“三大政策”颇加肯定。我知此一肯定，似非出自天石之笔。此书既为其主编，乃有意向之“找碴”。其文如下：

孙中山有无制定“三大政策”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经过近年中外学者的研究，认为孙中山生前，并未提出此一特定的政策，更无此一名词的确立，而是在他去世一年多以后，始由中共人员提出来的。如果把“赝品”视为“真货”而肯定之，便使学术性大为减色了。

后来天石有两篇论文，似在回应我的挑战，一篇是《北伐时期左派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斗争》，其中有“迁都之争”一项。另一篇是《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尤其后一篇响应我的“找碴”甚为明显，如该文结语所云：

“三大政策”这一概念形成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它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的一个比较精确的概括。应该承认，所概括的三方面确实都来自孙中山，不是赝品。

天石此文，把“三大政策”的概念形成，提前到1925年10月，似乎早了些。此时应是酝酿，而非形成。形成的时期，应是1926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之日。天石根据这天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出版《总理周年纪念特刊》所载施存统（当时是共产党员）以“复亮”为名发表《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一文。即如天石所云：“空前明确地提出了‘三大革命政策’的概念。”过去对此概念形成和“三大政策”名词的

出现,只追踪到1926年10月,天石此文把它提前7个月,这是一大发现。

这一问题,由于中外和两岸学者多年来的探讨,大致已有定论。这一概念和名词是在孙中山去世以后,由共派方面的人士概括而来,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历史上很多概念和名词,都是后来概括而成的。例如“辛亥革命”、“联俄容共”等名词,都是如此。所以天石说它“不是赝品”,也是有根据的。

四

我对天石之文的另一次挑战,是2005年10月在台北举行之“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研讨会。天石发表的论文为《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大会安排由我评论之。天石此文认为蒋介石对这个“底”曾有四次改变、四个层面,即四个“底”。我则认为只有两个“底”,即卢沟桥事变“底”与珍珠港事变“底”。前者为不澈底之“底”,后者为澈底之“底”。原稿节略如下:

天石此文所表现之特色,一为精彩选题,可谓“小题大作”,用一个“底”字来贯串整个抗战过程中重大问题。次为精彩选材,此文多以第一手原始数据完成之,特别是1939年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演讲《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成为天石研究“底”的根据。蒋介石此一演讲,十分坦率,在当时有高度之机密性。存于国民党党史馆,迄未公开。天石以此文件所解释的“抗战到底”之“底”来量蒋介石以后对“底”解释的变化。天石根据五中全会以后的文件,认为蒋对“底”作了“新解释”,改正前“底”(五中

全会的)“错误”。改正有两点,一是将“底”追溯到九一八事变(收复东北),一是将“底”扩大为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联系起来。

此两点是否为改正前“底”之“错误”?这要看在前“底”之前的蒋介石文件有无和“新解释”相同之处。据我的了解,这种“新解释”在五中全会前或五中全会中的演讲里已经有了。例如蒋介石1938年9月18日《告东北同胞书》中有云:“此次牺牲,发动抗战,即为恢复东北失地。”关于中日问题须与世界问题联系起来,蒋的五中全会演讲即有详细说明,他说:“中日问题,无法单独解决;要解决中日问题,一定要解决远东问题;远东问题即是太平洋问题,必须在解决太平洋问题中获得一个结果。”

太平洋问题如何解决?一是和平,一是战争。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倾向和平解决;此后则为战争解决。天石文中引用一件极为机密而极重要的文件,为1940年8月在蒋介石指导下起草的《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要》,有两大底限,一为战争底限,一为和平底限。战争底限名曰“最大之成功”,和平底限名曰“最小限度之成功”。这是天石一大发现。从这一文件,可以看出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是求“最小限度之成功”(和),之后是求“最大之成功”(战)。结果“最小”的未能成功,而“最大”的反而成功了。正如胡适在抗战期中有句名言“和比战难”。依此文件,我认为“抗战到底”之“底”只有两“底”,一为卢沟桥事变“底”,不澈底之“底”,一为珍珠港事变“底”,乃澈底之“底”也。

评过天石此文以后,想到1986年10月在台北的“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中,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蒋中正先生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两相对照,异同互见。19年后,有幸评论天石此文,亦乐事也。

五

天石精于资料的搜集,他所探讨的问题,颇多我曾经思考而未能解答的。例如他对胡汉民的研究,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曾接触过这个问题,也有一些著作发表过。在读到天石的《蒋胡“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和《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所藏胡汉民档案》后,使我深感过去研究的不足。对于他的发现,也引起我去思考存疑未决的问题。例如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一文,就使我想起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因解决国共纠纷而由国民党中央于1924年8月通过的《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国民党档案中,列为“极机密”。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讨论到通过时,鲍罗廷和中共瞿秋白都曾与会。此案全文早已收入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一书中,迄未引起学者的注意。胡汉民1930年在南京向新亚细亚学会演讲《民族国际与第三国际》提到他1925年到1926年间在莫斯科“提议国民党加入第三国际的经过和原因”,显然与前项决议案有关。2004年,我在广州“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发表《孙中山与鲍罗廷》一文,曾提到这一决议案问题。再阅天石的《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一文,可以看出从孙中山、胡汉民到蒋介石,对中俄、国共关系的改善,都曾有过强烈的需求。共派人士提出的“三大政策”,亦为需求国共合作关系的维护。然而终致决裂者,此亦值得深思之问题也。

六

天石的年龄和我相比,差了一大截。但其出道很早。1958年从事南社的研究,观其搜集和运用资料的方法,就已十分内行。“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忘潜修,一旦开放,便脱颖而出。加入《中华民国史》编写行列,以其文学的底子、哲学的素养,加上科学的方法、求真的精神,以锲而不舍的毅力,追求难得的史料,思考问题,故其发表的文章,引起同道的重视和欣赏,非偶然也。

天石参与民国史的工作,涉猎的范围,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国民党派系斗争等,特别对蒋介石的研究,都下过很深的工夫,有很多的发现和创见。由于彼此的行道不谋而合,所以我对天石的发现和创见,体会较深,受益更多。因此,能与天石“以文会友”是我生平最大的乐趣。《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的出版,不仅可以展现他50年来努力的成就;更重要的意义,能为继起研究者,提供宝贵的经验,这是我的期待与祝贺。

2007年6月2日

于台北



序 三

日本放送大学 山田辰雄

我尊敬的老朋友杨天石先生的著作集即将出版，有幸为该书作序，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当代中国涌现出了许多的历史学者。在我的同龄人当中，杨天石先生属于最为优秀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华民国史的学者。他在这部《文存》中收录的论文，我大都拜读过。只要浏览一下它的目录，就会让人折服于杨先生研究领域之广泛。在这部《文存》中，他研究了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和领导人，论述了自清末时期、辛亥革命，以至国民革命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与思想史的问题。

作为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优点在于，他具有发现重要问题，在中国乃至广阔的海外发掘最新的资料，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独创性论文的能力。这种能力并非一日可就，它的背后是敏锐的历史感和日积月累的知识与教养。

作为学者和他的朋友，我自己也从杨天石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仅在思想史领域，他就不仅关注政治家，而且论述到许多知识分子。他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关于蒋介石的研究，也引起了我的注目。在中华民国史上，对于蒋介石的客观研究，迄今还没有充分地展开；其中有资料上的制约，并含有微妙的政治评价的问题。而杨天石先生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则始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既阐明了诸多新的事实，同时又发表了独创性的见解。

我是日本人，要克服语言的障碍、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非

易事。但所幸可以理解杨天石先生的大作。我近来通过翻译他关于蒋介石的论文,来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努力理解他的研究。我在许多国际会议和日常会话场合,与杨天石先生有着交流。他的汉语发音,婉转而清晰,不但表明他头脑清楚,也让我克服了作为外国人的语言障碍。

最后,我祝贺《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的出版,并期待着他为中华民国史的国际性学术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2007年6月

(臧运祜 译)



编辑说明

一、《文存》收著者此前所写关于中国近代史(1840—1949)的大部分文章,少数人物传记、序跋未收,专著、小册子不收,超出中国近代史领域者不收。所述历史事件在1949年以后而有关中国近代史者,列为附录。

二、《文存》依时期与主题厘为五卷:《晚清史事》、《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与战后中国》、《哲人与文士》。各卷分别独立。

三、前四卷主要反映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为方便读者阅读,大体按历史事件的先后排序,不便排序者列为附录。

四、第五卷主要反映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分类排序。其所论人物事迹涉及当时政治发展者,列入前四卷;评述人物思想、学术、文学者收入本卷;如黄遵宪、孙中山、章太炎、柳亚子、胡适等。少数人物研究,虽从政治上立论,但无法纳入某一时期者,亦收入本卷。

五、王了一(力)师主张“龙虫并雕”,《文存》师其意,长短兼收,庄谐并取,论议之文与叙事之文同存。

六、所收文章,均尽量保持发表时原状,注明原发表书刊。少数篇章,此前有改动或此次編集时有小改动者,均加说明。

七、《文存》附有部分插图,为著者辑自海内外的珍贵、稀见资料,一般常见、易见者不录;虽珍贵、稀见,但未得允许,无法复印、摄影者从阙。

八、所作各文,内容有较多重复者不收;论题相同而论证、叙述方式不同者酌收。

九、与师友合作撰写的文章,《文存》仅收以本人为主执笔者。对合作中有关师友的指导、教益,谨致衷心谢意。

十、《文存》不是通史性著作,所论仅是著者有兴趣并且深入研究过的部分问题。近代中国的历史空前丰富、复杂,内容广阔。所有重大问题一一论述,非著者精力所及;若干问题,著者尚有兴趣探讨,请期之异日。

十一、所引文字,有缺漏或模糊不清者以□标示,错字的订正用〔〕号,增补的脱字用〈〉号,删除的衍文用[]号。



目 录

- 1937：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年
——从卢沟桥事变至南京陷落 (1)
- 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30)
- 毛泽东、李富春的一封未刊英文函件
——美国所见中国名人书札 (43)
- 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运动的珍贵文献
——读宋庆龄往来英文未刊函札 (46)
- 张学良三次请缨抗日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75)
- 报国无门的苦恼
——读张学良幽居日记 (79)
- 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90)
- 日蒋秘密谈判的重要资料
——读孔祥熙档案 (116)
- 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 (122)
-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一 (145)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 (186)

“桐工作”辨析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三…………… (221)

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四…………… (267)

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五…………… (277)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六…………… (295)

吴开先与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敌后抗日工作

——读台湾所藏朱家骅档案…………… (328)

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

——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 (344)

胡适与陈光甫…………… (350)

对苏外交的一鳞半爪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一…………… (376)

史迪威事件中的蒋介石与宋子文

——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一…………… (382)

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 (432)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457)

关怀张学良全家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二·····	(472)
宋子文与戴笠之间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三·····	(475)
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四·····	(479)
排挤驻美大使胡适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五·····	(490)
蒋孔关系探微	
——读孔祥熙档案·····	(496)
傅斯年攻倒孔祥熙	
——读台湾所藏傅斯年档案·····	(508)
到底是谁毒死了章亚若? ·····	(522)
章亚若死因新证·····	(528)
汉奸末日审判记·····	(530)
溥仪要求参加苏联共产党·····	(538)
南京政府崩溃时期的陈光甫	
——读陈光甫档案之一·····	(540)
蒋介石的“慰问”与北平的邀请	
——读陈光甫档案之二·····	(576)
从大举进攻到全面败北	
——读蒋介石致熊式辉手札·····	(586)

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 (605)

附录一

蒋介石“复职”与李宗仁抗争

——读居正藏札及李宗仁档案…………… (618)

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种力量

——读张发奎档案之一…………… (628)

海峡两岸争取张发奎

——读张发奎档案之二…………… (635)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读张学良档案…………… (641)

附录二

我和民国史研究…………… (658)

进一步发展中华民国史学科

——访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 …… (672)



1937：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年

——从卢沟桥事变至南京陷落

1937年7月7日，驻扎中国北平近郊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托词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桥畔的宛平县城搜查，遭到拒绝。不久，失踪士兵归队，但日军仍于次日清晨发起攻击，守城部队奋起抵抗。这一事件成为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的开端。

最初，中国军队以华北为主战场，蒋介石自任这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同时将他所信任的德国军事顾问法尔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派到北方前线。^①但是，战争开始后不久，蒋介石决定首先消灭上海地区的日军。这样，中国军队就同时在华北、华东两个战场与日军作战，而主战场则逐渐转移到上海地区。中国方面出动兵力约75万人，日方出动兵力约25万人，时间延续三个月，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庞大、作战最烈的一次战役。

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当日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

^① 辛达谟：《法尔肯豪森将军回忆中的蒋委员长与中国》，（台北）《传记文学》，第21卷第6期。

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应战此其时乎？”^①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②。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需六个月。为此，他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③ 18日，又托人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④。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⑤ 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⑥ 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⑦

在知识阶层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教授胡适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求和，不如在大战发生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

① 《困勉记》(稿本)，《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该稿本据蒋介石日记摘录，词句与日记原本小有不同。

②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总第1120页，台北，1978。

③ 《徐永昌日记》，1937年7月14日、16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④ 同上，1937年7月18日。

⑤ 同上，1937年7月19日。

⑥ 同上，1937年7月20日。本函所述，徐已在19日的会上作过口头陈说。

⑦ 同上，1937年7月24日。

力”。8月6日，胡适向蒋介石提出书面建议：1. 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 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 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① 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五十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2日，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州、保定一线作持久战，同时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②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16日日记云：“此宣言发表，其影响究为利为害？”^③17日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日记云：“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当一意应战，核发战斗序列，不当再作回旋之想矣。”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城镇，蒋介石日记云：“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

^①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1598～1612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②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上），总第1131页。

^③ 《困勉记》。

想。”“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余一身负之。毋愧领袖。”28日，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防守北平南郊的战斗中阵亡，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次日凌晨，天津守军主动进攻当地日军，日军调兵增援，中国军队因伤亡严重，于30日撤离天津。中国北方两个最大城市的丧失，使蒋介石感到，再不抗战，必将遭致全国反对。8月4日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蒋介石认为：中国方面虽多弱点，例如组织不健全，准备未完全等，在此情况下抗战，存在很大危险，但日本“外表横暴”，而“内部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也”。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会上，何应钦将军报告军事准备情形，提出第一期拟动员一百万人投入作战。其中，冀鲁豫方面约60万人，热察绥方面约15万人，闽粤方面约15万人，江浙方面约10万人。何陈述的困难，有财政开支扩大，枪械、子弹勉强可供六个月之需，防御工事未完成，空军机械不足等。蒋介石在谈话中对胡适的主张颇有讥刺，参谋总长程潜甚至指责胡适为“汉奸”。会议决定“积极抗战与备战”^①。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当时，蒋介石估计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期大约一年。他决定“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倭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从而争取战争的胜利。^②

8月13日，淞沪之战爆发。

^① 《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② 《困勉记》，1937年8月13日。

中国军队力图“先发制人”，但缺乏重武器， 上海攻坚战未能取胜

上海处于东海之滨，距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不过三百公里。1932年5月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为防止日军自上海入侵，南京国民政府根据法尔肯豪森等人的建议，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上海周边工事，在吴县、常熟等地，利用阳澄湖、淀山湖构筑主阵地——吴福（苏州—福山）线，在江阴、无锡之间构筑后方阵地——锡澄线，同时在乍浦与嘉兴之间兴建乍嘉线，以与吴福线相连。^① 其后，又在龙华、徐家汇、江湾、大场等地构筑包围攻击阵地，并且拟有《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② 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为加强上海防务，任命张治中上将为京沪警备司令。张受命后，即命所部化装为保安队入驻上海虹桥机场等处。7月30日，张治中将军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况异常，“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蒋介石同意张治中的设想，复电称：“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③

① 黄德馨：《京沪国防工事的设想、构筑和作用》，《八一三淞沪抗战》，40～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参见 Liang His-huey: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934—1938)*, Bernd Martin: *Die Deutsche Beraterschaft in China 1927—1938*, Dusseldorf 1981, Droste Verlag, pp. 141 - 142.

② 《八一三淞沪抗战》，4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③ 张治中：《揭开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序幕》，《八一三淞沪抗战》，1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参见余湛邦：《张治中——张治中机要秘书的回忆》，2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日本海军积极主张向华中地区扩张。7月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报告:局限战将有利于中国兵力集中,造成日方作战困难,“为制中国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①。8月7日,米内海军大臣建议杉山元陆军大臣向内阁提出,为保护青岛和上海日侨,应迅速准备派遣陆军赴华。^②次日,长谷川清得到指示,为因应事态扩大,实施新的兵力部署。9日,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携士兵斋藤要藏,以汽车冲入虹桥机场,开枪射击中国保安部队,中国保安队当即还击,将大山等二人击毙。^③日军乘机在上海集中兵舰,以陆战队登陆,要求中国方面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海军中央部通知第三舰队称,除武力外,别无解决办法,将在陆军动员之后20天开始攻击。10日,日本内阁会议同意派遣陆军。长谷川清命在佐世保待命的舰队开赴上海。12日,陆军省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

保安队是上海地区仅有的中国部队。蒋介石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占领,决定拒绝日方要求,同时下令准备作战。11日,蒋介石得悉日舰集中沪滨,决定封锁吴淞口。同日,命张治中将所属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所部、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所部两师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围攻线,准备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军,拔除其据点。^④当时,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总兵力不超过五千人。^⑤12

① 《蒋介石秘录》,第4卷,2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1页,中华书局,1981。

③ 《中央日报》,1937年8月10日。

④ 《上海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26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⑤ 当时日本在上海的兵力说法不一,此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4页。

日,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① 何应钦将军在会上表示:“和平已经绝望”,“如果他稍有动作,就要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更困难了”。^②

张治中原定于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但蒋介石因英、美、法、意四国驻华使节等方面正在调停,要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③。同日上午9点15分,日本陆战队水兵冲出租界,射击中国保安队,中国军队还击。^④ 10点半,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小冲突。^⑤ 同日黄昏,日军炮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以迫击炮还击。^⑥ 日军并以坦克掩护步兵攻击八十七师阵地,日舰连续炮击上海市中心。^⑦ 14日拂晓,张治中奉蒋介石令,发起总攻。同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日第三舰队旗舰及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本部。淞沪之战爆发,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名副其实地进入“全面抗战”。

战争初起,中国方面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双方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进行巷战。20日夜,将日军压迫至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同时包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据点。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8月17日,张治中将军向蒋介石报告:“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

① 《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12日。

② 《中常会第50次会议速记录》,1937年8月12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③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265页。

④ 同上,335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335~336页。参见《日军对华作战纪要》。

⑦ 同上,336页。

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张治中报告说：“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①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这种情况，自然无法克敌制胜。

中国军队当时是否完全缺乏攻坚武器呢？并非。关键在于何应钦没有想到，蒋介石也没有想到。11月20日，蒋介石检讨：“绪战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灭沪上敌军。何部长未将所以巷战及攻击武器发给使用，待余想到，催发战车与平射炮，已过其时，敌之正式敌军，已在虬江码头与吴淞登陆矣。敬之（指何应钦——笔者）误事误国，亦余想到太迟之过也。”^②

蒋介石对张治中将军的指挥不满意。8月20日，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陈诚将军向蒋介石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③同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日本海陆军根据地，阻止或乘机消灭后续日军。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将江苏南部及浙江划为第三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为副司令长官，陈诚将军为前敌总司令。张治中将军被任命为淞沪围攻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将军被任命为杭州湾北岸守备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守卫上海左翼浦东。这些举措，说明蒋介石开始重视上海战场，但是，蒋当时还没有在上海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对这次战争的艰难与严酷也还缺乏认识。当日日记云：“沪战颇有进展，倭军恐慌万分，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342页。

② 《省克记》。原稿。该稿摘抄自蒋介石日记，台北“国史馆”藏。

③ 《陈诚私人回忆资料》，《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

其国内陆海军意见分歧，政府内部不能一致，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势，英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乎？”^①次日，日本拒绝英国调停，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忧心倍增”^②。22日，蒋介石下令成立第十五集团军，以陈诚将军为总司令，守卫上海右翼长江江岸。

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中国反登陆战失利

日军在上海的兵力有限，要持续进攻，必须通过海上的远距离运输，将军队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战场。中国海军的军力本极有限，舰艇在战争开始时或被炸沉，或奉令自沉长江，封锁航道，已经没有和日舰进行海上作战的能力；空军能作战的飞机不过一百八十余架，不足以从空中遏制日本运兵舰艇的航行。^③中国军队所能进行的只有反登陆，在海岸及相关纵深据点布置军队，阻遏日军，但是，中国方面又未予以足够重视，守卫江岸、海岸的兵力都很薄弱。

8月13日夜，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为讨伐中国之暴戾，以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如今已到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之地步”^④。同日，日本政府下令，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协助海军，扫荡、歼灭上海附近的军队，占领上海。17日，日本阁议决定：“放弃以往所采取之不

① 《困勉记》。

② 同上。

③ 《王世杰日记》，1937年10月12日。

④ 林石江译：《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373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台北，1987。

扩大方针,采取战时态势上所需要之各种准备对策。”^①22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率第三、第十一师团到达上海东南的马鞍群岛。23日,日军第十一师团在三十余艘军舰密集炮火的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川沙口强行登陆,占领川沙镇,第三师团在吴淞铁路码头登陆,进攻上海北部的吴淞、宝山等地。据中国方面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史说回忆:“在23日拂晓以后,日空军开始猛烈轰炸,使我援军不能接近,日海军也以猛烈炮火支援日军登陆。我沿长江岸守备的第五十六师和沿黄浦江口守备的上海市保安总团,兵力薄弱,日陆军登陆成功。”^②

日军登陆后,中国方面力图阻止敌人向纵深发展。张治中将军在敌机猛烈轰炸下骑自行车赶赴前线,一面任命王敬久师长为淞沪前敌指挥官,指挥部队固守原阵地,一面抽调第十一师彭善在部、第九十八师夏楚中部北上,拒止登陆之敌。双方在罗店等地激战。中国军队向日军发动数次猛攻,虽有进展,但均未奏效。28日,守卫罗店的中国军队伤亡过半,日军第十一师团占领罗店。31日,日军第三师团攻占吴淞镇。9月1日,日军精锐部队久留米第十二师团等三个师团到达上海,实力大增,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9月5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及战车、炮舰、飞机联合进攻,中国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姚子青营奋力抗战,激战至第二日,全营官兵壮烈牺牲。^③蕴藻浜沿河之战,“双方死亡俱奇重,浜水皆赤,所谓流血成河,显系实在景况”^④。据陈诚报告,该部自8月22日参战,至9月7日,仅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八、第五十六五个师就伤亡官兵9039名,第六师吴淞一役,即伤亡过

① 林石江译:《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374页。

② 《八一三淞沪抗战》,95页。

③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354页。

④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6日。

半。“大部受敌飞机、大炮轰炸，人枪并毁。”其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①。

由于江岸地形有利于日本陆海空军协同作战，日军又源源不断地增援，中国军队为减少损失，只能主动退守。史说后来回忆：“日军在长江沿岸及黄浦江沿岸继续登陆，与我军一个点一个点地争夺，往往日军白昼占去，夜间我又夺回。”“在日军舰炮火下，伤亡惨重，往往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付伙食担子。”^②9月10日，第十五集团军右翼阵地被突破。11日，第九集团军奉命向北站、江湾等地转移。

反登陆战失利，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增加。9月11日，自青岛调来的日军天谷支队进入月浦镇。12日，由华北方面军转调的后备步兵十个大队陆续抵达上海战场。14日，自台湾调来的重藤支队登陆。中国军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为维护中苏交通线，蒋介石决定吸引日军改变主战场；为配合外交斗争，蒋介石决定坚守上海

9月11日以后，中国军队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作为淞沪战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最先感到了中国军队的不利态势。8月28日，罗店失陷，蒋介石日记云：“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乃动摇矣。”31日，吴淞失守，蒋介石再次在日记中表示：“我军转入被动地位矣。”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重新思考，仗将如何打下去。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356页。

^② 《八一三淞沪抗战》，96页。

9月2日日记云：“敌之战略，其弱点乃以支战场为主战场，其战争全在消极，且立于被动地位，故我之战略，应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彼愈进愈穷，进退维谷，不难旷日持久，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这则日记说明，尽管上海战场形势不利，但蒋介石决定“全力贯注一点”，在上海长期拖住日军。其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作战组长刘斐等向蒋提出，淞沪会战应“适可而止”，部队应及时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介石一度接受这一意见，下令执行，但第二天又决定收回命令。^①同月14日蒋介石记云：“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抗战乎？”两种方案，前者意味着在上海和日军决出胜负，后者意味着向吴福线转移。这则日记，说明蒋对自己的战略决定有过犹疑。但是，这一时期，蒋从全国各地抽调的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因此，蒋仍然决定长期坚守上海。其日记云：“各部虽死伤大半，然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②16、17日，日军发动总攻击，中方阵地动摇，前线指挥官向蒋要求撤退，蒋严令死守，并亲往昆山督师。^③21日，蒋介石调整部署，将中国军队分为右翼、中央、左翼三个作战军。右翼军以张发奎将军为总司令，下辖第八、第十两个集团军；中央军以朱绍良将军代替张治中为总司令，下辖第九集团军；左翼军总司令陈诚将军，下辖第十五、第十九两个集团军。

当时，中苏之间的枪械、弹药有两条运输线。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连接陇海路。9月11日，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震痛，在日记中激烈地批评第二战区司令长

①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3~4页。

② 《困勉记》。

③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21日。此际，李宗仁也曾劝蒋，“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见《李宗仁回忆录》（下），692~693页，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

官阎锡山,指责他未能守住大同等地,“使苏俄运械交通更为困难,其罪甚于宋哲元之失平津,可痛之至”^①! 26日,蒋介石得悉平汉线中国军队溃退,河北沧州不守,估计日军将进攻河南郑州,中俄之间的第二条联络线有可能截断,决定加强上海战场,吸引日军主力。27日,蒋介石决定四项抗敌策略:“一、引其在南方战场为主战场;二、击其一点;三、持久;四、(沿太行山脉侧面阵地)由晋出击。”^②10月8日,蒋介石决定调骁勇善战的桂军加入上海战场。10月15日日记云:“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17日,蒋介石到苏州督师。次日,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发动总反攻。

蒋介石之所以决定坚守上海,一是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维护中苏交通线,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外交斗争,争取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有较好的影响。《九国公约》签署于1922年2月,其签字国为美、英、日、法、意、比、荷、葡、中等九国。该条约表示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强调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与中国的门户开放。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国联”申诉,要求“谴责日本是侵略者”。“国联”没有采纳中国的要求,提议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10月16日,比利时向有关19国发出邀请,初定同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希望通过该次会议,“使各国怒敌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美、英允俄参战”^③。因此,蒋希望在该会召开之前,上海战场能有较好的战绩,至少,要能坚守上海。据唐生智回忆,蒋介石曾向他表示:“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④同月22日,蒋介石通电全军将

① 《困勉记》。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南京保卫战》,4页。

士,说明《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举行,全体将士“尤当特别努力,加倍奋励”,“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①为此,蒋介石向全国各地普遍调兵。24日,蒋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询问滇军出发各部到达何处,要龙命令该军“兼程急进,望能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到沪参战”,在会前有所表现的企图跃然欲出。^②

日本政府采取对应措施,不断从华北、东北及国内向上海战场增兵。10月1日,日首相近卫、陆相杉山、海相米内、外相广田举行会议,通过《中日战争处理纲要》,决定发动十月攻势,扩大华北和华中战局,将中国军队分别驱逐至河北省及原《上海停战协定》规定区域以外,迫使南京政府议和,结束战争。此后,上海战场日军参战兵力超过华北,达九个师团,20万人以上。17日,日本陆军省限令上海作战部队在《九国公约》签字国会前攻克闸北、南翔、嘉定一带。^③

双方既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较量,战场上的拼杀自然更加激烈。10月21日,广西增援部队第二十一集团军军长廖磊率部到沪,向蕴藻浜沿河之敌发起全线反攻。桂军作战勇敢,但武器落后,缺乏与现代化武装的日军作战的经验,未能挽救危局。22日蒋介石日记云:“满拟以桂军加入战线,为持久之计,不料反因桂军挫败,而退至走马塘之线,战局顿形动摇,殊所失望。”^④次日,桂军因伤亡过大,撤至京沪铁路以南地区整理。^⑤其他部队也伤亡惨重,第三十三师打到官兵仅剩十分之一,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一),55页,台北,1981。

② 《蒋委员长致龙云十月敬电》,《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藏。

③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281页。

④ 《困勉记》。

⑤ 《陈诚致蒋介石密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372页。

师长负伤，旅长失踪。^① 25日，中央军第七十八军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部防地为日军突破，朱军放弃位于上海西北的战略要地大场。至此，蒋介石才觉得“不能不变换阵地”，决定命中国军队作有限度的撤退，转移至苏州河南岸。但是为了给世人留下仍在坚守苏州河北岸的印象，他决定在闸北“留一团死守，以感动中外人心”。^② 27日夜，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率部留守闸北四行仓库，演出了八百壮士（实只四百人）孤军抗敌的悲壮一幕。31日，该团退入上海公共租界，坚持至1941年12月18日。

蒋介石认识到，中国的对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消耗战，但是，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防守战。8月18日，他发表《告抗战将士第二书》，主张“敌攻我守，待其气衰力竭，我即乘胜出击”。“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以深沟高垒厚壁，粉碎敌人进攻。”^③ 9月13日，蒋介石手拟《告各战区全军将士文》，再次强调固守，“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亦必在阵中抗战到底”^④。10月28日，他在松江召开军事会议，仍然表示：“要严密纵深配备，强固阵地工事”，“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⑤

要杀敌卫国，自然需要强调牺牲精神，但敌人拥有海、空优势，配备重武器，呆板的防守战必然带来巨大的伤亡，最终也难以守住阵地。当时，日方有各种飞机1500架，而中国仅有战斗机、轰炸机300架。^⑥ 8

① 《顾祝同致何应钦密电》，《抗日战争正面战场》，373～374页。

② 《困勉记》。

③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148页。

④ 同上，总第1167页。

⑤ 同上，总第1179页。

⑥ 《蒋介石秘录》，第4卷，2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月24日,张治中致蒋介石、何应钦密电云:“连日敌机甚为活跃,全日在
各处轰炸,毫无间断,我军日间几无活动余地,威胁甚大。”^①白崇禧也
表示:“无制空权,仗无法打。我官兵日间因飞机不能动,夜间因探照灯
亦不能动。长期抵抗,须另有打算。”^②淞沪之战,中国军队士气旺盛,
英勇抗敌,但蒋介石单纯防御,将几十万精锐密集于长江南岸狭长地区
内,层层设防,硬打死拼,大量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是很愚蠢的作
战方法。第二年,蒋介石回顾淞沪战役,就曾自我检讨,认为自己没有在
《九国公约》会议之前,及早退兵于吴淞线、乍嘉线阵地,“而于精疲力尽
时,反再增兵坚持,竟使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此余太坚强之过也”。^③

“坚强”是好事,但不顾条件,“坚强”太过,没有任何灵活性,就是执
拗了。

中国军方的大失误,忽视杭州湾防务

日军最初制订的作战计划是,在上海西北的白茆口和西南的杭州
湾登陆,占有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带。为此,日军早就对杭州湾实施
侦察,收集地志资料。^④金山卫水深,可停舰艇,又有利于登陆的沙滩,
明代倭寇扰浙时,即在此登陆。8月20日,蒋介石得报,金山卫有日本
水兵登陆侦察,指令“严防”。^⑤10月18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作战组

①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294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12日。

③ 《困勉记》,1938年2月2日。

④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554~555页。

⑤ 《困勉记》。

情报提出,日军有在杭州湾登陆的企图,但估计登陆部队最多一个师,不会对上海战局有什么影响。^①倒是张发奎将军有所警觉,亲到当地巡察,并配置了兵力:以第六十三师担任乍浦、澉浦防务,以第六十二师担任全公亭、金山嘴防务。10月26日,中央军撤到苏州河南岸后,浦东防务紧张,张发奎遂将第六十二师主力调防浦东,当地仅余该师少数兵员,实力空虚。^②

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以三个半师团的兵力,在舰炮掩护下,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因兵力悬殊,无法阻挡。中国统帅部急令已调浦东第六十二师的主力回兵,会同新到枫泾的第七十九师合力反击,并令从河南调来、新到青浦的第六十七军向松江推进。蒋介石希望借此稳住阵地。6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我军能站稳现有阵地,三日以后当无危险矣。”^③但是,由于天雨泥泞,加上日机轰炸,中国部队行动迟缓,日军后续部队源源登陆。第六十七军从河南调来,尚未集中,即遭敌各个击破。8日,松江失陷,这样,退守苏州河南岸的中国军队侧背受敌,有被围歼的危险。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场中国军队的侧背受到严重威胁,有可能陷入包围,使退却无路,全军覆没。有鉴于此,白崇禧将军再次向蒋介石提议,中国军队向吴淞线后撤。11月7日,朱绍良将军、何应钦将军等也提出,“已到不能不后撤之时会”^④。蒋介石权衡利害,这才认识到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日记云:“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重。”同日,蒋下令中国军队自

①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282页。

② 《第三战区淞沪会战经过概要》,《抗日战争正面战场》,381页。

③ 《困勉记》。

④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7日。

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① 但是，他仍然担心此举会对《九国公约》会议造成不良影响，痛苦地写道：“借此战略关系而撤退，使敌知我非为力尽而退，则不敢穷追与再攻，是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②

忽视杭州湾北岸防务是重大的战略错误。后来蒋介石总结说：“由大场撤退至苏州河南岸以后，以张发奎为指挥官，使金山卫、乍浦一带，负责无人，不注重侧背之重要，只注意浦东之兵力不足，调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东，乃使敌军得乘虚而入，此余战略最大之失败也。”^③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必须既善于组织进攻，又善于组织撤退。蒋介石下令在苏州河南岸撤退后，中国军队争相夺路，秩序混乱，作战能力丧失殆尽。郭汝瑰将军后来说：“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④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南市，上海市长发表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淞沪之战双方都付出了很大代价。据日方统计，至11月8日止，日军在上海战场阵亡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⑤ 但是，中国方面损失更大。据何应钦将军11月5日报告，淞沪战场中国军队死伤187200人，约为日军的4倍半。^⑥

① 参见《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6日。

② 《困勉记》。

③ 《省克记》。

④ 《八一三淞沪抗战》，252页。

⑤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战役》，555页。

⑥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5日。

南京：守乎？弃乎？

日军攻占上海后，军方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军队已经非常疲劳，必须休整，一种意见认为，军队虽然疲劳，但仍应攻占南京。11月7日，日军编组华中方面军，以松井石根兼任司令官，规定以苏州、嘉兴联结线为“统制线”，在此以东作战。但是，第二天，日军就兵分两路。一路以上海派遣军为主力，沿沪宁铁路线西进，一路以第十军和国崎支队为主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13日，日军一部在常熟白茆口登陆，声势更盛。15日，第十军幕僚会议认为，中国军队已处于溃散状态，如果把握战机，断然实施追击，二十天即可占领南京。华中方面军赞同占领南京的意见，认为“现在敌军的抵抗，各阵地均极微弱”，如不继续进攻，“不仅错失战机，且令敌军恢复其士气，造成重整其军备的结果，恐难于彻底挫折其战斗意志”。^①

日军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11月13日，蒋介石决计迁都，长期抗战。日记云：“抗倭之最后地区与基本线乃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而抗倭之最大困难，乃在最后五分钟，此时应决心迁都于重庆，以实施长期抗战之计，且可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迫订城下之盟之妄念。”^②但是，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高级将领中普遍反对“固守”。有人明确表示，不应在南京作没有“军略价值之牺牲”，白崇禧将军主张改取游击战，刘斐将军主张适当抵抗之后主动撤退，只作象

① 《从卢沟桥事变到南京作战》，601页。

② 《困勉记》。

征性防守。^① 蒋介石一时也拿不定主意。11月17日日记云：“南京应固守乎？放弃乎？殊令人踌躇难决。”^② 不过，蒋介石和唐生智上将都认为，南京为首都所在，总理陵墓所在，不可不作重大牺牲。蒋并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认为统帅不宜守城，时在病中的唐生智将军遂主动请缨。^③ 19日，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兴中将为副司令长官，负责守卫南京，时间为三个月至一年。^④ 不过，蒋介石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7日，蒋介石巡视南京城防工事，叹惜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⑤ 这声叹惜，正是蒋内心矛盾的表现。

淞沪之战打响后，主和之议一直未歇。9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时至今日，只有抗战到底之一法。主和派应竭力制止之。”^⑥ 次日日记云：“除牺牲到底外，再无其他出路。主和之见，乃书生误国之尤者，试思此时尚能议和乎！”^⑦ 及至淞沪战败，主和之议再盛。司法院院长居正原来坚决反对和议，力主逮捕胡适，此时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⑧ 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⑨

①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8~9页。

② 《困勉记》。

③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19日；参见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南京保卫战》，3~4页。

④ 《徐永昌日记》，1937年11月6日。

⑤ 《困勉记》。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王世杰日记》，1937年11月21日。

⑨ 《困勉记》。

为了守卫南京,中国统帅部的第三期作战计划规定:京沪线方面,以最小限之兵力,利用既设工事,节节抵抗,同时抽调兵力,以一部转入沪杭线,抵御向太湖南岸进军的日军,一部增强南京防御能力。计划称,在后续援军到达时,将以皖南的广德为中心,与敌决战,在钱塘江附近歼灭日军。^①当时,中国军队已退至第一道国防线——吴福线,但是,这道被誉为中国兴登堡防线的国防工程却“无图可按,无钥开门,无人指示”^②。19日,日军进占苏州。俗语云:“兵败如山倒。”吴福线不守,中国军队主力继续向锡澄线及太湖西南的安吉(浙江)、宁国(安徽)等地溃退,蒋介石原来以为“有良好地形,坚固阵地,可资扼守”的锡澄线同样没有发挥作用。11月20日,蒋介石调集第二十三集团军川军刘湘部五个师、两个独立旅,由四川赶到皖南广德、浙西北的泗安、长兴一线。不过,川军作战能力很低,纪律很坏,“闻敌即走”,并未发挥多大作用。^③11月23日,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局势也并无改变。11月25日,无锡失守。26日,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失陷。蒋介石得悉撤退秩序不良,日记云:“竟不分步骤,全线尽撤,绝无规律,痛心至极!”^④29日,日军侵占宜兴。30日,日军攻陷广德,从东南、西南两个方面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12月1日,江防要塞江阴失守。同日,日方下达“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应与海军联合进攻中国首都南京”的皇命,日军分三路进攻南京。

蒋介石反对与日本议和,但不反对国际调停。早在日军金山卫登陆之际,德国大使陶德曼(Oskar P. Trautmann)即受日方委托,向蒋

① 《淞沪作战第三期作战计划》,《抗日战争正面战场》,331页。

②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333~334页。

③ 《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3日。

④ 《困勉记》。

转达日方媾和条件,蒋介石认为,这些条件“仍以防共协定为主”,“乃严词拒绝之”。^① 24日,蒋介石曾经寄予希望的《九国公约》会议闭会,没有取得任何积极性成果。12月2日,蒋介石为行“缓兵计”,再次会见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方所提条件为谈判基础,但要求先停战后谈判。6日,蒋介石得悉句容危急,决定离开南京,日记云:“敌以德大使所提调停办法,不能迫我屈服,乃已决绝乎!”^② 7日,蒋介石飞离南京。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③ 到庐山后,蒋介石即研究、制订全国总动员计划,准备在“全国被敌占领”的最坏情况下仍然坚持奋斗。^④

南京的防御工事分“外围阵地”与以城墙为主要依托的“复廓阵地”两种。12月5日,日军进攻“外围阵地”。8日,汤山失守,唐生智将军下令中国军队进入“复廓阵地”。9日,日军逼近南京城墙,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坚决拒绝。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

淞沪之战中,中国军队消耗过大。战后,武器、弹药、粮食都严重缺乏,士气极端低落。蒋介石多方拼凑,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12万人,其中新补士兵约3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

① 《困勉记》。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蒋介石1937年12月9日日记云:“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见《困勉记》。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①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的必要条件。^②10月22日,蒋致电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询问如《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失败,中国决心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日期。11月10日,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③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可以出兵,同时还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该会议将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后举行。^④此电与杨杰、张冲的报告不同,蒋介石内心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⑤,但他仍然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

① 《王世杰日记》,1937年9月1日。

② 同上,1937年9月28日。

③ 《蒋委员长致蒋廷黻、杨杰(请伏元帅转斯大林先生)电》,《革命文献·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

④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蒋委员长十二月电》,《革命文献·对苏外交》,《蒋中正总统档案》。原电无日期,此据《徐永昌日记》考订。

⑤ 《困勉记》,1937年12月5日。

助”^①。不仅如此,他还继续以之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声称“俟之两个月,必有变动”^②。12月6日,蒋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必可转危为安。”^③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必大变”,仍指苏联出兵。12月11日,蒋已经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④。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将军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⑤不难看出,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⑥,这正是蒋介石当时的无奈心理。

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的地步,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在远东有所动作。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但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340页。

② 《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6日。

③ 《蒋委员长致李宗仁、阎锡山等电》,《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蒋中正总统档案》。

④ 《南京保卫战战斗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413页。

⑤ 《蒋委员长致唐生智、刘兴、罗卓英电》,《革命文献·淞沪会战与南京撤守》,《蒋中正总统档案》。

⑥ 《爱记》(稿本),1937年12月9日。

是,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①。“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②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旋即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淞沪战败之后,南京失陷有其必然性,但是,突围与撤退时的严重混乱及其损失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坚持抗战国策

首都失陷,常常和国家沦亡相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现象。一时间,日军骄横气焰达于极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蒋介石个人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怎么办?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③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以为掩护”^④。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⑤18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皆以为军事失败,非

① 《宪兵司令部战斗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433页。

②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会战详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424~425页。

③ 《困勉记》,1937年12月15日。

④ 同上,1937年12月16日。

⑤ 《王世杰日记》,1937年12月2日、27日。

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①当时，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26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②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③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及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④。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⑤！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⑥他最终决定，拒绝德国方面的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华北战场失利与平型关之捷

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决定进行华北会战，扩大战果，占领华北要地。其主决战方向为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线南下，打击在河北省境

① 《困勉记》。

② 《困勉记》，1937年12月26日。

③ 同上，1937年12月27日。

④ 同上，1937年12月28日。

⑤ 同上，1937年12月29日。

⑥ 《困勉记》。

内的中国军队主力,同时沿平绥路西进,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及绥远。8月31日,日本编成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上将为司令官,兵力约37万人。

中国方面为保卫华北,将平汉、津浦两条铁路线的北段划为第一战区,以之作为与日军作战的正面战场,同时将山西、察哈尔、绥远三省划为第二战区,作为“侧背”。两个战区共辖六个集团军,约60万人。为了就近指导河北方面的作战,军事委员会在保定设立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

自8月11日至10月16日,沿平绥路进攻的日军先后占领南口、张家口、大同、包头等地,控制北平西北的广大地区,解除其南下威胁。自9月中旬至12月下旬,沿平汉、津浦线进攻的日军先后占领石家庄及河南北部的安阳等地。中国军队虽然作战顽强,但未能遏阻敌人的进攻。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的参战,中国方面才在山西平型关取得了一次规模不大但振奋人心的胜利。

9月中旬,日军进攻山西北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以内长城线为依托,把守平型关、雁门关一线,阻止日军对山西中部的进攻。9月24日,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和副师长聂荣臻决定利用平型关附近的山地,集中兵力设伏。25日,日军板垣征四郎所属第5师第21旅的后续部队行经该地,中国军队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双方短兵相接,日本空军无法发挥作用。此役中国军队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缴获辎重马车二百余辆及大量军用物资。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状况下,八路军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无疑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此役也昭示,对优势日军作战,必须有特殊的战略、战术。

平型关战后,阎锡山以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集中主力,在山西省会太原以北的忻口抗击日军。10月中旬,第九军

军长郝梦龄中将指挥的中央兵团等部曾重创来犯日军，郝壮烈牺牲。同时，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则进军敌后，展开游击战，切断日军交通线。蒋介石曾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赞扬该部“屡建奇功”。^①但是，小型的局部性的胜利一时还无法影响战争全局。10月26日，日军攻陷山西东部门户娘子关，太原危急。阎锡山为固守省会，下令中国军队撤离忻口。11月9日，日军攻入太原，守城中国军队突围而出。同月，日军攻陷山东省会济南。

结 束 语

自7月7日至12月13日五个多月时间内，中国军队同时在华北、华东两个战场英勇作战，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在短时期内速胜的美梦，显示出中国军队、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日军虽在华北地区先后占领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省的许多城市，在华东则攻占上海、南京，威胁皖浙，但是，这也使其在中国战场上愈陷愈深，难以自拔。

敌强我弱，在两国军事实力相差过于悬殊的情况下，失去部分城市和领土乃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必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领导者的最大问题是，战略、战术呆板，过于看重一城一地的得失，只懂得阵地战、防御战，单纯和敌人硬碰硬，拼力量，拼消耗，而不懂得运用其他作战形式，以求更多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淞沪、南京之战中，又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和苏联出兵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组

^① 《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织战略撤退,造成中国军队空前巨大的损失。

从战争学习战争。这一时期的战场失利使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认识到,中国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必须以空间换时间,必须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懂得运用运动战、游击战。11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时应令各战区发动游击战,使敌所占领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之防不胜防也。”^①12月1日日记云:“抗倭制胜之道,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之干涉,又使敌军在广大区域,留驻多数兵力,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此我之基本主张,万不可稍有动摇。”^②同月16日,南京失守后的第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③这些地方都说明,通过挫折和失败,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战略思想有了某些长进。

本文为提交2004年1月在夏威夷召开的中日战争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日文稿发表于《日中战争の军事展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英文稿待刊。

① 《困勉记》。

② 《省克记》。

③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总第1200页。

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平津沦陷,胡适向蒋介石上条陈

台湾蒋介石档案中,藏有陶希圣致陈布雷函手迹一通,函云:

布雷先生:

本日下午五时,希同胡适之先生奉谒,未遇为悵。我等以为川越之南下,中国政府只有两种态度:(一)为拒绝其入京,(二)为积极表示政府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希等主张第二办法,并主张与之作一刀两断之方案,即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领土行政完整。其冀察部分希仍主张以实力保守沧保线而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此种意见之意义在运用我国可战之力与必战之势,不轻启大战,亦不可避免大战。盖大战所耗之力亦即我国之统一与现代化之力。若轻于用尽,必使中国复归于民六、民八敌方纷争时也。望先生为委座陈之。

弟陶希圣上,五日

陶希圣(1899—1988),名汇曾,字希圣,后以字行。湖北黄冈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1927年参加北伐军政治工作。1929年主编

《食货》半月刊。1931年任北京大学教授。陈布雷(1890—1948),原名训恩,布雷为其笔名。浙江慈溪人。1927年加入国民党。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1937年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常为蒋介石起草文稿。函中所称川越,指川越茂,原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1936年被提拔为日本驻华大使。次年奉调回国。1937年6月,再度使华。同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次日,川越声称赴北平“避暑”,自上海北上,滞留天津,和中国政府之间的交涉均由使馆参事代理。经中国政府与日本外务省交涉,川越才于8月3日离津,经大连南返。函末署五日,知此函为1937年8月5日作。当日,陶希圣与胡适共同访问陈布雷,企图对时局有所建议,未遇,便由陶希圣出面,写了这封信,要求陈向蒋介石陈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但他同时又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他提出解决卢沟桥事件四原则:1. 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 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组织;3. 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 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得受任何约束。^①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积极部署军队,企图防守沧县至保定一线。陶函即是在这一情况下提出的应时之策。虽仅一人署名,但函中明言“我等”,则代表胡适观点无疑。

卢沟桥事变后,在对日态度上,国民党和知识阶层人士分为和战两派。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认为中国国力衰弱,与日本作战必败,极力主和,形成所谓“低调俱乐部”。8月3日,川越茂离津时,曾就卢沟桥事件向记者表示:“吾人担任外交,非努力将此种事

^① 《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1128~1131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78。

件设法由和平解决不可。结果如何，固当别论，自应尽力从事者也。”^① 又称：“仍冀中日关系于最后危机线上可以转换，尽力调整国交。”^② 陶、胡对川越茂的南返存有希望，提出不要拒绝他人京，而要利用他“在决战之前作最后之外交努力”，与日本达成“一刀两断”的方案，其内容为保持冀察领土完整，保守河北中部的沧州、保定一线，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而其交换条件则为“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

何处是陶、胡所指“力所不及之失地”，函中未明言，但同函附有条陈一份。

原则：解决中日两国间一切悬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建立两国间之友谊与合作，以建立东亚的长期和平。

方针：

(一) 中华民国政府在左(下——笔者)列条件之下，可以承认东三省脱离中华民国，成为满洲国：

1. 在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得自由选择其国籍；
2. 在东三省境内，中华民国之人民享受居留、经营商业及购置土地产业之自由；
3. 东三省境内之人民应有充分机会，由渐进程序，做到自治独立的宪政国家；
4. 在相当时期，如满洲国民以自由意志举行总投票表决愿意复归中华民国统治，他国不得干涉阻止；
5. 热河全省归还中华民国，由中国政府任命文官大员在热河

① 《川越昨飞大连》，《申报》，1937年8月4日。

② 《川越由连来沪》，《申报》，1937年8月5日。

组织现代化之省政府,将热河全省作为非武装之区域;

6. 自临榆县(山海关)起至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

(二)中华民国全境内(包括察哈尔全部、冀东、河北、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汉口、上海、福建等处),日本完全撤退其驻屯军队及特务机关,并自动放弃其驻兵权、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此后在中国境内居留之人民,其安全与权益,完全由中国政府负责保护。

(三)中国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努力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以谋亚洲东部之永久和平。

(四)中国与日本共同努力,促成太平洋区域安全保障之国际协定。

(五)日本重回国际联盟。

外交手续:

1. 两国政府商定上项方针(不公布)之后。两国政府同时宣布撤退两国军队,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疆土原状。中国军队撤退至河北省境外,日本军队撤退至长城线外。北平、天津及河北省曾被日本占据地域内之政警务由中国政府派文官大员接管。其治安维持,由中国保安队担负。两国政府宣布军队撤退时,同时声明在公布之后三个月之内,由两国选派全权代表在指定地点开始调整中日关系的会议。

2. 第二步为根本调整中日关系的会议,依据两国政府会商同意之原则与方针,作详细的节目的讨论。此第二步之谈判,应不厌其详,务求解决两国间一切悬案,树立新的国交。谈判期间不嫌其长,至少应有两三个月之讨论。交涉之结果,作成详细条约,经两国政府同意后,由两国全权代表签字。

此条陈用红格稿纸直行书写,共4页,根据字迹,一望而知为胡适亲笔。据此可知,陶、胡二人所主张放弃的“力所不及之失地”,指的就是东三省。条陈中,陶、胡明确提出,在东三省人民可自由选择国籍以及将来可以用“总投票表决”的办法“复归中华民国统治”等四项条件下,中国可以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陶、胡二人企图以此换取日本让步,自东三省以外的中国境内全面撤兵,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

陈布雷见到陶希圣的信件和胡适的条陈后,于8月6日转呈蒋介石,同时写了一封短函,表示自己的意见,中云:

兹有陶希圣、胡适密陈国事一函,所言或未必有当,而其忠诚迫切,不敢不以上闻,敬祈睿察。

函中,陈布雷明确否定了陶、胡之见,但肯定二人的“忠诚迫切”。蒋介石见到后,在第二天召开的国防会议上介绍了胡适的“主和”主张,加以讥刺,但他未点胡适的名,而是称为“某学者”。参谋总长程潜很生气,直斥胡适为“汉奸”。^①当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时,蒋介石又说:

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

同时有许多学者说,你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

^① 《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旦,以为此事我们不可以打战〔仗〕,难打胜战〔仗〕。^①

显然,蒋介石所称“许多人”,包含陶希圣和胡适;所称“有人”,更直指陶、胡。蒋所称“以长城为界”,正是胡适在条陈中所述意见:“自临榆县(山海关)起至独石口之长城线由中华民国设防守御”,“日本军队撤退至长城线外”;所称“不能将几百千年的民族结晶,牺牲于一旦”,也与陶函所述不能将国力“轻于用尽”的意思相近。然而,蒋介石又说:

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把中国的国际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②

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没有“信义”,而且贪欲无尽,得寸进尺,吃到一块肥肉之后还想吃下一块,占了一个便宜之后还想占下一个。以为承认“满洲国”,放弃东三省就可以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止步,换来中日间的长久和平,实在是一个天真而幼稚的幻想。在这一点上,作为学者的陶希圣、胡适糊涂,而蒋介石却比较清醒。因此,蒋介石又说:“革命的战争,是侵略者失败的。日本人只能看到物质与军队,精神上他们都没有看到。各位同志,大家今天要有一个决定,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战〔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战〔仗〕不可。”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陶希圣、胡适的意见被否定。蒋介石在信封上用蓝色铅笔写了一个“胡”字、一个“存”字,将二人的信件“留中”了。

① 《抗战爆发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② 同上。

胡适条陈之后,蒋介石档案还收有陶希圣《中日外交意见书》一份,建议“以非常之方法准备外交谈判”。其方法有三种:1.派遣要员直接与川越茂“作侧面而有力之秘密周旋,在京沪急转直下以达于正式谈判”;2.派在野重要人员直到东京,访问日本近卫首相与广田外相以至日本军部,作开始谈判之先声;3.在伦敦由中国驻英大使经过或不经英国外交部之周旋,与日本驻英大使开始作谈判之准备。陶希圣认为,以上三种方法中,以第三种较为适宜。《意见书》中,陶希圣进一步提出与日本谈判的“最高与最低限度之条件”。他说:

今日中国不能战胜日本,故当然不得不作最高限度之让步。今日中国已能抵抗过度之侵略而维持生存,故可以要求独立自主之存在,非一·二八以前或塘沽协定以前忍气吞声可比也。所谓独立自主之存在,一则如政治经济组织之完整,二则如国防之自由建设,三则如国际关系之自决,皆其必有之条件。故共同防共、五省自治乃至走私等等,皆在最低限度之下,不可容许。然为保持此最低限度,在最高之让步,不可不以盖世绝代之魄力而为之。最高之让步,全为保持完整独立自主之政治经济军事之组织,不恤将六年来之一切纷扰,一刀两断而解决之。为此,宜一改过去只定最低限度之容忍条件,消极的拒绝其要求或降低之之态度,积极的提出我国保持完整独立自主国家所能处之代价,具体简明言之,宁割地而不丧权,不复效过去宁丧权而不肯割地,以致地仍失而权亦不保。

《意见书》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盖世之魄力”作“最高之让步”,“宁割地而不丧权”,可见,其主要意见仍是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意见书》最后称:“依此痛苦之认识,另提交涉条件,兹不再赘。”并以括号

说明“胡适之先生写成另交”。可见这份《意见书》仍为陶、胡二人的共同意见。《意见书》并称：“上海战起，首都被袭，更无从再谈不战。”“上海战起”，指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首都被袭”，指8月15日日本飞机两次空袭南京。据此，知此《意见书》写于8月15日之后不久。当时，抗战已成国策，但是，陶希圣、胡适仍然担心战争会毁灭中国精华，主张通过“割地”，以外交手段结束军事。《意见书》说：“若我尽吾六年来之菁华而置之于疆场，则菁华既竭，分崩又起。故当在外交上乘我力未竭之时，求收束军事也。”

早有此议

胡适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35年6月17日，胡适就致函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要求“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当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亲日派分子白逾桓等二人在天津日租界被暗杀以及东北义勇军一部退入滦东“非武装区”，要求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中央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禁止全国的排日行为。为了施加武力威胁，日本还从中国东北调关东军人关。6月10日，胡适从何应钦处得知，“日本人的要求完全接受了”，心里觉得“难过得很”。^①次日，胡适特撰《沉默的忍受》一文，号召国人接受教训，“把国家的耻辱化成我们的骨血志气，使骨头硬，使血热，使志气坚韧刚毅，时时提撕警醒自己”^②。同月17日，胡适因担心国民政府“在枪尖之下步步退让”，“自

①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5年6月10日。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

② 《独立评论》第155号。

己一无所得”，发展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便错误地向王世杰提出：中国方面承认“满洲国”，而日本方面则归还热河，取消《华北停战协定》，自动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的种种条件，如在北平、天津塘沽、山海关一带驻兵权等。胡适将这一“交换”称为“有代价的让步”。^①可以看出，胡适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向蒋介石所上条陈的基本内容在1935年6月华北危急时就已形成了。

王世杰反对胡适的意见，6月28日复函称：

故在今日，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某种条件既万不可得，日方亦决不因伪国之承认而中止其侵略与威胁。而在他一方面，在我国政府一经微示承认伪国之意思以后，对国联，对所谓华府九国，即立刻失其立场。国内之分裂，政府之崩溃，恐亦绝难幸免。^②

王世杰清醒地看到了胡适主张的巨大危害：日本不会因得到部分满足而停止侵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无法立足，在国内则面临分裂、崩溃的危险。但是，胡适执迷不悟，7月26日致函罗隆基，告以致王世杰函内容，函称：

雪艇（指王世杰——笔者）诸人赞成我的“公开交涉”，而抹去我的“解决一切悬案”的一句，他们尤不愿谈及伪国的承认问题。他们不曾把我的原电及原函转呈蒋先生，其实这是他们的过虑。

^① 胡适此函未留稿，其内容见《致罗隆基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5年6月30日；参见胡适1935年6月20日《致王世杰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5年6月20日。

^②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5年6月29日。

胡适否认自己的方案是“妥协论”,要求罗隆基将此函带给蒋介石一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适曾应邀参加蒋介石所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在听了蒋的谈话后,他表示“非常兴奋”,建议调用全国的军队充实河北国防,而且肯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等华北将领“不屈服,不丧失主权”。^①但是,很快他就发生转变。7月28日,胡适下山飞抵南京。29日,得悉中国军队在南苑等处惨败,宋哲元等退出北平,胡适大为紧张,即积极活动,力主与日本“和谈”。30日,他到高宗武家吃饭,与所谓南京的“青年智囊团”萧同兹、程沧波等人商议,决定外交路线不能断,由高宗武负责打通此线,同时决定寻找“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中的要人,胡适看中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要他做“社稷之臣”,在蒋的身边“努力做匡过补阙的事”。^②31日,胡适致函蒋廷黻,声称“这几天是最吃紧的关头”,“焦急的不得了,又没有办法”。^③同日,胡适应邀到蒋介石处吃饭。蒋称“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蒋的意见得到在座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支持,胡适觉得不便说话,只表示:“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当日,胡适日记云:“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④这则日记说明,胡适自知自己放弃东三省的主张难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接受,但他还是要竭尽心力去游说。8月3日,胡适、吴达铨、周炳琳、罗家伦、蒋梦麟等在王世杰家密谈。王世杰日记记载:“今日午后与胡适之先生谈,彼亦极端恐慌,并主张汪、蒋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

① 《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会速记录》,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1937年7月30日,576~577页,中华书局,1985。

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363~384页,中华书局,1979。

④ 《胡适的日记》,1937年7月31日,577页,中华书局,1985。miracle,奇迹。

议和之条件。”周炳琳、蒋梦麟同意胡适的意见，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① 8月5日，胡适遂与陶希圣共同拜会陈布雷，企图通过陈向蒋介石递条陈。次日，胡适得到蒋介石的谈话通知，胡适事先准备了一封长函，用以补充谈话中的不足。其主题为：“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其理由为：1. 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 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 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其步骤为：先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之疆土情况；第二步，两三个月后举行正式交涉。^② 显然，与上引8月5日条陈及陶希圣函的精神完全一致。不同的是，此函未提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而代之以“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会谈情况，据记载：“蒋甚客气，但未表示意见。”^③

胡适抛弃“和平梦想”

胡适放弃东三省的主张当然大错特错，但是，有其特殊的用心所在。1935年6月20日，胡适在致王世杰函中，说明自己的目的是“讨价还价，利用人之弱点，争回一点已失或将再糊涂失去的国土与权利”，从而取得“喘气十年”的机会。他说：

① 《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3日。

② 《抗日战争初期胡适的卖国罪证》（胡适日记摘录），《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此日日记，后来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辑《胡适的日记》时失收。

③ 《王世杰日记》，1937年8月6日。

察、冀、平、津必不可再失。失了之后,鲁、晋、豫当然随之而去。如此,则中国矿源最大中心与文化中心都归敌手。如此形势之下,中央又岂能练军整顿内政?①

胡适估计:“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因此,他在提出向日本“求和”的第一方案的同时,又提出不计利害,苦战四年,等待国际大战的“主战”方案。同年6月27日,他在致王世杰函中说:

欲使日本的发难变成国际大劫,非有中国下绝大的决心不可。

我们试平心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②

胡适提出,必须准备:1. 中国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全部被日军侵占毁灭;2. 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南等省沦陷;3. 长江被封锁,天津、上海被侵占,财政总崩溃。胡适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他说:

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之后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

①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5年6月20日。

② 同上,1935年6月27日。

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①

胡适并不认为，他的第一方案一定成功，因此，提出必须以第二方案为后盾。他说：“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能免于一战。”他并以俄国史为例，说明列宁和苏俄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之后，与德国讲和，“割地之多，几乎等于欧俄的三分之一，几乎把大彼得以来所得地全割掉了，但苏俄终于免不掉三年多的苦战”。他要中国人向苏俄学习，说“苏俄三年多的苦战最可以做我们今日的榜样。我们如要作战，必须下绝大决心，吃三年或四年的绝大痛苦”^②。胡适所没有想到的是，后来中国人民忍受的痛苦比他估计的还要大，苦战的时间也更长。

淞沪之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意志坚决，中国士兵作战英勇。这使胡适受到感染。9月8日，胡适离开南京，行前，他劝汪精卫“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劝高宗武：“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③又劝陶希圣说：“仗是打一个时期的好。不必再主和议。”^④自此，胡适“态度全变”，“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⑤不久，胡适接受蒋介石的决定，以非官方身份赴美，争取国际支援中国抗战。次年，又出任驻美大使，投入中国的抗战外交。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2期

①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5年6月27日。

② 同上，1935年6月27日。

③ 《胡适的日记》，1937年9月8日，581页，中华书局，1985。

④ 《陶希圣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396页。

⑤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364页。

毛泽东、李富春的一封未刊英文函件

——美国所见中国名人书札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有毛泽东、李富春的一封英文信件，是中美关系史的珍贵资料，现译出，格式一依原函：

Yenching, Kiangsi, Aug. 20, 1938

China Aid Council
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
268 Fourth Avenue
New York City, USA

Dear Sirs:

The 8th Route Army Medical Service has been informed thru Miss Agnes Smedly of the mix-up in funds for the month of July for the Front Field Hospital of the 8th Route Army, involving a sum of US\$ 650.00 which had to be repaid to the bank of City of New York, Hankow. The sum has been repaid to the bank and 8th Route Army medical service agrees with the action taken in this respect.

The remainder of the funds for July have been transmitted amounting to \$2,571.43 Chinese and an official receipt is on the way.

In regards to the Field Hospital a detailed preliminary report has been sent and will be followed up by regular monthly reports in the future.

The 8th Route Army Medical Service also wishes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ir sincere thanks for the tremendous support that has been forthcoming and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such help will continue. This thanks not only from the Medical Department but from all the wounded and suffering who have been able to obtain such needed help from your support.

Sincerely, with Greetings,

毛泽东 李富春

8th Route Army Medical Service.

毛泽东
李富春

毛泽东、李富春的英文函件

延安, 陕西, 8. 20. 1938

援华会
促进和平与民主同盟
第 4 街 268 号
纽约, 美国

亲爱的先生:

八路军卫生部经由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小姐得知, 7 月份八路军野战医院的综合费用共 650 美元, 必须偿还在汉口的纽约花旗银行, 此款现已偿还该行。八路军卫生部同意这一做法。

7 月份资助余款已经兑换为中国货币 2571. 43 元, 正式报告已经寄出。

野战医院的一份详细的初步的报告也已寄出, 今后将按月报告有关情况。

八路军卫生部希望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得到巨大援助的真诚谢意, 并且希望这种援助能够继续。这种感谢不仅发自卫生部, 而且发自所有得到你们很多帮助的伤员。

您的真诚的, 致以敬意的

毛泽东(签字) 李富春(签字)

八路军卫生部

毛泽东(签字章)

李富春(签字章)

当年 6 月 15 日, 毛泽东曾写信给延安《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 要他代为起草一封信给一位美国“同情者”, 信云:

亮平同志：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毛泽东、李富春的英文函件当亦由别人起草。两封信之间或许存在着联系。致吴亮平函中所称“美国一位同情者”，或即史沫特莱。

促进和平与民主同盟(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是当时美国最大的反战和平组织，拥有 400 万会员。它曾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斗争。中国抗战开始后，该同盟即组织专门的援华委员会(China Aid Council)，当时称为美国援华会，或译全美援华委员会。该会设总部于纽约，并在各地建立分会五十余处。援华会的主要活动为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举行反对轰炸中国的示威，组织周游讲演，动员募捐。该会成立不久，即向中国派出两名医生、一名护士，同时按月接济医药救济费用 1500 美元。本函所称 7 月份的资助，当指这一笔款项。



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运动的珍贵文献

——读宋庆龄往来英文未刊函札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有宋庆龄英文往来函札多件。其中一部分,美国圣若望大学李又宁教授已经作过评述^①,这里将全文译出这些信件,并在李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历史内容。

哥大所藏宋庆龄函件,除个别手迹外,均用保卫中国同盟信笺,英文打字。大部分发于香港。

保卫中国同盟 1938 年 6 月 14 日成立于香港,由宋庆龄发起。其目的为动员、鼓励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列名发起的还有印度尼赫鲁、美国保罗·罗伯逊、德国托马斯·曼以及冯玉祥、孙科、宋子文等。宋庆龄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任秘书长。邹韬奋、金仲华、陈翰笙、路易·艾黎、沙尔文·克拉克、诺曼·法朗士、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诺、王安娜等均为“保盟”成员。在其活动的年代里,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有关宋庆龄的大量文献中,哥大所藏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即使是这一部分,也足以充分展现宋庆龄的功绩和伟大品格。

^① 《介绍最近发现的几封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信》,《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

1938年8月5日宋庆龄致哈斯克尔先生

大札叙述了在为中国征集捐款时遇到的困难,极有帮助,非常感激。我们得以充分了解,由于敌方的阴险宣传和反动分子歪曲我们卷入的各种问题,美国公众普遍冷淡。我们一定尽力工作,在将来为您提供丰富多彩的资料和激动人心的呼吁书。

在美国的收获如此微小,令人十分沮丧。我本来期望很大,其理由,这里不必说了。

您在划拨资金给汉口的林博士时碰到了困难。我们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正是为了确实地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好几个集团军都有代表驻在香港,他们也是我们同盟的成员。我们将愉快地按照您的指定,将资金划拨给某一个集团军或组织,并从那里取得收据。请详细说明您希望资助的处所,以便发送资金。由于可能从汉口撤退,发送或邮寄资金到那里是不明智的。我们将愉快地尽一切可能发挥联络作用。

我正计划在最近几天内飞赴汉口,希望能找到办法,迅速补救对外宣传及与之相关的不足,同时将提出您在信中叙述的某些困难。

具有严格保密性质的事务请直接和我联系,不必通过我们的办公地址香港和上海银行转。我的地址是:香港 Conduit 路 11号,2A 房间,宋庆龄夫人。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您的十分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又及,请尽可能广泛地分发我们的通告。

宋庆龄

本函大部分为英文打字,“又及”以下,为宋庆龄手迹。哈斯克尔(Haskell),生平未详,当为美国援华会工作人员。林博士,原函作 Dr. Lim,当指林可胜,福建厦门人,著名医学家。多次组织医疗队,参加抗日医疗救护工作。1937年10月,组织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任救护总队总队长。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卫生行政人员训练所主任。

宋庆龄写这封信的时候,保卫中国同盟成立才一个多月。附言中提到的“通告”当指《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该《宣言》声明:为了加强和扩大国外援华工作起见,所有愿意与“保盟”合作的机构,均可与“保盟”香港中央委员会取得联系。“保盟”中央委员会可以:(1)成为各机构与其所支援的中国有关方面之间的桥梁;(2)供给各机构消息及有关的建议。宋庆龄要求哈斯克尔尽可能广泛地分发这份《宣言》,以扩大影响。

从信中可以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险宣传等原因,“保盟”开始工作时很困难,收效不大,但宋庆龄坚韧不拔,积极改进,力争以最好的成绩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938年9月8日宋庆龄致哈斯克尔先生

附寄我们的《新闻通讯》。在我去广东之前收到您7月12日极有启发的来信。出于对您的信任,我不想隐瞒,从大札中获得信息是我们海外运动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如果您能不断地向我个人提供美国的情况,我将十分感激。

实现访美愿望还不可能。我已被选为广东省海外动员委员会委员,即将再去广州以保持必要的联系。我下面给您的地址是在中国期间的永久地址,请将所有的信件寄到我的私人地址。

感谢您为在精神和物质上援助我们而作出的巨大努力,祝您成功!

您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孙逸仙夫人)

2A 房间

Conduit 路 11 号

香港,中国

9 月 8 日,1938 年

《新闻通讯》,是保卫中国同盟的英文机关刊物,自 1939 年 4 月 1 日起,初为两周刊,后为月刊,并增出中文版。据本函,此前当已不定期出版。

当年 8 月 20 日,宋庆龄离港赴穗,到广州会见中共中央代表邓颖超。次日,赴各医院慰问受伤将士及被敌机轰炸的难民。下旬,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声明中国将“拼死的斗争,坚持抗战,直到最后的胜利”,呼吁英美不要和日本贸易,停止将原料和技术输给日本。^① 同月 25 日返港。本函所称广东之行,指此。

宋庆龄非常重视华侨的力量。1937 年 12 月,她支持广东群众团体成立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任名誉主席。次年 3 月,她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呼吁华侨支援祖国抗日部队。本函所称广东省海外动员总会,或即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宋庆龄发出此信后不久,又再返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 年 8 月 24 日。

广州。当时，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正在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宋庆龄曾为会议写作《华侨总动员》一文，要求“加紧华侨中的团结，充实与扩大华侨救国的组织，统一华侨运动的领导”^①，对于“海外动员”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11月21日宋庆龄致顾维钧

“中国人民之友”法国协会(地址:Irue de Clichy)来信说:愿以展览及义卖中国工艺品的方式为我们募款。圣诞节期间,在伦敦的援华会也在做类似的努力,为此,我们已寄去了十大箱的绣品、字画、象牙、玉及其他中国工艺品。

我们希望:您与法国友人仁慈地合作,容许他们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义卖;您和顾夫人,及知名的法籍中国之友担任赞助人。这样会吸引众多人群,会保证成功,并有效地宣传我们的宗旨。明年1月,一个类似的义卖将在华府或纽约举行。何时寄出(义卖的)物品,由何船运载,容后奉闻。这些物品是在香港的所有中国妇女捐赠的。为了避免上税,这些物品将直接寄到尊处。The Messageries Maritime(法国邮船公司)将免费为我们运送。

谢谢您。

您的非常真诚的

宋庆龄
(主席)^②

① 《宋庆龄选集》，133～136页。

② 本函用李又宁教授译文。

“中国人民之友”法国协会由法国 52 个和平团体组成，社长赫礼欧 (Ed. Herriot)，法国社会急进党总裁，曾任内阁总理，当时任众议院议长。该会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曾举行多次演讲会，呼吁抵制日货；又曾向国联大会、法国内阁及外交部上书，要求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主权独立。该会还曾号召为救济中国难民捐款。仅据 1938 年 9 月初的统计，捐赠款项即达 50 万法郎，捐赠人达 2 万余之众。当年 2 月 12 日，该会在伦敦召开世界援华大会，有欧洲五国代表参加。在伦敦的援华会，指英国援华运动总会，成立于 1937 年 9 月，会长为李斯陶威尔 (The Earl of Listowel) 爵士，其任务为向中国捐赠医药用品、布匹；组织集会讲演，抵制与日本的贸易；散发日本侵略的文件等。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即倡议在国外举行义卖，借以筹集经费。香港的五个妇女团体——全国妇女救援会、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中国妇女俱乐部、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广东妇女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等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倡议，至 1939 年 4 月中旬，共募集中国艺术珍品 4500 余件，先后在伦敦、巴黎、纽约三地举行义卖。本函即为与驻法大使顾维钧接洽义卖而作。

1938 年 12 月 2 日宋庆龄致哈斯克尔先生

来电敬悉。您同意协助我们举办义卖会，十分高兴。这次义卖的收益将捐献给伤兵、战争孤儿、难民，他们的总数已超过 6000 万，我们已无力供养。救援的需要每日都在增加，但我们几乎得不到来自美国的捐助。

现在我正动员中国不同组织的全体妇女，帮助向富人收集捐

献品。我们已成功地得到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刺绣、磁器、漆器、卷轴、古玩等，全是中国民族工艺。义卖会将能为中国向公众作出有影响的宣传。我们正在法国和伦敦进行同样的努力以募集资金，但是，最有价值的物品将送到纽约。

由于我们的书记沙尔文·克拉克夫人休假一月，义卖会的大部分工作落到了我的肩上。这里有这么多工作要做，使我无法设想美国之行。我们发出的每一件物品都附有标签，标明价格，因此，您将了解每一件物品的基本价格。由于它们是免税的，请尽力争取最高价格，不要跌价出售。

我们希望将这些箱子装上“总统门罗”号，12月23日启程，2月10日到达纽约。为了便于免费运输并免税，这些箱子将寄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胡适博士。我早已写信给胡博士，请他在货物到达时派遣代表，或指令驻纽约领事取货。可否请您和中国领事取得联系并派遣一些代表陪同中国领事接收并检查这些货物？

稍晚一点，当这些物品登记并列表后，将寄给您一封更详细的信。

本函为接洽在纽约举行义卖而作。沙尔文·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保盟”的名誉书记。“总统门罗”号，原函作 President Mondoe，疑为 President Monroe 之误。

1938年12月7日顾维钧致宋庆龄

11月21日大札敬悉。对您为救济我国战争难民而作出的高尚努力谨致谢意。在法国，我们已在为同一目标工作，举行了几项

活动。和美国、英国比较,这里只有少数人能像上述两国一样进行施舍;虽然募集并送往中国的数目不大,但也表达了法国对中国的普遍的同情。考虑到目前为救济中国战争难民的中国物品义卖会正在举行,因此到下一年早些时候方可举行另一次慈善义卖,这样,我们可以有时间准备并有足够的间隔以重新引起兴趣。

按照我们的经验,美丽的物品能卖得好价格,从而增加义卖的收益。能否告诉我,您何时可以发出义卖的物品?

致以最高的敬意!

您的真诚的

顾维钧

本函为复宋庆龄 11 月 21 日函而作。

顾维钧热情支持宋庆龄的义卖计划。由于顾的努力,所有运到法国的义卖物品均获得免税。

1939 年 1 月 18 日宋庆龄致哈斯克先生

我们的秘书已将名义上是寄给驻华盛顿大使胡适的物品目录寄给了您。这些箱子将于 2 月 10 日到达纽约。我们希望,您将和纽约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取得联系,该会的领导人为塞巴斯蒂安·艾尔夫人、穆丽尔·德雷珀夫人、路易斯·瑞娜、爱德华·卡特夫人等,她们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会帮助您举办正在发起的义卖会。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华昌贸易公司的李国钦博士也会帮助您,他懂得中国古玩,能带领许多富有的收藏者来参观展览。

我刚从乡下旅行归来，很快又要离开。以后还要作出南方难民生活条件的报告。请原谅只能写这封短筒。祝您在援助我们方面取得成功，并祝新年好！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本函亦为接洽在美义卖而作。纽约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是美国援华组织之一。1938年3月7日，宋庆龄发表《向全世界妇女申诉》一文，呼吁世界妇女采取措施，援救无数在战争中失去了父母的中国儿童。纽约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正是在宋庆龄的这一号召下成立的。李国钦(原函作 Dr. K. C. Li)，爱国华侨，纽约华昌贸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曾任美国中华协会副会长。

1939年3月28日索耶小姐致宋庆龄

附寄3月24日星期五的信，尽管形势已经改变，但我希望您知道当时我正在想什么。

星期六，贵国领事馆打来电话称：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中国大使馆，我国财政部没有发现允许货物免税入境的先例。我不知道，您给大使馆打电报是否对此有利，但我相信有此可能。如此巨大数量的一批货物以“国际优惠”为理由获准免税进口，在目前形势下，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做到这一点更困难了。如果可能，我计划在一两天内去华盛顿，了解真正的困难所在，以及有无改变裁定的希望。Mr. C. Y. Chen可能和我一起去。

如果裁定不能改变,我们必须交税,将争取付得少一点。我
要知道,您能否从运来的物品中将1830年前制造的艺术品分
出来。按照我们的法律,在任何情况下,此类物品进口都是免税的。
我意识到,这样做可能对您太麻烦了。如果您做不了这么多,我们
会理解。在这些物品中,如果有明显的古董,鉴定人会分辨出来
的。我们需要尽早得到您收集的证据。

这批物品的领事发货单寄给大使馆了吗?我们尚未收到。如果
我们必须交税,那就必须有一份。没有发货单而要提取物品,唯一办
法是邮寄一份笼统的保证书,但那样也必须在6个月内接到发货单。

我们都很遗憾,未能尽早打通我国国务院。不过,面对贵国大
使馆的请求,我们将事情全部扔给他们,似乎是轻率的。从大使馆
得到任何信息都是很困难的。

最真诚的

伊迪丝·O·索耶
理事

附:3月24日函:

我们很苦恼,不能通过海关及时提取运来的艺术品;更加苦恼
的是,我们感觉到,牵连到的有些事较之通常的官样文章还要严
重。从胡适博士的秘书那里,我们得到口头保证,大使馆已经做了
所能做的一切。我们相信,直接来自您的电报将鼓励他们作进一
步的努力。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有影响的朋友去打通我国国务院,
但是,贵国大使馆的代表强烈要求我们不要主动做什么。

在为准备展览及义卖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之后,如果这批物品
不能到手,或者被要求和别的组织合办,那将事实上破坏援华会的

威信。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有数百名有兴趣的人在等着这次义卖,他们中的许多人卓越而能干。推迟义卖自然会减少兴趣,但我们相信,如果得到物品,我们将能举办一次成功的义卖。

很早以前,我们曾建议中国战灾难童委员会帮助这次义卖,但他们太忙。这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不愿和别的组织共同发起的真正理由。即将出现的义卖委员会将是一个由杰出人物特别组成的团体。

因为延迟,需要另雇一人,管理机构,推进展览和销售。在纽约,此类事情需要高明的技术。花点钱处理更多的事务比只用志愿人员弄糟事情好得多。其经费将从收益中扣除,我们希望得到您的批准。为了义卖,这是必须的。我们正试图向一些有兴趣的朋友筹款,以弥补这笔开支,因为我们喜欢尽可能将全部收入都交给您,用之于中国。

我的大部分时间必须用于重组美国援华会,以便通过它的分会及组织新分会的计划有效率地工作。当然,我也会密切关心展览和义卖。

下周,我们将海运大约一吨已用过但仍完好的外科设备。约值4000美元。买新的要花两倍以上钱。要求设备和药品的新呼吁已经发出。如果上述设备无法使用,请立即赐告。

我们正在进行民意测验以了解当地分会对抵制(日货)和禁运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援华会的政策仅限于救济。在下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将讨论一项政策上的可能转变。我们的希望之一是做最能帮助中国的事。我们有一些优秀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如果我们能获得进行组织所需要的资金,委员会将迅速发展。我们付给工作人员的工资仅可勉强维持生活,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以继续保持已经建立的联系并利用正在增长的对中国的兴趣。

我希望希尔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了解此新的内容,可以直接将信寄给她转您,因为我不能十分肯定您现在的地址。

索耶(Edith. O. Sawyer),美国援华会理事。运往法国、英国的义卖物品均顺利获得免税,但在美国则碰到困难。据 1939 年 4 月 15 日出版的《新闻通讯》第 2 期报道:“不幸,纽约美国海关至今尚未同意免税。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胡适博士目前正在争取获得免税。同时,组织义卖和捐助义卖的各妇女团体在 4 月 6 日的联合会议上,决定向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发去下列电报,求得她的帮助。”该电由宋庆龄领衔。本函反映出美国援华会方面的努力。

当时,美国是日本主要的军火和军用原料的供应国,日本从美国的进口数约占其总进口数的 54%。美国援华会成立后,曾不断发动抵制日货运动,同时要求对日禁运军火、军需,曾派代表赴华盛顿国会请愿。索耶小姐 3 月 24 日函称:“正在进行民意测验以了解当地分会对抵制和禁运的态度”,显然是在为新的行动作准备。

1939 年 4 月 14 日宋庆龄致顾维钧

来电敬悉,得知义卖的箱子已转交“中国人民之友”社的 Etienne Constant 夫人,非常感谢。

附寄备忘录一件,当地“中国工业合作”(CIC)促进委员会要求转给您,希望得到来自您的信息与合作。

致以最好的祝愿!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1937 年秋,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与路易·艾黎等在上海

提出,鉴于中国沿海工业区已经或即将沦于日军之手,后方工业品十分缺乏,建议采用合作社的方式,在大后方发展小型手工业和半机器工业,生产各种迫切需要的日用品,以支持长期抗战。宋庆龄积极支持这一倡议。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成立。随之,工业合作运动(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在各地兴起,简称“工合”。1939年1月,根据艾黎的建议,为了避免重庆方面控制并贪污海外捐款,将之用于“最急需的地方”,在香港成立中国“工合”协会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不久,又成立“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宋庆龄任主席。其后,宋庆龄即积极在美国、英国、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建立“工合”推进委员会,大力争取国际援助。本函称“附寄备忘录一件”,“希望得到来自您的信息与合作”,显然,宋庆龄希望得到顾维钧支持,在法国推进“工合”运动。

1939年7月25日宋庆龄致索耶小姐

您盛情经由沙尔文·克拉克夫人转来的1102元支票收到,附寄收据两张。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前后,保卫中国同盟从纽约美国援华会得到的援助额为:美元4258.81元,法郎9556.09元;从麦迪逊、诺坦普顿、费城、得克萨斯等地美国援华会得到的援助额为:美元1757.27元,法郎127.57元。本函所称转来的1102元支票当为其中的一部分。

1939年10月宋庆龄致亚瑟·柏朴

本函英文本曾刊于1939年10月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机关刊物《新闻通讯》第9期，题为《孙逸仙夫人致外国团体的信》，中文本收录于1983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远和党在一起》，题为《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两种文本均无收信人，看来当时是寄给许多外国机构和个人的。

亚瑟·柏朴(Arthur Pope)，美国救济中国战灾难童会主席。

由于本函已有中文本，故此处不录。

1939年10月宋庆龄致普赖斯小姐

普赖斯(Mildred Price)，纽约美国援华会的执行秘书。本函内容与致亚瑟·柏朴同。

1940年5月24日宋庆龄致亚瑟·柏朴

支票收到，收据随信附上。谨代表我们的委员会向您致以深深的谢意。我已经得知您对我们工作的巨大兴趣。感谢您的不断支持，它已使挽救无数幼小的日本侵略的受害者成为可能。我去前线访问六周，刚刚回来，在我访问过的不同团体中，战灾难童受

到我特别的注意。

不久我将寄一封详细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信给您。随信寄去一张战灾难童的快照，它是在视察旅行中抓拍的。

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孙逸仙夫人)

据有关资料,1939年前后,美国救济中国战灾难童会曾向保卫中国同盟捐款 388 美元。本函所称收到的“支票”,当指该项汇款。

1940年3月31日,宋庆龄与宋蔼龄、宋美龄自香港飞抵重庆。4月初,与宋蔼龄一起到重庆第一儿童保育院慰问难童。5日,三姐妹巡视被敌机轰炸的重庆市区。8日,赴伤兵之友社医院慰问伤兵。22日,飞成都视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参观“工合”产品展览会。5月9日返港。本函所称“访问6周”,指此。

1940年5月26日宋庆龄致普赖斯小姐

我到内地作了六周旅行,刚刚回来。在那里,我见到了您的朋友并且收到了您的信息。但我仍然希望得到详细的回答。

同时,我还必须告诉您,对您为我国战争受难者所做的杰出工作,我是多么感谢!自您参加援助中国委员会以后,巨大的进步明显可见,至于捐赠品的增加,就不用提了。我已写了封短信给洛克伍德博士,感谢他帮助在费城成功地举办了音乐会。

从现在起,我将更加用心,试着写一封信去美国。正在讨论的妇女问题确实是个问题,不过,像所有问题一样,它不能表面地加以解决。这需要时间。

致以个人的问候和敬意!

您最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美国援华会在费城设有分会。在当地举办的音乐会,也是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义演。因此,本函中,宋庆龄除了对普赖斯小姐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谢外,也顺便告诉她,已去信感谢帮助组织义演的洛克伍德(Lockwood)博士。

1940年7月16日宋庆龄致普赖斯小姐

附上尊处寄给“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300元收据。

S-C夫人已去碧瑶,您的信将由办公室秘书转给她。

当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时,我们的组织还有其他的承诺。当您尝试募捐时,请记住这一点。更多的人对后一组织感兴趣,因此,经常有钱来自各方。

信即将发出,我必须止笔。致以热烈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S-C夫人,当指沙尔文·克拉克夫人。碧瑶(Baguio),菲律宾的一座

城市，位于马尼拉之北。

为了广泛争取支持，动员菲律宾华侨支援祖国抗战，宋庆龄曾派斯诺夫妇去马尼拉组织“工合”菲律宾推进委员会。其后，又在碧瑶建立了同样的组织。路易·艾黎曾去两地演讲，获得很大成功。克拉克夫人去碧瑶，当亦为推进“保盟”和“工合”运动。

本函中，宋庆龄指出，更多的人对“工合”有兴趣，“经常有钱来自各方”，这是非常正确的。据不完全统计，至1946年止，英国“工合”推进委员会对中国“工合”的捐款为10万英镑。美国“工合”推进委员会的捐款为300多万美元，连同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约计500万美元左右^①。

1940年8月27日宋庆龄致普赖斯小姐

捐款拜收，呈上收据。对您的努力，谨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我已指示会计，在将来更细心地列出捐献清单，并且向援华会颁发所捐全部金钱和物资的荣誉状，而不一一给予个人。这确实是由于办公室打字员的粗心，以致使她登录了贵会分支的认捐额。

美国战灾难童会参加贵会，这是个极好的消息。我希望您已经收到我为战灾难童出版的专刊，其中提到，在30万以上战争难童中仅有2万受到照顾。因此，非常需要为这些日本暴行的无辜受害者寻求资金，建设更多的住宅，特别在西北地区，由于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尚未受到充分注意，要求就更加迫切。

^① 卢广绵：《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文史资料选集》，第71辑，126页。

听到普赖斯小姐关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款子的不满,我很惊讶。我们经常迅速地将款子转交(中缺)回答说,他们已经从保卫中国同盟的会计那里收到了全部款子。如果普赖斯小姐能给她的朋友写一封信,更清楚地说明何项款子我们没有转交,事情将会立即得到澄清,因为我们可靠的秘书掌握着所有给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支票。

眼下我极忙,短筒乞谅。

致以热烈的问候!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保卫中国同盟由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士(N. H. France)任名誉司库,有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从本函看,由于打字员的粗心,出现了某些差错,宋庆龄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1940年12月7日宋庆龄致普赖斯小姐

11月16日大札敬悉。谢谢。附呈我们的司库寄给您的支票收据两张。听到您的许多活动,我们很高兴,对您提到的某些困难,我们也能很好地理解。

沙尔文·克拉克夫人早已写信给您,阐明委员会关于医药救济的观点。保卫中国同盟仍然主要负责国际和平医院的维持和供应,此项工作,我们不能直接依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或美国医药援华会)。我记得沙尔文·克拉克夫人说过,美国医药援华会仅提供物资,它的援助主要用于林博士及其救护总队,

这已成为一项主要原则。但是，林博士完全忙于满足主战场的需要，除了偶尔向游击队员或游击区派遣一个医疗队外，不能提供更多的帮助，后者要依靠国际和平医院。

援华团体广泛直接地以经费支持国际和平医院，之所以仍然非常重要，其原因就在这里。

关于经由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募的款项，我们运用同样的原则。我们尽量特别支持前线及游击地区，尽可能地将特别指定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款项用在“游击单位”及前线地区的特别计划。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一般经费必须分配于他们活动的全部领域，但是特别指定的经费可由在香港的国际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之下的）处理，并直接送到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地区，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应当立即发展的。

我们的难童经费主要用之于西北地区，边区孤儿院及延安附近的“小鬼”训练学校。在那里的儿童，不仅受照顾，而且被训练去做有用的和建设性的工作。

总之，保卫中国同盟坚持早已得到赞同的政策，首先援助那些不能从一般救济工作、红十字会及援助中国组织得益的所有前线及游击区。

自然，我们希望，贵会将继续支持此项工作。

目前，游击区正面临日军全面进攻，因此，种种原因说明，他们从海外朋友处得到支持，远较过去任何时期为重要。

我希望，你们计划在1月举办的美术义卖与展览能获得巨大成功，从而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好的工作条件。

您最真诚的

宋庆龄

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国际和平医院,抗战初期创建于晋察冀的一所医院,没有固定院址,主要为中共所领导的游击区军民服务。1938年,国际和平大同盟世界代表大会在伦敦通过援华决议,其后,宋庆龄即积极和中共方面联系,筹备建院。该院由英国援华会捐助建院费,第一任院长为白求恩,第二任院长为柯棣华。宋庆龄对该院一直给予巨大关注和支持。《新闻通讯》也经常报道该院消息。此外,延安保育院也受到宋庆龄的特别关注。

鉴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条件极为艰苦,因此,保卫中国同盟一直将援助的重点放在中共所领导的解放区。例如,“保盟”1940年的援助账单即记载:国际和平医院,46878.46元(港元,下同);红十字会医疗救济会,9639.80元;八路军,27411.50元;新四军,14990.83元;中国工业合作社,30616.69元;战灾儿童,5789.47元;难民救济,5511.03元;鲁迅艺术学院,9800元;抗日军政大学,923.87元。在本函中,宋庆龄坦率地向普赖斯小姐通报此点并说明了理由。

1941年1月11日宋庆龄致普赖斯小姐

拜领您最近寄来的捐款,呈上收据。

在委员会上部分地宣读了您的坦率的来信,很受欣赏。大多数您指出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可以奉告的是,我们正在重建我们的机构、成员,并且坚决在广阔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政策,以适应需要和形势。

詹姆斯·伯特伦先生现在是我们的发言人,他将回答大札中有关问题。不过,他和我都正可怕地忙于在本月举行音乐舞蹈演

出会。我们经常好像处在奔跑中。如果不是因为财政运动,继之以《新闻通讯》,两星期之后,我肯定将专注于您的问题。

同时,请接受我热烈的新年祝福和对您献身于我们共同事业的感激。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签字)

本函发于九龙。詹姆士·伯特伦(James Bertram),或译杰姆斯·贝特兰,英国人,1932年考入牛津大学。1937年来华,曾秘密去延安访问毛泽东。1938—1939年任《先驱报》、《卫报》驻华特派员。1941年任英国驻重庆大使馆新闻参赞。他曾在“保盟”的《新闻通讯》上发表《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报告》、《同日本摊牌》、《纪念白求恩》等文。

为救济战争难童,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曾于1940年10月18日在香港半岛旅馆举行过音乐舞蹈演出会,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和上海市立乐团歌手斯义桂等参加演出,获得成功。1941年1月22日,同盟又与援助昆明医院委员会共同发起,在香港皇家剧院举行演出会,所得收入用以援助国际和平医院及遭到严重轰炸的昆明医院。戴爱莲、斯义桂再次参加了演出。

1941年2月18日宋庆龄致普赖斯小姐

1月28日大札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贵会在纽约成功地为中国获得了大量救济物资。如果您能指令将他们运到香港,我们将非常感激。

由于日本人占领了惠州附近的道路，从香港经过广东北部到达内地的通道现在不能开放。我们希望这只是暂时的，通道将能迅速开放。目前，我们在仰光没有代理人，这条路线又远，而且经过滇缅路运送救济物资还需要特别的安排。在这两条路线中，香港—广东要快得多。

我注意到，您剩下了一些圣诞卡。如果可以储存起来，请留待下一年使用。

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和公众舆论以及人民武装的形成，中国的内战暂时得到阻遏。我感到，我们的外国朋友，此地的和海外的，已经为促进统一战线所做的或将要做的努力，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都感激在纽约的朋友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

您提出的与菲希顿先生谈话有关的四个问题我已转交陈翰笙博士，请他回答。我想，在下一封信里，他会回答您。

最近，我们增加了同盟工作机构的人员，并且建立了更多的工作部门。沙尔文·克拉克夫人负责与欧洲国家的通讯，陈翰笙博士将处理和美国朋友的通讯。

致以热烈的祝福！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

孙逸仙夫人，主席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抗日统一战线面临破裂的危险。14日，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谴责事变，要求国民党和蒋介石“撤消剿共布置，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在国内外爱国、民主力量的反对下，这次事变未发展为更大的风潮。2月15日，“保盟”的《新闻通讯》发表《统

一战线继续存在》一文，报道事变真相，说明局势已经缓和，要求国内外一切民主力量继续努力，维护国内、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本函为向美国友人通报有关情况而作。

当时，在“保盟”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四个小组委员会：诺曼·H·法朗士领导的财政委员会、麦克斯·比克顿领导的运输委员会、邹韬奋领导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玛丽恩·苔德莉领导的促进委员会。本函称“建立了更多的工作部门”，即指上述各机构。

圣诞卡，1939年、1940年，“保盟”都制作了具有中国艺术特色的圣诞卡，委托美国援华会等友好组织出售，收入全部用于救济中国的战争难童和伤病员。函中所称圣诞卡，指1940年所制。

1941年3月6日宋庆龄致普赖斯小姐

我想知道，您是否已经见到了埃德加·斯诺，他正在纽约。我乐意将他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创始人介绍给您。毫无疑问，您早已熟悉他在援助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方面所做的各种工作。

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可能易于同意在美国发表讲演。如果在援助中国委员会主持下他有某些讲演的机会，我们将很感激，他能向美国公众说明同盟的目标和活动。

兹答复您2月28日大札中询问的项目。D1与D2在香港买不到。我们的办公室有关于价格的资料，摘录如下：

绷带用品，40码(yd)长，36”宽，每卷港币5.3元

橡皮膏，7”×1yd，每罗港币72元

安全别针，每罗港币35分

脱脂棉,每箱 224 磅,港币 224 元,或每磅港币 0.75 元

纱布,40yd×28”,港币 4.5 元

棉布,作绷带、包装等用,40yd×36”,港币 8.6 元

棉布,作小袋用,40yd×36”,港币 6 元

一般地说,如果您收到了此类捐赠,望运至香港,我们再转运内地。当您指定捐款用于制造此类物品时,我们将安排在此购买此类物品并转运内地。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下属的任何单位都能制作绷带、脱脂棉花及纱布。

凯思琳·霍尔小姐是一位负责公众健康的护士,她在山西南部的红十字会里做了一年多医疗工作,成绩突出。最近回故乡新西兰,途经香港。您可以想起,她是和白求恩博士一起在五台山工作的朋友中的一个。

根据她的报告,现在在山西和河南有 14 个孤儿院,4491 个儿童,五分之二是女孩。她们急迫需要的是医药、衣服、食物、教育用品与房屋。

目前,生活费到处都在飞涨,但是,儿童的食品补助却因为缺乏经费而无法增加。现在,负担一个儿童的食品和其他开销至少需要中国货币 1 元。汇率是 18 元中国货币兑换 1 美元。

由于需要抚养的儿童不断增加,几个孤儿院虽早已找到经费,但都不够。根据霍尔小姐提供的情况,我可以愉快地说,这些孤儿院在条件允许时能很好地工作。

食品、教育用品之外,医药是紧迫的需要。眼病、一般的儿童疮、抓伤、跌伤,还有夏季疾病的药物供应不足。来自半饥饿或饥饿地区的儿童需要鱼肝油和维他命 B 产品。

我知道,在边区的孤儿院得到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太不足了,仅能维持每日最贫乏的食品,包括小米、面条、馒

头和黄豆。另一方面,护士和教师的数量似乎差不多。每8至10个儿童有一名护士。我知道,这些教师和护士在延安的师范学校和医药学校受过训练,他们中的有些人毕业于抗日大学。

那些孤儿院进行简单的初等教育,包括读、写、算术、唱歌、体育和政治教育。圣诞节在信徒的家里庆祝。中国新年(今年1月27日)一般受到重视。儿童节(4月4日)和双十节(中华民国国庆)放假。教育设备如积木、粘土、可塑材料等供应不足。通常的玩具不需要。

由于霍尔小姐的报告,我对于那些孤儿院进行一般的卫生训练获得印象。孩子们被教以一般的健康和环境卫生习惯。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牛痘和血清的供应,使当地政府的防疫站能给孩子们种牛痘和免疫?

希望您已经收到了我2月18日的信。与英文版一起,同盟正在这里出版中文版半月刊《新闻通讯》。

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真诚的

宋庆龄

孙逸仙夫人,主席

1941年1月,斯诺在香港从宋庆龄与廖承志处得悉皖南事变情况,曾向美国发出急电,公布事变真相,导致美国政府中止一笔新贷款的谈判,国民党政府因此取消了斯诺的采访权,迫使斯诺返回美国。本函中,宋庆龄希望普赖斯小姐为斯诺提供机会,向美国公众介绍“保盟”。

凯思琳·霍尔(Kathleen Hall),教会护士,1939年12月以中国红十字会外籍人士后备队员的身份赴山西工作,1941年初因病回国医治,途经香港时,向“保盟”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该报告详细叙述了中国西北部人民饥饿和缺医缺药的状况,也介绍了在八路军总部、国际和

平医院以及各地孤儿院的所见。出于对孤儿们的关怀和爱护，宋庆龄在本函中特别为他们提出了救援要求。

1943年4月17日宋庆龄致普律德小姐

李约瑟博士给我带来了您的短简，从而得知您在纽约活动的部分情况，很高兴。上周我在贵国大使馆时，一位朋友提起，他听说，您试图控制在纽约的“工合”美国推进委员会。我笑了，评论说：“这必然是联合对华救济会那里来的。”他点头，我们两人都大笑起来。后来，我向他叙述了“保盟”和这个连锁组织打交道的经历以及现在的僵局。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想知道，贵处是否已经有人试图会见蒋夫人，听她如何谈论路易。我想，罗斯福夫人能在这方面给予很多帮助。

卢广绵上周给我打了电话。他大为改变，甚至提出将杭立武（陈立夫的人）增补进委员会。

您读了特迪·怀特关于河南饥荒的报告（《时代》，5月）吗？它提供了真相和该地区可怕的情景。大批灾民正在涌入宝鸡，“工合”可以救济他们。不幸的是，路易的努力被挡住了。他被劝说待着，完全不要动。说实在的，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使人丧气的了。

这封信必须立即发出。请代我问候佩（Pey）、高洛克（Galack）小姐、巴布科克（Babeock）夫人。致以最好的祝愿并望不要泄气（我也正在试着这样做）。

宋庆龄（签字）

Strictly Personal

JUN 7 1943

Chungking.
April 17, 1943

My dear Miss Pruitt,

Dr. Joseph Huddham

gave me your note from which I was
glad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your
activities in N. Y. (last week I was at
the U.S. Embassy & one of the friends
mentioned he heard you were trying to
"dominate" the U.C. committee in N. Y.
I laughed & remarked: "it must have
come from a U.C. R. agent!" He nodded
& we both laughed heartily - then I related
to him ^{also} about CO's experiences with this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 organization
and our present impasse -

As I write these lines
I am wondering whether you people
have tried to interview Mme. Chiang &

宋庆龄致普律德小姐函手迹(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本函发于重庆,为宋庆龄亲笔,左上角并有 Strictly personal(绝对个人的)等字。

收信人普律德(Ida Pruitt)出生于山东烟台,在中国度过幼年时期,后回美国读书,毕业后再来中国,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到上海,与路易·艾黎、斯诺等共同发起“工合”运动。1938年到香港,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后被宋庆龄派回美国,组织“工合”美国推进委员会,邀请罗斯福夫人任名誉主席,普律德自任秘书,为支持中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晚年执教于美国宾州大学。著有《汉族的

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传记》(*A Daughter of Han,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rking Woman*)等书。

联合对华救济会(United China Relief),或译“救济中国难民联合委员会”,由美国对华医药救助委员会、劳工对华救济委员会、中国妇女救国会、对华紧急救济委员会等团体组成。以罗斯福之子西尔多·罗斯福为主席。该会也为支持中国抗战做了大量工作。但该会与美国各地绅、商、资本家及保守派工会领袖关系密切,当时中共领导的武汉《新华日报》曾发表文章称:“这一团体有很多弱点,他们在组织上排挤进步分子合作与参加,又该会并不注意群众的组织与团结,仅作运动的发动与号召。”^①从宋庆龄此函看,联合对华救济会与“工合”国际委员会及推进委员会之间存在着矛盾。宋庆龄领导的“工合”运动主要援助中共及八路军与新四军,这可能是联合援华会对“工合”和普律德不满的主要原因。

路易,指路易·艾黎,新西兰作家、诗人。1927年来华。抗战期间,积极支持宋庆龄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倡导工业合作运动。卢广绵(函中作 Lu Kwang-mian),原在华北从事棉业合作工作,抗战爆发后到上海参加全国农业调整委员会,旋又参加胡愈之等人发起的星一聚餐会,与路易·艾黎及斯诺夫妇相识。不久,投入“工合”运动。杭立武(函中作 Han Lih-wu),安徽滁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先后留学美、英两国。时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候补干事。后曾任教育部常务次长。

“工合”运动受到国民党政府,特别是CC系的嫉恨。不少“工合”工作人员被捕,甚至被害。1942年末,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路易·艾黎的“工合”技术顾问职务,企图迫使他离开中国,其理由是,艾黎在洛阳与共产党员共同搞阴谋,利用蒋夫人的钱使八路军有所依靠,为新四

^① 汉口《新华日报》,1938年7月27日。

军制造草鞋。^① 本函询问普律德,美方是否已有人会见宋美龄,听她如何谈论路易,当即为此。本函又称:卢广绵“大为改变,甚至提出将杭立武(陈立夫的人)增补进委员会”,可以曲折地反映出 CC 系对“工合”运动所施加的压力。

特迪·怀特(Teddy White),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的昵称,中文名字为白修德,193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39年至1945年任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记者。1943年,河南发生大灾荒。《大公报》因报道了有关情况,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三天,怀特随即决定偕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前往采访。同年5月,怀特在《时代》杂志5月号发表文章,报道了当地因为严重饥饿而出现人吃人现象的可怕情景,并且严厉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救援工作效率的低下。^② 当时,“工合”西北办事处设在宝鸡,本函反映出路易·艾黎曾准备动员“工合”予以救济,但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

信中,宋庆龄劝普律德不要灰心,自己也将同样做。在当时的条件下,宋庆龄尽可能地为救济河南灾民做了许多事。当年5月15日,在重庆发起赈灾足球义赛。其后,又通过美国援华会的帮助,从联合对华救济会取得5万美元捐款。^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2期

① 路易·艾黎:《“工合”运动记述》,《文史资料选集》,第71辑,105页。

② 参阅西奥多·怀特、安娜·雅各布著:《风暴遍中国》,175~1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5。

③ 宋庆龄:《从香港到重庆》,《永远和党在一起》,36~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张学良三次请缨抗日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志在团结国内爱国力量，共同抗日。事变后，张学良被“严加管束”，软禁于浙江奉化，但是，他抗日之志不泯。在奉化期间，他曾对来访的部将于学忠等表示：“除对日作战外，决不想再统军。”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危急。18日，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要求蒋给予杀敌机会，函云：

卢桥冲突，日渐扩大，日本军人之凶焰，肆行无厌，真令人发指！良知钧座鸿谋，早有成竹，万一不幸，中日问题，必须以兵，俯乞钧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座俯临华夏，决不令匹夫一志之不得伸。临书惶悚，不知所云，俯乞鉴宥。

这封信，表现了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也表现了他杀敌卫国的急迫心情。张学良原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是仅次于“蒋委员长”之下的“副座”，但他表示，只求血染敌襟，死得其愿，职务、等级，均不在考虑之列。信是送到蒋介石手上了，但杳无回音。

西安事变中，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周恩来等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使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软禁，宋子文觉得有愧于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即积极向蒋介石进言，要求释放

张学良,使之抗战效力。7月30日,宋子文致函张学良云:

弟时时思欲与兄晤谈,而在目前情形之下,不能须臾离沪。国难如此,正一致御侮之时,弟已切请委座恢复吾兄自由,俾为国家效力。弟在此数日内,必抽暇来溪口与兄面叙也。

同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亲赴昆山前线指挥,宋子文再次向蒋介石进言。这次,蒋介石居然同意了,宋子文很高兴,于9月22日致函张学良云:

许久未通音问,实因无善足告,非敢对兄忘情,度邀亮照。兄事,弟对介公陈说之电不下数十通,最近在昆山晤谒,并以国难极度严重,急宜起用吾兄,及时效力为言,已得介公俞允。顷蒋夫人来函,亦经提及,大云出山,指顾间耳!

从卢沟桥事变起,时间不过两个多月,但宋子文向蒋介石陈述起用张学良的电报已达数十通,可见宋子文用力之勤。因为宋函有“顷蒋夫人来函,亦经提及”一语,所以张学良收到宋函后,即给宋美龄写信,希望通过“夫人路线”比较快地解决问题。首云:“人世以来,除先严时加训诲外,扶持爱护者,只有委员长一人,感激之深,铭心刻骨。良恪守夫人前在妙高台之训,惟委员长之命是遵,所以居山以来,每日以阅书看报检束身心为事,外间事一概不闻不问。”当年4月10日,宋美龄曾在奉化妙高台邀请张学良、于凤至夫妇午餐,临行前,宋美龄单独召张学良谈话,声称“彼深知余为 gentleman,不过性急躁须改”云云。函中所言“妙高台之训”指此。接着,张学良转入正题:

惟自中日战事爆发以来，家仇国难，时萦于心，恨不能舍命捐躯，以抗强敌，是以前此有请缨雪耻之举。近两月中，每日注意锻炼身心，以备委员长之驱使，期为民族而牺牲，不敢自图安逸，苟全性命于世间。良受委员长之优容厚待，有如家人。委员长运筹决策，夙夜焦劳，凡属同袍，皆各效其能，以为抗战之助力。良处此时势，讵敢妄有希冀，扪心自问，实有难安心者耳！否则饱食暖衣，山居优游，亦或人求之所不得。夫人聪慧过人，谅能洞鉴良之心绪也。

这一段话写得很婉转，但国难期间，愿为民族牺牲，而不愿“饱食暖衣，山居优游”的心情表达得很明确。同时，张学良并致宋子文一函，要他将上函转给宋美龄。函云：

我二人爱如手足，亲如同胞，心心相印，两地情同。兄对弟之关切，我心深知，弟非木石也。顷上蒋夫人一书，弟之情绪，统见其中，兄请酌可否呈递。良见我同志皆能杀敌救国，而家仇国难萃于一身如我者反山居优游，衷心时刻难安，想兄当可鉴及也。临书迫切，企盼好音。

蒋介石虽然在宋子文面前表示，同意起用张学良，但很快就后悔，通过宋美龄转告张学良，要他“好好读书”。这是张学良第一次请缨抗日的情况。

1938年，张学良迁移湖南沅陵，住在凤凰山。6月1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得到蒋介石允许，到凤凰山探视张学良，张学良将事先写好的请缨书交给张治中，托他转呈蒋介石，同时另抄一份给刘乙光，请刘转交戴笠，请其帮忙。这封信没有流传下来。

此次请缨，仍无回音。

张学良第三次请缨是在同年11月9日。当日，戴笠到凤凰山。晚餐后谈话，张学良从戴笠口中得知“抗战中真情不少”，张学良听后“悲喜交集”。此前戴笠对东北流亡人士有所照顾，张学良颇为所感，觉得戴笠“可称一朋友”。戴笠临行前，张学良交给他一封致蒋介石的信，中云：

雨农兄来山，欣闻钧座虽在夙夜辛劳之中，身体精神两健，深为快慰。此非只钧座自身，乃中华民族之幸福也。学良山居如恒，竭力对于知识及身体，尽能修养，惟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能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谨为陈述。

因为已经碰过两次钉子，所以张学良已经不愿提出什么要求，仅强调同志、同胞在抗战中“各能尽其天职”，而自己“安居后方”，良心上无法平静，那意思还是要求上前线。

张学良在接受美国张之宇、张之丙姐妹访问时谈道：“我跟蒋先生写过两三封信，我当营长、团长都愿意，跟日本打。他也没答应。”又说：“我愿牺牲就是了。”证以上述信函，张学良的有关回忆是准确的。

蒋介石为什么“不答应”呢？张学良说：“我也明白蒋先生不让我抗日。一旦我出来抗日，蒋先生的领导权，我就拿过来大半了。不但老百姓，甚至中央军队我也会影响。”张学良一出来，是否会将蒋介石的领导权“拿过来大半”，不一定。但张学良重新掌握一支武装，即使是一支抗日武装，也是蒋介石不能放心的。

报国无门的苦恼

——读张学良幽居日记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学良档案中，日记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存张氏日记，始于1937年1月1日，终于20世纪90年代，是研究张学良生平的重要资料。这些日记，特别是他在抗战时期的日记，充分显示出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激情。张学良曾自称“爱国狂”，此言确非虚语。

执戈冲锋成梦想

1936年12月31日，南京高等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审判后，张被移送孝陵卫孔祥熙宅。这一天，张学良梦中过年，有两位东北老乡来访，诉说国破家亡之苦，三人相对涕泣，张学良不觉哭出声来，被看守唤醒。次日元旦，张学良日记云：

呀！廿六年的元旦了！不只失地未复，而国权日衰，就是我今日之处境，百感交集。但我是中国人，我是个丈夫，悲愤是无用的，只有不顾一切，冲出一条血路，打倒我们的仇敌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国事有复兴的机会。

同月13日，军统局派刘乙光等护送张学良到溪口。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18日，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要求蒋给予杀敌机会，不论官

阶、职务,只要能血染敌襟,死得其愿,但蒋介石要张学良“好好读书”,不予批准。张学良只能在奉化山中猜测日寇对华北可能采取的措施,如成立自治政府,在察哈尔、绥远、内蒙古等地成立“大元国”,以防共名义,与华北伪组织订立协定,继而又想到华南状况以及将来的中日结局,忧愤不能自己。当时,抗日烽火已在华北、淞沪等地燃烧,张学良再也无法安坐,9月18日日记云:

9月18日啊呀,又到九一八了!六年中我作了些什么?悲惨忍痛,过了六年。今天中日战争展开,而我安居山上,凡我同志多去肉搏,我不能执戈为民族去冲锋,报家国之仇。九一八我失却冲锋机会,那是我的罪恶,忍耐点吧。不怨天,不尤人,自励身心,以备国家需用你的时候,你能担起一个任务……

次日为中秋佳节,张学良等在妙高台赏月会餐,张学良内心痛苦,喝得酩酊大醉。日记云:“此时惟酒可以解去苦闷,希望对日战胜。我在此赏月赏桂,要大大痛饮一回。”

日军在进攻上海的同时,多次倚仗空中优势,狂轰南京。9月16日,出动飞机50余架。19日,再次出动30余架。20日,张学良满怀仇恨地在日记中写道:“夺我土地,杀我同胞,袭我首都,再加以杀父之仇,真无法同倭寇戴天了!”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确立。张学良非常高兴,24日日记云:“共产党宣言,服从三民主义,一致御侮。蒋先生已发表谈话,抗敌前途之一大快事也。抗日方有真实的统一。今日可证之也。”但是,张学良高兴未久,就得到保定失陷的消息,张学良转喜为忧,直到当夜两点,辗转不能成眠。25日日记云:“保定失守,忧愤万分。忧华北局势,愤华北将领,何

以如此之可恨！该杀！”10月25日，中国上海守军在经过艰苦奋战后，被迫撤至苏州河以南阵地，但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谢晋元部八百壮士奉命坚守闸北四行仓库，掩护主力撤退。张学良闻讯，非常赞赏谢部的“死战”精神，在日记中写下了“可嘉”二字。

10月，张学良奉命自溪口迁安徽黄山，到达黄山后又奉命迁江西萍乡。12月14日晨，张学良听到电台广播，蒋介石命南京卫戍长官唐生智退出南京，立即推测到南京已经陷入敌手，日记云：“那末，南京陷入小鬼之手了，痛哉!!!”

虽然战局不断恶化，但是张学良仍存有希望。12月31日，又是一年除夕，张学良日记云：“一年过去了！这一年中，个人及国家，风云变化，全是划时代的。现抄一句吉祥话，祝明年中华民国国运亨通，打倒帝国主义，完成自由解放。”

大好河山难住脚

1938年初，张学良奉命迁移湖南郴州，再次开始颠沛流离的旅行，1月2日张学良在途中赋诗一首：

剡溪别去又郴州，四省驰车不久留。
大好河山难住脚，孰堪砥柱在中流？

古人云：“闻鞞鼓而思将帅。”从离开溪口始，张学良的脚印已经踩过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省，但是，仍然收不住脚。自然，张学良希望能有人砥柱中流，支撑战争危局。2日，张学良一行抵达郴州郊外苏仙庙。

3日张学良下山游览当地的温泉和池塘,非常喜欢,不禁想起故乡,赋诗云:

马岭云松少见松,神仙羽化总成空。

辽东万里家何在,今住牛山第一峰。

眼前风景虽好,其奈家山沦陷,返乡无日何!据有关人士回忆,苏仙庙期间,张学良曾凝视地图,自言自语:“东北这块地方,现在不知道成了什么样子了?”这一段回忆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诗中的感情。

3月16日,张学良读韬奋的《萍踪忆语》,其中写到殖民者对黑人的压迫,黑人与白人乘车时必须“分座”,张学良由此想到日本在南满东洋车中实行的“分座”制,岂不同黑白分座一样吗?当日日记云:“国未亡,日本小鬼早已用劣等民族看我,不把小鬼此种心理打倒,中日安有和平之望乎?”同月,中日两军在山东台儿庄会战。4月6日,李宗仁所部歼敌一万余人。张学良于9日从报上看到消息,兴奋地写道:“(此)为抗战九个月来第一次大胜利,更使人快意者是将板垣、矶谷两个王八旦打败了。”接着,又传说中国军队收复济南,张学良高兴地写下了“快活极了”四字。

台儿庄战役后,日军调整战略,将兵力集中到华中战场,企图攻取武汉。4月18日,张学良奉命迁居湖南沅陵凤凰山。这是当地的一座小山,状似凤凰,山上建有古刹,风景宜人。在这里,张学良的生活是安适的,但他却常常自责:“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我,当此时期,而驻此清快处所,心中愧杀,但又奈何乎!”他仍然渴望有机会报国杀敌。6月1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得到蒋介石允许,到沅陵探视张学良,张学良将事先写好的请缨书交给张治中,托他转呈蒋介石,同时另抄一份给刘乙光,请刘转交戴笠,请其帮忙。结果,仍然石沉大海。

报国无门，坏消息却不断传来。10月22日，张学良得知广州失陷，深为中国军人难过。日记云：“呀！中国军人该死，我也是中国军人，也是不肖之一，思之不知容身于何地！”26日，又得知汉口失陷，心中更加悲痛。日记云：

今年以来未有如此之悲痛者。从抗战以来，失陷多地，未有如此之难过者。思今后，想往昔，五衷如焚，竭力自制这一极端懦弱现象，但一时仍不能止！痛哉!!! 难道中国人必须要一度为亡国奴乎？不能！不能！不能！我也不肯！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联合起来吧!! 我们必须拿我们的血来洗这个耻辱。

11月9日，戴笠到凤凰山，饭后畅谈，张学良得知抗战中真情不少，不禁悲喜交集。戴笠对东北流亡人士有所照顾，使张学良颇怀感激。当日，张学良托戴笠转呈蒋介石一函，再次表示参加抗战的意愿。

为了阻止日军进攻长沙，蒋介石密令张治中于必要时焚毁市区，实行“焦土抗战”。11月2日，日军侵占岳阳，长沙警备司令酆梯匆匆下令点火，全城被焚十分之九，居民被烧死两万余人。16日，戴笠再到凤凰山，谈起长沙放火情况。张学良深为不满，日记云：“长沙当局，彼时之张皇失措，沿途之惨，又怨又气。抗战不败于敌，乃败于自己也。”

中日之战，中方屡败，其原因固在于双方在国力、军力上的差距，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政策失当亦是原因之一。“败于自己”，张学良的这一结论有其深刻性。

1938年除夕，张学良从无线电中听到南京日伪电台的隆隆钟声，又羞又气，但转念一想：“此声虽可敲碎我们的心，但是也可以警醒睡人们的迷梦吧！”

以“九一八”作为个人一年之始

汪精卫早就对抗战失去信心。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出逃,发表“艳电”,主张接受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三原则”。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决议,永远开除汪的党籍。次日,张学良日记云:“汪氏之为人行动,不只丢国民党的脸,也丢中国人的脸。但其人如此,其客观条件早已将他完成了,不过今天更显著些罢了!中央党部已将汪永开除党籍,不过晚了一点。”

很快又到了“九一八”。这一天,对于张学良说来,可谓创痛钜深。一听到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张学良的心中就为之酸痛。他决定将这一天作为他个人的一年之始。其理由有三。第一,就世界来说,张学良认为,这一天“日本野心的军阀之一弹,震荡了全世界,打破了国际条约,暴露了国联无能,接连着德、意法西斯的疯狂,灭亡了几个国家,残杀了多少人民。可是在另一方面,使全世界认清了侵略者的真面目,辨明了法西斯的本质,反侵略者奋起,为世界史造一新阶段”。第二,就中国来说,张学良认为:“我中国丧失土地、生命、财产,其惨其苦,笔之为之心痛!但是,另一方面,深刻刺激了国人的惰性,警醒国人的沉昏,加强团结,各阶层群起抗敌,给中国有史以来开了一个新纪元。”第三,就张学良自己来说:“在责任上,为国家民族负重大之罪恶,在个人名誉上、声望上、经济上,一切之一切受无限的损失。可是,另一方面,改变了我的环境,改变了我的思想,能使我了解了人生,使我认识了些真理,也可以说使我由污浊的深渊跃出,给我开了一个新生命。”一直到1946年,张学良才将个人的一年之始改回到元旦。

张学良的幽居生活很清闲,但是,愈清闲,张学良愈加不能自安。9月27日,张学良试写了一首新诗:

人家都在那里打仗,
咱“国难家仇”的人,
静坐塘边来钓鱼,
呵!“戎马半生”已经三十年了!
年近四十,再干一干“蠹书虫”儿。

国难家仇,戎马半生,竟然只能静坐钓鱼,做“蠹书虫”儿,张学良心情之苦闷,可想而知。

“凡有利我国家民族问题,用我的头全可以”

汪精卫被开除党籍之后,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曾派人赶到越南河内,企图将他除掉,不料错杀汪的助手曾仲鸣。这以后,汪即转赴上海,招降纳叛,积极筹备建立日军卵翼下的伪国民政府。9月5日,成立伪中央党部,原东北军将领鲍文樾出任伪中央委员。10月11日,戴笠到张学良寓所,要求张学良利用和鲍的旧关系,致鲍一函,请其帮忙铲除汪精卫。张觉得义不容辞,立即答应,并且声明:“凡有利我民族国家问题,用我的头全可以,其他不必说了。”戴笠又谈到于学忠,怕他继起投敌。张学良保证,此人决不会当汉奸。他按照戴笠意思,分别作致鲍文樾、于学忠等人函,统交戴笠。10月12日,张学良日记云:“但愿除此汉奸,为民族国家去一大害,我尽一点小小职务。假如雨农叫我去

执行,我全愿意。那个王八旦,头号汉奸,人人得而诛之!”11月26日,南宁失守,中国对外交通线被切断。张学良估计这是汪精卫向日军所献之策,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汪兆铭这混账,为要证实他的投降理论,不惜‘卖身投靠’,向敌献策——攻我西南国际交通线。也许南宁失守,这东西在那得意呢?他那里晓得,他正给自己加工赶造棺木哪!”

1940年1月,参与汪精卫集团对日谈判的高宗武、陶希圣自上海出逃香港。22日,香港《大公报》公布了日本提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面目,也揭露了汪精卫之流的卖国丑态。26日,张学良日记云:“汪精卫之卖国协定,被高、陶宣布,我读过之后,对于汪之无耻和只要钱,不值得再加批判。关于日人之毒辣,我也不惊奇。”

所见既多,经验愈深,对敌伪,张学良已经进入“横眉冷对”的境界了。

终于盼到了胜利

对于一个志在报国的人来说,其痛苦莫过于不能有所作为了。

1939年12月11日,张学良又写了一首新诗:

现在我有血无处流,
有精力无处去使;
只有武装我的头脑,
充实我的体力——
以待国家民族需用我时。

诗中可见,张学良虽痛苦,但仍存有希望,渴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为国效劳。

幽居中,张学良不忘时事,不忘读书。1940年1月,有人从贵阳给他带来一些刊物,其中有一份《反攻时与潮》,内有好几位东北老乡的文章。张学良读后十分兴奋。21日日记云:“并不是我狭窄的地域观念,因为我听到这些不甘作奴隶的东北人底呼声,——也代表着不甘作奴隶的中国人底呼声,使我心中说不出来有一种快愉,我意味着,这是中国前途的光明。”4月4日,宋子文来,告诉他“抗战有办法”,也使他高兴了很久。但是,当年的“九一八”,张学良仍处于痛苦中。日记云:“一到这个日子,心中总是难过。想把它忘了,又忘不掉。等到中华民族解自由那天,也许到了这一天的心绪就不同了吧!”

1941年1月初,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等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3月2日,董、邓等致函参政会,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同月10日,张学良见到消息,忧心如焚,日记云:“中国内部又将分裂,痛心!痛心!余曾为促中国之统一,牺牲权利,牺牲性命,皆所不惜,而今日正在对外抗战之时,不幸再要分裂,何只余一人痛心乎!”不过,大敌当前,国共双方都还比较克制,张学良所担心的分裂局面没有出现,抗日统一战线得以继续维系。

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次日,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开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随之形成。此后,战局逐渐变化,好消息也逐渐多起来。1943年10月,张学良读报,见到“英美宣布撤销在华治外法权”的消息,几乎不敢相信。日记云:“现在无确实消息,以待后证。”直到次年1月,张学良看到正式消息,才在日记上记道:“中英、中美废除在华特权,已正式换约,报纸昨已公布。”晚清以来,中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为了废除这些条约,无数仁人志士呼号奔走,甚至断头沥血,均无成效。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以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日本侵略,终于迫使英美相继宣布,废除在华特权。张学良

的有关日记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其兴奋可以想见。

1945年,盟军反攻,日军已呈劣势,国民党当局开始策反伪满及汪伪集团部分人员。2月6日,戴笠致电张学良,要张致函伪满洲国张景惠、臧士毅及投降汪伪的鲍文樾等人,劝他们弃暗投明。张学良当即遵嘱写了十一封信,说明“盟军迫近柏林”,“日本之必败,路人皆知”,“公等真危矣。进退无据,虽死无光,即欲终身夷狄,亦无可投之国”。张学良要求张景惠等人在中国军队反攻之时立功自赎,“振臂一呼,促敌速亡,断敌归路,使其片甲不回”。函称,这样做之后,“国人对往事有以谅解,政府可以宽容”,“切勿以过去问题徘徊踌躇,坐失良机”。戴笠收到这批信后,认为分量过重,不便挟带,给张学良送去两丈白绢,命张重写。张学良一一照办。4月25日,又按戴笠要求,补写了七封绢书。

同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28日,张学良日记云:“见报载,已占领东三省各大城,可以说完全东三省占领了。”

30日日记云:“政府批准八月四日的《中苏盟好条约》……此条约不能算是完全平等。在中国立场上说,近百年来对强大国家所定的条约,这个可以说是较强人意的条约。”9月18日,张学良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今天天气十分晴朗,今年更比往年大不相同,我虽然还不能自由的走上我的故土,可是我的故土是在压迫之下而得到了自由。虽然故乡的老乡们受到了日寇的奴化,可是十四年的教训,使得多少老乡们改换他们的头脑,促成了他们自发的精神。我衷心期待着解放了的故乡焕然一新。”张学良等了又等,终于等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乡有期了!

然而,张学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不会自此太平。1946年元旦张学良日记云:“九一八的问题虽然是有了结局,可是东北尚未得到自由解放,那块土里还是埋着大量的炸药,不晓得哪一天它还是会爆发的。可是,不只东北哟,中国全国还不是一样吗!”当时,东北人民对张学良

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使张学良惭愧不已。1月3日日记云:“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确认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等原则。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政协已获重大成果,“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2月5日,张学良日记云:“政协完成,和平建国纲领甚好,但愿不要只成为一张好的文献文章。但无论如何,中国总算有进步。”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很快就被撕毁,张学良本人也在不久之后转迁台湾,继续漫长的幽居生活。

张学良的自我鉴定

张学良是个复杂的人物。古人云:“盖棺论定。”张学良已经盖棺了,但是华人世界中关于张的评价却分歧颇大。1948年5月9日,张学良思考自己的前半生,日记云:

自觉自己还有一点优点:1. 良心秉正,每遇大事,总是把国家和大众利害为思虑的主点,把自己的利害置之度外;2. 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否则早成了满洲土皇帝;因之上不愧天,俯不作人。

通读张的幽居日记之后,应可承认,他的上述鉴定不是自谏之言。

原载《百年潮》,2002年第12期

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 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多次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所谓“和平”谈判,这些谈判的策划者和出面者大多是日本军方或政府人员,但也有以“民间人士”身份出现的,例如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他们都曾是孙中山的友人,有过支持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又和日本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称虽非代表,却是“代表以上之人”^①。

萱野长知(1873—1947),号凤梨,日本高知县人。1895年与孙中山订交,先后加入兴中会、同盟会。1907年被任命为东军顾问,负责购置并运送枪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萱野应黄兴之邀赴汉阳参战。1915年,再次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顾问,协助居正在山东起义反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受首相犬养毅派遣,秘密来华商谈日本撤兵问题,因军部反对,不久即被召回。^②

小川平吉(1869—1942),号射山,日本长野县人。189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98年加入东亚同文会。1903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武昌起义爆发,与头山满、内田良平、犬养毅等人组织有邻会,援助中国革命。1912年初在南京访问孙中山、黄兴,商议两国“提携”方针问题。1914年出任东亚同文会干事长。同年11月,日军攻陷青岛,小川曾向内阁建议,缔结日中两国同盟条约,使南满洲、内蒙成为两国共同统治

^① 《小川平吉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2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32页,东京みすず书房,1973。

^② 《犬养密史·萱野长知の日志》,《中央公论》第690号,1946年8月1日。

区域。1925年任司法大臣。同年发刊《日本新闻》，标榜“纯正日本主义”。1927年任铁道大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筹建伪满洲国。1936年因铁道大臣任内受贿案下狱，次年6月近卫文麿组阁后被保释。

头山满(1855—1944)，号立云，日本九州福冈县人。浪人首领，右翼组织玄洋社的头目，煤矿资本家。1911年12月来华，与犬养毅一起劝说孙中山与岑春煊合作，共同对付袁世凯。1913年4月，与犬养毅、萱野长知、宫崎滔天等组织日华国民会，宣称以“增进两国国民永远的福祉”为目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头山满曾积极予以帮助。1924年孙中山北上，途经日本，头山满曾到神户与孙中山会谈，要求保障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1931年组织满鲜问题同盟会，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38年1月致函孔祥熙，表示将竭平生之力使两国复归于好，要求蒋介石集团“速改旧图，更新其策”^①。

秋山定辅(1868—1950)，日本冈山县人。189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93年创办《二六新报》。1899年经宫崎滔天介绍认识孙中山，得到信赖。此后一再劝说日本财团向中国革命党人提供借款。1927年会见访日的蒋介石与张群。1936年派实川时治郎来华，要求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②卢沟桥事变爆发，又商得近卫文麿同意，派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来华谈判，但龙介离日时突遭宪兵队逮捕，未能成行。

由于上述历史渊源，蒋介石集团极为重视和萱野等人的谈判。初期通过孔祥熙，后来直接控制，由亲信柳云龙、杜石山^③等在香港会谈，

^① 《头山翁致孔氏电报》，日本外务省档案：《支那事变善后措置》，A-1-1-0号。

^② 《对支政策觉书》，《秋山定辅关系资料》，157页，《秋山定辅传》，第3卷，樱田俱乐部，1982。

^③ 柳云龙，陈诚书记官，日方资料或称为蒋介石外甥，或称为蒋介石母妹之子；杜石山，亦作杜石珊，蒋介石设在香港的秘密办事处负责人。二人真实身份待考。

宋美龄亲到当地指导。自1938年春至1941年夏,在各次日蒋谈判中历时最长。蒋介石多次指示:无论如何,必须“保留此线交谊”^①。因此,研究这一条谈判线索,有着特殊重要性。

萱野长知和孔祥熙之间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抗战。同月,萱野长知来到中国,在上海景林巷公寓设立机关,开始找寻和蒋介石政权接触的机会。同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国民政府迁移汉口。次年1月,孔祥熙就任行政院长后,即努力开辟渠道,和日方进行和平谈判。23日,孔祥熙致电头山满,希望他“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法〈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②。3月末,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本藏次和孔祥熙的亲信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社秘密见面。贾称:“如果任凭中日两国同归于尽的话,将给整个亚洲招来不幸,必须设法讲求和平之道。”^③4月20日,双方在同一旅馆第二次会见。松本传达了萱野提出的和平条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独立,承认日本关于内蒙的立场;贾存德则要求日本全面撤兵。其后,在松本的安排下,萱野与贾存德见面,萱野声称:“我和孙先生是朋友,中日是兄弟之邦,不应以兵戎相见。”^④他要贾存德转信给孔祥熙,大意为:中日交战犹如

① 《杜氏笔记》,《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34页。

② 《支那事变善后处置》,日本外务省档案:A-1-1-0号。

③ 松本藏次回忆,见三田村武夫:《战争と共产主义》,170页,日本民主制度普及会,1958。

④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寇勾结活动的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68页。

冀豆相煎,如孔有意出面解决阅墙之争,化干戈为玉帛,他愿意为此奔走。5月,贾存德携该函赴港,与宋霭龄同机飞抵汉口。同月,贾存德携孔祥熙复函返回上海。其内容,据贾存德回忆,孔祥熙对萱野肯出面斡旋表示感谢,声称解铃系铃还在日本当局,如果萱野能以百年利益说动日本当局早悟犯华之非,则孔祥熙当共襄此举。^①据松本回忆,孔祥熙并提出了和平条件:1.中日双方即刻同时停战;2.日本尊重中国主权,声明撤兵;3.日本方面要求解决满蒙问题,中国方面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待中日两国商谈。^②孔祥熙另有一函复头山满,要求头山对日本军人“责以大义,晓以利害”,使之“幡然改悔”。^③

萱野收到孔祥熙的回信后,于6月9日回国,向小川平吉汇报。萱野声称,和贾存德、宋霭龄等孔祥熙、汪精卫的代表反复会见,结果孔祥熙等人的媾和决心愈加确定,准备不通过第三国,直接进行谈判,促使蒋介石下野。萱野期待在媾和之后,解散国民政府,与北京、南京的新政府合作(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汉奸政权——笔者),建设新政府。当时,中日两国已经断交,小川对萱野打开了和国民政府的谈判通道表示高兴,但他声称,关键时刻必须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和谅解,本人近来主张以蒋介石为对手进行和谈,不依靠蒋介石的力量而想驱逐共产党是困难的。^④10日,小川访问新任外相宇垣一成。当晚,与萱野一起访问首相近卫文麿,萱野向近卫呈交了孔祥熙复头山满函副本等文件。11日,萱野单独会见了宇垣。

1937年11月,日本政府曾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对蒋介石集

①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寇勾结活动的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70页。

② 《战争と共产主义》,172页。

③ 《支那事变善后处置》,日本外务省档案:A-1-1-0号。

④ 《小川平吉日志》(2),1938年6月9日。

团进行诱降,谈判迁延到1938年1月。中国政府未按日本规定的期限作出答复,日本首相近卫于同月16日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①小川平吉主张以蒋介石为对手进行和谈,这就和近卫声明发生矛盾。在会见宇垣时,小川提出:既要求蒋介石下野,又以蒋介石为对手进行谈判不也可以吗?^②目的在于调和这一矛盾。

在日本政府中,宇垣的观点与小川接近。他就任外相时即向近卫提出,“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必要时取消1月16日声明。^③近卫也感到这一声明是个“大失败”^④,同意宇垣的意见。因此,他们都支持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的谈判。宇垣表示,不必对蒋持坚决排斥态度;近卫则要求萱野将谈判情况及时电告小川,再由小川传达给他。^⑤

6月17日,萱野离日赴沪,就蒋介石下野问题与贾存德协商。7月4日,孔祥熙致电萱野,要求日方尽量放宽条件,表示愿承担责任,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以代替蒋介石下野。5日,萱野、松本藏次、贾存德等人转移到香港继续谈判。此前,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已于6月23日开始会谈。^⑥这样,为了同一目的,由孔祥熙牵线,在香港同时进行着两场谈判。为了保证成功,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两个家庭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松本藏次说:“二者之间没有日本、中国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4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② 《小川平吉日志》(2),1938年6月10日。

③ 《宇垣日记》,314~315页,朝日新闻社,1956。

④ 风见章:《近卫内阁》,79~80页,日本出版协同会,1951。

⑤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385~386页。

⑥ 参见《知られどる宇垣・孔秘密会谈》,《知性》别册,261~265页。

的区别。居正夫人作为孔祥熙行政院长的代理。一人是生母，一人是养父，分别代表日本和中国，谈判决定两国命运的重大问题。”^①谈判中，贾存德、马伯援等人表示，共产党正积极发展势力，汉口陷落将导致赤化蔓延，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他们提出，由孔祥熙、居正、何应钦、李宗仁出面会谈，并可由战胜者方面的日本提出议案。^②但是，蒋介石下野这一难题仍然无法解决。7月22日，萱野致电小川：“中国国内形势不允许蒋下野。蒋本人希望尽早结束战争，但周围的状况决不允许如此，担心引起混乱，以后无法收拾。”他表示将离港返国，借助头山满的力量，促使日本政府对要求蒋介石下野问题再作考虑，电称：“此点倘能办到，相信时局将急转直下，趋于解决。”^③

萱野等人赴港之际，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正赶赴东京谈判。高宗武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关系密切，是“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卢沟桥事变后，受命寻找“对日折冲”的途径。他早有撇开蒋介石，由汪精卫出面实现“和平”的打算。到日后，发现日方正在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便迎合日方意图，提出由汪精卫、张群等二三十人协力一致，迫使蒋介石下野。^④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的提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坚强的新的政权”。^⑤日本政府所谓“第一流人物”，即指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1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又通过了《中国新中央政府

① 《战争と共产主义》，173~174页。

② 《小川平吉日志》(2)，1938年7月27日。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593页。

④ 《萱野长知致松本藏次》，《战争と共产主义》，177页。

⑤ 日本外务省档案 S491。

建立指导方案》，准备在攻占汉口后建立所谓“中国新中央政府”^①。在这种情况下，萱野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自然要碰钉子。

在日本政府内部，陆相板垣征四郎属于强硬派，对蒋介石持坚决排斥态度。他表示：“按照原来的估计，汉口陷落时，国民政府将无条件投降，日本方面没有必要发表规定撤兵的声明。”^②宇垣属于柔软派，他仍然支持萱野和孔祥熙之间的谈判，但不敢过于拂逆陆军意志，表示蒋介石可在签订和约之后下野；如孔祥熙等出面会谈，他本人亦可出面。^③近卫文麿动摇于板垣与宇垣之间。为了争取支持，小川、萱野动员病中的头山满致书近卫，要求他排除军方的反对，与蒋介石集团媾和。

萱野返日之初，曾致电贾存德，声称如蒋介石决心“铲共亲日，媾和而后有办法”^④。9月上旬，萱野返沪，继续通过贾存德与孔祥熙联系。8日，萱野致电小川：“孔祥熙、蒋介石、居正等密约反共，如提出停战时，可否同意？”同日，小川请示宇垣后复电：“规定反共，和平后〈蒋〉下野是必要的，此点首须明确。对方提出停战，军部方面也许会附加麻烦的条件，不如孔祥熙等出面时，外相前往谈判为宜。”^⑤次日，小川以书信作了详细补充说明，信称：“日本希望蒋介石下野，但已大体谅解到，他在收拾时局之前不可能做到此点，倘蒋能在披沥反共诚意之时，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⑥从以蒋介石下野为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到允许事先“规定反共，和平后下野”，表明日方准备作出某些让步，因此，孔祥熙表示，愿意出面与宇垣谈判。

① 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102页，中华书局，1979。

② 《战争と共产主义》，175页。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400～401页。

④ 同上，393页。

⑤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595页。

⑥ 同上，596页。

其地点,宇垣提议在长崎附近的云仙,但萱野认为,在云仙谈判,孔祥熙等须在香港、上海、长崎换乘轮船,中途不仅危险,而且易为新闻记者侦悉,不如与海军交涉,在军舰上会面。^①9月15日,萱野第二次赴港,与贾存德等继续谈判。行前,致函小川,内称:“彼等因面子关系,对使蒋介石预先表示,在反共、和平后坚决下野一事颇感困难,以密约办理也感到非常为难,孔祥熙等共同保证,将于事后自动实行。”^②23日,宇垣将萱野的信件提交五相会议,要求海相米内派军舰供谈判使用,米内表示同意;同时,宇垣并要求板垣对与孔祥熙等人的会晤不持异议,板垣明确表示同意。此间,宇垣还曾上奏裕仁天皇,得到秘密批准。^③这样,近卫内阁“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似乎取消了。25日,马伯援离港,经河内赴重庆,与蒋介石、孔祥熙具体磋商;重庆方面也派郑介民绕道滇桂,赴港会商。

然而,日本陆军正积极准备进攻汉口,他们热衷于诱降汪精卫,对蒋介石不感兴趣。为了反对宇垣与孔祥熙谈判,他们不仅指使少数人面见近卫,指责宇垣为“国贼”,声言绝对反对和议,而且提出建立兴亚院,在外交一元化的旗号下削弱外务省的对华外交权。^④近卫顶不住陆军的强大压力,于接见新闻记者时声明:“帝国政府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方针始终不变。”^⑤在这一情况下,宇垣于9月29日辞去外相职务,萱野长知等积极为之牵线搭桥的宇垣、孔祥熙会谈也随之流产。

①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597页。

② 同上。

③ 《小川平吉日志》(2),1938年9月23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421页。

④ 额田坦:《秘录宇垣一成》,179页,日本芙蓉书房,1973。

⑤ 同上。

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香港谈判

日军侵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进攻汉口和广东的计划。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4天后,占领武汉。日本主战派认为战争即将结束,可以在中国建立亲日的新政府。但萱野却认为,战争将长期进行,日本孤军深入,四面皆敌,包袱愈来愈重,前途渺茫,因此,仍然主张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在此同时,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之一贯方针,勇猛奋进,造成最后之胜利”^①。但是,蒋方人员又连续致电萱野,表示“我方和平殊不便”,请求给予谅解。^②11月5日,萱野有一长函致小川,详细分析蒋方形势,告以蒋介石定可派郑介民来港,马伯援将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后回港,蒋介石的代表及孔祥熙的代表均在港等待。小川收到此函后,立即转示近卫、新任外相有田八郎、头山满及朝日新闻社主笔绪方竹虎等人。这时,近卫刚刚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内称:“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更换人事,改途易辙,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则帝国亦不加拒绝。”^③这样,就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说法有所修正。因此,小川告诉萱野:我方仍以“收拾大局,确立和平”为活动目的。中国的问题在于有共产党的存在,对蒋的苦心要有充分的谅解,中国的事务“只能慢慢地进行”^④。

① 《新蜀报》,1938年11月1日。

②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00页。

③ 《太平洋战争史》,中译本,231页。

④ 《小川平吉致萱野长知》,1938年11月25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02~603页。

在此期间,日汪关系有了迅速发展。11月20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与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达成“日华协议”,规定日华共同防共、承认伪满洲国、汪精卫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俟机成立新政府。12月21日,汪精卫脱离重庆政府,逃到河内。为了表示“小贺之意”,近卫于次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宣称日本政府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将与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①日汪关系的进展和汪精卫的出逃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集团,一度停顿的日蒋谈判再度恢复。

1939年1月4日,近卫内阁因内外交困辞职。平沼骐一郎继任首相,陆相、外相等留任。5日,萱野致电小川,告以“和平有望”^②。次日,萱野返国,向小川汇报,蒋介石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和平”之意不变。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决心起用嫡系复兴社人物。除郑介民、柳云龙外,增派杜石山参加和谈。杜是蒋介石在香港的秘密办事处负责人,对蒋可以发挥重大影响。^③14日,小川、萱野访问有田外相。17日,小川访问平沼首相。在争取到新内阁的支持后,萱野于23日致电杜石山,告以日本方针不变,询问蒋方态度如何。当时蒋方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同时,通过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2月3日,陈诚致电柳云龙,告以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奥秘,电称:“参政会与五中全会俱不足以为和平之根据,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407页。

②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05页。

③ 《小川平吉日志》(2),1939年1月13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436~437页。

而无阻。”^①陈诚要求柳云龙将此电转告杜石山与萱野。2月19日,杜石山致电萱野,内称:“柳云龙表示,汪精卫、孔祥熙、何应钦等均有代表与日方接洽,则吾人所商者,更为速于实现。”^②柳云龙传递的上述信息使日方兴奋异常,连板垣也认为,陈诚握有军事实权,电报大可注目。他和小川一向政见相左,但双方却得出了共同结论:国防最高委员会断然排斥共产党人加入,和平将易于实行,中央军实力强大,打击共军并非难事。^③头山满则要求小川赴华,和萱野一起谈判。他表示,倘有必要,自己即便躺在船上,也扶病成行。2月25日,小川致函先期回沪的萱野,声称头山满日益健壮,旅行当无问题,倘蒋介石因周围之事对讲和犹豫不决,可由头山满代表我等加以劝告。^④

蒋介石于3月4日致电杜石山云:“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⑤甩开孔祥熙,起用嫡系人物,表明蒋介石对谈判的重视,此电则进一步表明,蒋介石直接控制谈判。杜石山接电后,即电邀萱野来港。萱野于7日离沪南行,9日抵达香港。行前,将有关情况电告小川。此后数日内,小川即紧张地访问平沼首相、有田外相、板垣陆相等人,阐述蒋介石的和平诚意。

3月16日,宋美龄以治牙为名到港与萱野进行了非正式的晤谈。17日,萱野、柳云龙、杜石山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会商,柳云龙提

① 《杜石山致萱野长知》,1939年2月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08页。

② 同上。

③ 《小川平吉日志》(2),1939年2月1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446页。

④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0页。

⑤ 同上,611~612页。

柳雲龍科長譯轉

石山兄台鑒、歷次來電暨萱野翁前日來電均已誦悉、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奔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于平等與互讓原則之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日本方面究竟有無和平誠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實詢問、佇候詳復、蔣中正豪

三月四日 蔣中正電報

蒋介石密詢日方“有无和平誠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电
(采自日本国会图书馆)

出7条：1. 平等互让；2. 领土(完整)主权(独立)；3.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4. (日方)撤兵；5. (签订)防共协定；6. 经济提携；7. 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关于满洲，另议协定。^①会后，杜石山致电蒋介石，劝他抢在汪精卫之前与日本言和，电文称：“且和平之事，当在

^① 《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4页。

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多一障碍，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19日，得蒋介石电，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删。”^①

3月24日，小川亲赴香港。30日，在港听取萱野汇报，将备忘录交给萱野，令其转交柳云龙，其要点为：1. 日本政府尚未确认蒋委员长有和平诚意，希望派遣要人为代表，此为表示蒋委员长意志之最良方法；2. 媾和基础条件为近卫声明，五相中至今尚有希望国府改组者，而国府又认此为不可能之事，此点之解决为最先首要之问题。小川声称：“予反复思忖，苦心焦虑，别得一便案。”^②关于“便案”的内容，小川故弄玄虚，要求面见蒋介石或其心腹要人“详细谈议”。其实，小川的“便案”很简单，不过是要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实行局部停战。萱野询问杜石山，讨伐共产党是否可能，杜回答可能，同时表示要征询宋美龄的意见。宋的回答是，可用密约办理。此后，杜石山又电询蒋介石，蒋复电同意“用密约办理”。杜对小川称：“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③4月10日，小川致函蒋介石，声称“小生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要求蒋介石明确表态。13日，蒋介石复电称：“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致意也。”^④蒋介石要小川和马伯援联系。对马伯援，小川是满意的，认为他是适当的人选，准备通过他摸清蒋介石的本意。但是马伯援却因脑溢血于14日突然去世。

① 《杜氏笔记》，《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5~616页。

②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4~615页。

③ 《赴香始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653页。

④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20页。

轉石山兄鑒文電及小川翁萱翁台示敬悉一是小
 川先生本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兩國戰爭
 之中不能派代表來港致敬歉甚惟托其在港友
 人馬伯援君代為致意也希與馬君聯絡並將詳
 情電告蔣元

四月十三日蔣介石電

蒋介石“特秘”电(采自日本国会图书馆)

马伯援去世后,小川立即要求重庆方面补派有力人员来港,未见答复。4月25日,陈诚致电杜石山,内称:“文日以来各电,俱已译呈委座,惟未得批示,请暂待为要,小川翁等务恳切实联络。”^①29日,蒋介石原配毛氏夫人之弟返渝,萱野托他带信给蒋,声称与蒋“叨为盟友,谊若

①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21~623页。

弟兄”^①，劝蒋速决。5月6日，小川和张季鸾会谈。小川提出，日本战争的最大着眼点为排共。张季鸾则称：迄今为止，共产党一直在和蒋介石一起从事抗战，要蒋立即讨伐，难以做到。^②5月11日，小川致函蒋介石，劝他排除畏难情绪，当机立断，函称：“讲和之影响，内外上下，复杂多端，畏其难而不为，是非英雄，则终于难而已矣。惟知其难而为之，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③小川再次要求蒋介石派要员来港，并称愿与萱野共同赴渝，否则即束装归国。16日，重庆方面根据小川要求，派侍从副官贾某乘专机到港携走该函。此前，杜石山也致电蒋介石，声称马伯援已逝世多日，事悬未决，要求蒋介石“迅于电示”^④。

萱野、小川急于和蒋介石会谈，但蒋介石却于16日致电柳云龙，声称萱野及杜石山连日各电均已收到，“请石山兄暂勿与小川翁往还，但须随时报告小川翁行动”^⑤。蒋介石的这一突然变化，杜石山曾根据重庆来人所述，对萱野作过解释，其原因为：1. 蒋介石历次宣言，皆肯定抗战，一时不易改口；2. 蒋介石已嘱孔祥熙，命张季鸾、原顺伯^⑥、贾存德等继续与萱野及小川会晤，然后由孔祥熙根据各人报告，联络重庆元老及握有实力者，向蒋介石要求和平，再由蒋提出国防会议，议决后再派代表来港。^⑦尽管如此，小川仍然觉得受到冷淡，便向蒋发出最后通牒，声言将于6月3日离港，14日由上海归国。

①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21~623页。

② 《赴香始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653页。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24~625页。

④ 同上，626页。

⑤ 同上。

⑥ 原顺伯，孔祥熙秘书。

⑦ 《杜石山致萱野长知》，1939年5月20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27页。

香港谈判期间,日军始终采取咄咄逼人姿态。5月,日机多次轰炸重庆。26日,蒋介石派副官张铭新到港,退还小川、萱野原函,对轰炸重庆一事提出质询,认为足以证明“日本军、政二界之不协调”,同时,张透露了蒋不敢轻易言和的心事。张称:“蒋自‘九一八’后已受国人唾骂,讥为卖国贼、日本走狗”,“今后各事,欲不小心自亦有难为之处,因自己失败,政权即落红军之手,两国前途苦恼更多,所以委曲求全,无非想到彻底处也”。^① 杜石山也向小川说明,蒋介石选派代表,“视为心腹者便可”,选派大人物,易于泄漏,“事无成,且自己失败也”。^②

张铭新、杜石山的解释多少消融了小川的怨气。29日,小川致函蒋介石,对蒋的“苦心”表示谅解,但他仍然表示:“如别有便法,至获好机会,未必吝于陈述鄙见也。”^③该函于6月2日由杜石山用专机送蒋。同时,杜石山、柳云龙也对小川表示挽留。6月4日,副官杨洁自重庆来,进一步说明蒋介石退回函件的原因。杨称:“蒋氏将小川翁函提出嫡系干部会议,事为共产党所闻,迫蒋履行西安约言,不得中途妥协,并迫蒋迁都西安。事弄糟了。广西系亦出面反对,说如中途妥协,广西决单独抗战。”杨并称:“蒋氏密嘱,无论如何,欲保留此线交谊,并须再作紧密联络,俟时机一至,便可进行。”^④

杨洁到港前一天,宋美龄再次秘密到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当时,正值日本五相会议确定以汪精卫、吴佩孚组成中国“新政府”之后,汪精卫已经到达东京,正在与平沼首相会谈。9日,杜石山对小川说:“为中日两国早日结束战局计,以及种种考虑,在汪氏未成立机体组织之前,

① 《杜氏笔谈》,《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29~631、63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杜氏笔谈》,1939年6月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34~635页。

和平尚可实现。如果汪氏成立政府,深恐将来适如西班牙状况,演变更多,问题更不易收拾。”^①10日,杜石山会见小川,明确要求小川回日后,阻滞汪精卫成立“新政府”。^②当夜,宋美龄、柳云龙等密议后,再次由杜石山出面通知小川,已议决要求蒋介石指派人员到此面商和平,蒋“此时已有决心进行,惟内部尚须措置”,希望小川“无论如何,设法阻滞汪氏计划之成功”。^③

6月11日,小川回日。两个多月前,当他开始中国之行时,曾经踌躇满志地写过一首诗,中云:“胸中自有回天策,笑上南溟万里舟。”此次归国,他再也没有这种心情了。

再次谈判的洽商与搁浅

小川回国之后,日、蒋双方都不愿中断已经开始的谈判。1939年6月14日,孔祥熙再度出面,致电萱野,要求在具体方法上给予指导。^④当时,汕头已被日军攻陷,萱野企图利用这一形势,通过孔祥熙的关系加速谈判进程。与此同时,小川则在东京与平沼首相、有田外相、近卫文麿及板垣陆相等多次交谈。平沼等认为,香港谈判表明,蒋介石缺乏诚意,“已经到了正式决定倾全力于汪精卫的时机”^⑤。小川则竭力说明,蒋介石仍有诚意,对汪精卫不可希望过奢。当月,汪精卫自日本到

① 《杜氏笔谈》,1939年6月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34~635页。

② 《小川平吉日志》(七),1939年6月10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488页。

③ 《杜氏笔谈》,《杜柳二氏要求》,《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37页。

④ 《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6月17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37页。

⑤ 《小川平吉致萱野长知》,1939年7月16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42~643页。

达北平,企图与吴佩孚会晤,磋商“合作”问题。汪提出在顾维钧住宅见面,吴则坚持“行客拜坐客”,要汪到他的寓所拜见。双方坚持不下,未能达成协议。^① 这使小川感到气氛好转。自7月上旬起,他多次致函萱野,指示和蒋介石集团接触的方法,7月4日函提出甲、乙两案。甲案:日本承认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中国接受排共亲日主张,双方同时停战,以互让妥协的精神开始和平谈判。乙案:订立讨伐共产党的密约,提出局部停战条件。小川表示,希望与蒋方重要人物会谈,并设想,在9月份汪精卫建立新政权之前迫蒋接受“和平”条件。^② 7月7日函强调,先在有力的个人之间进行接触,再向日本政府提出,一气呵成。他认为日本对蒋介石、孔祥熙有抓紧的必要,建议采取前外相宇垣的办法,双方在军舰上会见,“顺势要求解决对日问题”^③。7月16日函重申个人接触和军舰会谈两种进行方法,认为有田外相与宇垣不同,中途接手,有必要重新得到蒋介石的承认。他要萱野特别注意,日本方面由于对重庆绝望,在中国北方建立“特殊国家”的意见正在抬头。函末,小川要求萱野将本函秘密示知蒋介石与孔祥熙。^④ 十三天之内连发三函,显示出小川重新打通与重庆谈判道路的迫切企图。

尽管小川态度积极,但萱野则认为尚非其时。7月7日,蒋介石为抗战两周年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等一系列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18日,萱野致函小川,认为蒋介石受到英国大使的迷惑,正在观望形势,“此时并非我方提出问题的时机”^⑤。8月3日,萱野再函小川,告以已遵嘱将7月16日函件出示杜石山、张季鸾、罗集谊、原顺伯等

① 《吴氏思想表现一束》,《吴佩孚工作档案资料》,10页,中华书局,1987。

②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40~641页。

③ 同上,642页。

④ 同上,643页。

⑤ 同上,644页。

人,并命其致电重庆,促使蒋介石、孔祥熙等反正。他声称,正在研究使重庆方面“不得不下决心的妙计”,其内容有二:一是策动华侨要求“和平”;二是策动江西九宫山地区蒋军倒戈,协助日军攻陷武宁、修水,给予重庆以军事打击。^① 杜石山也赞成萱野这一“妙计”,致函小川:“现在除照旧进行外,并邀集武装同志多人,拟别出计划,以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② 杜石山在小川归国之后,对蒋介石也产生了某种怨望。6月15日,蒋介石曾要他“来渝面谈”,但杜却以婴儿病危为由拒不奉命。^③

除杜石山之外,柳云龙在日、蒋谈判中继续发挥着特殊作用。7月16日,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及人选,规定蒋介石有权实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111条的规定——国民政府有与外国宣战、议和及缔结条约的权力。下旬,柳云龙致函杜石山,告以此次军事委员会改组,有极重要的地方:1. 排除共产党人员,不使参加;2. 委员长有宣战、议和之权力的规定;3. 蒋介石力辞大元帅之职而专任委员长职务。^④ 8月1日,杜石山致函小川与萱野,摘要报告柳函内容,并称:“蒋氏已有与共产党分离之决心与准备,且已有议和之决心与准备。”^⑤ 8月初,蒋方派郑介民、王子惠先后赴日。同月20日,蒋介石又派副官张某到港,向杜石山提出,要求见到小川7月16日的亲笔信。杜石山建议将原信借出进行拍照,为萱野拒绝,张某于是将信熟读之后归渝。^⑥ 此际,张季鸾曾向萱野表示:“如日本使汪兆铭之运动具体化时,和平将永远无望。”^⑦

①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45页。

② 同上,649页。

③ 同上,639页。

④ 《杜石山致小川平吉、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648~649页。

⑤ 同上。

⑥ 《杜石山致小川平吉》,1939年8月24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52页。

⑦ 同上。

小川得悉军事委员会改组消息后,也视为蒋介石“对共之准备”,立即向当局大臣汇报,并向各相分发杜石山的信件。他向萱野指出:“汪兆铭在双十节前组织国民政府的计划仍在进行中,因此,最好在此前促使停战协议成立。”^①8月10日,小川走访近卫文麿,当夜进京,与首相、外相、陆相会谈,此后又提出一项所谓显示“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即小川携带首相的书信亲自出马与重庆谈判,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或者相当于孔祥熙的人物进行预备会谈,其地点可在香港、重庆或其他任何地方。小川表示:“倘此次交涉仍以不顺利告终,我等将断然与重庆绝缘,突飞猛进地建立新政权”;同时,“自认推荐和信任蒋介石这种人物的不明智,除向天下认罪之外,别无可言”。^②

当时,汪精卫的“组府”活动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汪精卫为“国民党总裁”,议决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同日,柳云龙电告萱野,国民参政会常务委员会开会,委托张君勱提出和平方案,倘使日方不提出蒋介石下野问题,全体可以议定。^③9月3日,柳云龙飞港谈判,6日返渝。此际,重庆政府得到汪兆铭新政府延期成立的情报,大为高兴。小川后来向日本政府汇报:重庆方面力谋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成事,孔祥熙准备以牺牲一身的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但是,由于军方的压力,日本政府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将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重庆方面对此感到疑惧,形势急变,多数意见主张,“宁可将讲和的机会置于新政权的实力试验之后”。9月16日,参政会否决了和平案云云。按:9月9日至18日召开的国民参政

① 《小川平吉致萱野长知》,1939年8月16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49页。

② 同上,650页。

③ 《萱野长知电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53页。

会一届四次大会根本不曾讨论过所谓“和平案”，小川得到的显然是柳云龙等人提供的假情报，但有一点是确实的，由于日本政府发表了支持汪精卫的声明，重庆方面改变了与小川等人再开谈判的计划。^① 10月13日，萱野离开香港回国，谈判再次搁浅。

尾 声

萱野归国之后，小川等人的“和平”工作陷于停顿。

1939年12月2日，萱野会见外相野村吉三郎，陈述重庆方面情况，阐明对汪精卫政权的见解，没有明显成效。1940年1月，米内内阁成立。3月9日，小川致函陆相畑俊六与外相有田八郎，希望在发表政府声明时，避免排斥与重庆政府交涉的言论，以免杜绝收拾战局的通路。^② 同月30日，汪记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小川曾致函汪精卫，劝他和蒋介石合作，函称：“民国内地抗战意识今尚颇旺，绥靖招抚之事真非容易。若欲速收战局，举和平统一之实，不如使重庆政府停战讲和。”小川表示：“阁下与蒋介石相会之机会必将到来。”^③ 4月30日，时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发表文告，声称“对中国要彻底讨伐”，同时又称，重庆政府“如有悔过之意，可以宽恕”。次日，小川致函板垣，赞许其后一语，认为它将大有助于“收拾残局”^④。

就在萱野、小川等“静观”之际，蒋介石方面却又积极起来。同年6

① 《重庆方面关系经过概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660页。

②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6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670页。

月,日军占领四川门户宜昌,威逼重庆。19日,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发表广播谈话,声称:“蒋介石肯为国家打算,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我们不但可走开,并且可以死。”^①21日,蒋介石致电杜石山,要他邀请萱野来港,谈判“和平”。26日,曾政忠再次致电杜石山,声称蒋介石获悉有关经过后,表示后悔,以前之所以不能拜受萱野诚意,其原因在于状况不明和情势不许,现在形势变化,汪精卫宣称,倘实现和平,彼等不仅将引退,即死亦所不辞。这样看来,和平有了可能。^②杜石山奉命之后,不敢怠慢,连电萱野,告以夜长梦多,要萱野把握机会,乘时进行。

此前,蒋介石已经派特务曾广冒充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和日方的今井武夫等人在香港、澳门多次磋商,6月6日,双方一致同意,由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举行三人会谈。这就是日方所谓的“桐工作”。但是,蒋介石愿意多线进行,又派郑介民、柳云龙等到香港活动,传达蒋介石的“和平”决心,准备恢复与萱野等人的会谈。7月29日,小川致电板垣,告以经慎重研究,萱野将于8月2日赴港。^③不料板垣这时正热衷于“桐工作”,不愿另生枝蔓,要求萱野延期出发。^④8月上旬,杜石山致函萱野诉苦,声称受到重庆方面“联络欠确实”的责备,要求萱野勿因少数人的阻难而坐失良缘,尽快确定来华日期。^⑤10月初,萱野再次准备赴港,但外相松冈洋右正通过银行家钱永铭与重庆联系,仍然不愿另生枝蔓,萱野之行再度受阻。^⑥

汪伪政权是在日本卵翼下成立的。举行典礼的当天,日本政府即

① 袁旭等:《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241页,档案出版社,1988。

② 《杜石山致萱野长知》,1940年6月2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73页。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83页。

④ 《重庆方面交涉经过概要追加》,《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664页。

⑤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687页。

⑥ 《重庆方面交涉经过概要追加》,《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664页。

声明支持,并期待各国承认。有意思的是,日本政府自己却未立即予以外交上的承认。从长期的军事和政治实践中,日本侵略者终于认识到,要如愿以偿地解决中国问题,撇开蒋介石及其政府是不行的。因此,他们不得不留有余地,以便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并促进汪、蒋合作。板垣的“桐工作”,松冈的“钱永铭工作”,目的都在于此。但是,他们也感到,蒋介石不同于汪精卫,不会轻易就范。因此,他们在对重庆开展“和平”工作的同时,又在积极准备承认汪伪政权。^①9月中旬,“桐工作”失败;继之而起的“钱永铭工作”也困难重重。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承认汪伪政权。

蒋介石否定了今井武夫、宋子良等人的会谈结果,主要原因在于板垣提出的条件过于“苛细”^②,但是,他并不拒绝“和谈”。11月1日,杜石山再次致函萱野,说明蒋介石的苦心。函称:“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指张学良——笔者)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函中,杜石山并通知萱野一项特别消息——美国已“积极备战”,要求日本“鉴于世界大势之安危,临崖勒马,以符永保太平洋之宗旨”^③。同月上旬,松本藏次和头山满的儿子头山秀三到达澳门,向杜石山传达日本政府即将承认汪政权的信息以及头山满的意见。12日,杜石山返港,急电向蒋介石报告。不久,杜石山得复电,已由何应钦、白崇禧联合签发命令,限红军五天内退驻西北方边区,并拟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缓和苏俄,免为和平之梗。^④杜石山得电后,派门人林某携电赴澳门,但松本等已返

① 参阅《中国事变迅速处理办法》,1940年9月1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WT47号;又,《对重庆和平交涉之件》,1940年10月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488号。

② 《杜石山致头山满、萱野长知》,1940年11月16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97页。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96页。

④ 《杜石山致萱野长知》,1940年12月15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702页。

日。杜石山于是通过日本人八谷致电外务省，力陈承认汪精卫政权的利害关系。^① 16日，蒋介石又派侍从副官陈某乘专机飞港，对松本和头山秀三远涉重洋前来报告有关消息表示感谢，同时表示：“自七七以还，只是委托石山兄维持立云翁、秋山翁、萱野先生等与中国及国民党以及个人之历史的感情，无论直接间接，未曾选派任何人员，提出任何事件，是以职责攸关，不得不谨慎也。”^②然而，不管蒋介石集团如何表示“殷勤”之意，日本政府还是于11月30日承认了南京汪记政权。杜石山于12月15日致函头山满和萱野，满腹牢骚地表示：“岂知不数日而承认汪氏之讯至，真如天际巨雷，使弟不知如何解说？”函件同时批评日本政府失策：“今以两无准备之局势，而遽予汪氏以承认，故英、美轻之如鸿毛，而以泰山视渝也。”^③1941年2月，杜石山派人去上海寻找松本藏次，企图重建联系，结果未能如愿。

还在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就在《配合华南作战的政务处理要纲》中规定：“对华侨方面，配合政治及其他措施，领导他们反蒋亲日”，“同时促进对南洋贸易的发展，以利获得不足资源”。^④ 1941年5月5日，萱野为了调查华侨情况，以南方协会顾问身份到达澳门。在此之前，重庆方面已经得知这一消息，派柳云龙及侍从副官一人来港，通过杜石山征询萱野对“和平”的意见，重申蒋介石“绝对维持此线”的主张。5月12日，杜石山抵澳，与萱野相见，萱野提出：“可以无条件委托头山翁。”^⑤14日，柳云龙返渝向蒋介石报告。6月，蒋介石秘密召开嫡系干部会议及最高国防会议，决定一切委托头山满办理。会后，蒋介石赠头

① 《杜石山致头山满、萱野长知》，1940年12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700页。

② 同上，1940年11月16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98页。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701~702页。

④ 日本外务省档案 UD49。

⑤ 《报告书》(第四回)，《小川平吉关系文书》(1)，665页。

山满及萱野相片各一张，附言表示：“望今后协助处置共产党。”^①6月11日，小川通知萱野，当谈判地点决定时，头山将参加。^②

中國革命之秘話
(七) 頭山滿

當時蔣介石却不願認輸。他說：「革命還在進行。決沒有停頓。只是中國土地廣大。交通不便。難從南方一氣向北徹底革命。為今後的發展準備。並為恢復身心的疲勞。而作暫時休息。」昭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蔣由上海啓程。偕參謀張群和劉紀文及其他來日本。廿九日抵長崎。十月三日晨抵神戶。寓於該市的吳景濂寓。而使張群先向東京出發。張群抵京便來訪我。央託照料蔣介石。那時蔣是個僕物。想於日本一定是有益。所以我也就快應諾。

余沒有政治意味。不過特為會見頭山。大發等諸先生。和外務省參謀本館及其他的舊友。擬約逗留東京一星期。然後旅行日光。鹽原等地。以後是否赴美或歸返中國。還沒有決定。

蔣在帝國飯店卸除族裝。專作休息。便即到我的家裏來。他說：「一定要在先生左右起臥了。」所以我就叫他寄信給宅的川野。他一到東京。就希望拜孫文。的知己寺尾亭的墓。而且親選美的花菜供獻在墓前。

他住在我處的時候的印象嗎？不消說。我

成了北伐。蔣臨別時。對我乞賜教訓。他說：「中國到底要怎樣才好？」所以我說：「須要和日本一塊兒跑到底。決不可依靠共產主義。」又並說：「不論如何。日本和中國應該結盟。我所說的就是這意思。倘若還有一點。國家和國家的邦交固是不消說。就是兩人的交情也難保完全。」

那時候的蔣介石。同孫文一樣憎惡英國。所說的也是在日本的力量。應該和中國的力量併合。以圖應付的託論。只是這傻子拍那西安事件。來。這事

他在十月十五日。上海去。時恰值李宗仁。程潛。白崇禧等各軍正欲從安徽。湖南。江南的省垣。分三路進迫武漢。戰事也已經熱了。蔣在翌年一月五日入南京。再膺任總司令。指揮北伐軍。勢如破竹。到處擊破北軍。於是繼承孫文的遺志。成就民國的大業。

這道時。雖是完成中國的不世大業的人。但他終是傻瓜。對應該提携的日本反戈。以致難免自滅。他現在作最後的掙扎了。他會這樣蠢。實在我也是料想不到。(持續)

头山满著文，辱骂蒋介石是“傻瓜”（采自广州市中山图书馆）

然而，这时头山对蒋介石集团已经很失望，正在逐渐采取亲汪立场。6月14日，汪精卫访日。在此前后，头山发表连载文章，尖锐地抨击蒋介石：“他终究是傻瓜。对应该提携的日本反戈，以致难免自灭，他现在作最后的挣扎了。他会这样蠢，实在我也是料想不到。”文章又称：“于兹期待继承孙文遗志的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活动。”^③头山文章的

① 《萱野长知致小川平吉》，1941年6月11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707页。

② 《小川平吉致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708页。

③ 《中国革命之秘话》，广东《迅报》，1941年6月8—18日。

发表,宣布了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对蒋“和平”工作的破产。此后,双方虽仍有若断若续的联系,但始终无法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谈判。

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人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历史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抗战前期,蒋介石脚踏两条船。他一面进行对日作战,同时又维持谈判,准备妥协。当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作战不利时,这种动摇、妥协的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日方诱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关,也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关,同时,蒋自身的民族主义感情和他对切身利益的考虑也应是原因之一。蒋介石充分懂得,只要他接受日方条件,甚至只要他和日方谈判的消息泄漏,他就会遭到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垮台。香港谈判中,他之所以顾虑重重,其原因即在于此。

通过对文献的研究还可以看出,蒋介石集团和日方的“和谈”并不完全是真心实意的,有些显然具有策略目的。或为了延缓日军进攻,或为了阻挠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或为了延缓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的承认。兵不厌诈。战场上固然虚虚实实,风云诡谲,谈判桌上何尝不如此。历史是复杂的,任何简单化的看法都将妨碍对事物全貌和本质的认识。

附记:收集本专题资料过程中,承日本国会图书馆广濑顺皓先生指点,承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惠赠大量资料,写作过程中,又承日本冈山大学石田米子教授,寿祝衡、邹念之二位先生,尹俊春、周兴梁二同志帮助,谨此致谢。

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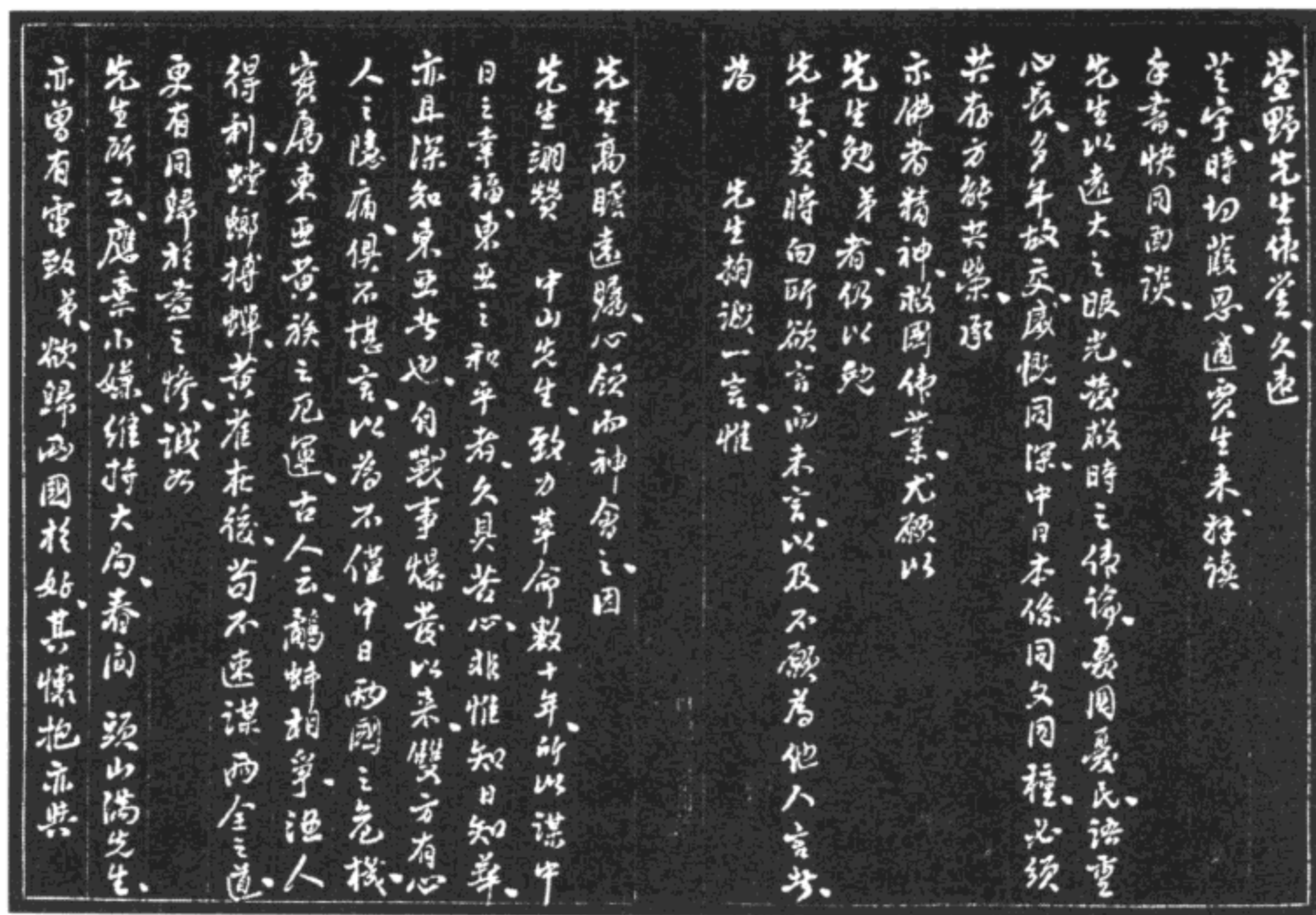
日蒋秘密谈判的重要资料

——读孔祥熙档案

萱野先生伟鉴：

久违芝宇，时切葭思，适贾生来，拜读手书，快同面谈。先生以远大之眼光，发救时之伟论，忧国忧民，语重心长，多年故交，感慨同深。中日本系同文同种，必须共存方能共荣，承示佛者精神，救国伟业，尤愿以先生勉弟者，仍以勉先生，爰将向所欲言而未言，以及不愿为他人言者，为先生掬诚一言，惟先生高瞻远瞩，心领而神会之。因先生翊赞中山先生，致力革命数十年，所以谋中日之幸福，东亚之和平者，久具苦心，非惟知日知华，亦且深知东亚者也。

自战事爆发以来，双方有心人之隐痛，俱不堪言，以为不仅中日两国之危机，实属东亚黄族之厄运。古人云，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苟不速谋两全之道，更有同归于尽之惨。诚如先生所云，应弃小嫌，维持大局。春间头山满先生亦曾有电致弟，欲归两国于好，其怀抱亦与先生相同，足见贵国老成谋国者，尚未尽为威武所屈也。惟是此次惨剧，由于贵国少数军人未审共同利害，一时误入歧途所致。敝国坚决抗战，纯为自卫起见，故解铃系铃，仍在贵国少数军人之手。先生欲自救以救人，必设法使贵国少数军人早日醒悟，必先使其了解此次战事于贵国之利害。弟旅东有年，不乏知交，且懔于唇亡齿寒之戒，不仅忧在敝国，而易地以想，认为贵国危机潜伏，亦颇为为之代忧，尚冀先生对于贵国少数军人有以指示而纠正之。



孔祥熙致萱野長知函手迹(1938年)

(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一)中日接壤最近，唇齒相依，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极为密切，互助则能共存，相残必致偕亡。且敝国地大物博，民性中和，适为贵国最近之善邻，较之其他远水不救近渴之友邦，尤宜患难相救，疾病相扶，不意今竟弃好寻仇，驱友作敌，似此阡墙之争，其豆之煎，何异自残肢体，自坏长城，况黄雀渔翁，俱在其后，失此奥援之国，必致唇亡齿寒。究竟贵国之真正敌人是谁，似应认清，此对于亲仁善邻，不能不希望贵国军人猛省者一也。

(二)贵国陆军为何而积极教练，贵国海军为何而积极扩充，一切武力之准备，是否专为对华之用！姑不论以今日整个战局观之，贵国未必即操胜券，一切武力消耗于对华之后，何时始能补充？一旦他国乘机对日冲突，将恃何种武力以与周旋？深恐贵国不亡于

对华，而亡于其他敌国。此对于国防武力，不能不希望贵国军人猛省者二也。

(三) 贵国原为工业国家，一切原料率多取给敌国，一切货品亦多行销敌国，是敌国为贵国惟一最大之市场，今竟摧毁之不遗余力。姑不论和气生财，懋迁有无，全恃情感，而战时贵国之生产力日益惨落，敌国之购买力日益减少，试问影响于贵国经济者，曷堪设想！德、义均为工业国家，纵能供给原料，行销货物，究有几何？且英、美、印度抵货之风，有加无已，贵国更蒙国际上之损失乎？同时贵国战费之增加，漫无限制，人民之负担不堪，尤恐贵国不亡于战场，而亡于市场，此对于经济恐慌，不能不希望贵国军人猛省者三也。

(四) 贵国人士素以武士道自豪，忠君爱国，抑强扶弱，今者军队在华，奸淫烧杀，惨绝人道，毫无纪律，武士道之精神已荡然无存。战而败固不必言，即使战而胜，对于军队之纪律，将何以整饬？对于嚣张之风气，将何以遏制？且民众反战之情绪酝酿益烈，尤恐贵国不亡于外患而亡于内乱，此对于武士道，不能不希望贵国军人猛省者四也。

上述诸端，仅系荦荦大者，此外因战事延长，不利于贵国之处尚多，想先生熟筹深思，早已洞若观火，而贵国朝野不乏明达之士，倘能平心静思，当亦悚然于此种自杀之政策，适足以促东亚之速亡。且数千年来我东方之文化，基于仁义道德，纯为王道，孟子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贵国固亦素倡王者者，今贵国少数军人舍王道而行霸道，竟欲以武力屈服敌国，以敌国土地之广，物产之富，人口之多，非惟在事实上不可能，而敌国人士薰陶于王道之中，最尚气节，倘使压迫过甚，势必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亦惟有余及汝偕亡而已。如贵国军人果能改弦易

辙，弃嫌修好，勒马悬崖，回头是岸，似非不难化干戈为玉帛。弟固深知贵国军人倔强成性，或以骑虎难下为虑，惟是止戈为武，古有明训，既不失其武士精神，亦不愧为大国风度，究修百年之好，抑种百年之仇，似全在贵国少数军人之一念。先生东亚明哲，中日有识之士莫不深佩，当此大局危急之秋，倘承联络贵国忠君爱国之士，责以正义，晓以利害，当可幡然改悟，此固贵国之福，亦东亚黄族之幸也。弟虽不敏，然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荣之百年大计起见，亦当竭尽绵薄，以从事焉。专此布悃，诸希亮察，未尽之意，仍由贾生面达。敬颂勋祺！

弟 名正肃
五、廿二

外附微物数件，聊以将意，务祈哂纳为幸！

上述函件，已摄成缩微胶卷，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孔祥熙档中。萱野，指萱野长知(1873—1947)，号凤梨，日本高知县人。1895年与孙中山订交，先后加入兴中会、同盟会。1907年被任命为东军顾问，负责购置并运送枪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萱野应黄兴之邀赴汉阳参战。1915年，再次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军顾问，协助居正在山东起义反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受首相犬养毅派遣，秘密来华商谈撤兵问题，因军部反对，不久即被召回。

在抗日战争中，孔祥熙属于主和派。1938年1月，日本浪人首领头山满致函孔祥熙，表示将竭平生之力使两国同归于好，要求蒋介石集团“速改旧图，更新其策”。同月，孔祥熙复电头山满，希望他“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法〈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3月末，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本藏次和孔祥熙的亲信、行政院代理秘书贾存德（即函中所云贾生——笔者）在上海中国旅社秘密见面。贾称：“如果任凭中日两国同

归于尽的话,将给整个亚洲带来不幸,必须设法讲求和平之道。”4月20日,双方在同一旅馆第二次相见。松本传达了萱野提出的和平条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独立,承认日本关于内蒙的立场;贾存德则要求日本全面撤兵。其后,在松本的安排下,萱野与贾存德见面,萱野声称:“我和孙先生是朋友,中日是兄弟之邦,不应以兵戎相见。”他要求贾存德转信给孔祥熙,大意为:中日交战犹如萁豆相煎,如孔有意出面解决阅墙之争,化干戈为玉帛,他愿意为此奔走。5月,贾存德携该函赴港,与宋蔼龄同机飞抵汉口。同月,贾存德携孔祥熙复函返回上海。关于这一过程,贾存德晚年回忆说:

在汉口住了两天,孔便令我转港返沪,行前找我谈话,首先勉励我一番,要我为他好好做事,并当面允诺在上海中央银行给我挂一个名义,领取薪俸。接着就警告我说:“你回去以后和这些人(指萱野等人)来往要特别谨慎,若不小心,一旦泄露秘密,我不但要否认,还要通缉你。当然,你也不必害怕,暗中我会保护你的。”同时,他还要我回去打听萱野背后的支持人是谁,经常和哪些人来往,松本藏次从前做过些什么,等等,最后让我找他的秘书李青选,给萱野带回一封信。

当天晚上,李青选拿着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给我,并说:“你可以看看信的内容,以便按照孔的意图和萱野交谈。”信的内容是:收到了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下旗回国时所带头山满先生的信。……今兄(指萱野)为了两国的利益有志斡旋,弟甚感钦佩,惟解铃系铃还在于日本当局,如果兄能以百年利益说动贵国当局早悟犯华之非,弟将呼应共襄此举。李青选还告诉我今后有事直接和他联系,并将联系时所用之密电本交给了我。

关于贾存德所回忆的这封信,近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在日本没有找到,在中国也没有找到,不想却在美国找到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将贾存德的回忆和原函比较,可以发现,贾存德的回忆虽然简略,但大体不错,“解铃系铃”云云,确系原函中的用语。

孔祥熙《复萱野长知函》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期间日蒋之间的秘密谈判。

原载《团结报》,1991年9月28日



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

在孔祥熙与宋子文二人中，蒋比较喜欢并信任孔祥熙。193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建立战时体制，任命孔祥熙为行政院长。同年6月，宋子文愤愤地对潘汉年说：“蒋之用孔作行政院长，就是为的准备好与日本谈判和议。”^①蒋之用孔，原因很多，宋子文的这段话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中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确曾通过孔祥熙多次与日方进行秘密交涉。由于除孔祥熙外，他的大儿子孔令侃等人均参与其事，因此，有的人称之为“孔家的和平运动”^②。

关于抗战时期孔祥熙和日本方面的秘密交涉情况，我在前些年曾有所论述。^③ 本文将根据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全面探讨孔祥熙与抗战期间中日秘密谈判的关系。前文已详的，本文将从略；海内外其他学者著作已详的，本文也从略。^④

① 《南湖(胡鄂公)致孔令侃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梅思平：《和平运动之如是我闻》，《汪精卫集团投敌》，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③ 见本书另文《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及《日蒋秘密谈判的重要资料——读孔祥熙档案》。

④ 参见章伯锋：《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反动集团几次妥协投降活动》，《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彭泽周：《中日战争初期的和谈》，（台北）《传记文学》，第54卷第3期。

贾存德与萱野长知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同月26日,日本政府通过德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面交中日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四条。由于中方没有按照日方的规定时间作出答复,骄狂不可一世的近卫内阁于次年1月发表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从而表示出对蒋介石的决绝态度。但是,这以后,日本军方和“民间”都仍然有一部分人企图做国民政府的工作,诱使蒋介石等人投降。

1938年3月底,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与旧日一起做过情报工作的日本人松本藏次在上海相遇。松本当时在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处任参事,他劝贾出而奔走,早日和平解决中日之间的战争,以免俄、英等国收渔之人利。^①松本并利用孔、宋之间的矛盾进行挑动,声称“宋子文为未来政权企图计,亦有似此活动。愿君勉为之”^②!当时,胡鄂公(伯良、南湖)是孔祥熙留在上海的顾问,指示贾提出先决条件:1.介绍畑俊六见面;2.畑俊六亲笔写信给蒋介石或孔祥熙。

日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是武汉,畑俊六企图在此前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同月4日,畑俊六与贾存德会晤。畑仍然坚持近卫声明,声称:“现在日本的对家已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他表示了一点灵活的态度:如蒋委员长、孔院长“有所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③。畑俊六旋即介绍萱野长知与贾存德交谈。萱野在

① 《伯良(胡鄂公)致王良(梁)甫电》,1938年4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贾存德阳电》,1938年4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伯良(胡鄂公)致王梁甫电》,1938年4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辛亥革命前后与中国革命党人有密切关系,当时受日本松井石根大将之命在上海寻找谈判线索。他对贾述说了自己与孙中山、孔祥熙、宋霭龄及国民党当局诸人的交往,声称“中日战争结果,必二者俱伤”,表示愿遵畑俊六之命“写信给蒋委员长和孔院长调和”^①。

萱野长知当时虽服务于日本军方,但和军部并不一条心,企图另辟议和渠道。5月初,贾携带萱野函件离沪。临行前,萱野对贾称:日本军阀要价过高,要实现中日和平,只有设法使日本和平派抬头。^②同月6日,贾存德经港飞汉,会见孔祥熙。22日,孔祥熙复函萱野长知,陈述侵华战争对日本的危害,要求萱野做日本“少数军人”的工作。函称:

敝国坚持抗战,纯为自卫起见。故解铃系铃,仍在贵国少数军人之手。先生欲自救以救人,必设法使贵国少数军人早日醒悟,必先使其了解此次战事对于贵国之利害。^③

同时,孔祥熙致日本浪人首领头山满一函,内容大体与致萱野函同。^④6月1日,贾存德携带孔祥熙函回到上海,与萱野、松本会谈。贾称,武汉等地“抗战极坚决”,“人心镇定如昔”。他转达了孔祥熙的意见:要求日方“放下屠刀,使我领土完整,为东亚两大民族千年万年谋真正共存共荣”。“苟能利和平,即敝履现院长地位,亦愿与二位共同奋斗。”萱野表示:“拟回东京联络同志作后盾,然后分谒内阁、军部、重臣、元老,征求意见,一致以谋和平之早日实现。”他并说:“余老矣,士为知己死,蒙

^① 《伯良(胡鄂公)致王梁甫电》,1938年4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王梁甫致孔令侃函》1938年5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孔祥熙致萱野长知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④ 《支那事变善后措置》,日本外务省档案,A-1-1-0。

院长不弃,同情管见,余誓以老命报之。”^①7日,萱野与松本飞返东京,和头山满密议。接着,与近卫首相、宇垣外相会谈。17日返沪,对贾存德称,近卫、宇垣对孔祥熙函件都表示同情。萱野并要求与孔祥熙择地会见。^②

日方积极,孔祥熙却表现得很冷静。6月25日,孔祥熙的秘书李青选(汝秀、毓万)致电贾存德,指示他说话须“慎重”,电称:“事关重要,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应付失宜,危险至巨。现在彼方既感困难,我方尤须沉着,如过急反以示弱,更难得当也。”其后,李青选一再致电贾存德,声称孔祥熙“不便轻易离汉”,要贾了解日方“切实办法”,并要求萱野长知亲笔开明“真实条件”。^③

日方一方面宣称条件不高,畑俊六表示:“日将领同士兵,除海军一部分外,多已厌战。今次日提和平条件,极平正,绝不使孔院长为难。除经济合作、防共产外,无苛求。”^④一方面则要求解散国民政府,蒋介石下野,由孔祥熙出面组织政府。28日,贾存德再电孔祥熙,告以萱野意见:

此事至难而不难。盖双方着重顾全颜面,中国之颜面重在军队退出,领土完整,日本之颜面重在解散抗日政府,老蒋暂行下野,从新组府,任之孔院长。老蒋下野,换汤不换药,故难而不难者,即此之谓也。^⑤

① 《贾存德致孔令侃转李青选电》,1938年6月3日、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贾存德致李青选电》,1938年6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李汝秀致贾存德电》,1938年6月25日、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贾存德致李青选转孔祥熙电》,1938年6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同上,1938年6月28日。

萱野认为在上海不便,要求于7月5日与贾存德共同赴港谈判,并要求面见孔祥熙。7月3日,李青选电告贾存德,明确拒绝解散国民政府、蒋介石下野等条件,但表示可以孔祥熙下野作为转圜。电称:

彼方果有诚意,当以可能条件与我商洽,否则漫无边际,可不必谈。如军部所提,非惟政府不能因人要求而解散,委座不能因人要求而下野,且全国民众亦不能允许委座下野。此等话实使夫子无办法说出。前曾与兄谈及,现在最高行政当局本为夫子,如果彼方以为无法下台,夫子本人情愿牺牲地位,以为彼方转圜面子。^①

萱野长知等并不十分同意近卫“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听了孔祥熙愿意牺牲院长地位的表示后,便表示可以不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②

7月6日,贾存德、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转到香港谈判。此前,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和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谈判已经开始。^③谈判中,贾存德等提出,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9月上旬,日方声称,蒋介石可以预先作出下野表示,而在和平后自动实行。在此情况下,孔祥熙表示可以出面与日本外相宇垣谈判。但是,日本陆军妄图在当年秋季结束对华战争,正积极准备进攻汉口、广州,同时热衷于诱降汪精卫,对蒋介石不感兴趣。9月29日,宇垣下台,拟议中的孔祥熙、宇垣会谈流产。^④同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

① 《李青选致贾存德电》,1938年7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贾存德致李青选转孔祥熙电》,1938年7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关这一谈判的情况可参阅杨凡译《日本外交档案中有关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记录》,《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中村丰一:《知られざる宇垣・孔秘密会谈》,《秘められた昭和史》,日本河出书房版,261~265页。

④ 参阅本书另文《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胡鄂公与津田静枝

孔祥熙的对日谈判大量是通过胡鄂公进行的。^①

孔祥熙一面动员萱野长知等人做日本“少数军人”的工作，一面力图和日本军方建立直接联系。1938年6月，孔令侃在香港指示胡鄂公，利用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原莞尔为枢纽，在孔祥熙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之间建立“谅解”，胡返沪后，即嘱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伊藤武雄、铃江言一二人赴大连与石原商量，石原表示同意。^②

同年7月，胡鄂公与伊藤武雄等商定，以中日在野名流，用私人资格进行初步谈判。中国方面人物以唐绍仪、吴佩孚为领袖，实际谈判人物为江天铎、汤芑铭、罗家衡、易敦白。伊藤武雄同意这一计划，即联络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在陆军参谋部任职的柴山兼四郎、在海军任职的津田静枝中将，以及坂西利八郎中将等，于10月上旬向日本政府提出说帖，得到同意。^③ 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原定“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为诱使国民政府改变政策，更

① 胡鄂公一生经历复杂。曾参加辛亥革命北方起义。191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1年在北京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不久，《今日》派的主要骨干被并入共产党。1922年12月，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因其有帮助曹锟贿选嫌疑，决定停止其“出席小组会议”。后担任孔祥熙的私人政治、经济顾问。1936年在潘汉年领导下联络西南派，反对蒋介石。抗战期间在上海、香港为国共两党做秘密工作。1945年任孔祥熙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1949年去台湾。1951年在台北病逝。

② 《情字第2076号电文》，《档案史料与研究》，1991年第3期。

③ 《孔令侃于香港转发胡鄂公报告电文》。《档案史料与研究》，1991年第1期；参见《伯良（胡鄂公）致孔令侃电》，《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

换人事组织,参加所谓日、满、华的合作。于是,日本政府一面命土肥原统一汉奸政权,一面派津田静枝、今井武夫、伊藤武雄等到沪,与国民政府方面进行私人谈判。

11月22日,伊藤与胡鄂公谈话,说明日本转变政策的原因。伊藤称,强硬派原以为攻下武汉、广州后,中国的抗战即可结束,但事实并非如此。强硬派也认为,必须“双方政府直接商议”,由“最高责任者在适当地点会见”。因此,原来反对宇垣的一派已经在原则上和宇垣的主旨一致。伊藤并称,日本希望以“东亚门罗主义”为和平基础,排除西洋各国的干涉。^①自11月26日至1939年9月,胡鄂公与津田静枝等共进行了六次会谈。前三次会谈属于一般性会晤。胡鄂公根据孔令侃指示,提出“各原则”,据称:“所得结果极好。”^②1938年12月,汪精卫等出逃,叛国投敌。日本当局即企图以扶持汪精卫为筹码,要挟重庆国民政府妥协。次年5月3日,胡鄂公与津田第四次会谈。津田探询重庆方面情形。胡称:汪精卫离开重庆后,情形更安定,汪精卫“离开全国民意”,不会成功。胡强调:国民政府是目前中日战争的当事者,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和全中国的领导者,建议先在私人间就几个基本纲领达成谅解,然后再在政府间进行直接谈判。胡提出基本纲领:1. 承认两国间的战争不合理;2. 恢复卢沟桥事件以前的状态;3. 发展两国合理的经济提携;4. 目前不采取防共协定的形式,而在精神上的一致。^③同年9月第六次会谈时,津田提出,希望国民政府与汪精卫合作,胡称:汪精卫已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被国民政府通缉,同时在道德上,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① 《孔令侃于香港转发胡鄂公报告电文》。

② 《胡鄂公致孔令侃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关于津田静枝与胡鄂公的会谈,可参阅伊藤武雄为铃江言一所著《孙文传》所作的跋,东京:岩波书店,551页,1977。

③ 《情字第396号电文》。《档案史料与研究》,1991年第1期。以下所引史料,除注明者外,均见该刊1991年第1、第2、第3及1992年第1各期。

日本政府以之为谈判对象，“非常失策”^①。至此，胡鄂公与津田静枝的会谈告一段落。

胡鄂公与船津辰一郎

1939年3月27日，胡鄂公在上海与前日本驻上海领事、上海日本纺织业会长船津辰一郎会晤。胡企图使船津放弃对汪精卫和吴佩孚的工作。胡的谈话大旨为：1. 汪之领导权已丧失，号召力消灭；吴佩孚决不做傀儡；2. 日本欲得真正和平，应以蒋及国民政府为对象。胡要求船津运动日本当局，先行举行中日私人谈判。28日，胡鄂公致电重庆，声称此项工作，“可以阻止汪、吴傀儡之运动复兴”。同时使“日本方面多一主张和平之说客”。胡并称：此项工作与津田方面并无抵触，可收“殊途同归之效”^②。

4月11日，胡鄂公与易敦白、彭希民约船津聚餐，双方辩论五个小时。其后，船津表示采纳胡鄂公的意见，将向日本军部提出建议。

胡鄂公与坂西利八郎

坂西利八郎曾任袁世凯顾问，长期在中国做特务工作。1939年10月5日，胡鄂公与坂西谈话，提出中日和平意见五条。6日，孔令侃复

① 《情字第1239号电文》。

② 《情字第28号电文》。

电胡鄂公,认为胡的意见非常“周详”,特别是第五条,由日本邀请美国以第三国立场参加保证一节,办法很好。孔要求胡鄂公以私人立场继续试探对方真意。^①此后,双方多次会商,胡鄂公始终坚持,必须邀请第三国参加保障,然后停战撤兵。^②谈判不了了之。

樊光与喜多诚一

樊光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与孔家关系密切。还在1938年春,樊光就曾与北平日本浪人山本荣治建立联系,为他去汉口向孔祥熙递送“中日和平意见书”。^③1939年3月下旬,樊光得到消息,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长、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中将将于4月10日南下,谈判和平。他向孔令侃请示。27日,孔令侃复电,指示以“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先由日皇下诏撤兵”为要旨。喜多要求面见孔祥熙,表示希望在汪精卫登台以前“得到办法”。为此,樊光曾赴重庆报告。同年9月22日,喜多应原上海电话局局长鲍观澄之邀到沪。会谈中,喜多重提蒋介石下野问题,受到樊光驳斥。樊光称:日方所提条件,不外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取消抗日三条。其中经济合作一条,如在平等互惠条件之下,可以商量;防共问题,现在德苏已成同盟,日苏关系亦已妥善,日本真有诚意与中国和平,共党一节不成问题。至于取消抗日问题,只要日本无侵华之举,华人又何所抗?当喜多询问有何办法实现中

① 《渝情字第733号电文稿》。

② 《情字第1349号电文》。

③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参见谭光:《我所知道的孔祥熙》,《孔祥熙其人其事》,5、6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日和平时,樊光称:“中日双方相持下去,日军必至有不能不溃退之一日,国必紊乱,难以收拾。若日皇下诏,撤兵言和,似过便宜日本,然孔院长则以为中日兄弟之邦,彼此牺牲均属可惜,故愿赞成此举,使日方亦能得利也。”^①对此,喜多表示,此事体大,非一人所能作主,容回北平后详细商量。

会后,鲍观澄对樊光言道,喜多不愿汪政权成立,造成既成事实,使和平多生枝节。如孔院长能与之秘密会晤,彼必出全力做成此事,汪政府即可消灭。24日,樊光将会谈情况报告重庆。10月11日,孔令侃复电称:“喜多谈话,全属空泛之词,仍以委坐下野为题,而无切实表示,自无诚意可言,显系试探性质。”孔令侃并批评樊光的答话“句句着实,诚如代表院座答复,而反示我方求和心切。万一为彼方灌音,收去留为话柄,如何是好”!孔令侃要樊光以后对外谈话时,多问少答,试探口气,在对方答话中寻觅线索。^②

樊光与今井武夫

1939年4月上旬,原大隈重信亲信、日本《报知新闻》记者、特务机关政务课长百武末义与樊光在上海会谈。百武称:因受平沼首相及参谋本部中国科长今井武夫委托,与国府联络和平,特由东京赶回。当时,报载平沼内阁已与汪精卫结约,樊光据此提出责问。百武称:平沼与汪敷衍则有之,但通过本人说明,已确知汪并无能力。今井并深知联汪拉吴,均已失败,言和只有向蒋及孔祥熙处觅取途径。百武并称:和

① 《情字第 1255 号电文》。

② 《渝情字第 1728 号电文稿》。

平沼首相多次畅谈,平沼表示,若能和平停战,撤兵自可办到。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及满洲国事,均可不提。这是空前宽松的条件,樊光表示怀疑,百武则“发誓愿负责”^①。

4月14日,百武再次会见樊光,称过去日本少壮派军人受汪精卫蛊惑,以为蒋完全受共产党包围,因此有不与蒋政权交涉的声明;现在唯一的条件是共党问题,接洽和谈时,“只须蒋先生或孔院长表明,与共产党无关态度”即可。百武并称:只要能让平沼看得出孔祥熙“真有意和平”,今井武夫及平沼代表即可来华。15日,樊光致电孔令侃称:“弟意现当汪正在勾敌时,总当设法使彼方对我言和者不失望。”^②22日电再称:“现汪精卫已上当,完全受日人摆布,傀儡登场,不可不速为设法破其奸谋也。”^③

日方一面积极扶植汪精卫登场,一面引诱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百武多次表示,只要平沼、今井确信已和国府取得联络,即刻放弃与汪精卫等人的联络活动。5月4日,今井自东京抵沪,要求与孔令侃在港见面。他对樊光表示:本人主张以蒋先生为对手商停战,以孔院长为对手商和平谈判。^④今井了解孔祥熙与萱野长知之间的关系,因此特别表示:“所言决负责任,非为一般浪人萱野等可以随便说话,毫无实际。如所不成,当出家当和尚。”

今井在上海坐等孔令侃消息,但重庆方面直到5月9日才有回音。11日,樊光约见今井,重庆中央银行秘书姚瑛同时出席。樊光声称:孔令侃公务冗繁,交通阻隔,到港恐来不及。他出示孔祥熙特别指示三

① 《情字第135号电文》。

② 《情字第208号电文》。

③ 《情字第230号电文》。

④ 《情字第332号电文》。

条:1. 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进行谈判;2. 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3. 由美国出面调停。^① 樊光并补充了三条意见:1. 此事由日方主动,当然应由日方提出确实办法;2. 须由日方政府作明显表示,予我诺言之保证;3. 停止一切分化运动,专诚向国府及蒋先生言和。今井对未能见到孔令侃感到不悦,于12日返日。

同年8月30日,阿部信行内阁成立,今井武夫调任驻华日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兼中国科长,邀请孔令侃到上海谈判。10月6日,百武末义对樊光称:“日政府仍望对重庆有办法,如中央确具诚意,能有相当负责代表密行接洽,决即放弃汪事。但如仍无确实办法,则日方于无办法中只好从汪方面进行活动。”^②此后,日方扶汪活动加紧。10月22日,樊光对今井武夫说:“君等既支持汪组织所谓新政权,似不必与我们再谈和平矣!”今井表示:汪为和平而出来,又商谈过很久,不能不予以支持。但汪并无“十二分把握”,因此,日方仍愿与重庆谈判。今井表示,希望重庆来一“负责大员”^③。

11月6日、7日,樊光与今井武夫连续两次会谈。今井提出,日华两军的停战交涉以蒋介石为对手,实现和平之后,汪蒋合作。^④其后,樊光声称赴重庆出席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离开上海;今井武夫则在香港找到了所谓“宋子良”的关系,开始“桐工作”。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16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② 《情字第1262号电文》。

③ 《情字第1321号电文》。

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7页。

胡鄂公等与和知鹰二

1940年初,日本军部部分人士逐渐感到依赖汪精卫不会结束对华战争,力图在国民政府内部另觅诱降对象。为此,日本华南特务长和知鹰二大佐奔走于香港、两广间,竭力拉拢李宗仁,结果失败。其后,和知便全力投入拉拢重庆方面的工作。^①

1940年2月,和知调任驻上海机关特务长,晋升少将。同月26日,和知与易敦白谈话,试探性地提出,如日本以蒋为对手谈判,而蒋又拒绝,如何?接着,又提出经济提携、反共及满洲三问题。易称:中国共产党已信奉三民主义,政府已不认共产党存在,至少已对其控制。又称:现在解决七七事变,满洲问题待将来别求合理解决。易并称:如果日本真能退出华北、华中、华南,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租界及内河航行特权,则中国“对满洲何尝无壮士断腕可能”^②!

3月22日,和知与易敦白第二次会晤。当时,汪精卫政权已预定于当月月底成立。和知要易敦白作出估量。易答称:汪精卫等寄食日人,等于消毒,抗战阵容更加彻底坚固,足以争取最后胜利。和知称:日本政府将在一二月内承认汪政权,届时以蒋为对手的谋和计划将无法进行。他询问易敦白:可否在二三月内“办出头绪”?又询问:中国政府最低条件如何?可否提出一具体原则?^③

会谈后,和知向板垣汇报。板垣时任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

① 《情字第1777号电文》。

② 《情字第1760号电文》。

③ 《情字第1741号电文》。

谋长,他认为与重庆方面谈判为时尚早。实际原因是,当时与“宋子良”的谈判正在中国南方进行。不久,“桐工作”停滞,板垣便催促和知继续与孔祥熙方面谈判。

4月初,和知与孔祥熙的亲信、院长官邸秘书处第六组负责人盛升颐在香港会晤。和知称:日本元老、重臣及军部一致要求停战,希望由孔祥熙与何应钦主持,开始正式谈判。^①当时,孔令侃企图利用与和知的谈判“侦查日本意向所在”^②。同年5月29日,易敦白向和知提出四个问题:1.日自动撤兵问题;2.东三省交还问题;3.美国参加和议及保证问题;4.汪逆引渡问题。易声称:“这也许是蒋先生的真面孔。”和知则列举蒋介石和日本人交往的事实,说明上述四条不一定是他的“真实面孔”。他以“中日两国共同建设亚洲大局”和“防共”等诱引蒋介石,声称:“中国要收回安南、缅甸,日本可以协助;要收回外蒙,亦可协助。”关于汪精卫,和知要求不咎既往,予以相当位置,否则,也不必重办。^③

这一时期,中方雍容自如,而日方则惶急无奈。6月8日,易敦白根据胡鄂公的指示,故意对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表示怀疑,同时表示,中国决心继续进行持久战,无意谈判。^④板垣为了表示“真意”,竟在第二天就亲书委任状,委任和知鹰二为全权代表,令人飞沪转达和知。

胡鄂公分析了和知的谈话后,认为“日方阳假和平之名,阴行政治进攻策略”。重庆方面也指示:“非俟其觉悟自动撤兵时,决不与彼谈判。”^⑤但是,谈判实际上仍在继续进行。6月15日,胡鄂公、易敦白、陶

① 《1251 与和知谈话记录》。

② 《情字第 2025 号电文》。

③ 同上。

④ 《×字第××××号电文》。

⑤ 《情字第 2053 号电文》。

菊隐与和知鹰二等在上海虹口会谈。其间,胡鄂公起草了《中日恢复和平之基本原则》七条,主要内容为:1. 中国为领土与主权独立而战,故亦愿为领土与主权独立而谋和。(1)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局面;(2)改善卢沟桥事变以前种种不安状态及不安适事件。2. 中国放弃恢复辽、吉、黑、热“九一八”以前原状的主张,日本放弃承认“满洲国”独立的主张,由中日合组处理满洲问题委员会,共同管理满洲,15年后由满洲人民投票自决,或仍属中国,或独立。3. 中日满同盟一事绝无考虑余地,但可商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或中日友好条约。4. 防共协定非中日当前急需,可商订文化协定。5. 基于平等互惠原则,谋两国之经济利益。6. 双方全权代表会晤后即签订停战协定,召开中日和平会议,合组善后委员会,办理日方撤兵中国接受事宜。7. 邀请第三国参加保证。19日,胡鄂公致电重庆,报告以上内容,同时声称:“设与日本谈判顺利,和平可以实现时,我中央对于共党红军似宜以发动内战、破坏统一抗战之罪名,而用最迅速之手段加以剿灭。”^①

6月19日,和知飞宁,向板垣汇报,当日返沪,约见易敦白,希望中方早日提出和平基本原则。20日,板垣电话通知和知,此后中日谈判决与胡鄂公接洽,过去日方所有接触关系概行停止。^②23日,板垣派其亲信秘书辻政信少佐赴沪,通过和知介绍,与孔祥熙派驻上海的秘密电台负责人沈养吾会谈。辻政信转达板垣的两条原则:1. 承认“满洲国”为日本最低限度要求,希望中国予以谅解,日本可在其他方面给予中国补偿或让步;2. 组织东亚联盟,中日两国平等、独立地互商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辻政信并要求携带板垣亲笔函件赴渝面见蒋介石,声称

^① 《情字第2073号电文》。

^② 《情特字第×号电文》。

“只要能将板垣心情达于委座，即被渝府枪决，本人决死而无怨。”^①同日，胡鄂公致电重庆，内称：板垣“确认委座为唯一之对象”，“除承认满洲及建立东亚联盟两原则外，其他均可让步，汪更不成问题。只要委座肯有表示，则彼可负责提出具体方案，彼已委和知为代表，希望渝府能派员出面，则谈判立可开始”。^②

当时，阿部信行之后的米内光政内阁又即将倒台，和知声称：日本内阁即将改组，希望在此前讨论胡鄂公所拟中日和平基本原则，并盼能在7月初讨论结束。如双方意见一致，板垣将在同月7日与谈判代表见面，然后回东京与日本政府作最后决定。^③

日本方面希望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板垣为了取得对华“和平工作”的领导权，声称9月底可以实现中日停战。但是，日方在有关策略上，又存在种种分歧。影佐热衷扶持汪政权，今井热衷通过“桐工作”实现重庆与南京的合流，和知则热衷于与重庆的直接谈判。板垣虽声称“对汪已看穿，对影佐已失望”，但实际上，对“桐工作”一直寄予希望。汪伪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也支持今井的合流方案，而和知鹰二则对今井的工作持怀疑态度。同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9月底，南京会议认定“桐工作”无望，决定将此事交东京办理。^④于是，对华“和平工作”便改归外相松冈洋右主持。

① 《情特字第×号电文》。

② 《×字第××××号电文》，1940年6月29日。

③ 《情字第2071号电文》。

④ 《何一之致孔祥熙密函》。

王子惠与板垣

在和知鹰二之外，板垣还曾通过王子惠、贾存德与孔祥熙建立联系。

宇垣、孔祥熙会谈流产后，孔祥熙命贾存德通过各种关系，继续议和活动。1939年夏，贾存德将这一任务交给伪南京维新政府实业部长王子惠，并于随后报告孔祥熙。孔同意这一安排，要王辞去部长职务，伺机去东京“团结主和派人物，抵制主战派”。1940年4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日本主和派闲院宫金子伯爵、头山满等人联络一起，并称军部及在华日军首脑板垣等人希望从速结束对华战争。5月间，王子惠送来板垣亲书的中日和谈五项条件草稿，主要内容为：共同防共、中日经济合作、取消汪精卫政权、休战、撤兵。王称：板垣急于与孔祥熙见面。6月26日，贾存德携带板垣草稿赴重庆向孔祥熙报告。孔祥熙同意板垣提出的条件。7月底，孔祥熙命贾和王子惠派来的蔡森共同起草报告，上报蒋介石。

同年8月，王子惠、贾存德、蔡森在上海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会谈。岩奇要求在察哈尔、绥远及平奉线等地驻兵，贾存德拒绝签字。会谈无结果而散。^①

^①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

胡鄂公与松本重治

松冈接任外相后,在香港找到了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浙江银行家钱新之,因此,在内阁大本营联席会议上夸下海口,保证10月底完成对华议和,实现蒋汪合作。他一面派特使赴香港,一面派原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赴上海。

1940年10月20日,胡鄂公在上海与松本重治、伊藤武雄、铃江言一等会谈。松本称:近卫第二次组阁之后,日本内部已经统一。中日问题,过去由军部主持,负责人为板垣;现在则系根据宪法,由松冈外相主持。日本亟愿在年内结束对华事变。22日,二人第二次会谈。松本提出,日本新发展方向为南洋。为实施南进政策并在北方对苏联有充分准备,必先解决对华事变。日方要求:1. 驻兵内外蒙一线,必要时驻兵沧州及石家庄等地;2. 华北煤矿之开采权;3. 日本驻兵各地,铁路与交通线之使用。胡鄂公则表示:中日如谋永久和平,日本必须放弃其优越感及特权要求,中国不能因对日本之和平而支持日本南进政策。关于满洲问题,松本提出,希望中国政府予以承认,或决定承认原则,留待将来实行。胡鄂公对此坚决拒绝。胡称:“此问题最好搁置不谈,因为承认满洲国一事,断非中国政府能考虑也。”松本又称:松冈正通过张群、钱永铭,使汪精卫与重庆重归于好,实现渝汪合作。如两个月内无所成就,则日本不能长此忍耐,必出于长期战争之一途;同时,日本将断然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松本并邀请胡鄂公赴东京,与近卫、松冈等相见。对此,胡鄂公表示:中国政府对于背叛民族与国家者,不能予以宽容。此为一国之纲纪问题,与外交无关。胡称,松冈外相既然与张群、钱永

铭等进行谈判,自己不愿多头进行。胡劝松本暂勿进行,俟其放弃或失败后,再进行未晚。^①

夏文运赴日与日本“和平工作”的末路

“桐工作”失败后,板垣企图继续利用和知对中国政府进行诱降,但和知不愿与板垣合作。日本政府决定进行“钱新之工作”后,军部决定派和知协助松冈,但和知认为汪蒋合流不会成功,在二人协商时,又认为松冈“蛮横”,“自以为是”,因而不愿合作。1940年10月,和知在香港会见胡鄂公,要求取得孔祥熙的书信,以此作为谋和成绩向军部邀功,遭到胡鄂公拒绝。^②

11月10日,和知偕夏文运赴日。夏是一个勾挂双方的人物,既为和知做中文翻译,又与孔祥熙通气。到日本后,首先会见日本政界元老秋山定辅。秋山提出,由陆相东条英机、海相及川古志郎、首相近卫、头山满及秋山五人组织小组委员会,由和知出面奔走,建议蒋介石指定负责人员,最好由孔祥熙组织同样委员会,交换意见。夏其后又会见浪人领袖头山满、参谋本部参谋总长杉山元、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等。杉山称:“取消汪伪及延期承认汪伪一事,系政府份内事,碍难容喙。然中日战争应速停止,此为日本军部所愿望,务期加速进行。”杉山表示,希望重庆派人到东京商量。东条则询问,何不带同重庆代表来日,若然,可打消汪伪承认,和平立可实现。东条称:今后如再无办法结束事变,军

^① 《胡鄂公与松本第二次谈话记录》。

^② 《佳 764 政电》。

部即希望与蒋介石议和。此事不会因承认汪政权而停止。^①

松冈主持的“钱新之工作”有过一定进展。11月21日,重庆方面要求日本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同时无条件全面撤兵。22日,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同意重庆条件。但是,28日的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又决定推翻日四相会议的决议,决定承认汪政权。

日本政府虽然承认了汪政权,但仍不愿放松对重庆的诱降。12月2日,日本当局致电和知,命其回东京,商量承认汪政权后的对策。3日,大本营任命和知为部附,并同意恢复其在华所设特务机关(兰机关)。^②

和知设想的条件是:1. 无条件撤兵,代以对外防御性质的中日军事协定;2. 满洲国问题暂缓,将来有条件地承认;3. 南进时可得中国协助;4. 经济合作,以平等互惠为原则;5. 中国在华南海岸予日本海军以便利。^③ 不过,这以后和知的工作并无多大进展。1941年3月,和知调任台湾军参谋长。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日,重庆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同日,和知电询中方对于中日问题的意见,胡鄂公答称:“中日谈判,若日方不悬崖勒马,此时实难进行,且视明年三、四月局势之发展,或有机会。”^④

和知的工作没有进展,津田静枝等人亦然。1942年6月,津田静枝、伊藤武雄、松本重治等在东京进行和平活动,因日本陆海军意见不一,无结果。同月底,津田邀请胡鄂公赴东京,与海军当局交换个人意见,表示可以备军舰迎送。胡答以正患病,不耐舟车之劳。^⑤ 同月下

① 《何一之致孔祥熙密函》。

② 《江 777 情电》。

③ 《何一之致孔祥熙密函》。

④ 《情字第 477 号电文》。

⑤ 《情字第 726 号》。

旬,和知在东京会见侍卫长官本庄繁,本庄称:在目前情形下,只要蒋先生对于日本任何要人有书面之表示,则中日问题即有解决办法。^①不过,这时,蒋介石已经与英、美联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对“和谈”兴趣不大了。

抗战期间,孔祥熙与日方进行的议和活动还有其他线索,不能一一列述。

孔祥熙主和的思想基础与策略目的

孔祥熙主和,有其思想原因,也有其策略目的。

1937年10月,孔祥熙自欧洲返回南京。11月,德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之托,向中国政府提出议和条件,孔祥熙力主接受。^②他在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后,仍经常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③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发出准备进攻武汉的命令。26日,长江要塞马当失陷,武汉形势日益危急。在7月2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孔祥熙力主与日方妥协。^④10月24日,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当日,王世杰在汪精卫处参加谈话会。日记云:“汪、孔均倾向于和平。”

可见,孔祥熙之主和,有其思想基础,他的议和活动和他的思想状况有其一致性,反映出在日军的锐利攻势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一

① 《情字第745号》。

② 《王世杰日记》,1938年10月5日。参阅同书1937年12月2日、27日。

③ 同上,1938年1月28日、2月20日。一直到1940年7月,王世杰仍认为孔祥熙是“悲观而气馁者”,参见同书1940年7月12日条。

④ 同上,1938年7月2日。

部分人对抗战信心的动摇。

孔祥熙不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1938年4月,他就任行政院长后不久,曾在致蒋介石密函中表示:“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另有政策。”又称:“以党治国,一切大计均须取决于党,听命领袖,而抗战时期,最重意志统一,政策一贯,尤不容个人随便发表主张,致涉分歧。”^①他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有些事,并曾向蒋汇报。因此,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做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蒋介石长期认为中国实力不如日本,与日本作战,中国必败。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终于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思想上的恐日症并未消除,因此,他采取的是一面作战、一面和谈的两手政策,根据不同形势,交互为用,以便进可以战,退可以和,左右逢源。孔祥熙曾说:“蒋先生向来的做法,是找一部分前进分子,找一部分落伍分子,听二派的意见,从中采取一点。”^②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和、战两派的利用,与此类似。

在对日策略上,孔祥熙与蒋介石之间有时也有分歧。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声明,对“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僵硬政策有所修改。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内主和势力增强。^③12月9日,王世杰等到重庆黄山官邸议事。蒋介石主张坚持抗战方针,但孔祥熙却表示和议亦当考虑,“并以敌人将由桂攻黔为可惧”^④。10月中旬,孔祥熙对合众社记者有一次谈话,被外人视为意在请罗斯福出来调停中日战争,引起蒋介石不满。27日,蒋介石在赴南岳召集将领会议之前,

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② 《冯玉祥日记》,5,405。

③ 参阅《王世杰日记》,1938年12月1日:“杭立武为余言,近日国民党内倾向于和议者渐多。”

④ 同上,1938年12月9日。

约孔祥熙与王宠惠谈话，“嘱勿向美国表示盼其出面调停之意”。^① 孔、王都是主和派，受了批评之后，先后向蒋要求辞职，蒋一度考虑过，接受孔的要求。^② 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不过，将孔祥熙和蒋介石的议和活动完全视为信心不足也未必妥当。

1938年，贾存德与萱野长知谈判期间，曾致电孔令侃下属情报组负责人王梁甫表示：这种谈判可以“藉机探讨日本真相”^③。王梁甫在向孔令侃汇报时则称：“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及反战之势力。”^④后来，胡鄂公也说：谈判可以“促成日本和平派势力成立，俾与主战派对立”，同时可以“破坏日本组织统一伪政(府)企图”，并可以“利用中日在野名流私人和平谈判”，团结“国内在野人物”，“争取中国荣誉和平，以达到最后胜利，复兴中国目的”。^⑤ 应该承认，上述云云，证以胡在谈判中的言论，并非全是虚语。

本文为提交1995年在纽约、台北等地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原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日文译本刊载于《东アジア共生への道》，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出版部，1997。

① 参阅《王世杰日记》，1938年10月19、28日。

② 同上，1938年11月18日。

③ 《贾存德阳电》，1938年4月7日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王梁甫致孔令侃函》，1938年5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⑤ 《孔令侃于香港转发胡鄂公报告电文》。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一

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期间最诡异的事件。这不仅表现在中日双方,而且也表现在中国内部。一方面,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是,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不将这些情况研究清楚,就无法真正了解谈判全局,也无法了解蒋介石的真实对日意图。

精心指导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在蒋介石亲自掌控的谈判中,蒋介石最重视,并且用心指导的是1938年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萧振瀛(1886—1947),字仙阁,号彦超,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长。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总参议。1935年任天津市市长。次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其间,曾多次与日军驻华北将领多田骏等人谈判。1937年抗战爆发,萧振瀛任第一战区长官部总参议。1938年7月下旬或8月初,日本军部特务、“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到达香港,萧振瀛与和知是“旧友”,因此受命与和知谈判。谈判中,和知提出总原则六条,其中有诱饵,也有新的侵略要求:1. 停战协定成立之时,两国政府正式命令,停止一切陆、海、空军军事敌对行动,中国政府以新的姿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况。2. 日本政府绝对尊重

中国主权领土、行政之完整。3. 两国军事完全恢复战前原有状况后,以平等互助为原则,商订经济协定,以谋东亚经济的全面合作。4. 两国谋国防上之联系,在共同防止共产主义目标下,商订军事协定。5. 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6. 两国在此次事变中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和知提出的《经济协定基本原则》共四条:1. 本平等互助原则,尽先欢迎日本投资,如日本财力不逮,可向欧、美各国商借资本;2. 资源与市场之紧密调整与提携;3. 两国互惠关税之协定;4. 战后复兴之合作。其《军事协定基本原则》共三条:1. 中日两国共同防卫,共同作战;2. 平时训练,得聘请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官,向日方订购及补充器材;3. 国防之联系。军事内容与情报之交换。^①

当时,日军正节节向武汉逼进,和知“求和”,使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主和”派觉得是个机会,但蒋介石对此却不抱希望。8月26日,蒋介石听说和知将到汉口活动,便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②9月23日,蒋介石返回汉口,主持汇报会议,决定对策。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会议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谋停战。至于军事协定,应绝对拒绝之。”^③此前,国民政府一直要求,在与日本谈判时必须有第

① 《对方特提稿》,1938年10月,“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以下简称“蒋档”。

② 《困勉记》,稿本,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均同。

③ 同上。

三国保证,但是,就在几天前,英、法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捷克主权以绥靖纳粹德国。因此,汇报会议决定,可直接与日方谈判。9月26日,蒋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有对日交涉经验的雷嗣尚到港,加强谈判力量。

9月27日,萧振瀛、雷嗣尚与和知鹰二第一次会谈,首先告以军事协定不能签订。和知答称,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均在恢复七七以前原状后再办。事后,萧电蒋报告。蒋复电指示:“1. 与对方谈话,切不可稍有一点增减,必须依照所面述之范围,万不可有所出入。2. 不可抱有成就之望,要知我方全处被动地位,迁就不但无益,必受大害。如主动方面有诚意,我方不迁就,亦能成就也。3. 每日在途中住宿地,能通长途电话时,请通电话一次,以便随时接洽,恐逐日局势有变化,俾可随时洽商也。4. 对于无商量余地之事,如彼方再三试探,必须坚强拒绝,以我方本不望有所成就,而所欲望成者,实在对方也。此意须特别认识,并知我国至此,实毫无其他希望,只有死中求生之一途也。5. 一切言语态度,须十分稳重从容,万不可带有急忙之色。缓急先后,皆由其便。我方必须以无所为〔谓〕之态度处之,更不必要求其必答,有所期待也。须知我方除此之外,并无再可商洽之事,即以此为最后之办法也。6. 所写具体各件,切不可书面明示彼方,且须对彼言明,无具体成文之件携来,一切皆以口头商洽,作为临时相商之事可也。”^①

当日午后,萧振瀛等与和知第二次会谈。萧等向和知说明:1. 中国方面,自孙总理至蒋委员长,对于日本之强盛,均有深刻之认识与敬意,企求自存、共存,与日本共定东亚大计。日方苟有和平诚意,中国必以诚意应之。2. 日方尝强调东亚主义,以“东亚之事,东亚之人自了之”为

^① 《无题》,见“蒋档”,但据“国史馆”所藏《(蒋中正)事略稿本》1938年9月27日条,该文系蒋介石复萧振瀛“感辰电”的后一部分。

内容,中国亦甚同情,但因弱国恐受强国欺凌之故,始终不愿直接交涉,必须有第三国介入并保证,方能重建和平,但如日方确有诚意,尊重中国行政、主权及领土之完整,则中国自当以最大诚意,与日方直接谈判,不要第三国介入。此事如能实现,即东亚主义之大成功,即日方之大胜利、大收获,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3. 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4. 如果军事停止,一切恢复七七前状态后,中日两国诚意展开两国、两民族之全面合作,将来定可做到经济合作、外交一致。5. 中国自十六年清党以来,即站在坚决剿共立场,日方必有正确认识,共产主义断乎与中国国情不能相容。中国国内之防共,中国自能为之。6. 日方尊重中国行政、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中国内政绝不干涉。中国人最恨者,为日、鲜浪人之贩毒,认为是灭种政策,必须切实取缔;中国最疑畏者,为日方所设在华特务机关,认为是亡国政策,必须加以取消。7. 中国不骗人,做敌彻底,做友也彻底,将来必做到中国人爱日本如爱中国,同时日本人爱中国亦应如爱日本。8. 如果日方能以强国大国风度,照此做去,不问国际形势如何演变,即在日本极不利之环境下,中国亦必以最大诚意直接谈判,重建和平。^①

和知认为萧振瀛的谈话在原则上、精神上与日方认识相同,双方取得初步结论:1. 停战协定中不涉及军事协定字样。2. 俟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后即订经济协定。3. 对中方提出的不订军事协定问题,和知本人认为可以商量,但恐东京方面坚持,故对此点表示保留。4. 和知同意,由日本先发和平宣言,中方以和平宣言响应,即停止进攻若干日,作为双方正式代表签订停战协定的时间,其签订地点可在香港。5. 双方和平宣言须以电报事前商定原稿,方得发表。6. 和知定 28 日晚回东

^① 《此次谈判经过》,1938年9月30日,“蒋档”。

京,作最后决定,于10月10日前电告,和知本人随后即来香港。7.和知离港后请雷嗣尚飞汉,面陈详情。^①

同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要求向对方坚决表示:“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不仅军事协定之字样不得涉及于停战协定之中,即经济协定,在原状未复以前,亦不能商谈。”关于“经济协定”,电称:“兄等携来经济协定之原稿,无异亡国条件,更无讨论余地。”关于“停战协定”,电称:“只可订明停战之时间、地点与日本撤兵及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之手续与月日,此外不能附有任何其他事项。”关于“停战日期”,电称:“停战之日,即为停战协定同时发表之日,决不可以停止进攻若干日为签订协定之时间。换言之,中国于停战协定未签订之前,绝不愿停战。”蒋介石并要萧振瀛郑重声明:“原状未复,且未有以平等待我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能再提军事协定,且绝无保留之余地,否则请明告对方,无从再约续谈也。”^②萧振瀛收到蒋的电报后,于当日与和知进行第四、第五次会谈,反复讨论,和知表示愿作让步:1.对停战协定中不出现军事、经济协定字样一条,认为可以商量。2.对中方要求日方以事实表示诚意,非恢复七七前原状后,不商谈任何协定一条,表示“颇谅解”。但是,和知也表示,关于将来中日合作的具体内容,事前须取得一种“无文字的谅解”,“否则,日方无以自圆其立场”。证明中方“毫无诚意,日本断难相信”。^③28日晚12时,和知离港回国,行前向萧振瀛透露:日方此举的国际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其次要原因则为

^① 《萧仙阁(振瀛)感亥电》,见《困勉记》,1938年9月28日。

^② 《9月28日复萧仙阁电》,“蒋档”。据《困勉记》1938年9月28日记载,知此电为蒋介石所发。

^③ 《萧仙阁艳辰电》,1938年9月29日,收“蒋档”;又见《困勉记》。

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和知称: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虽有远识,但日本朝野各方,尚无普遍认识。此次回东京,遭遇困难必多,将拼死努力,于10月10日前以日方最后态度相告。^①

9月29日,萧振瀛致电蒋介石,报告28日与和知会谈情况,声称前后谈话,均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为唯一前提,与蒋的指示并无出入。在转述和知临行前密告的日方谋和原因后,萧称:和知此次奉近卫、板垣、多田之密令而来,态度确甚诚恳、坦白,条件亦较以前多次提出者为合理。最近东京将举行重要会议,决定武汉会战之后的对策,但日方亦有主张“硬干到底”者,南京伪组织、北平伪组织又多方破坏和局,故前途定多周折。^②他要蒋介石表态,“若双方意见,距离尚不甚远,而和知再度来港,我方应如何应付,应请预筹”^③。

萧振瀛与和知在香港的谈判以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前提,符合蒋介石的要求,谈判也似乎进展顺利,蒋介石甚至开始研究和谈成功时的停战、撤兵要点。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甲、分区交代。乙、交接与冲突时之地方治安维持办法。丙、交接时防制(止)误会。丁、预防察绥与冀东及伪组织之处置。”又云:“停战、撤兵后,先订不侵犯条约,后商互助协定。”^④10月2日,蒋介石从孔祥熙处读到香港情报一件,其中谈到日人百武末义回国活动中日议和情形,百武希望了解,如果日本发表和平声明,中国是否能够发表声明响应。蒋介石当即电询孔祥熙,“其言是否可信”。他指示:“总要前途先拟整个确实办法,

① 《此次谈判经过》,“蒋档”。

② 《萧仙阁艳辰电》,“蒋档”。

③ 《此次谈判经过》,“蒋档”;《事略稿本》,未刊,1938年9月30日。

④ 《困勉记》。

再谈双方宣言也。”^①此后，中国方面即开始草拟《和平宣言》。

中方草拟的《和平宣言》称：

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内求自存，外求共存，此为国立国唯一之政策，亦为世界各友邦所深信，况与日本为同文同种之国家，诚能共存共荣，何忍相仇相杀！苟日本能以诚意相与，中国亦以诚意应之。倘使能以此次战争之终结为枢纽，一扫荆棘，开拓坦途，共奠东亚永久之和平，是不仅为中日两大民族之幸，亦为世界全人类和平之福也。

蒋介石特别在“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一句下以红笔加写了一段话：“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盖始终以和平为主，认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②中方也草拟了《停战协定》草案等有关文件。《停战协定》草案共五条：1. 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2. 日本政府绝对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 两国政府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亲善与谅解，取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言论行动。4. 两国在此次事变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以互不赔偿为原则。5. 本协定自发布之日起发生效力。草案提出：

① 《事略稿本》。

② 《中国宣言原文》，“蒋档”。

该协定可在福州或九龙签字,在中国方面发表《和平宣言》后一日公布。日军撤兵分三个时期,每期一个月,至第三期时,日军完全撤出黄河以北及黄河、长江以南,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考虑到清末庚子条约规定外国军队在平津一带有驻兵权,蒋介石特别以红笔加添了一句:“日本在平、津一带之驻军人数务须与庚子条约相符,勿多驻兵。”^①关于当时存在于华北、华中的两个伪政权,草案提出:1. 自停战协定签订之日起两星期内,南北两伪组织即行取消。2. 国民政府对于伪组织之参加者,宽大处理,但绝不能有任何条件。关于中日两国合作问题,中方提出:“必须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后,方能商订协定,事前只能交换意见,成立精神上的无文字的谅解。”关于《经济协定》,草案提出:“绝对以平等互惠为原则”,日方“所提原则,尚须修改”,“将来举行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在此,蒋介石以红笔批示:“此时绝对不得商讨内容与具体办法。”^②关于《军事协定》,草案提出:“在恢复原状后,可先商订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批示称:“此可研究。”^③关于“满洲国”问题,草案拟订了“相机应付”的三条谈判意见:1. 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2. 中国承认东北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3. 暂仍保留。蒋介石在第三条后加了一句:“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④

10月8日,雷嗣尚到汉口向蒋介石请训,蒋当面指示:1. 对方如确

① 《停战协定原文》,“蒋档”。

② 《关于将来双方合作之谅解部分》,“蒋档”。

③ 《关于军事协定者》,“蒋档”。

④ 《关于满洲国问题之考虑》,“蒋档”。

有诚意,应在10月18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2.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害怕汉口失守,尽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3.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但对方如不质询此点,我方自不必自动说明。4.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5.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6.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① 蒋特别强调:“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凡将来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处束缚”;“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②

和知于9月28日离港返回日本后,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回国后向近卫、多田、板垣等人汇报,都认为蒋介石“有诚意”,愿意放弃此前历次宣言,以诚意商谈。日方并经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甲、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乙、中国政府之调整;丙、伪组织之收容;丁、满洲国之承认;戊、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己、日、华、满经济提携;庚、战费互不赔偿。这七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和知深知这些条件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接受,因此有意作了“弱化”,其“解释”是:甲、如中国政府自动实行反共,则可秘密约定。所谓驻兵,指将来在内外蒙边防,双方作军事布置之意。乙、所谓“中国政府之调整”,指“酌令接近

^① 《面训要点》,1938年10月8日。参见《事略稿本》同日条。

^② 上述指示,无题,且时间不明。“蒋档”整理者置于《10月14日电萧》之后,但其中有“以十八日为限期,防其缓兵”之句,可知必与《面训要点》同时。

日本之人员参加,以便促进中日两国亲善之关系”。丙、所谓“伪组织之收容”指对其主要人物酌予安置。丁、满洲国问题暂可不谈,待合作三二年后再商解决。己、日、华、满经济提携,满字可不涉及,军事协定亦可不再订。和知称:前次所谈原则,只有军、参两部最高首脑同意,此次则已取得内阁全体之同意。表面虽近烦苛,实际已经让步。如防共问题,倘使中国自有办法,则协定之有无,仍可从长商讨。又称:自天皇以下对于此事均盼速决,只须双方诚意努力,当可顺利解决。关于日军当时仍在向华南进兵问题,和知解释,此系以前预定计划。如和谈有眉目,即可停止。和知并表示,可致电日本军部,通知前方,对于夜间飞机,不加袭击,以便代表在香港、汉口之间往来。对于和知提出的上述条件,萧振瀛称:“超出前谈范围,不能答复。”17日夜,萧振瀛致电何应钦,请示“究应如何”^①。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甲、乙、丙、丁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戊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己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何应钦提醒萧振瀛:“须知侵粤以后,内外情势大异,不容有从容商酌余暇也。”^②该电在当时的谈判文件中被称为“巧未电”。

^① 萧振瀛:《致汉口何部长》,“蒋档”。

^② 何应钦10月18日电,“蒋档”。此电无题,未署名。据内容考证,知为何致萧振瀛电。

何应钦发出“巧未电”后，又迅速发出“巧酉电”，补充说明：关于日方所提甲项，历年以来，委员长及中央所发宣言一再声明，除三民主义外，不容有共产主义存在，此为我方坚决立场。如对方不提甲、乙、丙、丁四项，则将来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在内外蒙边境军事布置一层“或可情商”。电称：“若对方果有诚意，弟可向委座恳切进言，但不能作为军事协作或防共之谅解事项。又互不侵犯协定，我方愿在恢复事变前之原状后，即行商订，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①不过，“巧酉电”发出后，何应钦觉得其中有不妥之处，又于19日发电纠正：“该电末句‘然后再商经济协定也’，应改为‘再商经济合作也’。”当时，中方《和平宣言》已经起草完毕。何应钦在电中特别指示：“在日方宣言稿未提出之前，不可先将我方宣言稿示之。”^②该电称为“皓卯”电。发出此电后，何应钦仍不放心，又于同日发出“皓午电”，电称：

密。奉谕：昨日各电，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③

两日之内，连发四电，可见何应钦的重视。“巧酉电”中，何应钦在“或可情商”四字后，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改”；在“恳切进言”四字后，何应钦加注说明“系遵电话谕所增”；本电一开始就是“奉谕”二字，这些地方都说明，上述各电，反映的都是蒋介石的主张。

① 何应钦：《致九龙森麻宾道18号萧彦超》，“蒋档”。

② 同上。

③ 同上。

10月19日,萧振瀛和回汉请示又于18日赶回香港的雷嗣尚继续与和知谈判。在长谈7小时之后,双方在六个方面取得“大体接近”的意见。1. 双方《和平宣言》原稿,须互相同意,宣言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再发表,作为协定之解释而发。2. 《停战协定》内容只载以下三项:(1)规定停战日期及地点。(2)日本尊重中国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3)在恢复战前和平状态后^①,中国政府诚意与日本谋两国间之全面的^②亲善合作。3. 日军撤退问题,中方要求规定撤退期限,和知表示,日本天皇诏令班师,约需一年方能撤完。4. 经济合作问题:(1)以绝对平等互惠为原则;(2)在恢复战前和平常原状后召集中日经济会议,决定具体内容。5. 满洲国问题,保留二年,中国再考虑日方所关心之满洲问题,诚意谋合理解决。6. 双方因战争所发生之一切损失,互不赔偿。^③

萧振瀛在电报中称:上述六点,“均接近我方腹案”。此外尚有三点,和知极端为难,研究费时甚久,即:1. 和知欲将撤兵及其将来谅解留交正式代表团谈判,我方则坚持须先商定一切内容,方能成立停战协定。此点经讨论,和知表示同意。2. 关于防共军事协定及驻兵问题,萧等恐其别有打算,坚请说明具体办法。和知称,防共可不要协定,只要中国自行铲共,问题即可解决。所谓军事协作及驻兵问题,系指内外蒙一带之军事共同布置而言。对此,萧等表示:1. 中国自行清共,日方不必提及。2. 在恢复战前和平常原状后,内外蒙边军事共同布置可商,但其他区域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④ 萧称:此点和知已电东京请示,尚未得复。3. 关于收容伪组织,和知闪烁其词,若有难言之隐。萧等称:取

① 萧振瀛原注:“原为‘恢复七七前原状后’,和支〔知〕坚请改如上文。”

② “全面的”,萧振瀛原注:“三字亦和支〔知〕所加。”

③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1938年10月21日,“蒋档”。

④ 萧振瀛原注:“以上表示,系遵巧西电训。”

消南北伪组织，系和议一切前提，否则，恢复原状一语，毫无意义，且此问题，前已完全解决，此次应不再谈，否则，无从再谈和议。对此，和知及参与谈判的何以之均称：土肥原一派仍支撑伪组织，王揖堂、梁鸿志听说和知赴港，已聚集沪上，问题趋于复杂化，须去电请示，得复后尚须再听取北平、上海两地意见，方能定案。萧等遂声明：1. 南北两伪组织及战区内一切伪组织，必须即刻取消；2. 中国方面可表示，凡参加战区维持治安者，一律宽大处置。和知最后表示，个人同意，仍须电东京请示。^①

蒋介石在收到萧振瀛与和知 19 日的长谈资料后，立即研究并以红蓝铅笔作了修改。其一，在“大体接近”的第三条上以红笔眉批：1. 撤兵日期必须在停战协定详细载明；2. 必须载明恢复七七前原状；3. 此“全面的”三字不能加入。其二，在“为难”问题的第二条上以蓝笔眉批：“必须先撤兵，恢复七七原状，然后再商驻兵问题。内外蒙交界之线最多以张北、沽源与大青山以北之线，对于兴和、陶林、武川、固阳、安北，必须驻扎华军。”其三，在萧等坚决表示的第二点“其他区域”四字下，以红笔加了问号，在“必须完全恢复战前原状”句上以红笔眉批：“区域二字，应改为事项，否则对方将解释为察、绥二省全境矣。”^②以上情况表明，为了换取日方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即行撤兵，蒋介石考虑过，同意日军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的要求。

10 月 21 日清晨，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行前，与萧振瀛密谈，声称因防共军事协定、驻兵及伪组织问题，颇形烦难。上海方面，梗阻尤大。土肥原曾来电，请其返沪，故决定先回东京，向中央部陈述，拟在 10 月

^①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参见《限即刻到汉口何部长》，1938 年 10 月 21 日。均见“蒋档”。

^②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

25日以定案电告中方。萧振瀛称：如和局可成，必须在10月30日前完成手续，11月10日前在福州签订停战协定，否则即作罢论，不再续谈。^①同时约定，由和知通知日军，自23日至27日午后九时至午前三时之间，停止攻击香港至汉口的夜间航班，以便往来。关于中方全权代表，和知要求由何应钦出任；日方全权代表，何以之暗示，土肥原偏见颇深，以多田骏代替土肥原最佳。^②

萧振瀛在写给蒋介石、何应钦的报告中称：和知态度，确甚恳挚，一切问题，有研究而少争执；但是，日方动员60个师团，耗财百亿，死伤数十万，必须求得代价，方能自圆立场，因此，我方“惟有善用内外形势，示以不可克服之力量，又饵以将来可以合作之诚意，似可就我范围，实现和局”^③。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有某种乐观，蒋介石却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研究和议的弊害，认为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从遵令；三是英美不悦。蒋介石称之为“皆应注意”的“三害”。^④10月3日，蒋介石研究和议之“险点”，日记云：“一、敌已设支那院与特务总监，岂肯轻易放弃？二、停战后敌在华北部队如迟延不撤，则应如何？三、在上海与察、绥部队如不撤，则应如何？四、我对内如何宣言？五、对死伤军民如何抚慰？此皆应俟孔祥熙得和知具体办法时决定之。”^⑤5日日记云：“敌既欲求

① 《萧仙阁皓亥电》，1938年10月19日；《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蒋档”。《经过》在“11月10日前签订停战协定”句下有萧振瀛原注：“上约时期，因事实需要，故与巧酉电训，略有出入。”

②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1938年10月21日，“蒋档”。

③ 《和知第二次到港会谈经过》，蒋档。

④ 《困勉记》。

⑤ 同上。

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小鬼可鄙,惯施其伎俩。余惟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①7日日记云:“注意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故应确定其限期,不可拖延时日。”“至于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绝对拒绝。”^②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应为大亚湾——笔者)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日记云:“倭既在粤登陆,无论英国对倭是否妥协,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其威胁作用失效,卒致欲罢不能,更勿以国际外交而影响我作战方针。余三年前早有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汉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十五日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促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③此前,蒋介石早有利用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日一切问题的打算,日军侵粤,战区扩大,不仅让蒋看到了日军陷入被动,会出现更多的“灭寇良机”,而且让他感到,英国与日本妥协的可能将会减少,召开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共同对付日本希望已经大为增加。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④他随即决定将前此准备的“谅解”方案作废。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正在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0月21日日记云:“敌方答复延缓,并无诚意之表示,余当考虑发表宣言以示决绝。语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非下此决心,无以救国。”^⑤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

① 《困勉记》。

② 《事略稿本》,参见《困勉记》。

③ 《事略稿本》。

④ 《10月14日电萧》,“蒋档”。

⑤ 《事略稿本》。

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和知鹰二返日密商后,旋即来华,10月25日到达上海,立即致电萧振瀛,盼何应钦急赴福州,同时声称将派人携函赴港,28日可到。萧振瀛认为“和局当已有望”,于26日致电何应钦及蒋介石,声称待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即询明详情,如与在港所谈没有大出入,即请和知到福州商定,同时请何应钦前往。电称:“何部长应即准备,待电即行。”^①29日,和知所派之人到港,声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方“争持甚烈”,正在上海会谈。如果难以作出决定,和知仍拟返回东京,请“最高干部”决定。^②同日,萧振瀛致电孔祥熙,报告上述消息,声称此外各问题,仍与在港所定腹案大体无出入,统由雷嗣尚带到重庆进呈。^③

前文已经指出,蒋介石对和知的活动本不抱希望。10月27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同盟社宣传电及板垣征四郎于26日、27日两日先后发表的好战谈话,认为“敌寇野心并未减杀,而且有缓兵与诱惑之狡计”,决定发表早就在草拟中的《告全国国民书》,以示决心。^④28日,蒋介石又接到重庆行营主任张群来电,认为日本外相宇垣辞职,求和空气已淡,必须我方持久抗战,使敌益感疲乏之后,由英美联合,形成国际中心力量,着手调停,才能实现“差强人意之和平”。他说:“抗战至现阶段,决无抛弃立场、根本改变国策之理。”^⑤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⑥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

① 《致长沙何部长》,1938年10月26日,“蒋档”。

② 《院长钧鉴》,1938年10月28日,“蒋档”。

③ 同上。

④ 《困勉记》。

⑤ 同上。

⑥ 《事略稿本》。

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①31日，蒋介石在南岳致电张群，要他立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不可再缓。日记云：“余之告书今日发表，敌必又受一不测之打击，使其以后之威胁失效，更使其进退维谷也。”^②同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称：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

文末，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③。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很满意。11月1日日记云：“《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文章，必使国民感悟持久抗战之意义，且使

① 《事略稿本》。

② 《困勉记》。

③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305～306页。

敌国知所畏惧。”^①大概当时主和派对发表此文有意见,12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②

萧振瀛与和知的谈判因蒋介石的刹车而中止,但日方对这一线索仍存有期待。1938年12月,汪精卫自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加紧与日方勾结,日本对华政工人员中出现两派。一派将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一派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1939年3月,何以之及和知鹰二相继抵港。12日,何以之致电在重庆的萧振瀛:日方正在实行“拥汪倒蒋”毒谋,为国家大局,“在内必先除汪,在外必多联美”。土肥原与和知二人均以“收拾时局自负”,希望萧到港一谈。^③萧振瀛在香港的孙、施两位助手也向萧报告,认为土肥原与和知“与联汪派主张不同,暗斗甚烈,实为我方利用、以敌制敌之良好机会”。报告称:“此时如能利用土、和,继成前议,固属圆满,即难完成,至少可以牵制联汪政策不能决定,亦于我有利而无害。”孙、施二人要求萧振瀛将有关函电密呈蒋介石,从长考虑。同时建议萧本人速来香港一谈,“在国际情形好转之下,奸党勾结未成之前”,找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新途径”。^④萧振瀛接获上述电报后,于13日致函蒋介石称:“伏查汪日关系,乃由日本军部影佐等从中斡旋,不仅土肥原等极为愤慨,皆抱收功在我之愿,板垣近于议会中亦郑重声明,汪既不能号召国内,而与日本尤无历史关系,欲求中日永久之合作,绝非汪辈之所能为力者,言外之意,当系仍欲与钧座间取得谅解。”萧向蒋请示:“对方既极端欲赓续前议进行,和知又将来港,究应如

① 《困勉记》。

② 《事略稿本》。

③ 《仙阁兄授密》,“蒋档”。

④ 栋(孙维栋)、驥(施驥生):《中央银行速转萧总参议》,“蒋档”。

何应付之处,恭请鉴核示遵。”^①对萧振瀛此函,蒋介石未作答复。1939年9月,和知鹰二通过其助手转告萧振瀛,汪精卫将于本年11月在南京成立政府,要求萧来港重开谈判,在汪组府之前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阻碍汪的计划实现。10月6日,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谈判。10月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②这是蒋阻遏与日方和谈的最严厉的一次指示。^③至此,萧振瀛与和知鹰二的关系遂告结束。

面对特殊的日方代表

在秘密谈判中,日本方面出面者大多系军部或政府人员,但是,也有个别谈判,其出面者系“民间人士”。例如萱野长知与小川平吉。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小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④

1938年7月,萱野长知首次到港活动,其谈判对手为孔祥熙系统的贾存德与被孔派到香港的马伯援。同年10月初,萱野再次到港,近

① 萧振瀛:《委座钧鉴》,“蒋档”。

② 蒋介石:《致孔院长》,《革命文献》,未刊。台北“国史馆”藏。

③ 详情见本书另文《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④ 参见本书另文《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

卫首相及头山满均派人到港协助，其谈判对手改为军统局在香港的工作人员郑东山。萱野向郑表示：1. 目前形势甚迫，但日本政府及人民均不愿战，军部方面，仅少壮军人主战，高级将领则不尽然。如双方能开诚相见，仍不难觅取和平办法。2. 宇垣外相去职后，萱野曾向近卫首相请示，和平谈判应否进行，嗣接近卫复电，声称方针不变，仍照前约进行，政府当负全责。谈话中，萱野并以近卫原电相示。和萱野同时来港的外务省政务次官松本忠雄则称：萱野年高德重，中国各院院长均为其友辈，必须派能代表中央，并与彼有交谊之大员，如孔祥熙、张群、居正等前来谈判，且须军统局郑介民陪同。经郑东山解释，萱野同意由郑介民来港商谈。10月15日，戴笠向蒋介石请示：“兹事关系重大，该员所请先派郑介民秘密赴港试与商谈一节，是否可行，理合转呈鉴核。”^①蒋介石没有批准郑介民赴港，戴笠遂决定由杜石山与日方联系。杜石山，亦作杜石珊，广东兴宁人，早年留学日本，为士官生，娶一日女为妾。民国初年曾出任统领，后长期居住香港。抗战爆发后经曾政忠^②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杜石山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由戴笠领导，目的在收集情报，因此，与日方交谈中的许多言辞均虚假不实。但是，戴笠曾多次书面向蒋介石汇报，因此，我们可以从留存档案中窥知谈判的真实情况。

据萱野向杜石山称，近卫首相曾屡次致电萱野催促，萱野则仍坚持要求郑介民迅速到港。他说：“中日事件，如久延不决，于日本固有重大祸害，而中国之不利，则尤甚于日本。”“现日本当局，灼见及此，深愿和平解决。其整个决策，为积极求和，不得则继续军事行动，并从事第二

^① 《戴笠呈》，1938年10月15日。

^② 曾政忠，广东台山人，美裔华侨，先后肄业于岭南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1938年10月加入军统。1940年曾冒充宋子良与日方谈判。

伪中央政府之产生。中国似应趁机派员来港接洽,以无条件、无理由之和平解决。”^①其后,萱野又直接打电话给杜石山^②,声称拟与郑介民先生进行之事,已与近卫首相、头山满、宇垣大将、有田外相、荒木大将等疏通妥当,近卫并已奏准天皇,定期停战,请迅速督促郑介民来港晤商。12月9日,戴笠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蒋仍无批示。1939年1月6日,萱野回日活动。

蒋介石不能长期不理萱野长知这样和中国革命有过密切关系的日本友人。1939年3月4日,蒋介石致电杜石山称:“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③杜石山收到此电后,即电邀萱野返港。3月10日,萱野返港,告诉杜石山,他回日后遍访朝野要人,新上任的平沼首相、有田外相都了解蒋的“伟大”,头山满准备亲自来华与蒋会晤。中日之间应当“平等言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和平的基本原则为:甲、中日两国同时发表和平宣言;乙、由中日两国政府各派遣大员会议于约定地点,议明逐步退兵、接防之日期。丙、至于防共与经济提携问题,重在实事求是,以便互相遵守,而奠中日共存共荣之大计。^④12日,萱野提出,双方政府代表可在军舰上见面。^⑤3月16日,宋美龄到港指导谈判。17日,萱野、柳云龙、杜石山商讨条件,最初为九条,后经修改,定为七条:1. 平等互让。2. 领土(完

① 戴笠《报告》,1938年12月9日,“蒋档”。

② 同上。

③ 《小川平吉文书》,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抄件。

④ 《戴笠呈》,1939年3月20日,“蒋档”。

⑤ 《萱野长知电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2页,日本みすず书房,1973。

整)主权(独立)。3. 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4. 撤兵。5. 防共协定。6. 经济提携。7. 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关于满洲,另议协定。^① 宋美龄对七条、九条都有意见,批评说:“此种条件,何能提出于国防会议耶!如能办到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当时时记住。蒋先生可以提出国防会议者,即可成功。”^② 18日,杜石山等将七条电告蒋介石。^③ 杜在电文中劝蒋在汪精卫“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作出决定。^④ 19日,蒋复电命继续进行,同时称:“得‘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删。”^⑤ 关于“防共协定”,宋美龄及蒋介石都表示,可以密约办理。

3月29日,小川平吉到港参加谈判,行前致函萱野,说明此行得到首相平沼、外相有田、陆相板垣及近卫、头山满等人支持,受命来华情况,要求蒋介石派遣“有权威之代表”到港谈判。^⑥ 小川到港后,命萱野转交杜石山亲笔函一件,内称,日本政府尚未确认蒋介石有和平诚意,“最良之方法则为代表的要人之派遣”,又称,日本要求国民政府改组,而国民政府认为不可能,他本人有一打破僵局的方案,但该案“内容极微妙,而须秘密,非亲见蒋委员长或其心腹的要人不能尽其委曲”^⑦。4月初,戴笠到港,向军统局在港人员指示:“此时我与日本绝无和平可言”,“必须以热衷和平姿态为饵,以遂行吾人之谋略,首要之图,为阻滞

① 《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4页。

② 《宋美龄对条件的意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5页。

③ 戴笠:《呈校座》,蒋档。

④ 《杜氏笔记》,《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5页。

⑤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4~615页。

⑥ 《小川致萱野函译稿》,转引自戴笠:《即呈校座》,1938年4月3日,“蒋档”。其日文原本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3页。

⑦ 《小川之亲笔书》,引自戴笠:《即呈校座》,1938年4月2日,“蒋档”。

汪伪组织，不使于短期内成立”。^① 同月 2 日，戴笠致电蒋介石云：

中央于此次小川来港之机会，可否密派一绝对可靠而与小川认识，且在现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员来港，与小川晤谈，藉以刺探对和平之真实态度。如此事钧座认为绝不可行，则生处可设法令杜石珊置之不理。是否如何，谨乞鉴核示遵。^②

4 月 3 日，杜石山也电蒋催促。5 日，蒋复电称：“当遵照文电萱翁意见进行为要。”^③所谓“文电”，当指前述双方政府代表在军舰上会面一事。此电说明，蒋当时对中日双方代表秘密会见还有某种兴趣，但是，这以后，蒋的态度却突然转为消极。10 日，小川再次致函蒋介石，声称“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幸有以教之”^④。13 日，蒋介石复电称：“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致意也。”^⑤马伯援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华留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总干事，虽是日本通，但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从未担任过重要职务，顺便委托这样一个时在香港的“政治上不甚重要之人”与小川周旋，说明蒋意在敷衍。

对与马伯援接谈，小川尚未来得及表态，马即于 4 月 14 日突然去世。21 日，萱野、小川二人与杜石山见面，严厉批评杜向蒋报告不够详尽，声称马即使不死，也非讨论“秘密大计”之人，如居正、孔祥熙不能来

① 刘方雄口述《抗日战争中军统局谋略战一例》，（台北）《传记文学》第 39 卷第 2 期，98 页。

② 戴笠：《即呈校座》，1939 年 4 月 2 日，“蒋档”。

③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18 页。

④ 同上，619 页。

⑤ 《筹笔》13678 号，“蒋档”；又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620 页。

港,则应与蒋先生直接晤谈。萱野、小川称:与中国方面约定大计之后,即可赶程归东,报请政府,恳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藉天皇之谕旨,压服一般军人。现在王克敏、陈中孚、温宗尧、吴佩孚、汪精卫等均与日方已有联系,力量不弱,如不从速约定,乘机解决,则在王、汪等人的谋划根深蒂固之后,吾人虽欲爱护国民党,亦恐难以为力。二人不无情绪地埋怨说:“待命日久,仍无消息,似已成骑虎难下之势,此应请蒋先生乾纲立断,速下决心。想多年相知,必不致难为老朽也。”^①军统人员面对这两个自称与蒋“多年相知”的“老朽”,不敢怠慢,立即将情况转报蒋介石:“伏维小川翁既以垂暮之年,奉命前来,其诚意可嘉,其爱我尤切。日前复得谕令致意,则其言和之心益甚。委座只以指定代为致意之人适已逝世,则今后何人继任及应如何之处,有不得不预为筹划应付也。”^②

5月11日,小川通过杜石山致函蒋介石,叙述自己多次“援助”中国,卢沟桥事变后与近卫首相商量收拾时局办法,以及与头山满组织主和团体等经过,要求蒋介石“当此难关,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函称:“如蒙幸领鄙意,愿派遣要员来港商议,倘足下以仆之赴渝为便,仆应偕萱挺身赴渝,面聆大教。若不然者,则仆即去港归国,一任局面如何恶化。”^③16日,重庆方面派专机取走该函。21日,蒋介石指示:“杜石山绝不准与小川来往”,同时命将小川原函退回。^④27日,杜石山遵命办理。其情况,据戴笠报告,萱野除太息外,默不一言,小川则莞尔而笑,并调侃说:“仆此行,诚不出板垣将军之所料矣。”他告诉杜石山:

① 之光:《致重庆钟先生》,特急电,1939年4月22日,“蒋档”。

② 同上。

③ 戴笠:《报告》,1939年5月22日,“蒋档”。

④ 同上;又《报告》,1939年5月31日,“蒋档”。

板垣认为,蒋先生自西安事变后,受共产党之计,实行抗日政策,日本虽欲和,而蒋先生不能和,因此不希望自己以老耄之年,徒劳往返,自己曾十二次提出意见书,才得到板垣批准,现在“所提条件,不蒙明察,辜负余心,是板垣将军诚有先见之明。呜呼,岂非天乎”^①!二人决定于6月2日离港。

萱野、小川都是曾对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人,背后又有头山满及日本政要支持,因此,蒋一度对谈判有兴趣,宋美龄到香港指导就是明证。蒋介石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下令中止谈判,其原因在于欧战爆发,蒋介石由此看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和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积极调整国际战略。1939年4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必使欧洲战局扩大至远东,且使包括全球,如此,则英在远东势力可不被倭或俄国乘欧战之机,取得渔人之利。”^②同时,他也看到了日本经济能力的严重不足。次日日记云:“余已催英与俄速订军事同盟,使俄、倭对欧战不能旁观坐大,而倭连日五相会议,对欧外交政策举棋不定,然其最后必实行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以其军阀之嚣张,如倭王不准,则有革命之可能也,至其对我国,一面恫吓,一面求和,犹想从中取巧,未知其经济尚有支撑二年之力否?此次小川等求和,余拒绝之宜矣!”^③

萱野、小川在香港除与杜石山等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张季鸾答称: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

① 戴笠:《报告》,1939年5月31日。

② 《困勉记》。

③ 同上。

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共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苏诸朋友,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中共,张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战后之中国完全根据三民主义及法律处理一切,即凡不违法之人与事,皆可承认。”^①对张季鸾所言,小川不能反驳,只能苦笑。

小川决定离港后,于5月27日约曾任驻日领事的罗集谊谈话,表示愿在行前与张季鸾一晤,张拒绝不见。5月30日,张季鸾致函蒋介石称:“小川个人未必无诚,但在敌方并无正式好的表示以前,政府断不可派人来谈。焯虽在局外,亦当拒不与见。”^②不过,重庆方面并未对小川等采取决绝态度,双方始终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直到1941年6月。有关情况,笔者在《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一文中已有论述,兹不赘述。

“和平”底盘与张季鸾香港谈判的天折

张季鸾是报人,但是,从1938年1月起,张季鸾即受蒋介石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蒋的高级智囊。1940年7月2日,蒋介石收到张季鸾的来函,当日日记云:“敌又求和,未知其诚伪如何?此时应暂置不理,以示我不受轰炸之威胁。”^③尽管如此,蒋还是在几天后复函张季鸾,指示谈判机宜,日记云:“敌方间接求和之心虽切,然其方法与政策,

① 《萱野、小川约见谈话要点》,1939年5月6日,蒋档。

② 焯(张季鸾)《致委员长》,1939年5月30日。

③ 《困勉记》。

仍毫无变更。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1. 谈政策而不谈条件；2. 谈情感与利害而不谈权利与得失；3. 对于中国人心，应特别注意苏俄放弃在华特权之宣言；4. 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应放弃；5. 汉口租界应先取消；6. 内河航权应取消；7. 青岛与海南岛应完全交还；8. 热河应先交还；9. 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10. 天津与上海租界应定期交还；11. 保障问题应稳妥；12. 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①前文已述，日军自山海关至北平的驻兵权，为清末《庚子条约》所规定，1938年萧振瀛与和知鹰二谈判时，蒋曾同意保留。但是，这里蒋却明确要求日方放弃。此事表现出，在与日方谈判中，蒋的妥协性逐渐减弱。此后，蒋介石在与张季鸾会面时又不断指示，其7月19日日记云：“与季鸾谈已日：敌国野心如昔，毫未改变，岂有和平希望？”^②25日日记云：“张季鸾来，谈东北与倭不侵犯条约事。”^③显然，如何对待已被日本侵占多年的东北，是否可以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都是谈判中无法回避，或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张季鸾必须向蒋请示。

1938年10月，和知与萧振瀛的谈判因蒋的刹车停止后，和知继续寻找和重庆方面联系的线索。1940年8月，和知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其内容无异乞和，为从来所未有”，蒋介石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④同月6日，他与张季鸾讨论，可否利用这一形势，在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但蒋又认为：抗战目的，在于打破日本的侵略野心与侮华心

① 《困勉记》，1940年7月7日。

② 《困勉记》。

③ 同上。

④ 同上。

理,恐怕一时还难以达到。^①9日,蒋介石再次研究和知来函,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乃益幼稚,实亦愈益毒劣,应切戒严防之”^②。13日,蒋介石发表《“八一三”三周年纪念告沦陷区民众书》,盛赞淞沪之战中国军民的英勇表现,中云: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伟大的历史,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有至大至刚的民族正气;我们在沦陷区的同胞们,要知道我们中华民国的版图,决不会放弃寸地尺土的,要知道敌人有必然失败的道理,更要知道我们前方后方的军民,都在加紧努力来迎接这最后的胜利。^③

蒋介石将这篇文告的发表看成是对日本的沉重打击和对自己的警策。8月14日日记云:“余昨日八一三告书发表,与敌当头一棒,使彼对余之认识或能更进一步;否则,彼不醒悟,常来尝试,我若一时中其诱计,则太危矣!”^④这段日记表明,蒋已经意识到,自己既要抵挡日本的军事进攻,又要谨防日本的“和平”诱惑。

这一时期,蒋介石大概每个月都会收到日本方面的一条求和消息。为了确定谈判“底盘”,蒋介石命张群等人开始起草一份文件,参加者有张季鸾、陈布雷等人。至8月下旬,文件定稿,题称《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该文包括《建国原则》、《对敌策略》、《平和条件》等内容,其《对敌策略》总原则为:保卫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作战媾和之实际策略以

① 《困勉记》。

② 同上。

③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201页。

④ 《困勉记》。

度德量力为依归。下分五条：

1. 领土之完整，主权之神圣不可侵，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自由之确保，为国家民族存亡、主奴所关，故必须牺牲一切，长期抗战，以求其贯彻。

2. 利于长期抗战，而不利于迅速反攻，此量力之义也……确保长期抗战之实力，巩固全民族救亡自卫之精神，由军事上、经济上、外交上疲困敌人，逐渐减少其“力”的方面之优势，而增加其“德”的方面之弱点，以期敌我间之形势逐渐与我有利，以终达作战目的之成功。

3. 不论时间如何长久，环境如何困难，必须贯彻成功，不容中途自馁。惟作战为现实的问题，必须自定最大限与最小限之成功条件，衡量彼我，根据事实以为运用。

4. 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规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要求。

5. 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

以上五条，其最重要之点在于将抗战成功分为“最大限”和“最小限”两种。必须在保证“最小限”，即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时才能开始与日本进行和平交涉。

关于《平和条件》，《纲领》分《理论原则》与《具体条件》两方面。其《理论原则》规定：

1. 日本必须真实承认中国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
2. 此次议和之后，期成立平等互尊之新关系。

3. 日本须放弃过去战前及战时对华不友善之政策及宣传。

4. 除东北悬案另作专案解决外,其余一切有损中国主权之事实,皆须彻底纠正。

《纲领》中有一部分为《坚持之件》,共8条,其中关系重大者为1—4条及第7条。

1. 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应限期完全撤退。河北及华北部队,应撤离河北及察哈尔省境以外。

2. 凡所占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与沿海及海上各岛屿,应完全定期交还。

3. 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销,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与契约,一概不能承认,并不能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上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

4. 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7. 不平等条约之废除,须于和约发表时,同时自动声明且有定期之实行。^①

在上述各条旁,有注:“8月31日张携带港之件”,可见,这份文件是为张季鸾赴香港谈判准备的。

8月27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日记云:“和战方针:甲、以基本条件为标准;乙、以不失时机为要旨;丙、以期待国际为下策。而和战要点:甲、打破敌国侵略灭华政策;乙、消灭敌人优越奴华心理;丙、恢复中国独立自由地位。且敌人有求于我,国际上、地理上、经济上、军事上,皆非与我合作不可。敌又有惧于我,我有领袖权威、革命精神、三民主

^① “蒋档”。

义,而我则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而又决裂。”^①蒋介石反复叮嘱张季鸾:“交涉时,应持坚决态度,不可少有迁就。”29日,再次与张季鸾、陈布雷会晤,指示与日方谈话要点,“对所拟定条件,决不可迁就”^②。31日,张季鸾飞港。但是,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改变主意,日记云:“倭动以日、满、支相称,如何可望其彻底言和?我国损害如此重大,如何可以轻易言和?”^③9月1日,蒋介石命陈布雷起草致张季鸾函,有所指示。陈因当日没有飞港班机,改发短电。^④陈电今不可见,但9月2日张季鸾复函云:“在未得尊电前,即决定不与和某见面”,可见,陈电内容为,要张不与和知会晤。7日,蒋介石干脆命陈布雷致函张季鸾,要他从香港回来。^⑤

张季鸾8月31日抵港后,即得悉“桐工作”的有关情况,感到日方“愚昧凌乱”,“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⑥此前,和知曾告诉张季鸾,日本政府将收回军方的对华谈判权,另作准备,又托人带话,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员,其他无大问题。9月1日,张季鸾召见和知的助手何以之,要何转告和知:1. 日本政府如准备自办对华交涉,“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劝彼亦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2. “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⑦此后,张季鸾即利用和

① 《困勉记》。

② 同上。

③ 《事略稿本》。

④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1日。内部排印本,台北“国史馆”藏。

⑤ 同上,1940年9月7日。

⑥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日,“蒋档”。关于“桐工作”,请参阅本书另文《“桐工作”辨析》。

⑦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日,“蒋档”。

知,以“桐工作”中的问题反对板垣,制造日本内部矛盾,同时则抬高身价,拒不与和知见面。9月3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弟意非和氏有东京敌总部之新意见,决不与之见面。”^①次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张季鸾命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诚意,见我何用!”^②

尽管张季鸾拒绝与和知见面,但是,他内心还是希望继续维持与日方的秘密谈判的。9月17日,何以之面见张季鸾,告以和知来电称:已于9月10日在福冈会见东京要员,偕飞南京,与板垣协商,决定以和知、板垣为核心,办理对华交涉,将再飞东京,取得正式委托,然后南来。同日,张致函陈布雷,要求代为向蒋请示:“是否在港逗留一见?”17日,蒋指示可“在港静候”^③。但是,蒋介石很快就失去耐心。20日日记云:“敌和知求和迁延之原因,其必待敌军侵越时来见有所要胁乎?”^④2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季鸾好事”的批评。^⑤同日,陈布雷即致函张季鸾,要他结束在港工作,立即回渝。不过,张季鸾仍然有自己的想法。日本方面一直宣传愿与中国政府谋和,他要“试验”其真伪。23日,张季鸾致陈布雷函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

① 焯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3日(原文作9月12号,当系误书——笔者)，“蒋档”。

② 同上,1940年9月6日午前,“蒋档”。

③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19日,“蒋档”。

④ 《事略稿本》。

⑤ 《困勉记》,1940年9月22日。中云:“与张季鸾谈已曰: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而其幼稚欺诈,则非常情所能想像。若与之理会,必受无妄之灾。季鸾好事,庸之无妨,为可叹也。”当时,张季鸾尚在香港,不可能与蒋有此谈话。“与张季鸾谈已曰”云云,疑为《困勉记》编者摘编时误加。

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汉奸当然取消，二也。”^①可以看出，张季鸾与陈布雷的“微有不同”在于，张相信日本可能有“若干诚意”，而陈相反，显然，陈的态度反映蒋的观点。

9月24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表示遵嘱结束在港工作。25日，张季鸾与何以之“最后晤面”，告以一两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许可和知通信一次，本人亦当“拼其最后之信用”，转达一次。谈话中，张季鸾并按照陈布雷来函指示，通知日方，如欲讲和，须有与中国建立平等“新国交”的决心，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要求万不可向中方提出，本人也不能转达。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承认蒋介石比自己高明：“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致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②10月4日，张季鸾回到重庆，其精心准备的与和知的谈判计划终于成为废案。

企图以“和谈”阻挠日本承认汪伪政权

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松冈对军部和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所做的“诱和”工作不满，决定收归外务省掌握和领导。他将这一工作委托给自己的门生西义显和松本重治等人。西义显将希望寄托在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身上。钱是江浙财团的重要成员，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一度担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松冈对钱永

^①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3日下午，蒋档。

^② 同上，1940年9月27日午，蒋档。

铭这一人选很满意，夸口说很快就会成功。当时，日军计划南进，从英国和荷兰手上夺取东南亚，急于和重庆国民政府达成妥协，以便拔出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足。

同年8月，西义显到香港访问正寄寓在那里的钱永铭，动员他投入对重庆的“和平工作”。钱提出：如果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前的状态，日军能够全面撤兵，或许能同重庆进行谈判。^①他表示，自己可以负责促成宁渝合作，但须请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出面与日方接洽。^②据西义显回忆，钱当时提出三项条件：1. 重庆、南京两政府合并，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统一政府。2. 日本政府以中国的新统一政府为谈判对象，从中国全面撤退为推行日华战争所派遣的全部兵力。3. 日本政府与中国新政府缔结防守同盟。9月18日，西义显偕钱永铭的代表张竞立等到东京访问松冈洋右外相。10月，松冈签字同意钱永铭提出的条件。^③不过，后来松冈实际向重庆提出的是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太田一郎所拟六条：1. 承认满洲国（必要时以秘密文书约定）；2. 共同防共；3. 撤兵；4. 经济提携（作若干让步）；5. 治安驻兵（长安三角地带不驻兵）；6. 不要求蒋介石下台。^④

松冈洋右除委托西义显外，又亲自致函时在上海，与钱永铭、周作民关系深厚的船津辰一郎，拜托他协助进行。^⑤船津曾任日本驻天津、上海、奉天总领事，有和国民党人员打交道的丰富经验。10月17日，西义显携带松冈的亲函访问船津。同日，船津访问周作民，说明本人应

① 船津辰一郎：《华南谈判失败日记》，《近代史资料》总第69号，254页。

② 《周佛海日记》，34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③ 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241、261~2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④ 《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卷，241页。

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大东亚战争开战经纬》（3），此据台湾译本《对中俄政略之策定》，“国防部”史政局版，154页。

松冈要求,将去香港活动,周表示恢复两国间的和平也为本人所希望。10月19日,松本重治会见周佛海,面交日方所拟“和平”条件,托周作民转交钱永铭。周佛海的印象是:“与在京所谈判者大致相同,惟完成撤兵由二年减为一年,蒙疆及特定地点驻兵,虽形式略异,实质完全相同。”^①21日,船津与周作民同船赴港。在港期间,周作民与钱永铭以日方提出的方案为核心,草拟报告与意见书,托因事来港的金城重庆分行经理戴自牧带回重庆。^②

11月7日,蒋介石研究钱永铭、周作民转来的“和平”条件,大为不满,日记云:“此条件,不过文字变换,而内容实无少异。钱新之不察,以为较汪奸之条件减轻矣,希望政府采纳,是真只知私利而不顾国家者也,可痛!”^③不过,当时蒋介石正在向美、英两方提出“合作方案”,建立同盟,尚未得到答复,^④日本方面又准备在11月30日承认汪记南京国民政府,这使蒋介石感到忧虑。他担心德国、意大利会跟踵承认,担心正在和德国拉关系的苏联会对华冷淡,也担心国内民心、军心的动摇。17日日记云:“英美未与我确实合作以前,对倭不使其承认汪伪为宜,此亟应设法运用者也。”^⑤18日,蒋决定派张季鸾赴香港,日记云:“且嘱钱新之与周作民周旋,未知能使倭不承认汪伪否?”^⑥

松冈洋右除利用钱永铭等与重庆谈判外,又通过德国出面,对重庆政府施加压力。11月1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近闻日自新内阁成立后,亟图解决中日问题,已拟

① 《周佛海日记》,367页。

② 同上,384页。

③ 《困勉记》。

④ 参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642页。

⑤ 《困勉记》。

⑥ 同上。

于近日内承认南京政府。日如实现，义、德因与同盟关系，亦必随之，他国或尚有继起者。此于中国抗战，或益加困难……倘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达蒋委员长及贵政府加以考虑，以免误此最后时机。”^①14日，蒋介石接到陈介来电，认为这是“倭求和进一步之表示”，于18日、19日两日分别接见英、美驻华大使，告以陈介来电情况，说明日本承认汪伪之举，将动摇中国民众抗战信心，进而影响中国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与军事问题。^②21日，蒋介石电复陈介：“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若日方以承认伪组织为词，使我与其议和，则彼既无恢复和平之诚意，我方亦决不以此有所措意也。”^③这通电文，表面上致陈介，实际上是说给日本人听的。同日，日方宣称，重庆方面如不在12月1日之前与日方言和，将承认汪政权。蒋介石不受威胁，日记云：“倭此种宣传，只有增加我对英美合作之决心，若以此为恫吓吾人之计，实至愚蠢也。”^④24日，蒋介石得到苏联通知，继续援助中国武器，感到宽慰。26日日记云：“如何能使俄与英美对远东合作，此为今日唯一之要务也。”^⑤这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当时所孜孜以求的是与苏、美、英等国结成抗日联盟，与日本谈判不过是为了阻挠其承认汪伪政权，并非根本之计。27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声称已与日方完成“调整国交条约”，与“友邦”内定，只须“恢复和平，确立治安，则撤

① 《陈大使自柏林来真电》，“蒋档”。

② 《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话》，《战时外交》（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16~117页。又《困勉记》（1940年11月21日）：“与美大使谈已，曰：今以陈介来电，德愿保证中倭将来和平条件之履行者告之，期美于月内对我合作之提议有一决定也。”

③ 《事略稿本》。

④ 《困勉记》。

⑤ 同上。

兵期限,仍践前诺,无所改变”,要求重庆方面“立下决定,宣布停战”。28日,蒋介石收到电文,在日记中斥以“为寇作伥”^①。

张季鸾到达香港后,即向钱永铭提出:国民政府对于日方诚意仍有怀疑,因为日方宣称,如重庆方面在一定期间内没有肯定答复,就要承认南京政府。对于此类威胁,国民政府“非常不满”。张向日方提出两项条件:1.无限延期承认汪政权;2.无条件全面撤兵。^②张称:倘若日本政府答应履行上述条件,中国政府准备同日本政府进行和平交涉。11月23日,在松冈外相的力促下,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接受张季鸾提出的条件,要求中国政府迅速任命正式代表来日,日本政府将延期承认汪精卫政府。其后,钱永铭即将有关情况电告重庆,并请杜月笙携带详函飞渝,要求指派前驻日大使许世英为首席正式代表。^③27日,重庆拟派许世英赴港。至此,谈判似乎颇有进展,但第二天就发生了变化。

日本内部的拥汪势力一直很顽强。28日,日本内阁会议由于受到军方和日本派驻南京的阿部信行特使的压力,决定按原定日期承认汪伪政府。同日深夜,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得到东京电告,力谋挽救已成局面,改变日本政府的决定。他立即要求钱永铭电告重庆,必须迅速同意日本的“和平原则”,任命正式谈判代表。^④同日夜,蒋介石接到钱永铭来电,得知日方变卦,非常愤怒,日记云:“敌倭与钱新之所谈

① 《困勉记》。

② 关于张季鸾向日方提出的两项条件,各书记载稍有差异。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的记载为:“(一)原则上承认在华日军的全部撤兵;(二)取消承认南京傀儡政权。”见该书第278页。《今井武夫回忆录》的记载为:“日军的全面撤兵与日方是否可以不承认汪政权问题”,见该书第17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此据船津辰一郎的《华南谈判失败日记》,见《近代史资料》总69号,257页。

③ 西义显:《日华“和平工作”秘史》,288页。

④ 《田尻爱义回想录》,86页,东京,1977。

及其态度仍以威胁为主。松冈外长尤为荒唐。无论其文武人员皆不可理，若欧亚交手，卑污恶劣狰狞之形态即毕露矣。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应即令钱新之决绝不理。”^①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蒋介石的第一反应是“东亚战争不知延长到何时方能结束”，第二反应是：“我促英、美、俄更进一步之表示与助我，此其时乎！”^②同日，松冈洋右致电钱永铭，表示愿继续与重庆议和。12月1日，钱永铭和张季鸾分别将有关情况转报陈布雷，陈的强烈感觉是：“敌之狼狈失态，可谓无所不至。”“松冈之可笑，洵无以复加也。”^③12月3日，蒋介石读到陈布雷摘录的钱、张报告，愤怒地在日记中对松冈写下了“欺诈恶劣极矣”六个字的考语。^④

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使蒋介石忧心忡忡。1940年12月1日，蒋与其宣传干部研究“如何能安定民心”，夜不能寐，自称当夜只熟睡了三个小时。^⑤次日，他在“国父纪念周”上报告，说明这是近卫内阁的“自杀”行为，自感“颇费心力”。^⑥其实，日本承认汪伪政权一事对当时的政局、战局并无多大影响，蒋介石过于紧张了。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长知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祖、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峰，留交王芄生讯问。如果不

① 《困勉记》。

② 同上。

③ 《陈布雷日记》，1940年12月1日、3日。

④ 《困勉记》，1940年12月3日。

⑤ 同上。

⑥ 同上。

能利用为反间，则应拘留，不许释放”。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①

结 束 语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坚持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同时，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如前述，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时，立刻下令终止谈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1939年，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与中国军统人员谈判，力图面见蒋介石。这是两位和中国有过特殊关系的日本人，在他们后面，又有日本“主和”人士头山满和近卫等政要的支持。最初，蒋介石对谈判持有兴趣，宋美龄、戴笠都先后到港指导。但是，欧战的爆发使蒋介石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途径和希望，因此毅然采取决绝态度，禁止军统谈判人员再与小川等来往。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

^① “蒋档”。

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限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同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右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所有他掌控的谈判,都是日方求“和”,蒋只是被动应对而且都由蒋主动刹车。在谈判中,他的态度逐渐坚决,条件逐渐提高,是日渐强硬而非不断软化的。

蒋介石思想中的战、和矛盾存在过很长时期。就在蒋介石受松冈洋右欺骗,愤而斥责日本为“无礼无信之国”后不久,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应使敌知,非由美国或苏、德出而保证决不能解决战事之意乎?”“敌此任内阁,如果由海军系联美派出任,使美得出而调停中倭战事,则和平有望乎?”^①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访问重庆。

^① 《困勉记》,1940年12月10日。

居里向蒋提出：本人来渝，常闻传言，某某等秘密对日进行和议，请直率相告。蒋答：

自由中国绝对无一人愿与日本言和。倘英、美能继续予以援助，亦决无人表示不满。此间人士皆决意除最后胜利外，他无所求，何言隔〔个〕别之和平！我人已作此最大之牺牲，日本已陷无援助、无希望之绝境，英、美已在精神上、物质上予我以一切援助，故不论日本以任何动人之条件向我求和，而此未成熟之对日和平，余将一律视为中国之失败。余可向阁下保证，对日和议必在英、美参加之和平会议席上谈判之，此外无中国可以接受之可能。余愿时机成熟之时，此项会议由美国召集之，一如召集九国公约之华盛顿会议。惟华盛顿会议时，无苏联参加，深盼此会议亦有苏联一席耳。^①

这个时候，中国虽还在孤军奋战，但已得到英、美、苏三国的援助，因此，蒋介石说话底气足、腰板硬，但是，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和平”幻想的阴影。彻底抛弃“和平”幻想，转过来劝止英、美对日妥协，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彻底胜利，蒋介石的面前还有一段路程。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① 《战时外交》(一)，588~589页。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国力、军力都相距很大,因此,还不能立即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战争。他们主张,仍应以妥协方式与日本达成“和议”。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主动向日军进攻,标志着抗战国策的确立和全面抗战的展开,但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都仍有部分人主张“和平”。淞沪之战失利后,主和之议更盛,孔祥熙是这一部分人中的重要代表。现存档案表明,中日之间的许多秘密谈判虽由日方主动,但中方的掌控者则是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于1938年初升任院长的孔祥熙。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活动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真实态度的反映,代表蒋介石的意志。然而,事实出人意料,蒋介石对孔祥熙掌控的这些谈判大都持反对态度,曾多次批评,甚至以极为严厉的口吻加以阻遏。这种情况,与我们的传统认识大相径庭,值得郑重讨论,以求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加深对蒋介石其人的全面认识。

拒绝被孔祥熙视为“天赐良机”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 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 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 扩大上海的停战

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 停止排日;5. 共同防共;6. 降低日本货的进口税;7. 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同月9日,陶德曼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威胁孔祥熙:“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①28日,陶德曼在汉口会见孔祥熙,重申上述条件。29日,孔祥熙致电在南京的蒋介石,告以他本人多次和在汉“重要同志”会晤,都认为“长此以往,恐非善策。既有人出任调停,时机似不可错”。电称:“复查近来党政军各方及民间舆论,渐形厌战。弟意此次战争,我已牺牲甚钜,除非军事确有胜利把握,不若就此休止,保全国力,再图来兹。”^②30日,孔祥熙再次致函蒋介石,认为陶德曼出面调停,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乘风转舵”,改变抗战国策,函称:“前方战事既已如此,后方组织又未充实,国际形势,实远水不救近渴。而财政经济现已达于困难之境,且现在各方面尚未完全觉悟,犹多保存实力之想。若至寄人篱下之日,势将四分五裂,此时若不乘风转舵,深恐迁延日久,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③他认为日方所提条件“尚非十分苛酷,多系旧案重提,亦非迫我必须一一接受,尽可作为讨论之范围”,建议蒋介石在接见陶德曼时原则表态,至于具体条件,可由行政院“趁此先行停战,稍事整理”。可见,孔祥熙对抗战形势极为悲观,陶德曼出面调停,对他说来,可谓喜出望外。

蒋介石与孔祥熙不同,这一时期,蒋的抗战意志相当坚决。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日记云:“老派与文

①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德国外交文件》,第4辑第1卷,784页;中译文见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16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

② 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7A,00085。

③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11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和平酝酿》,以下简称“蒋档”,台北“国史馆”藏。

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① 21日，布置防守南京，日记云：“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②但是，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前方军事失利的严重情况。29日，蒋介石得悉日本委托陶德曼调停的消息，立即决定加以利用，日记云：“是当约彼来京。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③12月2日，蒋介石与陶德曼谈话后，一度对日本有过幻想，日记云：“如倭果能觉悟，则可与之谈乎？”^④但不久，日军即以加紧进攻南京粉碎了蒋的幻想。1月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到达江西星子，日记云：“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⑤9日，研究全国总动员计划，日记云：“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⑥26日，日方由于军事上已经取得巨大胜利，通过陶德曼提出四项新的强硬条件：1. 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2. 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3. 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4. 相当赔款。四条之外，另附两项条件：1. 谈判进行时不停战；2. 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日方指定地点直接交涉。蒋介石认为“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⑦。2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参加者多数

① 《困勉记》，稿本，台湾“国史馆”藏，以下均同。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困勉记》，1937年12月26日。

主和,蒋介石坚持不可,受到于右任的讥笑。^① 29日,蒋介石与于右任及另一位主和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他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② 1月2日,蒋介石再次见到陶德曼转达的日方条件,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决定严词拒绝。^③ 但是,当时日军攻势锐利,中国军队需要休整与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不得不虚与委蛇地敷衍日方。1月12日,在孔祥熙和张群指导下,外交部拟具口头答复稿,认为日方所提四项条件,“太属空泛,愿明晰其性质与内容后,予以详细考虑与决定”^④。这一口头答复稿的目的在于“拖”,以便不明确拒绝日方条件,为中国军队争取时间。但是,口头答复稿所提出的要求日方答复的四个问题却被蒋介石否定。这四个问题是:

1. 所谓中国放弃亲共政策而与日、“满”合作,实行排共政策,日本政府意,中国究应采取何项步骤?

2. 所谓非武装区与特殊制度,究拟设在何处? 特殊制度之性质如何?

3. 经济合作一层,其范围如何?

4. 日方是否坚持赔偿一点,是否对于中国方面所受之巨大损失,可予考虑。^⑤

蒋介石当时正在河南开封布置防务,见到此件后,认为这将使谈判具体化,立即以“限一小时到汉口”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与张群,表示

① 《困勉记》。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口头答复稿》,《德国调停案》,见台湾藏档《外交部案卷》,00556,65页。

⑤ 《口头答复稿》,《德国调停案》。

“最后四项问句切不可提”^①。15日，孔祥熙会见陶德曼，面交英文答复，委婉地表示：“为以真诚的努力寻求在中、日两国间重建和平的可能性，我们已经表示，热诚希望得知日方所提‘基本条件’的性质与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我们对日本所提条件的看法。”^②16日，蒋介石决定，通知陶德曼：“如倭再提苛刻条件，则应拒绝转达。”^③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政府极为恼怒，将蒋视为对华“诱和”或“诱降”的最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否认“蒋政权”。次日，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声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④。此后，日本政府即决定，以蒋介石“下野”作为中日“和平”的必要条件。

制裁唐绍仪谋和

日军占领上海后，即企图物色在中国政坛上有过重要地位和声望的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或直接出面组建傀儡政权。唐绍仪，字少川，清末任外务部右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武昌起义后任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议和。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任第一任内阁总理。此后，唐绍仪历任要职，其地位和声望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留居法租界，日本船津辰一

① 《蒋委员长致孔院长》，《德国调停案》，见《外交部案卷》，00556，64页。

② 《德国调停案》，见《外交部案卷》，00556，76页。

③ 《困勉记》。

④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386～387页，东京原书房，1978。

郎等人便多方设法,企图拉唐下水。唐的住处,不断有各色人物登门。重庆国民政府为防止唐为敌所用,也不断与唐联系,许以国民参政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外交委员长或驻德大使等职,任其择一。据说,蒋介石还曾致函唐绍仪,拟聘请其为“高等顾问”^①。1938年5月,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会见汪精卫、孔祥熙等人。汪称:“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的下野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孔祥熙则表示,最好由唐个人与日本方面谈条件。^②

唐绍仪接受汪精卫和孔祥熙委托后,即于5月底或6月初在上海与日方谈判,其条件大略如下:1. 取消以前一切不平等条约,如二十一条、塘沽、何梅等协定;2. 日本军队完全撤退。万一拘于《庚子条约》,其所驻军队亦不得超过欧美各国所驻军队数目之上;3. (中国方面)绝对不赔款,因自动停战议和,非战败和议可比;4. 中、日、满经济合作。唐并表示,中国方面如必欲取消满洲独立,可在今后和议中由唐出面交涉。^③ 唐绍仪的计划是,在两个月后日军到达河南鸡公山时,或由中国“最高领袖”授意前方将士自动停战,或由孔祥熙邀同戴季陶、汪精卫等与日本素有关系的“老同志”,代表政府或人民团体赴香港谈判,他本人届时当前往参加,但决不单独负责。^④ 6月17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鸟工作”计划,准备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强有

① 《南湖致刚父电》(胡鄂公致孔令侃),1938年6月11日,“蒋档”。

② 同上。

③ 克克:《致孔院长转居觉生先生》,1938年6月9日,“蒋档”。

④ 同上。

力的政权”。^① 27日,唐绍仪托大女儿(诸昌年夫人)持函,到武汉会见孔祥熙,声称“以国难为虑,渴望于国事有所襄助”,“欲得公正和平,须中日公开谈判”。^② 7月5日,诸夫人回沪,携回孔祥熙致唐绍仪函,函云:“战争初期,我方别无选择;时至今日,或有公正和平之望。”孔要求唐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试探日方和平意向,同时,联络中日有名望的民间人士,呼吁双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③ 8月上旬,孔祥熙在香港的亲信访问诸夫人。诸称:有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的全权代表向唐绍仪提出三项条件:1. 停止反日运动;2. 反共;3. 经济合作。该代表称,日方没有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向孔在香港的亲信表示:“此次因系院座(指孔祥熙——笔者)再三劝慰,少老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诸夫人并称:该代表定8月5日返沪,如有所命,请在8月15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④ 8月9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汇报上述情况。

蒋介石这一时期仍然不赞成孔祥熙的谋和活动。6月23日,蒋介石与孔祥熙谈话称:“敌人至今灭亡我国之野心已为我粉碎,即其对粤汉速战、速决之信心,亦已为我消灭。最后胜利之属于我,已确定矣。今日对倭和战问题,亟须统一,不可各自接洽。”^⑤ 7月12日,日机轰炸武汉,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再次与孔祥熙谈话,劝止他的谋和活动。谈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98页,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

② 转引自《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278~2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③ 《孔祥熙致唐绍仪密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

④ 《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1938年8月9日,“蒋档”。

⑤ 《困勉记》。

毕,蒋介石慨叹道:“庸之对敌行动求和,犹不知为误事,可叹!”^①蒋在接到孔祥熙关于诸夫人的活动情况报告后,立即于8月10日复电孔祥熙,电称:“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②当时,蒋介石对于孔祥熙秘密与日本谈判的情况已经有所察觉,苏联驻华外交官也为此向中方了解情况,因此蒋在电报中特别提醒孔祥熙:“日人近时特放一种空气,甚传兄屡提条件交敌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务请兄注意为禱。”^③

8月11日,孔祥熙电复蒋介石,首先表示尊重蒋的意见,“承嘱一节,自应注意”。接着,为自己转呈唐绍仪女儿谈话一事解释,向蒋道歉:“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关于他本人和唐绍仪发生关系的原因,孔声称目的在于争取唐,阻止唐为敌所用。电称:“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方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使其为中央用。”关于蒋电所称向日方提交和平条件问题,孔坚决否认:“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技。与弟绝无关系。”^④

在历史上,唐绍仪反对过孙中山。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唐不愿支持,退居家乡。1931年,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政

① 《困勉记》。又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938年7月2日,未刊稿,以下简称《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藏。

②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蒋档”。

③ 《中致重庆孔院长》,1938年8月10日,“蒋档”。

④ 《致武昌蒋委员长》。“蒋档”。

府,与蒋介石对抗,唐是常务委员之一,后来胡汉民与蒋介石对立,领导“西南派”从事公开的与秘密的反蒋活动,唐又曾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因此,蒋介石不喜欢唐绍仪,更反对唐出面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当时,日本方面正在动员唐绍仪出面,在南京组织伪政权,1938年2月,蒋介石即得知有关情报。^①7月9日,蒋介石分析日本对华强硬的原因,其第三条就是,唐绍仪“希冀拆散我政府”^②。9月11日,蒋介石再次分析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对华政策,认为当年6月至7月之间,板垣之所以强硬,其原因在于,“错认我内部有分裂及强逼我下野”的可能,同时,也由于“我内部文人之态度暧昧,以及唐绍仪老奸之施弄阴谋”^③。同月下旬,日本特务土肥原到上海访问唐绍仪,说服唐起草了《和平救国宣言》。^④9月30日,唐绍仪在家中被军统特务刺杀。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实为革命党除一大奸。此贼不除,汉奸更多,伪组织与倭寇更无忌惮矣。总理一生在政治上之大敌,我党革命之障碍,以唐奸为最也。”^⑤唐绍仪被刺一事,扑朔迷离,多年来成为疑案。蒋介石的这一则日记表明,此事当出于蒋的决定。

制止贾存德、马伯援与萱野长知等人的谈判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和战两用”政策,即一面武力进攻,一面政治

① 《困勉记》,1938年2月23日。

② 《困勉记》。《事略稿本》作“企图以唐绍仪领导伪政府”。

③ 《困勉记》。

④ 《今井武夫的证词》,《土肥原秘录》,54页,中华书局,1980。

⑤ 《事略稿本》。

诱“和”。1938年2月,日本将在长江下游的侵华部队改编为华中派遣军,以畑俊六大将为司令官。畑俊六接任后,即一面筹划进攻武汉,一面通过萱野长知、松本藏次等人与中方联系。萱野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孙中山、黄兴结识,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多次参与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抗战爆发后受头山满及松本石根大将之命来华,寻找与重庆方面谈判的机会。畑俊六对萱野说:“战事无论延长至何时,总有和平之一日,希望有一了解日本者出而负责收拾善后局面,缔两国共存共荣之同盟。”^①又召见孔祥熙在上海的亲信贾存德^②说:“现在日本的对象已不是蒋委员长了,而是南京新成立的维新政府,但是,蒋委员长、孔院长想到同盟会时日本人好意的援助而有觉悟,亦未尝不可谈判和平。”^③他指示萱野直接致函孔祥熙。当年5月,贾存德密携萱野致孔亲笔函,自沪至汉。函称:“现在中日战争,无异箕豆相煎,势将两败俱伤,绝非东亚之福,希望捐弃小嫌,维持大局。”^④贾并向孔转述萱野意见:现在日军对和平要价过高,实难谈商,必须设法使国内和平派抬头。如中方暗示同意,本人极愿回国为和平奔走,并已派人与头山满接洽云云。^⑤萱野所言,符合孔祥熙心意,复函称:“中日接壤最近,唇齿相依,在历史上地理上关系极为密切,互助则能共存,相残必致偕亡。”“究修百年之好,抑种百年之仇,似全在贵国少数军人之一念。”孔要求萱野联络日本的“忠君爱国之士”,“责以正义,晓以利害”,促使少壮军人早日醒悟。孔本人则声称:“为奠定中日真正共存共荣之百年大计起见,亦当竭尽绵

①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23日,“蒋档”。

② 贾存德,字辛人,孔祥熙的同乡、学生,长期在中央银行工作,负责收集日本经济情报。

③ 伯良(胡鄂公):《致王主任(良甫)虞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编,《政治》(一),22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④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函》,1938年6月23日,“蒋档”。

⑤ 同上,1938年6月3日。

薄,以从事焉。”^①同时,孔祥熙还准备了一封致头山满的信件,也交贾带回。6月初,贾回到上海,与松本藏次见面,代表孔祥熙表示:“中日相持,仇者快,亲者痛,利害详如来函,如能保领土完整,修万代之好,两国幸甚。现以院长地位,亦乐与公等挽救两国之危局,不知公等有无善策?”^②6日,萱野询问有无孔祥熙复电,贾当时尚未接到孔的新信息,只好编造了一通假电报出示萱野。7日,萱野偕松本飞返东京。^③13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实业总长王子惠告诉贾存德:日本军部训令,如蒋介石不表示休战,决定三路进攻汉口。^④21日,萱野回到上海,与贾存德讨论与孔祥熙会面地点。^⑤23日,孔祥熙向蒋汇报此事,声称“在此时期,似不妨虚与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派与反战派之势力”^⑥。

此函发后,蒋介石迅速回电批评。蒋电未见,但其基本精神从孔祥熙6月25日复蒋电可以窥知。孔电云:“顷奉手示,至佩卓见。弟前接贾生来电,当即复电切戒。兹承尊嘱,已又去电严谕。”孔特别向蒋表白,为避免发生意外情况,已预留地步,本人所有致贾存德之电,均系秘书具名;前致萱野函,也是采取另附名片的办法,并未签字盖章,希望蒋宽心。孔同时向蒋汇报,刚刚接到贾存德来电一件,“已答以现尚无暇,嘱将切实办法先行探明电复,备作参考,此外,仅对萱野奔走辛劳略表慰勉而已”^⑦。

① 孔祥熙:《致萱野先生函》,孔祥熙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参见《日蒋谈判的重要资料》,拙著《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524~52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② 贾存德:《孔秘书(令侃)转呈孔院长》,1938年6月12日,“蒋档”。

③ 贾存德:《致孔秘书(令侃)转呈院座》,1938年6月12日,“蒋档”。

④ 同上,1938年6月13日。

⑤ 《上海贾君来电》,1938年6月21日,“蒋档”。

⑥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6月23日,“蒋档”。

⑦ 同上,1938年6月25日。

当时日方认为,与中国“和平”的最大障碍是蒋介石,因此坚决要求蒋下野。7月1日,孔祥熙致电贾存德,表示本人可代替蒋介石下野,电称:“苟有利真正共存共荣,为彼方转圜面子,不惜敝履个人地位。”^①萱野对孔祥熙的态度表示敬佩,声称对蒋下野一事,可不坚持。7月4日,萱野表示,以人格担保无欺诈,日本的军事行为最近暂可“不积极”,但完全停止,须待会见孔祥熙之后。^②7月5日,贾存德偕同萱野赴港,继续谈判。行前致电孔祥熙,表示将亲自携带“切实大略条件”到武汉,详细面禀。^③7月6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宣称,日本政府拟在8月以前夺取武汉,两国谈和,最好在此时期。日方条件仍如陶德曼转达的“订立防共协定”等四条,希望了解中方条件,再行商洽。中村要求孔祥熙直接致电外相宇垣一成商洽,同时表示,希望7月7日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时,“演词不致过分激烈,以免引起彼方民众反感”^④。同日,孔祥熙将贾存德的上述电报及中村谈话一并报告蒋介石,请示“所陈各节,是否可行”^⑤。7月15日,孔祥熙又将萱野的老朋友马伯援以及和萱野有干亲关系的居正夫人派到香港,参加谈判。^⑥

7月20日,马伯援偕同贾存德会见萱野及松本。马伯援表示:
1. 日本军阀,不协助东亚民族,使之独立,为九亿有色人种之领袖,乃恃强奴隶中华民族,迫中国抗战,自相残杀,未免自坏长城。2. 日本不知

① 转引自《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5日,“蒋档”。

② 《上海贾存德来电》,1938年7月4日,“蒋档”。

③ 《上海贾君来电》,1938年7月5日,“蒋档”。

④ 《香港情报》,1938年7月6日,“蒋档”。

⑤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7月6日,“蒋档”。

⑥ 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据贾存德回忆,贾到武汉后,孔邀马伯援与贾相见,对马说:“你明天就和贾存德一同到香港去。”又致函萱野长知:“关于和谈之事,特派马伯援先到香港候教。”见《孔祥熙其人其事》,1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中华民族之团结,由于日阀之迫逼与凌辱,反欲分化中国,利用汉奸,这种手段,已不适用于现代之中国。3. 中日战争结果,必陷日本于污泥中,更陷东亚于污泥中。4. 可惜日本无大政治家,无远见军人,理解孙总理的大亚细亚主张,促其实现,致有今日之悲剧,受到白色人种轻视。谈话中,马伯援警告萱野:中日战争的最后一胜利将是共产党。他盛赞延安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言“肤施之青年男女,日食小米饭两餐,工作十四小时不倦,精神方面,胜过今日之大和魂”。

萱野和松本表示同意马伯援的意见,陈述其观点:1. 犬养毅临终时表示,日阀利用大亚细亚主义,强霸东亚,必惹大祸,拟改大亚细亚主义为亚细亚和平协会,使各国各民族乐于参加。2. 头山满最近常说:中日战争,起于日本不敬,轻视中国军人及中华民族,应当止于“诚”。倘中日以“诚”相见,各种问题均可解决。3. 现在中日军人,愈打愈对立,愈仇视。吾辈工作,以休战、恢复理性为先。4. 日本军人,最要假面子,倘蒋先生能理解,一时下野,即可停战,中日双方,同时派出代表,和平立刻实现,届时蒋先生东山再起,亦无不可。马伯援反驳萱野二人的意见,声称“蒋公为现在中国唯一的领袖,假使下野,无论何人,对于这个局面,不敢负责,不配负责,中国依然混乱,仍是抗战到底为是”^①。萱野表示,愿回东京传达上述意见。马伯援即鼓励萱野,倘能建议日本取消近卫宣言,不要求蒋下野,伯援可以个人资格,报告孔祥熙或其他党中旧友,请其转陈蒋公,促进和平实现。会谈后,萱野、松本等于7月23日前先后回日,向近卫首相、宇垣外相等人汇报。

宇垣一成对华政策上属于“温和派”。当其接任外相时,蒋介石就估计他会“主和”,但蒋认为,宇垣仍会“以挑拨离间我内部为唯一手

^① 《马伯援呈》,1838年10月8日,“蒋档”。

段”，因此提醒自己“戒惧勿忽”^①，自然，他对马伯援、贾存德与日方的谈判仍然持反对态度。8月4日，孔祥熙致蒋介石电称：“前奉尊谕，已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完全作为彼等私人接洽，藉以探取消息，备我参考，绝不能谈及任何条件。”^②11日，他在回答蒋关于唐绍仪的批评时再次作了同样表示。^③8月下旬，已经返回上海的贾存德多次致电孔祥熙，声称畑俊六与第三舰队长官及川古志郎托人邀贾会面，表示日方已不再要求蒋介石“下野”，近卫声明亦可由天皇出面表示取消；现在日方的条件仅为“防共”与“亲善”两条，如中方采纳，希望派负责代表到沪商谈。贾并称，日方已暗中成立休战特别委员会，畑俊六、及川古志郎为委员，土肥原等为进行委员。^④9月1日，孔祥熙再次将上述情况向蒋介石汇报。6日，蒋介石复电，命孔祥熙转告贾存德，向日方表示拒绝。^⑤10日，蒋介石决定迅速制订五年抗战计划，改组国民政府，以期自力更生与独立作战。^⑥11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孔祥熙，口吻空前严厉：

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汉奸通敌论罪。敌想复订停战协定，以亡我国，其计划极毒，请兄负责制止，免误大政方针。千万注意是荷！^⑦

① 《困勉记》，1938年5月27日。

②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8月4日，“蒋档”。

③ 孔祥熙：《致武昌蒋委员长》：“至前马、贾两君与萱野等之接洽，亦系藉私人关系刺探消息，作为情报，更未提及任何条件，不过不能不有所指示，免应付失言。”“蒋档”。

④ 《抄上海贾生来电》，“蒋档”。

⑤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9月7日）：“顷奉鱼（6日）机鄂电，遵即转告贾生，令其拒绝。惟前数日尚接有贾生来电三件，虽系过去情报，姑仍照抄奉阅，以备参考。”“蒋档”。

⑥ 《事略稿本》，1938年9月10日。

⑦ 蒋介石：《致重庆孔院长》，“蒋档”。

蒋介石既甩出狠话,孔祥熙不敢再转呈贾存德的情报,于是,采取其他办法。

不理睬孔祥熙与日方首脑会面的要求

萱野长知等于7月23日返日后,联络头山满、小川平吉等人,在政界上层活动。至9月上旬,宇垣外相表示,不再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但蒋须“预先作出准备下野的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①。9月17日,萱野再到香港,与马伯援、贾存德会谈,萱野称:宇垣“酷爱和平”,愿意仿效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故事,在航行大海的军舰上与孔祥熙见面,不讲条件,仅以“和平”与“防共”两原则为谈话基础。^②马伯援将两原则略加修饰,改为:1. 东亚永久和平;2. 中日精神防共。对“精神”二字,萱野深表同意。23日,日本五相会议议决,同意宇垣与孔祥熙的会谈计划。25日,马伯援离港赴渝,向孔祥熙汇报。但是,宇垣因其主张遭到日本军方的强烈反对,于29日辞职。10月8日,马伯援写出报告,交孔祥熙转呈蒋介石。报告称:萱野等对和平运动,俱有决心,正在运动头山满组阁。宇垣虽已去职,但近卫仍有决心,日本厌战心理,已遍全国,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时机。他说:“头山满为日本右派之典型人物,与总理有旧,现以八十四岁,老而且病之躯,热心和平,并派六十六岁之萱野,两来香港,设法沟通,此种精神,吾政

^①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598页;参阅拙作《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410~4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② 《马伯援呈》,“蒋档”。

府宜利用之。再中日战争，孰胜孰败，总有结束之一日，我政府纵不轻与之和，亦当与之周旋。”他建议重庆国民政府“通盘打算，本乎历史，鉴于大势，派得力人员与之接洽，鼓其勇气，或进而同去东京，察其虚实，宣传我政府主义”^①。

孔祥熙觉得马伯援的报告很有用，于10月15日上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说明国际没有援助中国的可能，而中国国内的财政又已极为困难，无法维持。函称：

兹据顾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实检讨之必要。最近有西友自日来言，就其国内表面观察，似无大战状态，一切经济财政尚能勉维现状。至于我国，在我兄领导之下，虽将士用命，民众动员，抗战年余，已博各国之彩声，只以战场尽在我国境内，虽不免土地日促，交通困难，工厂既遭摧毁，货物亦难出口，所有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实不可以数计。非惟我兄多年来苦心孤诣之种种建设，付诸东流，而今后财政上之维持，更将难乎为继。^②

该函进一步渲染财政危机和武汉失守后中国的困境，声称：“后方情形，为我兄所深悉，长此以往，武力固属重要，而国内物质及人民团结如何，均应顾及。如果军事方面确有把握，不仅武汉可保，且能继续支持，日本方面不出三数月即有变化可能，自属不成问题，万一无甚把握，恐武汉一经退出，则人心不免因厌战而动摇，各省态度有无变化，亦难预料，且敌机现已屡向我后方扰乱，将来大多数军队究宜退至何处，倘使拘于

^① 《马伯援呈》，“蒋档”。

^② 孔祥熙：《致介兄》，1938年10月15日。

一隅,补充与给养似皆成为问题。加以目前我之现金及外汇已拨用殆尽,而以货易货又因交通困难运输亦极不易。弟忝负行政责任,对于军事事实不甚谙,对于财政外交,则不能不悉心研究。近来多病,杞忧尤甚。”他建议蒋介石抓住机会,乘时进行。函称:“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心所谓危,不敢缄默。”

同函附呈孔本人撰写的《最近国际情势》及《日本最近情势》报告。前一报告对蒋“攻心”,历述各国情况,声称寄希望于国际援助,无异画饼充饥。中云:

我以开罪于日本,故英国对我各项借款,非完全拒绝即多所顾虑,而法国对我所购之器械,现亦多方为难。俄虽对我极表同情,然因德、义、英等国对俄均甚歧视,俄内部情形复杂,故斯大林不敢言战……至美国因鉴于欧洲形势,虽心理上为我不平,实际上亦难积极助我……若望其为我出力,仍恐等于望梅止渴。^①

后一报告说明日本国内和平派的活动,内称:“日本元老重臣文治派,现在希望和平者颇不乏人,如头山满、近卫、宇垣已合组秘密委员会,暗中活动,设法制止军阀跋扈……萱野为头山之代表,现在香港,仍思尽力奔走。”接着,孔祥熙着重说明,宇垣虽已去职,但日本国内的和平派仍在活动。报告称:

昨接港电云,松本最近由东京抵港,据言,对和平大纲,近卫与宇垣一致,方针未变。现矢田回国,拟请近卫亲自出马,以效张伯

^① “蒋档”。

伦。顷又闻知萱野接东京来电，谓海、陆相急盼与弟及居觉生兄会面。^①

还在宇垣一成刚刚出任外相时，蒋介石就得悉日方曾要求中方派员赴日谈判，对此，斥之为“想入非非”、“可笑之至”。^② 自然，对于“近卫亲自出马”以及陆军大臣、海军大臣要与孔祥熙、居正等见面的说法也不感兴趣。对孔祥熙此函，蒋介石未加理睬。同年11月，褚民谊、樊光致电汪精卫、孔祥熙，再次声称“近卫甚愿效张伯伦赴德故事，赴华晋谒委座”。同月7日，孔祥熙将此电转呈蒋介石，蒋仍然未加理睬。^③

阻止孔祥熙答复近卫第二次对华声明

近卫的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遭到日本许多人士的批评。11月3日，近卫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题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改变此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企图以此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④ 果然，孔祥熙觉得是个机会，准备在11月7日的行政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讲话，给予“非正式答复”。拟稿称：“我人所注意者，仅彼对我态度，以平等待我者，即我之友，以暴力侵我或武力乱我者，即我之敌。”拟稿批评日本政府“好用定

① “蒋档”。

② 《困勉记》，1938年5月30日。

③ 《褚民谊、樊光致汪精卫、孔祥熙电》。“蒋档”。

④ 《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400~401页。

义不明之词句以淆惑视听,如彼所谓安定东亚,是否独霸东亚之别名?所谓求中国之合作,是否剥夺我经济之独立自由之变相?我人于此亟愿得知其真意”^①。这里,貌似对日本提出批评、谴责,而实际上将为日本政府提供答辩、粉饰其侵略政策的机会。拟稿并称:“解决中日之关键,全在日本,日人果能尊重我主权,而抛弃其侵略政策,则东亚之安定一举手耳,即世界之和平亦易如反掌也。”11月6日,孔祥熙将拟稿电送蒋介石审阅。同日,蒋介石以“限卅分钟到的特急电”通知孔祥熙:“此文应慎重斟酌,切不可发表。”^②11月9日,孔祥熙复电蒋介石称:“电发之后,弟觉似仍未尽妥,经再修改,原文另电陈闻,顷奉尊电嘱为缓发,经已遵办。”^③这样,蒋介石就阻止了孔祥熙与近卫文麿之间的一次远距离对话。

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1938年9月,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与此项工作,但他对谈判非常关心,惟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闻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陷入僵局,功败垂成,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

① 孔祥熙:《致重庆蒋委员长》,1938年11月6日,“蒋档”。

② 《致重庆孔院长》,“蒋档”。

③ 孔祥熙:《致重庆蒋委员长》,“蒋档”。

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当,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贴,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①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②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之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觉得是个机会,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积极准备等组伪国民政府。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方面: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新任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阿部信行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

① 《事略稿本》,1938年10月23日。

② 同上。

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① 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9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催萧即速来港。^② 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知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③ 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④

这封信，语气严峻，表面上对萧，实际上断然批驳孔祥熙。蒋当日在日记中即一方面指斥日方“可笑”，一方面则明确写道：“然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应注意痛斥之。”^⑤ 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

① 何以之：《致彦超（萧振瀛）》，1939年8月31日，“蒋档”。

② 何以之：《致彦超》，1939年10月4日，“蒋档”。

③ 孔祥熙：《致介兄》，“蒋档”。

④ 《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

⑤ 《困勉记》。



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①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②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③次年1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征四郎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④对于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

自蒋介石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后,孔祥熙虽不敢再向蒋转呈贾的情报,但仍命其在上海继续联系日方。

早在1938年,贾存德即与伪维新政府官员王子惠相识。王为留日学生,早期同盟会会员,与畑俊六、及川古志郎等日军头目都有联系。伪维新政府成立时,任实业部长。当年夏,王向贾等表示,如能给以自

① 《冯玉祥日记》(5),1939年5月29日,66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参见高兴亚:《冯玉祥将军》,187页,北京出版社,1982;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67页,中华书局,1960。

② 《严斥汪逆卖国降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谈话》,126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

③ 《孔令侃为呈再晤何以之给孔祥熙的密电》,《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75页。

④ 《盛升颐为呈评述日方和谈条件由给孔祥熙的密电》,《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77页。

新之路,可随时脱离伪组织,牺牲一切,专诚为中央效力。贾存德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告孔祥熙,孔即复电勉励,命其辞去伪职,伺机去东京团结日本主和派,抵制主战派。王奉令照办。1940年4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主和派人物闲院宫津子伯爵、头山满等联成一气,主张和谈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反对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权。王并透露,板垣征四郎想从速结束对华战争。5月间,板垣在面谈时口头提出五项条件:1. 声明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2. 中日以平等互惠之原则,经济合作;3. 共同防共;4. 撤兵;5. 取消一切伪组织。^① 在谈到第四条时,板垣表示,希望孔祥熙指定地点,以极秘密的方式与板垣等会面;如孔允许,约定会面日期后,可通知板垣,即由板垣等请求天皇下密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王子惠并称,板垣亲口表示,如孔祥熙同意,将亲自签名发出正式公文,望孔在6月6日天皇承认汪政权前对上述条件表态。^②

6月26日,贾存德化名吴复光到达重庆,孔祥熙表示可以接受板垣的五项条件。但是,7月4日、8日、9日、10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这使孔祥熙很不满,对贾存德大发牢骚,责问“日本人搞的什么鬼”,埋怨因此妨碍了向蒋的“进言之机”。^③ 不久,板垣应允,自16日至22日止,停止轰炸一周。这一时期,孔祥熙情绪低落,告诉贾存德“事不好办”,要他“不要着急”。7月底,王子惠再派蔡森抵渝,会见孔祥熙,声称“如有谈判可能,彼方即行统一军、政、党意见,取消一切枝节活动,决定专责,以资进行”^④。其后,日方急于得知蔡、贾谈判消息,致电称,将

① 《敌情报告录呈参考》,“蒋档”。据贾存德回忆,以上五条由板垣以铅笔亲自书写,交王子惠转贾。见《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128页。

②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128页。

③ 同上,129页;参见孔祥熙《致介兄书》,1940年8月24日,“蒋档”。

④ 《敌情报告录呈参考》,“蒋档”。

派专机到广州迎接蔡、贾。孔祥熙觉得这又是一次好机会，于8月24日致函蒋介石，摘抄蔡、贾报告及有关电报，函称：“敌思结束对华战事，以便南进，可以想见。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函末，孔祥熙特别要求蒋介石“阅后付丙，不必交存”。又附言称：“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蔡、贾所述各节，亦有可以供我利用之处。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分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摩擦，于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①

板垣曾向王子惠表示，可以发出亲自签名的公文。孔祥熙向蒋介石上书后，要求蔡森回沪，取到板垣正式公文。又命贾回沪，暗中监视王、蔡二人。其后，二人即陆续离渝，经香港回沪。8月下旬，蔡、贾的行踪被军统在香港的特务发现，戴笠亲自向蒋报告，蒋即命戴笠向孔祥熙查询。9月上旬，孔祥熙复函戴笠，谎称吴复光系中央银行某职员别名，因受敌伪注意，调令来渝。蔡系靳云鹏旧部，受靳之命来渝报告北方情形，二人均系“普通人员”，敌人不会相信，更不会赠以巨款。^②其后，军统打入日方的特务毛丰又向戴笠报告，蔡森已于27日偕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东条佑铃专机飞沪，此事系日本实业家背后策动，曾拨款二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云云。^③9月10日，戴笠将有关情况再次报告蒋介石。同月19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敌人曾购买山西人蔡某等二人赴渝，携孔先生假信而归沪。现由敌人特许设电台通电，

① 孔祥熙：《致介兄书》，1940年8月24日，“蒋档”。

②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0日，“蒋档”。

③ 同上。

尚在乌烟瘴气中，此事尊处想早已闻及矣。”^①20日，蒋将有关检举报告转给孔祥熙，要他回答。22日，孔祥熙复函，首称检举报告“所载各节，恐多揣测误会，以讹传讹，原报告人有意邀功，遂不免捕风捉影，或另有作用者希图对弟中伤”。接着，孔向蒋辩白。一是孔祥熙致函板垣及头山满问题，孔称，蔡、贾来渝时，携有日本老友名片，向弟问候，弟因多年故交，在情理上不能不理，因此在蔡、贾临行之时，以名片回报，所谓寄板垣与头山满等人的亲笔函件，绝无其事。二是蔡、贾与王子惠、板垣的关系与接受巨额资助问题，孔称，王子惠派人赴港迎接蔡某，或有其事，但蔡、贾到沪后，是否赴南京，已否晤见板垣，均不得知。孔承认，蔡、贾来重庆之前，确曾与板垣会面；也承认，二人可能得到日方资助，但他说：“敌方实业家因反对军阀厌恶战事，渴望真正和平早日实现者甚多，既派其来，或有赠送旅费之事。若谓拨款二百万元，恐未必有此巨额。”他认为这些情况，“真伪无从证明”，属于敌人“内部互相猜忌，设词毁谤”。三是关于蔡、贾的身份与贾存德往来沪、渝之间的目的。孔在重申“调回”说之外，又加了一个“迁移眷属”说。函称：“上海沦陷业已三载，敌伪方面无时不思毁我法币，俾我财政不能接济军事，对中行人员极力压迫，彼等既无寸铁，政府亦难为保障，故不能不有一熟悉敌情者为我刺探消息，藉便戒备。贾在过去，虽曾任此项工作，因其参加倒汪运动，为汪方特务队所注意，前已将其调回。此次赴沪，即拟设法迁移眷属。至蔡本非弟之属员，亦无任何名义，在无所谓调回矣。”^②

蒋介石下令戴笠调查之后，陈布雷又于22日接到香港张季鸾的检举信，中云：“王子惠所购买之蔡、贾二人之事，其情形甚堪发指。盖敌人以专机送至广州，而公然入渝，其归也，亦由敌人由港接至广州，而专

① 焜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19日，“蒋档”。

②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22日，“蒋档”。

机送往上海。此辈宵小，本无足深论，然敌人贿赂之人而能公然出入重庆，且能带孔先生之假信而来，再不能以小事看矣。”^①陈阅后“甚感离奇”，立即转呈蒋介石。^②蒋阅后再致孔祥熙一函，严厉批评孔祥熙等人的行为“摇撼军心、人心”，显示“政府零乱”。^③同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而其幼稚欺诈，则非常情所能想像。若与之理会，必受无妄之祸。季鸾好事，庸之无方，为可叹也。”^④这里批评到了两个人。前者是指张季鸾于不久前到香港与和知鹰二谈判，后者则批评孔祥熙与蔡、贾等人的招摇。

蒋介石的批评很严厉，显然，孔祥熙要认真想想对策了。9月30日，孔祥熙于八天之后才复函蒋介石，函称：“今细绎手示，对蔡、贾实际情形，似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恐系根据一方面之情报所致。既承谆谆相告，弟不忍不略陈衷曲，期解疑虑。”

孔函除说明蔡、贾的身份及离渝情况外，指责情报提供者“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孔函特别说明，在接待蔡、贾的整个活动中，自己对蒋既无隐瞒，又持慎重态度，没有文字贻敌，更未假借蒋的名义，函称：“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人谅亦无此巨胆敢事伪造。”接着，孔函强调掌握敌情，善于利用反间的重要：“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

① 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1日晨，“蒋档”。

②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22日，内部排印稿，“国史馆”藏。

③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22日，“蒋档”。

④ 《困勉记》。

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弟虽愚,窃期期以为不可。故蔡之来谒,不能不见,惟所告之言,皆系勉以大义,并未派以任务,且暗示种种,使其有机会时,于不知不觉间言于敌方,以期于我有百利而无一害。”孔函还强调,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难免遭人误解,甚至遭到攻击,但自己完全出于忠诚:“弟亦深知接见此种人物,难免物议,小则受人攻击,大则自招巨祸,然为效忠党国,使我兄抗建大业早日成功,故不惜利用各种机会,各方力量,期达目的,从未对自己本身之安危着想。”^①

孔函接着分析日本少壮军人中的两派。甲派主张先用全副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然后再行南进,此种主张对于中国最危险,非极力破坏不可。乙派主张用温和手段,得到中方谅解后,再行南进。孔函由此论证利用乙派的必要及利用蔡森的正当。函称:“至乙派今日之肯降阶表示寻求和平者,确因千载不易得到之南进政策,今可不费力拾得之,故不容轻轻放过。弟既认定此时如能诱其南进,确属于我有益,前曾向兄言及,兄谓恐做不到,弟亦深知其难,不容强求,然苟有时机,弟以为不应放过,必随机设法暗示,希接近敌方者,于无形中促助其乙派之主张,故蔡来见时,弟亦晓以此意,暗示其促成。于上次报告中最后一页,业向我兄陈明。”

针对蒋函所批评的“摇撼军心、人心”之说,孔祥熙辩解道:“蔡此来,原出敌方之意。据情报所载,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人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人之军心、人心,而我之军心、人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接着,孔祥熙又反驳蒋的“政府零乱”说,声称:“蔡既来渝传达敌人之意,是时至今日,敌已深知欲谋全面之和、真正之和,非向我兄请求不可,亦非听由我兄裁

^①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30日,“蒋档”。

决不可，似无零乱之可言。”

孔祥熙在逐一反驳蒋对谋和活动的批评后，着重说明自己对蒋的耿耿忠心：“在过去二年中，弟对于敌伪或其他方面，凡有利于我兄之抗建大业者，均不惜任劳任怨以谋利用者，一则因承我兄重托，付以行政责任，不能推诿，一则因我兄为最高领袖，身任统帅，意欲保护其威望，故决志为国为兄，自甘牺牲，决不愿使我兄因一言一动，受有半点怀疑，致被奸人藉口攻击。”^①函末，孔祥熙表示，将遵蒋之嘱咐命人查究此事。函称：“现蔡、贾事，既蒙尊嘱，遵即饬查，如有假冒招摇情事，贾当撤职严办，蔡已托人设法予以警告。”自然，这是孔祥熙对蒋的敷衍之词。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很用心。在正函之外，还附有《情报摘要》两份。其内容之一是，褚民谊曾在南京宴会席间对人说：“先从倒孔入手，使重庆内政发生纠纷。”孔祥熙附呈这一情报，意在告诉蒋介石，所有反对他本人的行为，均有汪伪背景。其二是，张季鸾对人表示，衔蒋之命到港与日方谈判和平，到港前曾见蒋 11 次，等等。孔要求蒋阅读这些情报后“仍乞准予赐还，以便存查”，并称：“弟向不道人长短，在过去更不欲以此种复杂琐碎之报告，烦扰我兄心神。现在事既牵涉及弟，恐其中别有作用，不能不请兄注意，但仍不愿使他人知之，以为弟亦有所攻击，或影响人心也。”张之赴港，确系受蒋之命。^②孔向蒋呈送有关张的情报，其潜台词是，你蒋介石不也在和日本人建立联系吗？孔祥熙这一手很厉害，蒋自然无话可说，追查蔡、贾一事不了了之。

蔡、贾回到上海后，即列席王子惠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所举行的会谈。岩奇称：“中国的维新大业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才能成功”，“要共同防共，中国方面就需要邀请日本在华北边区枢纽地留兵协助”。会议

^①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30日，“蒋档”。

^② 参见本书另文《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记录提出,察哈尔、绥远铁路线及北平、奉天线各枢纽地均由日本驻兵。至此,贾存德才发现上了王子惠与日方的当,拒绝签字。会议不欢而散。1944年9月,贾存德在上海会晤日本“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得知和知与板垣之间存在矛盾,深感变化难测,打电报给孔祥熙,声称才识不足,难以胜任,自此退出与日方的谋和活动。^①可见,此前孔祥熙并未对贾采取“饬查”、“撤职严办”等举动。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孔祥熙在1940年9月20日函中向蒋介石表白:“弟在过去,凡有所闻,均曾择要抄陈,后因奉命,亦即停止。”似乎他在与日方谋和中,所有重要事情都曾向蒋汇报,而且奉命即止,没有违背过蒋的意志。读者从上文中已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下文我们将进一步提供新的论证。

根据日文档案,早在1938年6月,孔祥熙即派遣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谈判。二人先后在6月23日、28日,7月1日、13日、18日、19日多次会谈。在7月18日的会谈中,乔曾转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

1. 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

2. 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

3. 承认内蒙的自治。

^①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片断》。

4. 决定华北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

5. 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6. 虽然还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

7. 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来说,(日方)虽有赔偿的要求,亦无力支付。^①

以上七条,包括实际上承认伪满、承认内蒙“自治”、设立非武装地带等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谈判中,乔辅三向中村丰一称:“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直到今天,也还有学者坚信乔辅三的这一表白。其实,档案资料证明,这些条件和蒋在对日秘密谈判中一贯坚持的条件完全相反。档案资料也证明,孔祥熙从未向蒋汇报过上述条件。上引8月11日孔祥熙致蒋函称,他之所以不拒绝和日方谈判,“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作过类似保证。可见,孔祥熙的上述条件是背着蒋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仅如此,连派乔辅三赴港谈判一事对蒋都是完全封锁的。现存蒋档中,孔有许多关于秘密谈判的汇报,但是,没有一件提到乔辅三。在必须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饰。如1938年7月6日孔令侃致孔祥熙,又由孔转蒋的电报说:“据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该领事称:‘钧座在位,各事总有办法。’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下野为条件之意。当以此种观念决不能任其系怀,故照钧座在汉面谕,对该领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钧座负责主持,如确有必要时,钧座当可辞卸。”该电所称驻港日领事,指中村丰一;

^① 日本外务省档案,S487号,中译文见《孔祥熙其人其事》,135~136页。

钧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蒋介石。其中所称“所派与驻港领事密洽者”,显然就是乔辅三。之所以不称其名,说明孔祥熙父子不愿意让蒋了解乔赴港谈判的真情。

在对日秘密谈判中,孔祥熙对蒋介石所作的隐瞒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蒋一再嘱咐,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孔也屡称“遵嘱”,但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挥贾的活动。又如马伯援赴港谈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马伯援所写,经孔祥熙转蒋的报告却说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适日友萱野长知亦在该地,时相过从。”之所以这样写,完全因为此前蒋介石已不只一次与孔谈话,要他停止谋和。此外,孔祥熙还长期利用曾是共产党员,后向国民党自首的胡鄂公^①在上海与日方谈判,次数频繁,接触面很广,但是,孔祥熙也从未向蒋汇报过。

孔祥熙长期追随蒋介石,和蒋利益相共,荣辱与俱。但是,他却背着蒋一再向日方谋和,甚至在个别谈判中向日方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长期抗战丧失信心。从本文前引他写给蒋的多通信件看,他认为国内财政极端困难,国际援助又毫无希望,因此才一意主和,谋求妥协。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祥熙与日方的秘密谈判除谋求妥协外,也还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敌情,扩大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分歧;阻挠、延缓汪伪政权的成立;引导日军南进,减弱中国战场压力等多种原因在内。因此,孔的谋和活动与汪精卫有别。1940年以后,孔的谋和活动基本停止。他在协助蒋介石掌控战时经济,保证抗战资源方面还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的。

^①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有胡鄂公者,籍隶鄂省,曩为国会议员,嗣与李大钊等加入共党。民国廿三年间,经生处在汉破获拘禁,旋奉经准予自首,并交由生处运用。”见“蒋档”。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加批评、阻遏,而孔祥熙则一再坚持,多方联系,并且背着蒋向日方提出严重的妥协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蒋、孔二人虽公私关系均极为密切,但二人在对日态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卢沟桥事变后,孔祥熙在伦敦致电蒋介石,分析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态度,反对立即抗战,电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把握,似宜从长考虑。”“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①21日,蒋复电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30日,孔祥熙再次致电蒋介石,询问“中央今日作何主张”,蒋复电称:“中央必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之余地矣。”8月3日,孔再次电蒋,以“我军处处失利”为忧,蒋则复电表示:“战事果起,弟确有把握,请勿念,一时之得失不足计较也。”这些地方,说明二人在对日抗战问题上确有分歧。1995年,我在《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一文中,曾判断“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当时我认为孔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这一看法需要修正。^②

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当年5月,蒋日记云:“日本军阀,攻破我济南,在彼以为

① 本电及以下各电,均见《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7A-00085。

②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见本书另文。

得意,而结此中日世仇,不能再忘,是其军阀之害国,甚于中国之军阀也。”^①又云:“倭寇第一条要求为总司令谢罪。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②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手,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这就将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他再不抗战,必将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他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③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勉之,勿惑众议。”^④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1938年1月22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如国内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灭矣!”^⑤可见,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完全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都时时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蒋日记称:“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

① 《爱记》,稿本,1928年5月12日,台北“国史馆”藏。

② 《省克记》,稿本,台北“国史馆”藏。

③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780页,中译文见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164页。

④ 《困勉记》。

⑤ 同上。

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①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其不断膨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外虽强而中干,有其虚弱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艰苦,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又写道:“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②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任何妥协协议,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原因。

一切战争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作战到底,直至敌方完全被消灭或投降;一种是双方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适可而止。至于“和平”协议,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敌,丧权辱国;一种是有利于己,无损或基本上无损国家主权。以上种种,都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941年之前,蒋介石长期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举棋不定。蒋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付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档案资料证明,

① 《事略稿本》,1938年8月18日。

② 《困勉记》,1938年1月10日、13日。

蒋本人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谈判,有关情况,请见本书所收《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一文。

本文为提交2006年7月在溪口召开的中华民国史国际讨论会的论文,原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略有改动。



“桐工作”辨析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三

日本侵华期间，曾多次向中国方面“诱和”，其中，最为重视的是1940年铃木卓尔、今井武夫在香港和张治平、“宋子良”等人所进行的谈判，日方称为“桐工作”。至今日本文献中还留有大量资料，有些史家即直接、间接地据此证明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方面的动摇和妥协。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关系重大的谈判却始终缺乏中文资料的证明。本文作者查阅了保存在台湾的蒋介石档案，发现其中有不少和“桐工作”相关的文件，将这些资料和日文资料两相比照，便会发现双方记载差异很大，真真假假、扑朔迷离的情况极为严重，但是，仔细查勘辨析，我们仍然可以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比较确凿地揭示出事件真相。

谈判过程与日中双方记载的异同

关于“桐工作”，日文档案集中收藏于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题为《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为当年日本军令部第一部相关文电的汇编。^①“桐工作”的参加者今井武夫1964年出版述及此事的回忆录时，也收录

^① 档案号：支那事变全般——127。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所著《大东亚战史》大量引述了该项档案。该书有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本，与本文论述有关者分别见于《战前世局之检讨》、《对中俄政略之策定》两册，台北，1991。

了部分当年文献。中文资料则有中方谈判参加者张治平的报告,军统局戴笠向蒋介石的报告,军统局审查张治平时留下的文件,时在香港、参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致陈布雷的多通函件等。

比较日中两方资料,可以发现,双方对谈判的缘起、经过的叙述存在巨大差异。

(一)谈判缘起。

日方资料记载:1939年10月,日本在中国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11月底,起用原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担任香港机关长,寻找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路线。12月,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要求会见宋子文的胞弟、时在香港担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宋初则拒绝,后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夜,双方第一次会面。宋提出:日本如尊重中国的名誉及主权,中国有和平的准备,为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新中央政府”(指汪精卫政府——笔者)之前和国民政府认真商谈;先行停战,日本方面保证撤军。宋同时提出:日本对于不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是否可重新加以研究?能否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能否向蒋介石个人提交有关和平的亲启书信?^① 1940年1月22日,双方第二次会谈,宋称:重庆方面仍具有日本预料不到的抗战实力;目前看不出蒋介石有与汪精卫合作的意图,毋宁说正在努力破坏汪的组府计划。宋并称:通过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两三周内将赴重庆。如有需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

^① 《香港电第81、82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回忆录》,329~330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进行转告。^① 2月3日,双方第三次会见。宋子良称:希望进一步获悉日方的真意。本人将于2月5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10日将携带会谈结果回港。2月10日,第四次会谈,宋称:自己已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蒋于2月7日召开国防会议,决定派出代表或最受蒋介石亲信的人物来港。铃木卓尔当即询问:“上述代表是否随身携带蒋介石的委任状?”^② 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到达香港,偕同铃木与宋子良、张治平会面。宋称:重庆方面将派出携有蒋介石委任状且与日本方面有同等地位、身份的代表,并称宋美龄已到香港。双方同意在香港召开日华圆桌会议。

中方资料不如日方资料详细。据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作书面报告,其经过是,七七事变后,张治平到香港避难,从事教育与新闻事业。1939年11月,日本驻港武官石野(芳男)去职,由铃木卓尔中佐继任。铃木是张治平“抗战前的老友”。1940年1月中旬,铃木从日本驻港总领事岗崎(胜芳)处得悉张的寓所,突然登门拜访,向张坦白陈明此次来港所负使命,要求撮合。张当时告以此事不敢过问,将来有此路线时,再行通知。1月末,张治平偶与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曾政忠谈及,曾即介绍军统在香港的另一工作人员卢沛霖与张“餐叙”。不久,曾政忠告张称:卢已奉令,“允于特工、情报范围内与敌周旋”^③。张转告铃木,铃木致电今井武夫。今井和张治平也是老相识,有“十余年旧谊”。2月8日,今井武夫约同大本营第八课课长白井茂树大佐共同来港,与张治平、曾政忠在康乐道十七号空屋内会谈。10日,今井武夫提

^① 《香港电第126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见《今井武夫回忆录》,331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334页。

^③ 《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凡未注明者,均同。

出觉书八项,张电呈重庆后,又将原件寄呈。2月17日,张治平奉电召到重庆,报告经过,得到训示:“该觉书之荒谬,尤对于伪满问题、内蒙驻兵问题与汪逆问题,认为敌方之妄想。”^①张治平返港后,即偕曾政忠会晤铃木,“面斥其非”。同时通知铃木:“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②铃木应允亲去东京、南京交涉后再谈。^③

上述两方资料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起始时间:日方资料在1939年12月,而中方资料则在1940年1月。2. 会谈次数:日方资料有1939年12月27日,1940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14日等五次,中方资料则仅有2月8日、10日两次。

1940年9月8日,张治平被审查时曾向戴笠递呈书面报告,中称:2月10日,今井武夫曾向中方提交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但今井武夫到达香港的时间为2月14日,当日日方记录中无此内容。^④ 经查,今井武夫向中方提出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时在3月9日。关于此点,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呈书面报告是错误的。详见下文。

① 《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

② 《张治平申辩》,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③ 《张治平致戴笠报告》,1940年9月8日。

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129、335页。今井在出版回忆录前,曾于1956年12月8日在《读卖周刊》先行发表《今井武夫少将手记》。据《大东亚全史》编者考证,该《手记》文中的日期与畑俊六日记等其他史料之日期完全一致,内容也没有出入。(《战前时局之检讨》,319页)今井写作回忆录时,利用了他本人的日记和存世档案,因此所记日期仍然比较准确。例如,今井回忆,他曾于1940年6月12日,偕同影佐少将会见周佛海,说明板垣、蒋介石、汪精卫将在长沙会商,要汪参加。周向汪报告,次日,周称,汪可以去长沙。所述日期和内容与周佛海日记完全相合。今井的回忆录出版于1964年,而周佛海日记至1986年才公布。这种情况,说明今井当年必定留有确凿的记载。

(二)3月香港圆桌预备会议。

日方资料记载：今井武夫会见张治平后，于2月19日赴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汇报，21日，由参谋次长稟明天皇。3月7日晚，日中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座谈。8日晚，正式会谈。日方出席者为今井武夫大佐、臼井茂树大佐、铃木卓尔中佐；中国方面出席者为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章友三（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宋子良、张汉年（陆军少将、侍从次长、香港特使）、张治平（联络员）。会上，日方出示陆军大臣畑俊六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所开身份证明书，中国方面第一天未带来委任状，第二天由陈超霖和章友三出示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身份证明书。^①中方称：出发之际，蒋介石提出，应取得日本撤军的保证；应明确日军的和平条件；应使会谈在极端秘密中进行。当日就中国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华驻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9日会谈中，日方提出备忘录（觉书）八条，其重要者为：第一条，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第二条，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第三条，日华缔结防共协定，允许日军一定时期内在内蒙及华北地区驻兵；第七条，停战协定成立后，国民政府与汪兆铭派协力合作。^②10日中午，张治平通知铃木，中国方面委员彻夜协商，大体同意备忘录，已向重庆请示。同日晚，中方声称接到蒋委员长的长篇训词，另提“和平意见”八条，其主要内容有：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方式另商；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

①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今井武夫回忆录》，339页，参见同书第131页。

② 《备忘录》，《今井武夫回忆录》，137～138页。

关于汪兆铭问题,此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汪氏与国民党历史之关系,中国当有适当处置,毋庸提为和平条件之一;关于撤兵问题,日本应于和平妥协时,从速撤退在华军队。^①中方建议,两方各自分别在“备忘录”与“和平意见”上签字,遭到日方反对。

3月23日,汪精卫预定在南京成立“新中央政权”的前三天,铃木应宋子良紧急之邀,与宋会谈。宋称:有蒋介石急电,望转达板垣征四郎。蒋对日方“备忘录”大致无异议,但承认满洲国问题遭到东北将领反对,正努力说服,要求日方推延汪政权的成立时间。铃木答以重庆方面须立即派遣秘密代表谈判,并于25日前答复。^②至期,重庆方面没有答复,汪精卫遂于30日在南京举行“还都式”。

戴笠呈蒋介石的报告中保存有一段《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中称:“本年二月,由渝返港后,曾告铃木,欲谈和平,须先撤销汪伪组织,并应有进一步之具体表现。当时铃木唯唯久之,往反纠缠,毫无表示。三月中旬,呈奉电令,以敌无诚意,遵即置之不理。”^③这一《陈述》完全未提3月7日至10日的香港圆桌预备会议及3月23日的紧急会谈。但是,其后张治平在被审查时所写《致铃木先生函》中则称:“今年一月间,先生在港过访,密告负有斡旋中日两国和平之重要使命,请平向我政府方面设法沟通接洽和平之路线,故有本年三月七日香港之会谈。当时,除平与先生及今井先生外,尚有敝友章友三先生在座,结果先生出示今井等所提所谓中日和平之八项觉书内容交平设法转达我政府。”^④根据此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139~140页。

② 《(日本)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210号,《桐工作关系资料缀》,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藏,支那事变全般——127。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日文档案,均同。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260页。

③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④ 《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

函,可见确有3月香港圆桌预备会议,并且确有包含八项条件的觉书,与今井武夫的回忆相合,同时可证张治平被审查时向戴笠所呈报告中关于此点的谬误。

(三)5月九龙四人会谈与今井、宋子良二人香港海上会谈。

日方资料记载:3月25日之后,铃木与宋子良继续接触。宋强调:“重庆方面有和平诚意,在努力实现中。”^①4月16日,张治平自重庆返港,声称15日曾面见蒋介石。^②5月13日,日方代表今井、铃木、坂田与中方代表章友三、宋子良在九龙半岛一旅馆会见。章称:“当前和平的难题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这可以暂放它一放,留待日华恢复和平后,再谈判解决。”“只要秘密预备会议日华双方取得一致意见,日华两军即可停战。同时,重庆政府将发表反共声明。因此,希望在六月上旬仍由上次的原班人马在澳门举行第二次会谈。”^③此次会谈时,铃木从门锁匙孔中偷拍了宋子良的照片。17日,今井应宋子良之邀,在香港海面的小艇上会谈。宋称:蒋委员长“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④。

九龙会谈在中方文献中毫无反映。1940年5月底张治平致戴笠报告称:他在4月自重庆返港后,即遵照上级意见,不再和铃木卓尔往来。其间,铃木曾数次访问张治平,张均以现任香港大学教授兼德国通讯社记者身份,“以采取情报之立场”与之会面,告以“中国决不能接受

①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232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263页。

② 铃木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所作报告,1940年4月26日,见时在中国派遣军担任记录的井本熊雄的《井本日记》,转引自《战前世局之检讨》,264页。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143页。

④ 同上,144页。

任何有损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条件”。^① 铃木卓尔知道自己的企图失败,于4月21日应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之召赴南京,5月4日返港,再次邀请张治平面谈,张“婉词拒绝”。其后,铃木派秘书增田会晤张治平,通报铃木此次赴宁返日,会见板垣、今井及参谋次长泽田茂等人的情况。据称,日本首脑部曾研讨中国不能接受和平的原因:1. 中国在承认“满洲国”及防共驻兵两个问题上,或者不可能接受日本要求,日本为顾全东亚全局,获得真正和平,可放弃此项要求。2. 中国如同情日本的善意,日本愿在双方获得谅解之后,运用适当方法,毁灭“共党”力量,消除中日和平的阻力。又称,板垣对中国处境困难,颇能了解,故对和平条件,并无任何苛求,日本所亟须明了的是,在双方停战或成立协定后,中国是否可以发表“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的宣言(同时日本方面也发表撤兵言和宣言)?或是到如何时机,如何阶段,可共同发表此项宣言?这样,日本撤兵才有所根据,不致被认为是“战败溃退”。戴笠收到张治平上项报告后,于5月23日以《情渝二三四五号》呈报蒋介石,同时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②

《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称:3月中旬,接奉电令,敌人无诚意,勿再与铃木卓尔晤谈,张即遵令置之不理。其后,铃木的秘书增田多次求见,增田并于5月间提出和平意见五项,内有“日本对汪政权拟于一二月内不予承认,预为中日和平之最后时机”等语,奉准再与铃木卓尔晤谈,“仍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条件”^③。

以上张治平的两份资料,绝口未提九龙会谈与香港海上会谈。

①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②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③ 同上,1940年9月15日。

(四)6月澳门会谈。

日方资料载：6月4日晚，今井武夫、白井茂树、铃木卓尔在澳门与陈超霖、宋子良、章友三、张治平会谈，地点为中国方面所租的一所空房的地下室。日方出示闲院宫参谋总长的委任状，中方出示由蒋介石署名，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介石小印的委任状。^① 宋子良所用名字为宋子杰。会谈以香港备忘录为基础。章友三以空前激烈的态度表示：中国对“承认满洲国及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绝对难以承认”。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他要求日方居中斡旋，或命汪出国，或命汪隐退。^② 日方对章的发言表示反对。会谈两天，无结果。6日，宋子良、张治平到旅馆访问今井武夫，双方磋商后提出，由板垣、蒋、汪三方先行会谈。其地点，日方提出在上海、香港、澳门三地中选择，中方则提出在重庆或长沙。当晚，双方代表再次在原地下室聚会，中国方面提出备忘录：满洲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外交方式解决之；驻兵问题于和平后，由军事专家秘密解决之；汪精卫问题，另行商量。日方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书：承认满洲国的时间及方法，留有协商余地；驻兵问题以秘密协定方式约定。^③ 6月10日，今井武夫返回南京汇报，板垣征四郎对与蒋、汪的“巨头会谈”极感兴趣，表示有主动进入敌区的决心。20日，宋子良转达重庆意见，要求将三人会议的地点设在长沙。^④ 22日夜，板垣征四郎向汪精卫说明谈判情况，汪同意参加三人会谈，但希望地点在

① 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桐工作关系资料缀》中有副本。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151页。

③ 同上，151~154页。

④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10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307页；《今井武夫回忆录》，155页。

至急親展
極秘電報譯
六月十七日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七日 一三三三番着
次長宛
香港機関
特香港電第三〇五號
十六日ニ於ケル會談ノ經過次ノ如シ
一、リ、ゲ、チ、三者會談ニ對スル當方ノ強キ
主張ニ對シテハ先方ハ之ヲ受諾シ得ルノ
用意アルエトテ反カシタルモ澳門會談ノ
結果ニ鑑ミ蔣介石ハ事前ニ於テ一應三
者會談迄ニ和平條件ニ関ル中央對日
委員會ニ納得セシムルノ要アルヲ以テ正

日本进行“桐工作”的相关电报(采自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

洞庭湖上。24日,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泽田茂到南京,传达参谋本部意见:承认满洲国及在华驻兵问题,均不作为“强行之条件”^①。22日,铃木向宋子良提出,为保障安全,如会谈地点选定长沙,则必须交换进行会谈的双方最高负责人的备忘录。30日,铃木向宋子良提出会谈的四种方案,供中方选择。其一为首先举行蒋、板长沙会谈,继之以停战,再处理蒋汪合作问题。^②

① 《畑日记》,1940年6月25日,转引自《战前世局之检讨》,309页。

②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28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311~312页。

张治平《致铃木先生函》称：“先生复再告奋勇，驰往南京、东京，将图挽救也。返港后，又力表诚意，要求继续谈商，故有六月三日在澳门作第二次之会谈。当时在座者仍为平与敝友章友三先生与先生及今井、白井两先生也。平乃以贵国既有诚意，表示求和，则应撤销汪精卫之伪组织为先决条件，否则无以表示贵国求和之诚意也，但今井等当时则称对撤销汪伪组织问题，贵国为顾全信义，碍难办到，平与章友三先生则坚决表示，如贵国不能先行撤销汪伪组织，在吾人无继续晤谈之可能。”^①

6月27日，张治平致电戴笠称：当月26日，铃木卓尔再次访晤张治平，声称日前赴粤，会晤今井武夫、白井茂树二人，得知板垣征四郎意见：“只须中国方面有和平诚意，则前言去汪而后言和，则亦未尝不可。惟于日军占领区内进行此事，既与日本信义有碍，且日本亦将起而革命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板垣提出两个方案：“1. 委员长如能予以谅解，请指定地点如长沙或重庆，板垣当偕同汪逆前来谒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当面请和。2. 由委员长指派干员，在中立地点，如香港或南洋等地，约汪逆商谈中日大事，板垣当策动汪逆前来晤谈，则汪逆既离日本之占领区域，则一切悉听中国之处置。”板垣称：除此两办法外，并无其他先决条件。“无论此事之结果如何，中国必须履行诺言，开始和平谈判。至于日本方面所持之和平意见，大致如前次所提之觉书，惟其中关于承认‘满洲国’及防共驻兵问题，暂可不提，留待将来用外交途径或他种方式解决之。”^②板垣表示：自愿提供一份“觉书”，由板垣本人与西尾寿造或畑俊六共同签名，申述愿意亲来长沙谈判的诚意。在转述板垣意见后，铃木要求中方在会谈前十天通知日方；除板垣外，届时汪精卫、今井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

②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武夫、白井茂树及其他军事、经济专家数十人将参加，有一艘小型轮船即足用；如中方要求陈公博、周佛海等同来，日方亦愿考虑、乐从。^①

比较上述日中两方资料，其相同点为：中方对汪态度转趋激烈，双方均同意举行板垣、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会谈；其相异点为：铃木卓尔与张治平会晤时转述的板垣意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云云，在日文资料中毫无影迹可寻。

(五)7月会谈。

日方资料载：7月9日，宋子良向重庆请示后返港，提出新方案——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先行于7月下旬在长沙商议中日停战问题，蒋介石与汪精卫的会谈则于蒋、板会谈后另订。^② 铃木同意这一方案。7月11日，中国派遣军参谋片山二良携带《中日实施停战会谈之备忘录》到港。该备忘录由板垣亲笔书写并盖章。其内容为：一、时间：7月下旬。二、地点：长沙。三、方法：蒋与板垣协议中日间之停战问题。^③ 16日铃木卓尔与宋子良会谈中，宋主动提出，将建议派出蒋介石和板垣二人都信任的高级人员到汉口，迎接日本代表，日方则要求这一高级人员必须是张群、孔祥熙或何应钦等。^④ 会谈时，宋子良还曾要求板垣携带天皇敕命，遭到铃木拒绝。^⑤ 7月20日，陈超霖、章友三携带蒋介石亲笔所书备忘录到达香港，其内容、格式均与板垣备忘录相同。

①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②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42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314页。

③ 《支那派遣军总参谋长致参谋次长》，总参二特电第468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315页。

④ 同上，总参二特电第480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316页。

⑤ 同上。

21日,铃木、片山与宋子良、章友三会议,相互出示备忘录。铃木、片山共同研究,认为蒋介石所书备忘录与澳门会谈时中方出示的委任状字迹完全相同,确信为真迹。日方企图偷拍未成,只在匆忙间拍得“蒋中正”三个签字,随即模仿复制,送往南京审查。^① 22日,铃木与宋子良(署名宋士杰)签订备忘录,将板、蒋会谈时间改为8月上旬。会后,章友三赴重庆请示。27日,今井武夫偕片山二良少佐返回东京,向近卫首相及陆、海军省人员报告,近卫大感兴趣,要求“好好地做下去”^②。29日,章自重庆致电铃木,要求与张治平共同访问东京。31日,章返港,与铃木继续会谈,声称近卫既第二次组阁,应发表声明,明确取消1938年的“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第一次声明,同时提出:板、蒋会谈时,不可提及“蒋汪合作”问题;板垣应以亲笔函表示,取消日汪条约。对此,铃木答称,将争取在板垣亲笔函中声明:“(日方)虽提出善意的意见,但不作为停战条件处理。”^③

中方资料载:7月2日,张治平致电戴笠,报告前一日与铃木再次见面的情况。据称,铃木表示:板垣不仅亟欲与中国言和,而且希望在结束战争后进一步与中国商订军事同盟。此项计划,已由今井武夫拟成草案,其主要精神为:1. 仿照旧时英日同盟形式,双方均处于绝对平等地位;2. 消除中日两国之一切误会,力图东亚民族之富强,以抵抗外来之一切压力;3. 经费共同负担;4. 设立最高机关,双方人数相等;5. 以中国之行政院长与日本之首相充任总裁;8. 有效期无限;9. 不干涉同盟国内政;10. 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铃木并称:“板垣之意,以为此次中日战争实为历史上最愚笨之行为,及今只得痛自悔过。”7月3日,戴

①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61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317页。

② 《大野大佐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8页。

③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77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8~18页。

笠复电,指示张治平称:“敌方明知汪逆之无用,而仍不肯牺牲之,甚至谓将由板垣偕汪逆来见委座,当面言和等情,足证敌方之无言和诚意,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之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①

7月26日,张治平再次向戴笠报告称:据铃木卓尔相告,板垣征四郎曾于最近偕同今井武夫返回东京,觐见天皇,并与海陆军及参谋本部首要磋商,决定电知张治平,“作末次之试行沟通”^②:1.板垣奉天皇令前往长沙,向委员长当面求和;2.日本不提任何条件,双方精诚相见,停战协定成立后,日本迅速撤军;3.板垣与委员长会谈后,日本保证不干预中国内政,汪伪政权亦听由中国自行处理;4.前次所言由板垣带同汪逆赴长沙,意在交还我中央自行处理,并非带同谈判。今为免除外间误会,可以不带汪;5.板垣与委员长会谈时间,愈速愈佳。上项办法,如中方同意,日方即派员来港,将天皇保证文件交我,磋商板垣赴长之技术问题。^③

比较上述资料可见:这一个月最大事件是谈判双方相互出示板垣与蒋介石的亲笔备忘录,但张治平在向戴笠汇报时,绝口未提;而所谓板垣“痛自悔过”及准备在战争结束后订立日中“军事同盟”一事,也不见于日方记载。^④中方文献所称日方可派员送交“天皇保证文件”一事,日方资料的记载则是,宋子良有过类似要求,但遭到日方拒绝。

①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② 并无此事。据今井武夫自述,他在7月底去东京,30日会见第二次出任首相的近卫,近卫希望谈判成功,但在31日会见新任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时,东条却认为铃木与中方的谈判是“派遣军的越权行为”。见《今井武夫回忆录》,157页。

③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④ 日方内部文件《调整日华关系的新原则》有“日、满、华三国”结成“东亚和平之轴心”的提法,见《今井武夫回忆录》,337页。

(六)8月会谈。

日方资料载：8月4日至11日，双方多次会谈。日方称，阿部信行与汪精卫之间正在举行会议，日汪条约尚不存在。中方同意板垣在亲笔函中声明，不将汪蒋合作问题作为停战条件，并称已决定派张群迎接板垣与会。^①中方表示，不再要求近卫发表新的声明，但近卫必须向中方提交亲笔私人函件。铃木同意提交近卫私函，但强调中方必须同时提交蒋介石的私函。13日，中方提出折中方案：日方须先提交近卫私函，然后中方才提交蒋介石的亲笔答函。铃木对此表示为难，但称须到南京，请上司裁定。^②

14日，铃木赴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汇报：“宋子良其人断定为真。”“张治平为人可靠，与重庆中枢联络确有其事，假设本工作未直接通达蒋委员长，但至少秘密通达是不难想象之事。”^③19日，臼井茂树、铃木卓尔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一起商定板垣与近卫首相致中方亲笔函的内容，同时完成板垣亲笔函的起草：“关于汪、蒋合作问题，为达成日华之间，特别是中国内部之圆满和平，必要时可能将会提出善意意见。但依据不干涉内政之原则，不作为停战条件之一。”^④21日，铃木赴东京，向陆军省首脑汇报，会上，代近卫首相起草了亲笔函：“半载以来，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之代表在香港就中日两国间的问题交换意见，已获结果，欣闻阁下近期将与板垣中将会面，余深信此

①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88号。参见《对中俄政略之策定》，23页。

② 铃木中佐报告，1940年8月17日，见《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26页。

③ 《井本日记》，《对中俄政略之策定》，27页。

④ 《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30页。原译文字蹇涩，本文有所校改。

次会谈必能奠定调整两国国交之基础。”^①22日,东条英机、白井茂树、铃木卓尔等谒见近卫首相,近卫欣然同意。^②28日,铃木卓尔回到香港,当夜即与26日自重庆归来的章友三会谈。^③

中方资料载:戴笠收到张治平7月26日的汇报后,正拟向蒋介石报告,收到军统南京区8月1日电,声称,当地盛传日军参谋本部白井大佐来,由犬养健陪见周佛海,周向其亲信杨惺华称,如能实现和平,我与影佐甚至板垣均愿前往,虽有意外,亦所不辞。云云。戴笠当即密令张治平,“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④。其后,戴笠又先后接到张治平的电报,声称:1.板垣征四郎续电在香港的铃木卓尔,大意谓,日本内阁虽经改组,但对中国求和之意如旧,板垣本人已获日皇训令,静候我中央许可,径赴内地,同时保证取消一切伪组织,以之作为求和先决条件。2.铃木卓尔最近接东京训令:甲、近卫决定,可先发一宣言,取消从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乙、由板垣立具亲笔保证书,保证中日议和后,日本决不理睬汪伪政权,完全由国民政府处决之,此后日本决不再干预中国内政。铃木称:板垣奉天皇令,向中国最高当局求和,请中方决定地点;为求得信任,日方可立即由近卫亲书保证求和之诚意,转交中国最高当局。^⑤8月12日,戴笠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蒋介石,请求指示。

据《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称:8月14日,铃木离港飞往南京,同月28日回港,约张治平晤谈,声称今井武夫、白井茂树将在澳择期会见。会谈中,铃木出示板垣的亲笔保证书及近卫亲笔函件。事后,张治平向

① 《石井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31页。译文有校改。

② 同上。

③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351号。参见同上书,33页。

④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⑤ 同上。

戴笠请示“应否接受”，“奉令先探内容具报，暂缓接受”。^① 又据《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称：8月28日铃木卓尔返回香港，催促张治平往阅板垣亲笔保证书后，其后即由张缮具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陈重庆。^②

关于铃木此次返港所谈，军统香港区工作人员叶遇霖在致戴笠“冬电”中有更详细的汇报。该电称：据铃木卓尔告，铃木于8月14日经台湾赴南京，会见板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次，并曾会见汪精卫。21日至东京。22日，偕陆相东条英机及白井茂树总参谋谒见近卫首相，同进午餐，会谈至下午三时半。铃木告诉中方称：此次无论在南京、东京，均竭力要求先毁汪组织，再进而与中国议和，而日本当局方面则担心迄今谈判的中国代表的真实性，更担心“毁汪之后，向何人交账”。会谈决定由板垣出具亲笔保证书。铃木并称：“（汪）为日本政略之工具，可有可无。近因吾人之活动，近卫竟拒绝与汪晤面，阿、汪谈判已暂告搁置。”“（日本）事实上已不支持汪伪组织，在汪伪组织不毁而自灭矣。”但是，铃木也表示：“中日如万一无和平途径可觅，则日本亦只有利用之耳。”铃木出示的板垣保证书为：“为日华国交，尤其为助于中国内部之圆满的和平，或须有关于汪提起善意的意见之场合破坏，该问题基于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原则处置之，决不认为停战条件之一，兹为保证之。板垣征四郎。”铃木并称，自己已获得近卫与板垣的授权，还带来近卫首相的亲笔函，要求中国方面转呈蒋介石。^③

上述资料显示：双方叙述虽仍有诸多不同，但为准备长沙会谈，铃木卓尔确曾先飞南京，取得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后又返东京，谒见近卫首相，取得近卫的亲笔函件。

①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1940年9月4日。

通观日中双方留下的资料,可以发现,双方记载有若干相合之处,但是,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相合处,自然可以确认其真实性;其差异处,就需要进行仔细的考辨了。

军统局对张治平的审查与日方“桐工作”的结束

抗战期间,军统局负有收集日方情报的任务。张治平与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谈判后,戴笠非常关注,不断向蒋介石汇报,也不断给予张治平指示。当他获知日方代表携带近卫首相的亲笔函及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到港后,即于9月4日转报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接受上述两项文件。两天之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原来,8月下旬,板垣征四郎为加强“桐工作”,将和知鹰二少将派到香港。和知,广岛人。长期在华进行特务工作。1928年任职于日本在济南的特务机关。1932年任日本驻广东武官。1935年任太原机关长。1938年任兰机关长,负责策反中国的西南军政首长,此项工作即被称为“兰工作”。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部付”。次年5月升少将。和知鹰二不相信铃木所述的可靠性,向时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询问“真相”。张自1938年起,即在香港和日方各色人物联系,刺探消息,供蒋介石决策参考。他从和知鹰二处得悉张治平等与铃木谈判的情况后,于9月2日致函在蒋介石的侍从室任职的陈布雷,汇报所得消息,分析日方何以相信张治平、铃木谈判的原因:一是最初之交涉人携有“委员长之委任状”——“研究对日问题咨议”;二是“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三是华方交涉人张某、陈某中间曾要求板垣来一信,向华方示阅,而数星期后华方交涉人得到委员长之回信,亦交日方

阅看，日方将此信照相带回。张季鸾指出：“此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张函并称：“最后华方又要求近卫须有所表示，故近卫来一信。据称，长沙之会见及岳军先生之赴汉，皆先已商妥者，现在仅余画龙点睛之正式决定而已。”^①但是，张季鸾判断，所谓委员长亲笔函件及军委会委任状均“彻底为捏造之故事”，“显系受骗或互欺”。其根据为：“我领袖何以能有回信，此在常识上尽可判断者。”“所称交涉人有委任状，根本即是虚假，中国政府永不会派出有委任状之人找日方接洽。我军事委员会现在亦根本无咨议之官衔。”张季鸾猜测：“此事始终与汪逆、周逆有关。”他要求严查此事，函称：“惟有一点不容忽视者，即有人敢伪造委员长之信件，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以彻查。”^②9月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认为：“此案敌人陷于极可笑之失败，但我亦曾受不利之影响。盖因此使敌人看轻，认为易与，同时，使汪、周便于作祟，故必须彻底纠查，目前最须严防者，为再出现委员长复近卫之假信。”他建议：“可令张治平来渝，即禁其离开，而从容询查之。”^③

蒋介石得悉张季鸾向陈布雷所报情况后，大为生气，判断张治平为汪精卫的“探子”，于9月6日指示戴笠审查。当日，戴笠紧急与已经应召来渝的张治平谈话。张强调自己的忠贞，声称在与日方八个月的周旋中，“我方坚持非去汪不可”。戴笠则认为日方一定有假，他说：“敌方既不肯毁汪，在铃木之来找我中央路线，必故作圈套，一面则表示诚意与我言和，一面则故放中央有讲和空气，企图国内外对中央都减少信仰呢！”^④

① 《焜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

② 同上。

③ 同上，此函署9月12日，从内容判断，应为9月3日之笔误。

④ 《戴笠与张治平谈话经过》，1940年9月6日。

9月7日上午,戴笠将张治平软禁,并派军统局第三处(掌行动司法)处长徐业道与张谈话。张坚决否认所询各点:1. 否认有伪造军委会委任令与伪造蒋介石亲笔信件之事实;2. 不承认有章友三与陈超霖二人偕见铃木之事,声称八个月来,始终只有本人与曾政忠二人与铃木卓尔、臼井茂树、今井武夫等接谈。只是“曾政忠之英文拼音与章字同,是否因此误会,则不可知”。3. 与铃木卓尔过从已久,早通姓名,决不能冒称宋子良先生。^① 张治平与徐业道谈话后,又书面补充声明:1. 本人与曾政忠“从未敢越出范围”;2. “职等第知运用特务技巧,以整个揭破敌人之阴谋。”张治平称:铃木于8月14日赴南京、东京,“活动汪伪组织之撤销问题”,结果,获得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与近卫首相的“亲笔书”,用以“表示其对撤销汪伪组织之决心”以及近卫“对委员长诚意”,“希望两国迅速调整邦交,为建设永久和平之基础”。他说,自己已经目睹上述两种函件的内容,但铃木不愿立即交出,郑重表示,用何种方式提呈中国方面,是一个重要责任问题。张治平并称:戴笠所获情报,可能是和知鹰二等与铃木卓尔“作对”,目的是为了“反间”。^②

9月8日,张治平致函戴笠,为自己辩护,全面反驳戴笠所示情报,声称该件“歪曲事实,言之难尽”。他说,自己与敌人周旋,均与曾政忠及卢沛霖两同志商量,始末情况,皆经卢沛霖按时电呈,还曾两次奉召来渝,亲向当局详尽汇报。张治平的辩护共七点:

1. 关于向日方出示蒋介石“委任状”问题。张治平称:“读该件,谓职持委状于去年末见石野,不胜荒谬之至!”“今井与铃木因与职为老友”,“何须有委状向示? 此委状又从何处得来耶?”

2. 关于蒋介石对日方觉书所提八条的态度。张治平称:“该件谓委

^① 徐业道:《报告》,1940年9月7日。

^② 《张治平致徐业道函》,1940年9月7日。

座对敌方提出之八条,甚感满意,尤为荒谬绝伦。”

3. 关于宋子良参加谈判问题。张治平称:“该件谓宋子良确参加之,因今并有摄印(影)带回,并由周佛海所供之多数相片内确认宋子良之相片无误,此事询诸宋子良本人,当亦发一大笑。”

4. 关于谈判中所持原则问题。张治平称:3月中旬本人第二次奉召来渝时,上峰训示:“敌人如有诚意,须先取消汪伪组织”,返港后,即以此点与敌人争辩。5月初,铃木又约今井武夫、白井茂树到澳门,在本人专租的密室内会谈。结果,敌方表示:“愿回去努力,但要求时机不可失,而以板垣来华(谈判)之意相告。”自此以后,“职即以取消汪伪组织之事与之苦缠至今,铃木此次带来之板垣保证书与近卫亲笔,即针对汪伪组织与表示诚意之举也”。

5. 关于允许日方摄印蒋介石文件问题。张治平称:“该件谓我方示以委座之文件并令其摄印带回,此何言耶?”“无论何时何地,能证实此事者并在敌方存有此摄印者,甘受国家之极刑。”

6. 关于委派张群赴长沙谈判问题。张治平称:“该件又谓,此方已派张岳军负责此事……张未曾被派。此事始终由职与曾同志负责。”

7. 关于日方谈判代表问题。张治平称:“该件内所提铃木通贞为铃木卓尔之误,所谓马场者,并无其人。”

张治平在该函中说明,经过“八个月与敌之苦缠”,谈判已有进展:
1. 条件问题,现所争者为内蒙驻兵与和平谈判后双方同时发表宣言;
2. 汪伪组织由板垣保证撤销之;3. 议和方式,由敌酋板垣奉天皇命自甘来华求和;4. 作为日方诚意表示,可呈交近卫首相的亲笔信函。^①

次日,张治平在8日函后附言,重申没有伪造蒋介石委任状的必要:“过去八个月与敌周旋期内,敌人因对职信念极坚,一切会谈,从未

^① 《张治平致戴笠函》,1940年9月8日。

向职索阅或索取委座文件。职亦从未有任何伪造委座文件授诸敌方以博得其信用也。在事实上,职对伪造文件无此需要,又自量绝不可为,深望明鉴之。”^①

在此之后,张治平继续申辩:1. 关于 1939 年底,张治平持蒋介石任命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为研究对日问题咨议委任状,与日驻港武官石野洽谈和平问题,张称:“铃木与治平原系抗战前夙识”,“由曾(政忠)介识卢沛霖(即系港区与曾之联络人),得中央之允许,以特工技术进行。此本年一月间事也”。“今井与治平有十数年之旧交,决不需要伪造咨议委状。”2. 关于陈超霖与宋子良参加谈判问题。张称:“仅介绍曾政忠与铃木等见面,曾化名章友三,并未冒充咨议,仅称章有中央路线可以转达,并未介绍宋子良与铃木相见,更无陈超霖其人。”3. 关于张治平出示蒋介石“亲笔复函”问题,张称:“不但委座墨宝,即治平本人亦从未以一字笔迹供敌人利用。每次会谈,铃木屡要求记录签证,概予拒绝,更无伪造信件之理。如有此事,愿受极刑。”4. 关于日方提出板垣与蒋介石在长沙会见,中方派张群赴汉口,陪同板垣前往问题。张称:“敌方求和心切,预定在九月中旬实现,因此,铃木当时提出福州、洛阳或长沙为会晤地点,治平对此未置肯定答复。”^②

根据张治平交代,曾政忠是张治平对日谈判时的合作者。戴笠为了查核有关情况,召曾政忠及军统局在香港的另一工作人员刘方雄到重庆,询问有关情况。曾报告称:“张治平自本年二月投效中央以后,……对工作颇为热心,数月以来,确未与汪逆有任何往来勾结。”对张治平“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等情况,曾表示“毫无所闻”。^③

① 《张治平致戴笠函》,1940年9月8日。

② 《张治平之申辩》,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③ 《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曾政忠来渝前，张治平曾致函曾政忠，要求曾向铃木处索取近卫亲笔函及板垣保证书，铃木拒交，声称原件“须至适当时期及适当地点方能交出”。9月9日，曾政忠“照录”板垣保证书的日文及中文本各一份，由铃木在日文抄本后加注保证：“本内容与板垣总参谋长所书不相违”，并署名盖章。^①曾到重庆后，将所抄之件交给戴笠。戴笠发现，曾政忠的新抄本与张治平所报旧抄本有同有异。相同处在后段，即“该问题基于内政不干涉之原则处置之，不认为停战协定条件之一”；而在前段则关键之处不同：张所报者为“汪问题”，而铃木交来之抄件，则改为“□^②(蒋)汪合作问题”。戴笠做完上述调查后，于9月15日向蒋介石报告：

张治平接受铃木、今井之求和，原属探取情报性质，以撤销汪伪组织为一试题，以觐敌人求和之诚意与其求和之缓急也。张治平本系伪东亚民族协进会常务委员，与敌伪当有关系，张谓铃木、今井均其旧交，有相当信赖，此语固未敢尽信。惟张自本年春节港区运用以来，在工作上尚未见其有不忠实处，但张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经多方侦查与研询，尚不能证明其确有其事。张治平与铃木等屡次洽谈和平，据曾政忠谓，张对于铃木所提者，确以撤销汪伪组织为先决问题，但张对吾人是否忠实可靠，亦未敢肯定。

这份报告语气犹疑，“未敢尽信”、“尚不能证明”、“未敢肯定”云云，说明事件扑朔迷离，连戴笠这个精明的特务头子也心中无数，不敢作出肯定判断。对于“汪问题”之变为“蒋汪合作问题”，戴笠分析：“敌人不肯遽

① 板垣日文保证书抄件，《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

② 此字原空，当系戴笠避讳之故。

然放弃汪逆，对汉奸仍欲保持信义与作用，实彰彰明甚。”^①报告中，戴笠并称：张治平与今井武夫尚有9月16日在澳门见面之约，但张所进行的情报工作，已告一段落，“故拟留张在渝，暂不赴港”。此后，张治平即被以担任“训练班政治教官”名义，扣留于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放回香港。^②

在蒋介石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张治平致铃木的责问函，所署时间为9月28日。此函或为张治平主动所写，或为应军统要求而作。是否发出，不可知。该函除回顾自1940年以来与铃木在香港的会谈经过外，特别指责铃木“要功心切，不自检点”，又指责日方在外间散布谣言：

一则谓平曾持示军事委员会委任状，介绍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于去年年底在港晤石野武官，商谈中日和平问题，再则谓我蒋委员长对所提八项觉书表示满意，曾有委员长亲笔信交贵方摄影带回，又谓贵方曾摄有双方会谈时之照片，宋子良亦在其内等语。此种无稽之谈，如非先生有意伪造与故意宣传，平实不知从何而来也？^③

针对日方所谓宋子良参加谈判的说法，张治平要求铃木将摄得的所谓宋子良原相片“公诸报端，以待证实”。函件末称：铃木的所作所为，“足证贵国所谓中日和平之无诚意也，足证先生做事待人之不守信义也。先生失败矣，咎由自取也”。

①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② 刘方雄口述：《抗日战争中军统局谋略战一例》，（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101页。

③ 张治平：《致铃木先生函》，1940年9月28日。

张治平虽被扣留在重庆,但重庆方面不愿意就此中止和日方的联系。曾政忠奉召到重庆陈述不久,即被派回香港继续与铃木卓尔等人周旋。9月18日,曾政忠晤见铃木,按照军统设计方案通知铃木,声称重庆首脑会议认为:“中国之抗战力尚大”,“无须做出屈辱性和平”,“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对所谓“蒋汪合作问题”,曾表示“不明了日本之真意”,怀疑其中有“谋略”。^①谈话中,曾询问张治平与汪精卫的关系,铃木称:张治平对和平运动确甚热诚,日方所拟条件,人所不敢向中国高层转达者,张能,但张有时言过其实,此点日方早已了解。关于张与汪精卫“勾结”一节,铃木保证“必无其事”。对于重庆方面所提“先行消除汪精卫组织再言中日和平”问题,铃木明确拒绝,声称事实上“诸多困难”,“如中国力持此点,和平前途未可乐观,谅中国政府已准备再战数年矣”。^②铃木并称:今井武夫尚在澳门,等待与张治平会谈,张既不能回港,本人将赴澳报告,请示今后方针。铃木约曾政忠21日再谈。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在向戴笠报告上述情况后表示:“政忠同志老成有余,机智不足,恐难应付铃木、今井诸人。如钧座对铃木等尚有运用之必要,应请指派干员来港,就近指示。如仅为表明我方严正之态度,则拟于再晤谈一二次后,即嘱政忠停止一切活动,以免贻误机宜。”^③

9月22日晨,曾政忠再次与铃木卓尔会晤。铃木称,已于19日派秘书赴澳门,谒见今井武夫,报告中方态度,他本人则拟于23日赴南京,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他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意见与确实办法:“消除之方式与消除以后之办法”,“如何能使中国

^① 《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39页;参见《今井武夫回忆录》,160页。

^② 《港区叶遇霖致戴笠皓亥电》,1940年9月19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1日。

^③ 同上。

确信日本之和平诚意”，“如何使日本在消除汪组织后，不致有不良之顾虑”。铃木并称：“日本空军猛炸重庆，但对飞机场始终保全，亦所以使此项活动不致因交通困难而阻遏也。”^①24日，军统香港区负责人叶遇霖再次将上述会晤情况报告戴笠，戴笠认为铃木此线已无利用价值，电嘱曾政忠停止与铃木见面。

在中方指示曾政忠“停止一切活动”的同时，日本当局也指示停止“桐工作”。9月27日，铃木卓尔应召回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报告，总司令部决定暂时取消“桐工作”。10月1日，今井武夫赴东京汇报，登台不久的陆相东条英机严令军方“撒手”^②。同时，外相松冈洋右则决定另辟途径，通过银行家钱永铭对重庆进行新的“工作”。

张季鸾企图借机拆穿日方“把戏” 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延续

张季鸾从和知鹰二处得知张治平、宋子良与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的谈判情况后，极为震惊，他一面研判事件性质，探究真相，汇报重庆中央；一面则力图通过和知鹰二，拆穿日方的“把戏”。

除铃木卓尔、今井武夫等人外，和知鹰二实际上同样负有寻找与中国方面谈判机会的任务。九一八事变后，和知鹰二的主要任务是联络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派”反蒋。1938年日军进攻武汉前后，和知鹰二的任务转为在香港和蒋介石直接指挥的萧振瀛谈判，当时即与张季鸾相识。但是，和知与板垣征四郎等不同，主张抛弃汪精卫，专

^① 《香港叶遇霖致戴笠敬电》，1940年9月24日，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5日。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160页。

以代表国民党“中央”的蒋介石为谈判对象。他对张治平与铃木、今井之间的谈判,不仅不支持,而且“立于竞争、暗斗之地位”,“曾力予破坏”。1940年春,今井武夫第一次到港活动,和知即致电他的中国助手何以之,嘱其设法向中方揭破:“今井来意为蒋汪合流,实际为汪奔走,故亟应破坏之。”^①

1940年7月,和知鹰二在澳门会见张季鸾。8月17日,和知回东京向陆军省官员报告,声称“本官之工作根本不提和平条件,重点放置于兴之所至之打听”。“蒋中正之意在于希望日华彻底合作,不拟苟合。”^②29日,和知在澳门会见时在香港的重庆工作人员王季文,要求王转告孔祥熙的秘书盛某,请其促进宋子良工作。但是,却意外地得到盛某告知:“宋子良所进行之工作,那是一桩谋略。”^③9月1日,和知向张季鸾打听“真相”,告以所知,张季鸾感到震惊之余,认定“铃木活动,彻底为捏造之故事”^④。谈话中,和知向张季鸾透露,东京方面对板垣领导的“和平”工作本已失去信任,东条英机陆相怀疑,外相松冈洋右也怀疑,只同意板垣等办至9月底,“若届时不成,决由政府自办”^⑤。因此,张季鸾暗示和知,将此事向东京报告,借以“促成板垣之崩溃,使敌人内部发生重大争吵”。张季鸾估计:“该板垣把戏一旦揭穿,定会发生重大责任问题,而敌人之乱,即我之利也。”^⑥9月3日,张致函陈布雷,告以

①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何以之,一作何益之、何毅之,他既为和知鹰二,也为中国方面工作,是个“两面人”。

② 《石井备忘录》,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47页。

③ 同上。

④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和知向张季鸾通报情况,时间不明,但8月30日和知尚在广州,与张季鸾谈话时间必在9月1日。

⑤ 《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张函有时署“炽章”,有时仅署“炽”。

⑥ 《炽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日。

即将向外界“放出消息”，说“委员长震怒，正彻查其事”，“如是则敌人自知失败而板垣倒矣”。^①

和知鹰二在与张季鸾谈话中，曾向张故示宽大：如中日双方停战言和，“东京只主张内蒙暂驻少数兵，其他无大问题”。张答以“中国是不许任何地方驻兵，不许任何地方特殊化的”。对和知所称中日谈判今后将由东京“收回自办，另作准备”，张季鸾表示：“如作准备，须彻底觉悟，重新检讨，简单一句话，必须互相承认为绝对平等的独立国家，凡不合此义者，概不必来尝试。”^②张季鸾通过铃木和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故事”，认定日方“愚昧凌乱”、“荒唐幼稚”，程度太差，“证明去中日可以谈话之程度甚为辽远”，“可决其今后无大的作为”，^③因此，他不准备与和知鹰二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张通过何以之转告和知，“不必奔走，更不必找我见面”。当时，张季鸾听说，日本陆军正在力主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因此又嘱咐何以之劝告和知：“决不可对苏联乐观。苏联之事，中国知道的多，苏联对中国，近来也很好，个中消息虽不能多谈，总之苏联对日本，可说是无丝毫好意。”^④

9月4日，和知离港，返回东京，自称当于15日返回华南，行前表示：“板垣始终不脱蒋汪合流之主张，故必须撇开板垣。”张季鸾不愿与和知作泛泛空谈，托何以之电告和知：“不是日政府诚意委托不必再来；不是日本诚意改变对华政策，诚意谋真正之和平，则不可接受委托。要之与弟何时见面并不关重要，日政府苟无真正觉悟，见我何用！”^⑤当时，日军正在准备进军南洋，抢夺英、法在当地的利益。张季鸾估计，日

① 《焜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2日(应为9月3日)。

② 同上，1940年9月2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1940年9月7日。

⑤ 同上，1940年9月6日午前。

方“因南进不能决策甚为焦躁，板垣等又闹此大笑话。和某归后，敌人内部，将呈鼎沸之态”^①。9月6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建议对日方采取“攻心为上”策略。他估计，板垣、铃木工作失败之后，日本内阁必将另起炉灶，重新确定与中国的谈判路线，因此，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以“私人观察”身份向日方提出三项基本要求：日军自中国完全撤兵；完全交还占领地；自动废止不平等条约？^②

张季鸾分析，当时日方急于与中国议和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 为了进军南洋。他说：“敌对南洋，势在必取，即荷印亦在所必争，故港、越、新加坡、荷印是一串的问题，一动作就是大事情。若只拿安南，不成一局势也。因此海军坚持非结束对华战争不能南进。”2. 摆脱在中国的尴尬局面。张季鸾称：日军在中国的部队，共69个师团，约计在130万人以上；每日军费有2000万元到3000万元。最近半年，日军几乎毫无动作，今后的作战计划也无法确定。“老师糜饷，毫无效果，而同时眼看一年或等不到一年之后将失去南进机会，此其所以不得不焦躁也。”9月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请示下一步谈判方针，函称：

综观大势，委员长对于全局之判断，皆完全符合，弟深致敬佩。现观敌方殆有逐渐就范之可能，其酝酿应需一两月之时间，故十月、十一两月恐为重要时期，现拟得和某来电，再知悉最新敌情之后，即先回重庆。然若彼竟南来，当与一见。总之，现时为适于宣传之时期，倘蒙指示机宜，不胜厚幸。^③

① 《焯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6日午前。

② 同上。

③ 《焯(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和知鹰二曾告诉张季鸾，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内阁准备由少数人组成“委员团”，专门负责对华谈判，因此，张季鸾询问：“万一敌方此次更派高级人员一同前来求见时，应如何处理？”他表示：“弟现时之个人意见在拟拒见他人，以贯彻私人谈话性质之立场。”^①

在军统局审查张治平的同时，陈布雷也致函张季鸾，要求他向日方“索要伪件”，以便查清所谓张群“证明书”、蒋介石委任状及亲笔函的真相。张季鸾感到为难，回函称：“板垣尚倾信伪件，正期待其进行。若果正面索取，反恐困难，且使敌人感觉，弟之地位太涉于机密也。”^②他托何以之致电和知鹰二，声称“张群因无端被人出卖，非常愤慨，托索证件以便彻查。同时附告，张群疑为日方捏造，或为汪派作祟，愿查明真相”。张季鸾相信和知能办妥此事，携件南来；同时也相信“经此一电，亦可使南京敌酋恍然于一场故事之为捏造矣”^③。

张季鸾曾得到情报：周佛海鉴定铃木得到的蒋介石所书“委任状”及“亲笔函”后，指出其均为伪造，板垣征四郎甚为慌急。又得到情报：1939年板垣任陆相时，日军为试探苏联态度，进攻诺蒙罕（今译诺门坎——笔者），如苏联不抵抗，即调大部关东军入关。当时曾由板垣奏明天皇，天皇询问计划可靠否？板垣答云可靠。不料日军大败，转而调关内作战部队赴援。事后，关东军及参谋部有关人员一律免职。板垣本来也应该免职，派来中国，是让他“戴罪图功”。“桐工作”出现问题，板垣更为慌恐。^④云云。基于上述情报，张季鸾对板垣的倒台颇具信心。

① 《焮（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7日。

② 同上，1940年9月10日。

③ 同上，1940年9月11日。

④ 《焮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

和知于9月4日返回日本后,曾电告何以之,已向东条英机发出长文,拟在福冈与东条派来的人员见面,或直接赴东京报告。不久即发电称:东条英机“令彼负责进行”。但是,其后,又发电称,9月10日在福冈与东京派来的要员会晤,偕飞南京,协商结果,以和知与板垣为核心,办理此事。和知称:将于9月15日或16日再飞东京,处理铃木等失败的善后事宜,同时取得东京正式委托,再飞南京,然后南下香港。^①

和知确曾按张季鸾要求向日本军方揭发“桐工作”的问题。9月12日,臼井茂树就曾在向参谋本部有关人员报告时说:“据和知少将所调查探知,桐工作系香港蓝衣社之谋略,只是使用宋子良而已。”“谅蒋中正不会见板垣中将,板、蒋会议无法解决一切问题。蒋中正不至于发亲函,所谓蒋之亲函是冒牌货。”^②但是,日方不肯也不愿意相信和知所报,而宁愿相信中国有不同“路线”。9月20日,和知鹰二致电何以之:

下记最近之情况,有告知之必要: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疗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又谓宜昌方面,一周内当有人到达可能云云,暗示张岳军有出来之可能,表示恋恋不忘之意。日方为使促进正式交涉之实现,当期望中国路线之统一。又有人谓,蒋先生不肯使子良工作中断,子良背后,有特务人员控制,蒋先生不能使其中止等云。^③

和知鹰二要求何以之转告张季鸾:最好能命宋子良出洋外游,然后日方正式向中方提出谈判要求,而由东京负责进行。和知很着急,函称:“子

① 《焜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17日。

② 《石井备忘录》,转引《对中俄政略之策定》,46页。

③ 《焜(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良何时出国,祈速赐知为要!”^①

张季鸾本已判断张治平、铃木之间的谈判是“把戏”,现在日方却又提出新材料,说明宋子良和铃木之间仍在联系,这使张季鸾感到迷惑。他决定不再参与中日秘密谈判。9月21日,张季鸾要求何以之用明码电文告诉和知,张季鸾日内离港;同时另用密码告知:

铃木假把戏我早已一再告之,何以尚如是纠缠?且对我方内部之观察,饱含污蔑之意,是证明对方不足与谈。中国本决无路线问题,我政府从未委托过人,我亦从未受过委托,只因你们来找我,我为个人友谊之计来此。今乃认中国有多少路线,是等于认定我为路线之一。我现在声明,此路线取消,我不复过问,将来纵有正式交涉,亦勿找我。我之为人,本极恶麻烦之事。今如此麻烦,我厌恶已极,故决计脱离此问题,望彼告板垣,我已自己取消,不愿过问矣。^②

宋子良是否和铃木确有联系呢?张季鸾不能判断。他将这一问题交给陈布雷。9月21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陈述五条意见:1. 观和知电文,“足知敌方有轻蔑、操纵之意”,但宋子良君是否对铃木确有此表示,本人没有“判断真伪之力,因而不能作有力之反驳”。2. 今井、铃木的失败,在敌方内部是“绝大问题”,南京敌人明知是假,尚欲“挣扎蒙混”,板垣负责与中国谈判,原以九月底为限,本人“声明不管,更足以打击之”。3. 南京敌人的和平攻势彻底失败之后,日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再变和平攻势为军事攻势,一为由东京发起,正式媾和。此问题日方如何选

^① 《焜(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② 《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原函未署名。

择,在不远期间便可明了。4. 敌军人本是一丘之貉,但和知有一点特殊,即不仅与“勾汪”工作无关,而且在敌人内部以“反汪”得名,因此可以判断,如东京正式与中国交涉,必派和知奔走,因此,和知此线索仍应保留。5. 观察最近情形,我方内部不能不承认“发生毛病”,“当假委任状、假信问题发生之后,何以宋子良君以行将出洋之身,而尚与铃木作私人接触”? 他严肃表示:“此真为不能想象之事!”^①他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和日方秘密联系的严重事例,要求陈布雷将上述情况呈报蒋介石。2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说明“自前日向彼方通告不管之后,觉心神为之一舒。盖国家与领袖受敌轻侮,只有如此断然表示,为昭雪轻侮之道”^②。

张季鸾虽已向日方表示“不管”,但是,他仍然对中日谈判存有希望。9月23日,张季鸾致陈函陈布雷云:“对今后看法,弟微有不同。弟以为判断局势之第一关键,在看是否以敌大本营之名义来开正式交涉,果来交涉,即当认定其有若干诚意。”“盖既来交涉,则为承认是国家与国家间之正式议和,一也;汪奸当然取消,二也。”此前,陈布雷认为,日军进攻安南,中国的对外联络线受到威胁,说明日方没有议和诚意,对此,张季鸾表示:“安南问题,当然有威胁我方之恶意,然不能因此之故,即断定敌人不企图正式议和。”他说:“和战本为同一问题之两面,中日现在战争之中,而又并无和的头绪,在我方似不必过重视其另辟一新战场之企图,即藉以判断其政策如何。”他表示:自己的“工作目的”在于执行一种试验,即“敌人宣传愿与我政府议和之是真是伪”。他认为,此点关系中国今后半年乃至一年间之“一切抗建工作”^③。

① 《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1日晨。

② 《焮(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3日下午。

③ 同上。

陈布雷反对张季鸾对“和谈”的幻想,要求张季鸾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尽早回渝。9月24日,张季鸾复函陈布雷:取消前函所述意见,自即日起,对外对内均脱离此问题,不再报告和知传来的敌情;所保管之“港币小款”,亦不再负保管之责;将向中航公司订票,尽早动身。^①

宋子良以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的“至亲”身份擅自与日方谈判,张季鸾对此深为不满。正当此际,一件关于宋子良谈话的新情报帮助张季鸾作出判断。9月24日晚,张季鸾读到和知鹰二致何以之的最新电文,其要点为: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又云:因近日委员长不满于孔、何二人,故孔、何不参加会议。张季鸾认为:“其最可笑之语为委员长表示,交涉可继续进行。”张季鸾判断:“无论宋君如何荒唐幼稚,断不会作此可笑之谣言,是可确定为铃木所捏造矣。”对于铃木捏造此类谣言的目的与效用,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板垣屡次向国内报告,和平条件业已成熟,并且逼迫近卫写信向我方表态。近卫信件在我方虽不觉重要,但在日方却是总理大臣公函,板垣无法卸责,只能继续不断造谣,希图继续控制军权,“以达其继续进行勾汪签约延长现状之目的”^②。

当时,和知鹰二召何以之赴沪。9月25日,何到张季鸾寓所会面,张要何到沪后明确告诉和知,“所有铃木报告中之宋子良谈话,绝对为铃木捏造”,建议和知向东京切实报告。^③同时,张季鸾也要何向和知转达:为大局起见,在一两个月之内,如东京确有正式讲和诚意,并有适当内容时,允许和知与张通信一次,但仅以一次为限。张称:“当拼其最

① 《焮(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4日。

② 同上,1940年9月25日早。

③ 同上。

后之信用转达一次，盖中国实在认日本无诚意也。”张并称：如东京确有进行之意，则个人愿忠告：第一，停止进攻云南及轰炸一类威胁、压迫行动；第二，须有建立平等的“新国交”的决心，绝对不可向中国方面提出“承认伪满、中日联盟”等一类要求，否则张不能转达。^① 第三，根据上述两项作正式之准备，可来一次信，说明派何人负责开谈及其他具体事项。张特别强调：当年冬天，准备往陕西终南山养病，和知来信，须在两个月之内，“过时则我入山已深。无法接头矣”。何以之向张表示：“除非东京真正弄好，彼亦不敢赞成接洽。盖在板垣之下接洽，则中国上当也。”^②

张季鸾要何以之转告和知鹰二的话，有类最后通牒。之所以如此，据张季鸾致陈布雷函，其用意在于：1. 在敌人内部暴露板垣等之欺骗；2. 试验敌国今后究竟如何。此前，日本早已强迫法国封闭滇越铁路，英国也一度宣布封闭滇缅路，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先后受阻，抗战环境愈益艰难。张季鸾认为，形势断不能无条件乐观，个人可以封锁，国家不容封锁，保留与和知的联系线索，有益无损。之所以只允许通信一次，是为了使之“更为严重而有力”。他说：“弟近月颇感敌人求结束战事之心已达顶点。盖如待其南进顺利，稳占安南，并控制缅甸，而美国又不实际干涉，则彼时敌人心理恐又一变，因此现时之对敌工作，恐正为最紧要而有用之时。”关于宋子良，张季鸾建议，应命其迅速出洋，或令其回渝，借以“打破敌人和平攻势”。他提醒陈布雷：“铃木制造之假故事，方日新月异，喧腾于日人内部”，“观铃木造谣之猛烈，则所谓假委状、假信件，恐系铃木所捏造”。^③

① 此为陈布雷指示张季鸾者。

② 《焮(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夕。

③ 同上，1940年9月25日早。

尽管张季鸾方面认为谈判仍有必要,但是重庆方面已对谈判失去兴趣,指示将 1938 年萧振瀛工作期间留在香港的文件全部销毁,同时对日方采取决绝态度。张季鸾随即遵令执行,同时指示在港协助自己工作的人员:1. 在何以之离港前,使之相信,张季鸾“决非任何意义之代表”,“亦决不做政府代表”,并非“真正受政府委托之人”;2. 今后不再与何以之来往,避免交谈,如何以之下次到港,亦不必理会,“务使何某知问题严重,今后无复奔走之余地”。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

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陷于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①

写此函时,张季鸾确实准备将他在香港搞的特殊工作“告一段落”,然而,正当他回渝在即,又接到何以之转给他的和知鹰二的密电:“铃木、宋子良工作终止,在东京将开始全面的和平谈判,现元老重臣、陆军、海军及外务省首脑部在协议中,务以大乘的见地,速求东亚全局之和平及繁荣。”^②电文中,和知表示,将于9月末上东京,然后携带所决定的《要纲》来澳门,张季鸾可先回重庆,但本人返澳后务求张来澳相晤。和知此电打消了张季鸾“告一段落”的想法,决定另拟策略。

张季鸾认为:从日本方面看,“必须企图结束对华之战争”,“求和运动,必继续一时”;而从中国方面看,“(现时)实立足于举足重轻之地位,同时亦到了必须决定长期忍耐封锁之对日战争办法”,因此,“希望在最短期内,将敌情、友情俱完全弄清,以便下最后的决定”。9月30日,张

① 《焜章(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7日午。

② 《焜(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30日下午3时。大乘,日语,从大局着眼。

季鸾致函陈布雷,建议“在最后决定之前”,努力于“攻心为上”之对敌宣传,其内容为:1.打破日本“战美之自信”;2.打破其联苏之妄想;3.打破其信赖德国之心理;4.鼓吹中国之真正愤怒,并打破中国不肯和及不敢和之推测。张表示,他不期待和知鹰二再来会有何结果,但就取得“高等消息及做宣传”着想,在香港“稍待”还是有用的,“无论如何,我有知悉真正敌情之必要也”^①。这样,张季鸾就又在香港留了下来。

张季鸾在香港的工作一直做到1940年11月。张要求日军全面撤兵,不承认汪伪政权。同月23日,日方表示接受,要求重庆方面派出正式代表。^②但是,日本当局终于舍不得抛弃豢养的傀儡。30日,日本政府与汪精卫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权,以事实嘲弄了张季鸾,也嘲弄了重庆国民政府。

考证与辨析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有其局限与幸运。其局限在于,历史已逝,许多资料散失,事实失传;其幸运之处在于,有可能见到当时无法见到的敌对双方,甚至是多方面的资料,从而综合研判,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作出比较真实、合理的分析。

根据笔者已掌握的日中双方资料,比勘辨析,可以确定:

(一)谈判中出现的蒋介石“委任状”及“备忘录”均是伪件。前文已述,据日方资料记载,谈判中,中方曾展示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中正小印的委任状,其内容为:“兹委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

^① 《焮(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30日下午3时。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175页。

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印。”又，在讨论板垣、蒋介石长沙会谈时，中方曾出示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备忘录。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文件均为伪件。

在抗战前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就主张不立文字，不落痕迹。在抗战爆发以后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更加小心翼翼，不肯给日方提供任何文字根据。张治平等与日方会谈，蒋自然不会提供“委任状”、“备忘录”一类凭证。而且，更重要的是，蒋一开始就并不积极支持张治平等人于日方谈判。1940年3月21日蒋介石日记云：“倭寇一面成立汪伪中央政会，宣言三十日成立伪府，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者来求和议，其条件一如往昔，以试探我方对汪伪出现之心理，此种恶作剧，去年行之一年，其愚拙卑劣，当以一笑置之。”^①这里的“陌不相识者”即指张治平。^②当时，蒋还搞不清楚张的身份，其后，身份搞清楚了，蒋立即指示戴笠：“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③5月下旬，戴笠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7月3日，戴笠电张治平云：“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又曾指示：“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其后，蒋介石的态度越来越严峻。当年5月18日至30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大举轰炸重庆八次。6月6日至8月17日，又轰炸二十八次。7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敌又求和，未知其诚伪如何？此时应置不理，以示我不受轰炸之威胁。”^④8月11日，

① 《困勉记》，稿本，此稿据蒋介石亲笔日记摘录，见《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② 蒋介石日记误书为陈治平。

③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

④ 《困勉记》，稿本，1940年7月2日。

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称：“敌乃以板垣亲到长沙，与汪兆铭同来会晤为饵，其儿戏滑稽，实亦大可怜也。”^①12日，戴笠书面向蒋介石报告张治平与日方多次接触情况，请求指示。次日，蒋介石日记云：“晚，研究敌情，曰：‘敌又托胡鄂公、何世楨、张治平等各别来求见、通问，彼之求和，乃是欺诱行动，益令人可恨，应一概严拒之。’”^②这应该是蒋介石对戴笠请示的回答。9月初，蒋介石从张季鸾函中得悉张治平向日方提供了自己的“亲笔”文件后，非常生气，日记云：“汪兆铭探子乃捏造凭证诬我，是使我又多一意料不及之经验也。应牢记，以自鉴戒。”^③9月15日，日机两次空袭位于重庆曾家岩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委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以张治平为我中央可靠之路线，用力求和八个月，未得成效，今始觉悟，遂更恼怒，炸我寓所。”^④以上材料雄辩地说明，张治平与铃木谈判中出示的“委任状”、“备忘录”与蒋介石无关。

前文已述，日方在见到中方出示的“备忘录”后，曾在匆匆间拍得“蒋中正”签字，送回南京审查。而据周佛海日记，当年7月26日，日方确曾请周审查真伪，周观察的结果是“实不甚像”^⑤。这一则材料不仅可以作为上述“备忘录”是伪件的旁证，而且说明，它的作伪者并非如张季鸾所认为的是日方。铃木卓尔等人决不会自己制造了伪件，又送回去请人审查。

（二）在一系列问题上，张治平等中方人员哄骗了日方。首先是宋子良参与谈判问题。尽管张治平在被军统审查过程中一再坚决否认，

① 《困勉记》，稿本，1940年8月11日。

② 同上，1940年8月13日。

③ 同上，1940年9月6日。

④ 同上，1940年9月15日。

⑤ 《周佛海日记》，1940年7月26日，32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但是,日方谈判时曾从钥匙孔内偷拍了“宋”的照片,并且也曾交给在南京的周佛海等人核对,可见,有“宋子良”参与确是事实。这位“宋子良”的照片,经周佛海核对之后,也认为“与本人不符”^①。1941年9月,参与“诱和”活动的日本人松本藏次就曾指出,所谓“宋子良”,其实是蓝衣社的间谍,其目的在于刺探日本秘密。^②1945年夏,这个假扮“宋子良”参加谈判的人成了日本上海监狱中的囚犯,被原日本支那派遣军特派员,曾在香港会谈中担任翻译的坂田诚盛认出。在与今井武夫见面时,此人承认自己是蓝衣社的“曾广”。1955年“曾广”致函今井武夫,对于当年“冒充宋子良的错误深表歉意”^③。可见,在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时,中方确实有人冒“宋子良”之名。

其实,这个冒充“宋子良”的“蓝衣社”特务的本名并非“曾广”,而是在谈判过程中一直与张治平密切合作的曾政忠。^④前文已述,张治平被审查,并被软禁在重庆后,军统局继续派曾政忠到香港与铃木卓尔周旋,9月18日、22日先后与铃木有过两次谈话。然而,这两次谈话中的“曾政忠”都仍被铃木视为“宋子良”。19日,铃木向今井报告:“根据宋从重庆返回香港所作的报告,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在重庆的重要干部会议上决定,关于满洲问题及日军部分驻兵问题,只要日华双方未取得一致意见,长沙会议暂行搁置。因此,本谈判没有进展的希望。”^⑤铃木的这份“报告”也传到了他的对手和知鹰二那里。和知在致何以之的一

① 《周佛海日记》,1940年7月26日,32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② 《松本藏次致小川平吉电》,转引自《小川平吉致近卫函》,又,《致射山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691~692页,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73。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162~163页。

④ 笔者的这一推断,已为军统局人员的回忆所证实,参见刘方雄口述:《抗日战争中军统局谋略战一例》,(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101页。

⑤ 《今井武夫回忆录》,160页。

份电文中说：“铃木报告，谓宋子良近谈，本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委员长曾与戴笠、张群、张治中秘密研究此事。”^①上述两通电报表明，9月18日，曾政忠与铃木卓尔会晤时，虽然已经通知铃木，张治平可能是汪方人物，但仍然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现。这是曾政忠冒充“宋子良”参加日中秘密谈判的确凿证据。^②和知鹰二另一通电报说：“子良近对铃木言，将出洋疗疾，希望中日问题早日结束。又岳军一周内可到宜昌云云，故板垣对于子良路线，仍认为可靠。”^③这通电报告诉我们，曾政忠当时已准备“抽身”，不再以“宋子良”的身份出现，同时，也还在继续哄骗日方，所谓张群“一周内可到宜昌云云”，就是一例。有意思的是，一直到1941年11月，为了阻挠日本承认汪政权，军统特务还在假借蒋介石的名义，在“宋子良”问题上继续说假话，欺骗头山满和萱野长知二人。^④

“宋子良”是冒牌货，自然，参与谈判的所谓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等也都是冒牌

① 转引自《炽(张季鸾)致陈布雷函》，1940年9月25日早。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160页。又据同书及《井本日记》(《对中俄政略之策定》，42页)，9月21日，“宋子良”曾再次访问铃木，而据军统叶遇霖9月24日致戴笠电，此次的访问者，仍是曾政忠。此外，铃木卓尔于9月27日到南京派遣军司令部作报告，仍称18日与“宋子良”会谈。见《井本日记》，《对中俄政略之策定》，39~40页。凡此，均可证明，铃木卓尔心目中的“宋子良”，乃是曾政忠冒充。

③ 佚名密电，1940年9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和平酝酿》。

④ 1941年11月16日，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杜石山致函头山满、萱野长知，转达蒋介石“意旨”云：“宋子良以运输事务抵港之日，宫崎(应为铃木——笔者)、今井代表板垣将军，约其晤谈，并提交子良以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子良据以为报。当即电质子良，以何资格见板垣将军之代表，及根据何种机关之命令，以接受板垣将军之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诘知子良接电，惧而避之美国。旋以该条件甚为苛细，想板垣将军畅晓军事，明察世局，必不提出中日两国不能相安之苛细条件。该条件或系一二军人之私见，遂不予子良以深究。”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697页。

货。根据前文所引军统香港区叶遇霖致戴笠“冬电”，铃木回港后，曾与叶谈话，而据铃木给上级的电报及派遣军总司令部有关人员的日记，铃木当时谈话对象即为“章友三”。^① 因此，“章友三”应是叶遇霖的化名。

在审查张治平时，张坚持与日方谈判中只有他本人和曾政忠二人参加。对于所谓“章友三”其人，张第一次解释为“曾政忠之英文拼音与章字同，是否因此误会，则不可知”。“曾”与“章”的英文拼音本不相同，张治平等与铃木的谈判中也并未使用英文，不可能产生误会。后来则解释为“仅介绍曾政忠与铃木等见面，曾化名章友三”，两次说法前后明显不一，巧言支吾、企图蒙混之心清晰可见。显然，张治平可以承认曾政忠化名“章友三”，而不能承认冒充“宋子良”，因为前者无罪，而后者则关系重大，可能获罪。

张治平对军统的交代，不仅时间颠倒，语意支吾，而且真假混杂，包含若干谎言。例如，他声称与铃木、今井是老相识，与今井且有十多年的情谊，因此，无须身份证明及委任状。其实，他和今井武夫并无深交^②；日方在与中方人员秘密谈判时索要身份证明也并非仅此一例。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桐工作”时，还在开展“姜豪工作”，向姜豪“要求与携带有重庆政府中枢有关的身分证明书的人会面”^③。张治平之所以编造与铃木、今井的“友谊”谎言，无须身份证明云云，不过说明他心中有“鬼”，力图掩盖他伪造文件、伪传蒋介石指示等做法而已。

^① 《香港机关致参谋次长》，特香港电第 351 号。参见《对中俄政策之测定》，33 页。又，《井本日记》所记亦同，参见上书 33 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称：“宋子良和铃木中佐的居间人张治平，我在北平大使馆武官室工作时，他正在冀东政府任职，他还当过北平的新闻记者。这次奇遇，感到惊异。但只是见过面，对他的身份、性格等，却一无所知。”见该书第 129 页。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168～169 页；参见姜豪：《和谈密使回忆录》，194～196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前文已述,戴笠为了验证张治平的交代,曾从香港调回曾政忠与刘方雄,但曾、刘同样不敢说真话。当戴笠询问“冒充宋子良事件”是否为张治平“串演”时,二人的回答是:“甚有可能,但无实据,且与本局绝无关系。纵认确系张之所为,则张之功过,似乎可相抵销。”戴笠听后表示:“揆之时间先后,确与本局无关。且事过境迁,已无法深究,亦无足深究。”^①可见,戴笠虽心知肚明,但他担心蒋介石怪罪,所以也不想查得很明白。“与本局无关云云”,不过是饰词而已。

(三)铃木等日方谈判人员也哄骗了中方。2月3日,铃木在与“宋子良”第三次会见时曾表示:“处理汪精卫对重庆政府的关系,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我方似无干涉的必要,可由中国政府妥善处理。”^②所谓日方同意“去汪”、“毁汪”一类的“甜言蜜语”,铃木不仅在私下对张治平讲过多次,对“章友三”也讲过。前引叶遇霖致戴笠“冬电”所汇报的铃木行程及其和近卫会见的时间、情况,和现存日文档案完全相合,可以确证“冬电”转述内容,来自铃木本人,而非张治平等编造。一直到9月22日晨,铃木与“宋子良”会晤时,仍在向“宋”保证,回南京会见板垣时,“当尽力促请先行消除汪逆伪组织”^③,可见,处理汪精卫,取消汪伪组织确是铃木私下向中国方面作出的保证。前文已经指出,铃木前后出示的板垣征四郎保证书前后不同,有一个从“汪问题”向“蒋汪合作问题”演变的过程。8月14日,铃木赴南京、东京之前,向张治平、“宋子良”(曾政忠)出示过“底稿”,主题词为“汪问题”。当时,即由张抄录,交曾密存。19日,铃木卓尔到南京,与臼井大佐正式为板垣起草保证书,

① 刘方雄口述:《抗日战争中军统局谋略战一例》,(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2期,101页。

②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的经过概要》,《今井武夫回忆录》,332页。

③ 《香港叶遇霖敬电》,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27日。

主题词演变为“蒋汪合作问题”。28日，铃木返港，催张治平往阅“保证书”，但铃木仅出示抄件，主题词仍为“汪问题”。张阅后即誊写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呈重庆。^①9月上旬，“宋子良”（曾政忠）向铃木索取板垣亲笔日文原件，“保证书”的主题词又变回“蒋汪合作问题”。前后出示的两种版本，措辞虽只有一两个字不同，但却是根本性的差异。当时，日方的基本方针是促进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的合作，使南京、重庆两个“国民政府”合流。铃木为板垣起草并在9月上旬出示的保证书才反映日方的真实态度，也和今井武夫公布的内容相合。^②由此可见，铃木曾出示的以“汪问题”为主题词的保证书并不反映包括板垣征四郎在内的日本官方的态度，而是铃木为了诱使中国方面坐到谈判桌前的伎俩。他在和张治平等人的私下接触中所称，日本准备抛弃汪精卫，甚至准备将汪交给中国方面，云云，都不过是巧言相诌，为了哄骗中方而已。

1940年2月，“桐工作”刚刚开始之际。日本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就指示：“日华代表在协商处理事变时，可同意中国方面的提案，藉此引诱重庆参加乃至进行分化离间工作。”^③铃木卓尔关于“毁汪”、“去汪”一类“甜言蜜语”，正是对载仁亲王策略的运用。

铃木卓尔哄骗中方非止上述各例。前文已经叙述，9月18日铃木与“宋子良”会谈时，铃木曾称，将去澳门向今井武夫汇报，后来又称，已于19日派秘书前往汇报。其实，今井武夫在当月14日已经离开澳门，并于16日到了南京。^④铃木所云，完全是信口开河。应该指出的是，铃木卓尔不仅哄骗了中方，而且在关键情节上对其上级也有隐瞒。如6月澳门

① 《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5日。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158页。

③ 《参谋总长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今井武夫回忆录》，336页。

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160页。

会谈,中方提出“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方令汪出国或退隐。此事见于今井武夫记载,并非中方文献的片面之词。^①但是,铃木在向其上级汇报时,却改变为中方仅要求日方对汪作“适当处置”,并可由重庆派遣代表,与汪“协议合作问题”。^②这就完全扭曲了中方的态度与立场。又如,9月初,“宋子良”已经将中国方面对张治平与汪方关系的怀疑,以及张不能回港继续参加谈判等情况告诉了他,这实际上是在通知铃木,张治平已处于被审查中。但是,这一情况,铃木卓尔始终未向其上级报告。^③

(四)据《今井武夫回忆录》记载:“桐工作”过程中,宋美龄曾于1940年3月5日到港,“从侧面协助中国的代表”,“宋美龄抵港的消息,经报纸作了报道,因此,我们相信了中国方面的言词”。有些历史学家据此怀疑宋美龄此行大有文章。其实,宋此次到港,完全是为了休养。1939年12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吾妻以疗鼻疾割治,甚忧。”1940年2月12日日记云:“送夫人到珊瑚坝机场,往香港休养。”可见,宋美龄此行与“桐工作”无涉。中方“代表”所云,与冒充“宋子良”一样,同为对日方的哄骗。

结 论

在全面审视日中两方留下的资料后,现在可以作结论了。

(一)日军攻占武汉、广州中国广大地区以后,兵力枯竭,财政困难,已达势穷力蹙境地,急于与中国方面“停战”,用战争以外的形式巩固其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151页。

② 特香港电第228号,又291号。参见《战前世局之检讨》,300~301页。

③ 参阅《井本日记》,转引自《对中俄政略之策定》,39~40页。

侵华成果。日方上至天皇、内阁、军部，下至板垣征四郎等中国派遣军官员普遍重视“桐工作”，其原因在此。为了等待“桐工作”的成果，日方不惜推延汪伪政权的成立时间；在汪伪政权成立后，又不惜推延对其“外交承认”的时间，幻想出现“蒋汪合作”的局面。日方谈判代表铃木卓尔之所以不惜卑词谦态，巧言相诘，乃是为了诱引蒋介石或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来。它既反映出铃木个人的“要功心切”，更多反映的却是日方“求和”的急迫性。

(二)日方所谓“桐工作”，就中国方面来说，不过是军统在香港的几个小特务对日方的玩弄，目的在于刺探情报。谈判中出现的“宋子良”以及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等人是假货，所出示的蒋介石“亲笔”委任状、备忘录等文件是贗品，所转达的蒋介石意见是假“圣旨”。

(三)谈判初起时，汪精卫正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南京筹组伪国民政府，因此蒋介石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其后，汪伪政府成立，蒋介石自感上当，认为日方求和乃是“欺诱”行为，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中方并没有马上关闭谈判之门。“桐工作”在1940年9月底结束后，重庆方面也还通过几条线索，虚与委蛇，与日方继续维持着秘密关系。

战争中，既有战场上的“角力”，也有谈判桌上的“斗智”。铃木卓尔、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之间的谈判是一种“斗智”行为，不能要求双方“忠诚老实”，他们在谈判中说假话，提供假材料、假情况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谨慎地辨别真假，而不能以假作真，视为信史。遗憾的是，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而且似乎还不是个别的。

原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略有修订。

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四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自知仅凭武力不足以征服中国，曾通过多条渠道诱使国民政府进行和谈，姜豪工作即其中之一。有关情况，姜豪本人曾经写过一本《“和谈密使”回想录》。^①但是，事隔多年，记忆难免讹误。更重要的是，当事人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决定了历史学家在回忆录之外，还必须广泛收集相关档案资料，相互参证，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中有一封戴笠的信，函云：

骊先生赐鉴：

顷蒙电询。晚适因事外出，未获闻教。殊歉。姜豪同志之事，因欧洲局势之剧变与敌内阁之改组，情况变迁，故尚须稍隔几日方能决定。容决定后当有奉闻也。专上，敬颂崇安！

晚

戴笠敬上

九、五、^②

① 《“和谈密使”回想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② 朱家骅档案，馆藏号：301-01-23-645。本文所引档案，均同，不一一注明。

骝先,朱家骅的字。此函未署名。1939年8月30日,日本平沼骐一郎内阁倒台,阿部信行出面组阁,任首相兼外务大臣。9月1日凌晨,希特勒指挥军队大举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戴笠函中提到“欧洲局势之剧变与敌内阁之改组”,可知本函作于1939年9月5日。

姜豪,江苏宝山人,1908年生。父亲曾在宋耀如家中任教,为宋子良、宋子安弟兄讲授国文。姜豪于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学,读书期间参加国民党。曾秘密参加改组派,任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主任,从事反蒋活动。1933年当选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1937年8月,参加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任战时服务团团长。上海沦陷后,姜豪通过时在伪维新政府任教育部督学的朱泰耀、杨鹏转二人刺探日伪情报。1939年1月,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5月初回上海。同月9日被捕,被日本军部设在上海的小野寺信机关保释。

小野寺信原在日本参谋本部俄国课工作。1938年10月被派到上海,建立小野寺信办事处,目的在于寻找和重庆国民政府的关系,劝说蒋介石与日本“和谈”。同年12月,小野寺信被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委任为参谋,“与国民政府要员就再建东亚问题进行协商”^①。小野寺信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为经济学教授吉田东祐,其中文翻译即为与姜豪有关系的杨鹏转。这样,姜豪就经常通过杨鹏转了解小野寺信机关的信息。其间,日本特务影佐楨昭正在主持“汪兆铭工作”,企图将汪精卫扶植为傀儡。小野寺信希望抢在影佐之前打通重庆路线。朱泰耀建议姜豪利用这一机会,代表重庆与小野寺信接触,试探其“和平”诚意。姜豪致电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请示,未得答复。姜豪被捕后,小野寺信出面保释,向姜表示:日本的元老、重臣、财

^① 《“和谈密使”回想录》,180页。

阎都希望早日结束战争。日本海军急于南进,陆军急于北进,因此必须解决中国问题。姜豪认为此事应从速向重庆中央汇报。同年7月,姜豪到达重庆,朱家骅表示,此事须在向蒋介石汇报之后才能决定。

当时,军统负责对日情报。从上引戴笠函可知,朱家骅听取姜豪汇报后,将有关情报转告军统,由军统方面决策。由于德军进攻波兰,日本内阁改组等新情况,至当年9月5日止,军统方面尚未拿出主意。

同档所藏戴笠9月27日致朱家骅函云:

骝先先生赐鉴:

查姜豪同志来渝已久,现晚拟派其赴港,侦察敌方之企图并汪逆之活动,未悉尊意何如?乞示。专此奉陈,敬颂崇安!

晚戴笠敬上

九、廿七日、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逃离重庆。29日,在河内发表《致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书》(《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第三次对华声明。1939年5月,汪精卫到达上海。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9月5日,成立伪中央党部,积极谋划成立傀儡政权。戴笠此时决定派姜豪赴港,“侦察敌方企图并汪逆之活动”,显然是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

此后的情况,据姜豪回忆:10月间,朱家骅称,“奉总裁谕”,要姜到海关巷1号谈话。到了那里,才知道那是军统局的办事处,由戴笠亲自谈话,告诉姜:他正需要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让姜到香港去和日本人接触。不过当前国际形势还没有明朗,让姜再等些日子。11月某日,戴笠再次约姜豪谈话,说是可以到香港去了,听听日本人谈些什么,但不能讲中国政府有什么意见,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以香港为限,等等。

事后,姜豪向朱家骅汇报,朱交给姜一本密电码,要姜到港后和他保持单线联系。^①

姜豪到港后,先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要求姜豪介绍中国政府负责代表谈判,姜豪答以时机尚未成熟。其后,吉田到港,双方转到澳门会谈。关于谈判情况,姜豪一面通过军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刘方雄转报戴笠,一面则通过吴铁城的电台于11月14日致电朱家骅报告。电称:

板垣已派高山来晤,藉悉敌方现决全力扶植汪逆,但亦知伪中央成立后,无所作为,故仍思取巧谋和。高山所谈和平办法,据谓撤兵无问题,程序与时间,视吾实行亲日反共之程度为比例。如某处已有表现,该处即可撤兵,如各处同时彻底表现,各处亦可同时撤兵。所要求事,除反共、经济合作外,最重要者在委座退隐,同时对汪逆精卫须予面子。至于满洲问题,则不谈。

板垣,指板垣征四郎,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高山,当为吉田东祐的化名。据此电可知,日本侵略者当时的策略是,双管齐下,既积极扶植汪精卫,又积极向重庆方面“诱和”。其条件为亲日、反共、经济合作。由于蒋介石在1938年1月拒绝陶德曼调停,日本方面曾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因此,吉田在和姜豪谈判时仍然坚持此点,要求“委座退隐”。对于叛离重庆的汪精卫,则要求照顾其“面子”,意即有适当的安排。关于“满洲”问题,吉田深知,这是谈判中最棘手之处,所以回避不谈。

对吉田所提条件,姜豪逐一反驳,电称:

^① 《“和谈密使”回想录》,193页。

职告以中国在求本身之独立、生存，为此而战，为此而和。目前环境益佳，无须求和，但为谋二国之真诚、永久、亲善合作，觉日本如能放弃侵略，当为言和。其原则在不损伤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于委座，系全国信仰、权威之所集，退隐根本不能谈。至于汪逆，为全国人士所无法宽容，故上述见解完全错误。

吉田表示：姜豪所谈各情，均所深悉，“但为面子，不得不如此，惟尚可商量。如委座退隐改为短期休养，汪逆问题亦可设法”。姜豪则称：“停战撤兵之后，个人问题，再行考虑。最重要事，在谈判期间不能成立伪中央，否则即无诚意，谈判无法进行。”汪精卫成立伪中央党部之后的下一步必然是成立伪国民政府，姜豪所云，显示出他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汪精卫成立伪府。对此，吉田答应“设法阻止”。双方最后约定，各自请示后再行约期续谈。电末，姜豪向朱家骅建议，利用谈判，在汉奸集团内部制造分化与对立，并设法诱使敌人“处决”汪精卫。电称：“据职观察，敌内部意见不一，至今仍思投机取巧，故今后应付方针，似宜继续虚与委蛇，以动摇其内部，并吸收汪系以外之汉奸，使与对立。如能彻底处决汪逆，则最佳。”

此电 11 月 16 日到重庆。朱家骅于 25 日复电姜豪：“盼速返渝。诸俟面谈。”姜豪收到朱电后，于 11 月 29 日回电，表示遵命准备返渝，但请示四点：

(一)戴先生所派，尚有其他任务，未奉其命可否离港。(二)家眷现在港，是否同返？(三)路费无着，机票难购。(四)何处商洽？

至于高山返沪后，板垣心腹今井对此事积极推动，故须磨十六日前有不利汪逆之谈话。惟今井表示，此事已至决策阶段，如吾中央确有诚意，须有要员出面，则彼可代表板垣来港晤洽，至少须职

赴沪先与一晤，否则禁止高山与吾方来往，以免上吾之当。高山因此甚焦急，已派人来此催复。惟高山近又来电，谓板垣处如决裂，彼返东京另行活动等语。此事已详告戴先生请示办法，但至今尚未获复。请就近与之商洽后详示一切。

今井，指今井武夫，当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课长。他原担任对汪精卫及其同伙的联络，但他认为：“成立南京政府自然还不是其目标，而是与重庆政府间实现全面和平才是最终目的。”^①因此，他于当年9月29日到任后，即努力开辟与重庆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络通道。从姜豪电可知，他对“姜豪工作”持积极态度，准备代表板垣征四郎到港与姜豪会晤，或命姜到上海见面。须磨，指须磨弥吉郎，日本外交官。1933年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次年任日本驻华公使馆一等秘书。1937年任驻美大使馆参赞。1939年9月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他于当年10月15日到上海，16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日本之政策，惟基于近卫之声明，至汪氏如何，或其他方面如何，在所不问。”“余目下不欲讨论任何中国方面之声明，连同汪氏之声称在内。”当记者问他，“日本是否以支持汪精卫为限”时，须磨回答：“日本之支持并不以某个人为限，而视其政权之主张。凡主张之合乎日本者，皆得广博之支持。”^②姜豪电所称须磨的“不利汪逆”的谈话，当即指上述言论。在姜豪看来，这是日方不专一与汪精卫打交道的表示。

12月2日，朱家骅收到姜豪上述电报，于当日复电称：

奉谕：不得进行，并速返等因。特奉达。

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12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② 《须磨之重要谈片》，《申报》，1939年11月17日第9版。

朱家骅当时地位显赫，所奉之“谕”，其来源可以意会，但朱家骅有意不说。12月5日，姜豪致电朱家骅，报告新情况：

板垣处加派人员会同高山定7日到港，职拟与其晤后来渝。戴先生处如何？乞与接洽后赐示一切。

在姜豪看来，日方既然加派人员到港谈判，很快可到，自然应该等一等。12月6日，姜豪再致朱家骅一电：

冬电奉悉，即遵命停止。惟7日来人，为顾全担任联络工作之朱、杨二人安全计，只得再与一晤。待二人料理沪上家务出走后，即绝往来。职将此情报告戴先生，待其核准结束其他事务，并待筹得路费后，即携眷来渝。职工作原意本在分化对逆内部意见与阻止汪逆组府，二月来尚见成效。今奉此命中止一切，自当遵命办理，但以未达最大目的为憾耳！

朱、杨，指上文提到的协助姜豪工作的朱泰耀、杨鹏抃。按中统纪律，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朱家骅既然命令“不得进行”，姜豪自然只能表示“遵命停止”。但是，姜豪显然不愿匆匆结束和日本人已经开始的谈判，所以除陈明自己不能立即回渝的种种理由外，还和盘托出自己的工作目的——“阻止汪逆组府”，并且特别说明“二月来尚见成效”，意在打动朱家骅有所触动。不过，朱家骅毫未动心。

姜豪的工作属于军统和中统双重领导。12月9日，朱家骅致电戴笠：

日前奉总裁面谕，姜豪同志所进行之工作不可再进行，并促其

速返等因。适值姜同志有电至，复电中已将总裁谕旨告之，特函奉达，敬祈察洽为幸。

原来，命令姜豪工作“不可再进行”，出自蒋介石“面谕”，这样，戴笠自然无话可说，姜豪也只能奉命返回重庆。

姜豪回渝后，留在中统局，奉副局长徐恩曾之命，协助全国粮食管理局指导各县粮管行政。姜不愿留在中统，以“兴趣较少”为理由，托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向朱家骅说情，要求调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① 1940年3月2日，朱家骅复电吴开先，说明组织部名额已满，请吴劝姜留在中统，其中谈到将姜豪从香港召回的原因：

至姜事所以迟迟发表者，先因曾由雨农兄任用，派在香港工作。继因总裁深以其工作为不满，奉谕召回，请兄转劝屈就。

朱家骅此电将情况说得更清楚，蒋介石对姜豪在香港与日本人的谈判深为“不满”，才下令将其召回。

抗战后期，蒋介石曾向美国人声称，抗战期间，他先后拒绝日本人的谈判要求十二次。朱家骅档案中所藏姜豪工作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其中的一个实例。

姜豪香港谈判的目的在于阻止日本人支持汪精卫组府。当时，日方也有人企图利用此点诱使重庆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9月，日本军部特务和知鹰二向中方提出，如日华之间成立“全面停战协定”，即可取消汪伪各组织，甚至可以将汪“剪除”。孔祥熙对此感到兴趣，于10月6日致函蒋介石，要求派人赴港谈判，不料引起蒋介石大怒。10

^① 吴开先：《致骅公电》，朱家骅档案。

月9日,蒋复函孔祥熙,严词痛斥:“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①姜豪在此后赴港,以阻止汪精卫组府为理由与日本人谈判,自然要在蒋介石那里碰钉子了。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叛逃,蒋介石最初很震惊,也担心此事会对抗战造成不良影响。当月22日日记云:“不料兆铭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呜呼!党国不幸,乃出此无廉耻之徒!余无论如何诚心义胆,终不当彼一顾,诚奸伪之尤者也。”^②据称,当晚他思考此事对国内党、政、军、各地,对外交与对敌等各方的影响,久不能眠。但是,此后,他逐渐认为,汪的叛逃并不纯粹是坏事。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其面目清晰暴露,蒋介石即为此庆幸,其31日日记云:“其通敌卖国之罪,暴露殆尽,诚不可救药矣。”“今汪既离党国,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敌欲望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灭矣。”^③次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蒋介石即称此为“党国之大庆”^④。后来,日本利用汪精卫为“奇货”,要挟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蒋介石即认为汪已无价值。1939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词中说:

伪组织是一定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不祥之物出现之日,就是敌人末日临头之时。现在敌人以为是他政治进攻之成功,但实际上就是他侵华政策上最后的失败。^⑤

① 《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参见《困勉记》,1939年10月9日。关于此事,参见本书另文《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② 《困勉记》。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大公报》,1939年11月13日。

次年3月2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

去年今日,余或恐其伪组织出现,影响国内与国际之心理;今年出现,则不惟无此顾虑,而且亦希望其能出现,虽于我无甚利害,而于敌国、对国际及我国民众之心理,必能发生恶劣之反响,或竟促成敌国之崩溃。与其酝酿而不出现,不如早出现为愈也。^①

蒋的公开谈话和私人日记都表明,在蒋看来,汪精卫的伪政权即使能组织起来,其结果不仅于中国无害,倒反而不利于日方,将加速日方的崩溃。蒋介石当时之所以对姜豪工作毫无兴趣,严令返回,其原因在此。姜豪在回忆录中以为这是“军统与中统又一场争斗的结果”,纯粹出于猜想。

姜豪在全国粮食管理局协助工作,其时间自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②。同年4月,任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管理处秘书,中统局方面则停职留薪,在此期间,再未到过香港,也再未参加中统或军统的情报工作。今井武夫称:铃木卓尔曾于1939年12月10日和第二年1月3日两次在香港与姜豪见面,姜自称多次接受重庆领导人的指示和意图,云云。^③证以姜豪留下的档案和回忆录,完全是在瞎说。

原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①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563页,1978。文字据“国史馆”所藏《事略稿本》有所校正。

② 姜豪:《致骝公部长函》,1940年4月23日,朱家骅档案。

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168~169页。

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五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曾通过多条渠道和中国政府联系，企图以“和谈”的方式取得其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日方派出人员，或属于军部系统，或为外务省官员，或为与中国有传统关系的“民间人士”。但是，也有一个特别的例外，这就是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从1938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受日本人之托，多次出入武汉、重庆，会见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有关资料，不仅真实地反映出抗战期间中日秘密外交的发展历史，也真实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到穷蹙困窘的没落历程。

王克敏企图和重庆拉关系，“推翻汪伪”

台湾所藏档案中，存有王克敏致宋子文函一通，中云：

别将三载，不殊隔世，想望之殷，笔楮难宣，必维起居胜常为颂。弟抵此二年余，一言难尽，忆前在沪与兄所论，殊非想象能及，今而知世事之变幻无常，而人心之莫可测也，然庸人自扰耳。近来孱体大非昔比，虽目力较增，而体力弥退。惟恐身先朝露，无由自明其心迹，时用忧煎，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此间近状，傅君当能

面述不赘。诸惟心照，顺颂时祺。

弟名心叩，4月6日^①

本函未署年，从内容考察，应作于1940年4月6日。

王克敏，1873年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清末曾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驻日公使馆参赞、留日学生副监督。1907年归国，先后供职于清度支部、外务部，并曾任直隶交涉使。民国后转入银行界，陆续担任中法实业银行董事、中国银行总裁、天津保商银行总理，并由此跨入政界，三度出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31年，任北平财务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财务处主任。1935年，任代理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1937年12月，与汤尔和、王揖堂等在北平组织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新民会会长。1938年2月，曾遭军统局天津站策划的暗杀，但仅受轻伤。同年9月，在日本侵略者的导演下，伪临时政府与在南京成立的以梁鸿志为首的伪维新政府在北平合流，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王克敏任主席。

函称“别将三载”，则王克敏与宋子文的上次聚首当在1937年。当时，宋子文一度被蒋介石摒弃于国民党权力中心之外，但仍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王则蛰居上海。同年10月，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山本荣治向王克敏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据

^① 《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以下不一一注明。

传,此事王克敏曾和宋子文商量,宋表示,可以先出面“对付日本人一阵”^①。王克敏写此信的时候,已出任华北伪政权的要角,而宋子文则寓居香港,处理中国银行业务。函中所言傅君,指傅泾波。傅于1900年出生于满族世家,祖父当过甘肃巡抚,1918年在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时结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一个出生在美国人,曾在金陵神学院教授希腊文,1918年任燕京大学校长。1920年,傅入燕京大学读书,自此成为司徒雷登的亲密助手。司徒雷登曾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

王克敏致宋子文函属于叙旧与联络,函称“惟恐身先朝露,无由自明其心迹”,暗示他虽出任伪职,但仍忠于国家。“爱我如兄,宜有以教之”,则是明显地要求宋子文为其助力。由于事关机密,他请傅到港的真正目的未在信中透露。4月17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称:

昨傅泾波兄来港晤谈,最近在平时,叔鲁告以日军统制派对汪伪组织仍持不妥协态度,彼亦正在进行破坏工作。就彼所知,汪日所订条约,如撤兵驻兵问题、内蒙问题以及经济合作问题等等,均极端丧失国权。据彼见解,应觅取途径,推翻汪伪,重新与日订立比较平等条约。如果有此可能,彼甚至竟来重庆。彼如一经到港,则汪伪当可瓦解云云。

傅泾波兄刻尚在港。倘兄有所询问,当即来渝陈述。叔鲁致弟一函,兹并附察。^②

^① 傅泾波回忆,见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战局》,29页,新华出版社,2001;关于此事,还有另一种说法,即王致电宋子文商量,宋请示蒋介石后,复电称:“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见文斐编:《我所知道的伪华北政权》,5页、3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录此备考。

^② 《革命文献》,《蒋中正总统档案》。

平,指北平。叔鲁,王克敏的字。王在北平成立的伪政权虽号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是,王出身北洋,对国民党系人员并无多大号召力,因此,日本侵略者在积极扶植王克敏和另一个汉奸梁鸿志的同时,仍将主要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身上。1938年12月,汪的亲信梅思平等在上海重光堂与日本人会谈,签订协议,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中国驻扎,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区域。同月,汪精卫等逃出重庆。1939年12月,汪指派周佛海等与日本人谈判,日方提出《日中新关系调整纲要》,空前地扩大了日军在中国的驻兵权,而其撤兵时间则可由日方自由解释。《纲要》同时提出,华北、蒙疆的特定资源由“中日合作开发”,其他地区国防资源的开发则须为日本提供便利,日本拥有对华北政治、经济的“内部指导权”以及对华北铁路的经营权等。12月30日,汪精卫竟在以《纲要》为基础的《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协议书》上签字。王克敏对傅泾波所称“汪日”所订“均极端丧失国权”的条约,指此。

王克敏是投靠日本,成立傀儡政权的“老前辈”,日本侵略者又曾一度打算将他的政权扶植为“重建新中国的中心势力”^①,自然不甘于让汪精卫后来居上。1939年6月,汪精卫曾到北平与王克敏会谈,希望与王“合作”,王则强调临时政府的“独立”和“自主”地位,要求以之为主体组织伪中央政府,谈判未能取得成效。汪精卫刚一离开北平,王克敏立即召开记者会,宣布不支持汪精卫的任何冒险事业。同年7月,汪在南京继续与王克敏、梁鸿志会谈,磋商成立“中央政府”。王克敏大谈其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说,自称为“皮”,指汪为“毛”,要求汪附到自己这张“皮”上来。汪则提出,未来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担任,这就排除了王克敏等染指这一职务的任何可能。按汪的设计,“临时”、“维新”两个政府只能有6人参加“中央

^① 《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下),381~384页。

政治委员会”，占总数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种情况，自然引起王克敏的强烈不满，“激忿到几乎使会谈决裂”。在日本人干预下，汪精卫作了让步，决定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和“维新”两个政府占三分之一。1940年1月，汪精卫在青岛再次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会谈。三方达成协议，合组“中央政府”，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汪则同意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给予相对独立的权力，并以王克敏为委员长。同年3月29日，王克敏宣布“临时政府”自动撤销。30日，汪精卫在南京宣称“还都”，成立伪国民政府。4月1日，王克敏宣布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

宋子文致蒋介石函表明：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日军华北当局并不赞成，王克敏与汪原存的矛盾也未消解，因此，王通过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拜访宋子文，企图建立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系，借此推倒新建的汪政权。王克敏甚至表示，愿亲到重庆谈判。函称：将“推翻汪伪，重新与日订立比较平等条约”。前一句话确系王克敏的愿望，后一句话不过是向重庆国民政府展示的诱饵而已。

蒋介石没有上当。4月21日，蒋介石复宋子文函云：

十七日函悉。傅转来之意，请代告其前途，切勿有架桥之意，望其绝念为要。此意且已面详司徒校长矣。傅不可来渝。饬勿谈。

“请代告其前途”。“前途”，指王克敏。“架桥”，指联系中日双方。蒋要王“绝念”，并且不准傅泾波到重庆。“饬勿谈”，这是对宋子文的约束。复函很短，但蒋介石拒绝和谈的态度表达得很坚决、很明确。

在傅泾波到港之前，司徒雷登已经到过重庆

蒋介石复宋子文函称：“此意且已面详司徒校长矣”，可见在傅泾波到港之前，司徒雷登已经到过重庆，蒋已经向他表达了拒绝和谈的态度。

在日本政府和军部中，支持汪精卫出面组织伪政权是主流意见，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完全赞成，他们主张和蒋介石直接打交道，至少也要促成蒋、汪合作。如先后担任日本陆军参谋次长、第三军司令官、华北派遣军司令官等职务的多田骏，初任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后任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部长的喜多诚一，以及先后担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等。

1938年2月，多田骏授意王克敏，邀请司徒雷登出面，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其条件为：1. 禁止反日运动；2. 建立良好的华北行政区；3. 经济合作；4. 赔款。^① 同月26日，司徒雷登偕傅泾波离平。3月11日，抵达汉口，见到蒋介石。当时武汉正处于火热的抗战气氛中，司徒雷登发现，没有任何调停希望，便没有向蒋转达日方通过王克敏提出的条件。^② 回到北京后，司徒将所得印象告诉王克敏，王要求由他安排，将情况报告日本军方。关于这一过程，司徒雷登回忆说：

他是华北有名无实的政府首长，早就彷徨不定自己是否应该在日本军阀下面出任这种被认为不爱国的职位。他听我很高兴地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38, Vol. 3, p. 109.

^② *FRUS*, 1938, Vol. 3, p. 124.

谈到中国全体人民在蒋委员长感召领导下继续抗战的坚决意志，然后问我是否愿意由他替我安排，让我把这种情形告诉当地最高日本军官。日方自然早已知道我的旅行经过，但无法阻止一个中立国的国民。王克敏的提议倒是令人难决的，但我终于接受了。同往的还有一向伴随着我的傅泾波和我的勇敢译员。此后每次旅行的时候，我更事先大胆通知日方当局，并问他们是否有什么事要我办。^①

1939年7月，司徒雷登受喜多诚一的委托，再到重庆，将驻华北日军的和谈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的回答是：1. 日本必须将其部队、伪组织、企业撤往关外；2. 所有和谈活动排除汪精卫的参与；3. 如果日方和王克敏有诚意，将考虑派张群前往会晤。8月中旬，司徒会见王克敏，声称：“蒋拟与日本直接谋求和平，对汪是要彻底予以破坏，但并非不要和平。”^②9月14日，司徒雷登再次会晤王克敏，声称：“这一工作的背后有英、美对蒋的压力（指停止援助），它意味着为了使蒋不走向共产及防止苏联势力的扩张，希望蒋和日本相互妥协，恢复中国的和平。”^③喜多诚一对此感到兴趣，建议将对汪精卫的工作推迟到9月份。但是，由于蒋坚持的谈判先决条件还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照此办理，日本将失去1937年7月以来所有的侵华成果。同时，汪精卫认为这是重庆方面的谋略，要求停止接触。日本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樋口称：“司徒雷登之流是撒谎的惯犯，如今对汪若采取无视的态度，日本的武士道就成

① 李宜培等译：《司徒雷登回忆录》，台湾《大华晚报》1954年印本，79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26页，中华书局，1981。

③ 同上。

了废物。”^①这样，司徒雷登的此次斡旋就无果而终。

1940年1月，日本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通过王克敏，建议司徒雷登再到重庆，向蒋介石转达两点：1. 如蒋有诚意，根本变更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政府共产分子，而与汪先生合作，汪先生或可接受。2. 蒋对于收拾时局若有意见，最好与汪径谈，否则王可从中传达，并派渝密使来谈。^②周佛海和汪精卫都同意多田的意见。同年2月24日，司徒雷登到上海，与周佛海会晤。周托司徒到重庆见蒋时转述：“（南京）中央政府势必组织，但决不为东京、重庆间讲和障碍。”同时劝蒋“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③，那意思是说：战胜日本并非易事，不要因为和汪精卫的个人恩怨放弃“和平”机会。26日，喜多诚一专程返日向陆相畑俊六汇报，说明司徒提出的和平原则共8项：1. 日本必须以蒋委员长为和谈的对象；2. 以近卫三原则作为和平之基础条件；3. 华北、蒙疆之防共仍是必要措施（非指驻兵）；4. 日本必须调整经济合作的范围；5. 文化合作可以接受，但必须改编教科书；6. 原则上日本必须撤兵，唯华北、蒙疆可以暂时驻留；7. 设置委员会，促进经济合作；8. 对欧美仍须维持友好关系。其中所谓“近卫三原则”，指“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1938年1月，由于蒋介石拒绝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声称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年11月3日，近卫再次发表声明，对愚蠢、僵硬的第一次声明有所修正，表示如国民政府能抛弃“错误政策”，则日本政府亦可“不加拒绝”。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中、日、“满”三国“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及所谓对华“三原则”。为了诱使重庆国民政府上钩，近卫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29～30页。

②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1940年2月12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③ 《周佛海日记》，1940年2月24日。

甚至以“尊重中国的主权,允许考虑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相诱。蒋介石对近卫的三次声明都持反对和批判态度。在近卫提出所谓“三原则”之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即公开发表谈话,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括,也是敌人整个的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①第七天,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发表驳斥《近卫宣言》对敌之影响如何?足使敌知所警戒,打破其变换威胁或计诱之妄念乎?”^②因此,蒋介石不可能以“三原则”作为和平的基础条件。喜多声称上述8项条件为司徒“所知”的蒋介石的和平原则,其实,这不过是司徒雷登的想法而已。

司徒雷登不赞成日本制造汪政权。他在上海时曾对周佛海表示:“对重庆工作并不是英美大使及王克敏的意愿,而是日本渴望和平,希望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所以放弃‘新政府’较为妥善。”1月27日,畑俊六得到报告,得知司徒的有关言论,大发雷霆。^③

3月初,司徒雷登到达重庆,会见蒋介石。他向蒋介石表示:不仅他个人,而且美国政府和人民都盼望中日之间有建立于共同利益之上的关系。美国关心中国的自由、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蒋介石则表示,除非经由美国总统,他将不考虑与日本的和平谈判。这是由于,他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及其对国际道义的认知,也是由于对罗斯福总统个人的尊重,但是,蒋又表示:他现在还不准备要求总统出面调停。让日本人违背自己的利益,放下架子,走出侵略狂热,进入谈判过程,还有很长的路。中国宁愿继续战斗,直到和平条件成熟,中国获得自由。日本

^① 《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1938年12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

^② 《困勉记》,稿本。台北“国史馆”藏。

^③ 《畑俊六元帅日记》,转引自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印《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216~217页。

人必须从长城以南撤退全部军队,和中国讨论满洲问题,或者双方坦率认可,将这一问题搁置。^① 蒋认为,满洲问题较难解决,因此,将中国的抗日分为两步:第一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第二步,以外交手段,通过谈判收回东北。蒋这里向司徒雷登表述的,就是他的第一步计划。^② 蒋并称:中国有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去,三年五年在所不计。目前的困难在于财政,因此,进一步的外国贷款成为抑制通货膨胀、鼓舞抗日信心的重要措施。4月5日、10日,司徒分别写信给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和罗斯福总统,汇报上述情况。在致罗斯福总统函中,他呼吁总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中国。例如,对日本实行经济封锁,进一步给予中国以财政援助,减少其通货膨胀的危险等。他认为,这种做法,所冒风险甚小,而利益,即使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都是巨大的。^③

在和司徒雷登的会见中,蒋介石已经将对日本“诱和”的态度及其抗战决心表述得很清楚,因此,自然没有再见其助手傅泾波的必要。如本文一开头所述,傅想通过宋子文的关系打开重庆之门,自然要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4月底,司徒雷登到达上海,向日本议员田川大吉郎传达与蒋介石的会晤情况称:

1. 虽然重庆方面也想以《近卫声明》为基础,而日本方面却不实行此声明,看不到实行此声明的证据。日本要压服中国,几乎没有承认中国独立和尊重中国主权的意思。

2. 蒋介石没有说日本不撤兵就不答应和平解决,也没有说不撤兵中国就不能实现和平,也没有说不撤兵就不进行谈判。

① FRUS, 1940, Vol. 4. pp. 315 - 316, 324.

② 参阅本书另文《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③ FRUS, 1940, Vol. 4. pp. 315 - 316.

3. 蒋介石希望根据《近卫声明》处理时局,但是,日本是一副占领者的姿态,不尊重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蒋介石对于《近卫声明》的内容还有模糊之处,但对其宗旨是明了的,希望做到名实一致。

4. 蒋介石希望达成和平协定,并相信早日和睦地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是符合中日两国的利益的。

5. 司徒雷登认为,给人的印象是日本战胜了,但暂时必须有所控制。现在需要的是双方都站在平等地位,谋求东亚的永久和平与亲善,即可实现和平。

6. 蒋介石对蒙疆及华北抱达观的态度。^①

这6条,和上述司徒本人在致罗斯福总统函中汇报的情况不符,也和蒋介石对中日谈判及《近卫声明》的一贯态度不符,因此,只可以视为司徒本人的态度,或者是司徒为劝诱日本人而有意编造的辞令。

在未到上海之前,司徒雷登曾两次捎信给周佛海,表示急盼与周见面,使得周佛海感到“蒋先生有和意”,因而兴奋异常。同月28日,周佛海从特务李士群处得知,“蒋今仍逞意气,不顾大局,实为可叹”。同日,周与司徒雷登谈话,司徒安慰周称:“美国出面调解,蒋或可接受。”但周已经绝望,批评说:“蒋对汪仍不谅解,未免意气用事。”二人虽相约共同努力,但周佛海当日还是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话:“恐前途仍属悲观。”^②

汪精卫等虽在日本侵略者扶持下成立了伪政权,但是,并无多大信心,因此,也期望“汪蒋合作”,借以摆脱叛国投敌的困境。5月1日,周佛海与陈公博、汪精卫商讨司徒雷登出面斡旋情形,陈提议周佛海赴沪,邀请与蒋介石有深厚关系的银行家周作民赴重庆助力。周称:“蒋

① 《中国陆军事变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47页。

② 《周佛海日记》,286~287页。

先生仍意气用事,全面和平前途辽远,至吾辈对重庆说话,似乎尚早,必须做出几件事,表示吾辈并非无办法,然后再与之谈。”陈公博同意周的意见,但汪精卫则称:“不妨同时并行。”^①4日,陈公博访问周作民,周称:“蒋无和意。”^②24日,周佛海会见汪精卫,汪称:“蒋先生表示,即打至缅甸,亦不愿与吾辈合作。”周佛海自感计穷力竭,叹惜道:“余数月来已用尽方法,向渝方表示诚意,并表示如全面和平可期,吾侪虽亡命,亦所不惜。今蒋竟如此,吾侪之心尽矣。”^③

在汪精卫、周佛海等谋划与蒋“言和”的同时,司徒雷登偕同傅泾波再到重庆,继续斡旋,但仍以无果而终。今井武夫回忆说:“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的五月,司徒雷登校长同傅泾波教授相偕去重庆,王克敏和华北日军首脑间进行密切联系,期待他们的答复。可是,司徒雷登校长却一时难回,唯有徒耗时日而已。一隔数月之久,带回的只不过是作为蒋介石意图的抽象的回答。”^④今井认为,其原因在于“汪兆铭政权的成立,使重庆政府对日军谈判的热情突然降低了”。其实,今井讲得并不正确。6月4日,蒋日记云:

闻王克敏、周佛海派人来求和。彼辈妄想由汉奸为桥梁而谈和议,并以较低条件为诱饵。彼辈心理,以为先立伪组织,再求中央谅解,以图合流,所以造成汉奸罪恶,而敌阉受其愚弄至此,尚不觉悟,匪夷所思,又来诱和,亦太不自量矣!敌在此时,如有理智与常识,果为爱国,应真正无条件撤兵,以挽救其颓势,然而敌必冒险

① 《周佛海日记》,288页。

② 同上,289页。

③ 同上,299页。

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171页。

狂妄，非激起其国内变乱与崩溃，中倭必无和平之望也。^①

日本侵略者认为，通过王克敏、周佛海等一类“中国人”出面，实现汪、蒋合流，并且降低条件，这种做法较易收效。今井等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时期，重庆方面正弥漫着强烈的反汉奸、反投降气氛，日本人的做法只能遭到蒋的鄙视。蒋并非不想“和平”，但他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真正无条件撤兵”。蒋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特点一是“冒险”，二是“狂妄”，不到穷途末路，是不会放弃其侵华方针的。

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久，王克敏的后台喜多诚一被调回日本。6月7日，汪政权发表命令，准王克敏辞去本兼各职，由王揖唐接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台后，王克敏退居青岛，宣称“静心养病，闭门谢客”，但仍暗中活动，伺机再起。1940年11月，国民党中统在天津的地下机关得到信息：“近闻在长崎之王克敏，受日本之意，拟与中央发生关系，进行中日问题之解决，其间系经司徒雷登居中转圜。”又云：“近王克敏托人，急欲寻求与中央有直接关系者，向总裁传达一切。”^②这就说明，王克敏始终没有忘记利用司徒雷登这一线索为日本侵略者的“诱和”策略服务。

司徒雷登再赴重庆

日本侵略者始终不放弃对蒋介石的诱和。1940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松冈洋右出任外相。他决定收回原由军部等牵线的对华

① 《困勉记》，1940年6月4日，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

② 《赵支诚致朱家骅电》，1940年11月5日，朱家骅档，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

秘密谈判,统归外务省办理。同年11月,他通过原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与蒋介石联系,达成初步协议:日本无限期延缓对汪伪政权的承认,无条件从中国撤兵。日本内阁会议本已同意,但是,事隔一日,又在军部等力量的反对下否决。蒋介石觉得受到欺骗,认为对日本这种“无礼无信之国,不可再理”,指示钱永铭对日“决绝”。^①此后,松冈洋右仍企图挽回,重建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系。12月,松冈派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课长山田专程到北平,动员司徒雷登再次出面斡旋。同月9日,二人见面,山田称:外相松冈洋右经过努力,已获批准,直接与蒋介石谈判,并且已经派东亚局局长赴香港,希望在承认汪精卫政权之前完成谈判。山田询问司徒,何以蒋介石拒绝会见日本代表。司徒雷登以1940年3月与蒋见面时蒋对此的解释作答:1. 由于日方代表的既往表现,他无法信任他们;2. 他无法确信,日方来使的言论能真正代表整个日本的国家政策。司徒雷登称:汪政权为日本军事当局制造,受日本军事当局直接、间接的控制,因此,日本承认汪政权并无真正意义。日本的唯一出路是,从中国领土撤退所有的武装力量,保证中国独立,这样,日本代表才能与蒋介石会见,讨论和平问题。司徒告诉山田,日本解决中国问题,有两种政策:一是继续实行武力政策,征服并控制整个中国;二是改取友好关系,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获取合法利益。如果日本采取第二种政策,将能重建与美国的友好关系。他说:美国的基本利益是保持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随后,司徒雷登提出十个问题,让山田转交日本当局。^②

司徒雷登曾将与山田会谈的情况写成信件,寄给英国驻华大使,建议转呈蒋介石,函称:

^① 《困勉记》,1940年11月28日。

^② FRUS,1940,Vol. 4, pp. 466 - 467.

去年12月9日,余与山田约晤,……此人系日外务省东亚局第一科长。山田初则详述松冈外相如何努力寻求与重庆正式直接谈判之机会,并曾遣派东亚局长田尻赴港作此活动,希望于必须承认汪政权以前能有眉目……山田亦承认松冈不过姑妄试之,并未寄过大之希望……山田继则对于蒋委员长何以不愿商谈和平,甚表惶惑不解……山田又询蒋委员长何以不愿接见任何日方代表,余称当余最近见委座时得悉有两种理由:观于日人过去之行为,无法对彼等发生信任,而此项人员能否真正代表其举国之意见,亦无确切把握。^①

司徒雷登在此前和蒋介石的会谈中,已经对蒋的有关想法一清二楚,写此函,主要为报告情况,观察蒋的反应,故未提出具体意见。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急于与中国谋和。1940年6月至7月,派贾存德、蔡惠到重庆,与孔祥熙接洽。^②同年8月,板垣甚至出具亲笔保证书,企图到为中国军队所控制的长沙,实行与蒋介石见面的“巨头会谈”。^③在这些企图先后失败后,板垣又于1941年1月邀请司徒雷登前往南京会商,声称愿在任何地方,甚至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与蒋介石或他的代表进行私人会晤。2月13日,司徒与板垣二人在上海会面。板垣称:有18位日军将领在南京军事会议上一致表示,渴望结束中日战争,“承认蒋介石”,为此,将撤退关内全部日军,以保证中国国家独立。板垣并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调解,所有问题都将在中、日、美三方参加的会议中解决,期望罗斯福总统能采取主动,找到使彼此都

① 《特交档案》。

② 参见本书另文《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③ 参见本书另文《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

满意的解决办法。^① 2月24日,司徒雷登托人告诉周佛海,他得到新近从重庆回来的美国友人消息,“渝无意和平”^②。4月初,司徒雷登乘参加教育文化基金会议之便,再次赴重庆。行前,日本使馆参赞向司徒探询由美国出面调停、结束中日战事的可能性。司徒答称:他个人的意见是,如果中日都提出要求,如果中国得到日本撤军保证,愿意和谈,美国将出面调停,并参加三方讨论。^③ 到重庆后,司徒三次会晤蒋介石,并与孔祥熙、何应钦等长谈。他得到的印象是,蒋介石对日本和谈条件不感兴趣,在重庆感觉不到对日求和的趋向。5月7日,他到上海会见周佛海与陈公博称:“蒋目前无意和平,须俟世界战争总结束后解决中日问题。”“日本不能持久,故最后胜利必属于我。”^④

同年,不少日本政治家,以至高级军官都意识到解决中日战争的必要性,主张:1. 和蒋介石谈判;2. 从中国领土、领水撤退全部武装力量;3. 美国参与。连王克敏都认为,日本不能坚持过这一年。^⑤ 大概就在这一时期,司徒雷登曾寄宋美龄一函,中云:

前信已述及,日本甚愿与委员长直接讲和,现在亦然,但可使委座愿意谈判之条件距离尚远,加以现在国际局势进展于中国有利,委座坚拒和议,无疑的甚为合理,故只有听其自然,不可强求,果熟自然蒂落,为时恐亦不远矣。^⑥

① FRUS, 1941, Vol. 6, pp. 36 - 37.

② 《周佛海日记》, 1941年2月24日。

③ FRUS, 1941, Vol. 6, pp. 117 - 118.

④ 《周佛海日记》, 1941年5月7日, 460页。

⑤ FRUS, 1941, Vol. 6, pp. 322 - 323.

⑥ 《特交档案》,《蒋中正总统档案》。此函原未系年。

从1938年起至1941年止,司徒雷登数次出入武汉、重庆,企图说服蒋介石和中国政府,接受他的和平斡旋。本函称“委座坚拒和议,无疑的甚为合理”,可见被说服的不是蒋,而是司徒雷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就受到日本华北军事当局的拘禁。1945年7月,日本侵略者覆亡前夕,日本政府派河相达夫、外务省官员永井洵一、参谋本部官员山崎重三郎到北平访问还在拘禁中的司徒雷登,说明日本所面临的绝境,表示应不讲任何条件,立即结束战争。司徒雷登提醒道:“7月26日的波茨坦会议曾经声明结束战争的条件是‘无条件投降’,而蒋委员长也已经表示同意。因之,我同任何人都不能有所作为。只有劝导日皇与日本新阁从速接纳。至于顽强的军部纵仍提出反对,亦可不予顾及,因为他们的愚蠢已使国家蒙受惨重的祸害。”^①司徒雷登认识到,这个时候,历史已经不给日本侵略者提供机会了。

司徒雷登是美国人,本与中日战争无关,他的多次斡旋纯系个人行为,表现出他反对侵略,期望中日两国之间能建立和平、友好与互利关系的善良愿望。但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其“和平谈判”或者是侵略的另一种形式,或者是挽救失败、逃避惩罚的手段。自然,它要受到当时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拒绝,司徒雷登的善良愿望最终落空乃是必然的。

抗战胜利前夕,王克敏通过其女婿周泽岐及其弟宗岐自西安致电宋子文,表示拟赴重庆接洽。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声称:“彼辈此来,或与北方日军投降有关,可否饬雨农派人探询?”^②这是王克敏再次企图通过宋子文与重庆政府联系。自然,没有任何结果。1945年12

^① 《司徒雷登回忆录》,91~92页。

^② 宋子文文件,第58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月,戴笠在北京设计,以蒋介石名义邀请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共商华北大计”,当场逮捕。

本文为提交 2006 年 11 月在温哥华召开的“战争及其代价”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原载《中国文化》第 23 期,2006 年秋季号。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 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 ——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六

抗战时期，蒋介石在公开谈话或与日方的秘密谈判中，曾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条件或“抗战到底”之“底”。部分学者对此的解读是，蒋准备放弃、出卖东三省，因此他们对蒋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持严厉批判态度。但是，批判者实际上并不了解这一问题提出的过程及其来龙去脉，往往容易从既定观念出发，对之加以解读、引申，因此，有关批判也就很难准确。

历史学应该是一把最公平的秤。人们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好恶可能因种种原因而不同，但是历史科学应该力求还原历史本相，并给予正确解释，不离开历史真实而去有意拔高或贬低任何人，要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是关涉蒋介石和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大问题，要重建科学的、真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必须研究清楚。

为《九国公约》布鲁塞尔会议准备的预案

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也有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

1937年7月，日军制造“卢沟桥事件”，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此后，

中国政府一面坚决抵抗日本的军事进攻，一面仍对和平解决抱有希望。7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大使馆，要求该馆迅速转电华北日军当局，“严令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该处事变以前状态，静候合理解决”^①。1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接见日本驻华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要求：1. 双方出动部队各回原防；2. 双方立即停止调兵。^② 15日，外交部再次照会日本使馆，重申12日照会内容，要求日方“将此次增派来华之日军悉数撤回，并将本案肇事日军撤回原防，恢复事件以前之状态，静候合法解决”^③。至此，恢复“事变以前状态”只是解决卢沟桥事变中双方军事冲突的方法，尚非解决中日两国战争的外交原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提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能要求任人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领土，不能受任何约束。蒋称：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蒋的这些主张，已经超出卢沟桥这一具体事件的范围，发展为解决中日两国间冲突的一般原则，成为后来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的思想基础。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一如既往，将问题提交国联，以争取国际的支持和援助。9月13日，国联在日内瓦开会。会议将问题交给国联远东咨询委员会。远东咨询委员会指责日本“诉诸武

① 《外交部致日本驻华大使馆》，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211页。

② 《王宠惠与日高信六郎谈话记录》，《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223页。

③ 《外交部致日本驻华大使馆》，《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212页。

力”的行为，但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建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讨论。会前，列强的设想是：通过有关国家的共同帮助，“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以斡旋或调停的方法达成一项和平解决的办法”。为此，列强希望在中日两国军队之间达成停战或停火，同时邀请日本参加会议，直接对话，劝导日本接受调解。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通过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同僚们已经了解到，有关国家“把重点放在先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然后通过斡旋或调解取得迅速解决”^①。但是，现地“停战或停火”对中国并不利。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军已经迅速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地区，上海也正处于日军的包围中。现地“停战或停火”将意味着首先承认日本侵略者的这些“战果”。

为准备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中国政府曾在国内外的少数智囊人士中征求意见，从而形成一份文件，题为《关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初步研究》。该文件提出，无条件的“先行停战”对中国不利。文件称：

会议之时，或先提出一要求双方停战，留出时间以便接洽……日本方面若不允停战，应付极易，但虑日本方面军事或到利于停战之时，未尝不可允许，果尔，中国方面地位极感困难，因中国方面立足在自卫二字，无拒绝停战之理由……但先行停战，除军事上或有作准备之利益外，皆有害无益。

因此，智囊人士建议，中国外交人员应提前与英、美、法、苏等国暗中接洽：“声明如有先行停战之要求，至少须附有‘日本军队应迅速退还卢沟

^① 《顾维钧回忆录》卷2，589页，中华书局，1988。

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否则事实上无异帮助日本压迫中国也。此点为会议前应暗中请英、美等国谅解之一重要点。”^①智囊人士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停战或停火”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剥夺日军在卢沟桥事变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战果”(包括已经占领的土地),是一个有利中国而且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方案。

当时,中日之间的最大问题是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广大土地,并且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怎样面对这一现实呢?智囊人士在另一份文件中提出:

吾人共同最后之希望,固在收复东三省暨其他一切失地,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若不先在一强有力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完成经济、社会、军事上之新建设,似尚不足以言此,故吾人认为:一、在此会议,不必坚持收复东三省失地及修订条约两问题;二、于日本要求,应慎重考虑,不必一概予以拒绝,且须以具体对策应付之。^②

智囊人士认为,收回东北三省及其他一切失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中国的奋斗目标,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中国的强大,《九国公约》会议作用有限,因此,不应在会上提出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智囊人士的意见显然得到蒋介石的肯定。10月21日,陈布雷代表蒋介石致电顾维钧,对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作出指示:1. 促动苏俄参战决心,并设法减免其未能决心之忧虑;2. 继续运动各参加国政府及社会,加紧对日一致之经济压迫,务使“国联”谴责日本之决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和平酝酿》,台北“国史馆”藏,以下简称“蒋档”。

^② 《中日两国在九国公约会议所采取之态度及应取之办法》,“蒋档”。

议事实化；3. 向参加各大国请求战费借款及军械贷款。同时，陈布雷要求代表们于会前先向英、美、法、苏等国说明“最要各点”：

①调解方案未妥协前，无条件之先行停战，于中国大不利，至少必须有“日本军队应退还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一条件。

②华北已成为中国国家最后生命线……不能容任日本所谓“特殊化”之组织存在。

③必须设法令日本将在中国之驻兵及军事特务机关完全撤退。^①这样，“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就成为中国代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预案。

《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中国代表不仅会前做了相应的工作，而且也在会上提出了这一问题。11月6日，顾维钧偕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会见美国首席代表戴维斯。此前，日本政府已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提出，要求德国政府出面斡旋，因此，戴维斯询问程天放：如果德国真想提出愿意为中国调停，中国是否接受调停？什么样的条件中国方面可以接受？程天放当即回答：“任何调停应有先决条件，即须恢复7月7日以前之状态。”^②

根据以上叙述可见，在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方案的同时，蒋介石及其智囊人士并未准备放弃东北，而是准备将这一“老大难”的问题留待适当时机，以免干扰当前较易解决问题的解决。此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采取这一策略。

① 《应令顾大使等注意要点》，“蒋档”。

② 《顾维钧等致外交部》，1937年11月6日，《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396～397页。参见《顾维钧回忆录》卷2，617页。

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 运用与苏联政府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以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弃抵抗。^① 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请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威胁蒋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及时结束战争，不要落到“无条件投降”的悲惨下场。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提出的7项和平条件：内蒙建立自治政府，与外蒙国际地位相等；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以南一线设立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华关税税率；尊重外国权益。日方同时声明：如日本被迫延长战事，则条件必数倍苛刻。^② 同日，德国外长牛赖特训示陶德曼，将上述条件转告蒋介石并劝其接受。

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及孔祥熙，转告日本条件，再次警告蒋：“千万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蒋介石当即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他说：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至于具体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首先必须恢复原状。^③ 可见，蒋提出这一问题，目的仍在于剥夺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果”，

① 《日本四相会议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纲要》，《年表及文书》（下），370页。

② 《德国调停案》，《外交部案卷》，00062A, 0556。

③ ADAP, Serie D(1937—1941), Bd, 1, No. 516, 中译文参见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164页，四川大学出版社。

抵制日方以其武力胜利为基础所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蒋自感当天的谈话很强硬,在当日日记中自述云:“敌托德使传达媾和条件,来作试探,仍以防共协定为主,余乃严词拒绝之。”^①12月2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重申:“中国在华北之主权与行政必须不变,并须保持其完整。”“如德国元首向中日两方建议停战,作为恢复和平之初步办法,则中国准备接受此项建议。”^②当日,蒋介石决定将谈判情况通知英、美、法、苏四国。^③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基本条件”(新四条),要求中国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对日本赔款。^④中国政府认为“上项条件无考虑之余地”。28日,蒋介石密嘱杨杰,将上项条件密告苏联政府并听取意见。^⑤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反对日本侵略上有共同利益。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命其向苏方询问,如《九国公约》会议失败,中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⑥。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表示,在紧急关头,苏联将参战。^⑦但是,苏方的答复不过是一种表态。因此,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仗义兴师”时,苏联却借词推脱了。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声称:“假使苏联

① 《困勉记》,稿本,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均同。

② 陶德曼12月2日电,《德国调停案》,《外交部案卷》,同上。

③ 《困勉记》。

④ 《日本内阁会议议决的日本外务大臣致德国驻日大使复文》,《年表及文书》(下),380页。

⑤ 《王宠惠致杨杰电》,《德国调停案》,《外交部案卷》,同上。

⑥ 《蒋委员长致蒋廷黻转杨杰养电》,《对苏外交》,“蒋档”,台北“国史馆”藏,46页。

⑦ 《苏中关系(1937—1945)》俄文版,第1册,第111号、121号文件,138、156页。

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斯大林等开出的“参战”条件是,《九国公约》签字国全部或其中主要国家的允许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批准。电中,斯大林等表示,在上述条件未能满足时,苏联将用种种途径及方法,极力增加对中华民族及其国民政府的技术援助,同时,支持蒋介石在和陶德曼谈判中的立场。电称:“日本如撤回其侵华中及华北之军队,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时,中国为和平利益计,不拒绝与日本实行和平谈判。”^①

这样,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就不仅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而且也成了苏联政府的意见。

蒋介石在对日谈判中一贯坚持的先决条件

陶德曼“调停”因中国政府的婉拒而失败,但是,日本政府和军方都仍然“战和并用”,一面军事进攻,一面暗中谈判。蒋介石对日本,事实上也采用同样的对策。在公开的声明和演讲中,蒋介石多次批判与日本的谈和、妥协活动,他对孔祥熙通过多种渠道和日方的联系也常持严厉的批评、阻遏态度,但是,在日本多次伸出“和平”触角时,蒋介石也曾“姑妄试之”,小心翼翼地亲自掌控过和日方的几次秘密谈判。在这些谈判中,蒋介石始终坚持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不可。这既是与日方谈判的条件,也是谈判的前提。

1938年9月,萧振瀛与和知鹰二在香港谈判。9月23日,蒋介石

^① 《对苏外交》,“蒋档”。

在汉口主持汇报会,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谋停战。”^①27日,萧振瀛在谈判中强调:“现在日军进攻武汉,大战方酣,中国方面不能作城下之盟,故目前最要之着,为停止军事,恢复七七前之状态。”^②当时,和知鹰二以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要求与中国签订军事与经济协定。28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要求萧向日方坚决表明:“原状未复,诚信未孚,即未有以平等待我中国之事实证明以前,决不允商谈任何协定。”^③10月8日,蒋介石在对参加谈判的另一人员雷嗣尚“面训”时再次指示:“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④19日,何应钦又向萧转达蒋介石指示:“关于经济合作与军事布置等事,必须待恢复原状后,以能否先订互不侵犯协定为先决问题。又无论何项合作,必以不失我独立自主之立场而不受拘束为法则,请于此特别注意。”^⑤

萧与和知的香港谈判中,中国方面曾准备了一份宣言,中称:“中国所求者,惟为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民族自由平等之实现。日方诚能如其宣言所声明,对中国无领土野心,且愿尊重主权行政之完整,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原状,并能在事实上表现即日停止军事行动,则中国亦愿与日本共谋东亚永久之和平。”^⑥在这段文字下面,蒋介石曾经以红笔加写了一段:

① 《事略稿本》,未刊稿,台北“国史馆”藏。本稿正陆续刊行中。本文所引,凡注明册数者为已刊,反之为未刊。

② 《此次谈判经过》,1938年9月30日,“蒋档”。

③ 《9月28日复萧仙阁电》,“蒋档”。

④ 《面训要点》,“蒋档”。

⑤ 何应钦:《致萧振瀛皓午电》,“蒋档”。

⑥ 《中国宣言原文》,“蒋档”。

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盖始终以和平为主,认定武力不能解决问题也。

中方草拟的《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协定成立之同时,两国政府即命令各该国陆、海、空军停止一切敌对行动,日本并即撤兵,在本协定签字后三个月内(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之原状。”^①

关于“满洲国”问题,中方认为,此为“中日间之瘤”,此问题若不能成立谅解,预示未来解决之趋向,以后各项合作协定,均难签订成立,因此,萧振瀛等提出“相机应付”的三条原则:(一)日方自行考虑,以最妥方式及时机,自动取消“满洲国”,日本保留在东北四省一切新旧特权,但承认中国之宗主权。(二)中国承认东四省之自治,而以日本取消在华一切特权为交换条件(如租界、领事裁判权、驻兵、内河航行,等等)。(三)暂仍保留,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再谈。^②其中“待商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为蒋介石亲笔所加,可见,蒋介石主张先为其易,后为其难,将东北问题留待未来解决。

1939年1月9日蒋介石研究“和平原则”,确定:“甲、领土行政主权必完整;乙、以《九国公约》与国际联盟为有效保证;丙、以先恢复七七以前原状为恢复和平之先决条件。”^③同年,在军统局人员杜石山与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人的谈判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原则。当年3月4日,蒋介石致杜石山电云:“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之基础之上,尤

① 《停战协定原文》,“蒋档”。

② 《关于“满洲国”问题之考虑》,“蒋档”。

③ 《困勉记》。

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①17日，柳云龙、杜石山在与萱野长知的会谈中提出七项条件，其中第三条即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同年5月，小川平吉通过杜石山致函蒋介石，要求蒋“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中日谈判问题。27日，蒋未拆阅即将原函退回，并且禁止杜石山等与小川往来。小川从辛亥革命时期即和中国革命关系密切，蒋的举动使小川极为生气，宣称将于6月2日回国，但蒋仍不加工理。6月2日，陈布雷致张季鸾函云：“如彼果延期回国，可知其前所称欲回国者，全为装腔。请注意。兄函中有休战二字，以后如有接谈时，应特改变，以我方于未恢复七七战前原状之先，决不允其休战也，亦请注意。”^②陈布雷当时是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代表蒋指导张季鸾的工作，此函当然代表蒋的主张。

在秘密谈判中，蒋介石虽然提出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先决条件，不过，蒋介石并未对此抱有过大期望。1938年9月，武汉会战正酣，蒋介石分析形势，于5日自述云：“敌将于武汉未陷以前，求得一停战协定而罢兵乎？此则无异城下之盟也。如无国际变化，向倭压迫，亦决无和议可言。即使敌国承认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亦决无实现之可能。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我之坚韧不拔耳，切戒勿为和议之谈摇撼。”^③

① 《小川平吉文书》，抄件，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

② “蒋档”。

③ 《困勉记》，又《省克记》，稿本，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均同。

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摆、矛盾、反复的过程。

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丢失东北,在内外各方指责声中下野。次年1月,日本陆相荒木贞夫以支持蒋介石复出为诱饵,要求蒋赞同日本租借东三省,并且假意表示中国可以驻兵。蒋介石明确表示拒绝。日记云:“其亦视余为可欺也,是诚不知中国尚有人也。可笑之至!”^①同年5月16日,蒋勉励自己:“对俄外交,当不能放弃外蒙;对日外交,则不能放弃东三省。”^②随后,他并制订对朝鲜和东北的工作计划,指派滕杰与刘不同为联络人。^③6月,蒋决定迅速派定东北义勇军指导员,并致函张学良,嘱其出兵热河,一面与东三省各义勇军打成一片,一面威胁山海关日军。^④同月,他在牯岭听翁文灏谈,东北三省煤矿,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铁矿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自悔此前决策错误,日记称:“呜呼!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自恨研究之晚,而致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⑤同年9月13日,他自记称:“预期十年之内恢复东三省”,“凡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恢复东省奋勉”。18日,蒋介石在汉口听到日本人在租界鸣炮奏

① 《困勉记》,1932年1月7日。

② 《困勉记》。

③ 《困勉记》,1932年5月29日;参见《事略稿本》,第14册,台北“国史馆”印行,517~512页。

④ 同上,1932年6月4日、6月15日;参见《事略稿本》,第15册,95页。

⑤ 《省克记》,1932年6月17日。

乐,庆祝占领东北,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在日记中表示,期望能于1942年以前,“在中正手中而能报复国仇,湔雪此无上之耻辱”^①。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捍卫东北主权的一面。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施压,中日两国形势一紧张,他又软弱、动摇。1933年4月3日,他的日记中有一段记载:

省察目前危局之根曰:当民国十八年,明知应与俄复交,乃为老朽者阻碍而中止,及倭寇欲商东三省租借权时,余以为此可暂缓其侵略野心,乃亦被阻而不果,以致造成今日之危局。至胡汉民之变乱,宋子文之弄权,国益纷乱,更启外侮,是皆余自无主宰之过也,何怨何尤,惟自承当耳。^②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继而进犯长城各口,华北危急。从这页日记看,蒋在1931年1月拒绝荒木租借东三省的要求后,又在某个时期提出,可以接受荒木的要求,以便“暂缓其侵略野心”,但“被阻而不果”,所以蒋此时对阻止他的人颇有不满。显然,这是蒋在东北问题上的最大动摇。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动摇为时短暂。蒋介石写下上述日记之后的第22天,他就又“研究对倭战略”,认为“与倭决最后之胜负,惟在时间之持久耳”^③。

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后,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其原因在于蒋认为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丧权辱国”,不如不谈;即使谈判

① 《事略稿本》,第16册,458页。

② 《省克记》。

③ 《困勉记》,1933年4月25日。

成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约束其军方的能力,谈了也等于白谈。^①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应战。他预估:再有两年时间,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十年后,不只收复东北全境,而且可以“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② 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蒋介石即表示:日本没有信义,“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③。次年9月18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蒋介石日记云:“收复失土,痛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乎?”^④

不过,蒋介石虽然希望收复东北,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又不准备,甚至反对采用战争的手段。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他说:“‘兵凶战危’,古人常说‘不得已而用之’。凡是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一定不愿轻于作战,尤其自本党当政以来,一向以和平为职志,决不愿轻启战争,这是一定的道理。”话题转回现实之后,蒋介石表示:“我们这几年,一方面抱定保持我独立生存的决心,同时对于和平,始终为最大的努力,也不但是东北问题,就是其他中日之间的悬案,我也常常表示,只要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只要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我都可以负责解决。其理由就是保持和平为我们固有的理想,所以百事应着眼于民族久远的利害,而不在于计较一时的恩怨得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标示国民党转变政策,确立抗战建国方针的会议,但是,即使在这时,蒋介石对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盘也仍然是

① 《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193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

② 《困勉记》,1937年7月25日。

③ 参见本书另文《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

④ 《省克记》。

“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

1939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题为《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的演讲,将这一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盘”表达得更明确:一方面,他坚决表示:“外蒙有自治之可能,而满洲完全是中国人,绝对不能独立。”接着,他解释“抗战到底”之“底”时说:

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若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没有恢复,即与日本谈判,便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这是我抵抗的机会,也是我们不能不抵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无论如何只有和他拼命。……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①

在这一段演讲中,“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和前提。如前述,在特定条件下,这一主张有其正确的、策略性的一面,是一个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方案。但是,蒋介石将收回东北的希望只寄托在“外交的方法”,说什么“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这就有问题了。外交的方法,谈判的方法,可以是方法之一,但是,要让日本侵略者将已经人口的肥

^①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速记录》,国民党党史馆藏。

肉吐出来,在一般的状况下,“外交的办法”难于济事。因此,还必须准备另一手,即武力收复,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就是“自取灭亡之道”。显然,这是危言耸听。此事说明,自卢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但蒋介石的对日恐惧症仍然很严重,对将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到底,既缺乏信心,也缺乏决心,反映出蒋介石在对日斗争中特殊的软弱性。

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所作的新解释

如前述,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先决条件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抗战到底”之“底”则不妥。蒋介石不久即改正了这一错误。

1939年7月7日,蒋介石发表《抗战建国二周年纪念告日本民众书》,指责日本侵略中国,抢夺中国东北领土,建立伪满洲国等行为:“把一大群人看成奴隶了,反要说是给了自由;把中国一部分领土占据了,反要说是建立了独立国。”^①同日,蒋介石发表《告世界友邦书》,指出“今日国际间一切无法律、无秩序之无政府状态,实由1931年之九一八,日本强占我东北四省始作之俑所造成”。文告表示:“在敌人未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以前,我国抗战,无论遭受如何牺牲与痛苦,决不有所反顾与中止也。”^②这里“抗战到底”之“底”就被说成日本“彻底放弃其侵略政策”,较之“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前进了。

当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批判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5,78~80、193页。

② 同上,102~103页。

国民党内要求变更抗战建国方针,及早结束对日战争的错误思想。他说:“如果我们国家民族一天没有得到独立自由平等,抗战就一天不能停止,而我们的牺牲奋斗和努力,也就一刻不容松懈,更丝毫不容有徘徊观望、半途而废的心理,幻想苟且和平!否则抗战失败,国家灭亡,我们就作了中华民族千古的罪人!所以现在如有人以为敌人已无法进犯,他的侵略之技已穷,我们可以乘此机会与他讲和,或者以为友邦都不可靠,不如自己早些设法和平,这就是陷人与汪精卫同样错误危险的心理。”蒋介石主张:“一面坚持抗战,一面抓紧建国,再要埋头苦干三五年,非获得彻底的胜利和成功,使敌人根本放弃其侵略政策,决不能停战言和。”

讲话中,蒋介石对抗战到底之“底”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所谓“抗战到底”究竟是怎么讲呢?我们抗战的目的,如何乃能达成?我们抗战的目的,率而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亦即是中日问题要与世界问题同时解决。我在五中全会说明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以中国为基准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世界战争同时结束,乃有真正的解决。

他强调:“如果那一个国家想单独调停或想藉此谋他一国的利益,不论出于何种方式,结果都必然失败。”^①这里,蒋介石所说中国“抗战到底”的“底”就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扩大了视野,提升了要求,因而纠正了前说的错误。

^① 《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6,474~479页。

蒋介石的这一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蒋介石早就认为,中日战争是国际问题,它的解决也有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38年5月26日日记云:“如不能引起世界大战,恐不易使倭国失败也。”^①7月27日日记云:“中倭战事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②当时,蒋介石已在研究,如欧洲战争爆发,则中国将与英、法、俄共同作战,并借机解决东北问题。日记云:“速谋与英、法、俄进行共同作战之计划,以期中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又云:“向英、法政府恳切商谈,使国际盟约中之制裁条款为有效条款,藉以号召多数国家共同制裁,拯救东北同胞。”^③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同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一形势使蕴藏于蒋介石心中的期待成为现实,因此,他才能在五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战争联系起来,并对中国抗战目标作了修正和提升。

“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

欧战的爆发燃起了蒋介石的希望,使他敢于公开昌言,中国“抗战到底”之“底”与世界战争之“底”同步,但是,欧战最初并不顺利,法军和英军相继战败。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同月,法国宣布封闭滇越铁路。7月,英日之间达成妥协,宣布封锁滇缅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通道先后断绝。苏联则因准备对德国作战,

① 《困勉记》。

② 同上。《事略稿本》系于1938年7月28日条下。

③ 《事略稿本》,1938年9月18日。

拒绝对中国的进一步援助。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继续对日本采取战与和的两手策略,同时相应地将抗战目标区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度之成功”两种类型。

当年8月,日军积极谋划南侵,向东南亚进军,力图结束对华战事。在这一形势下,蒋介石曾准备利用时机,争取与日本实现于中国相对有利的谈判。同月,在蒋介石指导下,张群、张季鸾与陈布雷等起草过一份《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云:

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恢复东北失地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时之绝对的要求。

关于“最小限度之成功”,《纲领》云:

满洲伪国与蒙、藏不同,其地本为普通行省,其人民最大多数本与各省人民完全属于同一之民族系统,故其解决之方法,应不同于外蒙、西藏。惟该地被日本侵占已久,在我国不能用兵力收回之过渡期间,应视为与外蒙、西藏相类之悬案。扶助溥仪之伪政府,第一步使取得满洲内政上自治之政权,使该地汉、满、蒙人民先脱离被占领地人民之境遇;第二步,与溥仪直接协商,先求得一过渡的解决之办法,而最后与外蒙、西藏同为联邦之一,完全复归于中国。

这一方案的核心是,将希望寄托在溥仪身上:扶助其“自治”,使东

北与外蒙古、西藏作为“联邦”之一回归中国。

《纲领》又将东北问题的解决分为甲案与乙案：

东北问题：1. 甲案，现在不提，战后另作交涉。2. 乙案，现时先取得一种谅解，约期交涉。关于此点，我方又分两案：(1) 要求日本承认我国在东北之主权，而中国承认东北之自治。我中央派驻满指导长官一人，常驻长春，代表中央，但不干预其通常施政。(2) 要求日本先行改革满洲制度，使溥仪之政府确有施政用人之自由，废除日籍官吏制度，还政东北人民。此项改革完成之后，我中央得与溥仪之政府直接协商以求东北悬案之解决。

在此项协商开始以前，中日可订临时办法，以便利关内外人民之交通与经商。我方尤当注意要求日本善遇我东北同胞，废弃九一八以来仇视、贱视我人民之政策。

蒋介石等估计，和日本谈判时，日本可能提出承认“满洲国”，《纲领》强调：“我国应声明不能承认。”“东北问题，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但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

《纲领》规定：“我国为被侵略国家，故和议之发起，必须出自敌方……应深切考查，其条件是否无背于我建国原则，而足以达到我最小限之成功，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时，始允其开始和平之交涉。”张季鸾等还在起草的初稿中提出召开停战会议的原则：1.（日本）凡作战而来之军队，完全撤退；2. 凡所占领长城以内及察绥之土地完全交还；3. 不平等条约定期取消。”^①上述原则表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中日谈判的一项前提条件。

① 有下划线的文字为蒋介石所加。

该方案先后有几种稿子,名称和内容都不尽相同。《中日恢复和平基本办法》规定:“日本政府保证永不将东北各省划入日本领土,或采取其他行动使各该省在名义上或事实上成为日本之保护国。”《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规定:“东北问题即满洲问题之悬案,于恢复和平后一年以内特开会议,另案解决。”《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规定:“我国既不能收回(东北),又不容放弃,故利在延搁不决。”又称:“实质的收回,在将来为可能,此当在我国防完成,而敌人有求于我之时,或敌人在国际战败之时,因此,我又决不可自弃东北,以失去将来实质收回之根据。”上述资料表明,蒋的抗战方案有“最大之成功”和“最小限度之成功”、“军事”和“外交”两种。当他着眼于“最小限度”时,也没有放弃争取“最大成功”的希望。

9月18日,蒋介石发表《“九一八”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明确宣告,将收回东北列为“抗战到底”之“底”。文称:“我们到今天,还不能解放我们东北的同胞,收复我们的失土和主权,这就是没有达到我们抗战的目的,无以安慰已死的英灵。”他明确宣布:“我们九年来忍苦奋斗,三年来奋勇抗战的目的,就为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要解救我们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又称:“我们四万万同胞和东北三千余万的同胞是一脉相承的黄帝子孙,是手足同气、呼吸相通的兄弟。为了拯救国家,我们大家都负有相同的责任;为要解救我们水深火热中三千余万的东北同胞,我们在关内四万万同胞更觉得牺牲奋斗是自己的责任。”“我们今天多抗战一天,就是恢复我们国家独立自由和达到我们雪耻复仇目的日子更接近一天,也就是收回东北和解救东北同胞的日子更接近一天。”^①9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东北被侵已足九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1,220~228页。

年矣,但愿是日为我收回东北开始之日,勉之!勉之!”^①次日,蒋介石检阅旧日记中预期收回东北等地的文字时写道:“以最近时局之发展及上帝护佑中华,不负苦心人之意测之,自有可能。只要我人深信不惑,向天道真理勇进,未有不成之事也。”^②

反对苏、英、美三国的妥协、 错误主张,力保东北主权

欧战爆发,英、法作战不利,原为西方殖民地的东南亚成为“真空地带”。日本眼红该地的富饶资源,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力谋冒险南进。这种情况,使英、美更多地关心中国战场。1941年3月,美国罗斯福总统发表广播演说,声明一定要“援华到最后胜利为止”。这种情况,使蒋介石的抗战信心日渐增强。日记云:“此后只要我能自强奋勉,则十年困难,四年苦斗,不惟恢复失土已有把握,而太平洋之和平,亦从此奠定矣。”^③但是,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一个月之后,就发生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事件。

当时,德军进攻苏联在即,苏联为全力对德,避免两面作战,力图稳住东方的日本。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缔结《中立条约》。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14日,蒋介石自我检讨云:“余竟未想到其必互认满蒙伪国之领土也,此乃余对事理未能究乎其极之过也。此过

① 《省克记》。

② 《事略稿本》。

③ 《困勉记》,1941年3月31日。

不改，必致误国。”^①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发表声明：“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言赘。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所为妨害中国领土行政权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②24日，蒋介石密电各战区将领及各省党部、省政府称：“只要我能独立自强，战胜暴敌，则收回失土，恢复主权，势所必至，理亦当然。区区苏、日一纸不法之声明，岂能永为我领土与主权完整之障碍！”^③同年8月，重庆国民政府在被日机炸毁的礼堂废墟上举行“纪念周”，蒋介石自励云：“此乃余前年所谓在瓦砾场中，尚必在重庆国府原址作纪念周之决心也。安知我于二十一年立志，欲于三十一年收复东北之言不能贯彻乎？何必悲愤，惟益自勉而已。”^④

这以后接踵而来的消息有如噩梦连连。8月20日，蒋介石得悉英国有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与日本妥协的意见，日记云：“（英国）不仅明示日本在东三省保有其经济权，且称以邻国二字，使俄国对我东三省尚有同等权利。呜呼！其用心之险恶，可谓极矣！”^⑤9月12日，蒋介石得到情报，美日达成妥协，美国已同意日本占领中国的华北与满洲。蒋介石日记云：“今日问题，权操在我，非美国默认所能解决。今日中国政府绝非甲午战争时之政府可比，在此不惟美国之自杀政策，乃为美国之不利，而于我抗战政策根本不变之下，顾无损也。”^⑥18日，蒋借东北沦陷十周年之机，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文称：“我们非完全驱逐寇军于我们

① 《省克记》。

② 《新华日报》，1941年4月15日。

③ 蒋介石：《苏日中立条约之检讨》，机密。国防最高委员会档案，003/2081，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

④ 《省克记》。

⑤ 《困勉记》。

⑥ 同上。

的国境以外,彻底消灭他侵略的野心,我们的抗战,是决不能停止的。我们若非使东北同胞获得真正的自由,东北的失地完全恢复,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亦决不会停止的。”“我们东北同胞与全国同胞的生命是整个的,东北四省的土地与全国的土地,也是完全整个不容有寸土分割的。我们整个民族和整个领土,是存则俱存,亡则俱亡,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是我们天经地义的道理。”^①蒋介石的这篇文章,明为“告全国军民”,实为对国际的宣告。同年12月6日,蒋介石与拉铁摩尔顾问谈话,嘱其转告罗斯福总统:“中国决不能放弃东北,否则新疆、西藏皆将不保,外蒙亦难收复。”^②此后,拉铁摩尔即成为蒋介石这一主张在美国的积极宣传者。^③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由单独抗战进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阶段,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蒋介石保护东北主权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烈。

还在太平洋战争初起时,蒋介石就积极研究同盟条约,确定对英、对俄、对各国要求:“东四省、旅顺、大连、南满,要求各国承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④1942年3月,蒋介石设想,在日本“北进”,进攻苏联之时,中国军队乘机与日本决战,“收回失地,恢复旧有领土与民族固有地位,以为解放亚洲各民族之张本”^⑤。15日,他甚至乐观地设想,将于1961年之前完成自蒙古库仑至东北满洲里之间的北疆铁路。同年8月3日,蒋介石与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谈话,得知美国方面有人主张东

①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② 《困勉记》。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一),680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

④ 《困勉记》,1941年12月18日。

⑤ 同上,1942年3月14日。

北由国际共管,作为日本与苏联之间的“缓冲国”。这对蒋介石来说,宛如“青天霹雳”,“益觉国际诚无公道与是非可言,令人寒心”,^①但他立即声明:“中国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绝无讨论之余地。此实为中国抗战之基本意义。盖我抗战若非为收复东北失地,早可结束矣。”蒋要求居里尽一切可能纠正美国人的上述包含极大危险的错误观念,让他们明白,中国民众之所以甘于忍受重大牺牲与各种困苦,支持抗战,其原因就在于要收复东北。他并进一步向居里透露中日谈判中的许多机密:日本曾表示,只要中国允许日本保留东北,可以接受中方的一切条件;又曾提出,中日共管东北亦可商量。蒋称:这些都遭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拒绝。为了让居里记忆明晰,蒋用三句话概括:1. 我等已作一切牺牲抵抗日本侵略,唯一目的在收复东北;2. 我等之所以尚须继续抗战,因尚未收复东北;3. 东北四省就历史、法律、人种、事实各方面言,五百年来皆为中国不可分之一部。蒋要求居里转请罗斯福发表声明,重申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蒋强硬表示:倘此问题不解决,则平等、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悦耳之名词,皆无意义可言。^② 次日,蒋再次与居里谈话,态度更为强硬,他说:“倘和平会议席间,不能返我东北失地,仍为我不可分割领土之一部分,我人仍将继续抗战,即招致国家之毁灭,亦在所不惜。凡不承认东北为我领土之一部分者,皆为我仇。”^③5日,蒋介石再与居里谈话,仍然表示“整个东北为中国之一部,望罗总统早日声明”^④。在蒋介石的一再坚持下,美国政府于9月18日发表声明,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蒋介石感到欣慰,日记云:“此乃余对居里提议之一,已见效矣。”

① 《困勉记》。

② 《战时外交》(一),680~682页。

③ 同上,701页。

④ 《困勉记》。

同年9月，罗斯福派威尔基作为总统特使访华。29日，蒋介石研究与威尔基谈话要点，其第二条即为：“东北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必须完全归还中国。”^①11月9日，因宋美龄赴美在即，蒋介石研究须与美国商讨事项，有长期同盟；东三省与旅大完全归还中国；台湾完全归还中国；外蒙归还中国，予以自治等。^②这以后，蒋介石日记中频繁地出现关于东北问题的记载。1943年3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伪满傀儡组织，至今恰九周年矣。尚未消灭，思之可耻。”^③5月4日日记云：“溥仪昨日到安东州，汪奸本日六十一岁生日，皆为国家之羞耻，何日能一雪洗之？”^④25日，蒋介石研究美国访苏代表戴维斯谈话，日记云：“提及旅顺为自由港一点，则越出余之主张矣，应如何补救之？”^⑤

在开罗会议上与英国争论，要求明确声明， 将东北、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区组织反攻，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问题。

① 《困勉记》。

② 同上。

③ 《省克记》。

④ 同上。

⑤ 《困勉记》。



为准备参加开罗会议，蒋介石于1943年7月起草拟各项文件。当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会谈后的共同宣言要旨，提出“必须获得无条件之胜利”，这就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目标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①8月9日，蒋研究与罗斯福谈话要点，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东北问题”。15日，蒋介石研究战后中国国防建设，日记云：“东北收回后则维持其原有之工业与国防，以其余力充实我本部之建设。”^②24日，研究对美策略，认为“战后在台湾与旅顺之海、空军根据地应准与美国共同使用”^③。11月9日，蒋介石研究与罗斯福、丘吉尔谈话要点，问题之一为“东北”。14日，研究与罗斯福商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处理方案，确定“日本在九一八以来所侵占中国地区所有之公私产业应完全由中国政府接受”。18日，确定会谈应注意之重大问题，其内容之一为“东北与台湾必归还中国”^④。22日，再次研究会谈要旨，“东北与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仍为重点之一。

在蒋介石指导下，军事委员会为开罗会议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日本应自其在“九一八”起所占领之中国及其他联合国之地区撤退；将旅顺、大连两地一切公有财产及建设，以及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无偿交还中国；将台湾与澎湖列岛交还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偿中国自“九一八”起一切公私损失。国防委员会所准备的文件提出：“收复1894年以来日本所取得及侵占之领土。”11月2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在预拟的政府方面提案中提出：日本自九一八事变后自侵占之中国领土，包括旅大租界地及台湾、澎湖，应归还中国。

① 《困勉记》。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开罗会议开幕后,蒋介石在与罗斯福总统讨论中提出:“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①讨论确定的原则为:日本攫取中国之土地应归还中国,应使朝鲜获得自由与独立,战后日本在华公私产业完全由中国政府接收等。11月24日,开罗会议公报草案提出,日本由中国攫取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等,当然应归还中国。讨论中,英国代表贾次干企图将中国主权模糊化,提出将草案改为:“日本由中国攫去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王宠惠认为,英国的这一修改,“不但中国不赞成,世界各国亦将发生怀疑”。他说:“世界人士均知此次大战,由于日本侵略我东北而起,而吾人作战之目的,亦即在贯彻反侵略主义。苟其如此含糊,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故中国方面对此段修改文字,碍难接受。”他表示:“如不明言归还中国,则吾联合国共同作战,反对侵略之目标,太不明显。”美国代表支持王宠惠的意见,英国草案被否决。26日,草案送请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审阅,得到一致赞成。会议定稿的公报宣称:“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公报称:“我三大盟国将坚韧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

这样,中国对日作战的目标就进一步提升,远远超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了。

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曾传达孙中山的遗志:“恢复高台,巩固中华。”蒋解释说:“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几千年来是领袖东亚的国家,保障东亚民族、树立东亚和平是中国义不容辞的

^① 《困勉记》。

责任。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积极侵略的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的人民为我们的职志。”^①现在，这些理想都已纳入开罗会议宣言，实现在即，蒋介石很兴奋。于1944年元旦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内称：“在这次开罗会议中，英、美两国和我们中国一致同意，要剥夺日本第一次大战后所夺得或占领的太平洋上一切岛屿，要将日寇逐出于其以武力贪欲所攫取的土地，要归还东北四省和台湾、澎湖等岛屿与我们中华民国，要使朝鲜自由独立。……这不但使热望归还祖国怀抱的台湾、澎湖同胞闻而兴奋，使我们沦亡十二年以上的东北同胞鼓舞奋发，使不堪日寇奴辱的朝鲜国民闻风兴起，而且也是亚洲所有被日寇欺凌压迫的海上、陆上一切民族，都感到解放之有期，共同为消灭敌人而奋斗。这样一个重大而有力的共同决议，可以说在十年以前我们只是一个志愿，而到了今天已成为事实了。”^②

国民政府为完全收回东北主权 所作的斗争、让步与代价

《开罗宣言》虽然明确宣布，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是要将纸上的宣言转化为现实并不是容易的事。其关键的关键是要击溃日本的强大军事力量。

依靠国民党的军队吗？1944年3月至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虽然在缅北等地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挫败日军精锐师团，但是，却在豫湘桂战役中溃败。自1944年4月日军渡过黄河，进攻河南

^① 《对日抗战与本党前途》，《先总统思想言论总集》卷15，187页。

^②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2，50～51页。

始,至当年12月占领贵州独山止,8个月之内,日军长驱两千余公里,占领中国二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一切,使罗斯福感到,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还不具备击溃日军的力量。依靠美国人吗?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队和日军实行逐岛争夺与越岛作战,已经付出了惨重的牺牲,罗斯福不愿付出更大的牺牲。为了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罗斯福企图利用苏联红军的力量。1945年2月,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决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事结束时,协助中国对日宣战。但是斯大林提出,必须满足苏方下列要求:1. 外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2. 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1904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者:(1)南库页岛及其毗连各岛应归还苏联;(2)大连商港应辟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3)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3. 千岛群岛应割于苏联。以上各条,除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的有关规定外,均严重损害当时中国的主权。蒋介石对斯大林所提条件强烈不满,4月5日日记云:

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国强权占领,而决不能以租借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武力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以我民族之大,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勿为外物胁诱,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①

^① 《事略稿本》。

对于与斯大林达成交易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蒋介石也指斥其“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①他担心罗逝世后，“美国对华政策恐将比现在更坏”，于5月23日致电时在美国的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转告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要求其向斯大林说明：“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②6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说明“本人希望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希望苏联能帮助中国的独立、行政与领土之完整，希望恢复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与行政独立”。他一方面表示，如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东三省领土，中国将在东三省的铁路、商港等方面，给予苏联便利，苏方如有军港需要，亦可与苏方共同使用。但是，蒋又以委婉语气表示：“我全国人民咸认不平等条约、领事裁判权及租界等事为国家的耻辱，一致痛恨，吾人为革命党人，自应注意人民之心理与要求，而期其要求之实现。”^③这实际上又在提醒苏联，不要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方。6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旅顺至少限度必须中俄共同使用，“若俄提归其独占，则我必须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④。11日，蒋介石两电宋子文，表示可以同意与苏联共同使用旅顺，但“租界”的名称“为我国之历史耻辱”，“今后不能再有此污点之发现”，“此点非坚持不可”，“否则所谓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独立也”。^⑤12日，彼得洛夫向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谊互助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其第一条即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他表示，苏联是一个太

① 《事略稿本》，1945年3月15日、4月13日、30日。

② 《战时外交》(三)，547页。

③ 同上，549~550页。

④ 同上，554页。

⑤ 同上，558页。

平洋沿岸国家,需要有不冻港。蒋介石坚决反对,他从历史角度说明,此例不可开,苏联不应使中国成为“不平等的国家”^①。

6月30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访苏,会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旅顺可不用“租借方式”,但坚持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企图将这一问题“搁置”。但是,斯大林的态度极为强硬,毫不让步。7月6日,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若苏联能协助我对日抗战胜利,对内切实统一,则为苏联与外蒙以及我国之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我政府或可忍此牺牲。”^②7月7日,蒋介石两次指示宋子文,在苏联保证中国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的条件下,可以同意苏联要求。7月10日,蒋介石接到宋子文转来的苏联方面所提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等多项条件,认为比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与沙俄所订条约还要“苛刻”,日记云:“明知其为讨价,而寸衷刺激不堪,所受侮辱,亦云极矣。”^③7月19日,蒋介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时再次强调:“外蒙独立,则于我国牺牲极大”,苏联必须同时“协助我东三省领土、主权与行政权的完整,及解决国内共产党的问题,和新疆变乱的解决。必须这三点做到,我才可排除一切,解决外蒙问题”。^④他坚持:“两条铁路和两个海港的中国主权,一定要完整的。”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数十万苏军攻入中国东北。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改

① 《战时外交》(三),561页。

② 同上,594页。

③ 《事略稿本》,1945年7月10日。

④ 《战时外交》(三),637页。

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主权属于中国,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大连辟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旅顺政府。在《条约》所附照会中,苏联政府承认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①同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蒋介石并非不懂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首先建立在自力更生基础上。1938年8月15日,他就表示过:“战事只有自力为可恃耳。”^②但是,蒋介石在事实上无法做到,他还是只能将希望建立在外力上。当蒋介石决定接受斯大林的条件时,中国虽已跻身“四强”,但是,名强而实不强,外强而内不强。国民政府自身无力全部歼灭日寇,收回东北,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不得不仰仗外力,而其结果是付出了巨大代价。

综观抗战八年的历史,蒋介石兑现了自己“抗战到底”的诺言,他为此确定的“底”也逐渐变化,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发展为收复包括东北、台湾在内的所有失地,解放朝鲜等东亚被侵略民族,再发展为与盟国共同作战,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条件之胜利”。这种情况,当然有蒋的个人作用在内。对于这种作用,人们应该承认而不应该抹煞,但是,我们又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中国抗战国内外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日益明朗的结果。

本文为提交2005年10月在台北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6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原载《中国文化》第22期,2006年5月。

① 《战时外交》(三),656页。

② 《事略稿本》。

吴开先与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敌后抗日工作

——读台湾所藏朱家骅档案

抗日战争，除了战场上硝烟弥漫的厮杀，还有隐秘深藏的敌后地下斗争。关于前者，史家已多有研究；关于后者，至今尚少论述。兹就台湾“中研院”朱家骅档案所藏，参以“孤岛”时期的上海报纸，阐述国民党系统在上海地区的部分敌后工作情况。

上海党部委员纷纷变节，蒋介石大为震怒

上海于1937年11月沦陷。1939年，汪精卫自重庆逃出后，于5月8日抵达上海，即以之为基地，大肆鼓吹“和平运动”，紧锣密鼓地筹备组织伪国民党和伪国民政府。蒋介石认为“上海阵地不能丢”，计划加强上海工作。^①当时，国民党虽在上海设有地下市党部，但由于原书记长蔡洪田、常务委员汪曼云率先变节，为虎作伥，一时间，除主任委员、原暨南大学教授童行白等二三人尚能保持气节外，其他委员和职员居然携带卷宗、印信，集体投逆。^②这种情况，使蒋介石大为震怒。6月7日，蒋介石手令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等人称：“上海党部实在无成

① 吴绍澍：《记上海统一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82页。

② 李子孝：《致朱秘书长函》，1939年5月24日。朱家骅档案，台湾“中研院”藏，以下所引资料凡未注出处者，均同。

绩表现,其无能力与无办法可知,应特别设法改良为要!”^①13日,陈立夫也致函朱家骅,建议“集商改进方案”。^②

重庆国民党中央很快决定派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郑亦同去上海,以中央组织部代表名义负责考察当地党务。8月23日,郑亦同致电朱家骅报告:上海党务既无下层基础,上层干部“变节者变节,消沉者消沉”,必须“彻底改组”,方能“重奠革命之基础”。他并推荐,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担当此任,其理由是,上海的这帮动摇失节之辈,与吴“有甚深切之历史关系”。只有请他出马,才能“多尽劝导之责,或于残局不无小补”。^③

吴开先出生于上海近郊的青浦,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其后曾先后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可以说是上海通。郑亦同推荐他回沪主持地下工作,不无道理。

郑亦同的建议也正是朱家骅的想法,于是,很快就决定了。和吴开先同时奉命赴沪的还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沪代表蒋伯诚。

正邪、忠奸、人鬼的搏斗

1939年8月28日,吴开先抵达上海。当时,汪精卫正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伪国民党。一场正与邪、忠与奸、人与鬼的搏斗在上海滩上展开。

报纸是社会喉舌,可以造舆论,洗脑筋,影响和左右人心。汪精卫、

① 蒋介石:《机密(甲)第2895号手令》。

② 陈立夫:《致朱骝先函》。

③ 郑亦同:《致骝先秘书长电》。

周佛海等都是国民党内的文化人，长期做宣传工作，自然深谙此点。他们到上海后，一面通过《中华日报》鼓吹“和平运动”，一面威胁、恐吓各抗日报刊。6月17日，汪伪武装特务袭击《导报》馆，迫使该报停刊。同时，投降汪伪的原国民党特务丁默村、李士群等则以“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部”名义，向上海各抗日报刊负责人投递恐吓信，声称如再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决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7月22日，汪伪特工夜袭《大晚报》社。8月30日，暗杀《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版编辑朱惺公。其后，暗杀事件即层出不穷。

在抓报纸的同时，汪伪又大力抓学校。其办法是拉拢部分教育界败类成立所谓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游说各校校长发表拥汪通电。9月2日，上海女子大学校长吴志骞因致函《中美日报》，痛斥汪精卫的“和平”谬论，宣称“头可断，志不可屈”，被汪伪特务暗杀。^①接着，大海中学校长聂海帆也遭到毒手。其后，各校校长纷纷接到前述“铲共救国特工总部”的恐吓信，声称如再坚持不肯参加“反共和平运动”，“执迷不悟，甘心附共”，将以同样手段对付。^②因此，一部分校长、教导主任不得不表态拥汪。^③

吴开先离开重庆时，携有蒋介石致虞洽卿等人函五件，孔祥熙致上海银行界李铭等人函十数件。吴开先抵沪后，即迅速访问上海各界头面人物，特别是工商界巨头，传达抗战国策。在沦陷两年之后，上海人士突然见到了这位来自重庆的旧相识，因此，一时颇为兴奋。8月31日，吴开先致电陈果夫、朱家骅等称：“环境虽确甚恶劣，然事尚可为，决

① 参见《吴志骞来函表白》，《中美日报》，1939年8月29日。

② 《中美日报》，1939年9月12日。

③ 钱俊瑞等：《汪伪在上海各界活动的真相》，黄美真等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242~2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参见展鸿图：《忠奸搏斗中的教育界》，《新华日报》，1939年1月19日。

以最大之努力挽此颓势。”^①9月10日,蒋伯诚、吴开先又联合致函朱家骅称:“汪逆失败,在沪利用敌人之金钱,威胁利诱,无所不为。对忠实同志屡加杀害,丧心病狂,较之暴敌,尤为残酷。惟汪逆无论金钱、暴力,如何凶残,但是非犹在,清议尚存,顺逆忠奸之辨,孩童皆知。故无论党内党外,忠贞不二、持正不阿之士,所在皆是。”函件表示,上海潜在力量非常广大,将广泛联络各界及各民众团体,“使全沪民众不为利诱,不为威屈,造成强固之不合作运动,以为消极之抵抗”^②。后来的事实表明,蒋、吴二人的这些壮语虽没有完全实现,但在打击敌伪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

汪伪和日寇很快就得知吴开先已经返回上海并重建地下组织。9月9日,汪伪《中华日报》刊出吴开先到沪的消息。同时,丁默村悬赏5万元捉拿吴开先。9月19日,日方制订应予扑灭的中国秘密机关计划,首列“吴开先集团”。^③

成立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

到达之后不久,蒋伯诚、吴开先很快发觉,上海地下市党部的被破坏情况,远比原来估计的严重。二人函告重庆称:“市党部因二三叛徒破坏,无异临阵倒戈,牵动甚大。”主任委员童行白虽然艰苦撑持,但人面过熟,险遭敌伪暗杀,行动、居处,都极感困难,因此,已不能留沪工作,市党部必须根本改组。函件同时也提到,上海原有特工组织,均已

① 吴开先:《致果公、立公、楚公、骧公、厉公、庸公、布公电》。

② 蒋伯诚、吴开先:《致骧兄秘书长函》,1939年9月10日。

③ 《第十三军工作要领》。

崩溃,应即统一力量,重加组织,派遣重要人员来沪主持。函称:“叛徒一有制裁,则同志之勇气自增,而观望之徒有所顾忌,更不敢为非作歹矣!”^①当时,重庆方面在上海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系统有好几个,政出多门,互不相关。9月30日,吴开先再次致函朱家骅,说明中央在沪工作人员尚未取得密切联系,“工作既未集中,经费尤为奇缺”。他要求朱家骅报告蒋介石,“将全沪工作化零为整,以坚强之组织与敌伪相抗”^②。

1940年夏,吴开先返渝汇报工作,国民党中央采纳吴开先、杜月笙等人建议,决定组织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以杜月笙、蒋伯诚、戴笠、吴开先、吴绍澍为常务委员,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吴开先为书记长。同时,改组上海市党部,以吴绍澍为主任委员,兼三青团上海支团主任。统一委员会成立后,吴开先指定杜月笙留在上海的管家万墨林为总交通,以原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冯有真等人为专员。^③在上述五个常务委员中,杜月笙和戴笠都不在上海,因此,统一委员会的工作主要由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三人负责。

上海统一委员会成立后,上海市党部、三青团上海支团的工作进一步呈现起色。

争取失足分子,稳定动摇分子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有一部分是铁杆汉奸,有一部分则是一时失足者。吴开先到上海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争取失足分子,制止文

① 蒋伯诚、吴开先:《致骧兄秘书长函》,1939年9月10日。

② 吴开先:《致骧公函》,1939年9月30日。

③ 吴绍澍:《记上海统一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82页。

教界正在蔓延的附逆趋势。1939年9月11日,吴开先致函朱家骅:“抵沪后,对丁逆所胁持分子已救出周斐成、张咏春、苏顽大、顾荫千、柴子飞等十余人,均为租屋,另行居住;盲从而悔悟愿归者亦有封光甲等十余人(均为中小学校长)。”^①这可以说是蒋伯诚、吴开先等到沪后的最初成绩。

1940年1月初,在万墨林策划下,高宗武、陶希圣二人离开汪伪集团,出走香港。蒋伯诚、吴开先即于7日致电朱家骅,要求迅速向蒋介石汇报,转命驻港工作人员“联络抚慰,以拆汪伪团体”^②。14日,朱家骅批示将电报抄送蒋介石的侍从室,同时指示:“汪逆正谋傀儡登场之际,忽与其重要干部凶终隙末,我方自可及时利用。”^③

高、陶到香港后,在杜月笙等策划和支持下,向报界公开了汪伪和日本所签订的卖国密约,并陆续发表了《致大公报函》、《新中央政权是什么》等讨汪文章。以此为契机,全国各地纷纷掀起讨汪运动。1月23日,吴绍澍对记者发表谈话,通过沪报公开声讨汪精卫的卖国行为。谈话特别提出:“汪之末日已至,日人之政治阴谋已穷”,号召“受汪逆一时诱惑者,从速猛醒,戴罪图功”。^④同时,吴开先则分别致函附逆分子。函称:

慨自汪逆叛国,匿迹沪西,谬倡和平,行同盗匪。影响所至,环境日恶,生活日高,全沪人士,咸蒙其害。诸君或被利诱,或遭威胁,虽不能与“认贼作父”、“为虎作伥”者同日而语,要亦信念不坚,

① 朱家骅档案。

② 蒋伯诚、吴开先:《致朱部长骅兄电》。

③ 朱家骅:《条谕》。

④ 《党部主委吴绍澍氏在香港发表谈话》,《大美晚报》,1940年1月23日。按吴绍澍当时实在上海,谈话称“在香港”,系为迷惑敌人。

交友不慎，有以致之。在先或惑于谬论，或醉于利禄私图，执迷不悟，莫可理喻，方今高、陶远走，密约揭露，诸君虽不与谋，亦属附和，务望及时憬悟。

函末，吴开先并号召失足分子刺杀汪精卫：“若能刺逆来归，将功赎罪，我中央不特不咎既往，且将厚事赏赉也。”该函于28日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刊载。^①

高宗武、陶希圣公布汪日密约后，汪伪集团极为狼狈，伪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春圃狡辩说：高、陶所公布的密约是“日人片面提出之条件”，“并非最后折冲之结果”。^②27日，在吴开先等劝导和安排下，伪社会部秘书程宽正等15人决定反正，脱离汪伪控制。31日，程宽正等发表公开函件，反驳陈春圃的狡辩，说明“自高、陶宣布密约，乃知所谓‘和平运动’，实汉奸运动之变相”^③。其后，程宽正并发表长文，揭露丁默村等胁迫他落水并逼他参加汪伪“六大”的经过。^④周乐山等也发表文章，谴责汪精卫“假和平之名，行屈膝之实”^⑤。2月6日，吴绍澍致电叶楚傖、朱家骅称，自吴开先发表文告后，“奸伪内部顿呈动摇”，“沪市人心殊见兴奋”，云云，^⑥虽有夸大成分，但确系事实。

除分化敌人、争取失足分子外，统一委员会又严密注视上海头面人物的动向，特别注意监视动摇分子，及时采取措施。

汪精卫等成立伪府前后，多次诱胁虞洽卿出任伪职。统一委员会

① 各报文字小有不同，此据《中美日报》。

② 《中华日报》，1940年1月23日。

③ 《程宽正等跳出火坑，公开函质》，《大美晚报》，1940年1月31日。

④ 《从祸水中跃登彼岸》，《大美晚报》，1940年3月20日。

⑤ 《周乐山等公开函》，《大美晚报》，1940年3月19日。

⑥ 吴绍澍：《致楚公、骊公电》，1940年2月6日。

得到消息,立即紧急集议,决定假冒吴铁城名义致电虞洽卿,声称:“奉总裁谕,上海情形复杂,安全堪虞,请即来渝。”1940年秋,虞洽卿离开上海,经香港转赴重庆。^①统一委员会的此一举措,有效地防止了虞洽卿为敌所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英美宣战,占领上海租界。黄金荣受日伪诱惑,准备出任租界维持会会长。统一委员会故伎重演,送去一份蒋介石具名的电报,表示对黄近况的关念,询问其身体状况,劝其多加养息。23日,吴开先致电朱家骅,报告这一做法,电称:“此老如能悬崖勒马,而不为敌用,对于沪上一切,或究可稍好也。”^②结果,在整个抗战时期,黄金荣和日寇虽有周旋,但始终没有出任伪职。

上海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为敌所用,将极大地不利于抗战。上海统一委员会争取失足分子,稳定动摇分子的工作虽然无法完全阻遏少数败类的投敌,但对分化敌人,限制敌伪利用上海的人力资源,显然有一定作用。后来,吴开先在回忆中曾不无自豪地说:“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银钱业较知名人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③

肃反、锄奸

为了对付汪伪的恐怖政策,蒋伯诚、吴开先于1939年9月5日致电朱家骅,告以“汪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厉”,要求“速派妥员来沪,主持

① 吴绍澍:《记上海统一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86~87页。

② 吴开先:《致骝公电》,1941年12月23日。

③ 吴开先:《抗战期中我所见到的杜月笙先生》,恒社编:《杜月笙先生纪念集初集》,18页,香港,1952。

肃反工作,鼓励民气,坚强阵线”。^①其后,军统上海区先后处置了汪伪特工总部大队长赵刚义、机要处副处长钱人龙、青帮大亨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人,起到了部分震慑作用。

资料显示,重庆方面曾企图通过上海统一委员会暗杀汪精卫。同年11月14日,蒋伯诚、吴开先致电朱家骅称:“赐电奉悉。嘱破坏汪逆伪组织事,弟等不避艰险,多方设施,政治方面,曾向平方策动反汪,已见成效。现仍积极进行。沪上各方,在弟等联络及监视之下,各界均亦不敢勾结参加。”同电并称:“行动方面,曾积极计划,俟机实施,惟逆贼防卫严密,不易接近为虑。”^②电报所称“向平方策动反汪”,指的是利用华北汉奸集团反对汪精卫,制造其内部矛盾。所称“行动方面”,则显指暗杀汪精卫。

上海统一委员会暗杀汪精卫的计划未能实行,但是,在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他们还是处置了几个小汉奸。2月28日,在吴绍澍等指挥下,上海同日发生三起暗杀案:日伪《新申报》记者许申,伪京沪、沪杭甬两路党部委员薛显扬,上海市商会委员马少荃遭到枪击。不过,许申未能致命,而马少荃则当时并无显著附逆行迹,统一委员会对他采取行动,主要是吓唬,促使他离开上海,转赴重庆。

推行崇尚廉耻运动

蒋伯诚、吴开先到上海后,除联系各界头面人物外,还曾联络了部分民众团体。1939年10月,在蒋、吴等鼓励和支持下,上海工商、教

^① 蒋伯诚、吴开先:《致骝公电》。

^② 同上。

育、慈善等各界人士组织上海市民廉耻运动委员会，发起崇尚廉耻运动，其内容为：“自己立誓，不与闻无耻之事业，不受无耻之金钱，共同对无耻之徒，口诛笔伐。”^①12月12日，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孤岛市民，刻苦淬砺，坚忍奋斗，以复河山”^②。此后，陆续发表《告教育界同仁书》、《敦劝金融界书》、《劝告妇女界书》、《告上海市民书》、《告工友书》等文件，倡导“守廉厉节，图强发奋，雪耻复仇”^③。1940年3月11日，廉耻运动委员会发布宣传要点，指责汪伪曲解孙中山的言论以行其奸，严肃声称：“凡曲解三民主义者，不但为总理之叛徒，且为千秋万世之罪人。”^④29日，汪伪成立汉奸政府前夕，廉耻运动委员会再次发布宣传要点，尖锐地提出一系列问题：“你接受无耻金钱吗？你参加无耻事业吗？”^⑤30日，汪伪政权成立之日，委员会又发表文告，提出“应益坚气节”^⑥。这些，显然都具有批判民族败类，砥砺气节的作用。廉耻委员会后来曾发展到各行各业，在上海活动了很长一段时期。

在统一委员会活动期间，上海工商、知识各界的群众工作有一定发展。当时发端于重庆的“春礼劳军运动”、“节约劳军救难运动”、“一元救难运动”等，都曾得到上海市民的积极响应。其中“春礼劳军运动”，上海各团体原拟募集代金50万，20天不到，各业认捐额即达60万。^⑦

当然，上述群众运动是多种社会力量，包括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共同推进的结果，但其中有统一委员会的努力则是无疑的。

① 《申报》，1939年10月17日。

② 同上，1939年12月12日。

③ 同上，1940年1月1日。

④ 同上，1940年3月11日。

⑤ 同上，1940年3月29日。

⑥ 《大美晚报》，1940年3月30日。

⑦ 《申报》，1940年2月22日。

揭穿汪精卫伪造民意的鬼把戏

在汪伪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培植了华北、华中两个汉奸集团。汪精卫等自重庆出逃之后，日寇即准备以之为中心，成立统一的汉奸政府。1940年2月，汪伪开始制造“还都”舆论，谋划在南京成立伪府。其手段之一是伪造民意。当月，《中华日报》以上海一百多个同业公会的名义发表“拥护和平通电”，借以欺骗社会。为了揭穿汪伪玩弄的鬼把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分别动员各同业公会登报否认。3月19日，上海酱园业、古玩业、地货业、杂粮油饼业等同业公会首先在《申报》发表启事，声明“本会以维护同业为职志，越此范围，概不预闻”。在此基础上，《申报》并进一步刊登消息，说明《中华日报》所登启事，“其中六十五个，系未经正式成立，甚至根本无此名称者，其中四十一个，已陷停顿者，至于确有此种名称而在活动中者，对于此事，事前实一无所闻”^①。自此，各种否认声明络绎不绝。至3月30日，各同业公会发表声明者达150余起。各界发表声明者每日数起。^② 这些声明，有力地揭穿了汪伪的鬼蜮伎俩。

反对成立伪府

汪伪集团在一再延期之后，决定于3月30日“还都”。为了加紧反

^① 《捏名通电，各公会均否认》，《申报》，1940年3月21日。

^② 蒋伯诚：《致骧兄密电》。

汪斗争，三青团上海支部于29日通电全国，声称：“我国人心未死，公义尚存，岂能容此无耻巨奸，靦颜人世，以貽民族之羞！”^①同日，上海市各区党部督率全体党员上街张贴标语，进行了一次突击宣传。据报道，南京路商业区，以至曹家渡、徐家汇等地区，“均有大量小型彩色讨汪传单散发”，“人行道上之电杆木上，均有极整齐之讨汪标语张贴”。^②后来，吴开先曾回忆说：“每年元旦或国庆日，均由党部工作同仁在先施、永安、大新诸公司之游乐场上，掷下大批纸质国旗党旗，以唤起民心。汪伪组府时，并印大批传单说明汪之汉奸行为，以昭告国人，亦由高处掷下。”^③

3月30日，汪伪为了制造气氛，盗用英法两租界华人纳税会名义，以纪念台儿庄战役为名通知各商店悬旗。上海市党部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商请各晚报刊登消息，揭穿阴谋，并加印《大美晚报》八千份，调动学生五十人分头送报，并向各商店说明。因此，当日除外滩日本银行及虹口、沪西一部分商店外，英法两租界内绝无一家商店悬旗。^④同日，上海学生协会、上海学生讨汪运动总会等纷纷发表宣言，声称：“现在更伟大、更艰巨的反汪任务，放在我们肩上来了，我们只有更英勇更坚决地发扬我们的传统，担负起我们的使命，集中我们的火力，万众一心，从日寇汪伪的进攻中发动全面决死的总反攻。”^⑤当日，三万学生举行全市大罢课。各校学生在风雨中分别举行讨汪宣誓：“余誓以至诚，决不参加伪组织，以最大之决心，打倒卖国组织，并否认卖国密约，决以全力

① 《三青团上海支部通电全国讨汪》，《大美晚报》，1940年3月29日。

② 《本市学生反对伪组织》，《大美晚报》，1940年3月30日。

③ 《沪上往事细说从头》，（台北）《传记文学》，1987年12月号。

④ 《致朱家骅电》，1940年3月30日。

⑤ 端木衣虹：《大上海青年反法西斯斗争底绘卷》，《新华日报》，1941年11月30日。

拥护中央，拥护抗建国策。”^①会后，各校宣传队到租界各马路散发反汪传单，高呼反对成立伪府口号，因此，被捕数十人。这是沦陷区的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行动，发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日，蒋伯诚即致电重庆，报告有关情况。4月2日，朱家骅复电表示满意。电称：“沪市讨汪工作，由兄主持，颇著绩效。原电已译呈总裁鉴核，仍请督导诸同志加紧进行。”^②

宣示抗战国策，拒绝德国人转达的日本和平条件

日军侵华，原以为可以在短时期内灭亡中国，但是，却陷入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泥潭中。日本侵略者不得不通过多种渠道向重庆国民政府诱和，以求取得在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从侵华战争中拔出脚来。

1940年10月15日，德驻华使馆代办密告蒋伯诚与吴开先：日本华北军司令长官多田骏等对汪精卫甚为轻视，认为中日问题非与蒋介石洽商，无法解决。德代办称：日方现应以优越之条件给予中国政府，但日方亦应有所得。德代办暗示，德国将以第三国姿态出面保证实行。蒋、吴二人没有坚决表示拒绝，同意将谈话经过报告蒋介石。朱家骅对此不满，复电称：“此次抗战，中途言和，可招亡国之祸。”“战事扩大，正我所期待。英美合作既成，则共同制日，步步加紧，对我援助，日有进步，前途希望愈增，我抗战亦胜利愈近，此时我方决不可稍动摇。”^③

① 端木衣虹：《大上海青年反法西斯斗争底绘卷》，《新华日报》，1941年11月30日。

② 朱家骅：《复蒋伯诚电》。

③ 朱家骅：《复蒋伯诚、吴开先》。

德国企图再次调停中日战争的消息很快为英、美得知。10月26日,吴开先以中央驻沪人员名义对英、美记者发表谈话:“中日战争,非俟日本有真诚之觉悟,放弃侵略之决心,达到委员长所提恢复中国领土之完整,国家之独立、自由,则任何和平方法,余知中央决不愿予以考虑也。”^①朱家骅认为这一谈话“颇为得体”,于29日复电表扬,电称:“欲谋世界秩序之恢复,和平之重见,各国必先联合,共同制日。我三年余抗战,对世界,尤其太平洋有关各国,贡献良多。此后当更尽最大之努力剪灭此世界祸首也。”朱家骅指示,如外国人继续询问,即按上述意思回答。^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同年12月,日军占领上海英法两租界,统一委员会的工作转入隐蔽待机,但是,日方仍然多次辗转向吴开先表示谋和之意。1942年2月上旬,德国海通社社长美最时会见吴开先,转达日方求和意图,打听中方条件。吴开先答以“我方现在绝无谋和之意,条件无从谈及”。12日,美最时再次约见,出示日本海军方面的五条意见,主要内容为:1. 日本承认中国尚未击败,希望避免继续流血,愿接受中国之和平条件;2. 中国应尽速参加东亚新秩序,取得其应得之地位,则中日两国,将为亚洲之两平等国家;3. 日方决定大权,掌握在东京二三领袖手中,日本海军与之有最接近之联系,因此中国无须与其他日人谈判;4. 此次机会,稍纵即逝,望中国方面及早图之。有了前次的教训,这次吴开先的回答就干脆了:中国已在二十六国宣言上签字,不能单独媾和,“事无百一之望”^③。24日,朱家骅复电,指示称:“我国单独抗战,四年有半,百折不挠,已获胜利基础。”“太平洋战事发生以

① 吴开先:《致朱部长骅公》。

② 朱家骅:《复吴开先电》。

③ 吴开先:《致骅公电》。

極密

2303

來電

吳開先

附

我軍獨抗戰四年有年，上獲勝利基礎，
 下得人心，若奮鬥之志完成，必不在遠。於此
 戰事發生以來，我軍一躍而為四強之一國，
 中國國際地位既已提高，同時亦為亞洲各民
 族之領袖。此乃千載一時之良機，萬不可失。
 敵人在太平洋上勝利，本為意中之事，最後
 勝利仍屬於我，敵必慘敗，已無疑義。今其
 謀和之心愈切者，亦為此也。

德人建議，弟意不宜轉陳，因總裁必大生氣也。

甲、乙、呈

切轉懇向弟表示，以事及國策均置
 不問，最近海通社長姜最時君亦來談及日方在
 之誠，並叩我方和平條件，弟當答以我方現在絕無
 謀和之意，條件無從談及。侵日美最時君於相見時
 自上海發 三年二月二日 第 0006 號

後勝利仍屬於我，
 下得人心，若奮鬥之志完成，必不在遠。於此
 戰事發生以來，我軍一躍而為四強之一國，
 中國國際地位既已提高，同時亦為亞洲各民
 族之領袖。此乃千載一時之良機，萬不可失。
 敵人在太平洋上勝利，本為意中之事，最後
 勝利仍屬於我，敵必慘敗，已無疑義。今其
 謀和之心愈切者，亦為此也。

德人建議，弟意不宜轉陳，因總裁必大生氣也。

朱家骅在吴开先电报上的批示(采自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

来，我一跃而跻为四强之列，为世界大战中之主角，同时亦为世界各民族共认之领导者，国际地位既已提高，此乃千载一时万不可失之良机，正宜及时加紧努力，以竟全功，断无中途言和之理。敌在太平洋上初期胜利，本为意中之事，最后胜利仍属于我，敌必惨败，已无疑义，今其谋和之心愈切者，亦为此也。”朱家骅并称：“德人建议，弟意不宜转陈，因总裁必大生气也。”^①

① 朱家骅：《复吴开先电》。

统一委员会工作的停顿

1942年3月,吴开先被捕。5月6日,统一委员会的秘密电台被破获,吴绍澍避居宜兴西南的张渚。此后,又适逢蒋伯诚中风,因此,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工作陷于停顿。除营救吴开先外,就没有做过多少事了。

自吴开先抵沪至被捕,前后不到三年。在此期间,吴开先等始终没有能将上海的敌后工作真正统一起来,其工作范围也仅限于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和社会下层缺少联系。同时,他们还有和共产党闹摩擦的一面,反映出国民党虽一面联共抗战,一面仍不能忘情于反共。但是,吴开先等人和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主要斗争矛头是指向日本侵略者和汪伪集团的,因此,基本上应予肯定。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1997年7月号;修订稿发表于《民国档案》,1998年第4期。



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

——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

打开《民国人物词典》，有两个人物：一为江苏吴县人陈中孚，1938年任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顾问，1941年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后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为安徽望江人何世桢，1939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被重庆中央宣布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按二人职位，理应列入汉奸行列。但是，此二人在抗战胜利后都没有受到惩罚。不仅如此，何世桢还在上海参与接收日伪财产。1948年并被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这就奇了。

翻查有关档案、文献，二人也确乎有“劣迹”。如：1939年9月15日，何世桢曾致电蒋介石等称：“国家民族已至最危急时期，党既不能成为有主义、有精神之党，政府亦复不能为负有责任有能力之政府，全国人民已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诸公犹以国家民族为孤注一掷，将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此则诚可痛心疾首长太息者也。深望诸公幡然悔悟，以大无畏精神向国人公开谢罪，光明的主和，切实团结全国国力，共为光荣和平之奋斗。”此电刊于汪伪《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等人正在上海全力“主和”，何世桢在电报中却要求蒋介石和重庆方面“幡然悔悟”，放弃抗战方针，“向国人公开谢罪”，“共为光荣和平之奋斗”。这不是明显的汉奸言论吗？据说，何世桢还曾租用飞机在上海及重庆上空散发此电。他们在抗战胜利后何以未受到惩罚呢？

1996年，我在台湾所藏朱家骅档案中读到了葛覃、吴任沧、腾珂三人写给重庆方面的一份报告，专谈何世桢、陈中孚情况，部分解答

了我的疑问。

一、1938年秋，陈中孚、何世桢奉孔祥熙、于右任、居正三人嘱咐，探讨“中日和平途径”。适值陈立夫派陈惠到上海做“重要政治情报工作”，经滕珂介绍，与陈、何联系，“便中侦察日方对华政治动向，随时报告中央”。陈惠在上海组织民众党，出版《民力》周刊，公开反对汪精卫，同时与陈中孚、何世桢联手，打击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后陈惠被汪方通缉，被迫离沪。

二、汪精卫初到上海时，首先拉拢陈中孚、何世桢，计划在广州组织伪国民政府，为陈、何拒绝。同时，北方的王克敏、南方的梁鸿志也多方诱迫何世桢参加伪府，许以司法院院长高位和20万元的经费。陈、何态度未定，滕珂等多方劝阻，二人遂加以拒绝。

三、1939年，汪精卫到北平，企图勾结吴佩孚。陈、何得到消息，立即北上，劝吴以国家为重，不要受汪精卫的愚弄，吴遂拒绝与汪会晤。

四、汪精卫联吴失败后，回上海组织中山学会，旋改称“中央党部”，准备成立伪国民政府，陈、何即组织中国新同盟会相抗。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何世桢为主席团成员，继又推为伪国民党中央常委，许诺何为立法院长，均遭拒绝。因此，汪精卫非常痛恨何世桢。当重庆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何世桢党籍之时，汪精卫也在上海袭击了何主持的持志学院。

五、汪精卫到上海后，向日方夸耀，重庆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张发奎、陈铭枢等都同情他的和平主张，但所言不验；而且陈、何也不肯与汪合作。日方因此感到，汪没有解决时局的能力。陈、何乘机策动日方，“欲谋和，非向中央进行不可，否则徒受汪愚”。汪政权之所以一再喧嚷，而迟迟不能建立，与陈、何的策动有关。

六、陈、何不仅运用日方倒汪，而且不时运用南北两个伪政权刁难汪精卫。汪精卫政权之所以难产，此一重要原因。

七、1939年春,日本军部小野寺来华,与陈、何续谈和平,陈、何再次提出:汪无解决时局能力,欲谋和惟有求诸中央。小野寺赞同这一观点,立飞东京,与近卫、平沼商量;再返沪,向陈、何称:日方要人多数赞同与重庆方面谈判,任国府指定地点,重庆、昆明、桂林、新加坡、小吕宋均无不可,近卫或平沼均可参加。其他如军部的适原、海军的野村中将、现任海军司令津田中将均持同一主张。日方人员多次向陈、何表示:“如中央有意谈判,则日方条件均可从优,否则惟有支持汪政权矣!”

八、自高宗武、陶希圣在香港发表日汪密约后,海内大哗。陈、何表示:“即无日汪密约吾人亦不与汪合作;有此卖国协定,更非倒汪不可!吾人之中国新同盟会与和平救国会亦准备结束。”

九、1939年3月初,陈、何向腾珂等表示:现在日方的松冈洋右一派,如石井、小川等及日海军宇垣大将等发表新主张,高唱解决中国问题,除东北四省既成事实外,余均无条件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此说在日本国内甚为有力。军部的小野寺、适原,海军之野村、津田、岩村等,均持同一主张。彼等尤其反对支持汪政权,使之成为中日和平的障碍。北平的熹多、南京的原田、武汉的村杉也坚决反对支持汪政权。何称:陈中孚拟于汪政权成立后,开始其倒汪活动。届时,汪政权的弱点即将全部暴露,陈、何将联合日方海陆军中之反汪派,推倒米内内阁,促成宇垣、松冈洋右、小野寺等之抬头,并向日方之政党、议会发动倒汪攻势,从而转变日方支持汪伪政权的国策,俾向吾人就范。“吾人更一面在抗战军事予以若干次重大打击,一面支持日方反汪分子之活动,以扰乱其侵华阵容,则抗战之前途不难于有利之条件下达到中央预期之目的也。”

函末,腾珂等建议,恢复外交部驻沪办事处,派专人主持,联络陈、何,使之“作有利于中央之活动”,“发动对日之外交攻势”。同函并称:“汪伪政权成立期近,陈、何效力中央,颇具诚意,时机迫切,稍纵即逝。”

从腾珂等人的报告看,陈中孚、何世楨是有意打入敌人内部的国民

党的特殊工作人员,其主要目的是做倒汪活动。一方面在“和平”阵营内做汪精卫的反对派,一方面支持日本人内部的反汪派。一言以蔽之,阻挠和破坏汪精卫组织伪政权。

笔者的这一判断并不是孤证。吴绍澍在《记上海统一委员会》一文中回忆:“上海持志大学校长何世桢与李择一、陈中孚与日寇也有勾结,而同汪精卫伪组织并不合流,却想另搞一套。当时统一委员会对何也发出了警告。何就托人解释,说与重庆有联系。”可见,何世桢、陈中孚是打着“和平运动”旗帜的反汪派。上海统一委员会是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抗日组织,吴绍澍是其主要成员之一,其回忆自然比较可靠。

何世桢、陈中孚原来都属于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是坚决的反蒋分子。他们是如何转而成为重庆方面的特殊地下工作者呢?关于此,胡道静老人等回忆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何的持志学生徐明诚,时任军令部东南办事处即上饶办事处主任,劝何以国家利益为重,对蒋抛弃过去的个人恩怨,与日方接触,以了解日方动态,利用各方关系和他们之间的矛盾,为民族战争作出贡献。何接受了这意见。因而何到了重庆,接受我调查单位之请,返回上海,与日伪秘密接触,从而探知敌方很多秘密。1939年9月,重庆政府发布对何的通缉令,使他更受日伪之信赖。何世桢在抗战期间成为提供敌方情报最多贡献的人员。”

这段回忆清楚地说明了,重庆方面派何世桢回沪从事秘密工作的情况。陈中孚是何世桢的搭档,其情况当亦类似。

何世桢不仅为国民党工作,而且也为共产党工作。胡道静等又回忆说:何世桢秘密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驻上海的负责人。中共地下党利用何的关系在汪伪周佛海的中央储备银行搞到一个透支户,组织公司,实质上是新四军的后勤供应站。因此,1979年上海市公安局在何世桢的复查结论中明确写道:“何历史上与我党组织有过关系,曾做过有益于人民的工作,是有贡献的。”

胡道静等还回忆说：“何世桢与阜丰面粉厂厂长孙伯群有亲戚关系，在孙厂内的住宅内设立秘密电台，另一秘密电台设在何的家中。在杭州亦有一秘密电台设在何的学生劳鉴劭家中。有一时期，上海居民粮食紧缺，何曾请孙伯群设法弄一些面粉帮助地下工作人员生活。”

除在“和平运动”中反汪外，1944年，何世桢还曾和近卫文麿的弟弟水谷川忠麿等联系，介绍徐明诚代表重庆方面和日方谈判，提出要求日本全面从中国撤军等三项条件。日方称之为“何世桢工作”。同年9月29日周佛海日记云：“徐某来，半年前曾见过一次，据云系渝军令部东南办事处下之负责人，奉军令部电令向日海军接洽者，提出前记之和平条件三项。盖日海军前曾由何世桢传达，拟倒东条内阁以对渝表示诚意，而东条果倒，故内地电徐经何提出也。”据此可知，何世桢确曾在日方内部工作，挑动其内部矛盾。

何世桢、陈中孚的经历都很复杂。关于何，笔者所知略多：他于“文革”期间被隔离审查，写过几十万字的交代材料。1972年10月13日撤销隔离，同月17日去世。关于陈，则所知极少。他大概后来去了美国，组织第三种力量。

还要谈一谈陆玄南。《朱家骅先生年谱》称：“（民国二十八年）此时布置南京地下党部，发现委员陆玄南同时担任伪组织的南京市党部委员，因他事前没有向中央报告用兼伪组织的职务作掩护的手续，既格于规定，先生不得不将他免职。但他免职之后仍能一秉初衷，继续为中央工作，非常出力。结果被伪组织发现逮捕，壮烈就义。”显然这也是一位忠贞的爱国者。他的实际职务是南京市地下党部成员，公开职务则是汪伪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为此，他受到重庆方面的处分，最终则牺牲在地下工作的岗位上。

我曾见到过陆玄南写给重庆方面的几份秘密报告，知道他化名钟平，在南京“专任汪方之反间及情报工作”，“尽量离间，使其内斗”。他

最初在汪伪“中央通讯社”工作,后来偕同其他两个同志混入伪南京市党部。他曾利用特殊身份在当地组织了12个地下工作小组,也确曾向重庆报告过汪伪集团的许多情报。例如,其1939年提供的情报就有:汪伪新政权成立延缓,汪防范、戒备情形,汪派人员之摩擦益甚,汪建立武力情形,最近汪外交动向等。不过由于资料不足,他在南京的全部工作及其被捕牺牲情形,一时还难以厘清。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胡适与陈光甫

胡适的朋友大都是文化教育界人士，但是，也有几位银行界的大亨，陈光甫就是其中之一。

陈光甫(1881—1976)，江苏镇江人。年轻时在美国留学，曾获宾州商学院学士学位。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创办中国旅行社。同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1933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36年，以中国币制代表团首席代表身份赴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毛根韬(Henry Morgenthau)谈判，签订了有关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等问题的《白银协定》。谈判中，陈光甫给毛根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次年，任贸易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推广出口、争取外汇等事宜。

抗战期间，胡适与陈光甫二人共同在美国寻求援助，卓有成绩，彼此之间的友谊也因而建立。

早期交往

胡适与陈光甫的交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1929年3月，陈光甫赴欧考察，途经埃及时曾致函胡适，中云：

此次欧行，未克走别为帐。25号过苏彝士运河时，弟离轮乘汽车，夜渡沙漠，访开义罗，游览金字塔、石神 Sphinx、尼罗河，诚旧迹

之奇观也。又见英人经营埃及之成绩，道路平坦，交通便利，此时弟取出兄之大著“East and West Civilization”再读一遍，令人钦佩不已。同行有一美国学者，原来系医生，名 Dr. Clark，对兄之书深为钦佩云。全书精华皆在兄之文章里，不日来华，欲与一谈也。

弟约4月1号可抵马赛，即渡英小住数月，研究调查，此时国内已交春令，一般小孩子又要顽刀舞枪矣。可怜可笑！吾兄近有新著作否？有暇时希便赐示。^①

1926年，胡适曾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1928年，胡适以英文改写，内容略有变动，题为：Civilization of the East and west（《东西文化之比较》），成为比尔德（Charles A. Beard）所编 *Whether Mankind*（《人类的前程》）一书中的一章，1928年由纽约 Longman 书局出版。该文反对所谓“西方的物质文明已经破产，东方的精神文明将要兴起”的说法，认为“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②。又称：“这种民治的宗教”，“乃是设法使个个男女都能得到自由，除了用科学与机械增高个人的快乐之外，还要利用制度与法律使大多数人都能得着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西方最伟大的精神文明”。胡适写道：“我可以问问，妇女解放、民治政体、普及教育等是否从东方的精神文明产生出来的呢？焚烧孀妇、容忍阶级制度、妇女缠足，凡此种种，是否精神文明呢？”陈光甫信中所称“令人钦佩不已”的“大著”，指的就是这一篇文章。

近代中国，东西方文明的论争是个热门话题，人们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西化和国粹两派。陈光甫此函说明，他和胡适同属于西化派，也说

① 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② 胡适晚年曾对这句话表示忏悔。

明这一时期,他们已有较密切的关系。此后,胡适和陈光甫交往见之于记载的有:

1931年10月下旬,胡适和陈光甫同时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

1932年5月,陈光甫等银行家和部分外交界人士发起组织国际问题研究会,邀请胡适为研究组成员。^①

1934年5月,陈光甫到北平。6月1日,胡适前往拜会。陈称:“现时各处建设颇有进步,人才也多有新式训练而不谋私利的人。”^②

同年除夕,胡适赴香港大学讲学,途经上海,正值亚东图书馆发生经济困难,有一笔银行欠款必须偿还。为了帮助亚东度过年关,胡适托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请他打电话给陈光甫,把亚东在上海银行的三千元透支款再转一期。^③ 当夜,胡适到百乐门舞厅,看见宋子文、顾维钧、陈光甫、李铭等人舞兴正浓,胡适不禁感慨起来:空前的经济大恐慌正逼人而来,国家的绝大危难就在眼前,怎么谁也感觉不到呢!^④

这一段时期,胡适和陈光甫只能算相交,还不能算相知。

共同争取美援

胡适和陈光甫的相知主要是在抗战期间。

1938年,中国抗战正处于极为艰难的阶段。为了争取美国的财政

① 油印函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②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③ 同上,第12册。

④ 同上。

援助,国民政府应罗斯福政府之请,于当年9月指派陈光甫赴美谈判。同月,召回王正廷,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0月3日,胡适到达任所,旋即致孔祥熙电云:

鄙意外交至重要,当以全付精神应付。此外如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宜逐渐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光甫兄等来后,借款事空气顿肃清,即是最好例证。^①

自20世纪30年代初起,美国国内即弥漫着浓重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情绪,不愿过问欧洲和亚洲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战争。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中立法,更使这种孤立主义情绪得到了法律的肯定。胡适感到:要改变美国的这种情况,必须花大力气,因此,他对陈光甫来美专门谈判借款,非常高兴。

为了不违反美国的中立法,并且不招致美国孤立主义者的反对,陈光甫和毛根韬商定,在中国成立复兴商业公司,收购桐油,售给在美国成立的世界贸易公司,再由该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借款契约。这样,就使该项借款成为一项商业机关与银行之间的借款契约。谈判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比较顺利。

但是,国内战场的形势却一直很不好。10月21日,华南重镇广州失守,胡适和陈光甫都十分悲愤。23日,消息更坏,陈光甫懊丧异常。胡适力劝陈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职守。”^②25日,华中重镇武汉沦陷,胡适、陈光甫受到

^① 《胡适致孔祥熙电》,《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征求意见稿),3页,中华书局,1978。

^② 《胡适的日记》,第13册。

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也就在这一天晚上,毛根韬打电话给胡适,约胡和陈光甫同到他家去喝酒。二人到达后,觉得气氛有点异样。财部的要员都在,毛根韬的秘书手里拿着纸和笔,好像有什么事要办一样。毛根韬说:借款的事已经成功,罗总统已经 OK 了。他顺手指着桌上的纸张说,那就是借款协定的草案。他又说:这两天中国的消息不好,希望这笔借款可以有强心针的作用。^① 胡适、陈光甫正高兴时,毛根韬又说: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事:今天中午向总统请示,总统略加思考,即称:不幸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如果我今天批准借款,明天中国忽然换了政府,变了政策,我一定遭到非议。若在数日内,蒋介石将军能明白表示,中国政府安定而政策不变,我可以立即批准此项借款。^②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胡适、陈光甫又兴奋、又惊异,稍坐了一下,一人喝了一杯凉开水,就匆匆告别。

离开毛根韬住所后,胡适、陈光甫立即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要求按罗斯福的要求有所表示。当时,中国抗战需款甚巨。此次借款共美元 2060 万元,孔祥熙觉得数目太小。27 日,他致电陈光甫及胡适,询问数字是否有误? 此款之外,是否另有其他借款。关于国内情况,孔祥熙电称:

虽以广州陷落,武汉撤退,政局情形,尚称安定。金融方面,以竭力维持,人心安定,亦尚平稳,政治决不致有所变更。至于今后方针,只要友邦能予有力援助,决仍照原定计划继续抗战,决不因一二城市之得失而有所变更。军事发言人已有谈话发表,想已得悉。

① 《胡适谈话记录》,未刊稿,陈光甫档,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下同。

② 《陈光甫日记》,未刊稿,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下同。

孔电并称：

为持久抗战而达最后之目的，所望于美方者至深。如美只空表同情，不能实力帮助，殊使我为世界和平之抗战者，有所寒心。^①

陈光甫接电后，和胡适分析情况，认为此项借款，数目确实微小，其原因可能在于广州、武汉陷落，谣传政府改组，调停议和，在此情况下，美方暂时观望，亦属情理之常。陈、胡二人建议：先行接受美方方案，加紧组织公司，一面将桐油、锡、钨等，由新路源源运来，证明运输确有办法；一面相机续谈。陈、胡二人表示：“只要我方情形相当稳定，继续援助，似有可能。”陈、胡并称：“美国论利害与我非唇齿之依，论交情亦无患难之谊。全国舆论虽同情于我，终不敌其畏战之心。执政者揣摩民意，不敢毅然拂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毛根韬，“兢兢业业，与之研求”。^②

10月31日，陈光甫向胡适要一张照片，胡适在背面题了一首诗：

略有几茎白发，
心情已近中年。
做了过河小卒，
只许拼命向前。^③

① 《陈光甫日记》，1938年10月27日。

② 同上。

③ 《胡适的日记》，第13册，后来胡适重写此诗时文字小有变动：“小卒”改作“卒子”，“只许”改作“只能”。

这首小诗,反映出胡适当时为挽救民族危难,奋勇工作的精神面貌。

同日,蒋介石发表《为武汉撤退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决心抗战到底。11月2日,罗斯福约胡适谈话,胡适将孔祥熙来电要点转告。罗斯福表示已经知道,并称将与财长商量。但是,美国国务卿(外交部长)赫尔(Cordell Hull)认为借款几乎纯粹是政治性的,担心日本报复,于是,借款暂时被搁置。直到11月底,在毛根韬的斡旋下,罗斯福才批准借款。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关于进出口银行与世界贸易公司达成2500万美元信贷协议的通告。18日,蒋介石致电胡适、陈光甫,予以鼓励,电云:

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①

由于这笔借款以中国向美国出售桐油为条件,因此,被称为“中美桐油借款”。

中美桐油借款数量不大,但它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第一笔借款,意味着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壁垒被突破,国民政府争取美援的道路自此打开,它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

相互间的信任与支持

首次谈判成功,蒋介石很高兴。企图进一步搬掉美国援华的绊脚

^①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5页。

石。1938年12月30日,蒋介石手谕孔祥熙:“美国国会即将开会,对于美馆宣传与对其各议员之联络,应特别注重。其目的则在修改其中立法与提倡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与召集太平洋和平会议。”^①孔祥熙随即电告胡适、陈光甫二人,同时电汇美金2万元,要求他们“迅为运用,期达目的”。但是,这时胡适正因心脏病突发,住在医院里,直到1939年2月20日,胡适才出院恢复工作。

胡适以学者出任大使,作风和外交系的官僚们完全不同,因此,为部分人所不满,传言陈光甫将继任驻美大使。1939年5月18日,陈光甫到华昌洋行,有人对陈说:“适之人地极为相宜,全美华侨十分爱戴。朝野推崇备至,为数十年来最好之大使,可为中国得人之庆。此时若轻易调换,美政界必致发生误会。千钧一发,万不可冒险出此。”陈光甫此时已与胡适共事八个月,觉得这一观察不错,在日记中写道:“此项谣传之由来,大约不外国内有人对之不满。以书生出任大使,本为革命外交,旧外交系系员认为破天荒之举。试问今日外交,岂能尽如人意,一旦有机可乘,群起而攻之,造谣生事,无所不用其极。适之向抱乐观,全不在意。余料此类谣言,再过一月半月,即可冰消瓦解矣!”^②

陈光甫信任胡适,胡适也信任陈光甫,对陈的爱国热忱与工作精神日益佩服。

在美国谈判借款很困难,需要看人脸色、仰人鼻息行事。陈光甫曾在致蒋介石电中诉苦:“钱在他人手中,告求良非易易。”^③又在日记中自述:“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中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

^① 《孔祥熙致胡适、陈光甫电》,《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6页。

^② 《陈光甫日记》,1939年5月18日。

^③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241页,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1。

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境，窥伺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言词，迅速进言，藉以维持好感。自（二十七年）九月来此，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①有时，陈光甫不无牢骚：“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气恼，何苦来！”6月22日，陈光甫会见胡适，作了一次深谈，胡适对陈说：“我最佩服你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当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光甫办银行30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牺牲¹。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又称：“光甫作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了国家。”其后不久，又在日记中写道：“光甫不是很高的天才，但其人忠厚可爱。”^②为了帮助陈光甫消解客中的寂寞，胡适特意送了一本自己编的《词选》给陈。由于日军在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日益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7月26日，美国外交部正式照会日本大使馆，声明废止1911年美日商约，6个月后失效。胡适听了，大为兴奋，马上打电话给陈光甫，陈也很兴奋。^③二人再一次分享了成功的欢乐。

陈光甫身体不大好，是抱病到美国工作的，加上谈判艰难，因此早有退志。7月31日，陈光甫告诉胡适，已托人在云南呈贡的湖上买几亩地，盖几间房子，预备十二月或次年正月回去休养。胡适大笑道：“我和你都是逃走不掉的。”^④

① 《陈光甫日记》，1939年6月4日。

② 《胡适的日记》，1939年6月22日、8月2日。

③ 同上，1939年7月26日。

④ 同上，第14册。

此后不久，国内政局即酝酿着一次新的变动。

国民党内孔、宋各成一派，长期相互争斗。孔祥熙于1938年1月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不久就受到中外舆论和傅斯年、宋子文等人的批评。当年12月18日，翁文灏致电胡适云：

兄与陈光甫论孔意见，弟极赞佩。光甫公忠爱国，亦久佩。孔本人亦相当有用。惟其手下有若干人物，恐独立如光甫者，亦感不易应付。故进贤退不肖，实为当前急务耳！^①

从本电可以看出，孔祥熙“手下”的“若干人物”已经成了物议对象，“进贤退不肖”云云，正反映出当时部分人士改组“孔家店”的要求。1939年11月，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改任副院长，传说宋子文将出任要职，担任财政部或贸易部部长。陈光甫和宋子文有矛盾，和孔祥熙则有30年的关系，私交甚好。^②

胡适担心宋子文不能与陈光甫合作，影响争取美援，准备发电反对。11月25日，胡适到纽约。26日，在陈光甫家吃晚饭，商量此事。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我是向来主张“打孔家店”的人，今反过来为庸之说好话，是很伤心的事。但我为国家计，认为应该如此干，故不避嫌疑，决心发此电。^③

①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5页。

② 参阅杨桂和：《陈光甫与上海银行》，《陈光甫与上海银行》，9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③ 《胡适的日记》，第14册。

他本想当晚写完此电，因背上受凉，不舒服，未能完成。第二天一早起床，完成电文。10点时，陈光甫和纽约华昌公司董事长李国钦来，又请他们看，二人提了一点意见。中午，胡适返回华盛顿。晚上，重写电文，并于当夜发出。

电报是打给陈布雷的，内称：

弟向不满于庸之一家，此兄所深知。然弟在美观察，此一年中庸之对陈光甫兄之事事合作，处处尊重光甫意见，实为借款购货所以能有如许成绩之一大原因。^①

同电盛赞陈光甫在美国的工作：

弟默察光甫诸人在美所建立之采购运输机构，真能弊绝风清，得美国朝野敬信。不但在抗战中为国家取得外人信用，亦可以为将来中美贸易树立久远基础。

电中，胡适表示：1. 宋子文个性太强，恐怕难以与陈光甫合作；2. 如贸易委员会改以宋子良代陈光甫，则陈所办事业，恐不能如向来顺利。3. 今年夏间，宋子文曾向美财部重提棉麦借款，美财部疑为另起炉灶，印象相当不佳。胡适估计，以上情况，恐怕没有人向蒋介石详说，建议陈布雷密陈，供蒋考虑。胡适建议：由蒋出面，切嘱孔祥熙，屏除手下的贪佞小人，命孔继续担任财政部长，这样对陈光甫在美的借款、购货诸事，最为有益。如果由他人出掌财部与贸易部，也必须由蒋切实叮嘱，与陈光甫诚意合作，力戒其邀功生事，造成贻讥国外、妨害事机的不良效果。

^①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27页。

前些年,胡适曾在《写在孔子诞辰之后》一文中说:“凡受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胡适举了高梦旦、张元济、蔡元培、吴稚晖、张伯苓、李四光、翁文灏等九人。这一时期,胡适觉得应该增补几个人,其中就有陈光甫。^①

再次联手争取美援

2500 万元的桐油借款主要用于改善滇缅公路的运输状况,并不能解决多大问题。因此,胡适、陈光甫奉命继续谈判借款。

1939 年 5 月 23 日,陈光甫到华盛顿与胡适商谈。胡适提出,今后谈判有三条途径:1. 直接与罗斯福谈判。2. 托最高法院推事弗兰克福特(Frankfurter)从中斡旋。此人与胡有旧,接近罗斯福,托其居间活动或可较为顺利。3. 胡以大使资格直接与外交部(国务院)交涉。胡适此时正值大病之后,陈光甫觉得胡勇于任事,劲头十足,非常高兴,立即表示,三项之中,自以与外交部接洽为正常途径。当时的美国外交部以“守旧不管闲事”著称,陈对此虽有顾虑,但胡适声称,目下外交部对此亦相当有兴趣。^② 6 月 21 日,胡适即拜会美国国务卿赫尔,说明桐油借款已经用完,希望由国务院提议,向中国提供第二次借款。赫尔要胡适与联邦贷款主任杰西·琼斯(Jesse Jones)商量。

国内催促借款的电报不断飞向华盛顿。7 月 27 日,陈光甫再次到华盛顿看望胡适,从下午一直谈到晚十点半,重点商讨第二次借款如何

^① 《胡适的日记》,1940 年 1 月 3 日。

^② 《陈光甫日记》,1939 年 5 月 26 日。

发动。陈光甫计划于当年十一、十二月脱身回国,因此,建议此次由胡适发动。8月19日陈光甫日记云:“余去志已坚,当然无留此之必要。第二次借款,当看国内政治、经济情形。如果仍有去年余来美时之状况,此事似不悲观。数目多少,现难推测,可由胡大使与外部直接商办。”9月1日,欧洲大战爆发。7日,胡适与陈光甫商量,决定先由胡适向罗斯福开口,借款原则可以桐油为押,不足时加锡为抵押品。陈光甫一直觉得罗斯福对胡适有好感,由胡出面,成功的把握更大;由自己出面,如果罗斯福情绪不佳,说一否字,一切就都完了。次日,胡适拜会罗斯福,请求美国再打一次强心针。罗斯福答应交财部商办,随后即通知毛根韬。26日,胡适拜会毛根韬,毛称:“我等候了你两个星期了!”当天谈判顺利,说定可照桐油借款办法,继续加借。陈光甫计划于次日赴华盛顿研究办法及准备手续。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由大使发动,余可早日脱身。大使究属国家代表,余之职务本属畸形现象,早应更正,今得机会,私心庆幸。”^①28日,陈光甫赶赴华盛顿,与胡适长谈。当日,与胡适共同约请毛根韬的助手劳海(Archie Lochhead)夫妇吃晚饭。10月13日,二人再次作东,请罗斯福政府中的几个“少年才士”吃“中国饭”。在做好了这些外围工作后,胡适起草了一份说帖,于16日交给美国外交部。胡适谈判的艰辛也不亚于陈光甫。有些美国人始终坚持孤立主义、中立主义立场,援助中国的话半句也听不进去,使胡适有“对牛弹琴”之感。有些美国人架子很大。10月13日,陈光甫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国务院)暮气沉沉,只以保全个人地位为目标,其他概非所计,欲求其出力助华,殆如登天之难,能不从中阻挠已属万幸矣!因此又忆及美外部之远东司长项白克(Hornbeck),此君老气横秋,彼对适之讲话有如老师教训学生,可见做大使之痛苦矣!”第二次借款仍取商

^① 《陈光甫日记》,1939年9月26日。

业借款形式,数额为美元 7500 万元,以滇锡 5 万吨作担保。但是,由于美国正忙于修改中立法的大辩论,对日政策未定,进出口银行又资金告罄,因此,借款交涉陷于停顿。1940 年 1 月 13 日,胡适会见罗斯福,再提借款事项,请求迅速定议。16 日,陈光甫拜会毛根韬,请他特别帮忙。毛根韬态度虽诚恳,但表示,最近实在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相告。^①当晚,陈光甫到胡适处吃饭,分析美方将借款搁置的原因,一直谈到深夜。胡适翻出了他写的《回向》一诗,读给陈光甫听,其最末一节是:

他终于下山来了,
向那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陈光甫表示,能理解此诗的意思。^②

为了打开局面,1 月 24 日,胡适与陈光甫一同访问美国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联邦贷款主任杰西·琼斯,请他帮忙。胡适告诉琼斯,中国决不讲和,决不投降,一定长期抗战,如得美国援助,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陈光甫则将桐油运美以及在美购货等有关资料、图表交给琼斯,并递上要求再借 7500 万美元的说帖。琼斯有点聋,谈话很吃力。琼斯告诉他们,当天参议院财政组审查芬兰借款事,决定提议增加进出口银行资本 1 亿元,但每个国家借款不得超过 3000 万元。胡适、陈光

^① 《胡适、陈光甫致孔祥熙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262 页。

^② 《胡适的日记》,第 14 册。

甫感到,此议如成立,对中国甚为不利,托琼斯鼎力设法。告辞后,胡适、陈光甫立刻分头奔走活动。1月31日,陈光甫致电孔祥熙,说明美国“国会有如股东会,人多口杂,彼等适逢选举年度,顾忌特多”^①。2月7日,胡适读报,得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决定,进出口银行增资1亿元,废除原议借款总数不得超过3000万元的限制。胡适很高兴,立刻发电给陈光甫道喜。^②

总数不得超过3000万元的限制虽然取消了,但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同时规定,一次借款以2000万美元为限。3月5日,琼斯通知陈光甫,可按2000万元金额办货,分期支用。3月7日,琼斯会见罗斯福,随即宣布第二次借款一案成立。第二次借款的数目仍然不大,但是,当时日本侵略者正积极扶持汪伪政权登场,借款显示了美国的一种姿态,继续支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支持中国抗战。

3月8日,胡适拜会琼斯,表示感谢。11日,胡适又写长信给毛根韬致谢。同时,蒋介石也致电罗斯福致谢。

正当胡适、陈光甫为第二次借款成功庆幸之际,孔祥熙打了中、英文两份急电给陈光甫,认为第二次借款不应有抵押品(锡)及银行保证,理由是美方对芬兰的借款并不需要担保,中、芬同为反侵略国家,此类借款已从商业性质发展为政治援助,因此,不应有所歧异。此前,孔祥熙对有关方案一直没有提出异议。现在,在事情已成定局时,孔祥熙却要求改变原议,陈光甫、胡适都感到很为难。13日,陈光甫、胡适等商量后,复孔祥熙一电。25日,胡适再致孔祥熙电称:“光甫与适此时实难如此翻复,即向美当局开口,非但无益,徒使毛财长与琼斯诸人为难耳。”胡适并称:“适与光甫事事合作,深知此中困难”,要求孔祥熙速电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264页。

^② 《胡适的日记》,第14册。

陈光甫,按原议进行。^① 27日,孔祥熙复电胡适,不同意胡电“翻复一说”,电称:“吾辈负人民之重托,谋国家之福利。就政治言,应因时制宜,利用机会,并非变卦;即兄等奉令磋商,亦不得认为翻复也。”孔祥熙接着透露了秘密:“弟个人对两兄贤劳困难实情,极为深悉。情形如此,倘不有所磋商,势必惹起各方误会,参政会开会在即,更恐引起质询,势将无以为对。”

孔祥熙特别说明:“倘若言而无效,则我等责任已尽,亦属问心无愧。迭电奉商,实缘于此。”“万一以磋商为难,亦不必勉强。”^②孔祥熙既然只是一种姿态,陈光甫、胡适自然没有认真对待的必要。19日,胡适与陈光甫一同拜会赫尔。陈向赫尔报告第一次借款购货及运售桐油情形,对他及毛根韬协助的盛意表示感谢。4月20日,陈光甫打电话给胡适:《华锡借款合同》签字了。

第二次借款成功,陈光甫即准备交卸回国。4月26日,胡适、陈光甫与毛根韬一同会见罗斯福。陈光甫表示,第一次借款2500万元,已经用完,购买各物,均蒙美国财政部专家特别指示襄助,成绩尚好。陈并称:离开中国已一年半,拟即回国,特来辞行。那天,罗斯福的兴致非常好,对陈的工作表示满意,要陈秋天早点回来。胡乘机感谢罗斯福一年半来对陈的特别好意。罗斯福笑着说:我是最看重外交部与大使馆的;但我想,我的办法似乎比较便捷一点吧!胡适、陈光甫、毛根韬也都大笑。5月3日,陈光甫从纽约打电话向给胡适告别,下午又打电报给胡适,内称:“Assuring you of our happiest recollection of our time together.”胡适和陈光甫共事19个月,此次分别,都很惆怅。胡适感到陈是“很不易得的同事”。当日在日记中写道:“我和他都不求名利,都

①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33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269页。

不贪功,都只为国家的安全,所以最相投。”^①同日,胡适致电陈布雷称,陈光甫已于今日离开纽约西去,将于5月15日自旧金山乘轮返国,希望蒋介石能在其离美之前致电慰问。同日,蒋介石致电陈光甫称:“两借美款,悉赖才力,厥功至伟,尤念勤劳。”^②胡适于5月9日得知有此电,非常高兴。

接替陈光甫的是宋子文。6月14日,蒋介石派宋子文赴美,并授以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的全权。7月2日,胡适陪宋会见琼斯、赫尔等人。晚上,胡适到宋子文的旅馆小坐。宋称:“总统既答应了帮忙,借款一定有望了。”胡适觉得宋过于乐观,答称:“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这事没有这么容易。”接着,宋子文又批评陈光甫负责的两次借款条件太苛,胡适老实不客气地说:“我要 Warn(警告)你:第一,借款时间不能快。第二,借款条件不能比光甫的优多少!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条件下,无法更优的。”^③胡适的这些话,宋子文听起来自然很不悦耳。

陈光甫回国后,成为胡适的热烈维护者。每遇说胡适坏话的,陈光甫就与之对抗。王世杰曾在致胡适函中说:“兄自抵华盛顿使署以后,所谓进退问题,便几无日不在传说着。有的传说,出于‘公敌’;有的传说,出于‘小人’;有的传说,也不是完全无根。同时与这些公敌或小人对抗的,也不少。譬如最近返国的陈光甫,就是一个。”^④

① 《胡适的日记》,第14册。

② 《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38页。

③ 《胡适的日记》,第14册。

④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471~472页。

胡适动员陈光甫出山

物换星移,转眼到了1947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劝说蒋介石放弃一党专政,接纳自由主义分子,按照西方的模式改组政府,扩大社会基础。蒋介石要争取美援,不得不敷衍美国。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次年3月1日,宋子文因治理金融无方,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同时,蒋介石内定政学系首领张群组阁,计划吸收部分小党派领袖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胡适和陈光甫都在网罗之列。

还在1月中旬,蒋介石就通过傅斯年向胡适打招呼,要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3月13日,蒋介石邀胡适吃晚饭。饭前谈话时,胡适要求蒋介石不要逼他加入政府。蒋称:“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其间,王世杰推荐胡适出任行政院院长。3月17日,王世杰奉蒋介石命,拜会胡适,声称不要胡适做行政院长了,只要求胡适作为无党无派的一个代表,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18日,蒋介石再次找胡适谈话,胡适想保持“超然独立”身份,仍然推辞。19日,胡适飞上海,计划自沪返平。

蒋介石动员胡适的同时,张群也到沪动员陈光甫出任国府委员。陈表示,不就国府委员一职,但愿以个人之力帮助张群。在张群提出可能为财政方面的使命派陈去美国时,陈建议再次任命胡适出使华盛顿。他说:“这是最重要而且最关键的岗位中的一个,胡适能博得美国官方和公众两方面的尊敬。在美国,他是友好的源泉。美国人相信他。如

果派他去华盛顿,他将殚精竭力地工作。”^①

“至于我自己”,陈光甫附带说,“我将乐于和胡适合作,尝试再次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作为老朋友,我将准备承担您认为对我适合的任何紧急任务”。

当晚,陈光甫到上海国际饭店胡适住处作了一次长谈。胡适支持陈光甫出任国府委员。他说:

政府有意要你老大哥参加改组,我倒真觉得胆壮得多。光甫先生,我认为你对于国府委员这件事倒是值得考虑的。当今的问题,最严重的还是经济问题,如果我胡适之懂得经济,懂得财政,没有问题的,我一定参加。

胡适又说:

今天是国家的紧要关头,严重的程度可以和抗战初期相比。在当时,不得已,政府请你我出来,到美国去。在今天,情形也还是如此。正如蒋先生说: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坚持要我们这班人出来。你和我,都还有点本钱。所以政府要向我们借债。抗战初期,情形那样的困难,政府不得不向我们借债,度难关;在今天,也还是如此,向我们借用我们的本钱。从责任一方面看,我们是应该就范的。这并不是跳火坑,没有那样严重。

胡适并告诉陈光甫,这届国府委员的寿命只有9个月,很快就要交卸,不必有过多顾虑。胡适接着又说:

^① 《回忆张群》,陈光甫未刊稿(英文),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当年你我在华府替政府做事，我们真是合作，因为你和我同是没有半点私心，一心一意做我们的事。这次政府要你出来，担任国府委员，也许还要请你再去美国多跑几次，打通美国这条路。财政部的人是变了，不过财政部和进出口银行都还有你的老朋友在。还有一点，请我们参加政府是最容易的，最便宜不过的，我们不会有任何条件的。

在1946年的国民大会和其后的国府改组中，青年党，尤其是民社党，要官要钱，闹得颇为不堪。胡适对此很不满，谈起有关情况来，频频摇头。接着，胡适说：

今天的大局，或者可以这样看法：从整个的世界形势来说，如今是美苏对峙的局面，民主政治和集权政治的抗衡，没有，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只是武装和平 Armed peace。这是大宇宙，而中国是小宇宙，情形也一样，最多只能做到一种国共对峙下的武装和平，做不到一般人所希望的真正的和平与统一。唯一的希望是从这双重的武装和平中慢慢的产生一种方式，并且运用这方式逐步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

这天晚上，胡适谈兴很浓，从“大宇宙”、“小宇宙”进而谈到世界上的两种政党：“英、美的政党和独裁国家的政党”，又进一步谈到国民党。胡适说：

孙中山先生是受过英美思想熏陶的人。他树立国民党，原意要建立一个英美式的政党。但是，同时他又看到苏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于是有民国十三年改组，希望采用共党的优点。他的最

终目的还是要创立一个类似第一种政党，而采取第二种政党部分的作风，于是乃有先训政而后宪政之说。

也许胡适觉得话题拉得太远了，于是，又拉回来，谈起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来，他说：

这次在南京召开的三中全会最重要的题目就是训政结束，宪政开始。从国民党本身的立场上来说，就是放弃它这许多年所掌握的政权，亦即所谓还政于民。要一个政党吐出它已有的政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是反自然的。政党的目的是要取得政权，而不是放弃政权。所以这一次国民党的还政于民，实在是有史以来，中外政党史上从来未有的创举。

胡适越说越兴奋，又谈起 1946 年的国民大会，评价起蒋介石来：

我相信蒋先生对于这件大事，他是有诚意，而且也有决心的。记得我在南京开国民大会，那真是鸡群狗党，什么样人都有的聚会。国民党的极右、顽固分子，猖獗非凡，有几天看情形简直暗淡得很。蒋先生找这班人去，又是痛骂，又是哀求，希望他们要认清国大的意义。这样才能有最后通过的宪法，而这宪法在大纲上是维持政治协商的原议的。这次在南京，蒋先生召我去见他。我曾对他说，他的一大错误就是在抗战初期尽力拉拢政府中一班无党无派的人如翁咏霓、公权、廷黻等入党。蒋先生对于这一点也认错。从那天的面谈，我相信他对于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的态度，是非常诚恳的。

胡适一向主张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他说:

现在中国最大的悲剧就是缺少一个第二政党。我曾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力劝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像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一样的在野党,这就是一个观念上的错误,我没有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它根本是一个性质不同的政党。要它变成英、美式的在野党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胡适笑了笑:

中国今天缺少一个由陈光甫 finance 胡适之领导的政党。^①

胡适雄辩滔滔,说得陈光甫颇为动心。20日,下雨,去北平的飞机停航。胡适不得不再在上海滞留一天。他托人带话给陈光甫:如果到美国去,在那里有郭泰祺先生,是他 Pennsylvania 的老同学,还有刘锴,他们都可以像我当时在华盛顿一样的帮他的忙。

这时,陈光甫虽已准备出任国府委员,但是,对于再次赴美争取援助一事却已经信心不足。第二天,陈光甫听到别人转达胡适的意思后,连连摇头说:“不成!不成!今天的情形和当年大不相同了!”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名单,陈光甫以“社会贤达”的资格入选。胡适架不住蒋介石的一再动员,曾一度准备接受,后来听从傅斯年的劝告,拒绝了。

国民政府的改组只是换汤不换药,自然,不会有什么起死回生的效力。蒋介石等人仍然把希望寄托在争取大量美援上。11月2日,胡适

^① 《胡适谈话记录》。

在《中央日报》上发表《援助与自助》一文，认为要争取美援，最好是提出对方一定可以相信的财政专家，如陈光甫那样的人来主持其事。陈读到此文后，对秘书说：“闯祸了！”^①同月10日，胡适致函陈光甫，提出争取美援的具体方案。25日，陈光甫复函胡适，认为美国对欧洲的援助是有条件的，其中最大的条件，就是要受援国家放弃一部分传统的主权观念，如关税自主，以及接受美国关于借款的管理等，但是，这些在经过八年抗战的中国根本做不到，因此，大量的美援也谈不到。函称：老兄所提出的最好保证办法固然可以替两国解除不少的困难，但是，用中国人主持其事，假使蒋先生要钱用，又有谁能说没有钱给他用。我恐怕只有美国人或许可以能说这样的话，但是这岂不等于有损国家的尊严？

陈光甫同意胡适的设计，要建立某种机构，但他认为，这一机构的目的在于支配金钱，而在于联系、沟通，增进中美双方的了解，这就需要一位能够从事东西文化交流，既懂得中国，又懂得美国的人出来担任。陈光甫提出，这一人选非胡适莫属。函称：你我二人好有一比：兄是金菩萨，满腹文章，而我至多只是一尊泥菩萨而已。镏金的泥菩萨也许还值钱，不镏金的泥菩萨可就不值半文钱了。^②其后，陈光甫就反过来推荐胡适再度出任驻美大使。12月12日，王世杰以“国家需要”为理由，要求胡适“再去美国走一趟”。胡适答以“老了。十年的差别，如今不比从前了”。又说：“如对日和会在华盛顿开，我可以充一个团员，但大使是不敢做的了。”^③14日，胡适与陈光甫同到王世杰寓所闲谈，胡适才了解到，陈也是建议胡适再度出任驻美大使者之一。

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在1948年全面爆发，很快，国民党就处于下

① 《徐大春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263页。

② 《胡适书信选》，下册，281页，中华书局，1980。

③ 《胡适的日记》，第15册。

风。敏感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快要终结了。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①15日，胡适到上海，陈光甫邀请他住到上海银行的招待所。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以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上台后，即高谈和平，同时动员几位在全国公众中有影响的人物，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敲开和平之门”。陈光甫也在被动员之列。胡适劝陈光甫不要参加代表团，他说：除了颜惠庆，代表团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和他们一起去不值得，代表团不会有任何收获。^②

晚年的接触

胡适还是被蒋介石说动了。1949年3月，胡适将家属安置在台湾，于4月6日自上海登轮赴美。同月27日，定居纽约。其后，陈光甫也离开大陆，到了曼谷。1949年和1950年的12月，胡适58岁、59岁生日时，陈光甫都曾致电祝贺，但是，1950年陈光甫庆祝70岁大寿时，胡适却正在从洛杉矶飞赴纽约途中，未能有所表示。次年2月，胡适读到陈光甫给任嗣达的长信，对陈的“达观哲学”很佩服，于3月1日致函陈光甫云：“我去年曾想用古人说的‘功不唐捐’（‘唐’是古白话的‘空’，‘捐’是废弃）（No effort is ever in vain）的意思，写一首诗祝老哥的大寿。匆匆之中，诗竟没有写成。现在看你信上说的‘种子’哲学，使我记

① 《胡适的日记》，第16册。

② 《关于和平使命的回忆》，陈光甫未刊稿（英文），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起我在1919年写的一首诗，其中有这几段，我抄在下一叶，博老哥一笑。”^①

胡适所抄诗如下：

大树被斫做柴烧，
树根不久也烂完了。
斫树的人很得意，
他觉得很平安了。

但是那树还有很多种子，
很小的种子，裹在有刺的壳儿里，
上面盖着枯叶，
叶上堆着白雪，
很小的东西，
谁也不在意。

雪消了，
枯叶被春风吹跑了。
那有刺的壳都裂开了，
每个上面长出两瓣嫩叶，
笑迷迷的好象是说：
“我们又来了。”

过了许多年，

^① 吴相湘：《抗战期间两个过河卒子》，（台北）《传记文学》，第17卷，第5期。

坝上田边，都是大树了，
 辛苦的工人，在树下乘凉，
 聪明的小鸟在树上歌唱，
 那斫树的人到那儿去了？

胡适的这首诗，嘲笑“斫树人”，歌颂“种子”顽强的生命力，在陈光甫晚年时抄给他，大概是为了肯定陈一生的努力和业绩吧！

陈光甫于1954年定居台湾，胡适于1958年返台，二人继续往来。其间，胡适曾为陈光甫重写《过河卒子》一诗，并且加了一段跋语：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险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卅五年（1946年）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后来共产党的文人就用“过河卒子”一句话，加上很离奇的解释，做攻击我的材料。这最后两行诗也就成了最著名的句子了。^①

自1954年11月起，大陆曾掀起颇具声势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胡适对此极为不满，跋语只是表达了小小的牢骚而已。

原载《胡适与他的朋友》，第3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

^① 胡适手迹，《陈光甫的一生》插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对苏外交的一鳞半爪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一

抗战期间,宋子文在美国待了两年。他这一时期的档案大多反映对美外交,但是,也有少数文件,关涉对苏外交,可以从中看出这一时期中苏国家关系的一鳞半爪。

1940年10月30日张冲致电宋子文云:

史太林有函致委座,说明德、义、日同盟,于中苏两国表面上有害,实际上有利。询中日和平谈判之谣有无确据,以及问候之词。

当年9月,德、义(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同盟条约,规定三国要在欧洲、亚洲建立“新秩序”中起领导作用,彼此间以一切政治、经济手段互相援助。同月28日,驻苏大使邵力子致电蒋介石,建议乘机增进对苏关系。29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宣称“中国自抗战以来,外交方针无不期与利害共同之苏联一致,中正自去年欧战发生以来,更无时不思商承教益,俾作指针”,措词极为谦恭。10月16日,斯大林复函蒋介石,认为三国同盟改变了日本的孤立状态,对中苏不利,但它促使英美改变对日本的中立态度,因而又对中国有利。函称:“中国主要任务,在为保持与加强中国国民军”,“如阁下之军队坚强有力,则中国必不可摧破”。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集团曾通过多种渠道和日本秘密谈判,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威逼重庆之后,这种谈判活动有加剧之势,因此,斯大林关心地询问:“现在关于对日议和及和平之可能性,谈写〔论〕颇多,

余未知此种传说,与事实有何符合?”在国民党人中,张冲主张对苏友好,因此,他将斯大林致蒋函件摘要报告了宋子文。

抗战初期,英美对日态度举棋不定,苏联是唯一坚决支援中国的国家。1940年12月2日,张冲致电宋子文云:

苏使通知,于本月27日运到哈密交货,计飞机170架,野炮200尊,高射炮50,轻机枪800,重机枪500,并问美方对太平洋及中国及中美苏三国形势上有无方案,似此时苏方颇为起劲。

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其后,苏联即陆续以飞机、军械及军事技术人员帮助中国。1940年1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晤蒋介石,告以苏联政府可以向中国提供飞机、大炮、轻重机枪等物。蒋介石表示,希望在本年内,至迟明年2月止,化冻之前,能将上项物资运到中国境内。本电所云,12月27日运到哈密交货,当即此事。宋子文接电后,非常高兴,于同月9日复电云:

冬电欣悉。苏联开始运输大量军械,军气民心为之一振。其采取陆运,恐欲避免日本知悉。此后如有消息,请随时见告。

当时,中国抗战正处于艰苦阶段,迫切需要军援,宋子文的兴奋是可以想知的。

德国在欧洲的主要进攻目标是苏联。1940年7月,希特勒开始拟订进攻苏联计划。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命令,将进攻苏联的日期定为1941年5月15日。从1941年2月起,德国开始秘密地向苏联边界调集军队。为了全力对付德国侵略者的进攻,苏联政府力谋与日本妥协。4月13日,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内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

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一内容严重地损伤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重庆国民政府决定低调处理。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致电驻美大使胡适云：

日俄协定事，除由外部就满蒙问题声明立场外，我将不对苏作其他批评，以免造成反苏印象，为敌利用。请密囑有关人员注意。

此电虽是打给胡适的，但宋子文属于有关人员之列，所以此电就保存在宋子文档案里了。

从1941年3月日本外相松冈访问莫斯科并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之日起，重庆国民政府就很紧张，多方打听双方谈判内容。为此，邵力子曾访问苏联外交部次长拉代夫斯基，拉代夫斯基守口如瓶，答称“纯为礼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告诉张冲：苏联对外政策不变；苏联决不为自己而牺牲人家的利益；松冈过苏，因苏日并未绝交，照例予以招待云云。苏日条约一公布，国民党内部自然很激动，几经议论，才确定了王世杰传达给胡适的方针。

苏日条约第二条规定：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的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如约保持中立。当时，中日处于敌对状态，如果根据这一条，苏联就不能继续援助中国，因此，各方极为关心苏联对中国的态度。4月17日，邵力子自莫斯科致电胡适云：

15日，见Molotov(莫洛托夫)，询苏日约第二条是否适用于中日战局。据答：该约专为苏联保持和平，与中国无涉，谈判时亦未提及中国，不影响中国抗战。谨密闻，并请转告子文先生。

4月21日,张冲又致电宋子文云:

苏使见委座,谓苏日条约不妨碍中苏关系,松冈与莫谈话中并未提到中国问题。苏俄决不改变,而且不能改变援华政策。西北运输及顾问工作如常。谨闻。

从根本态度上说,苏联反对日本侵略,其所以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主要是为了麻痹日本,稳定东部边境局势,避免陷于两面作战的艰难境地。宋子文读到张冲的电报后,一颗紧绷着的心松弛下来,在张冲电报上批了两个字:“至感!”

尽管苏联愿意支持中国抗战,但是,1941年春,德军大举进攻巴尔干半岛诸国,进一步进攻苏联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为了准备对付德国侵略军,苏联开始自顾不暇了。4月23日,宋子文接到署名“七号”的来电,电云:

邵力子电孔,莫洛托夫谓巴尔干情势恶化,俄须注意西方,中国政府订购各货不能供给,料美国援助无影响云。邵谓僵局难打开,以后只有向美购。

“七号”,当系宋子文在国内的情报人员。此后,苏方对中国的武器援助大减,但是,两国间的换货贸易仍然继续,苏方仍然继续供应中国部分军用物资。5月28日,张冲致电宋子文云:

苏方上周给汽油2500吨,机油940吨,及其他器材。似苏日中立条约对中国不受约束。如我内外无大变化,苏仍将接济我国。我在苏尚有6千余万元押品之军火。

6月22日,德军以庞大的兵力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23日,宋子文致电张冲云:

兄前有促进苏美合作之愿,惜两国互相疑忌,今德苏决裂,美对苏态度将有转变,前愿易了,亦未可知。德日对苏有无密约,日寇此后向何方发展?德宣战后,苏对我有何表示及中共之言论,均请探询,伫候示复。

兄,宋子文自称。在很长时期内,美国尽力避免同德国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中立主义的情绪甚嚣尘上。但是,宋子文估计,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美国的态度将有转变,这一估计是正确的;他促进“苏美合作”的愿望也是有利于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的。果然,就在宋子文致电张冲的同一天,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发表声明,认为任何反希特勒主义的斗争都将促进美国的国防和安全,暗示了美国中立主义立场的转变。同月27日,张冲电复宋子文所提各种问题。7月3日,宋子文致电张冲云:苏军溃败太速,不容我辈作国际之工作矣!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长驱直入,迅速占领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大片领土,军锋指向莫斯科,这是宋子文所始料不及的,他感到促进苏美合作的国际工作不好做了。

然而,形势比人强。不待宋子文的斡旋,苏美之间很快加紧了合作的步骤。当年7月,苏联军事代表团和罗斯福总统的密友戈·霍普金斯分别访问了对方的国家。9月底至10月初,苏联、英国、美国的代表就互相给予军事援助问题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开始形成。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也希望苏联对日宣战。12月12日,斯大林致电蒋介石,答称:本人认为苏联力量目前似不宜分散于远东,苏联当然必须与

日本宣战,但准备需要时间。12月16日,外交部长郭泰祺致电宋子文,将斯大林电的大略告诉他:

史丹林答复委员长节略,谓苏站在同一阵线,日本将来必破坏中立协定,但目下西方战事吃紧,希望我方弗逼其立即对日宣战云云。

郭泰祺还告诉宋子文:“英方答复关于订立同盟一节,美方对于联合指挥一节,均在同情详细考虑中。”12月9日,丘吉尔致电蒋介石:“英国与美国业被日本攻击。我等向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矣!”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在重庆、新加坡、莫斯科三地分别召开军事会议,筹设永久性机构,“以设计及指挥我等共同之努力”。重庆国民政府梦寐以求的局面很快就要出现了。

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中国则向苏联提供钨、锑、桐油、茶叶等物资。其中,向苏联交运矿产品的工作由资源委员会负责。1942年9月5日,宋子文致钱昌照电云:

苏因高加索危迫,必尽力广事开辟,我为救急起见,合作未始非计。商量情形,仍请续示。

此电所讨论的具体“合作”事项不明,但它说明,在苏联处于危难之际时,中国方面也是努力帮助苏联的。

原载《团结报》,1992年5月20日

史迪威事件中的蒋介石与宋子文

——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一

史迪威事件是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上的大事,自梁敬惇的《史迪威事件》一书出版以来,研究已多,但是,由于此前的研究者都未能利用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甚至也未能充分利用史迪威本人的日记,因此,就给我们留下了仍可开辟、耕耘的广大空间,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貌、实质、由之激起的中美关系的巨大波澜以及蒋宋关系的曲折变化。

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发生、发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即谋求与美、英、苏等国结盟,组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1941年年末,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建立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当时,中国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对盟军的合作自然期望甚殷,但是,美国此后并无重要动作,引起蒋介石严重不满。1942年1月30日,蒋介石日记云:“美英对于整个战局与太平洋战局,仍无具体整个之组织。”“彼轻蔑我国,可谓异甚,应严加责问。”^①3月,史迪威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

^① 《困勉记》卷70,1942年1月30日。本文所引蒋介石日记,均采自台北“国史馆”所藏未刊《困勉记》、《省克记》、《爱记》、《事略稿本》,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收藏地点。

谋长,兼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及美国援华物资监理人。最初,蒋介石持欢迎态度,其后,二人间逐渐发生矛盾,并且不断发展、激化。

日军于1942年初攻入缅甸,英军不堪一击,一再溃败。2月26日,蒋介石命令中国第五、第六两军紧急开进缅甸,协助英军固守缅甸海口城市仰光,确保当时中国仅存的滇缅路这一国际通道。3月4日,蒋介石面谕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要他在史迪威到任之后“绝对服从”其指挥。杜问:如果史的命令不符合你的决策时怎么办?蒋称:可打电报请示,但蒋回重庆后,又以手书告诉杜聿明,强调“绝对服从史迪威的重要性”^①。6日,蒋介石在重庆与史迪威第一次见面,就向他表示,准备将缅甸战场的指挥权交给他。^②同月8日,英军放弃仰光,中国人缅部队失去目标。蒋担心日军乘中国军队入缅之际,自越南进攻中国云南,有调回入缅军,加强云南及长江流域各省防务的念头。日记云:“仰光为敌唾手而得,英军之怯弱如此,我军人缅之战略,应特加审慎,重新研讨。此关于我国军之成败非鲜,必须自固根基,不可以英人不可靠者而自误也。”^③3月10日,在史迪威赴缅指挥前夕,蒋介石又与史谈话,声称“我军此次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苟遭失败,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势不可能”^④。他主张保卫当时距离中国后方据点

①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人缅对日作战述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4卷,87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② 黄加林等译:《史迪威日记》,50页,世界知识出版,1992。

③ 《困勉记》卷71,1942年3月8日。

④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以下简称《作战经过》(三),238页。史迪威当日日记称:“蒋大谈中国人的气质和他们所受到的局限,他们不能去进攻的理由……在缅甸失败对于士气将是灾难性的一击。第五军和第六军(是)‘军队中的精华’必须慎重。”见《史迪威日记》,54页。

较近的缅甸的首都曼德勒(瓦城),待日军深入,予以痛击后再行反攻。

仰光是美国援华物资的转运站。史迪威视之为“生命线”,认为“一旦失去仰光,供应线将被切断”,因此,他在入缅后不久,即雄心勃勃地迅速拟定计划,准备推动中国远征军尽量南下,收复仰光。3月18日,史迪威飞返重庆,向蒋提出此项建议,但蒋介石认为,仰光濒海,日军具备海陆空三方面的优势,中国军队如无空军和炮兵掩护,很难克复该地。史、蒋二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蒋每提一个论点,史迪威即加以反驳。^①当日,蒋在日记中批评史迪威“无作战经验,徒尚情感”,“不顾基本与原则”。^②3月19日蒋介石再次与史迪威谈话,分析缅甸战场形势,提出“目前应取守势,切勿轻进以求侥幸”^③。蒋称:如果再过一个月,防线平安无事,他将考虑进攻的问题。谈话中,蒋要求史迪威保证不要让第五、第六军吃败仗,但史则表示无法办到,要蒋“另外找一个能保证这一点的人来,因为我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④。这次谈话,史迪威大为不满,当日即在日记中指责蒋为“固执的畜牲”^⑤。在此期间,美方发表消息,声称中国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入缅作战,蒋介石认为此属泄密行为,日记云:“此无异以我之秘密,相告于敌,使敌知我入缅只两军,其可虑可危,未有如此事之甚者。呜呼!何其不守秘密,不明敌情至此哉!”^⑥

为了保卫曼德勒,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戴安澜部在缅甸南

① 《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18日,60页。

② 《困勉记》卷71,1942年3月18日。

③ 《作战经过》(三),257页。

④ 《史迪威日记》,61页。

⑤ 瞿同祖编译:《史迪威资料》,19页,中华书局,1978;黄加林等《史迪威日记》译文作“顽固的家伙”,61页。

⑥ 《困勉记》卷71,1942年3月20日。

部的同古(东吁)设防。自3月18日起,与日军血战12天,歼敌5000余人。其间,史迪威坚主进攻,杜聿明则认为兵力不足,反对进攻,二人发生争执,以致闹翻。史迪威要求杜“服从命令”,并派人监督杜执行,但杜认为此举关系远征军存亡,中国军队既未能适时集中兵力与敌决战,即应在予敌一定打击之后及时转移,以保存战力。^①29日晚,戴部奉令突围,安全转移。蒋介石与杜聿明的想法一致,日记云:“我第二百师在同古予敌以重大打击后,自动转进至叶莲西之东南地区,与新二师取得联系,而敌军遭此重大打击,我军并无多大损失,乃自动撤退,不仅增我军之荣誉,实足寒敌胆而使之不敢北侵矣。”日记批评史迪威:“以为应在同古全力作战,此不知敌军心理与战地实情,并不知此次放弃同古,乃达成余一贯之意图,而受英方宣传与运动之谈〔误〕也。”^②

史迪威也对杜聿明的抗命不满,在日记中斥责杜聿明和新编第22师师长廖耀湘为“卑怯的杂种”和“十足的懦夫”。^③3月31日史迪威愤而返渝,向蒋介石提出:对指挥中国第五、第六军,“深感所得权限未足,未能令出必行,致有三次可以发动反攻之机会,皆蹉跎坐失”^④。他要求蒋介石免去其本人职务。对史迪威的态度,蒋介石自然感到不快,当日日记云:“史氏以我军师长不听其进攻同古敌军之命令,乃愠气回渝,向我辞职,殊出余之意外。呜呼!我军此次出国作战,对敌对友,对当地民心,皆多困难,而以客卿指挥我军,不熟悉各方内情,使余焦虑,必须面面顾到,较之在国内作战之单纯者,其难易相去有天壤之别。尤其史氏受英方之宣传与运动,而英军不自惭无力,必欲掌握指挥权,图保

①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875页。

② 《困勉记》卷71,1942年3月29日。

③ 《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30日,71页。

④ 《作战经过》(三),271页。

其虚名,余明知我虽牺牲而无益,然为全局与美国关系计,又不能不撑持到底,苦更甚矣!”^①同样,史迪威也感到不快,日记称:“由于愚蠢、恐惧和态度消极,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敌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插手。”“他身处距前线 1600 英里的地方,写下一道接一道的指令,要我们去做这做那,其根据是零散不全的情报和一种荒谬的战术概念。他自认为懂得心理,事实上,他自认懂得一切,他反复无常,随着行动中的每一个微小变化而不断改变主意。”“其结果是使我本来就很小的权威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没有军队,没有警卫,没有枪毙任何人的权力。”^②

4月1日的谈话,史迪威有意向蒋“摊牌”,自称“发作了一番,言辞激烈”,“投下的那些炸弹发出了巨大的轰响”。^③但是,蒋介石仍然极力忍耐。4月2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告以杜聿明“少年气盛”、“过分固执”,决定以年事较高、经验丰富的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在史迪威指挥下统率中国人缅部队作战。蒋并决定亲自陪同史迪威回缅。^④当日蒋日记云:“对缅战事,思虑异甚。既忧部下在国外过于牺牲,补充为难。又忧失败时丧失国威与军誉,而史迪威乃动气请辞,并于中美邦交有关。苦虑终夜,不得不决定约史由余陪同回缅,予以全权,以表示余对彼诚意,使之勿加怀疑也。”^⑤

4月5日,蒋介石与史迪威、罗卓英同机飞赴缅甸北部城市腊戍。6日,到美苗(卑谬),与史迪威及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商谈。7日,蒋与史讨论后,又与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各将领谈话,宣称史迪威是“老

① 《困勉记》卷 71,1942 年 3 月 31 日。

② 《史迪威日记》,1942 年 4 月 1 日,72~73 页。

③ 同上,73 页。

④ 《作战经过》(三),274 页。

⑤ 《困勉记》卷 71,1942 年 4 月 2 日。

板”，“有提升、撤职、惩罚中国远征军中任何一名军官的权力”，“他们应无条件服从命令”。^① 蒋的这些做法，可以说给足了史迪威面子，但是，蒋很快又因事对史不满。8日，蒋介石向孙立人师长授以曼德勒五万分之一地图，面示防守要略，并令与史迪威、罗卓英同往实地设防。蒋在视察新筑机场工程时，发觉进度缓慢，日记云：“史迪威称美苗机场十三天可以完工，是彼受英方之欺，而又欺我者也。可痛极矣。”^②

当时，英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战场；在亚洲，其战略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在缅英军或听任中国远征军独立作战，或利用中国部队掩护自己撤退。4月24日，蒋介石指示：“国军今后在缅甸之作战指导，应以不离开缅境，而又不与敌主力决战为原则。依此原则，以机动作战，极力阻止并迟滞敌之发展。”^③同时，指示远征军守卫腊戍、密支那、八莫等邻近中缅边境的城市。但是，史迪威和罗卓英都还醉心于组织曼德勒会战。5月1日，曼德勒失陷。5日，日军攻占八莫，威胁中国远征军的归国通道。6日，英军决定放弃缅甸，史迪威下令中国远征军向印度撤退，史本人拒绝美方派来接他的飞机，亲率少数人员徒步西行。蒋介石对史迪威未经请示就下令向印度撤退大为不满，日记云：“史迪威擅令我第五军赴印度边境之庞炳，而彼且离开队伍，先自赴印，并无一电请示。此种军人，殊非预想所及，岂彼或为战事失败，神经不安之故乎！可叹！”^④18日，蒋介石要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转告史迪威，“中国军队无退入印度之意”^⑤。在撤退过程中，远征军一度

① 《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7日，77页；参见《作战经过》，290页。

② 《困勉记》卷71，1942年4月8日。

③ 《作战经过》(三)，299页；参见罗卓英：《报告》，1942年6月25日。宋子文文件，第64盒，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以下均同。

④ 《困勉记》，1942年5月6日。

⑤ 《战时外交》(三)，146页。

粮尽药绝，饥病交迫，牺牲惨重，直至7月25日，杜聿明所部直属队等才到达印度。入缅时，远征军兵员约10万人，至此，仅余4万人左右。^①

6月4日，史迪威自印度德里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严厉批评中国远征军的高级将领：“殊令人失望”，“或缺能力，或缺胆略”，声称“彼等居处离前线太远，且无意亲上前线”。“因循迁延为各高级将领之通病。”他甚至点名批评杜聿明“个性刚愎，不易应付”。他自称这次汇报为“开门见山，指名道姓”，“那情形就如同在踢一位老妇人的肚子一样”。^② 蒋对这些批评大不以为然，认为史对此次撤退负有重大责任，但却“不知自反，专事毁人利己”^③。6月5日日记云：“我军在缅如此重大牺牲，其责任全在史氏之指挥无方，而彼乃毫不自承过失，反诋毁我高级将领至此。当失败之初，彼乃手足无措，只顾向印度逃命，而置我军于不顾，以致我第五军至今尚未脱险。呜呼！史迪威诚不知耻者也。”^④由此，蒋介石更进一步指责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半皆自私自大之流”^⑤。6月16日，蒋研究对史迪威的处理办法，产生“军法审判”的念头。日记云：“彼为推诿责任，掩护罪过，故不得不毁坏他人名誉，诬蔑我国将领。此应提议开军法审判，使美国政府能知史之不法与无礼乎！”^⑥至此，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印象可谓恶劣至极，而史迪威对蒋的印象也同样很糟糕，日记称：“中国政府是一个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础上的机构，掌握在一个无知、专横、顽固的人手中。”^⑦

① 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882页。

② 《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4日、7日，103、104页。

③ 《困勉记》卷72，1942年6月6日。

④ 同上，1942年6月5日。

⑤ 同上，1942年6月6日。

⑥ 同上，1942年6月16日。

⑦ 《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19日，105页。

蒋介石指示宋子文等向美国提出史迪威问题

为了援助被侵略国家,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和其他目的法案》(租借法案),授权美国总统以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法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国防物资。先后受援的国家有英国、苏联、中国、自由法国等。但是,其间的条件并不平等,给英国、苏联的援助物资可直接拨交,而对中国的援助物资,则必须通过监理人史迪威分配。此外,在华盛顿成立的联合参谋长会议(参谋团),也将中国拒之门外。

蒋介石企图改变上述情况。1942年4月19日,蒋致电时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要求宋与罗斯福总统作“肺腑深谈”。电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及军用品供应之主要事项中,中国并非受有英、苏之同等待遇,不过类似一受保护人而已。”“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如不扩大包括中国,或将中国置于军用品分配董事会之外,则中国势必成为棋中之末卒。”他指示宋子文:“须坚执予等有予等本身之立场,予等须维持本身独立之地位。”^①5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时直率表示:“今日之参谋团,惟有英美参加,拥五百万大军与日本作殊死战之中国反不能厕及,实非中国所愿见。”“中国军民对此措置,刺激实深。深感中国名为同盟国,实被歧视。战时之待遇已暴露不平等之痕迹,如此战后如何未敢想象矣。”^②6月18日,蒋介石致函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及宋子文,批评美国方面对中国战区的组

① 熊式辉文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② 《战时外交》(三),145页。

织与筹备工作进行不力,电称:“中国战区至今并未有何组织与筹备进行,对于维持中国战区至少限度与其可能之方案,亦尚未着手,空军建立与补充以及空运按月之总量,陆空军作战与反攻时期之整个方案,彼等皆视为无足轻重,一若中国战区之成败存亡皆无关其痛痒。”电报不指名批评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仍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在缅战失败撤退过程中,罗卓英与史迪威一度失去联系,史向美国军部报告,罗离开军队,逃往云南保山。^① 蒋介石事后查明,并无其事。对此,蒋极为反感,批评史迪威“谎报”,“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彼竟自赴印度,并擅令我军人印,而彼亦并未对我有一请示或直接报告(中与史本约有特用密本,平时皆直接通电),于情于理,皆出意外”。他表示:从未见过像史迪威这种“推诿罪过,逃避责任以图自保”的人,提出应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军事审判,查明功过。如果美国政府有意,中国政府可将有关高级将领解送华盛顿接受审判。但是,蒋又表示:中国哲学的原则是厚于责己而薄于责人,为维护中美国交及友邦荣誉计,要严格保密,切不可向外人“略露一点”,使人对中国政府有“以怨报德”之想。可以看出,蒋对史迪威已经不能忍耐,但是顾虑中美关系,因此,在要求宋子文等向罗斯福汇报的时候,显得特别小心、谨慎。电中,蒋介石也表述了中国作为“弱国”参加“国际战争”的心情:“不仅利未见而害先入而已,即将来战后是否能获得我所牺牲者相当之代价,实成问题。然而此时我国尚有一块立足之干净土地,而我政府幸亦未托足于外国以寄人篱下,且亦

^① 《宋子文致蒋介石急电》(1942年5月9日):“军部密告,接史梯威电,罗卓英离军队遁宝〔保〕山。”见林孝庭等编:《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往来电稿》,初稿,未刊。

有自立之道耳!”^①

宋子文对史迪威本具好感。当年4月28日,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担心缅战不利,将降低中国国际地位,影响美援争取,要求与史迪威合作,联合如实向美方提出报告,电称:“史迪威亲历其境,利害相关,所知当更透彻,此事必能与我合作,设法使联合国间明了真相。”^②5月6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报告所闻史迪威在撤退过程中拒坐飞机,率领副官步行的表现,称赞史迪威“不失军人本色”。电报提出,史迪威身负如空军援华、中印空运、军货接济等多重任务,要求蒋介石命其自印回渝。^③但是,宋子文也亲身感受到史迪威掌握美援物资分配大权所带来的困难。5月19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美军部以史梯威有全权,每有所商请,辄以史梯威并未要求,为不负责任推诿之词。”宋子文再次要求蒋将史迪威调到重庆,“常依左右,遇事随时飭报,勿使远驻印度,否则种种计划进行愈感延滞”^④。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向美方提出史迪威问题的指示后,感到相当为难。当时,德国正倾全力进攻苏联南部,苏军情况危急,英美无暇东顾。同年6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提出,应尽力于以下工作:(一)中印空运;(二)美空军多派数大队来华助战;(三)美根据史迪威要求,派陆军二三师赴印,助我克复缅甸,以利我陆运。根据上述情况,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对史迪威万分忍耐”^⑤。

① 熊式辉文件,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战时外交》(三),603~604页所载文字有小异,此据熊式辉文件引。

② 宋子文文件,胡佛研究所藏,第60盒。

③ 同上。

④ 宋子文:《加码呈委员长电》,1942年5月19日,林孝庭等编:《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往来电稿》,初稿,未刊。

⑤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往来电稿》。

滇缅路封闭后,中国对外通道被堵。美方不得已,将已经拨给中国的十余万吨机械大部分收回。此后,美国援华物资只能依赖中国、印度之间的空运。根据中国抗战需要和美国援华计划,最低限度每月必须向中国运输 3500 吨军械,而中印之间的空运当时实际上只能运输 500 吨。这种情况,将导致有关援华计划的取消。为此,宋子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与史迪威切实商谈:(甲)中印空运计划,(乙)中美在华空军计划,(丙)国内及赴印陆军计划及附带军械问题,等等。但是,始终得不到蒋的回答。宋子文询问美国空军参谋长,美国空军参谋长答称此为史迪威责任;宋子文向罗斯福总统汇报,罗答以史迪威为蒋的参谋长,诸事可由蒋向史下达命令。6月12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明白示知:“文追随钧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绝非意存推诿,更不愿敷衍因循,事实如此,不得不一再晓谕,即请钧座明白示知,钧座对史梯威感想如何?文各电所列问题,是否已与其商洽?有何困难?美方认定,接济中国必须史梯威商承钧座之后来电证实,始克有济,是以文必须明了钧座对史之感想及史对我之态度,始可设法相机应付也。”^①

这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已经感到,蒋对史迪威“无十分信任之表示”,二人关系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6月12日,史汀生约宋子文专谈史迪威问题。宋称:如美国将本国陆军交给苏俄军官指挥,将非常困难,而蒋介石却将中国人缅部队交给史迪威指挥,这是历史上的“空前之举”。史汀生则表示:史为“第一流战将,美军官中无出其右,故特派充蒋公参谋长,但余等崇拜蒋委员长及爱护中国之热切,不能以对史个人感情为比例,如蒋公以为史不适当,务请直言无隐,俾得更换其它将领,决不因此发生丝毫意见”^②。6月1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建议蒋

^①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6月12日。

^② 《作战经过》(三),514~515页。

将对史的意见向美方和盘托出,同时大胆对史迪威进行指挥,电称:“文意钧座愿顾全大局之苦心,为中外所共见,但如史梯威确不能共事,不妨此时乘机直说。”“钧座似可表示,对史梯威固至信任,但对其见解当然不能事事俯从。如此一方面不伤感情,一方面可留他日地步。陆长等既自动有另调之意,且自总统以次,均认史为钧座部属地位,钧座尽可照部属指挥命令之,不必以上宾相待,但善为利用其地位,以推动美军部充量之接济。”^①可见,宋子文关心的是利用史迪威的地位,推动美援,并不希望蒋、史矛盾激化。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风波发生了。

《备忘录》风波

6月下旬,德国加强了对非洲的攻势。为解救危机,美国军方将全部重型轰炸机和所需运输机调往埃及,其中包括驻扎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26日,史迪威将这一“坏消息”告知蒋介石。蒋认为这是美方“置我中国危急于不顾,心殊愤激”,他在“强忍”之下,仍然责问道:“罗斯福总统来电明言已令将美国空军第十军由印度调来中国作战,想令出必行,岂容擅改!”“倘英、美以为中国抗战实力尚有保持之必要,绝不应一再无视中国之利益如此。盖中国最近所受之待遇,不啻在英美心目中已失其存在矣。”^②事后,宋美龄、宋子文都提出质问,史迪威“狠狠地反驳了他们”。同日,史迪威秘密致电美国陆军部,声称“蒋公极为激动,嘱予电呈总统,其大意为:同盟国家未认中国战场为同盟国家战场之一部”,“中国全力抗战已有五年,而同盟国家并未以全力援华。利比

① 《作战经过》(三),514~515页。

② 《战时外交》(三),168页;参见《史迪威日记》,1942年6月26日,109页。

亚战事固紧张,但中国战场状况亦属紧张”。^①

6月29日,蒋介石向史迪威面交“手谕”一件,提出保持中国战区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三项:1.8、9月间美国派三个师去印度,与中国军队合作,恢复中缅交通;2.自8月份起应经常保持第一线飞机500架;3.每月经过驼峰运送5000吨物资。蒋批评自美国军事代表团抵华以来,在建设中国空军方面,尚无特殊成就;罗斯福对中国战区,尚有未能完全明了之处;太无视中国战区。^②7月1日,宋美龄与周至柔、陈纳德、史迪威会议。宋美龄要求史迪威将蒋的“手谕”转交罗斯福总统,并附上史本人的推荐信。史当场拒绝,对宋称:“这是大元帅给总统的最后通牒,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借此机会阐明自己的身份,一是大元帅的参谋长,二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其职权超出中国之外,三是战争委员会的美方代表,代表和维护美国的政策,四是总统负责租借事务的代表,五是一名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国军官。”史并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她不懂得这一点,那她就比我想象的还要愚蠢。”^③

7月2日,蒋介石拟从美国已经拨给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中转拨两架运输机给中国空军,遭到美员拒绝。史迪威为此向蒋致送《备忘录》,一面同意此两架飞机可由蒋介石支配使用,但同时声称自己是“出席中国任何军事会议之美国代表”,“在任何上述会议中,本人所有其他地位皆不适用”。又声称自己是美国“总统代表”,“负责监督及管理租借器材,并决定移转其所有权之地点与时间。俟所有权转移之后,委座即具此项器材管理之权”。^④史迪威的这份《备忘录》意在告诉蒋介石,

① 《战时外交》(三),613页。

② 同上,171~175页。

③ 《史迪威日记》,1942年7月1日,110~111页。

④ 《战时外交》(三),608~609页。

自己虽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但又是“美国总统代表”,可以不接受蒋的命令。美国租借物资只有在经过他同意之后蒋才能调用。蒋介石长期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令出必行,何曾受过这种对待!

接二连三类似事件,特别是史迪威的《备忘录》将蒋惹恼了。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表示“中国对租借物之受予形同乞怜求施”,指责史迪威“以总统代表资格胁制统帅”。蒋强烈表示:史既在中国战区内担任参谋长,“则所有其他地位皆不能适用”^①。7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史氏之愚拙虚妄,不法无礼,可谓无人格已极,而余乃自愧国家贫弱,所以遭此侮辱而已。”^②5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促请美国政府注意。6日,宋子文电复蒋介石,支持蒋对史迪威《备忘录》的态度,首次提出撤换史迪威问题。电称:“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文日内即进谒当局,谅能加以纠正。但文亟欲知者,重新明确规定参谋长职权后,钧座是否仍拟留其在华供职,抑或乘机更换,另选他员?”^③9日,蒋介石再电宋子文,要宋观察美国政府态度,暂不表态:“先看美政府对史之来函如何处理,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也。”^④18日,蒋介石与史迪威谈话,产生不再要求美援的想法,日记云:“美国对我冷淡接济事,不如不再要求,亦一对策也。”^⑤

宋子文受蒋之命后,即与美方接洽,并亲见罗斯福,陈述意见。7月23日,美国军部向宋子文转告罗斯福意见:史为中国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委员长,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法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如蒋以为不便,可将史的参谋长职务和美国代

① 《战时外交》(三),609~610页。

② 《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4日。

③ 《战时外交》(三),611页。

④ 同上。

⑤ 《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18日。

表职务划开,分由两人担任。美国军部称:总统因史迪威对中国及蒋公一向友好,而且熟悉中国情形,甚盼蒋公能继续任用。宋子文认为美方“语气仍不免袒护”,再次谒见罗斯福,解释内中情形,说明史函的不当。罗斯福称:史的职权中有代表美国出席在渝国际军事会议一项,现在既无此类会议,事实上形同虚设。关于租借法案,此后一切由宋子文代表蒋、霍普金斯代表我,在华府共同解决。这样史迪威即成为“专属参谋长”。“如蒋公仍以史为未妥,余当更换之,但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27日,美国陆军部代拟罗斯福复蒋介石函,仍取维持史迪威《备忘录》态度,要求宋子文转呈蒋介石,宋得悉其内容后,紧急谒见罗斯福,说明理由,告以“未便转呈”。罗斯福对宋子文所言,“极以为然”,决定撤销此电。^①

为了向蒋介石说明同盟国全盘战略,调解蒋、史纠纷,罗斯福于1942年7月派行政助理居里再次访华。7月22日,蒋介石会见居里,批评同盟国战略不当。居里问蒋,是否将史迪威调回美国?蒋答:“此由美国政府自定,余不愿参加意见也。”^②25日,蒋思考史迪威的《备忘录》,认为该函有三大问题:“甲、史函竟有听命与不听命由彼自便之意,此为侮辱统帅。乙、彼又以为租界案物资之发与不发,由彼自便,非由余求彼不可,此为欺凌中国。丙、过去之行动,乃以一人而利用两种职权,实以殖民地之总督自居,以参谋长为名而实行太上统帅职权者也。”蒋称:“此必于美国助华之平等政策有碍,而其侮辱中国与余革命人格亦何能忍受,此应与居里说明者也。”^③同日,蒋介石再次与居里谈话,进一步确认西方世界歧视中国,美国与英国并无差别。日记云:“谈后

① 《战时外交》(三),615页。

② 《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22日。

③ 同上,1942年7月25日。

更觉西人皆视华为次等民族,无不心存欺侮,可以进一步压迫,必压迫不止。美国以道义与平等为号召,而其心理与方法,实亦无异于英国之所为也。”^①26日,蒋介石与居里进行第三、第四次会谈,“痛斥史迪威之过恶与美国军部藐视我华之错误”。蒋自觉大义凛然,而居里则初时“矜持”,最后表示“折服”。蒋介石感到精神上的胜利,日记云:“夫彼可欺则欺,可侵则侵之心理,吾人若一味谦恭,则适中其计矣!”^②同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声称如罗斯福来电肯定史迪威《备忘录》,则宋可表示自己向罗表明:取消中国战区,辞去中国战区总司令职务。^③至此,蒋介石已向罗斯福摆出“摊牌”架势。7月30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乘居里在重庆期间,“凡不满史梯威之种种事实,最好向其直言无隐”^④。同日,蒋介石与居里第五次谈话,居里提出“过渡办法”,声称不可让史迪威太失体面,以免他回美后反华,可令史先赴印度,美国另派一人来华暂代。蒋同意这一办法。^⑤

上文已述,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援英战争失败后,部分军队退入印度。1942年6月,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得到批准。同月24日,蒋指令史迪威担任这支训练部队的司令。7月16日,蒋进一步任命史迪威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8月上旬,史迪威赴印,以蓝姆伽为营地训练中国部队。他提出,“要中国士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将领”,从美国调来三百多名军官,拟将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均改由美国人担任,遭到中国将士的强烈反对。史

① 《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25日。

② 同上,1942年7月26日。

③ 《战时外交》(三),614页。

④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7月30日,前引林孝庭等编未刊初稿。

⑤ 《困勉记》卷73,1942年7月30日。

遂将这部分美国军官改为联络官,派往各部。^①但这部分联络官权力很大,可以直接调动营以下部队,而无须通知中国部队长官。同年9月,史迪威下令将第38师改为10个炮兵营,将原师长孙立人及廖耀湘等改任炮兵指挥或步兵指挥。12日,杜聿明致电蒋介石,声称:“国家军制系我政府法定之建制,史将军擅权改制,实属毁辱国体,损害主权。”^②同年1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中国拨济30个师的军械。11日,蒋介石与来重庆参加会议的史迪威谈话,史乘机竭力批评中国军队办事延缓,罗卓英有“十大罪状”。蒋介石虽然不高兴,但尚能“忍耐”,决定撤换罗卓英,代之以邱清泉。^③不久,因担心邱脾气暴躁,不易与史迪威相处,又改为郑洞国。^④至1944年1月,蓝姆伽营地共训练中国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这支部队在后来的反攻缅甸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除退入印度者外,中国远征军的主力大部分退入云南西部。1943年2月,军事委员会决定重建远征军,以陈诚为司令长官。3月10日,陈诚与史迪威商量,决定在昆明设立训练基地,调集干部分批轮训后空运至蓝姆伽实习。

计划攻缅,蒋、史矛盾再度激化

日军占领缅甸全境后,史迪威多次提出反攻缅甸计划。1942年7月19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交《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为“南北缅水陆

①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295~296页,团结出版社,1992。

② 《作战经过》(三),515页。

③ 《困勉记》卷75,1942年12月11日。

④ 《我的戎马生涯》,272~273页。

同时夹击”：1. 中、英、美三国联合出兵，自印度攻入缅甸，同时，另一路中国军队则自云南进攻。两路会师曼德勒，会攻仰光。2. 在盟军从陆路进攻的同时，英国海军确立在孟加拉湾的制海权，从仰光登陆。这一计划后来被称为“安纳吉姆计划”。8月1日，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11月3日，史迪威自印度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和英军统帅韦维尔商谈结果，要求在1943年3月1日前后发动攻势。蒋介石表示，中国可由云南方面出动15师，但胜利关键在于英方是否能调拨足够的海空力量，掌握制海权和制空权。他说：“倘海空实力不充，中国实不愿派一卒参加此役。反攻开始以前，余必须知英国用于缅甸海空军之实力，方能下令前进。”“此次不反攻则已，一旦反攻，非胜不可，绝不能再受第二次之失败。”^①

1943年1月，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罗敦促英方，调动陆、海、空力量，共同克服缅甸。^② 同月，罗斯福、丘吉尔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卡港）会议，决定实施“安纳吉姆计划”。2月4日，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阿诺尔、空军补给司令萨默维尔（Somervell，或译薛莫维尔、索摩微尔）、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团长迪尔到重庆，向蒋介石通报卡港会议情况及1943年战略。同月7日，双方会谈，蒋介石同意英美方案，但要求英美方面增加空运与空军，切实支援中国。其标准为：空运物资每月一万吨，飞机500架。蒋强调，必须达到这一标准，并有确切日期。史迪威对蒋所提要求不满，当即质问蒋：“是否不达到标准，即不对日抗战？”史的质问含有明显的轻蔑，蒋认为史迪威作为自己的参谋长，提出这一质问，“可恶不敬已极”，但是，他忍着没有发作，只回答说：“中国抗战已六年，即使太平洋战争不起，英美不来援助，中国亦可独立抗战。”史迪

^① 《作战经过》（三），355、357页。

^② 《战时外交》（三），211页。

威再问：所谓标准是否为条件？蒋答称：“非条件，乃余负责作战者最低限度之要求耳！”接着，蒋以温和的语气要求阿诺尔转告罗斯福与丘吉尔：“当尽我所能，不惜牺牲一切，以期不辜负友邦之期望。”^①8日，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会议上的“不敬”，要宋转告史，“使彼戒惧，并限彼应切实设法，达成余之标准，以赎过失”^②。9日，中、英、美三方印度加尔各答会议，一致同意实施“安纳吉姆计划”，以1943年11月至1945年5月为入缅作战期。会议期间，宋子文向史迪威转达了蒋的批评。据宋致蒋电称：“彼极为懊丧，并谓当时谈话有失体统，甚以为歉，但信钧座必谅其忠实及一番热忱。”^③不过，史自己的日记则是：“见他的鬼吧！”^④

5月初，史迪威与飞虎队的陈纳德之间在对日实施“空中攻击”问题上发生分歧。陈纳德主张，只要中美用500架飞机对日军进行空中攻击，即可消灭日本大部分在华空中力量，阻遏其船运，破坏其交通线，使缅甸和中国本部的陆战易于进行。史迪威则认为，中国军队缺少军械给养补充，也缺乏训练，不足以保护机场。如对日“空中打击”实施过早，引敌来攻，则云南、广西、湖南各地的机场均将丧失，以中国本部为基地空袭日本的计划也将落空。争论虽发生于史、陈二人间，但不久即发生于史迪威与宋子文之间。5月5日，美国海陆空三方会议，邀请史迪威、陈纳德、宋子文参加。宋支持陈，主张当前急务为增强空军力量，史则认为，中国陆军勇敢苦战，损失巨大，“目前实不堪一战”。宋即批评史“对中国陆军未免过于悲观”^⑤。同日晚，宋美龄谒见罗斯福，罗表

① 《困勉记》卷76，1943年2月7日。

② 同上，1943年2月8日。

③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2月，前引林孝庭等编初稿。

④ 《史迪威日记》，未注明日期，175页。

⑤ 《战时外交》（三），224~226页。

示,拟将反攻缅甸计划缩小为占领缅北。^①

史迪威早就制订过一份“有限度的进攻北缅的计划”,但遭到蒋介石的否定。蒋的理由是:六年来,中国对日作战得到的经验是“迫使机械优越之敌人,运用恶劣之交通线,使其机械设备失其效用”。而在北缅,日军可以利用伊落瓦底河及仰光铁路,中国方面可利用的只有正在建造中的两条公路。即使中国军队在北缅成功,日本人仍可利用交通便利,派军增援。他向史迪威一再说明,“不可再蹈覆辙”^②。5月8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在罗斯福、丘吉尔会谈期间,力争照卡港会议及其后的重庆会谈决议实施,首先以英、美海空军截断日军供应线,占领仰光,然后收复整个缅甸。电称:“如果仅仅占领北缅甸至蛮德勒为止,非仅无益于中国战场,而且费力多,牺牲大。结果必不能达成目的,徒然牺牲兵力。”^③5月13日,宋子文专访到华盛顿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三叉戟会议)的丘吉尔,要求英方照卡港、重庆、加尔各答等会议决定,如期攻缅,但丘态度消极。宋问:是否准备放弃攻缅?丘答:英美军事专家正在研究。^④丘吉尔的回答使宋子文备感紧张,立即致电蒋介石汇报,蒋也跟着紧张起来。

1943年春,蒋介石为准备进攻缅甸,曾将原来部署在长江两岸的第六战区主力抽调赴云南、贵州,司令长官陈诚也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随部队入滇,鄂西空虚。同年5月,日军在湖北宜昌集结大军,进攻三峡地区,威胁重庆。当蒋得知太平洋军事会议有放弃攻缅计划的可能后,大为恼怒,致电宋子文称,如此,“则我军民对联合国从前所有

① 《战时外交》(三),226页。

② 同上,236页。

③ 同上,227页。

④ 同上,228页。

各种宣言与决议之信约，不仅完全丧失信用而已”。他觉得，又上了史迪威的当。电称：“史迪威始则强催我军集中攻缅，今乃因抽调部队，而使重庆门户大受威胁，而结果则谓可以取消打通仰光与滇缅路计划，则我军上下对美国用意与作为，岂啻视为儿戏，直认为有意陷中国于灭亡之境，不啻协助日本完成其大东亚之新秩序，岂不令人惶栗不已！”^①他要宋子文将这一看法明告史迪威及罗斯福左右。

5月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联合参谋长会议，转述蒋的态度，坚决反对放弃攻缅，也反对史迪威仅攻缅北的计划，阐述其理由说：“我如不占领缅南，断其后路，必归失败，徒作无为〔谓〕之牺牲。蒋委员长彼时之决心如此，今日对此之决心益强。”^②在此前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史迪威公开批评蒋介石：“诸事犹豫，于战略无一定见解。”针对史的批评，宋特别为蒋辩护，声言蒋并非初次与外国军事专家合作。他以蒋曾任用苏联的加伦、崔可夫，德国的塞克特及佛采耳为顾问为例，说明他们在任期内“无一不恪遵蒋委员长意旨”^③。18日，蒋介石从宋子文来电中得知有关情况，日记云：“丘吉尔固毫无进攻缅甸之意，而史迪威之污蔑我军，轻侮我国，尤令人痛愤忧戚之至！”^④21日，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宋子文再次要求，坚决执行卡港会议及加尔各答会议的攻缅决议，丘吉尔辩称，当时“只有计划，并无决议”，“英军事当局如有允诺，实属越权”。他表示：“将来当极力设法使印度与中国军队得以连合，或须经缅甸北部。”^⑤宋子文担心罗斯福会向英方妥协，于同日谒见罗斯福，重申史迪威的进攻北缅计划，“徒耗军力，蒋委员长绝不能接受”。罗斯福

① 《战时外交》(三)，229～230页。

② 同上，231页。

③ 同上，232页。

④ 《困勉记》卷78，1943年5月18日。

⑤ 《战时外交》(三)，234页。

则称：“攻复仰光，确有困难，但可先向西南岸进攻，以从后面袭击仰光”，将来拟派新锐部队赴缅。罗要宋子文转告蒋介石：“攻缅计划，余有决心进行。”^①

重庆危急加深了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恶感。5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我此次战局危急，乃被史迪威之所玩弄而陷人也。呜呼，此人误华不浅矣！”^②27日，蒋介石致电宋美龄云：“近日战况确甚紧急，本星期内关系最大，所以致此之故，实由史迪威催促我精兵抽调入滇，准备攻缅，以致前方空虚，为敌所乘。其实去年至今，自缅战至此次战争，皆为史所陷害也。”^③6月21日，蒋介石致电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要求她在向罗斯福告别时，相机提出史迪威问题：“甲、史对余不能合作，余为大局计，均能容忍，惟其对中国军民成见太深，以廿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之革命军民。乙、故自史来华，我军队精神因之消沉颓丧，盖史视中国无一好军人，无一好事，而根本不信我军能作战，更不信我胜利，故欲其指挥盟军以求胜利，无异缘木求鱼。而彼对自己所处理之事与计划，以为无一不好，固执不变，毫无商洽余地。丙、故现在我军对史失望，以为如再听其指挥，不惟无胜利，必大受牺牲，非至全败不可。”电末，蒋介石称：“彼之态度，是来胁制中国，而非协助抗日，其结果与美国之热忱援助及友爱精神相反。余为史对于一般军官严加劝戒，令与合作。惟长此以往，时时发生误会，则不胜防制之苦。故为作战及大局计，深望罗总统明了此事真相与现状，盖甚恐其对华盛情将来失望，故不敢知而不言也。”^④但是，蒋介石又叮嘱宋美龄，不必太正式，也不必采取“不可不

① 《战时外交》(三)，236页。

② 《困勉记》卷78，1943年5月22日。

③ 转引自《古达程渝来电》，1943年5月27日，宋子文文件，第58盒。

④ 同上。

撤换”的强硬方式,只告以“实情”即可。

在罗斯福的坚持和说服下,原来坚决反对攻緬的丘吉尔同意一致进行,英美参谋团会议随即制订新的攻緬计划。史迪威曾答应向蒋呈阅会议记录,但史迪威第一次交给蒋的并非全文,而且缺乏重要部分。当时,蒋认为海军是这次行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保住孟加拉湾,否则进攻緬甸也就没有用处。因此,他关心英美“将提供多少海军”^①。6月27日,蒋介石命外事局局长商震催史迪威来见,询问会议关于海军兵力数量等文件是否带来。史称,此件不能交任何人,继而改称,回去后交商震代呈。在商震去史处催索后,交来者仍非蒋所需要的文件。^②6月28日,史迪威致函蒋介石,说明联合参谋团为取得孟加拉湾制海权所必须派遣的“适当之兵力”。据史自称:“列了一长串战舰、重型巡洋舰、航空母舰及驱逐舰等,而且第七次解释了‘适当’一词。”^③史迪威非常不情愿这样做,日记云:“这超越了所有界限。这个小人令人厌恶,他十分傲慢地询问我们将能做些什么,谁在妨碍我们帮助他,以供应一切——军队、装备、飞机、医药、通讯、汽车运输,建立他该死的后勤供应部,训练他的劣等军队,甩下他那后娘养的参谋总长和总参谋部,而他却对我们的准备工作挑三拣四,对海军问题支支吾吾。主啊,救救我们吧。这个伟大的独裁者。他让他的部队忍饥挨饿,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④同日,蒋介石召见史迪威,当面加以批评。日记云:“此人之卑劣、可恨极矣!”“呜呼,此人之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⑤这说明,彼此之间的恶感都发展到了极点。

① 《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187页。

② 《困勉记》卷78,1943年6月28日。

③ 《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187页;《战时外交》(三),628页。

④ 《史迪威日记》,1943年6月28日。

⑤ 《困勉记》卷78,1943年6月28日。

美国是强国，史迪威是美国派到中国的将军，因此，蒋介石将他和史迪威的关系看成弱国和强国之间的关系。6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凡弱国参战，无论如何努力与牺牲，强国皆视为不能与彼相比。例如史迪威指挥我军在缅作战，彼总不以我军之牺牲为英勇，而为怯弱，盖彼仍以北洋军阀之军队视我也。”^①

不久，史迪威又有几件事加剧了他和蒋介石的矛盾。一是擅自撤委中国军官。8月14日，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温剑铭因事与国内军政部通电，被史认为“有违军纪”，下令调温为高参，委美国人博金为副参谋长，引起全军大哗。新编第一军军长郑洞国劝史收回成命，为史拒绝。史的助手参谋长波德诺甚至说：“驻印军是由美国装备训练的，因此军中事务，包括人事必须听命于总指挥部，即使中国政府也不得干预过问。”^②郑及参谋长舒适存、师长孙立人等愤而致电蒋介石。郑电称：“今竟有此不幸事件，则人无保障，势必媚外图存，军队纪纲如何维持，国家体制其何以堪！”^③舒电称：“美方一贯政策，为打破中国高级指挥机构。”“美方微员僚佐，皆代表史将军，须听其命以驰驱，稍不遂意，责难侮辱随之。”蒋介石批示：“为何史于人事，不先请准本委员长，而擅自撤委？”^④二是给蒋介石写报告、备忘录时所署职衔和语气。史通常均署“美国陆军中将”，引起中国将领不满。^⑤9月21日，史在给蒋介石的意见书末改署“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阅后称：“其内容仍有不逊之言，此种恣职态度，殊令人难受，隐痛极矣！”^⑥三是史迪威对中共的态

① 《困勉记》卷78，1943年6月29日。

②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301页。

③ 《作战经过》（三），516～517页。

④ 《战时外交》（三），630～631页。

⑤ 《史迪威日记》，1943年9月18日，200页。

⑥ 《困勉记》卷80，1943年9月21日。“恣职”二字，疑有误。

度。史对蒋失望，自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寄以希望。1942年6月至10月，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多次在重庆访问周恩来。1943年3月，戴维斯再次访问周恩来，周提议美国派代表常驻延安。6月24日，戴提出报告，主张接受周恩来建议，向延安派驻观察员。9月6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建议调动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及胡宗南、傅作义、邓宝珊等部向山西出击，这些都触犯了蒋的大忌。当日，蒋日记云：“此受共党所主使，故其语含威胁之意。且名为备忘录，乃欲于将来制裁中共时，证明曲在我也。史氏诚最卑劣、最糊涂之小人哉！余亦不屑驳复矣。”^①9月10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责史迪威“不知共党十年来经过之历史，更不明了最近共党之内容及其阴谋之所在，徒听共党之煽惑，助长共党之气焰，殊为可叹！”^②

蒋、史冲突转化为蒋、宋冲突

在罗斯福的推动下，丘吉尔勉强同意实施攻缅计划。其内容为：于1943年雨季结束后自印度对缅甸西北部进行陆空有力攻势作战，同时以海、陆军攻袭缅甸海岸，中国军队则由云南进攻。^③5月26日，罗斯福将关于此项决定的通知书交给宋子文。29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要他提醒罗斯福，陆军对北缅进攻与海军对仰光进攻，务须同时行动。8月18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告以雨季将过，不能再事迁移。同月，罗、丘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开会，决定在未来的干燥季节中，反攻

① 《困勉记》卷80，1943年9月6日。

② 《战时外交》（三），632页。

③ 同上，243~244页。

缅甸,同时决定成立东南亚战区统帅部,以英国海军中将蒙巴顿为统帅(旋升大将),史迪威为副统帅。

1943年9月,宋子文鉴于英美联军对日攻势渐趋积极,认为有调整与英美军事关系的必要。他设计了两项调整方案:(一)最高级的组织,如华府的联合参谋团及支配军械委员会,均应有中国代表参加。供给中国的军械,由中国直接申请,毋须史迪威或其他驻中国的美国军官过问。(二)史迪威即行撤调,同时改组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美国将领为副统帅;以中国将领为参谋长,以美国将领充副参谋长,统帅部各处长、副处长均以中美军官分任。^①宋计划先与罗斯福总统作原则上的讨论,在10月偕同美国陆军次长麦克洛来渝时,再与蒋商量决定。

9月16日,宋子文会见美国总统助理霍普金斯,霍赞成宋所拟调整方案,并称:在参加联合参谋团及改组战区大前提之下,更换史迪威轻而易举,史汀生虽反对亦将无效,马歇尔也不像以前那样绝对维护史迪威。^②同月29日,宋、罗见面。事后,宋子文电蒋汇报:美方同意撤换史迪威,调整中国战区,在华盛顿另组包括中国在内的太平洋军事参谋团。电称:本人将陪同蒙巴顿到重庆,向蒋报告国际情形,并洽商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问题。^③10月,宋子文偕蒙巴顿及美国后勤部长萨默维尔中将来华。萨默维尔是美方预定的史迪威的接替人,还在途经印度德里时,宋子文就对萨透露说:“事情正在成功,与大元帅(指蒋介石)一同进行了谋划。”^④他完全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改变主意。

① 《战时外交》(三),262~263页。

② 同上,265页。

③ 同上,267页。

④ 《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

10月2日,蒙巴顿等向蒋介石转呈丘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魁北克会议决议。同月11日,蒋介石与宋子文谈话,宋向蒋谈了他自己对史迪威的不满,当日蒋日记云:“子文能自美国转印度回国,报告史迪威言行。呜呼!史氏真卑劣小人,无耻极矣!”^①显然,这时,蒋、宋在对史迪威的态度上仍是一致的。同月14日,蒋开始思考史迪威的去留问题,一是去史之后的代替人选,一是撤换史迪威的可能性。蒋认为:美国人员中无人适合出任东南亚战区副统帅,也无人能出任驻华美军主任。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非常袒护史迪威,美国政府未必决心将其撤换。^②这样,蒋介石原来的决心就动摇了。

10月16日,萨默维尔将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一事告知蒙巴顿,蒙巴顿强烈反对。他说:如果指挥中国军队两年之久的官员(指史迪威——笔者)在军事行动前夕被免职,他无意于使用中国军队。蒙巴顿委托萨默维尔将他的观点转达蒋介石。^③同日蒋介石与萨默维尔谈话称:“史氏到华一年半以来,彼虽努力,然总勿能与我军合作,殊为遗憾。至于去留问题,余不作主张,惟望美国政府重加考虑而已。”^④谈话之后,蒋介石决定,“只要史氏能悟改,则以不撤换为宜”。他嘱咐宋美龄询问史迪威本人,同时,与宋子文谈话,将新决定告诉他。二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宋坚持原见,反对蒋改变主意,愤而宣称“不能与蒋共事”,并指责蒋:“你又不是野蛮人,为何说话不算话!”蒋则怒而逐宋离开。据唐纵日记称:“宋部长不知因何使委座见气,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睹之事。”^⑤当晚,蒋与宋美龄谈话,日记云:“史氏已表

① 《困勉记》卷74,1943年10月11日。

② 同上,1943年10月15日。

③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 376 - 377.

④ 《困勉记》卷74,1943年10月16日。

⑤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386页,群众出版社,1991。

示悔过改善,余当宥之,不可再听子文之言,坚持撤换矣!”^①17日,蒋介石本人通过宋美龄约史迪威谈话,告诉他:“如被撤职回美,个人之损失太甚。如能悔过改善,或可转回庶宥。”据云:“史乃完全自认错误,并表示澈底改过,余乃允而宥之。”^②又云:“彼果已悔悟,表示绝对服从,不再违令,当可信也。此于国家抗战之成败得失,所关岂浅哉!”^③

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发生冲突,一怒之下,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汪精卫、孙科等因而在广州另立政权,引起国民党内长达五年的宁粤之争。蒋担心撤换史迪威会严重影响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巨大灾难,日记云:“史迪威去留问题,为本周最重要之一事。宋子文力主去史,余之既定方针,几乎被子文摇撼,最后幸能自动补救,允史悔改,重加任用。此乃中美关系与战局影响一大转机,否则其危有甚于二十年时对胡汉民案者也。不能再为子文造成大祸。乃知安危祸福,全在最后五分钟几微之间也。此后应益戒惧。”^④18日,蒋介石再次会见萨默维尔,向他通报自己允许史迪威“悔过自新”的新决定,据称:萨“欣然甚感余宽大为怀之精神”。但是,蒋对宋却余怒犹存,当日,蒋日记云:“此事子文大不以为然,彼竟不顾大体,不知余之苦心,可恨孰甚!”^⑤21日,萨默维尔向蒋告别,蒋察言观色,觉得萨的词色与初见时大不相同,感到安慰。当日日记云:“此与余不被子文所胁制,而允史迪威之自新大有关系也。”^⑥

蒋宋关系中曾多次发生矛盾,蒋在日记中指责宋子文也屡见不鲜,

① 《困勉记》卷74,1943年10月17日。

② 《爱记》,1943年10月17日。

③ 《困勉记》卷80,1943年10月17日。

④ 《省克记》卷22,1943年10月17日。

⑤ 《困勉记》卷80,1943年10月18日。

⑥ 同上,1943年10月21日。

但是,指责宋子文“可恨”,却并不多见。处于局外的唐纵记载说:“日来委座火气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①

蒋介石对史迪威态度的转变既与他担心影响中美关系,损害抗战大局有关,也是宋蔼龄、宋美龄姊妹共同斡旋的结果。据史迪威自述:他曾经向这对姊妹谈过当时中国军队的真相,使她们非常震惊;也曾经研究过改革的办法——让宋美龄代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于是,史与这对姊妹“订了攻守同盟”^②。10月17日晨,宋美龄打电话给史迪威,声称宋蔼龄认为“仍有个转败为胜的机会”。史表示“不想呆在不受欢迎的地方”。于是宋氏姊妹就向史“谈起‘中国’和职责来”,要史“大度一些,坚持一下”。宋蔼龄对史称:“你的星正在升起,闯过这件事,你的地位就会比从前更为稳固。”姊妹二人表示,将代史见蒋,对他说,史只有一个目标,即中国的利益,假如史犯了错误,那也是由于误解而非有意,史准备好了要充分合作。在二人的坚持下,史点头同意,宋美龄表示“那我们马上就去做”。其后,史迪威见蒋,其情况,据史自述:蒋“改变了立场,演起了戏,竭力显得态度和解。他说了两点:1. 我应该明白总司令和参谋长的职责。2. 我应该避免任何优越感。这全是废话,但我有礼貌地听着。蒋介石说,在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谐地再次继续合作”^③。20日,宋蔼龄向史解释说:“她只能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国的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花生米’(指蒋介石),并让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她认为这是一个大胜利。宋蔼龄保证,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将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

①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1943年10月21日,387页。直到11月5日,唐纵才弄明白所以,见该书第389页。

② 《史迪威日记》,1943年9月13日,199页。

③ 同上,205~206页。

蒋介石改变主意，史迪威留任使宋子文“挨了一下猛击”^①。但是，蒋自感对宋的态度也有不妥之处。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本周以宋子文横暴，触余愤怒，实近年来未有之现象，此乃修养毫无成效之征象也，自惭之至！”^②31日，日记再云：“子文言动，令人愤怒，自不为过。然余之暴戾无状，不能逆来顺受，是毫无修养之征也。何以自解？”^③11月6日，日记又云：“宋子文夜郎自大，长恶不悛。二十年来，屡戒屡恕，终不能使之觉悟改过。彼之野心难驯固矣，然余无感化之力，不能不自愧也。”^④这一段时期，蒋介石不见宋，宋也不见蒋。11月16日，宋子安出面调解，要求蒋召见宋子文一次，遭到蒋的拒绝。日记云：“彼诚幼稚而天真之人也。”^⑤最后，宋子文不得不自己出面打破僵局。

12月23日，宋子文致函蒋介石，自称两月以来，独居深念，自感“咎戾诚多，痛悔何及”。接着，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信件着重说明抗战以来，自己“无论在国内、国外，惟知埋头苦干，秉承钧座指导，为争取胜利，竭其绵薄”，但因“个性愚憨，任事勇锐，对于环境配合之考虑，任事每欠周详；甚或夙恃爱护过深，指事陈情，不免偏执而流于激切”。信件自承在蒋前无礼、“粗谬”、“顽钝”，要求蒋“曲予宽容”。函称：“此诚文之粗谬，必赖钧座之督教振发，而后始足以化其顽钝，亦即文于奉教之后，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钧座琢磨之厚。今文以待罪之身，诚不敢妄有任何渎请，一切进退行藏，均惟钧命是听。伏乞俯鉴愚诚，赐以明示，俾能择善自处，稍解钧座烦忧，则文此身虽蒙

① 《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207页。

② 《省克记》卷23，1943年10月24日。

③ 同上。

④ 《省克记》卷24，1943年11月6日。

⑤ 《爱记》，1943年11月16日。

严谴，此心转可略安而曲予宽容。文无论处何地位，所以图报钧座之志始终不渝，尤必与青天白日，同其贞恒。”^①宋子文的这份“悔过书”打动了蒋介石。12月24日，蒋介石自思：“自十月痛斥宋子文以后，始终未准其相见，今日彼来函，表示悔悟，求见迫切，余乃从亲戚与内子之恳切要求，并为慰岳父母之灵，允于孔寓与之相见，当观其以后事实如何，如果能真诚觉悟，则公私皆蒙其福矣。”^②26日，蒋介石日记云：“对子文训斥以后，拒而不理者已逾两月。本周得痛切表示之悔书，乃于圣诞前夕，准予相见，亦以其为西安共同患难之关系也。”^③31日，蒋介石年末反省，日记云：“本年修养，虽较进步，然暴戾傲慢之气，仍未能减除，对张道藩、文白、孙哲生、陈辞修、宋子文、董显光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虽子文、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而其他同志则不过愚拙无能，实为无心之过，是余指导无门之所致也。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羞惭。”^④

史迪威的“除蒋”计划与美方 掌握中国军权的图谋

蒋介石留用史迪威，双方和解，固然与史迪威模模糊糊地承认错误有关，但关键原因还在于缅北雨季即将结束，中国军队计划反攻缅北，不能临阵换将。

① 宋子文文件，第64盒。

② 《爱记》，1943年12月24日。

③ 同上，1943年12月26日。

④ 《省克记》卷24，1943年12月31日。

10月1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会议,蒙巴顿、史迪威及何应钦等出席。史迪威对中国军队参与反攻缅甸的计划作了介绍,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史迪威日记云:“‘花生米’现在又讨人喜欢了。”^①与之相应,蒋对史的印象也有改变。11月24日,蒋日记云:“史迪威态度改变甚速,表现颇好,是亦感召之力乎?幸未为子文所胁制,否则,必得相反之恶果。”^②不过,蒋介石看到的只是一时的现象。

美国军部早就密令史迪威“应利用一切机会,统率中国军队”^③。11月22日史迪威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准备了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资料,中云:“无论蒋介石作何承诺,我们如不将掌握中国军队之权,早获明文规定,所有努力均将成为废纸。”^④但当日史、罗见面时,史未获提出机会。12月6日,史迪威会见罗斯福,罗问史:“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史答:“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5月份的那种进攻就会把他推翻。”罗斯福称:“好吧。那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⑤12月12日史迪威自开罗回重庆,途经昆明,与其助手多恩(Frank Dorn,或译窦恩)上校谈话。^⑥其内容,据多恩回忆:史迪威声称奉上官密令,对蒋实施暗杀。事后,多恩拟具办法三种:用毒、兵变、堕机。史迪威选择最后一种,令其准备,候令实行。^⑦此后,暗杀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史迪威愈来愈明确地认为:

① 《史迪威日记》,1943年10月21日,207页。

② 《爱记》,1943年11月24日。

③ 史迪威政治顾问(美国国务院所派)戴维斯告友人语,见《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6月8日,林孝庭等编:《胡佛研究所所藏蒋介石、宋子文往来电稿》,初稿,未刊。

④ 转引自梁敬尊:《史迪威事件》,19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⑤ 《史迪威日记》,220页。

⑥ 同上,228页。

⑦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 New York, Y. Crowell, 1971, pp. 75 - 79. 转见前引《史迪威事件》,196~197页。

“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①“他们所应该做的是打死大元帅和何(应钦)以及这帮人中的其他人。”^②

开罗会议中,蒙巴顿提出了一项在北缅作战的计划,蒋介石向罗斯福及丘吉尔陈述:攻缅胜利关键在于海军与陆军配合作战,同时发动,掌握制海权,阻绝日本的海上补给线。^③ 24日,丘吉尔向蒋表示,英国海军须至明年5月,才能在南缅登陆,这使蒋大为失望。^④ 次日,罗斯福向蒋介石保证,北缅作战时,英海军必提早在南缅登陆。^⑤ 蒋介石对丘吉尔已完全失去信任,认为“英人无论军事与经济,决不肯牺牲丝毫利益以济他人”,但他为了不给英方今后提供推诿借口,勉强表示同意蒙巴顿的北缅作战计划。^⑥ 30日,蒋介石在归途经过印度蓝姆伽,视察史迪威指挥部与郑洞国军部。郑早就感到,史迪威及其美国同事不愿他过问军事,不允许中国师级将领行使前线指挥权,事事要由美国人决定,因此向蒋诉苦,称史迪威视之如傀儡,不给他丝毫指挥权。^⑦ 同日,蒋与廖耀湘、孙立人谈话,认为蒙巴顿、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批评“皆非事实”,而且史迪威的指挥战略也“甚不当”。蒋并立即召见史迪威的参谋长白克,“据实用地图指正其误,并嘱转告史氏改之”^⑧。

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于11月28日又在德黑兰集会。斯大林表示,在打败德国后,将对日作战。英国对在缅甸作战

① 《史迪威日记》,时间不明,279页。

② 同上,1944年9月9日,284页。

③ 《战时外交》(三),537页。

④ 《困勉记》卷81,1943年11月24日。

⑤ 同上,1943年11月25日。

⑥ 《困勉记》卷82,1943年12月1日。

⑦ 《困勉记》卷81,1943年11月30日;参见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296~297页。

⑧ 《困勉记》卷81,1943年11月30日。

本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便借此机会企图取消原来在缅甸作战的承诺。1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德黑兰会议希望在1944年末结束对德战争,需要大量巨型登陆舰艇,询问可否将对缅甸的总反攻计划推迟到1944年11月。^①蒋介石觉得此为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决定,已无法更改,只能表示同意,但提出中国经济危机较军事尤为紧急,要求美国贷款10亿美元,用以支持中国继续抗战。

罗斯福虽然有将总攻缅甸延期的打算,但并未最后决定,因此,史迪威仍在作及早攻缅的努力。12月14日,史迪威到重庆,企图说服蒋介石,谈话很不愉快。蒋介石日记云:“此人之神态与见解引人不快。呜呼,凡事靠己,必须我能加强本军为第一义也。”^②15日、16日两日,蒋、史二人反复讨论攻缅战略。据史迪威日记,史向蒋反复说明“放弃进攻缅甸的可能后果”,蒋则表示:“我们不能冒在缅甸失败的危险,那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后果将极为严重”,以致史在日记中怒骂:“这个小畜牲根本不想打。”^③据史迪威称,宋蔼龄和宋美龄也同时出面劝说,宋美龄甚至向史宣称:“昨天夜里她祈求了他”,“做了一切努力”,“就差杀了他”。16日,再次开会讨论,蒋称:“我们只有1%的获胜希望。”“除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两栖行动,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又称:“如果我们采取守势而让日本人进攻的话,我们获胜的机会就会多一点。”^④据蒋介石日记,史“竭力怂恿如期攻缅”,但蒋“决心展期至明秋为止”。日记称:“此人既无军事常识,更无政治常识,余应表示展期之决心,勿使其再为我害也。”^⑤此际,1942年远征军初战失败仍像梦魇一样压在蒋的心头。

① 《战时外交》(三),286页。

② 《困勉记》卷82,1943年12月14日。

③ 《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5日,230页。

④ 同上,1943年12月16日,231~232页。

⑤ 《困勉记》卷82,1943年12月15日。

蒋日记云：“为攻缅展期问题，内外阻力甚大，如余无坚定决心，则此举必被根本动摇，将蹈去年失败覆辙矣。”^①他担心如攻缅再败，则昆明不保，空运根据地全失，国际通道断绝，国内军心、民心动摇，将更为美、英、苏所轻侮。蒋估计，最多不过两年，太平洋大战必将爆发，“届时，如中国兵额未足，毫无精强部队参加决战，则我国地位绝无矣。故此仅有之资本，决不愿再作浪费，而被英国之欺弄，致我国于万劫不复矣”^②。1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声称如登陆部队所需战舰及运输舰不能按原计划集中，则陆海的全面攻势延期至明年11月，一举歼灭在缅日敌，较为妥适。^③不过，蒋介石并不反对局部攻缅。

10月18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史迪威，布置自印度东北的列多（力多、立多）向北缅进攻的作战方针。19日，蒋介石与蒙巴顿、史迪威开会，确定以12月中旬为期，攻取缅北。蒋并且表示同意由蒙巴顿指挥全部在缅作战的中国部队，史迪威为副。^④会议结果使史迪威欣喜若狂。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史以来头一次，大元帅授予我指挥使用（中国驻印军）部队的全权，没有绳索——他说没有干预，那是‘我的部队’，给了我解除任何一名军官职务的全权。”在给史迪威夫人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欣喜，甚至哼起了歌曲：“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圣诞节多快乐，我们坐在吉普上。”^⑤第二天，史迪威即飞返缅甸，转赴列多，与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研究作战计划。其后，驻印军在胡冈河谷、孟拱河谷等地迭获胜利。

蒋介石所同意动用的只是中国驻印军，但是，在云南，还有另一支

① 《困勉记》卷82，1943年12月16日。

② 同上，1943年12月17日。

③ 《战时外交》（三），289页。

④ 《作战经过》（三），385～394页。

⑤ 《史迪威日记》，1943年12月19日，233页。

待命进攻缅北的远征军。12月21日,罗斯福又致电蒋介石,要求中国驻滇部队向北缅作战,以支援英、美部队由印度向北缅的进攻。蒋介石仍然觉得没有海军从缅南配合,并登陆协助,乃是自取灭亡之道。12月23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重申开罗会议南北海陆军同时发动的意见,批评“盟军战略置中国战区于不顾”,声称中国驻印远征军已交给蒙巴顿、史迪威指挥,不能同意驻滇远征军再行出动。^① 1944年1月15日,罗斯福再电蒋介石,要求出动滇西部队,尽力进逼,配合蒙巴顿。3月20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明缅甸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要求滇西远征军前进至腾冲及龙陵地区,以配合驻印远征军夺取缅北重镇密支那。^② 当时,苏联空军与外蒙军队入侵新疆,正在与中国军队对峙。2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说明中国已抗战七年,国力、兵力均极疲惫,在新疆未安定、中国正面战场对日军的防线未有把握之时,中国主力军不可能由云南发动攻势。他重申在开罗时对罗的诺言,一旦英军发动对缅甸的海陆两栖作战,中国主力军必全力攻缅。但是,蒋仍然表示,将尽量抽调云南部队空运西线,增强列多方面的作战力量。^③ 当日,史迪威飞到重庆,蒋介石即批准由滇西空运第14师、第50师赴印作战。4月4日,罗斯福再次要求滇西远征军占领云南边陲要地腾冲与龙陵。在电报中,罗斯福不无牢骚地向蒋表示:“去年吾人装备并训练阁下之远征军,现正当利用此机会。如彼等不能用之于共同作战,则吾人尽其最大之努力,空运武器与供给教官,为无意义矣。”^④ 此函语含谴责与批评,此前还不曾出现过。5日,蒋介石日记云:“措辞

① 《战时外交》(三),291页。

② 同上,296页。

③ 同上,297~298页。

④ 同上,299页。

傲慢,为自直接通电以来第一次也。”他认为,此电必为其军部所拟之稿,但现在尚非驳斥之时,应暂忍耐。^① 6日,宋美龄特约史迪威助手贺恩(Hearn)参谋来谈,告以“美国此种压迫行动,实非中国所能忍受”。7日,宋美龄致电史迪威,声称罗斯福致蒋电,“如此措辞,余恐其将使吾人共同企求之目的未克达成”,希望史设法向华府拟稿人说明,“当此紧要之际,应竭尽全力,以促使吾人共同胜利之早日来临”。^② 10日,马歇尔下令暂时停拨援华军事物资,至滇西远征军出动时再予恢复。蒋介石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嘱何应钦答复美方:中国抗战与出击,自有一定计划,决不为美国武器之接济与否所转移。^③

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调整对缅作战方针。4月13日,军事委员会电令滇西中国远征军于月底前完成作战准备,相机攻占腾冲,策应西线驻印军攻击缅北重镇密支那。17日,拟定怒江作战计划。5月11日,反攻怒江作战开始。

然而,就在中国远征军东西两路同时出动之际,日军的“1号作战”却在节节进展。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扫荡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首先向河南进攻。5月25日,攻陷洛阳。5月底,日军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蒋介石致电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要他提请美国军事当局注意其严重性,将成都存油、配件及飞机全部交陈纳德作为粤汉路空战之用。同时,蒋介石两电召史迪威回渝商量,史迪威均置而不答,蒋深感痛愤,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可以情义感之”^④。6月初,蒋介石自我反省,深悔“去年已决心解除其职务,而复留用”的“失

① 《事略稿本》,1944年4月5日。

② 同上,1944年4月6日、7日。

③ 同上,1944年4月13日。

④ 同上,1944年6月1日。

计”，批评自己用人办事尚为环境所转移，有关重要问题皆不能主动自决。^① 史迪威早就认为，蒋介石过于重视陈纳德的空中打击力量，忽视陆军的建设与改造，因此他对中国部队在河南的失败并不惊讶，日记称：“中国的局势相当糟糕。我相信‘花生米’将要为他的愚蠢迟钝付出重大代价。这个傻瓜蛋，救世军主动来拯救他，而他却不接受。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他却大叫了起来。”^② 6月5日，史迪威到重庆，如他所料，蒋的目的在于要求史迪威同意，为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增加汽油供应。这使史迪威很不屑，在日记中批评蒋说：“他想要整个世界，但又什么都不想吐出来。”^③ 自然，史迪威拒不加拨。^④ 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向粤汉、湘桂两路交叉点和战略基地衡阳逼近，情势更为危急。史迪威于7月2日致夫人函云：“如果危机到了足以摆脱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毁了整艘船的程度，那就值了。”7月4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报告中国战场危机，要求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以剧变形势应采剧烈手段”为理由，迫使蒋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电中，史迪威并称：“出兵晋豫以攻汉口，应是扭转中国局势之方法，此须使用中共部队。两年以前彼等愿听我指挥，今或仍能听命。”^⑤ 其实，中共长于敌后游击战争，不会轻易“听命”于史迪威，去匆促进攻汉口这样的大城市。

马歇尔同意史迪威的意见。7月6日，马备妥电稿，由李海签呈罗斯福，声称“中国局势近已颓落至可惊之程度”，“目下已到须将中国军权交与一个人物指挥抗日，使生效果之时，环顾中国政府与其军队之

① 《事略稿本》，1944年6月3日。

② 《史迪威日记》，1944年6月2日，262页。

③ 同上，1944年6月5日，262页。

④ 史迪威的助手贺恩称：“史迪威正想令华东机场失去，以证明其在华府会议中预测之证实。”，见 *Way of a fighter*, p. 294. 转引自《史迪威事件》，307页。

⑤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380 - 381.

中,尚无一人能够综持军力以应日方之威胁,有之即是史迪威”。^① 7月7日,罗斯福按拟稿致电蒋介石,提出日军进攻华中,局势严重,“应责任一人,授以调节盟国在华资力之全权,并包括共产军在内”,同时告以已升史迪威为上将,建议蒋将其从缅甸战场召回,“置彼于阁下直属之下,以统率全部华军及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以调节与指挥作战”^②。这一电报虽宣称将史迪威置于蒋介石“直属之下”,但实质上是架空蒋介石,赋予史迪威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7月8日,史迪威日记云:“罗斯福给蒋介石去电,乔治·马歇尔给我来电。他们在我的事情上一一直在向他施加压力。罗斯福要蒋介石给予我指挥的全权。”^③

蒋介石、罗斯福的冲突与史迪威的被召回

宋子文最先得知要蒋介石向史迪威交出全部军权的消息,因而最先致电霍普金斯反对,电称:“今天华盛顿又作出了一项错误的决定,陆军部要强迫蒋接受史迪威将军”,“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向你担保,蒋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而且也不能屈服”。^④ 蒋介石觉得难以硬抗,企图拖延。7月8日蒋介石致电在美代表孔祥熙,要他转呈罗斯福,声称“原则”赞成关于史迪威的建议,但中国军队及政治情况复杂,“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建议罗派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

① 《史迪威事件》,265~266页。

② 《战时外交》(三),634~635页。

③ 《史迪威日记》,1944年7月8日,267页。

④ 巴巴拉:《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622页,重庆出版社,1994。

增进中美合作。^① 罗斯福看出蒋意在拖延,于15日复电蒋介石催促,表示形势“需要有一迅速之处置”,尽早向史迪威交权。^② 7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抗战局势,至今受美国如此之威胁,实为我梦想所不及。彼既不允我有一犹豫之时间,必欲强派史迪威为中国战区之统帅,以统制我国。如余不从其意,则将断绝我之接济,或撤退其空军与驻华之总部,不惟使我孤立,而且诱敌深入,以致中国之速亡,其计甚毒。”^③ 8月6日蒋日记再云:“最近内外形势之压力日甚一日。尤以美国在精神上无形之压迫更甚。彼必欲强余无条件与共党妥协,又欲余接受其一史迪威为总司令,此皆于情于理不能忍受之事。”^④ 可见,蒋对罗虽表面顺从,而内心却充满强烈的对抗情绪。19日,蒋介石听说罗斯福将派美军副参谋长来华面递公文,估计必是催逼自己委派史迪威指挥对华军事,对罗斯福更加怨愤,日记称:“自本年七七以来,罗斯福对华已竭尽威胁压迫之能事矣。”^⑤ 但是,蒋介石一时还不敢得罪罗斯福,与戴季陶、陈布雷研究后,决定“暂用妥协政策为宜”^⑥。7月23日,蒋介石两电孔祥熙,要他当面向罗斯福陈述:蒋对罗的主张“原则上表示接受而毫不踌躇”,但实行上不可无“程序”,“须有一相当之准备时期”;罗所称指挥全部华军,应指在国民政府统辖下在前线的作战部队,其指挥范围与办法,应另行规定。并要孔特别说明:“抗战七年,而中国全国国民之所以百折不挠者,全为求得国家之独立与自由,保障国家之尊严”,意在含蓄地指出罗斯福主张之不当。关于租借物资支配权,蒋提出:应完全

① 《战时外交》(三),637页。

② 同上,642页。

③ 《事略稿本》,1944年7月16日。

④ 同上,1944年8月6日。

⑤ 同上,1944年7月19日。

⑥ 同上,1944年8月19日。

归于中国政府或最高统帅，但可授予史迪威“考核监督之权”^①。

罗斯福不容蒋介石拖延，于8月10日致电蒋介石，声称中国战场形势危急，授予史迪威全部指挥权一事“必须立即行动”，同时提出，将派曾任陆军部长、中东特使的赫尔利为私人代表来华，调整蒋、史关系。至此，蒋介石已不能闪躲。同月14日，蒋拟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并拟在复罗电中表示“余已积极准备，甚望其能于短期内可以顺利实现”。^② 蒋既松动，罗斯福也不想使中美关系弄得很僵。于8月23日致电蒋介石，继续催蒋尽早采取必要的措置，让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电称：“稽延之思考及审慎之部署，于此军事严重之时，容有严重之后果。”同时，罗斯福也表示，正拟订新程序，使史迪威不再负责拨发租借物资。^③ 这通电报，意在进一步催逼，但也有所让步。

9月6日，罗斯福特使赫尔利与纳尔逊抵达重庆。9月9日至11日，宋子文、何应钦与赫尔利、史迪威、纳尔逊谈话。其间，宋子文根据蒋介石指示，坚持美国租借物资到达中国后应交中国政府处理，声称“必须记住一个大国的尊严”，但史迪威、赫尔利均反对。^④ 赫尔利指斥宋子文“胡说”，对宋称：“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他们，我们愿意给谁就给谁。”^⑤ 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就完了。共产党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远征军）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

① 《战时外交》(三)，645~648页。

② 同上，651页。

③ 同上，655页。

④ 《史迪威事件》，278页。

⑤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6日，287页。

股。”^①12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赫尔利、史迪威不愿交出租借物资支配权,蒋称:“此事非坚持不可。”^②同日,赫尔利与纳尔逊拜会蒋介石,给蒋的印象是“言辞虽婉而意甚严”。他认为,抗战以来,举凡军事挫折、经济疲困、“共匪猖獗”、政治恶化等各种问题,都是美国“粗疏盲昧、无端诋毁”的结果。对于谈判再三而美国仍不愿将援华物资交给自己支配,以及不愿就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一事订立协定,蒋介石尤感恼怒,再次萌生“独立应战”的想法,日记云:“对余之侮辱欺妄,竟至于此。故余决据理力争,不能再事谦让,并须预作独立应战之准备,以防万一也。”^③9月16日,美国大使高斯对蒋介石称:“希望将来中国在和会中能代表中国与亚洲,不失为四强之一之资格。”蒋自称听了这段话以后,有如“利刃刺心”,在《反省录》写道:“若不自力更生,何以立国?何以雪耻,而史迪威之刁难轻侮,更令人难堪。”^④

史迪威所指挥的中国驻印军迭获胜利。8月5日,驻印军攻克密支那。但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进展迅速。9月12日,日军攻占广西全州,威胁桂林、柳州。滇西方面,远征军于9月14日克服腾冲,与盘踞龙陵的日军陷于苦战状态。9月15日,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命令驻印军乘胜进攻缅北的另一要地八莫,以此策应滇西远征军,否则,即拟将远征军撤回怒江以东,保卫昆明。史迪威声称,在密支那的中国远征军需要休息,建议蒋调在陕西监视陕北的胡宗南部来援,同时反对滇西远征军撤回怒江以东。他在日记中斥责蒋介石为“疯狂的小杂种”,“一如既往的荒诞理由和愚蠢的战略战术观念。他很难对付而

①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6日,287页。

② 《事略稿本》,1944年9月12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1944年9月16日。

又令人讨厌”。^① 事后，史迪威紧急电告马歇尔，声称“长江以南的灾难主要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指挥和照例的远在重庆的遥控。麻烦仍然来自最高当局”^②。1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认为日军进攻中国东部是“诡计”，要求蒋介石立即补充缅北部队并且立即派遣生力军，协助怒江方面的中国军队。该电同时严厉批评蒋延搁委任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以致损失中国东部的重要土地。罗斯福以威胁的口吻称：“务希立采行动，方能保存阁下数年来英勇抗战所得之果实，及吾人援助中国之计划。”“不然，则在政治上及军事上种种之计划，将因军事之崩溃而完全消失。”^③这通电报有如最后通牒。史称赞说：“这一枪打中了这个小东西的太阳神经丛，然后穿透了他。这是彻底的一击。”^④19日，史迪威向蒋面交此电，蒋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了”，但内心愤怒异常，日记云：“实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今年七七接美总统罗斯福侮辱我国之电以后，余再三忍辱茹痛，至今已有三四次之多，然尚可忍也。今日接其九一八来电，其态度与精神之恶劣及措辞之荒谬，可谓极矣。”^⑤20日，蒋介石对赫尔利、纳尔逊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等之侮辱，此殊足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也。”^⑥

赫尔利来华后，曾与史迪威长谈。史称：自己与蒋之间，两人个性均极强硬，工作上不免发生困难。今后愿意接受蒋之命令。关于援华租借物资，赫批评史全面操控的做法，史同意今后全部交蒋支配。关于

①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5日，287页。引文参考了瞿同祖所译《史迪威资料》，121页，中华书局，1978。

②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pp. 435 - 436.

③ 《战时外交》(三)，658~659页。

④ 《史迪威日记》，1944年9月18日，289页。

⑤ 《事略稿本》，1944年9月19日。

⑥ 同上，1944年9月20日。

中共问题,史提出由彼提出调整方案,国共两党彼此谅解,将中共以及中央用以防共的部队,均调出抗战。赫称此为中国内政,吾人虽盼中国统一,但只能以“纯客观之立场赞助中国政府解决中共问题”,使所有中国抗日部队均听命于蒋的指挥。24日,赫尔利会见蒋介石,汇报与史晤谈情况。蒋称:罗斯福关于将中国军队交史迪威指挥提议,出于好意,有利中国,但“军队乃国家命脉,而军队之指挥权,乃操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自己不能不慎重处理。蒋要赫尔利转告罗斯福:“有三点不能稍事迁就:1. 三民主义不能有所动摇,故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2. 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失;3. 国家与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即不能接受强制式之合作也。”^①蒋称:已对史迪威“失去最后一分之希望与信心”,希望美国另派人员来华。宋子文当即配合,声称美国派任东南亚的盟军总部某参谋长,即可胜任。^②25日,蒋介石命宋起草致赫尔利备忘录,表示同意美方遴选将领一员为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兼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备忘录称,自赫尔利来华后,本人曾不顾以前之感觉与判断,考虑以史迪威为前敌总司令,但“史将军非但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中止”^③。

蒋介石拒绝罗斯福的意见,自知事关重大,中美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准备恢复“独立抗战”。9月26日,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孔祥熙与宋美龄,声称罗斯福来电“其措辞实不堪忍受,余对其来电决置之不复”。“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只要内容简单,无外力牵制,则国内一切措施方能自如,决不如今日皆受人束缚之苦也。史决难再留,如有人来说情,应严正拒

① 《战时外交》(三),675页。

② 同上,667~671页。

③ 同上,673~674页。

绝,并请其从速撤换,以免阻碍今后之合作也。”^①27日蒋介石日记云:“自史迪威由印回渝,半月以来,彼即作有计划有系统之威胁宣传:一则曰,彼即离渝回美;再则曰,共党要求其赴延安;三则曰,彼拟飞往延安;四则曰,第十四航空大队将完全撤退;五则曰,撤退驻渝美军总部人员。以上种种荒谬言论,无非欲余将华军指挥权,无条件交彼而后已,而美国国内亦对华军作种种不堪之妄报,遂使其国人对华轻视,以为中国真至绝望之境矣。即以罗斯福上周在记者招待会上对华军事不满之表示,更可见非达到统制中国之目的不可也。若不决心据理力争,将何以遏制其野心而暴露其阴谋乎!”^②28日蒋介石致电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嘱咐他今后不可再向美国要求任何物品,以免为人轻视,并要求他迅速离美回国。这时候,蒋已经作了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准备。30日,他在《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美国态度之恶劣已至极点,如其再不自悟,惟有出于绝交之一途。”“万不料参加同盟战争,竟得此恶果与窘境。”^③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虽是弱国,但是,中国毕竟是大国,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力量。蒋介石既然寸步不让,美国不愿丢掉中国这个战略伙伴,就只有向蒋让步了。10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接受蒋的建议,解除史迪威的参谋长职务,命他不再负责租借物资,但罗坚持,为保证中印空运,仍须史负责指挥在缅甸及云南的中国军队。^④10月7日,蒋介石接见赫尔利,拒绝罗斯福建议,声称史迪威既不能服从命令,又缺乏与中国合作精神,故不能再委以指挥中国战区

① 《战时外交》(三),675页。

② 《事略稿本》,1943年9月27日。

③ 同上,1943年9月30日。

④ 《战时外交》(三),677~678页。

任何军队之名义与职务,要求美方另派人员。蒋并拟就致赫尔利的说明文稿和答复罗斯福电稿,当场由宋子文口译。^① 8日蒋介石约陈布雷谈话。陈认为应适可而止。蒋不赞成,表示:“应以要求撤回为唯一目的。”同日,孔祥熙也致电蒋介石,说明罗斯福召集美国陆海军首脑商谈,军方对撤换史迪威颇多顾虑,马歇尔又对史极为支持,史现升四星上将,与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权位相等,如另派他人,至为难得等为理由,要求蒋令史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职务,专心负责滇缅路联军军事。^② 但是,蒋也不为所动。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要求调回史迪威,另换他人。^③

此际,蒋介石认为对美交涉已至最后关头,做了最坏准备。他在日记中表示,如罗斯福不改变其现在态度,则不能不准备决裂。在历史上,蒋在碰到困境时,曾经有过两次下野的纪录。这次,蒋自称:“非至万不得已时,决不可为内外形势恶劣之故而灰心下野,以放弃我革命之责任也。”^④ 10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会见宋子文,希望留住史迪威,声称撤换史将损害罗斯福的威信。宋向蒋汇报,蒋虽感到形势的“危险与恶劣”,但是,也还是不准准备收回决定。^⑤ 10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当此内外夹攻,困难重重之秋,惟有求其在我,我能自立自强,则一切外物自可迎刃而解也。”^⑥

赫尔利来华,本负有劝说蒋介石接受罗斯福决定的任务,但是,他在与蒋的接触中,却逐渐被蒋说服。10月13日,他致电罗斯福,声称

① 《战时外交》(三),678~679页。

② 同上,683页。

③ 同上,684页。

④ 《事略稿本》,1944年10月11日。

⑤ 同上,1944年10月13日。

⑥ 同上,1944年10月15日。

“中国以劣势装备之弱国对其强大敌寇，抗战至七年以上，尚不能使之屈服，则美国对华交涉，决非用压力与威胁所能奏效”。他力劝罗斯福改变决定，另派能与蒋合作的人员来华。电称：“如我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了中国。”^①自然，罗斯福不愿失去中国，只能向蒋妥协。10月1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声称现正颁发命令，即将召史迪威回国。在一场比赛智慧、比赛意志的较量中，罗斯福败在蒋介石手下了。蒋介石志得意满，10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如果此次请调史迪威不成，则美在东方必演成军国主义之祸首，是以此举不仅救我国，抑且救美国矣。”^②28日，美国正式发布调史迪威回国命令。10月31日，蒋在日记中自夸云：“此实我中国解放之开始。”^③

宋子文最早提出撤换史迪威，在蒋改变主意后又因坚持己见而受到蒋的斥责，这时，自然很高兴。10月30日，宋子文致宋子安电云：“此次史迪威撤调回国，兄助回合（暗指蒋介石——笔者），出力不少。盖为纠正一年前历史上之错误也。”^④

1945年1月5日，美国政府自动撤回史迪威的助手多恩，蒋介石日记云：“此人为史迪威手下第一骄横侮华之人，美竟撤去，则其援华之诚意又进一步矣。”^⑤同年7月8日，蒋介石想起一年前罗斯福强制自己交出军权的情况，认为“几等于宣判中国之死刑，为抗战以来所未有之耻辱”^⑥。6月23日，史迪威出任美国第十集团军司令，与日军在冲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 1944, Vol. 6. p. 726. 参见《事略稿本》，1944年10月21日。

② 《事略稿本》，1944年10月22日。

③ 同上，1944年10月31日。

④ 宋子文文件，第47盒。

⑤ 《事略稿本》，1945年1月5日。

⑥ 同上，1945年7月8日。

绳岛作战。8月2日,蒋介石得知,马歇尔决定由史率领第十集团军由琉球来华登陆,史则倡言“必先倒蒋”^①。当晚,赫尔利拜会蒋介石,蒋将《史迪威事备忘录》交赫,嘱其转交杜鲁门总统,拒绝史迪威再次来华。^② 史迪威和中国的关系自此结束。

是非讨论

史迪威是个优缺点都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中国通,真心诚意地帮助中国抗日,对中国社会、中国军队与蒋介石其人有许多敏锐的认识。远征军第一次缅北作战失败后,他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增强了中国军队的作战力。远征军第二次缅北作战胜利,显然与他的训练、指挥有关。郑洞国曾回忆说: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最难得是他身为异国高级将领,却毫无官架子,待士兵们十分友善,喜欢同他们交朋友,慢慢赢得了不少中国将士对他的钦敬”^③。应该承认,史迪威是对中国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国际友人之一。但是,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点,例如傲慢、主观、急躁、偏激,特别是,作为美国将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国主义思想和作风。

蒋、史矛盾,开始于战略分歧。史迪威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际,中国远征军刚刚入缅,人地生疏,英国在缅军队则根本没有斗志,在这

① 《事略稿本》,1945年8月2日。

② 同上,1945年8月3日。

③ 《我的戎马生涯》,302页。

种情况下,就急于要求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强力进攻,是其不妥之一。蒋介石和中国将领与日军作战多年,熟悉日军的优势和特点,反对贸然进攻,后来又反对在缺乏盟国有力的支援和协同下由中国军队孤立作战,求稳防败,有其合理性,但史迪威却视之为“卑怯”,由此对蒋介石和中国将领的抗日积极性作了过低的估计,是其不妥之二。中国人缅军初战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张,未经请示就决定向印度退却,途中环境恶劣,给养困难,造成部队非战斗减员过大,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责,是其不妥之三。

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是同盟国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关系。蒋介石、宋子文等人期望尽可能多地得到美国的援助,但是,同时又不能容忍对中国的任何歧视,要求待遇平等,能和英国、苏联等受援国一样,自己掌握租借物资分配权,也有其合理性。当时,中国有关机构腐败严重,蒋介石又歧视和排斥中共所领导的抗日部队,因此,史迪威等应该也完全可以坚持对援华物资分配的建议权和监督权,但是,史迪威等却坚持援华物资是美国人生产的,必须由美国人分配,中国人无权过问,这就是大国主义的作风了。史迪威批评蒋介石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其中所说“偏执”姑置不论;说蒋“贪婪”,无非是指蒋对美援的不断争取;说他“忘恩负义”,则是典型的“施主”的“恩赐”心态。

抗战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确实存在较多问题,需要训练和改造,蒋介石对军队的指挥也确实有不少问题,需要改进、改革。但是,史迪威作为外国人,不应越俎代庖,大量任用美国军官来控制 and 操纵中国军队,更不应图谋全面掌握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甚至制订暗杀计划,企图除去当时还是中国政府和抗日领导人的蒋介石。1943年10月之后,中国军队两面作战,既需要迎击日军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需要开辟缅北、滇西战场,应付为难。在这一情况下,罗斯福听

信史迪威、马歇尔等人的意见，利用中国军队在河南、湖南等地的失败，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中国战场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自然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军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也是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命根子。蒋介石坚决抵制罗斯福的要求，甚至不惜为此与美国决裂，独立抗日，既反映出蒋介石思想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和其性格中的倔强一面，也反映出他充分懂得，维护军权对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愈来愈显示其重要性。史迪威对蒋介石集团失望之余，寄希望于中共，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援华物资中应有中共抗日部队的份额，并且建议将胡宗南的部队调往抗战前线。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蒋介石对此采取疑忌和反对态度，是其反共思想和立场的必然表现。

宋子文是史迪威来华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议者，为此，他在美国斡旋疏通，撤回有望，而蒋介石却临事而惧，改变主意，由此引起两人间的巨大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连开罗会议也不让作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参加。但是，蒋、宋之间毕竟基本观点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书“悔过”之后，蒋介石就原谅了他。此后，蒋、宋合作，共同促使罗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决定。

据提交 2006 年 5 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宋子文与战时中国”国际论坛的资料长编写成，2006 年 10 月 1 日完稿。

蒋介石与韩国独立运动

中韩两国有长期友好的历史渊源。1910年日本悍然并吞韩国，大批韩国爱国人士流亡中国，开展抗日、复国斗争，成为波澜壮阔的“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运动中，韩国来华流亡人士曾得到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各阶层人士的大力支持。本文将考察蒋介石和韩国独立运动的关系，以此为中心，阐述抗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对这一运动所作出的贡献。

几乎从韩国流亡人士踏上中国国土的那一天开始，两国的爱国者之间就开始来往。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明确表示，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准备给予援助。孙中山逝世以后，中国国民党人继承了孙中山的这一既定政策。

促进在华韩国抗日力量的团结

1931年7月1日，日警在中国吉林万宝山地区开枪射击中国农民。7月3日至9日，日本当局在朝鲜汉城等地煽起排华暴动，中国华侨遭到袭击。此事引起蒋介石震动。7月24日日记云：“余意即应对世界各国宣言及提案国际联盟会，暴露日本政府有组织的杀害侨民之罪恶与其已无统治朝鲜之能力，而朝鲜合并，我国未经承认。中日所订条约，皆认朝鲜为完全

独立国。”^①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开始调整政策，致力于抗日准备，因而，援助来华韩国人士问题也就逐渐受到重视。

韩国流亡中国的爱国者之间分合频繁，派系众多。当时，已发展为两大派。一派领导人为金九，另一派领导人为金若山。金九，1876年生，早年即参加抗日运动，曾三次被捕，1919年来华，先后担任韩国临时政府警务局长、内务总长等职，1927年任国务领（总统），次年组织韩国独立党。金若山，1898年生，1918年来华，在东北组织朝鲜义烈团，任团长。1926年率领部分团员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受训，曾参加中国的北伐战争，后在北平秘密创办政治学校。据说曾参加韩国共产主义团体——马克思、列宁派。^②在上述两派中，金九一派成员年龄较大，受韩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而金若山一派则年龄较轻，比较激进，两派思想上有较大差异。其他还有若干小党派，经常发生内讧，无法形成统一的抗日复国力量。在援助韩国独立运动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注意处理派系关系，促进韩国爱国人士的团结。

1932年，蒋介石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及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滕杰分别开展援韩工作。^③当年4月，力行社成立东方民族复兴运动委员会，确定以“济弱扶倾”精神援助中国周边地区的韩国、越南、印度等被压迫民族。5月，金若山率领朝鲜义烈团干部自北平到南京，向蒋介石提出《中朝合作反日倒满秘密建议书》，蒋介石批交力行社研究办理。^④同年秋，滕杰等奉命在南京设立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培养

① 毛思诚摘录本《蒋介石日记类抄》。

② 闵石麟：《韩国各党派概略》，《韩国各党派情报卷》，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中韩关系专档》（十），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

③ 滕杰：《滕杰先生访问记录》，118页；参见《蒋公总统大事长编初稿》卷2，209～230页。

④ 金若山：《朝鲜民族革命党之创立与其发展经过》，《韩国民族革命党卷》，《中韩关系专档》（十四）。

金若山一派干部。此后,金若山的活动即得到黄埔同学会和国民党军统方面的支持。1933年5月,蒋介石又通过陈果夫约见金九。金九要求中国资助百万元,保证“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大陆之后路”。此前,金九所领导的韩人爱国团的主要工作是暗杀,先后发生李奉昌在东京谋炸裕仁天皇以及尹奉吉在上海炸死白川大将两起事件,金九的名声因之大增。蒋介石不赞成这一做法,通过陈果夫向金表示:“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须先训练一批武官。”^①金九同意蒋的意见,双方迅速达成协议,以河南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作为基地,第一期培养军官100名。其后,金九一派有部分人员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情报工作。^②除金九等按月得到中国方面的经费补助外,韩国流亡人士的回国活动费用,也常由陈果夫转请蒋接济。^③

鉴于当时韩国来华人士中派系分歧的状况,力行社和陈果夫等曾于1933年敦劝各方合作,成立统一的韩国民族革命党。1934年7月,朝鲜革命党、朝鲜义烈团、韩国独立党、新韩独立党、大韩独立党等在南京举行代表大会,合组朝鲜民族革命党,以金若山为总书记,但随后又发生分裂,韩国独立党和朝鲜革命党宣布退出重建。1937年8月,金九领导的韩国国民党与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等九个团体在南京联合成立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简称“光复阵线”。11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则与朝鲜革命者联盟等组成朝鲜民族战线联盟,简称“民族战线”。1938年1月,两派在长沙会谈,磋商统一,未能达成协议。1939

① 《白凡逸志》,232~233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4。

② 《韩国党派之调查与分布》,《韩国各党派情报卷》,《中韩关系专档》(十)。

③ 萧铮:《韩国光复运动之鳞爪》,(台北)《中央日报》,1953年8月25日。

年1月,蒋介石不得不分别约见金九与金若山,劝告双方开诚合作,全力对日,争取朝鲜独立。其后,蒋介石即将该项工作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办理,命他“负责设法,使其内部统一”^①。同年5月,金九与金若山发表联合宣言,声称“从目前中华民族为取得最后胜利而实现民族大团结的教训中,痛感我们过去所犯的种种过错”,号召各团体停止各自的活动,不分主义和党派,把力量集中起来。^②但是,其后在重庆成立的全国联合阵线协会和在四川綦江召集的七团体会议仍先后失败。1940年1月,朱家骅密呈蒋介石,检讨长期不见成效的原因,认为其关键在于“完全采辅助主义,听任各党自由商讨进行,以致各行所素,不克抛弃成见”。他提出:今后“似应采积极主动之态度,对彼等表示切实具体之主张”^③。3月30日,蒋介石致函朱家骅,命其邀集在重庆的日本、朝鲜和台湾的革命首领会商,电称:“查汪逆傀儡登场在即,我方对倭亟宜加大打击,赞助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使其鼓动敌国人民群起革命。”^④朱家骅接函后,即制订方案,首先促使光复阵线三党统一,同时提出,暂时允许光复阵线与民族阵线并存,分区工作,长江以南为朝鲜民族革命党工作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为光复阵线工作区。5月8日,韩国国民党、韩国独立党、朝鲜革命党在重庆发表解散宣言,共同组成新的韩国独立党,以金九为委员长。这样,虽然出现了韩国独立党与朝鲜民族革命党并存的局面,但毕竟向着统一方向前进了一步。1941年5月,朝鲜民族革命党举行第五届第七次中央全会,

① 朱家骅:《签呈总裁密陈四年来对韩国问题办理经过附具意见伏祈手令饬办》,《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577页,1988。

② 杨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民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625、628页,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

③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资料》,64页。

④ 同上,551页。

议决参加以独立党为主体、金九为主席的临时政府，这样，韩国来华爱国者的团结就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支持朝鲜义勇队与韩国光复军

滕杰等人在南京举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至 1935 年 10 月，先后培训了三期学员。同月，军事委员政训班在江西星子开学，对部分韩国青年进行特工训练。^① 与此同时，还有部分韩国青年进入南京中央军校学习。1937 年 8 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南京召开代表大会，议决以军校韩籍学生为基础，组织义勇军，参加中国抗战。次年 10 月 2 日，成立朝鲜义勇军指导委员会，以中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长贺衷寒为主任，金若山为司令。第二天，决定改名为义勇队。10 月 10 日，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提出三个口号：（一）动员所有在华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二）争取日本广大军民，发动东方各弱小民族，共同打倒日本军阀；（三）推进朝鲜革命运动，争取朝鲜民族的自由解放。^② 该队的主要成员是原军委会政训班韩国学生队的毕业学员，至 1940 年 2 月，发展至 314 人。其工作有对敌宣传、国际宣传、教养俘虏、翻译日方文件等几个方面，部分队员并曾深入河南、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区，分化、争取日军中的韩籍士兵。1940 年 10 月 10 日，蒋介石为朝鲜义勇队题词：“手足相卫”。^③ 11 月 15 日，又通过军委政治部转颁嘉慰电文：

① 滕杰：《三民主义力行社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之经过》，《滕杰先生访问记录》，121～126 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

② 朴孝三：《两年来本队工作的总结》，《朝鲜义勇队两周年纪念特刊》。

③ 《朝鲜义勇队两周年纪念特刊》。

“诸同志本东方革命之精神，共为民族解放运动之精神毅力，欣慰良殷。”^①

1940年3月2日，金九向国民党中统局徐恩曾提出，华北日军中朝鲜籍士兵反正者颇不乏人，倘能在该处成立光复军，构成情报网，则将来于军事上、特务上裨益非浅。3月2日，朱家骅将有关情况呈蒋介石，表示“似可于韩国各党统一之前”，支持此事，“酌予补助”。4月11日，蒋介石批示“准予照办”，要朱与何应钦接洽。5月15日，何应钦复函提出：（一）该军编组单位，由金九按现有的人数拟定承核；（二）活动区域，俟该军成立后，由负责人按事实需要拟定计划呈军事委员会核夺。9月17日，韩国光复军在重庆举行成立典礼，宋美龄特别捐赠慰劳金10万元。随后，光复军在西安成立总务处，开始活动。

光复军的性质是另一个国家的流亡者在中国组建军队，涉及种种复杂问题，何应钦等认为此事既不合于“国际法”，又认为“韩国内部党争分歧”，“如此时在华成立光复军，将来处置必感困难”，因此，始终不肯积极支持。韩国流亡者方面盛传，当年冬天，军委会曾秘密通令取缔光复军。1941年7月8日，朱家骅致函何应钦，认为对韩国光复军，“未宜绳以常例，过求严格”，“似宜于可能范围内特别予以便利”。他并以戴高乐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军”，英人并未起而阻挠为例，要求何改变态度。^② 蒋介石支持朱家骅，于7月18日批示：“可准成立”，“但应有一限度”，要何应钦交军政部速拟办法。^③ 9月30日再次指示说：“本党领导东方民族革命及抗日战争，对朝鲜光复军，在原则上应为政治上之运用，不宜为法律问题所拘泥。至朝鲜内部党争，亦毋须过分重视。如

① 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309页。

②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330～331页。

③ 同上，317页。

系数党,则可为数党之运用,不必固执一党然后援助。至光复军成立时之处置:(一)直隶本会,由参谋总长掌握运用并于会内指定专人掌握该军之指挥命令及请款领械等事;(二)原隶政治部之朝鲜义勇队应同时改隶本会,由参谋总长统一运用,以免分歧;(三)限制该军,不得招收中国兵及擅设行政官吏。如欲引用华籍文化工作人员,须呈由参谋总长核准。”^①

蒋介石既有明确指示,中国方面遂于1941年11月1日颁发《光复军九个行动准绳》。其主要内容为:韩国光复军在抗日作战期间直隶中国军事委员会,由该会参谋总长掌握运用;在该国独立党临时政府未推进韩境以前,仅接受中国最高统帅的命令,与韩国独立党临时政府保留固有名义关系;该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由军事委员会指定;不得招收我籍之士兵及擅设行政官吏等。^② 上述各条,当时均经韩国临时政府同意。此后,光复军即正式隶属于中国军事委员会。该军以韩国独立党人士李青天为总司令。1942年3月,中国方面任命尹呈辅为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参谋长。^③ 5月15日,蒋介石将原属军委会政治部的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任命原该队队长金若山为光复军副总司令。同年9月17日,光复军成立两周年,李青天致电蒋介石表示敬意,蒋复电赞扬该军“批艰历辛”,“团结精诚”,表示将继续支持,“本扶弱抑强之素志,而竟兴灭继绝之全功”。^④ 不过,该军发展缓慢,始终规模较小,至1943年5月军委会点验为止,仅120余人。^⑤

① 《照抄陷川侍六代电》,《韩国光复军卷》,《中韩关系专档》(三)。

②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337~342页。

③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尹呈辅先生访问记录》,56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

④ 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391页。

⑤ 《军委会点验光复军》,外交部情报司情报,《韩国光复军卷》,《中韩关系专档》(三)。

光复军佩戴中国的“青天白日”帽徽,指挥权属于中国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由中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进行,因此,韩国流亡者方面有种种议论,如“非韩国之光复军,乃中国之光复军”,“失其所可享之权利,得其所不愿之义务”,“伐齐为名,参战无期”,等等。其中,有些人认为《准绳》“有损韩国独立之精神”,甚至攻击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及光复军总司令等人为“丧权辱国的罪人”^①。1942年10月,韩国临时议政院召开第三十四届会议,秘密决定,责成临时政府与中国方面交涉,废除《准绳》,否则即应引咎辞职,并将临时政府迁往美国。^②为此,韩国临时政府曾多次向何应钦交涉修改,均被拒绝。^③1943年2月20日,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部长赵素昂照会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要求废除《准绳》,另定《中韩互助军事协定》,使光复军“隶属于韩国临时政府”,“所属人员任免与政治训练由韩国临时政府主持”。^④此后,蒋介石即饬令何应钦签拟办法。同年12月,韩国临时议政院第三十五次会议议决,新任国会议员应在三个月内与中国政府交涉修订,如交涉无结果,即自动声明该项条文无效。1944年6月,赵素昂向国民党中央正式提出《中韩互助军事协定草案》。9月8日,蒋决定接受韩国临时政府方面的要求,致函吴铁城称:“韩国光复军自以隶属韩国临时政府为宜,其行动准绳,应即彻底取消,俾无害于中国之安全,并符韩方之希望。至派往各战区工作及通过战区之人员,则须经我军委会之同意为宜。”^⑤10月7日,金九致

① 闵石麟:《韩国各党派述略》,《韩国各党派情报卷》,《中韩关系专档》(十)。

② 《韩国临时政府拟迁往美国》,委员长侍从室致吴铁城函附件,《韩国临时政府情报卷》,《中韩关系专档》(九)。

③ 《温叔萱呈》,《韩国光复军卷》,《中韩关系专档》(三)。

④ 《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长赵素昂照会》,《韩国临时政府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一)。

⑤ 《蒋介石致吴铁城函》,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第12349号,《韩国光复军卷》,《中韩关系专档》(三)。

函吴铁城,提出韩方草案。^①

吴铁城综合蒋介石和韩方意见,于1945年1月4日签报新拟《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草案》,但蒋仍然于17日指示:“此事应嘱韩方派员先事洽商,成议后再核。”^②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温叔萱与韩国临时政府军务部长金若山商谈,确定《办法》五条。其后,金若山将《办法》交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会讨论,略加修正,从五条增加为八条。2月1日,金九复函吴铁城表示同意。但不久又变卦,对其中第五条“中国军事委员会派参谋团以取联络,并协助光复军工作”表示强烈不满,认为“系不以平等看待”,同时表示,“过去光复军之毫无成就,完全受军委会之牵掣所致”。谈话间,“言词不逊,态度至为傲慢”。这样,中国方面遂决定再次让步,“既不派参谋团,亦不派联络参谋”^③,从八条又修订为六条。1945年4月20日,金九致函吴铁城,表示同意《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自5月1日起实施。自此,韩国光复军遂改隶韩国临时政府管辖。

确定先于他国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

1919年4月11日,韩国流亡人士在中国上海成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政府,先后由李承晚、朴殷植、李相龙、洪震、金九等担任国务总理或大统领、国务领之职。1940年9月,临时政府迁至重庆。10月8日,

① 《金九致吴铁城》,《韩国光复军卷》,《中韩关系专档》(三)。

② 《蒋介石致吴铁城函》,军事委员会代电第14942号,《韩国光复军卷》,《中韩关系专档》(三)。

③ 《张寿贤致吴铁城呈》,《韩国光复军卷》,《中韩关系专档》(三)。

韩国临时政府议政院在重庆举行会议,选举金九为国务会议主席。

韩国临时政府虽然长期在中国领土上活动,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支持,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正式承认。1941年11月、12月,徐恩曾两次致函朱家骅,认为苏联远东军方面有韩籍红军三四万人,日苏一旦开战,即有组织苏维埃政府之可能,建议抢占先机,尽早承认韩国临时政府。^①次年1月30日,金九向中国当局提出节略,要求中国方面率先正式承认临时政府,并请同盟国一致承认。当时,中国方面已经蒋介石批准,在当年10月10日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曾通过外交部长郭泰祺对金九及金若山二人作过透露。^②但是,蒋介石重视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希望尽力和美方保持一致。

金九在被选为韩国国务会议主席之后,曾于1941年3月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承认临时政府,开始外交关系。但是,罗斯福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授权中国政府斟酌时机,再与美方讨论。4月1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转告罗斯福的上述意见。5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正式照会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由于韩人之间既不合作,与国内韩人又无联系,以及美国、苏联西伯利亚存在其他韩人团体等原因,美国方面无意立即承认任何韩国团体。这样,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就只能仍然处于讨论阶段。

为了加强援韩工作,1942年7月2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以戴季陶、何应钦、王宠惠、陈果夫、朱家骅、吴铁城、王世杰等七人为委员,以吴铁城、王宠惠为召集人,组成专门小组,通盘研究援韩问题。同月,军事委员会奉命草拟《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

^①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558、562~563页。

^② 《会见金若山谈话纪要》,《韩国各党派情报卷》(下),《中韩关系专档》(十)。关于郭泰祺约见金若山的时间,邵毓麟认为在1942年元月,见其所著《使韩回忆录》,36页。

案》3项15条。该方案提出：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须“以热情宽大公正协助之态度出之”；“为多党之运用，不必固执一党，并须使其能协同工作”；“对韩国临时政府，须使其能领导各党派力量，实行民主政治，不采一党包办之政策”，“随时考虑，应合国际情况，适时承认”；等等。8月1日，国民党中央援韩小组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军委会方案，决定：（一）原则上确定先于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时机由政府抉择；（二）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尚未表面化以前，只能承认一个团体为对手方；（三）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的借款，由党出面，以宽大与自由之精神为原则。^①8月12日，蒋介石致函吴铁城及朱家骅称：中央党部即将召集小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希即将议决要旨呈报。^②8月17日，中央援韩小组再次会议，特邀孔祥熙、马超俊、孙科等参加。决定：韩国在华党政军之指导与接洽，除军事方面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外，党政方面统由中央党部秘书处主持；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时机，由蒋决定；会议同时建议先拨100万元，协助韩国在华革命力量。^③8月22日，吴铁城将上述意见具报蒋介石。其后，在国民党高层讨论应否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上，发生分歧意见，何应钦“对弱小民族素无兴趣，迭持异议”，而军委会高级幕僚、国民党中常会，特别是孙科、戴季陶、吴铁城等则坚持承认。^④10月8日，蒋介石致函吴铁城，对军事委员会所拟《方案》要点提出多项意见。其一，蒋认为党政军事实不可分离，应予统一运用及指导，可于何应钦之外，再指定一二人参加主持，以后关于朝鲜问题，统由此数

① 《商讨朝鲜问题会议记录》，《扶植韩国复国运动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二）。

②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第6010号，《扶植韩国复国运动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二）。

③ 《关于扶助朝鲜革命运动一案之会商经过及决定事项》，《扶植韩国复国运动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二）。

④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572页。

人协议办理。其二,确定“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之原则可照办。其三,所拟“只承认一个团体为对手方”,似不必如此固定。其四,对韩国革命团体之借款不限于临时政府,而以其有革命力量与对我抗战有关之团体为对象。蒋同意由党出面接洽,先拨 100 万元,以协助其进展。^① 吴铁城接信后即与戴季陶、王宠惠、朱家骅磋商。戴季陶认为:“韩国革命团体及人民之自尊心理,应加以重视,文字上宜避免有所刺激,故此次整理,大体均本热诚宽大之意旨。”12月15日,吴等拟订的《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定稿。该方案分总纲、要旨、方法三大部分。总纲部分提出:“本总理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族之遗教,建立东亚永久和平,对朝鲜在华各革命团体予以积极的扶助,期培成其复国力量,重建完整之独立国家。”^②《要旨》部分提出:“本党同志应以亲爱精神与热诚谦和之态度接待朝鲜各团体。”《方法》部分规定:“于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其国际法律手续及有利时机之选择,由负责指导人员秉承总裁指示交外交部办理之。”^③12月27日,蒋介石致函吴铁城,批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同时批准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人主持援韩工作。^④

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1943年10月8日,《扶植韩国复国运动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二)。

② 《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扶植韩国复国运动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二)。

③ 吴铁城:《报告》,《扶植韩国复国运动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二)。

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第6948号,《扶植韩国复国运动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二)。

推动韩国临时政府改组

对韩国独立运动人士,除了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方面还给予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对金九、金若山等所属党派及韩国临时政府经济上的要求,中国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有时,蒋介石还特别指示:“不必稽核,以免伤及其自尊心。”^①

1943年春,蒋介石批准临时政府借款100万元。何应钦提出的分配方案是,临时政府60万元,韩国独立党与朝鲜民族革命党各20万元。此项分配,其他小党派无份,韩国独立党方面也不愿与民族革命党平分秋色,因此发生纠纷。3月3日,金九致函吴铁城,要求将此款暂为保存,俟将来需要时再行请领。4月初,赵素昂在韩国国务会议上指责中国方面的分配办法“含有帝国主义分化政策之毒素”^②。同月,韩国临时政府内部发生手枪失窃风波。韩国独立党认为此事和朝鲜民族革命党暗杀金九的阴谋有关,而朝鲜民族革命党则认为这是莫须有的陷害,韩国临时政府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7月14日,民族革命党金奎植、金若山等致函吴铁城等,指责金九扣发该党及韩侨补助费。接着,又发布公开文件,指责独立党部分人士侵吞公款,捏造暗杀事件。^③这样,韩国来华人士刚刚形成的统一战线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

① 《照抄致何总长辰佳侍秦代电副稿》,《韩国临时政府借款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二)。

② 外交部情报司情报:《韩国临时政府国务会议争辩之内容》,《韩国临时政府情报卷》,《中韩关系专档》(九)。

③ 朝鲜民族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朴精一、赵琬九等反统一派侵吞公款捏造金九等暗杀事件真相》,《韩国杂卷》,《中韩关系专档》(四)。

蒋介石关心韩国在华爱国人士的团结问题。当年4月14日,蒋介石即曾指示:“朝鲜民族革命党何以不能合并于临时政府之内”,要求“设法劝解,使其合并”。^①7月26日,蒋介石接见金九及赵素昂、金奎植、李青天、金若山等韩国两派人士。蒋称:“中国革命最后之目的,在扶助朝鲜、泰国之完全独立。此种工作甚为艰巨,希望韩国革命同志能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以完成复国运动。”当时,金九和赵素昂向蒋表示:“英、美对朝鲜将来之地位,颇有主张采用国际共管方式,希望中国方面不为所惑,贯彻支持独立之主张。”对此,蒋答称:“英、美方面确有此论调,将来争执必很多。韩国内部之精诚团结,有工作表现,乃为必要。中国力争,才易着手。”^②8月10日,蒋介石致函朱家骅,提出处理韩国各党派统一问题的三项基本原则:(一)党派问题,“不必强求其统一。但宜择优扶植,使能领导独立运动”。蒋同意朱家骅的意见,“目前各党派中以韩国独立党组织较健全,历史亦久,今后应以该党为中心,扶植其领导地位”。(二)政治问题,“兹后有关朝鲜独立运动,应侧重以韩国临时政府为对象,以消弭其内部政争”。(三)军事问题,“调整光复军之高级人事,培植临时政府系统下的军事力量,使其集中意志,灵活指挥”。^③其后,临时政府内部矛盾继续加剧。8月30日,金九等七人甚至一度以“无能维持”为理由向国务委员会提出辞职,直到9月21日,才宣布复职。9月22日,吴铁城接见赵素昂,再次以“希望韩国各革命

^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第7617号,《蒋总统接见韩领袖卷》,《中韩关系专档》(十六)。

^② 《总裁接见韩国领袖谈话纪要》,《蒋总统接见韩国领袖卷》,《中韩关系专档》(十六);参见《韩国民族革命党宣传部长金奎植先生于本年8月5日在重庆对旅美韩侨广播全文》,《韩国民族革命党卷》,《中韩关系专档》(十四)。

^③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584~585页。

同志团结统一”相劝。^① 10月1日,金九召集各派代表谈话,宣布“接受各党派意见,力求合作”等四点,作了一个高姿态的表示^②,然而,风波并未因此停止。

10月9日,临时议政院第35届会议开幕,朝鲜民族革命党孙健等人提出弹劾临时政府议案四项。^③ 1944年1月5日,议长洪震、副议长崔东旼宣布脱离韩国独立党。其间,又因修改约宪和投票方式发生纠纷,会议延至次年4月15日结束,没有取得任何协议。面对韩国来华爱国力量的再次分裂,蒋介石于1月20日指示何应钦、吴铁城、朱家骅三人:“韩国各党派内部倾轧益甚,如我方不善为排解,使其团结,易为他方所用,希即会商具体办法呈核。”^④ 2月28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处长温叔萱接见金若山,谈话后向吴铁城提出:“本党之对策,自当以促进其内部团结,产生合法政府为前提。两党皆仰赖于中国政府之经济援助而生存,自宜运用经济压力,启导两党相互妥协,并使其在工作上发生竞赛作用,以免各走极端,而致力量分散。”^⑤ 其后,吴铁城等分别邀约韩国两党负责人从中排解,促其团结合作。在中国方面促进下,双方加紧磋商,达成改组临时政府方案。^⑥ 4月20日,韩国临时议政院举行第36届会议,将国务委员增至十四人。其中,独立党八人,民族革命党四人。金九任主席,副主席由民族革命

① 《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辞职经过》,杨昭全等:《关内地区朝鲜人民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631页。

② 《韩国临时政府现状之调查》,《韩国临时政府情报卷》,《中韩关系专档》(九)。

③ 《韩国临时议政院会议陷入僵局之经过》,《关内地区朝鲜人民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639页。

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第10189号,《有关韩国问题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三)。

⑤ 《会见金若山谈话纪要》,《韩国各党派情报卷》,《中韩关系专档》(十)。

⑥ 温叔萱:《韩国党派纠纷近况报告》,《有关韩国问题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三)。

党主席金奎植担任。会议发表宣言称：“联合一致而产生了全民族统一战线政府，这不仅是今次会议的最大成功，而是在我民族运动史上，尤其是在临时政府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的大书特记的事实。”^① 24日，独立党、民族革命党、民族解放同盟、无政府主义者总同盟联合发表宣言，拥护会议修正的临时宪章，拥护金九及全体当选国务委员为“我们民族的最高领导者”^②。26日，韩国临时政府新任国务委员宣誓就职。这样，韩国独立党和朝鲜民族革命党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得到缓和，韩国来华爱国者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28日，吴铁城、朱家骅等首先致函祝贺。5月3日，国民党中央发出祝贺电。6月7日，中共代表林祖涵、董必武等也在重庆设宴招待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及各部部长。

在开罗会议上倡言保证韩国战后独立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步入1943年的时候，同盟国的胜利形势已日益明朗，有关各国都在考虑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

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一直主张韩国战后独立。2月25日，宋子文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务卿赫尔，强烈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战后攫取新土地，同时声明中国支持韩国独立。^③ 但是，罗斯福总统却主张

① 《中央日报》，1944年4月28日。

② 《韩国各革命党拥护第36届会议宣言》，《关内地区朝鲜人民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606页。

③ 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4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在战后将韩国交给美国、中国和其他一二个国家共管。^①

同年11月,中国方面为准备开罗会议,由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拟具《战时军事合作方案》和《战时政治合作方案》,向蒋介石呈报,其中明确提出:“中、美、英、苏立即共同或个别承认朝鲜独立,或发表宣言保证朝鲜战后独立。其他联合国家应请其采取一致步骤。”^②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所拟草案也明确主张:“承认朝鲜独立。”^③2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开罗应罗斯福晚宴,蒋向罗口头提出,在日本溃败之后,应使韩国获得自由与独立,得到罗斯福同意。其后,美国方面提出会议公报草案,虽将蒋、罗会谈内容写入草案,但是,却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加进了“于适当时期”的限制性词语。^④26日,英国再次对公报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将有关内容修改为“于适当时期,吾人决定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这样,朝鲜的独立就仍然是个不确定的议案。对此,中国代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坚决反对,认为提法模糊,易生重大后患,他主张明确规定韩国“将来的自由独立地位”。讨论结果,决定维持美国原案。^⑤27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发表《开罗宣言》,中称:“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⑥

《开罗宣言》得到了韩国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蒋介石也因为在会上倡言保障韩国独立而受到韩国人民尊敬。邵毓麟回忆称:“当时在华

① 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421页。

② 《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382页,台北“国史馆”,1990。

③ 同上,386页。

④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54页。

⑤ 《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394~397页。

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三),547页。

韩人闻讯,欢欣若狂。”^①又,韩国独立运动元老许宪在汉城发表演说称:“三千万之朝鲜人民,对于蒋主席极为感激。如无蒋主席在开罗会议所提之建议,朝鲜尚不能获得独立。”^②

反对国际共管与南北分割,继续支持韩国临时政府

开罗会议之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再度提上议程。

1944年4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今后一切援助,即以临时政府为对象。”6月,吴铁城向蒋介石报告,主张先行承认临时政府。同月19日,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赵素昂向中、美、英、苏提出承认临时政府的要求。29日,金九向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致送声明书,要求会议通过决议,承认临时政府,予以必要的物质援助。同月,韩国临时政府分别向中、美、英、苏等三十余个国家递送备忘录,要求承认。7月3日,金九又直接致函蒋介石,对他在开罗会议上提出保证韩国独立问题表示感谢,要求他“重察情势,始终成全,慨予首先承认敝国临时政府”,同时要求定期赐见。^③

蒋介石接到金九来函后,于同月10日饬令何应钦、吴铁城、朱家骅会同外交部宋子文核议。^④当时,宋子文认为:“基于目前韩国临时政府能否代表朝鲜内部人民意见及恐易启苏联误会之两点顾虑,目前仍以稍待为妥。”吴铁城、何应钦等同意宋子文意见,于31日向蒋介石报

① 《使韩回忆录》,43页。

② 《韩人获解放,感激蒋主席》,《中央日报》,1935年9月13日。

③ 《总裁代电》,《有关韩国问题卷》,《中韩问题专档》(廿三)。

④ 《关内地区朝鲜人民反日独立运动资料》,682页。

告,主张“俟至适当时机先他国予以承认”^①。8月3日,宋子文又单独具呈,作了进一步说明。^②28日,陈果夫致函宋子文,认为当时国际政治运作的重要方面是布置战后和平形势,韩国位居中、苏、美、日四国海陆交会之冲,不可不先事筹划。他向宋传达蒋介石的态度,“对韩国政府,颇有积极扶植,即予承认之意”^③。9月5日,蒋介石约见金九。金九向蒋介石面呈备忘录,内称: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境内建立后已经二十五年,现值此千载难遇之好时机,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合法的承认”,“为各盟国倡”。其他要求则有加深援助、拨借活动费5000万元等。接见时,金九又口头提出请指定专任负责接洽人等要求三项。13日,吴铁城约见金九,答称:“我国已确定方针,一俟时机成熟,自当率先承认。”关于“加深援助”问题,答以“惟力是视”,同意先行拨借500万元。^④

当时,美国和英国都积极主张国际共管朝鲜。9月29日,英、美共同提出《研究韩国问题纲要草案》,建议战后在朝鲜成立临时监督机构。10月2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切不可放弃中国扶植韩国早日获得独立的一贯政策,尤其不可赞成国际共管。^⑤1945年1月,太平洋学会第九届会议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召开,中国代表蒋梦麟、胡适、邵毓麟等出席。会上,英美代表认为韩国灭亡多年,缺乏行政管理干部,短时期内难以建立统一的独立国家,主张先由盟国共同托管五年,以便教育训练韩人。中国代表认为此一主张违反《开罗宣言》,所谓国际托管实

① 《吴铁城报告》,《有关韩国问题卷》,《中韩问题专档》(廿三)。

② 《关于韩临时政府请求承认事请核示由》,《韩国临时政府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一)。

③ 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318之4-1号,《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379~380页。

④ 吴铁城:《接见韩国金九主席谈话经过情形请转呈备查》,《有关韩国问题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三)。

⑤ 《使韩回忆录》,39页。

实际上是由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改变为几个强国的共同统治。^①2月8日,美苏在雅尔塔会谈,秘密决定,以38度线为界由美、俄分别实行军事占领,成立国际监督机构,共同管理韩国。同年5月,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组织韩国托管委员会问题。

1945年2月,韩国临时政府致函中、美、英、苏四国首脑,申请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创立会议。3月13日,赵素昂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提出这一要求,表示“愿在旧金山会议树立四十五面国旗,共同负责于新世界之立法”^②。4月3日,蒋介石训令外交部就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宋子文考虑到韩国临时政府尚未得到各国承认,不可能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因此,向美国政府探询,能否允许韩国代表以观察员名义出席。但是,美国政府担心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等会援例要求,给会议带来纠纷,不肯接受。蒋介石无奈,只好同意宋子文的意见,发给护照,由韩方自行向美国交涉签证。^③

5月12日,韩国临时政府代表李承晚向联合国会议正式提出出席要求。6月8日,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发表声明,声称韩国临时政府及其他朝鲜团体目前尚无足以获得美国承认的资格,美国不能采取行动,“以免于联合国获胜时影响及朝鲜人民选择其理想政府及政府人员之权利”^④。

蒋介石不放弃保证韩国独立的承诺。5月24日,蒋介石会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询问美国对于越南、韩国的军政策略,赫尔利只作了一个模糊的回答:“须视将来情况如何,再为适当解决。”当时,中国方

① 《使韩回忆录》,54页。

② 《中央日报》,1945年3月14日。

③ 《呈复关于韩国临时政府推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事》,《韩国临时政府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一);参见《军事委员会来电一件》(第1588号),卷宗同上。

④ 《大公报》,1945年6月10日。

面曾准备建立东亚民族委员会,主持扶助朝鲜独立的有关工作。美国态度既如此,蒋介石遂于6月27日致函吴铁城,指示其“万不可成立”^①。7月26日,蒋介石召见韩国两党代表称:纵使中国保证在战后俾予韩国独立的地位,但实际上仍须藉赖韩人自身团结的力量、团结的行动和事实的表现。^②

8月21日,韩国临时政府驻美代表李承晚急电蒋介石,希望蒋能致电杜鲁门,劝阻其采纳美、苏分割南北韩计划。电称:“不予高丽以完全独立之任何计划,高丽人民均不愿予以接受。”^③22日,吴铁城与金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谈话,吴称:“中国政府自当援助在渝之韩国临时政府返回祖国,领导韩国人民,办理选举,产生民选之正式政府。”金则表示:“俟韩国临时政府回国后,召集各方领袖,组织新的临时政府,届时请中国政府先予承认。”^④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声明国民革命的最重大目标即最迫切的工作有三件:一是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二是恢复台湾和澎湖的失土,第三件就是“恢复高丽的独立自由”。他说:“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本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⑤

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代电》,《扶植韩国复国运动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二)。

② 转引自《韩国民族革命党宣传部长金奎植先生于本年8月5日在重庆对旅美韩侨广播全文》,《韩国民族革命党卷》,《中韩关系专档》(十四)。

③ 《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401页。

④ 《吴秘书长接见韩国临时政府金九主席谈话要点》,《韩国临时政府卷》,《中韩关系专档》(廿一)。

⑤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

同日,金九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请蒋“向同盟各国再予提议承认敝临时政府”,同时,要求蒋转商美军当局,在最短期间,拨借飞机,运送临时政府人员归国。蒋认为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时机已到,指令驻美大使魏道明探询美方态度,同时指示外交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交涉。此际,美、英、苏已将中国排斥在外,达成协议,由美方通知中国:原则上准备将韩国交由四强先行托管,俟详细办法拟定后,再与中国会商。美国驻华大使馆则答称:美国政府对于韩国国外的任何政治团体,都不准备“绝对协助”,但是,奖励他们进入韩境,在军政府范围内工作,可以提供机位。

8月26日,金九致函吴铁城,请其转呈蒋介石,核准拨借法币5000万,以便临时政府成员随盟国回国。9月17日,陈立夫呈请蒋介石,拨借3亿法币,供韩国临时政府归国后活动之用。25日,吴铁城根据蒋介石指示,召集吴国桢、陈立夫、唐纵等座谈,讨论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临时政府失败后的援韩政策等问题,达成四点意见:(一)对韩国问题,我国应与美、英、苏采一致行动,但我国应自动提出合理的主张,促使盟邦与我一致;(二)就现势观察,欲期美、英、苏一致承认韩临时政府,实不可能,但我国对该政府,仍应实际上多方予以援助;(三)该政府如不能正式迁回国内,执行政权,我国亦应设法协助该政府中人员回国,参加其国内工作;(四)我国政府应即派员驻汉城,负联络观察之责。^①当时,金九也感觉到不可能以临时政府名义迁回国内,于26日致函蒋介石,要求蒋与美国政府协商,最少限度默认韩国临时政府为“非正式革命的过渡政权”^②。当日,蒋介石接见金九,金九又口头提出五项要求,

^① 《韩国、越南、泰国问题座谈会记录》,又,《吴铁城呈蒋介石》,《日本投降后韩国问题卷》,《中韩关系专档》(十九)。

^② 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467~468页。

希望蒋能与美方协商,允许他们回国后与各党派建立临时政府,办理全国选举,成立正式政府。同时提出,在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订立一项合作密约。蒋答称:前者须与英、美协商;将继续援助独立党,但不必有形式。^① 10月17日,蒋介石指示:韩国临时政府人员以个人资格回朝鲜;派飞机一架送重要人员分期赴上海,再由美军用机送朝鲜;借拨法币1亿元。^② 22日,批准先拨5000万元。^③ 2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会议,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归国。28日,蒋介石批复吴铁城呈文,同意除已拨之5000万元外再拨国币5000万元、美元20万元,作为韩国临时政府成员返国及返国后初期工作费用。^④ 29日,蒋介石接见金九,“希望韩国同志和衷共济,团结一致”。他说:“中国除非力量不够,不能做到之事,力所能及,一定援助韩国达到独立之目的。这是中国一贯政策。总理在日,即是如此。中国以韩国独立为中国之责任,中国能独立,韩国亦可得到独立。”金九提出,美国不肯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请中国予以解释。蒋答:“慢慢可以好转,不必忧虑。”^⑤ 11月4日,蒋介石、宋美龄等举行茶会,欢送金九等人归国。蒋称:“朝鲜不能告成独立自由平等,无异中国不能告成独立自由平等”,“为东亚与世界之和平及东亚各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计,吾人必须首先使朝鲜告成独立与自

① 《总裁接见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记录》,《蒋总统接见韩领袖卷》,《中韩关系专档》(十六)。

② 《总裁指示》,《韩国临时政府人员返国卷》,《中韩关系专档》(十八)。

③ 《国民政府代电》,府参(二)字第273号,《韩国临时政府借款卷》,《中韩关系专档》(二十)。

④ 《国民政府代电》,府参(二)字第383号,《韩国临时政府借款卷》,《中韩关系专档》(二十)。

⑤ 《接见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谈话纪要》,《韩国临时政府人员返国卷》,《中韩关系专档》(十八)。

由,此为国民党对朝鲜唯一之原则”。^①次日,金九等 29 人乘机离渝,经上海返国。

12 月 5 日,蒋介石决定派邵毓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将衔代表赴韩,与美、苏军方联系,视察韩国实情,同时抚慰中国在韩侨胞。同日,蒋致函吴铁城:“在目前美苏两军分占朝鲜南北现状下,国际上我方除应与美方密切合作外,对于驻韩美、苏军事当局,自应同等联系,俾我在外交上可保持超越立场,作为美、苏桥梁,乃至运用两者关系一方,逐渐培养亲华分子,团结韩方各派。”^②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根据蒋介石指示,草拟了一份标有“极密”字样的《韩国问题之对策》,其中提出:“调和美、苏势力,以消除韩国南北两部之对立,而促进其统一。”又提出:“积极与美、苏、英洽商,确定《开罗宣言》中‘于相当时期使朝鲜独立’之‘相当时期’之明确标准,并在将来和会中或联合国会议中提出通过,以为将来促使美、苏军按时撤退之依据。”^③但是,12 月 27 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于 12 月 27 日在莫斯科会议,却决定将朝鲜置于美、英、苏、中四强的五年托管之下。这样,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所拟《对策》自然成为废案。同月 28 日、31 日,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先后发表声明,反对该项托管计划,中国政府未发表声明支持。当时世界的主宰者是美、苏两大国,中国虽跻身“四强”,但实际上是弱者。

韩国独立党、民族革命党、临时政府及相关人员在华期间,其经费均由中国供给。金九等人返国前后,在华韩侨 535 人准备同时返国,急需

① 潘公昭:《今日的韩国》,135~136 页,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47。

② 《国民政府代电》,府军(义)字第 979 号,《日本投降后韩国问题卷》,《中韩关系专档》(十九)。

③ 《日本投降后韩国问题卷》,《中韩关系专档》(十九)。

冬服、旅资及生活维持等诸项费用。12月28日,蒋介石致函吴铁城,批准发给国币3000万元作为资助。^①这是蒋介石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结 语

在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国国民党人中间,有三个关键人物:一是陈其美,他和韩国独立运动人士接触较早,是援韩事业的始创者,但因他1916年即被刺身亡,所做事情不多。二是孙中山,他不仅制订了援助弱小民族的原则,而且以南方护法政府首脑的身份和韩国临时政府的代表进行会谈,为国民党人与韩国独立运动人士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但是,孙中山当时自身处境困难,没有能力进行实际援助。三是蒋介石,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援韩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时间最长,贡献也最大。

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给予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道义等各个方面。在这些援助活动中,蒋介石比较注意尊重韩国独立流亡人士的民族感情,及时调整政策,保持友好关系;在国际舞台上,蒋介石首倡保证朝鲜战后独立,反对国际托管和南北分割,不谋求在该地区的民族私利。这些,都与当时主宰世界的大国强权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文为提交200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① 《国民政府代电》府交字第1486号,《韩国临时政府借款卷》,《中韩关系专档》(二十)。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1985年,美国人迈可·考尔斯(Gardner Milk Cowles)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题名《迈可回顾》(*Milk Looks Back*),其中写到,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访问重庆时,宋美龄曾与之有过“风流韵事”,蒋介石发觉后,气愤地率领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前往捉奸。由于考尔斯是威尔基当年访华时的随员,因此,上述情节很容易取信于人。1986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10月号转载了考尔斯的有关回忆。1995年,李敖、汪荣祖在其合著的《蒋介石评传》中加以引用,并作了详细的论证和分析。其后,李敖又单独署名,写作《宋美龄偷洋人养洋汉》、《蒋介石捉奸记》、《宋美龄和谁通奸》等文,陆续发表于《万岁评论丛书》、《真相丛书》、《乌鸦评论》、《李敖电子报》、《李敖大全集》等处。近年来,大陆出版的某些图书、刊物以及网站也都乐于传播此说,竞相宣扬。

如果是里巷儿女之间的偷情,并不值得重视,但是,事情发生在中美两个重要历史人物之间,又经过上述出版物的渲染,就不得不认真加以考察了。

考尔斯细致、生动的回忆

为了考察方便,并利于读者思考、判断,笔者不得不首先引述考尔斯的有关回忆。《迈可回顾》一书写道: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的哥哥的那栋现代化的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词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地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儿。”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四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已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足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八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九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可，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十一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的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考尔斯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里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和爱荷华州《狄盟市注册报》(*Des Moines Register*)记者，后来创办《展望》(*Look*)周刊。应该说，他的这段故事写得很细致、很生动，但是，这又是一个破绽百出，编造得非常荒唐、非常拙劣的故事。

威尔基在重庆的日程足证考尔斯“回忆”之谬

威尔基于10月2日由成都到达重庆，7日下午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其间行程般般可考。为了以确凿的证据揭露考尔斯所编“绯闻”的荒唐，笔者现依据当时重庆《大公报》的报道及相关档案，将威尔基与考尔斯在重庆的活动排列于下：

10月2日 威尔基等一行于下午3时46分，由成都抵达重庆。旋即驱车入城参观市容。6时许至旅邸休息。

10月3日上午9时起，在美国大使高斯陪同下，威尔基偕其随员考尔斯(当时翻译为高而思)、白纳斯、鲍培，陆续拜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秉常、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

10时40分，拜会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谈至11时15分。11时3刻威尔基、考尔斯、白纳斯、鲍培

赴国民政府，拜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2时，林森设宴招待威尔基。出席者有居正、于右任、孔祥熙、美国大使高斯、考尔斯、白纳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等。

下午3时半，威尔基参观中央训练团，发表演说，长达一小时余。

5时至6时，美国大使高斯假座重庆嘉陵宾馆举行茶会，招待威尔基，到孙科、于右任等中外来宾三百余人。6时许散会。

晚8时，蒋介石及宋美龄假军委会礼堂设宴欢迎威尔基。参加者有威尔基及其随员考尔斯、白纳斯、梅森少校、皮耳少校、美国大使高斯、史迪威将军、陈纳德司令、苏联大使潘友新、英国大使薛穆及澳、荷、捷克等国外交使节与夫人。中国方面参加者有宋庆龄、孔祥熙夫妇、孙科夫妇、居正、于右任、王宠惠、吴铁城、冯玉祥、何应钦等多人。

10月4日晨，威尔基由翁文灏陪同，参观重庆工厂。中午，翁在中央造纸厂设宴招待。下午，威尔基返城。

同日下午4时，宋美龄以美国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会长名义假外交部举行茶会，欢迎美国总统代表、美国援华会名誉会长威尔基。宋庆龄、孔祥熙、孙科、史迪威及威尔基随员考尔斯、白纳斯、皮耳海军少校、梅森陆军少校及中外记者百余人出席。威尔基首先参观儿童保育院及抗属工厂作品展览，宋美龄为之“一一加以说明”。参观后，茶会开始，由儿童保育院儿童表演歌舞及合唱。进茶点后，宋美龄致欢迎词，威尔基作答。6时散会。

晚，蒋介石与威尔基长谈3小时半，宋美龄任翻译。

10月5日上午9时，威尔基由顾毓琇陪同，参观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及南开中学。12时返城，参加教育部长陈立夫举行的宴会。下午，蒋介石、宋美龄继续与威尔基晤谈。同日，受到威尔基接见的还有史迪威、胡霖、张伯苓、周恩来等人。

10月6日上午9时,威尔基由俞大维陪同,参观兵工厂。

中午,何应钦在军委会设宴招待威尔基。午后4时,中美、中英、中苏、中法文化协会等18个团体在嘉陵宾馆举行联合茶会,欢迎威尔基一行。到美国大使高斯、苏联大使潘友新及王世杰、冯玉祥等三百余人,由吴铁城致欢迎词。

5时50分,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访问威尔基。

午后7时,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及中美文化协会主席的身份在重庆范庄私邸设宴招待威尔基,宋美龄、宋庆龄、孙科、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等及美国大使高斯、史迪威、陈纳德,威尔基的随员白纳斯、皮尔、梅森等一百余人参加。席设范庄草坪,所用为“新生活自助餐”。

10月7日晨,蒋介石、宋美龄共同接见威尔基,同进早餐。

9时,威尔基举行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并回答提问。

10时,威尔基由董显光陪同,参观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出面招待,导往各办公室参观。至11时结束。

下午4时半,由重庆飞抵西安。

综观上述日程,可见整个威尔基访渝期间,由蒋介石主持、宋美龄参加的欢迎宴会只有10月3日晚一次。这次,威尔基和考尔斯都参加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次宴会,而不是考尔斯回忆中所说的会后还需要回到宋宅补进“晚餐”的“招待会”。会后也不如考尔斯所述,客人们分散谈话,以致威尔基可以乘机和宋美龄相约,溜出去偷情。关于宴后情况,重庆《大公报》报道:宴毕,由中央广播电台表演国乐。“音乐节目进行时,威氏倾耳细听,极为注意。每一节目奏毕时,威氏即向蒋夫人询问甚久,蒋夫人则详加解释。”“全部音乐节目完毕,威氏即登

台参观乐器。各大使亦继其后。威氏对每一种乐器均详加研究,蒋夫人以极愉快之情逐予解说。蒋夫人并亲抚古琴以示威氏,威氏叹为观止。”“十时半许,一夕盛会尽欢而散。”这期间,有威尔基与宋美龄调情、相约、出溜的机会吗?

重要的是,威尔基来华前和宋美龄从未谋面,到重庆后,3日中午,和蒋氏夫妇仅有35分钟的谈话。晚宴时,威尔基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怎么可能迅速升温,达到互相默契、外出偷情的高热度呢?

人的记忆常常不很准确。是不是事情发生在其他日子,考尔斯的回忆发生部分误差了呢?也不是。

4日。这一天,宋美龄为威尔基举行欢迎茶会,考尔斯是到会者之一。有无可能,偷情发生在这一天晚上呢?然而,档案记载,当晚,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宋美龄任翻译。双方长谈三小时半,不可能发生威尔基要考尔斯掩护,自己和宋美龄开溜的事。

5日。根据档案记载,蒋介石、宋美龄与威尔基之间的谈话自下午五时十五分起至八时十五分止,地点在重庆九龙坡蒋介石官邸。谈话后,同至曾家岩进晚餐,饭后继续谈话,宋美龄始终在场,也不可能发生和威尔基共同开溜之事。^①

6日。孔祥熙在私邸草坪设宴欢迎威尔基。此次宴会取“自助餐”形式,有点儿像考尔斯回忆所述的“招待会”了,然而,这次宴会,蒋介石并未参加,考尔斯也未出席,自然,不可能产生威尔基要考尔斯打掩护,纠缠蒋介石以分散其注意力一类情节。据《大公报》报道,当日的情况是,孔祥熙致欢迎词。8时15分,威尔基致答词,其后即在范庄向中国全国发表演讲词。词毕,继续进餐。餐毕,放映电影。八时许,宴会结束。又据威尔基自述:晚饭吃过之后,他即受宋美龄之邀,一起入室,与

^① 《史料初编》,771页。

宋蔼龄“大聊特聊”，一起谈到晚上 11 点，然后是孔祥熙进来，加入“龙门阵”。这是威尔基等在重庆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威尔基等就离开了。

可见，在威尔基停留在重庆的六天中，不可能发生考尔斯“回忆”所述的一类情节。

此外，现存的蒋介石和威尔基之间的谈话记录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根据蒋介石本人的统计，他和威尔基的谈话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之多，分别之前，蒋并友好地向威尔基表示，将来旅顺、大连可由中美共同使用。这种情况也表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隔阂。

考尔斯“回忆”的其他明显破绽

考尔斯的“回忆”还有其他不少明显的破绽。

第一，蒋介石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来宾众多，蒋介石要一一会见、寒暄的高贵来宾也很多。考尔斯只是威尔基的一介随员，怎么可能用“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缠住蒋介石达“一小时”之久？

第二，蒋介石仅仅在“招待会”上一时不见了威尔基与宋美龄，何以就轻率地断定二人出外偷情，以至于“盛怒狂奔”，率领持枪卫兵冲进威尔基住地，亲自搜查？蒋介石手下特务无数，要了解威、宋何在，何须亲自操劳？此类事情，越秘密越好，蒋介石带着卫兵，当着考尔斯的面搜查，一旦果有其事，当场提出，一个是罗斯福的特使，一个是自己的夫人，蒋介石将何以善其后？

第三，蒋介石身为军事委员长，又在盛怒中，怎么可能先向考尔斯“一鞠躬”？

第四,威尔基是美国共和党的领袖,罗斯福的特使,考尔斯怎么可能谩骂他:“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第五,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出访美国是件大事,中美双方都需要做很多准备,签证也需要时间,威尔基预定10月9日离华,怎么可能邀请宋美龄“同返华盛顿”?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自然懂得她的出访并非小事,数日之内不可能仓促启程,怎么可能在听说不能与威尔基同行之后,就用“长指甲”朝考尔斯的面颊“使劲地抓下去”?

第六,考尔斯对威尔基说:“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的关于他们的流言蜚语了。”威尔基在重庆停留的时日不过6天,即使威、宋之间有什么“风流韵事”,报业何从知晓?传播何能如此之快?如此之“足够多”?

以上六条,条条足以证明,考尔斯的“回忆”是编造的,而且编造得极为拙劣、低下。

宋美龄访美并非肇因于威尔基

威尔基于1942年10月14日回到美国。同年11月26日,宋美龄相继抵达,开始了对美国长达7个多月的访问。此事是否肇因于威尔基呢?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档案记载,邀请宋美龄访美的是罗斯福总统夫妇,1942年8月22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他本人及夫人都非常盼望“蒋夫人能即来敝国”。9月16日,罗斯福夫妇再次致电蒋介石,重申这一邀请。这两次邀请都在威尔基访华之前,可见,宋美龄访美,既非肇因于威尔基,也不需要依赖威尔基的力量。

威尔基确曾积极推动宋美龄访美。根据威尔基的回忆《天下一家》(One World)等资料可知,10月5日,威尔基在和宋美龄的谈话中,曾建议宋美龄去美作亲善访问。10月6日晚,威尔基在和孔祥熙谈话时,又说明其理由是,美国人亟需了解亚洲与中国,中国方面有头脑以及有道德力量的人,应该帮助教育美国人。蒋夫人将是最完美的大使,她有极大的能力,会在美国产生极为有效的影响力。他说:凭借蒋夫人的“机智、魔力、一颗大度而体贴的心、高雅美丽的举止与外表,以及炽烈的信念,她正是我们需要的访客”。威尔基回美后,还曾向罗斯福转达过宋美龄希望访美的口信。但是,威尔基的这些举动,都是在执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和指示。在很长时期内,美国采取孤立主义政策,漠视中国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战。威尔基反对日本侵华,对中国友好,积极主张援助中国抗日。在这些方面,他和罗斯福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宋美龄访美,一是为了向美国人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援,二是为了治病。

抗战爆发后,宋美龄即积极投身对外宣传,特别是对美宣传。她积极利用报纸、杂志、广播、接见外国记者等多种形式,宣传中国抗战。她的宣传受到美国舆论的重视和高度评价。1942年秋,中国抗战还处于艰难时期,自然有进一步争取美国支援的必要。

同时,这一时期,宋美龄的健康状况恶化也迫使她下决心赴美治疗,抗战初期,宋美龄到淞沪前线劳军,突遇日机空袭,宋美龄的座车在匆忙躲闪中倾覆,宋美龄不幸受伤。自此,宋美龄即长期多病。1942年10月下旬,宋美龄的身体状况日差,蒋介石担心宋患有癌症,决定命宋赴美治疗。同月27日,蒋介石日记云:“妻子体弱时病,而未能发现病因,甚忧。”29日日记云:“妻子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30日日记云:“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

可见,宋美龄访美也与她和威尔基之间的所谓“私情”完全无关。

这一阶段，蒋介石、宋美龄之间并无感情危机

如果宋美龄和威尔基之间确有“风流韵事”，蒋介石又曾“发怒狂奔”，率兵搜查，那么，他们二人之间一定会发生感情危机，但是，现存蒋介石日记（未刊）却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宋美龄访美启程前，蒋介石依依不舍，愁肠百结。如：

11月2日日记云：“今日为妻将赴美，此心甚抑郁，不知此生尚能有几年同住耶？惟默祝上帝保佑而已。”

11月17日日记云：“本日夫妻尤依依不舍，甚以明日将别为忧。惟妻此次赴美，余以关于中美合作、国际与太平洋集体安全等方案交付，敬祝吾妻之能达成使命也。”

11月18日日记云：“本晨五时醒后不能安眠，默祷吾妻此行平安与成功。九时，送妻至九龙坡机场，同上机，送至新津大机场。十二时，送妻登机，见其机大，乘坐必平稳，此心稍安。别时妻不忍正目仰视，别后更觉黯然销魂之情景，心甚悲怆。惟祝上帝赐予生育子女，以补吾妻平生之不足也。”

宋美龄启程后，蒋介石备感惆怅，于11月19日作诗云：“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惆怅不寐苦夫肠。”

宋美龄抵美后，蒋介石仍然思念不已。如：

11月29日日记云：“妻于十八日赴美，临别凄怆，儿女情长，

今又获一次经验也。”

11月28日日记云：“妻于二十六日平安飞到美国，并据医者检查，决无癌症，此心甚慰。”

12月1日日记云：“本日为余夫妇结婚十五周年纪念日，晨起，先谢上帝保佑与扶掖成全之恩德，晚，往孔姨宅举葡萄酒恭祝余妻康健。”

12月31日日记云：“惟以妻在美不能共同团圆为念。”

1943年2月4日日记云：“今日为旧历除夕，孤身独影，萧条寂寞，念吾妻与两儿不见。”

类似的记载还很多。如果宋美龄与威尔基有私情，蒋介石又确有所觉，他能写得出上述日记吗？

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有过两三次感情危机。例如，1940年10月，宋美龄赴香港养病，曾长期拒绝回渝。次年2月4日，蒋介石日记云：“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之。淡泊宁静，毫无所动。”这段日记表明，蒋宋之间发生了某种矛盾（关于此，笔者将另文分析）。而蒋在宋美龄赴美前后的日记表明，二人之间当时不存在任何隔阂。

考尔斯“回忆”的由来与宋美龄 在美国所打“诽谤官司”

考尔斯并非威、宋“绯闻”的始作俑者。早在1974年，美国人艾贝尔(Tyler Abell)整理的其父皮尔逊日记(*Drew Pearson Dia-*

ries)的上册中就有记载。该书谈到,威尔基以罗斯福总统特使名义访问重庆时,与蒋夫人有染,蒋委员长盛怒之下,带60名宪兵到南岸官邸去捉奸,并无所获。威尔基临行去向蒋夫人辞行,闭门一小时二十分钟才出来。等等。考尔斯所述正是皮尔逊日记有关说法的细致化。

皮尔逊是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其人文品不佳,专门挖人隐私,曾被罗斯福斥为“习惯造谣的人”。威尔基访华期间他并不在重庆,更与威尔基没有密切关系。其日记始于1949年,止于1959年,所述宋、威之间的风流韵事见于1957年6月13日日记,完全是事隔多年的道听途说,本无多大价值。然而,由于其事具有“商业价值”,所以日记出版后,迅速受到注意,被美国的每月书会列为重点推荐对象。该会当月的书讯在介绍该日记时不仅刊出威尔基与宋美龄的并列照片,而且下题“匆匆的结合”(a hasty liaison)。事为台湾驻纽约新闻处主任陆以正发现,上报台湾新闻局,新闻局不敢再继续上报,但宋美龄已读到了一位好事的美国老太太寄来的书讯,大为震怒,指令陆以正在美国《纽约时报》等十大报纸刊登全页广告辟谣。陆以正经过反复考虑,并经宋美龄同意,先向该书的出版公司交涉,要求更正,遭到拒绝。其后,陆以正即收集证据、证词,代表宋美龄向纽约州最高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出版公司与艾贝尔赔偿宋美龄的名誉损失三百万美元。经过一年多的谈判磋商,出版商最终接受三项条件:一、公开道歉;二、承诺在本书重版时,将诽谤的文字删除;三、律师费由双方各自负担,被告方赔偿起诉方诉状费、送达费、存证信函费等共七百多美元。此三项条件经宋美龄批准。

后来,《皮尔逊日记》上册再未重印,中、下两册则胎死腹中,永未出版。

以上情况,具见陆以正所著《微臣无力可回天》一书,台北天下文化书坊2002年4月出版,兹不赘述。

考尔斯反复无常

据说,按英美制度,提出诽谤诉讼,原告如为公众人物,有责任提出对方诽谤不能成立的证据。陆以正代表宋美龄控告皮尔逊日记的出版者及编者,就必须设法证明该书所述纯属子虚。

在找寻证据的过程中,陆以正找到了考尔斯(陆书译作柯尔斯)。其情况,陆书写道:

我去见柯尔斯,他没想到事隔三十年,还有人记得他曾在战时到过重庆,相谈甚欢。我问他《皮尔逊日记》所提的故事是否正确,他大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绝对没有!”我说可否请他给我一封信,以当年陪伴威尔基访华记者的身份,说明绝无此事。他马上唤女秘书进来,口授了一封信,签名交给了我。这样豪爽的个性,至今令我难忘。

陆以正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大概也一直没有发现,当年这位保证“绝对没有”此事的“证人”十一年后又又在“回忆”中,以当事人的身份,活灵活現地描述了本文一开始引述的那段“风流韵事”。

怎样理解考尔斯的反复无常呢?看来,只能用“商业价值”来解释了。为了吸引读者,考尔斯在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时,终于觉得那段“八卦新闻”还是很有用。不仅如此,到了1996年,考尔斯的老婆芙洛尔·考尔斯在写作《交友录》(*She made friends and kept them*)时还觉得“有用”,再次照抄丈夫的谎言。他们的共同想法大概是,即使再为台湾

方面发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皮尔逊日记》的官司不是七百多美元就了结了吗?

原载(台北)《传记文学》,2003年5月号,此据《百年潮》2003年第10期收录。



关怀张学良全家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二

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的日子里，宋子文曾经给了张学良全家以关怀。这一方面，美国胡佛研究所所藏宋子文档案也有反映。

1941年夏，张学良患急性盲肠炎转为腹膜炎，不得已开刀割治。7月11日，戴笠致电时在美国的宋子文报告。12日，宋子文复电云：

汉卿割治经过良好，甚慰。务请逐日电示病情，并祈饬属慎护为祷！

同日，宋子文又致电张学良慰问，电云：

顷闻兄患盲肠炎，割治经过良好，稍慰悬念。尚祈格外珍卫。已请雨农逐日电告尊况。嫂夫人安吉勿念。

雨农，指戴笠；嫂夫人，指于凤至。张学良被囚后，即由于凤至相伴，流转各地。1940年，于凤至积郁成疾，患乳癌赴美就医，得到宋子文的关照。电末，宋子文并称：“未敢通知嫂夫人，恐焦念过度，有碍健康。”这一段文字在发报前被宋子文删去，当系担心张学良反过来忧虑于凤至的健康之故。

宋子文和戴笠之间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他要戴笠“逐日电示病情”，戴笠不敢怠慢，17日于贵阳复电云：

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变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

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晚笠。筱。贵阳叩。

不知道是由于医疗条件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张学良的病并未如戴笠所称迅速“平复”，而是又恶化起来，不得不第二次开刀。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宋子文电云：

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这一病，沥沥拉拉，拖了好几个月。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戴笠电云：

汉兄病况，盼示。

从这短短几字中，不难看出宋子文自始至终对张的关怀。

在张学良患病期间，他的长子张闾珣在伦敦得了精神病。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驻英大使顾维钧云：

汉卿长公子马丁，入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问病状，可送美否？请示复。

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

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机任务，可专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洽，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未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凤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张娴瑛商量后,决定对于凤至保密。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云:

汉卿长子,入伦敦神经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何如?请兄将此事,先告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瞽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示复。

宋子文既要关心被囚禁的张学良,又要关心身患重症的于凤至,可谓用心良苦。

同年12月4日,张娴瑛结婚,宋子文于3日致电戴笠,要他转告张学良,电云:

汉卿女公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

在张学良寂寞的囚禁生活里,这大概是一丝安慰吧!

在宋子文档案里,还有一通电报:

张汉卿兄:尊夫人胸痛,今日开刀割治,经过极好,知注特闻。

本电字数不多,但同样表现出宋子文对张学良夫妇的情谊。

原载《团结报》,1992年3月14日

宋子文与戴笠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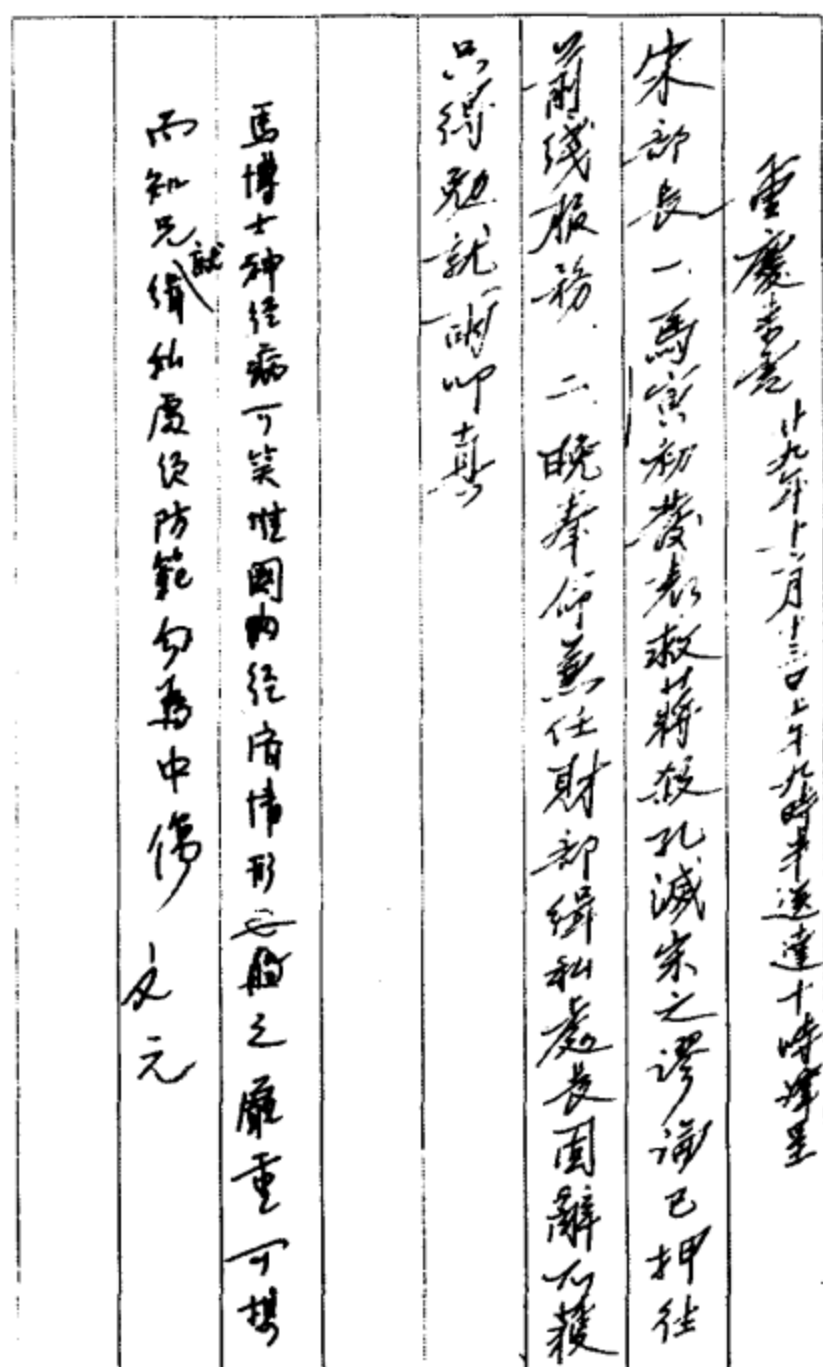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三

宋子文和戴笠关系密切，戴笠筹建中美合作所时，许多器材都是通过宋子文在美国购买的。这一方面，宋子文档案中有许多资料。我在美期间因时间关系未能一一收集。这里介绍的是反映宋、戴关系的另外几通电报。其一为：

宋部长：一、马寅初发表救蒋杀孔灭宋之谬论，已押往前线服务。
二、晚奉命兼任财部缉私处长。固辞不获，只得勉就。雨叩。真。

此电发于1940年12月11日。字数虽不多，但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抗战期间，马寅初在重庆大学担任商学院院长，多次抨击官僚资本。1940年5月29日，马寅初在重庆社交会礼堂发表演讲，指斥“拥有大量资产的达官们”，“大囤其货，大发其国难财”。他要求征收发国难财者的财产税。事后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责问说：“你知道马寅初在外面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蒋表示，要同马寅初谈谈。同年11月10日，马寅初应黄炎培之邀，在重庆实验剧院再次发表演讲，要求豪门权贵拿出钱来支援抗战，他说：“有人说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是照我看，只能说是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家族亲戚，危害国家民族啊！”11月24日，他第三次发表演讲，重申“请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的要求。戴笠电所称“救蒋杀孔灭宋之谬论”，当指上述演讲。12月6日，马寅初正在



宋子文戴笠往来电报(采自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用早餐的时候，被宪兵以最高当局请去谈话为名逮捕，旋即声称“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情况”，将马寅初押送贵州息峰集中营监禁，戴电所称“押往前线服务”云云，指此。

为了平息舆论对豪门权贵的不满，蒋介石于逮捕马寅初的前后，下令在财政部成立缉私处，以戴笠兼任处长。戴笠和宋子文关系密切，自然要向宋报告这一任命。

宋子文接电后，于12月13日复电云：

马博士神经病可笑，惟国内经济情形之严重可想而知。兄就缉私处，须防范，勿为中伤。

宋子文虽然受到马寅初的抨击，但当时主持行政院和财政部工作的是孔祥熙，因此，对马寅初，只淡淡地说了句“神经病可笑”，而对国内经济情况则表示了忧虑。戴笠不为孔祥熙所喜，在选择缉私处处长时，孔祥熙意在杨虎，任命戴笠完全是蒋介石的决定，因此，宋子文又叮嘱戴笠：“须防范，勿为中伤。”防范谁呢？自然是孔祥熙。

宋子文档案中，还有一通戴笠的电报，文云：

即面呈宋部长赐鉴：梗电奉悉。（一）晚意公有回国必要，惟公返国后对美种种交涉，似有一资望能力均优之大员能代公负责为妥。（二）吾驻美大使易胡为魏，国内各方感想不佳，美国旅华人士闻亦有不满意，乞公注意及之。（三）在此抗战时期，外交部工作实甚重要。日俄恐不免一战。苏对我最近表示颇好，惟英方为印度对我感想不佳。领袖对派驻（代理？）事，实难兼顾。（四）国内经济问题日行严重，领袖对民生必需品有管理决心，对公务人员与军警生活问题图定量分配。惟在行政院部长以上诸公对领袖之政策，大都无实行决心。（五）上陈诸问题均与公此行有关，晚亦甚望公能于此时回国一行也。谨电密陈。

此电发于1942年9月24日。戴笠通过本电向宋子文汇报了多方面的问题，可见戴对宋的忠诚，也可见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了英、美的盟国。宋子文因对美交涉有功，于同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但是，由于对美交涉繁重，宋子文仍停留美国，直到收到了戴笠的这通电报后，才毅然束装归国，于

此也可见宋对戴的信任。

此外，宋子文档案中还有几通电报。1943年4月20日致贝淞荪电云：

谏电悉。雨农商借国币两百万元，可照办。

9月10日再致贝淞荪电云：

青电悉。雨农兄经济困难，希询需银若干，即照数接济，毋须先期电告。弟返渝仍住怡园。

贝淞荪，即贝祖诒，中国银行副经理。1943年2月，宋子文再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此后，又访问加拿大、英国。此二电均发于国外。短短的几个月内，戴笠两次向宋子文告贷，宋子文均慷慨解囊，“希询需银若干，即照数接济”云云，简直慷慨得令人吃惊。如果不是关系特殊，决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原载《团结报》，1992年6月20日



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四

宋子文档案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大部分重要且机密度较高者目前尚不开放，我所读到的只是已开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获不小。

钱昌照先生解放前曾长期在资源委员会工作，和宋子文关系密切。他曾在回忆录中谈到，宋和孔祥熙一向不和，钩心斗角，但其具体情况，却谈得很少，使人颇感不足。我在宋子文档案中，发现了部分电稿，生动地反映出宋、孔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两家豪门之间的争斗。

1941年1月3日宋子文致钱昌照电云：

此间各项借款十日内可办妥，飞机事亦有相当成功，此后是否留美继续工作，或赴英办理借款，抑回国，正须考虑。以弟观察，介公仍被孔等愚弄，回国亦无意义，即平准委员会弟亦不拟参加，一切听委座及孔等决定。

宋子文自1928年起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和上海大银行家、商界人士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仅次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显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满蒋介石的猛增军费，滥发公债，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愤而辞去职务，蒋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自此，孔日益得到蒋的信任，

宋、孔之间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开。1940年6月，蒋介石为争取美援，派宋子文以私人代表身份赴美谈判。本电发于美国。它告诉钱昌照，争取美援事已有相当成功，征询钱对于他今后去留行止的意见。电中所云“介公仍被孔等愚弄”等语，反映出对孔祥熙的强烈不满。

1月6日，钱昌照复电宋子文云：

弟与孟余先生均认为最近国际政治中心在华盛顿，有暂时留美的必要，中、英、美远东合作及派遣专家等事，在华盛顿接洽较为方便。国内政局尚未至明朗化，除非介公电催速回，届时加以考虑外，似不必遽作归计。

钱昌照和顾孟余商量的结果是，宋应该暂时留美，其理由一是华盛顿地位重要，便于开展外交活动，一是“国内政局尚未至明朗化”，这是句潜台词丰富、耐人寻味的话。

宋子文辞职后，除挂名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外，没有其他官职，主要从事金融、企业活动，但他仍然渴望涉足政坛。然而，当蒋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时候，他的进身之途是不会畅通的。前电所云“回国亦无意义”，即是此意；本电所云“国内政局尚未至明朗化”，亦与此有关，说得直白一点，那就是孔祥熙尚无下台迹象也。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后，一直官运亨通。除了财政部长一职稳如磐石外，行政院副院长、代理行政院长、行政院长等位置轮流交替。这时，他正官居副院长，成为院长蒋介石的副手。但是，孔祥熙政声不佳，国民党中央也有一部分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2月12日，张冲致电宋子文云：

(一)俄方对新四军事变初甚关心，因恐引起内乱。(二)俄方已派一新总顾问到渝，前总顾问回国，与事变无关。(三)叶剑英回

陕调整,尚未返;周恩来在此,钧座可电其努力斡旋。(四)俄方飞机、军火已半数到华,余在运输中。下月开全会,钧座能回国否?

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秘密谈判,又曾以考察苏联实业团副团长名义赴苏,争取苏援。全会,指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本电中,张冲只是一般地询问宋子文是否返国出席全会,下一通电报就说得很明白了。3月23日电云:

中共以中央未采纳共党十二条办法,暂不出席中央所召集一切会议,但周恩来与委座间仍直接商洽调整,大体安静。八中全会或提付讨论。钧座如出面赞襄委座,则此事易得一解决之道。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队突袭北撤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1日,周恩来向张冲提出抗议。20日,中共提出十二条解决办法。28日,中共中央向张冲再次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3月1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张冲维护国共合作,希望与共产党关系较好的宋子文能“出面赞襄”蒋介石,主持政务,缓解国共合作危机。“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云,反映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拥宋派的呼声。

对宋子文属望甚殷,孔祥熙的位置就难以坐稳了。4月6日,古达程致宋子文电云:

顷见孔夫人致蒋夫人函,坚决反对俞鸿钧调任外次,并拟请委座任钧座为驻美大使。

俞鸿钧，广东新会人，曾任上海市市长，时任中央信托局理事。在宋氏家族中，宋蔼龄并非党国要人，但经常操纵金融，干涉政务，不但孔祥熙唯命是从，宋美龄也常听命于她，本电即说明了她的干政的情况及其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宋蔼龄任命宋子文为驻美大使的建议，颇有文章。4月7日，宋子文复电古达程云：

孔夫人又拟支配政治，甚为明显。委座对弟究竟如何？应否回国，以免被迫为大使？再，光甫有何新活动？均盼密告。

古達程

孔夫人又擬支配政治甚明
委座對弟究竟如何
應否回國以免被迫為大使
再光甫有何新活動均盼密告

宋子文

4月7日

宋子文电稿手迹(采自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光甫,指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抗战期间,曾被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签订桐油借款、滇锡借款、钨矿借款等协定。宋子文此电称:“孔夫人又拟支配政治”,可见前此此类情况已不止一桩。在封建社会里,臣下要经常研究皇帝的情绪和意向,以便“仰体圣意”;宋子文志在掌握中枢,不愿屈就驻美大使一职,但他的升沉荣衰,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因此,必须研究“委座对弟究竟如何”。

在复电古达程的同时,宋子文又致电钱昌照云:

微电敬悉。古达程鱼电可索阅。各方对孔不满。孔有无放弃财部,交光甫代理意?再弟已请高斯来渝时与兄详谈。

高斯(C. E. Gauss),美国外交官。曾先后在上海、天津、济南、厦门等地任领事、总领事等职。宋子文要倒孔,必须扳倒他的财政部长一职,故此电询问“孔有无放弃财部意”。当时,美国政府已决定派高斯出任驻华大使。宋子文要求高斯与钱昌照详谈,可能亦与此有关。

钱昌照很快就回答了宋子文的问题。4月10日电云:

就弟所知,孔无放弃财部意。各方对孔不满由来已久,但介公迄无决心根本改组政府耳。孔夫人建议任先生为美大使显有作用,其目的当在巩固孔之地位也。承介绍高斯,至感,来华后当随时与之洽谈。

在国民党政权中,孔、宋都是理财干将,但宋子文办事讲究手续,蒋开条子向财政部要钱,他要问一问做什么用,有时就不买账,而孔祥熙则绝不问长问短,要钱就给。因此,宋、蒋之间常有矛盾,宋子文曾发牢骚说:“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狗。”而孔、蒋之间,则比较和谐。尽管

“各方对孔不满”，但孔仍可以在行政院和财政部的宝座上继续坐下去。不过，尽管孔得到蒋的信用，但对宋仍有很强的戒备心理。此电揭示了宋蔼龄建议宋子文出任驻美大使的目的在于“巩固孔之地位”，正是这种戒备心理的表现——将宋子文“外放”，孔在国内不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吗？

古达程也很快就回答了宋子文的问题。4月10日电云：

委座对钧座现极信赖。惟孔在参政员及全会各中委前竭力攻击钧座，幸各人咸知孔之为人，多不直其所为。八中全会钧座未回国，在美任务若未终了，此时似不宜回。是否有当，尚乞钧裁！光甫尚未闻有新活动，敬复。

国民参政会是重要的舆论、咨询机构，国民党中央全会则是当时最高的权力机构，孔祥熙在这两个会议的参加者面前“竭力攻击”宋子文，显然非同小可。宋子文接到上项电报后，自然极为关心，立即电询古达程：

孔在参政会及大会之言词，尚盼详告。

4月12日，古达程复电云：

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方援我不能彻底云云。

棉麦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和小麦。平准基金，指

1941年4月宋子文与美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及借款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英国贷款500万英镑以帮助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的稳定。对这两项谈判及合同中的不当之处，自然可以批评，问题是批评的时机和目的。

4月25日，平准基金借款合同正式签字，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云：

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施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本日起对维持法币问题，悉听财政部措置，文未便再参末议矣！

这里说的“有人”，正是指的孔祥熙。面对孔咄咄逼人的进攻，宋不得不回敬一拳。不过，考虑到孔祥熙“圣眷正隆”，宋子文不愿明言。电中，宋子文表示不愿对维持法币问题发表意见，“悉听财政部措置”，含蓄而委婉地暗示了他和孔祥熙之间的矛盾。

6月初，国民政府内定俞鸿钧任财政部次长。同月3日，宋子文致电古达程云：

兄前电称孔夫人反对俞鸿钧任外次，今俞忽任财次，究竟内幕如何？

6月5日，古达程复电云：

俞鸿钧在信托局极得孔夫人赏识。反对俞任外次，恐他人夺其干部；极力荐为财次，以便充分利用。该项命令于孔夫人抵渝之翌日，即行发表，并以奉闻。

信托局当时在香港办公,其主要任务是向外国购买军火,它是孔氏家族聚敛财富的重要渠道,由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出面主持,俞鸿钧则是重要干将。本电说明宋蔼龄对信托局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了她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让俞鸿钧当“外次”,俞就不能当;推荐俞当“财次”,俞就一定当得上;而且任命状还必须在宋蔼龄自港飞重庆的第二天发表。宋蔼龄的力量,可谓大矣哉!

宋子文倒孔,不便亲自出马。6月15日,钱昌照致宋子文电云:

李石曾先生抵渝,弟已将一年来政治内幕详告,并共同斟酌晤蒋时应持之态度。

李石曾是国民党元老,他是有资格对蒋介石进言的,19日,李石曾电告宋子文云:

介公两次晤谈,函件已交,尚无机会及于具体问题,惟曾一再约弟往住黄山,俾利静谈,彼时或为较好之机会。

黄山,指当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李石曾虽是元老,但他也不敢造次,而要等待“较好之机会”,然而,宋子文却没有信心了。23日,他复电李石曾称:

最近孔在重庆,爪牙密布,几有清一色之势。今春大会,有人建议改组政府,介公谓君等以某某贪婪,故有此举,然代之者其为争夺政权,亦可想而知云云。意似指弟而言,领袖之不谅如此,益增悚愧。但我辈一本赤忱,为民族、为国家,只有不顾一切,努力尽我个人之职责。介公处兹环境,先生前电黄山谈话,恐难有彻底之效果耳!

今春大会,指五届八中全会,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建议改组政府”。王世杰日记就记载,3月21日,张群自成都来,和他商量“改组政府事”,要求在全会后更动财政部等部人选。张群并表示,将向蒋介石面述。然而由于蒋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杰4月3日日记又云:“此次全会,外间切望财政部长人选有更动,会毕,竟无更动征象,外间不免失望。”此电表明,宋子文也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蔼龄建议任宋为驻美大使,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国民党中委面前“竭力攻击”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

在孔、宋矛盾中,钱昌照支持宋子文,因此,经常向宋提供国内情报。8月4日电云:

孔谓先生气量狭小,又谓在外接洽,碎屑零星,光甫谓上两次桐、锡借款成功,全靠彼与摩根索私人关系,此次先生在外接洽,希望极小云云。

摩根索,美国财政部长。抗战期间,蒋介石盼望美援心切,派宋子文赴美,说明他对此的重视,孔祥熙一再贬抑,说穿了,无非是怕宋子文的名声盖住自己,动摇宝座罢了。

对于孔祥熙的飞短流长,宋子文自然极为恼火。当年8月,中国银行副经理贝祖诒企图赴美,想通过宋子文斡旋。28日,宋子文复电云:

孔对弟嫉视有增无减,是以兄来美之议,以另筹善策,托他人提出较妥。

1942年3月16日,宋子文再电宋汉章、贝祖诒云:

孔对行及本人，蓄意摧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人虎头蛇尾，两兄不必过虑。但我行内部，如有侵害社会、自私自利之徒，亟当不待外间指摘，随时自行察办。所谓西北助长囤积，本行在该区共放款若干？西北货栈案，油饼厂及豫丰等事，内容如何？希即详细电告，交光华加码密转，以便检讨，决定今后方针。请告外间，本行港沪损失奇大，决非意欲以零星剥削抵偿也。至于总处统筹管理，严加督导，乃我辈寻常应办之事，即请特别注意。

宋汉章，中国银行总经理。光华，指倪光华，宋子文在国内的机要发报员。中国银行原来实际为张嘉璈所有，1935年宋子文出任该行董事长，掌握该行及附属企业豫丰纱厂等大权。他联合交通银行、商业银行等，执金融界牛耳，随时计划取孔而代之，而孔祥熙则力图加强中央银行的地位，削弱中国银行的地位和影响。从本电可以看出，孔祥熙抓住中国银行及其附属企业业务中的一些问题，企图搞垮中国银行及宋子文本人。“蓄意摧残，已非一朝一夕”云云，说明孔、宋之间长期倾轧，已经成了冤家对头了。

孔、宋之间的争斗持续很久。钱昌照 1943 年 3 月 25 日电宋子文云：

粮食会议无特别重要性。孔荐郭任首席，似可不与之争，惟以后如有重要会议，则必须力争。为国家前途着想，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

粮食会议，当指世界粮农会议；郭当指郭秉文，江苏江浦人，曾任财政部次长。此电表现出孔、宋之间权力角逐的炽热。“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很有点准备决战的架势了。

果然,到了1944年初,马寅初带头发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发国难财,CC系、政学系等继起,一时反孔之声甚高。12月,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代行政院长。1945年5月,行政院改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长。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之间的权力争斗以宋子文的胜利告终。不过,应该说明的是,这次蒋介石之所以决心抛弃孔祥熙,起用宋子文,除了国内反孔势力的活动外,很重要的原因还是美国人罗斯福说了话。否则,蒋介石大概还是下不了决心的。

原载《团结报》,1992年3月11日



排挤驻美大使胡适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五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急需美援。1938年9月，蒋介石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企图借他的名声开拓对美外交。1940年6月，蒋介石又任命宋子文为驻美私人代表，负责争取美援。初时，二人合作尚好，但不久，宋子文对胡适的不满就逐渐增多。他多方运动，力图免掉胡适的驻美大使一职。

1940年10月14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

欲得美国之援助，必须万分努力，万分忍耐，决非高谈空论所能获效。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俾得协助并进。否则，弟个人虽竭其绵力，恐不能尽如钧座之期，弟所以提议植之，即为此耳。

植之，指施肇基，浙江杭州人。曾一度使英，三度使美，出席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又曾做过外交部总长、外交部部长等职，是有名的职业外交官。从电文看，宋子文此前已经向蒋介石提过以施代胡的建议，此电不过进一步申说理由。“决非高谈空论所能获效”云云，显指胡适而言。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经常发表演说和讲话，比较注意争取美国公众和舆论的支持，这当然是宋子文所看不上的。

宋子文的习惯和特长是和上层人物交往、谈判。12月3日，他致钱昌照电云：

进出口银行部分，五千万以矿产偿还，详细条件尚在磋商中。适之和蔼可亲，惟实际上不能发生助力。

胡适是学者，讨论借款的“详细条件”之类自非所长，不过，宋子文不满胡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1941年1月3日，宋子文再致钱昌照电云：

惟胡大使非但不能为助，且恐暗中冷淡，诸事均唱独角戏。

在孔祥熙、宋子文二人中，胡适对孔祥熙印象不错，宋子文担心胡适助孔，因此对胡有戒心。“暗中冷淡”云云，怕胡适在宋子文的对美谈判中暗中掣肘之谓也。

钱昌照同意宋子文对胡适的看法，曾在1月6日复电中表示：

适之能力薄弱，弟等早已料到不能为助也。

不过胡适自有胡适的优势，在蒋介石周围也有些人出头为胡适说话，因此，蒋介石没有采纳宋子文的建议。其后，宋子文便改取迂回战术。

他先是聘请施肇基到美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处理美国援华物资。同时，通过钱昌照，动员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出面进言，1941年6月16日李石曾、钱昌照致宋子文电云：

关于更动大使事，弟等观察最近政治环境，认为更动适之一点或可不成问题，但如率直的提出植之，恐不易立刻得到介公同意。盖因介公一向对植之感想平平，而离华前未能来渝一行亦稍感不快也。弟等磋商结果，此事似可以下列方式之一与介公接洽。（一）由瀛向介公婉达先生意旨，希望植之能担任驻美大使，俾一切

得顺利进行。一则由于植之已在赴美途中，二则由于植之与美朝野甚为熟悉也。（二）皆不提出植之，仅由瀛暗示介公，新派之驻美大使必须与先生绝对合作，故其人选最好与先生一商。以上两种方式，究以何者为宜，请即电复。

尽管施肇基多年从事外交，使美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但蒋介石对之“感想平平”，而且赴美前居然不到重庆向蒋介石请训，因此，李石曾对向蒋介石进言就很踌躇了。

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宋子文敏感地意识到，在美的外交任务愈益加重。25日，致电李石曾云：

（一）苏德已决裂，美参战期又更迫，此间外交异常活跃，实为我国之最好活动机会。（二）我国处兹环境，应有得力之外交使节驻美，与弟彻底合作，始可完成委座之使命。（三）适之外交工作情形，前请先生详陈委座，想已洞悉。（四）苏德宣战，嗣后中、英、苏俱在军货贷借案内要求协助，粥少僧多，竞争在所不免，弟非有得力之外交上协助，不能有满意之效果。（五）前奉委座东电，谓高斯奉其国务卿命，对委座表示，以后与其政府有关各电，皆请用正式手续云云。弟在此情形之下，更非有外交上彻底合作无能为力。再四思维，为国家前途计，实以植之兄任驻美大使为宜，盼即向委座婉陈为祷。

宋子文也有自己的难处：他是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在美活动的，然而美国人不吃这一套，通过其驻华大使表示，“请用正式手续”，他又不愿与胡适合作，因此，只有再次要求任命施肇基为驻美大使。

鉴于李石曾6月16日电所表现的犹疑态度，7月5日，宋子文再

电李石曾：

时局变幻万端，紧张日甚，我国在美外交亟待调整，务乞催促委座早日裁定，俾利进行，毋任企盼！再此事不必与复初商洽。

复初，指郭泰祺，湖北广济人，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要李石曾绕过外交部，直接催促蒋介石。其间，蒋介石曾多次电令宋子文，直接和罗斯福会谈。7月6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再次提出以施代胡问题。7日，又一次致电李石曾：

日昨介公迭电，囑向总统直接商办外交重要事项，因此提出植之事更为迫切。昨已电陈介公，请索阅原电。文完全为工作着想，个人固无所要求。办理特别外交，必须予我便利。万一不蒙谅允，只可株守本职，循分尽心而已。

蒋介石架不住宋子文的多次要求，同意以施代胡。7月12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仰蒙俯允，尤感荅筹。”他要求迅速发表明令：

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责，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

在以施代胡问题上，宋子文要李石曾不必与郭泰祺商量是有考虑的，果然，郭泰祺不赞成宋子文的意见，在蒋介石面前力谏，于是蒋介石收回成命，以施代胡之议再次搁置。8月22日，宋子文致电钱昌照云：

兄见甚为赞同，弟前请介公予我以政治上名义；又退一步，请

任植之为驻美大使，均无非为推进国际之活动，未蒙接纳，只有谨守范围，自治其分内应办之事，免于越俎之嫌耳！

从本电看，由于屡请不准，宋子文已经相当丧气，准备“谨守范围”，不再提什么要求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41年7月，宋子文和美国陆、海军参谋本部商谈，由美国派遣军官团来华，充当蒋介石的顾问，同时援助中国军火7.4亿美元。这当然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好事，但美国国务院担心引起日本反感，态度消极，迟迟不能决定。在此情况下，宋子文致函罗斯福催询。8月20日，罗斯福复函，同意派遣军官团赴华。宋子文自觉做了件大有光彩的好事，将罗斯福的复函径交中央通讯社发表。这样，就将中美之间的绝密谈判公之于世，宋子文随即受到批评。9月4日，宋子文致电钱昌照云：

江电悉。适之屡次不顾事实，颀颜自我宣传，弟殊不屑与之争辩。此次罗函本不愿公布，因恐淆乱听闻，有碍日后工作，故尔发表。嗣后自当注意，并请兄暨孟余兄随时加以补救为感！

可以看出，宋子文不仅在对美外交中“唱独角戏”，完全甩开胡适，而且感情上也憎恶胡适了。尤其不应该的是，居然为了争功，不惜泄露外交机密。孔祥熙批评宋子文“气量狭小”，信然。

宋子文始终不曾放弃以施代胡的念头。1942年4月3日钱昌照致电宋子文云：

东电奉悉。介公为安插与果夫、立夫有关系之徐恩曾，故将彭调开，先生恐无从助力。至调植之事，弟认不易办到。盖政府中不

乏为适之说话之人，而介公对植之感想仍不甚佳也。

彭，指彭学沛，时任交通部政务次长，当日，蒋介石将彭免职，而代之以徐恩曾。从本电可以看出，国民党用人，一要靠关系，二要靠领袖印象，蒋介石对施肇基“印象不佳”，所以始终得不到重用。

宋子文对胡适的排挤使一些知情人深感不满。1941年4月，周鲠生致函王世杰，批评宋子文“在华盛顿遇事专擅，不顾体统，颇使适之不快”。同年7月16日王世杰致函胡适，认为宋子文“有能干而不尽识大体”，希望胡适以“宽大”态度“善处之”，胡适虽然日子不好过，精神苦闷，但倒确能做到以“弘大度量”，宽恕地对待宋子文。1942年5月17日，他致函翁文灏、王世杰二人，声称“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又称：“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

同年8月15日，蒋介石决定免去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以魏道明继任。

原载《团结报》，1992年3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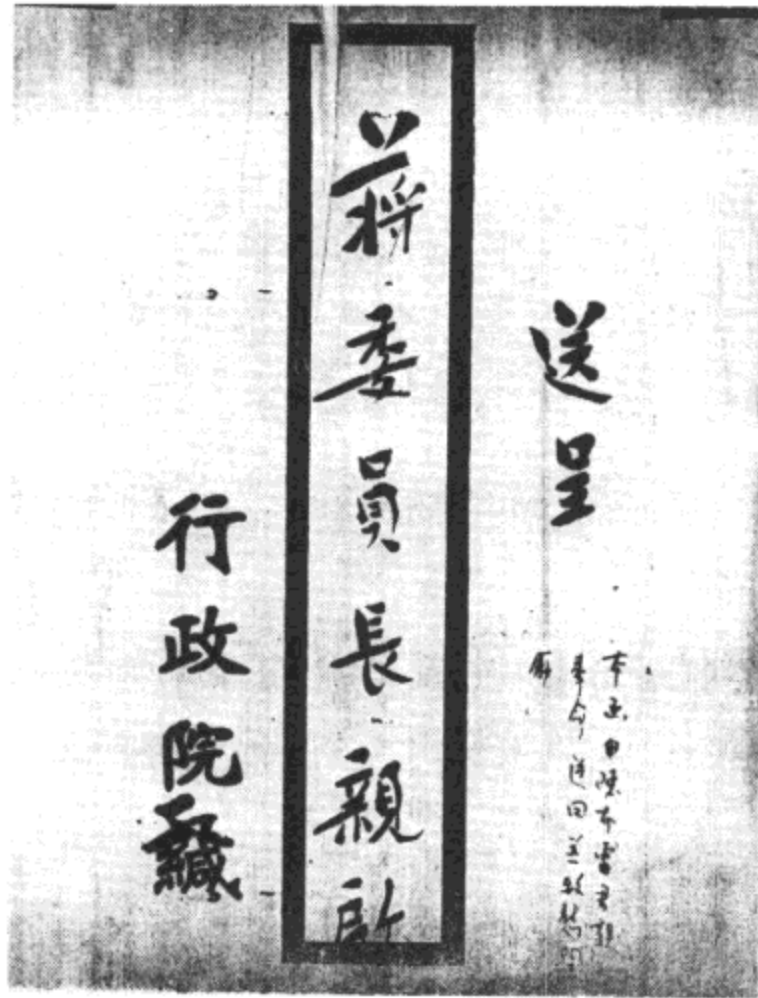


蒋孔关系探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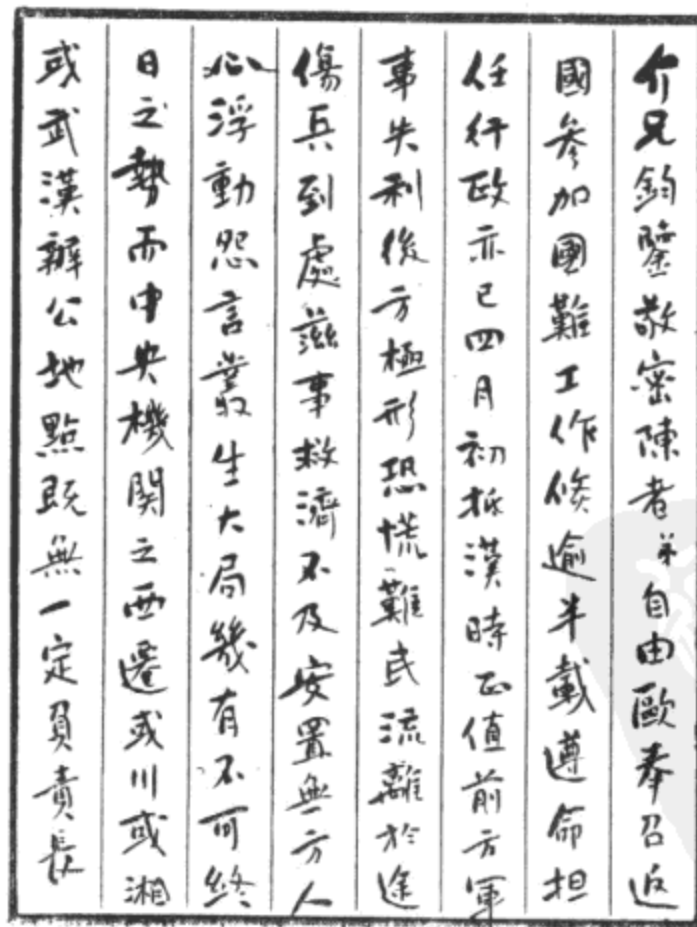
——读孔祥熙档案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孔祥熙档案中，保存着致蒋介石的几封信，看来是孔祥熙本人认为很重要的文件。其一为：

敬密陈者：弟自由欧奉召返国，参加国难工作，倏逾半载。遵命担任行政，亦已四月。初抵汉时，正值前方军事失利，后方极形恐慌，难民流离于途，伤兵到处滋事，救济不及，安置无方，人心浮动，怨言丛生，大局几有不可终日之势。而中央机关之西迁，或川，或湘，或武汉，办公地点既无一定，负责长官亦多分散，政务更有停顿之虞。为安定后方，镇静人心起见，经竭力设法，约集来汉，乃将中央组织稍事整理，协助地方政府解决伤兵、难民问题。嗣我兄以军事繁要，坚辞院务，筹划改革中央行政机构，以谋政院与军会之调整，虽蒙询及刍蕘，迄未妄参末议，对于提出改组办法，因而未曾过问。改组之议既定，以人事问题征及于弟，自维材轻任重，本不敢承，故再三辞谢，乃我兄推诚相与，恳切责勉，弟以时值国家艰危，我兄忧劳逾恒，遂不得不暂承其乏，冀我兄专心军事，求取抗战之胜利。所幸抗战初起，中央即有决议，党政军统归我兄领导，而政院诸务，早有成规可循，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另有政策。惟数月以来，外间或不加察，责弟无主张、无政策，在非常时期，更无特别办法。实则以党治国，一切大计均须取决于党，听命领袖，而抗战时期，最重意志统一，政策一贯，尤不容个人随便发表



礼祥熙致蒋介石函封面



行政院用箋

礼祥熙致蒋介石函手迹(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主张，致涉分歧。故切盼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早日开幕，有所指示。兹既先后举行，决定《抗战建国纲领》，则此后政治益臻稳定，军事愈易撑柱，财政亦筹有办法，且弟多年以来，即主张为统一政令、集中力量起见，政治军事大权应归我兄一人主持，去岁出国前并有长函向我兄建议，将军委会改组，国防部隶于政院，由我兄以院长兼总长。此次大会通过我兄为本党总裁，主持一切，尤与弟之平素主张相同。

目下前方军事好转，党政军权宜即乘时统归我兄总揽，庶几德威普照，军民共仰，指挥便利，策应敏捷，于国家前途及抗战前途裨益实多。弟近来身体多病，精力远逊于昔。前为我兄分劳，应付难局起见，暂任行政，尚能勉强支持，如使长负重责，深惧自误误国，既负我兄推许之意，亦累我兄知人之明。亟盼允卸仔肩，俾得稍事休养，或另畀闲散职务，以便从容效力。倘我兄仍不愿自兼院务，或由岳军代理，亦颇稳妥。至财政一席，子文如能担任，更为驾轻就熟。弟秉性率直，遇事认真，或不免获罪于人。长财数年，幸赖我兄信任，虽有谣谤，均置不理，始能放手做去，即近来稍有成就，亦系我兄指导之力。就积极方面言，因整顿旧税，举办新税，为国库增加数万万元；就消极方面言，因购置消费躬亲核实，为国库亦节省数千万元。均有数字可查。至于改善币制，整理公债，活泼金融，扶助工商，以及废除苛杂，治水防灾，直接间接，无形中为国家所增之富力，想亦有相当之数目。且自信经手事项，公私分明，丝毫不苟，差堪告慰于我兄。过去虽因严厉取缔交易所操纵投机，并在整理公债时期不肯徇情，致受人攻击，发生谣谤，曾经审计部派员秘密查账数月之久。其结果中行方面并未发现错误，财部方面亦只因暂记账为查账者所吹求质询，但该项支出均系奉有我兄手条，先行垫付，待补手续者，一经核对解释，亦无问题。现在厉行预

算制度,主计、审计,又复组织严密,一切收支必经种种手续,更不待言。

弟去秋在德,乘便诊疗宿疾,时期未滿,即奉我兄叠电召归。匆匆返来,又因国难严重,未敢休息。近复忙碌数月,益感精力不及。惟前以国家情景欠佳,未敢提及下忱。今幸行政组织大致妥帖,战事前途又形好转,而财政亦筹有办法。弟之去留,当不致影响大局。现拟提出辞呈,自不能不先商我兄。披沥直陈,敬祈垂察。倘承不以畏难见责,尤为感幸。专肃,恭请钧安!弟孔祥熙谨启。四·二十五日。

孔祥熙于1937年3月以特使身份被派赴英国参加英皇乔治六世的加冕礼,其后,陆续访问意大利、捷克、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美国,秘密订购军火武器及汽油等物资。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指示他“在国际方面多所接洽”,又再赴巴黎、柏林谈判。同年10月,奉蒋介石之召回国。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次年1月,为建立战时行政机构,国民政府实行改组,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本函称:“由欧奉召返国,参加国难工作,倏逾半载,遵命担任行政,亦已四月”,知此函作于1938年4月25日。

当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同月6日,在汉口召开五届四中全会。函中所称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指此。

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僚中,孔祥熙是最受蒋介石信任的一个。其原因,从本函可以窥见: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决不和蒋争权,也决不和蒋标新立异。本函称:“弟多年以来,即主张为统一政令,集中力量起见,政治军事大权应归我兄一人主持。”又称:“政院诸

务,早有成规可循,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这自然是十分投合蒋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于理财。1933年宋子文撙挑子的时候,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则达2200万元。宋子文曾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后,采取各种措施,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保证了蒋介石的各方面需要。本函所称:“就积极方面言,因整顿旧税,举办新税,为国库增加数万万元;就消极方面言,因购置消费躬亲核实,为国库亦节省数千万元”,应是事实。三是不顾财务制度,蒋介石要钱就给。本函所称“为查账者所吹求质询”的“暂记账”,都是只凭蒋介石的“手条”,就照付不误的。这是孔和宋很不同的地方。

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后,颇为部分人所不满。王世杰1938年2月12日日记记载:“近来中外人士对中央信托局(孔为董事长)购买军火,指摘殊甚,谓有不少舞弊情事。宋子文似亦有电告知蒋委员长。”3月4日日记云:“近日常外间对于孔庸之长行政院,王亮畴长外交,颇多不满。昨闻傅斯年君(国防参议会委员)曾以长函致蒋先生,指责孔、王甚力。”孔祥熙致蒋介石函中又说:“数月以来,外间或不加察,责弟无主张、无政策,在非常时期,更无特别办法”,可见这种不满的强烈。在2月12日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孔祥熙曾为中央信托局作过辩解,但并未能遏制这种不满。于是,他便以退为进,于4月25日上书蒋介石,一方面要求辞职,声称“亟盼允卸仔肩,俾得稍事休养,或另畀闲散职务,以便从容效力”;一方面力辩自己的“无主张、无政策”乃是因为在蒋介石领导之下,“曹随萧后,自亦不必另有主张”;同时则大谈自己多年来理财的“成就”和公正廉明,目的在于反驳舆论对自己的批评,争取蒋介石的信任。果然,蒋介石见信后,即命陈布雷将信退给孔祥熙,并表示“慰问鼓励”。这样,一场反孔风潮还没有来得及掀起来就被压下去了。

其二为:

主席钧鉴：弟病中闻有将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结束，所余工作改由中央银行执行之议，再四思维，窃认为应请重行考虑者有以下几点：

（一）按欧美各国外汇自由买卖时期，业务则统归中央银行调剂，但实行外汇管理后，则多在财政部设立专管机构，处理审核手续，而业务则由中央银行主管。如德、义、伊兰、加拿大、智利、巴西、阿根廷及其他南美诸国，皆采此制。其他如英国、印度、纽西兰等国由财政部授权中央银行管理外汇者，亦各在中央银行内另设机构，不与普通业务互相混合。盖审核、业务两种业务之应分别办理，犹会计、出纳之应分开也。分开则可收互相监察之效，合并则权力有过于集中之嫌也。

（二）我国管理外汇之执行，因英、美封存法令与我国有关系，而美国财部外贸局所颁布之《特许法令》第 58 项及第 75 项皆指明我国外汇管理委员会为合作执行之机关。按此项法令予我国管理贸易及资金之流动，颇多便利，而外国商人则认为不便。因此美方对此项法令久有放任倾向。今外汇管理委员会改组消息传来，闻已有非正式表示，拟取消此项合作办法而图便利彼国商人也。

（三）查外汇管理委员会成绩尚佳，若非确有必要，现似不必更改，否则恐外人认为不稳定之表现。如以为现有机构不足胜任，则可视诸工作之需要而加强，似不应重起炉灶也。

总之审核与业务理应分开。如必欲将二者皆归中央银行处理，亦应在中央银行之内特设审核委员会，聘请行外有关人事参加，方为妥善。因此事关系重大，影响国际合作，故直陈所见，以备参考。是否有当，尚乞钧裁。

此函未署年月。中国外汇本取自由买卖制度,1938年2月,日本侵略者指使北平伪组织设立银行,发行无担保、不兑现的纸币,强迫人民行使,妄图套取外汇,这样,中国政府就不得不逐渐建立外汇管理制度,规定外汇售结买卖,须在政府所在地的中央银行办理,其他非政府指定银行,不得买卖外汇。同月,财政部指定中央银行总行办理外汇审核事宜。次年4月,成立外汇审核委员会。1941年8月,成立行政院外汇管理委员会,孔祥熙任主任委员。1943年12月,外汇管理委员会改组,隶属财政部。此函当作于此后。

其三为:

介兄主席钧鉴:敬陈者:顷阅报载,美政府决派马歇尔将军继赫尔利将军使华,在此内外情势艰困之时,此举于外交姿态上殊属有利,深为庆慰。忆赫尔利将军使华年余,贡献极多,有助于中美邦交者非渺。其出任之经过情形,弟在美时曾应罗斯福总统之请,征询意见,除当时简略电陈外,兹再摘陈如下,用备参考。

自史迪威将军召回,及高斯大使辞职后,中美邦交阻碍颇多。弟奉派驻美代表,公私运用,极费苦心。对继任人选,如不得其当,误解更多,影响大局更甚。在当时情形,实须熟悉我国情形,同情我国困难,而富有军事专才,兼有政治头脑者为最适宜。弟于罗氏征询意见时,即经表示上述意愿,立场所限,自不便擅举人名。罗氏即以华莱士、纳尔逊诸人见询,弟则反复仅表我方之意愿,微露如能就贺浦金斯及赫尔利两人择一任之。罗以贺难远行,遂即以赫君任命。(下缺)

此函原稿未署时间。函称:“美政府决派马歇尔将军继赫尔利将军使华。”知此函作于1945年11月。

1944年6月,重庆国民政府派孔祥熙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蒋介石并任命其为私人全权代表。不久,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退,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中外震惊,驻华美军司令兼远东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通过美国政府,要求取得指挥中国战区作战部队的全权,加剧了和蒋介石的矛盾。于是,蒋介石指示孔祥熙会晤罗斯福,要求给予三个月的布置时间。孔祥熙接电后,在会晤罗斯福时表示,一旦中国的军队由外国人指挥,士气民心必将大受影响。孔祥熙要求召回史迪威,另择贤能。罗斯福接受孔祥熙的意见,改以魏德迈为美军驻华司令兼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同时派赫尔利为私人代表。10月,又任命赫尔利代替高斯任驻华大使。孔祥熙此函现存部分即反映这一情况。

其四为:

介兄主席钧鉴:敬陈者:抗战胜利,宇宙重光,此皆钧座坚苦卓绝,精诚感召有以致之也。弟以衰病之躯,早拟回沪养息,兼理家务。嗣以全会召开在即,身为革命党员,追随总理及钧座,献身党国者几四十年。际兹本党大业垂成,本届全会缺席去沪,恐惹误会,乃决缓行。现在大会业经闭幕,不久拟即束装就道。忆二十年来,在钧座领导护持之下,服务党国,勉分劳怨之任,若干任务难副殷望,由于能力之不及,与夫环境之艰难,乃虽心余力拙,仍难见效,致劳钧虑,实深愧憾。顾目今国家环境,内外艰危,实较抗战时期为尤甚。惟信在钧座领导筹谋之下,必可迎刃而解,统一进步之新中国自可指日而待也。

当今之势,我国际地位已跻于五强之列,责任自亦加重,苟国际间运用得法,外获世界之重视,内则我党人牺牲奋斗所求之三民主义、五权政府之终极目标,亦可加速顺利完成。近闻指示,极佩荅筹,实我国亿万年幸福之所系,忝属旧僚,实深钦敬。

所窃以自慰者，当抗战时期，重荷青睐，谬膺辅弼之选，自问竭忠尽智，不敢偷闲。今任务勉达，体力日衰，此时休养，度我余年，实拜钧座之所赐，感何可言！山居静养，检讨往事，愧贡献之毫无。惟忆任内凡所施措，均本福国利民之义，绝无为个人私利之念，区区赤心，早邀洞鉴。今后以在野之身，从事社会事业，聊尽国民之职。诸如燕京、铭贤诸校，中美文化、边疆服务、孔学会、慈幼协会等机构，均关社会福利，亦即本党终极目的所在。过去所需经费，均由弟私人筹措，虽有若干事业如孔学会、慈幼会等曾由钧座名誉领导，并承钧兄由国库酌予协助，弟以深体国家艰难，迄未请拨。今后事功更艰，深望钧座指导提倡，使之发扬光大，以竟全功。他如国家兴革，弟以从政多年，或有一知半解之见，只供钧座参考，苟有垂询，仍当尽我愚忠，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仰答知遇于万一。

留禀恭陈，以代踵辞，伏维垂鉴，敬请钧安！弟祥谨启。

此函原稿亦未署时间。函称：“抗战胜利，宇宙重光。”又称：“本届全会，缺席去沪，恐惹误会，乃决缓行。现在大会业经闭幕，不日拟即束装就道。”据此，知此函作于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之后。

1944年初，国内反孔之声大盛。同年秋，罗斯福通过宋子文转达提议，要求中国政府更换军政部长和财政部长。11月，孔祥熙自美致电蒋介石，请辞财政部长职务，同时保荐政务次长俞鸿钧接任。同月，蒋介石照准。1945年5月，孔祥熙再辞行政院副院长职务。7月，自美返国。此后又陆续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务。至此，蒋、孔之间的亲密关系结束，孔祥熙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基本消失。本函反映出孔祥熙失意后的种种复杂心情。他虽有满腹牢

骚,但仍然表示要忠于蒋介石,“仰答知遇于万一”。

其五为:

介兄钧鉴:拜别来美,转瞬经年。因知吾兄国事劳神,日理万机,未敢多扰清听,致疏函候,至以为歉。然对吾兄怀念之诚,无时或已也。当弟抵美之时,此间人士因受共党宣传,对我误解颇深。美友纷来探询,弟鉴于情形恶劣,不容坐视,乃一面向各方解释,一面联络议院友好,促成援华政策。幸于去年能在国会通过援华议案。当时正值竞选总统,共和党对我尤表热诚。不幸共和党失败,民主党当选。弟于选举之后,即与杜总统及马国务卿晤谈数次,杜氏虽对我表示同情,惟以各方牵制甚多,国会虽曾通过援华议案,而国务部执行方面仍多留难,环境因人事使然,实亦莫可如何。自吾兄引退以来,国内情形每况愈下,使此间爱我人士灰心。盖援华问题必须我方自身有办法方能推动,此美人所谓天助自助者也。

吾兄自参加革命,二十余年来,继承先总理遗志,努力奋斗,功在民国。抗战八载,全国在兄领导之下,协力支持,举世钦敬,名列四强,诚非偶然。不幸胜利以还,政府措施错误甚巨,因一误而再误,以致士无斗志,民有二心,功败垂成,为党国,为吾兄,实为痛心。我国战后措施之错误,据愚见所及,约有三点。因感于前车之失,可为后车之鉴,因敢为吾兄列陈之:

一、我国币制应于胜利之后立即改革。当时国币发行不过一千七百亿,而国库外汇尚有十亿美元,除可收回抗战旧币,换发建设新币外,尚可余存一亿美元之多,可以留作发行准备及建设生产之用。当时如能将币制整顿稳定,不自己贬值,当可维持信用,则资金不致逃避,物价不致腾涨,工商业可以发达,国外贸易可以推广,侨汇可以源源而来,国库收入不致太失平衡,人民安居乐业,赤

祸不致蔓延。殆至去年秋间,我国外汇已告枯竭,对外贸易及国内生产相差过巨,而于此时冒〔贸〕然换发金圆券,既无充分准备,又未增加生产,且强征民间黄金外汇,不顾商情成本,限价勒售,强迫执行,凡此种种,均大失人心,嗣后金圆券又自行贬值,一至不能维持而有今日之经济崩溃。此失策者一也。

二、胜利之后应立即恢复生产。所有日人之工厂,理应利用,不使停顿。不幸因政府接收人员彼此争夺,致使停止生产,机器损坏,原料散失,对国计民生损失奇重。本国既无生产,自不得不仰给于外国,因而外汇逐日消耗。此亦经济崩溃之又一原因也。

三、中俄条约原无必要,但一经签订,则使苏俄在东北及内外蒙古享有特权,故能充分武装中共,扰乱吾华。此实中共军事日强之主因,亦即我政府之失策也。

以上三点,不过事之近因,而考其远因,实由于群小干政,蒙蔽元首,结党营私,忌贤妒能,争权夺利,失德丧良,而结果吾兄代为受过,言之痛心。目今中外明达人士尚以为欲救中国脱离赤祸,非有吾兄出山领导不为功。且我国宪法亦无总统辞职之条文,惟吾党同志是否能捐弃成见,团结合力拥戴,瞻望前途,曷胜翘企!弟年老衰弱,无力报效。惟祈为国珍重,举贤任能,完成革命建国之大志。弟以为人能自知自改,方不失革命之精神。数十年来追随左右,甚感知遇,早拟本忠谏之诚,沥胆直陈,惟以吾兄明察秋毫,必已洞悉,且恐有人发生误会,未能遽启。然一片忠诚,如鲠在喉,一吐为快。兹乘三妹返国之便,冒陈渎听,祈垂察,实所企祷。肃此敬请钧安!

此函原稿亦未署时间。1947年秋,孔祥熙因得家人自美来电,称宋蔼龄癌症严重,匆匆离沪赴美。本函称:“拜别来美,转瞬经年。”又

称：“目今中外明达人士尚以为欲救中国脱离赤祸，非有吾兄出山领导不为功。”据此，知此函作于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之后。

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国民党政府，美国国会于1948年4月3日通过一项“援华法案”，向蒋介石集团提供四亿六千多万美元的援助。根据本函，孔祥熙在通过这一法案的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人们所未知的材料，可补史乘的不足。

孔祥熙写作本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本函除劝告蒋介石出山，从幕后走到幕前外，主要目的在于总结失败教训，为蒋介石制订新的施政方针提供借鉴。函中提出的未能及时进行币制改革等三点，并没有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失败的根本原因，但他论及的财政失策、接收大员们的“彼此争夺”，以及“群小干政”、“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等情况，却也为人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份当事者的有权威的证言。

蒋介石虽然在美国及国内反孔势力的压力下，于1945年甩开了孔祥熙，但是继任的宋子文、翁文灏、孙科、何应钦以及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却再也作不出孔祥熙当年的成绩。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去世之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认为孔创造了“中国财政有史以来唯一辉煌之政绩”。中云：“当其辞职之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这是对宋子文等人的批评，也隐约表示了对甩开孔祥熙的后悔。

原载《民国档案》，1992年第4期

傅斯年攻倒孔祥熙

——读台湾所藏傅斯年档案

孔祥熙是民国政坛上著名的不倒翁。他于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3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1938年,升任行政院长,一直官运亨通,步步青云。但是,以1939年11月改任行政院副院长为转折点,开始走下坡路。至1945年,遂轰然倒下。

孔祥熙的倒台,当然是他自己及其家族多行不义以及失宠于美国人的结果,但是,也和傅斯年等人的一再抨击、反对有关。其具体经过,过去由于资料较少,不得其详。今据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傅斯年档案,作一探索。

傅斯年的讨孔,涉及对贪污、腐败现象的治理问题,总结有关历史经验,当不无意义。

1938年,傅斯年首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

傅斯年档案中,有一通致蒋介石的函件,未署年月,但据王世杰日记,知为1938年2月末或3月初之作,距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不过两个月。^①

^① 《王世杰日记》(1938年3月4日)云:“近日外间对于孔庸之长行政院,王亮畴之长外交,颇多不满。昨闻傅斯年君(原国防参议会委员)曾以长函致蒋先生,指责孔、王甚力。”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册,197页,台湾“中研院”近史所,1990。

在现存傅斯年攻孔各函中,时间最早。

函件一开头就指出,抗战以来,全国将士、官民“正在为民族生存作空前之奋斗”,“国步艰难”,但是,外交、行政却未能发挥效能。傅斯年分析其原因,认为关键是“负责之人另是一格”,“作来一切若不相似”。^①

傅斯年此函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陈述孔祥熙 1937 年出使英国,祝贺英皇加冕时的情况,历举英国外相艾登、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等人对孔祥熙的批评,以及孔本人“举止傲慢,言语无礼”的事例,说明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不利于争取英美的财政援助。次述孔祥熙听任小儿子指挥财政部大员,小女儿管理机要电报,以致物议蜂起的情况,说明“似此公私不分,未有近代国家可以如此立国者”。

傅函的第二部分批评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宠惠,说他“绝不努力,绝不用心”,“毫无精神,鲜谈正事”。但是,傅斯年批评王宠惠,还是为了批评孔祥熙。傅斯年认为,王宠惠之所以表现如此,乃在于孔祥熙“指挥自决”,过于专权,使外长等于秘书、跟班。函件说:

孔氏无权不揽,无事不自负,再积以时日,恐各部皆成备位之官,不只外交失其作用而已。

函末,傅斯年保证:“其中绝无虚语,皆有人证、物证,斯年负其一切之责任。”

傅斯年上书之后,孔祥熙曾于 4 月 25 日上书蒋介石,要求辞职,但为蒋介石慰留。^②

^① 傅斯年档案,2-611。按,《胡适来往书信选》据胡适档案收入此件,但误系为 1939 年,文字亦有缺漏。

^② 参见本书另文《蒋孔关系探微》。

傅斯年联名上书,多方面说明孔祥熙 不能担任行政院长

第一次上书无效,傅斯年不肯罢休,酝酿再次上书。不过,这一次不是个人行动,而是与人联署了。

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大会在武汉召开。会前,傅斯年即以参议员资格积极活动,制造舆论。^①孔祥熙听到风声,因此在参政会报告时特别卖力,企图讨好参议员。^②但是,傅斯年等仍于7月12日致函蒋介石,从才能、信望、用人、友邦观感等各个方面论证,孔祥熙不足以担任行政院长一职,共五条:

第一条陈述,就中国官场应付技巧言,孔祥熙可称超群的上等人才,然而,对建设近代国家、主持大政的良规大义,却毫无所知。^③

第二条陈述,孔祥熙纵容夫人、儿子聚敛金钱,奢侈、豪华,“实为国人所痛恶”。

第三条陈述,孔祥熙用人唯亲,凡山西同乡及旧时同僚,都优为安插。

第四条陈述,孔祥熙国际舆论不佳,难以得到援助。

第五条陈述,孔祥熙以孔子后裔自负,而“持身治家”,每多“失检”。

① 《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3日)云:“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到汉者已甚众。彼等有对孔庸之长行政院极表不满,而思提案攻击者。”

② 《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11日)云:“参议员中对于王、孔两公颇多微辞,故两公发言特别详尽,以冀减少反感。”

③ 傅斯年档案,2-611。按此函曾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附录三。

函件最后,傅斯年等要求蒋介石为抗战前途计,“审察事实,当机立断”,免去孔祥熙的职务,以慰四海之望。

蒋介石事前就知道傅斯年在酝酿联名上书,很不高兴。书上,自然没有结果。^①

第三次上书,52人联名,向孔祥熙发动猛烈进攻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会前4天,在国民参政会谈话会上,傅斯年等发表激烈的抨击孔祥熙的谈话,得到许多人同情,于是,决定再次联名上书蒋介石,继续讨孔。会议推7人起草。同月27日谈话会定稿。函件要求严格考核掌握国家要政的大员们的功过与声名,分别晋升或罢退。函件特别严厉地批评了抗战以来的外交和财政,认为所有“迟缓、疏忽、懈怠,以及人事纠纷”等问题及其损失,都在于有关官员的不称职。函件最后画龙点睛地将责任归结到孔祥熙身上:

即如行政院长之大任,在平时已略如外国之首相,在此时尤关于战事之前途。若其人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则国家之力量,因以减少者多矣!^②

说孔祥熙“一切措施不副内外之望”,言辞之激烈,否定之彻底,可以说无以复加了。

^① 《王世杰日记》(1938年7月3日)云:“蒋先生闻之甚不悦。”

^② 傅斯年档案,1-657。

时值抗战艰难时期，傅斯年等考虑到蒋介石的心理，在函中特别说明，为避免滋生“误会”，故“密陈左右”，不在参政会上讨论，也未向外人泄漏。函稿宣读完毕，众人纷纷签名。

30日，孔祥熙出席参政会作财政报告，受到严重质询。会后举行茶会，孔祥熙故作姿态，“专说笑话”，众人更加不满。^①当日签名者迅速增加，计胡景伊、张君勱、左舜生、傅斯年、褚辅成、张澜、罗文干、钱端升、罗隆基、梁漱溟、梅光迪、张申府、王造时、马君武、许德珩、梁实秋等52人。

10月31日，傅斯年等将函件密封后，送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呈蒋介石，但几天后就被退回。当时，蒋介石因主持军务，不在重庆，傅斯年等便托马君武持函返桂，转赴湖南衡山面呈，同时又抄了一份副本，通过有关渠道送呈蒋介石。

胡适不赞成倒孔，但傅斯年的上述文章，仍被胡适称为“打孔家店妙文”^②。

参政会上多次开炮，孔祥熙失去行政院长职务， 改任副院长，成为人人可得溺之的“溺尿桶”

参政会是具有代议性质的民意机关，参议员有权对政府各级官员提出质询。现存傅斯年档案中，保存有好几件在参政会时的质询稿，可见傅斯年对于孔祥熙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其中，傅斯年抨击尤烈的是财政人员的风纪。如，财政部次长徐堪夫人使用外交护照，携带行李

^①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10月30日。

^② 《胡适致傅斯年函》，1939年10月8日，《傅斯年来往书信选》，打字本。

数十件经过美国旧金山时，因发现若干过于贵重的物件，和海关发生争执。傅斯年据此提出：“查高级官员之妻，似不当用外交或官员护照；又此时捆载赴美，未知与节约运动有无不合？”

又如，财政部所属盐务总署总办朱廷祺崇拜“老祖”，每日请坛扶乩，且在署中提倡。傅斯年据此提出：“未知孔部长是否注意及此？”

再如，当时财政部在香港等地有不少冗员，虚靡国帑，傅斯年提出：“未知是否皆有任务？”^①

同年，因物价暴涨，通货贬值，傅斯年再次提出《慎选行政院长、财政部长案》，要求蒋介石撤去孔祥熙的职务。提案指出：近两三月之间，财政部每次公布一项办法，必然继之以法币的暴跌。提案尖锐地提出：

民怨沸腾，群伦失望。似此情形，未知何以策将来？何以定人心？何以固抗战之根本？

提案要求蒋介石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仔细考虑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的入选，“务求官得良才，政致清明”^②。

蒋介石终于不能不考虑傅斯年等人的意见，但因适值桂南战役开始，日军图谋进攻广西南宁，蒋介石不愿意政局变动过大。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第七次全会，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威信大损。关于此，傅斯年次年致胡适函曾说：“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去年几几干掉了，因南宁一役而停顿耳，故维持之者实倭寇耳！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 taboo

^① 傅斯年档案，1-634。

^② 同上，1-642。

〔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①往日声势煊赫的孔祥熙竟成了人人得而溺之的“溺尿桶”,真是威风扫地了!

傅斯年继续抨击,孔祥熙失去财政部长职务

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后,仍然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因此,傅斯年照旧攻孔不止。

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函胡适,说明不能不攻孔的理由:1. 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憚;2. 孔之行为,惰人心,损介公之誉,给抗战力量一个大打击;3. 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 孔一向主张投降,比汪(精卫)在汉、渝时尤甚;5. 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会出何岔子;6. 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傅称:“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②

1941年春,傅斯年因病住院,后在重庆歌乐山休养。当时,孔祥熙曾问人说:“听说傅斯年病得要不行了!”为了证明自己未死,傅斯年抱病出席参政会。同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重庆国民政府派飞机去营救社会名流和学者,但许崇智、陈济棠等要人均未接到,却接到了孔祥熙“一大家”,以及累累箱笼,还有几只狗。消息于次年1月曝出,昆明学生组织倒孔运动委员会,数千人大游行,高喊“打倒孔祥熙”。傅斯年得知,极为兴奋,致函胡适说:“‘人心之所同然者,义也。’这次不能说是

^①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480页。

^② 同上,479页。

三千里远养病之病夫鼓动的罢!”^①同函并指责财政管理者：“泄泄沓沓，毫无觉悟”，自前年冬，到去年夏，不到一年，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业务减了甚多，而人员加了三倍！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战时物资管制，计划设立物资统监本部，有任用孔祥熙出任该部长官的可能。6月5日，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称：就经济局势言，此事如同孤注一掷，不得不求其必成，但如人事不变，其结果很可能仅是“孔副院长更加一官”^②。函上，该部终于没有成立。

同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开幕。第二天，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傅斯年带头开炮，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③。他提出四大问题：

一是孔祥熙及其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他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官之失德，窃贿彰也’，所以应自上层起。”他一一列举孔氏家族所设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裕华银行等企业后指出，所有孔氏之各项营业，已成立联合办事处，设于林森路裕华银行三楼，并以其家人为总经理。他要求调查：1. 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等机构是否合法？2. 这些公司借款囤积操纵之事。3. 彻查并公布裕华与国家银行历年往来账目。4. 政府要员私用其地位经营商业之影响。

二是中央银行问题。傅斯年称：“中央银行是一谜”，“山西同乡多”；梁子美、郭景昆，是孔祥熙的“义子”；“私人用款，予取予求”。

三是美金储蓄券舞弊问题。傅斯年称：市场忽有忽无，但中央信托

①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544页。

② 傅斯年档案，1-45。

③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527页，重庆出版社，1987；参见《中华民国大事记》(5)，12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局局员、中央银行属员却可以提前买到；孔家某氏竟“自分五万”！

四是黄金买卖问题。傅斯年称：“裕华(银行)在今春发了大财。”^①

傅斯年的这些责问，尖锐激烈，以致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参政员傅斯年等责问孔部长极厉，并涉及许多私人问题(私人经商，以及滥用公款等问题)。”^②

同年11月，孔祥熙免兼财政部长，由俞鸿钧接任，但是，他的行政院副院长一职则仍然未变。22日，傅斯年致函蒋介石称：“昨读报纸，知政府局部改组”，“闻此消息，如闻打一大胜仗，两夜为之不眠，友朋中有为之泣涕者”。但是，傅斯年也指出：“以目下最低之需要论，似尚有一著，留而未下。若下，则此次改革之效至为彰明；不下，恐此次改革之分量减少甚多矣。”^③傅斯年明确表示，此著，就是孔祥熙还当着副院长。函中，他竭力说明，当时整理财政的急务是：整理税收，惩治贪污，增加效能，更易首长，清理大事件。孔祥熙副院长一职不变，俞鸿钧有职无权，将无法工作。

1944年末，傅斯年致函蒋介石，于外交、内政多所建议，在内政部分，傅斯年再次提出高级官员经营商业，利用政治力量为自己谋利等严重问题，认为其危害远过于直接性的贪污。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失官箴”。函件说：

欲矫下层之弊，仍必先澄上层之源。上层之弊，未可直言其贪污，然失官箴之处，则甚矣！以影响论，直接性之贪污，为害固远不逮间接性之失官箴。

① 傅斯年档案，1-647。

② 《王世杰日记》，第4册，394~395页。

③ 傅斯年档案，1-48。

傅斯年举例说：孔氏家族开办的“祥记公司”的招牌已高挂重庆林森路多年。又如中国农民银行挂牌出售黄金，一般人买不到，而孔氏家族经营的裕华银行却得以大量购进，高价售出，“此一波折，国家失去不少黄金，裕华得数万万元之净益”。傅斯年由此不点名地批评孔祥熙包庇下属，竭力掩护。他说：“往事不待论，今财政部正有若干重大地方机关舞弊事件，一本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原则处理之。”

函中，傅斯年要求“裁并一切骈枝机关”，特别强烈要求“彻底禁止官吏及其家属兼营商业”。函末，傅斯年提出：人事改革为事业改革之本，要求蒋介石抓紧时机，“以人事之改革一新中外之耳目，而以事务之彻革随之”^①。

这回，傅斯年等人的意见起作用了。1945年5月，蒋介石决定另觅行政院副院长人选。5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根据蒋介石提议，选举宋子文、翁文灏为行政院正副院长。

穷追猛打，揭发贪污大案

孔祥熙丢掉行政院副院长一职，犹如冰山崩塌。1945年7月，傅斯年出席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进一步提出国库局贪污案，导致孔祥熙最后失势。

1943年，财政部将“1942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发行，总额美金1亿元，折合国币20亿元。1943年10月15日，财政部函知国库局停售该项债票，所有未售出的债票约5000万

^① 傅斯年档案，1-40。

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但国库局局长吕咸及熊国清等人却在孔祥熙的支持下,利用职权,以低价套购,牟取暴利。据估计,贪污数达国币二十六亿四千七百余万元。^① 1944年春,国库局的几个年轻人多次向重庆国民政府某机关密告,某机关虽然派人调查,但却查而不办。在此情况下,几个年轻人便向参政员求助。

在参政会上,傅斯年就此案作了口头质询,另一参政员陈赓雅即以准备好的一份提案相示,其中数目、证据俱在,要求大会讨论,送请政府严办。傅斯年遂立即签名,领衔提出。

傅斯年此次提案共有21人联署,题为《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官常案》,案称:“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傅斯年等提出:1. 彻查。由政府派定大员,会同专家、监察院委员、参政会公推代表(必为参政员)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账目与事项,有涉及犯罪嫌疑者,分别轻重,一律移送法院或文官惩戒委员会。同时,此项彻查人员,得接受人民呈诉。2. 改组。傅斯年等提出,使中央银行改隶财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将其业务移交战时生产局。在取消以前,仍须彻查有关账目。两机构的历年主持者,应对其主持下产生的“众多触犯刑章之事”负责,一齐罢免;有牵涉刑事者,应一并送交法院。^② 傅斯年等人的提案经参政会审查,作了局部修改后通过。在会上,傅斯年慷慨激昂地声称:“似此吕咸、熊国清之辈,如不尽法惩治,国法安在!”^③ 发言最后,傅斯年表

^① 陈赓雅:《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一幕》,《孔祥熙其人其事》,1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②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记录》,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印,60、183~184页。

^③ 罗家伦回忆,见《傅孟真先生年谱》,55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示：这番话不仅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愿亲到法庭对簿。傅斯年的这番话使全场振奋，掌声雷动。

尽管傅斯年等人的提案受到欢迎，但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却以“恐被人借为口实，攻击政府，影响抗战前途”为理由，要求陈、傅等人自动撤销此案，另行设法处理。陈布雷也出面表示：“一经大会讨论，公诸社会，恐使友邦更认为我们真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家，对抗战不继续予以支持，那末，影响之大，将不堪设想。”^①在此情况下，傅斯年等被迫同意不向大会正式提出此案。7月17日，傅斯年会见揭发此案的两位青年，拿到了全部证据。傅勉励揭发者说：“诸君爱国热诚，极可佩。我虽前已同意不在大会提，但此事总当使其发生效力。”^②

重庆国民政府虽然想竭力捂盖子，但是，也有人竭力想把案子捅开。重庆地方法院向中央银行函询此事，最高法院也准备立案侦办，要傅斯年提供证据和材料。7月25日，重庆国民政府免去孔祥熙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行联合办事处两项职务。30日，行政院改组。这一切使傅斯年高兴之至。

8月1日，傅斯年致函夫人俞大彩：“老孔这次弄得真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他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对夫人说：“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密告，只能在参政会办。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至为满意。”^③次日，最高法院检察长郑烈致函傅斯年，要傅提供帮助，信中说：“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

① 陈赓雅：《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内幕》，《孔祥熙其人其事》，147页。

② 《傅斯年在本届参政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傅斯年档案1-660。

③ 《傅斯年致俞大彩》，王汎森、杜永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集》，台北傅斯年先生百年纪念筹备会1995年刊行，120页。

如得公助，巨憨就擒，国法获伸，为公为私，当泥首雷门以谢也。”^①8月8日，国库局的几位职员致函傅斯年称，据闻，“委座已与先生说情，国库局贪污案已了，不知可确否？”函件希望傅斯年“继续努力，为民众宣达任命，务使此案在法院中水落石出”^②。当日，傅斯年向参政会提交了一份说明书，同时录呈国库局几位青年的密告信。他表示，所有各节，均经详核，确信其为真，待法院办理此案时，当偕同几位青年出庭作证。^③

傅斯年等人的提案经参政会通过，其经历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密送国民政府核办”；国民政府转发行政院；行政院“密交财政部核办”。1946年2月，财政部报告称：“各行局人员如发现，或据报有贪污渎职等情事，本部均经派员严查，分别惩办；如有触犯刑章并移送法院办理。”至于傅斯年提案中的派员彻查要求，则称“似无必要”。几句官话，将盖子严严实实地捂起来。^④后来据说有关人员退还了赃款，但其内情就无法得知，也无从查证了。

民主和法治是治理腐败的必要条件。孔祥熙的倒台，国库局贪污案的曝光，和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这一特定的民主形式的存在有关；但是，当时参政会的民主权力是极为有限的，司法又不能独立，蒋介石控制着包括党权、政权、军权在内的各种最高权力，为了护卫豪门利益，自然不可能按傅斯年等人的要求彻查。

① 《郑烈致傅斯年》，《傅斯年文物资料选集》，121页。

② 《国库局同人致傅斯年》，《傅斯年文物资料选集》，126页。

③ 《傅斯年在本届参政会大会中提案及询问有涉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事说明书》。

④ 《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大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行政院秘书处编，120页，1946。

主张没收孔祥熙家产

孔祥熙虽然倒台了,继起的宋子文也没有好多少。看来看去,傅斯年逐渐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绝望起来。

1947年3月23日,胡适致函傅斯年,认为蒋介石有“决心改革政府之诚意”。28日,傅斯年复函胡适,对此表示怀疑,函云:“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骂人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CC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①一个腐败的政权自然不可能彻底反腐败。应该承认,傅斯年此时的头脑要比胡适清醒,不过,他仍然和蒋介石站在一条船上,不愿意也不曾想到要走开。这是傅斯年的悲剧。

原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

^① 《胡适往来书信选》(下),190页。



到底是谁毒死了章亚若？

章亚若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情妇，为了避人耳目，1942年自赣州躲到桂林，为蒋经国生过一对双胞胎，但不久就因病住院，猝然死亡。关于她的死因，有三种说法：一是急病而死，一是自杀，一是死于中毒。其中，以中毒说占优势，但到底是怎样死的，凶手是谁，一直没有定论。最近，这一问题有了重要突破。

1989年5月，原蒋经国的机要秘书漆高儒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我所知道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其后又在该刊1990年4月号发表《章孝若死因大白》。二文透露：章亚若生产之后，蒋经国的另一个秘书黄中美到漆处表示：“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该在桂林隐藏的，不可对外，如今参加很多社交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样，将妨碍经国兄的前途，委员长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为专员的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并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重于一条女人的生命。”不久，章亚若就突然死在桂林。漆高儒称：“到底黄中美秘书如何置章亚若于死地，我是不知道的。”漆猜想：黄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事后报告了蒋经国，蒋对黄很不满意，此后黄即下落不明，没有再来过专员公署，云云。

漆高儒之外，《联合报》记者周玉蔻在《谁杀了章亚若？》一书中提出：1942年五六月间，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到桂林，与徐君虎商量，想借一辆车子，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因徐君虎反对而未成。其后，章亚若参加邱昌渭家的一次家宴，午夜返家后，腹痛不适，第二天早上进医院治疗，就此一去不返。周书也

称：章亚若是被毒死的，凶手是黄中美，云云。周书还说，黄已被第六战区陈诚的参谋张振国枪决。

漆高儒、周玉蔻二人都认为黄中美是毒死章亚若的凶手。黄中美何许人？资料表明，他原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参加过特务组织格别乌，回到中国后在哈尔滨被捕，后参加军统，成为某情报首领下的四大金刚之一。1939年，蒋经国接任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黄任公署主任秘书。同年冬，蒋经国在公署下建立特务处，黄中美兼任处长。此外，黄中美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他是奉蒋介石之命到江西保护蒋经国的。当时，接受这一任命在赣南保护蒋经国的计达30人以上。

周玉蔻的书出来后，遭到当年蒋经国部属李以助的质疑，认为张振国当时的职务属于第六战区，江西属于第九战区，管不到赣南，陈诚出面令张振国枪决黄中美，与一般情理不合。但是，今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一号却刊出了《张振国将军的战时回忆》一文，文中，张振国声明，陈诚虽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还奉命指挥第四、第九战区。本人虽是第六战区情报主管，但水涨船高，实际成了四、六、九三个战区情报组织的最高主持人。文中，张振国明白无误地表示：“黄中美确是我拘捕的。”文称：

凶案发生后，我报告辞公（指陈诚——笔者），他特别重视，命我彻查。随率千员数名赶到桂林，除襄办丧事外，追查结果，发现赣南专署有一挂名的秘书名黄中美者，是戴笠派往担任保防工作的，为了蒋经国的前途及蒋府的清誉，竟敢胆大妄为，自作主张，用毒针害死的。

又称：

我将黄中美拘捕后，带往恩施，经严加拷问，最好的证据是毒针，这是戴笠一帮专门杀人用的。以铁证如山，无法狡赖，我将黄中美以杀人犯录供后移转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冯庸（前东北冯庸大学校长）处理。

黄中美案足见戴笠当年在大陆上的无法无天。如河南灭门案、东南日报冤狱案，都是这些坏分子干的，此事乃我与戴笠结仇原因。

文中，张振国解释了他为何在六十年之后才披露这一秘密的原因。张称，原因之一是蒋经国生前绝口不谈，此案有人问及，他常顾左右而言他，足见他心中痛苦，我不便公布此事。原因之二是，他本人自大陆来台后，即侨居泰国、加拿大、美国等地，对台湾情形不清楚。“我们情报人员最大的守则，就是绝对守密，除了少数老友外，我不会对外宣扬。”张文并称，关于凶犯黄中美，他曾两次报告蒋经国，蒋经国称：“怪不得我到处找不到他。”

张文还公布了他 1989 年圣诞写给章亚若之子章孝严的一封信，内称：

近阅报载《蒋经国与章亚若》一文，内容真实，但令我不堪回首，百感交集。此乃我国近代史上一大悲剧。我堪称此一受人瞩目秘辛的见证人。

接着，张振国向章孝严讲述了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相识以及他拘捕拷问黄中美的经过。声称：“黄怕你妈会影响你爸的政治前途，竟敢胆大妄为自作主张，用毒针把你妈害死的。”

张振国原系蒋介石南昌行营侍从参谋，后任第六、第九战区长官部

办公室主任，与蒋经国过从甚密，他在1989年给章孝严写信，应无作伪、说谎的可能。至此，章亚若猝死之谜算是解开了。

然而，人们要问，章亚若被毒之谜完全解开了吗？

章亚若是蒋经国的情妇，蒋介石两个嫡亲孙子的母亲。要毒死她，黄中美有这样的胆量吗？戴笠或其他地位相当的人有这样的胆量吗？显然，黄中美背后有人，戴笠背后有人。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关系属于婚外恋，在当时的中国，是见不得人的，但偏偏章亚若一心一意要“正名”，当“蒋太太”，这就麻烦了。

据专门采访过蒋、章恋情的老记者王康说：章亚若“生了双胞胎之后，她的心情，产生了重大变化，渐渐认为翅膀硬了，不愿做‘黑市夫人’，想为儿子的未来，找一个名份”。^① 这种情况，当然为蒋家所不容。

又据曾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张令澳回忆，蒋介石对蒋经国和章亚若的婚外恋，一开始就不赞成。1940年蒋经国到重庆述职时，蒋介石曾批评他生活上“不检点”，“有玷你的声誉”。^② 后来，章亚若为他生了两个孙子，蒋介石有点高兴了，亲自决定以“孝”字排名，但是，蒋介石同时决定“千万不能张扬”^③。自然，章亚若想“张扬”，想“正名”，就大违蒋介石的意愿了。蒋经国是蒋介石精心培养的接班人，将要降“大任”于他。出了这种事，不仅有损蒋经国的“清誉”，而且也有损于“蒋府”的“清誉”，更有损于蒋介石的“培养”计划，所以，章亚若的死乃是迟早的事。还有，应该特别提出的是，黄中美被抓起来了，判决“刑处”了，然而，黄中美并没有死。

黄在一段时期下落不明之后，被蒋经国任命为四省盐务督运处主

① 《章亚若神秘死亡之谜》，台湾《中国时报》，1990年2月8日、9日。

② 《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台北版，392页。

③ 《张振国致章孝严函》，《传记文学》，1997年第1号。

任秘书,1945年蒋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时,黄中美出任吉林省盐务局长。1946年,在上海任中国盐业公司科长。1948年蒋经国从上海撤退,曾要黄中美随同赴台,为黄拒绝。1951年,黄在大陆被捕,1975年被赦,回到上海,因癌症去世,年82岁。

黄中美毒死了章亚若?除了蒋家,当年谁能免去黄中美一死呢?如果黄中美的举动不是出自某一方面的命令,而是擅自行事,蒋经国能原谅他吗?还是张令澳说得好:“赣州是个小地方,一点小新闻就能不胫而走,更何况有关蒋经国的桃色新闻。所以蒋章婚外艳史,最终还是被蒋经国之俄籍夫人所悉。她当然心存妒意,于是通过一定渠道向公公蒋介石告了状。蒋听到消息后,惟恐影响儿子的声誉和今后的前途,决定对该事情作‘断然处置’。虽然这‘断然处置’究竟指的是什么,也许将永远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谜团,然而,章亚若生子半年后即‘暴病而亡’却实在使人感到突然。”^①前文已述,蒋介石在蒋经国身边布置了30多名“保护”者,黄中美更负有特殊使命,蒋经国的绯闻本无须方良夫人汇报,关于此点,张令澳所述未必可靠,但是,他所述蒋介石“断然处置”的指令却是值得重视的。

其实,蒋经国也未必完全不知情。据章亚若当年的结拜姐妹桂辉(昌德)回忆,蒋经国得知章亚若的死讯后“久久一言不发。细读遗书,双手背后,蹀躞于室中。悲戚凝噎,欲语又止,忽仰天长叹,状殊痛楚”^②。这种状况,正说明蒋经国有难言之隐。

对于黄中美之毒死章亚若,漆高儒也曾分析说:蒋经国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怒”,其喜的原因是:“与章的情史,是要绝对守密的,既然外面风传很多,确实对我的前途不利,中美既然为我经国着想,情

① 《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357页。

② 《镜报》,1985年4月号。

有可原,而且不愧为共患难的朋友。”这说明,章亚若被毒符合蒋家的需要。

有些人总想开脱蒋家的关系,例如,桂辉就说:“老先生庆获麟孙,喜出望外,此系华夏炎黄血统,岂有杀媳妇之理。虎虽毒不食其子,诱过于老先生,让他背黑锅,未免冤哉枉也。”^①其实,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有些事,天真的人们是很难想象的。

章亚若,江西南昌人。1913年生。抗战期间投入蒋经国在赣州主持的青干班,与蒋经国相恋。

原载《文史精华》,1997年第10期

^① 《镜报》,1985年4月号。



章亚若死因新证

关于章亚若之死，张令澳所著《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一书中曾称：蒋介石听到蒋经国与章亚若婚外恋的有关消息后，“惟恐影响儿子的声誉和今后的前途，决定对该事作‘断然处置’”。我在《到底是谁毒死了章亚若？》一文中曾以此为据，并根据种种现象及情理推断，章亚若之死和蒋介石有关。文成之后，有的朋友仍认为证据不足，近阅海外出版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其中有陆铿与某军统特务的谈话，可为拙文的论断提供新的证据。照录如下：

从中国历史看，宫廷斗争一直是残酷的，而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再以章孝严、章孝慈的母亲章亚若之死来说，也同样是在一种“赐死”心态下的谋杀。

1950年，军统元老、人称阿公，曾任军统局香港站站长、负责策划陈济棠属下空军投奔蒋介石，为蒋立了大功的邢森洲先生，在昆明监狱跟我谈天，他因为出任两广监察使时经于右老介绍和我认识，彼此了解，故谈话无所顾忌。

有一天，谈起章亚若，他说是军统接获密报，章亚若在桂林住院生子时，对外有所招摇，故意透露她和蒋经国的关系，因此，戴笠经过请示，奉命将她去掉，乃予以毒害致死。我问邢森洲，请示什么人呢？

阿公责备我说：“你是做记者的，怎样问出这样的问题。除了蒋委员长，谁敢接受戴笠的请示？”

陆铿并称,他已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章孝严。《回忆与忏悔录》接着写道:

1990年,章孝严与崔蓉芝在旧金山凯悦酒店谈江南案和解事,我陪蓉芝前往,自始至终未发一言。临别时,孝严礼貌地表示,今天未闻陆先生的高见。我说:“对你们兄弟,我倒有一个建议——不要搞什么认祖归宗。因为据军统元老邢森洲先生告诉我,你们两位的母亲就是蒋老先生下令毒害而死的。”

我想,读了陆铿的上述回忆之后,章亚若的死因应该可以真相大白了。

原载《文史精华》,1998年第7期



汉奸末日审判记

中华民族富于爱国精神，日寇侵华期间，广大军民英勇抗战，创造了无数顶天立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也有少数败类，觊颜事敌，为虎作伥，堕落为汉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伸张国法，惩处奸邪，进行了长达年余的对汉奸的审判。

天网恢恢

南京伪政权的头号汉奸汪精卫早在 1944 年 11 月即病毙日本。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即仓促召集会议，宣布解散，至此，南京伪政权彻底倒台。汉奸们自知末日将到，惶惶不可终日。伪考试院院长陈群当即服毒自杀。陈公博在观望形势，自感不妙后于 8 月 25 日携带妻子及伪国民政府秘书长周隆庠、伪安徽省长林柏生等 7 人逃往日本。其他汉奸或设法改变身份，或奔走权门，或销声匿影，企图逃脱或减免罪责。

抗战后期，周佛海等少数汉奸发现形势不妙，便见风使舵，千方百计地和重庆国民政府接上关系。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分化和利用敌人，曾经应允他们戴罪图功。抗战胜利时，由于这一胜利来得很突然，国民政府远在四川，而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则深入敌后，因此，国民政府一度采取权宜之计，委任并责令周佛海等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但是，在国民政府的势力到达长江下游地区，京沪一带已顺利在握时，

国民政府便展开行动,以各种方式缉拿汉奸,归案法办。古语云:“天网恢恢。”往日仗势为非、不可一世的汉奸们大部分成了瑟缩待罪的囚徒。

1946年,对汉奸的审判陆续在各地展开。4月3日,伪新民会副会长缪斌率先受审,8日,被判死刑,5月21日执行,成为第一个受审并伏法的汉奸。接着,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等一一被推上审判台。

陈公博明正典刑

陈公博原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40年追随汪精卫投敌,曾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1940年5月、1943年3月两次作为伪国民政府特使访问日本。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后,陈公博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为继承汪精卫的头号汉奸。

1946年3月18日,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提出起诉,罪状共10条:1. 缔结密约,辱国丧权;2. 搜索物资,供给敌人;3. 发行伪币,扰乱金融;4. 认贼作父,宣言参战;5. 抽集壮丁,为敌服役;6. 公卖鸦片,毒化人民;7. 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8. 托词清乡,残害志士;9. 官吏贪污,政以贿成;10. 收编伪军,祸国殃民。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

陈公博被捕后,即书写《八年来的回忆》,为汪伪政权辩护,声称“南京政府五年半中,可以说无日不与日本斗争”。接到起诉书后,又精心起草《答辩书》,声称他本人“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企图减轻罪责。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布:“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

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并予没收。”宣判后，陈妻李励庄不服，以陈公博在1940年就与军统局取得联系为理由，声称“被告虽降身忍辱于伪组织，而其秘密效忠中央之事实不可淹没”，申请复判。5月16日，最高法院驳回了李励庄的要求，核准原判。6月3日，陈公博被处决。

周佛海幸免一死

周佛海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38年12月随同汪精卫叛逃，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上海市市长等职。

1946年10月，首都高等法院以“与汪兆铭勾结敌寇、秘密媾和，共同组织伪国民政府”，“滥发纸币，扰乱金融，供给敌人金钱物资”等罪名提出起诉，其律师章士钊等则提出，周曾向中央投诚自首，并曾接受戴笠命令，设计铲除敌伪特工头子李士群等，要求减刑，周本人也声称：“被告参加所谓和平运动，行为容或错误，但是动机确是在救国家。”同年11月7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判决书称：“（被告）在国家危急之秋，脱离抗战阵营，私通敌寇”，“只图逞个人政治之野心，不顾国家民族之存亡”，“纵树微功，难掩巨过”。判决后，章士钊等及周妻杨淑慧申请复判。1947年1月20日，最高法院宣布坚持原判。

同月25日，陈果夫、陈立夫致函蒋介石，认为周在抗战胜利前一年能依照第三战区的预定计划，在京沪一带暗中部署军事，使得“胜利后江浙两省不致尽陷于共党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不无微功”，希望免其一死。同年3月，蒋介石致函司法行政部，证实1945年6月，曾命

戴笠转告周佛海：“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图功，以观后效。”3月27日，国民政府明令减刑，改判周佛海无期徒刑。1948年2月死于狱中。

褚民谊依法枪决

褚民谊是汪精卫的连襟。1932年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褚民谊任秘书长。

1939年，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全大会，褚民谊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后任伪中央党部秘书长。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后，褚民谊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其间，一度出任伪政权驻日大使。1945年7月，调任伪广东省省长兼广州绥靖主任、保安司令。

被捕后，褚民谊也写过一份题为《参加和运自述》的自白书，诡称之所以叛国投敌，目的在保全国家，保障沦陷区人民，动机“单纯简洁，殊不自以为有罪”。1946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在起诉书中指责褚民谊“首奉汪逆之命”，与伪维新政府、伪临时政府商洽改组伪国民政府，是除汪精卫以外的“叛国元凶”。同时指责褚在任伪外交部长期间与日寇订立《中日基本条约》、《中日同盟条约》，发表《中日满宣言》等罪行。褚民谊拒不认罪，反称：“蒋先生是主张抗战救国，汪先生是主张和平救国，彼此主张不同，而救国则一。”同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布对褚民谊处以极刑。5日，褚妻陈舜贞声称：褚“深入虎穴”，目的在援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沦陷区人民，要求复审。29日，最高法院驳回陈舜贞的请求。8月23日被枪决。

陈璧君终身监禁

陈璧君是汪精卫的老婆，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12月随汪精卫自重庆出逃，后任汪伪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广东政治指导员。江苏高等法院在起诉书中指责其有操纵粤政断绝抗战物资来源、与汪同恶共济、主持华南特工情报、用人行政一切仰敌鼻息等四条罪状。起诉书称：“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媒敌寇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

审判中，陈璧君傲慢骄横，声称汪精卫主和“目的亦在救国”。同时，矢口否认主持华南伪特工一节。判决时，法院驳斥了她的“和平救国”谬论，但也因证据不足，撤销了对她主持华南特工的指控。4月22日，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

判决后，陈璧君表示了不服，但她表示绝不上诉，因为上诉结果不会两样。其女汪文恂聘请律师申请复判，被驳回。此后，陈璧君即被长期监禁，1959年6月，死于上海监狱医院。

王揖唐装病闹庭

王揖唐原是段祺瑞的心腹死党。1937年12月，王克敏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在北平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揖唐任常务委员、内政部总长等职。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揖唐任考试院长。1940年6月，王揖唐继王克敏之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3

年，因汉奸集团的内部矛盾，被迫辞职，仅保留汪伪国民政府委员一项头衔。

戴笠在北京借宴客逮捕汉奸时，王揖唐正在医院里养病，但不久即逮捕归案。审判时，王假装病重，要人用帆布床抬他上法庭。他一言不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法院当局不得不宣布，如不开口答讯，将视同缺席审判，依法制裁。这使他不得不改变策略。当时，审判长何承焯曾在他的手下当过法官训练所教务主任，于是他便当庭声称，何不配审他，对何说：“你赶快给我回避，让政府另换法官审讯，我王某自会语语吐实，有的是话要说。”第二天，王揖唐又在报上刊登启事称：“如谓揖唐系大汉奸，则该审判长为揖唐统治下之小汉奸。今以小汉奸而审大汉奸，天下后世其谓今日为如何世耶！”

在闹庭的同时，王揖唐又聘请律师出庭辩护，并向南京国民政府检举何承焯。后来，河北高等法院另行派人审理，判处王揖唐死刑。王不服，两次上诉。1948年9月，南京最高法院复议，维持原判。同月10日，王揖唐在北平第一监狱被处死。

梁鸿志伏法上海

梁鸿志原是安福系政客，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的卵翼下，于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任行政院院长。汪伪南京政权成立后，梁任监察院长。汪死后，改任立法院长。

抗战胜利后，梁鸿志四处避匿，均感不是安全之计，被迫投案。他在自白书中承认“对于国家立场，未经兼顾，此自是个人之昏愤糊涂，不能辞免罪责者也”，但是，他旋即又起草辩诉书，对自己的罪行一一作了解

释。1946年6月,上海高等法院公开审理梁案。梁鸿志除聘请多名律师为自己辩护外,又多方收集有利于己的证据,企图幸免。25日,上海高等法院判处梁鸿志死刑。梁及其家属不服,向南京最高法院上诉。10月24日,最高法院核准原判。执行时,梁在遗嘱中声称:“此乃佛语所谓前生罪孽。”他并对检察官说:“我是懂法律的,执行时间未免太快!”

周作人铁窗十年

周作人原系鲁迅之弟,五四以后著名的新文化运动作家。自1939年起,历任伪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是著名的文化汉奸。

1946年6月,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提出起诉,指控他担任伪职期间:聘请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启发其亲日思想等罪状。周作人则声称他参加伪组织的动机是“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前后六年,无日不与敌方兴亚院及伪新民会在争持磨擦之中”,要求宣告无罪。庭审时,法官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同时责问他为何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等伪职。据《申报》报导:周作人“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最后,“于汗流浹背下狼狈还押”。由于周作人是著名的文化人,因此,不少人为他请求轻减。11月16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判决后,周作人认为量刑过重,上书自辩称:“虽任伪职,并无罪行。”1947年12月,最高法院复判称:“申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因此改判有期徒刑10年。

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除上述诸人外,被处死刑的重要汉奸还有: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伪宣传部长林柏生、伪内政部长梅思平、伪陆军部长叶蓬、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村、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伪间谍金璧辉(川岛芳子)等。被判无期徒刑的重要汉奸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司法院长温宗尧、伪中央党部秘书长罗君强、伪最高法院院长张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等。被判有期徒刑的有:伪司法行政部次长汪曼云、伪考试院长江亢虎、伪教育部长兼外交部长李圣五等。

总计,至1946年10月,国民政府共起诉汉奸30185人,其中判处死刑者369人,判处无期徒刑者979人,有期徒刑者13570人。至1947年底,起诉人数增至30828人,科刑人数增至15391人。此外,由于中共解放区也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惩奸活动,因此,实际受到审判和惩处的汉奸将大大超过此数。

中华民族最重气节。自古以来即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说。那些横眉怒对外敌,虽粉身碎骨不改丹心的民族英雄受到人们长久的敬仰,而屈身事仇、卖国求荣的败类则永远被人民唾骂。日寇侵华期间,投敌的汉奸们虽情况各异,原因有别,有些人早年还有过颇为光荣的革命历史,但是他们昧于民族大义,在关系个人出处的大关节上失脚,结果,“立身一败,万事瓦裂”。汪精卫、王克敏等虽然幸免刑责,但是难逃历史的斧钺。他们和其他汉奸一起,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溥仪要求参加苏联共产党

伪满洲国覆灭后，溥仪仓皇出逃，于1945年8月在沈阳被苏军逮捕，解往苏联赤塔。这时，他最怕的是落到中国人手里，以为那样必死无疑。他想：如果落到外国人手里，可能还有一线生望。苏联和英美是盟邦，不妨先在苏联住下来，然后设法迁往英美作寓公。

主意既定，溥仪便为此努力。据他本人回忆，在苏联五年期间，口头不算，曾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永远居留。溥仪的这些上书，他本人没有存稿，因而不见于其口述历史《我的前半生》，但是，却被俄罗斯史学家找到了。有关情况，莫斯科1992年10月出版的《珍闻》杂志作过报道，1997年12月，台湾《传记文学》发表了该报道的中文译本。据该文可知，1945年12月末，溥仪上书斯大林云：

我十分满意，承蒙贵国政府之垂顾和不杀之恩，悉心照料，赖以存活于苏联境内，安然无恙，为此让我再次深表谢意。

不揣冒昧，斗胆提出，请求贵国政府允许我永远留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境内，这将是完善自己科学认识的最好机会。我真心愿意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同时，也要学习其他的科学。

由于该文从俄文译出，因此，并非溥仪原文。

关押期间，溥仪曾组织“皇室马列学习小组”，成员除他本人外，还有他的两个侄儿和弟弟溥杰。每天早晚各学习一次，每次一个小时。

早晨学联共党史,晚上学《真理之声》。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我的前半生》得到部分印证。该书云:“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当局发给了我们一些中文书籍,并且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党史》。”

令人意想不到的,溥仪不仅申请留居苏联,学马列,而且竟要求参加苏联共产党。据当时给溥仪当翻译的格奥尔基·佩尔米亚科夫回忆:“他当然被拒绝了。”不过,溥仪并不明白他何以被拒绝。

“共产党中连一个皇帝都没有吗?”他向苏联内务部官员提问。

“没有。”苏联内务部官员回答。

“真遗憾。我头一个加入就好了。”

为了达到留居苏联的目的,表现其进步,溥仪真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了。

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性格都极为丰富多彩,它所衍生的各种情节、细节、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常常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独特性;既有规律可循,而又出人意表。就求生、讨好、力图减轻罪责等方面来说,溥仪的行为反映出某一类人共同的性格,但是,身为战犯而企图加入苏联共产党,这又只能是久居深宫、不知世事的溥仪的独特行为。谁也不会想到这位皇帝竟是这样:既聪明,又愚笨;既可笑,又可气。

从这里,是否能悟到将历史人物写“活”的某些道理呢?

原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

南京政府崩溃时期的陈光甫

——读陈光甫档案之一

陈光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银行家，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他一生创建了两个重要企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都卓有成就。他曾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抗战的关键年代里，曾受命赴美谈判，争取援助。在战后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他又曾出任国府委员。他的档案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本文将根据该档案中的未刊日记、函札及其他资料，考察南京政府崩溃时期陈光甫的活动及其心态变化过程，从而揭示这个特定时期对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影响。

南京政府改组与张群游说

1947年2月，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物价猛涨。金价每两从法币30万元涨到110万元，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从1美元兑换6700元涨到1美元兑换1.7万元。人们普遍感到，生活的压力愈来愈难以承受。

1944年冬，宋子文利用人们对孔祥熙家族贪污腐败的不满，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取代孔祥熙成为行政院长。1946年2月，任用亲信贝祖诒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中央银行拥有黄金储备560万两，连同其他外汇，总值8.58亿美元。宋子文为了控制物价，维持法币，大量抛售

黄金和外汇。结果,仅仅一年光景,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减到 260 万两,连同其他外汇,总值 3.64 亿美元,减少了一多半。1947 年 2 月 15 日,中央银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宣布停售黄金。于是,物价继续猛涨,金融大乱。蒋介石伤心地对宋子文说:“我把财政经济交给你管,不料你竟弄得如此之糟!”^①16 日,监察院决定派员赴上海彻查,随后迅速提出了对宋子文的弹劾案。28 日,蒋介石改组中央银行,任命著名的银行家张嘉璈(公权)为总裁。3 月 1 日,宋子文被迫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决定改组政府,内定以政学系首领张群为行政院长。张群随即展开了紧张的组府、组阁活动。

鉴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早已为人们所深恶痛绝,同时,经济危机又已严重威胁着国民党政权的生存,因此,这次改组政府,既要网罗一些小党派领袖和在公众中有威望的无党派人士,又要罗致在金融工商界有影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陈光甫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于是,便成了张群心目中首要的网罗对象。

1947 年 3 月 18 日,张嘉璈的妹妹朱夫人邀请陈光甫与张群共进午餐。19 日,陈光甫日记记载道:

我去了。这是一次愉快而亲密的聚会。我们谈啊,谈啊,一直谈了三个钟头。张群是一个善于雄辩的人,有时有说服力。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此次到上海,仅仅为了说服我参加政府。

他说,蒋主席派他来,只为了一个特殊而单纯的目的,劝我出任国民政府委员。蒋主席形成了某些现实的、稳固的思想,并且企图寻找名声好的人来加强政府。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人有资

^① 经济资料室编:《宋子文豪门资本内幕》,60 页,光华书店,1948。

格被考虑,包括胡适、胡霖、莫德惠和我。^①

陈光甫并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两天以前,张嘉璈早已出面动员过。当时,陈光甫表示拒绝。张嘉璈和张群同属政学系,二人关系密切。显然,张嘉璈动员无效之后,张群亲自出马了。

“我希望您不会真如传说一样成为新任行政院长。”陈光甫试探性地提问。

“不!”张群回答。“我必须出任。我和党有40年的密切关系。我的情况和你们大不相同。你们是党员,或者不是党员,而我,和蒋主席有40年的关系。当他要求我的时候,我不能拒绝。”张群于1908年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送日本留学,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这一年加入同盟会,在此前后,与蒋介石相识,至此,差不多40年了。

“你要大力帮助我和新政府。”张群继续说,“如果你同意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将来,你会被派往美国,担负财政方面的使命。”^②1936年、1938年至1940年,陈光甫曾两次以财政部高等顾问身份被派往美国,接洽借款,均告成功。但是,这一年,陈光甫已经67岁了。张群好像估计到陈光甫会以不胜负担为理由拒绝似的,特别应许说:新的岗位将不会带来过多的麻烦,全部要做的事只是两周去南京参加一次会议。

“这完全是一个争取人们支持的问题。”张群直率地说,“我们需要广泛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有你和胡适一类人参加的原因。”

“争取人们支持是重要的。”陈光甫评论道,“但是,政策更重要。您的新政府将采取什么政策?进行无止境的战争直到共产党人被打垮和

^① 原文为英文。陈光甫日记大部分为英文,小部分为中文,不一一注明。

^② 以上对话均见陈光甫日记,下同。

肃清，还是现在就停止战争？抑或政府设定一个有限的目的，达到之后就停火？”抗战胜利后，人们普遍渴望和平，不希望国共两党之间再起刀兵，但是国民党却调集大军，进攻东北、鄂东、豫南等地的解放军。1947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担任联络和谈判的工作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回延安，内战有再次全面爆发的危险。

“是的，有限制。”张群答道，“在肃清津浦路、平汉路并且重新通车之后，政府将再次谋求和平。”1946年12月末，蒋介石曾密令各部，规定翌年上半年的作战目标是“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长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张群这里告诉陈光甫的计划显然大大缩小了。

“尽早停火更好。”陈光甫不希望打内战。他对张群强调指出，国家经济受到内战的巨大打击，有垮台的危险。

张群的两任前任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因治理经济无方而倒台的。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严峻的经济形势自然是他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他告诉陈光甫，政府准备发行一种新的货币。但是，陈光甫对此不以为然，他告诉张群，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这将是困难并且是无效的。

“政府的军费怎样？有无限制？”陈光甫深知，造成国民党政府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扩军备战，任意增加军费。另一天，陈光甫从别处听说，蒋介石在下两个月里需要2万亿元，这是任何理财能手都无法满足的。陈对张群强调指出，关键是解决经济问题。

陈光甫还对张群说：“对于新政府来说，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重视国际政策。在新体系里包括亲美分子，清楚地显示了政府倾向美国，但是不能忽视苏联。政府应该表现出，对两个国家都持友好态度。”

陈光甫还提出了一些其他问题：“您有无便捷的门路通向蒋主席？”张群作了肯定的回答。“您如何找到马歇尔？您认为能和马歇尔共处，

并且在观察问题上或多或少地取得一致吗？”张群的回答也是肯定的。马歇尔于1945年12月受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以特使身份来华调处国共纠纷。1947年1月，调处失败，马歇尔快快回国，但回国后即升任国务卿。陈光甫认为，在华盛顿没有任何人能像马歇尔一样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陈光甫并建议张群，同时兼任财政部长，以便于和马歇尔谈判。

1938年至1940年，陈光甫在美接洽借款，曾得到驻美大使胡适的密切配合，因此，当张群提到，可能为财政方面的使命派陈光甫赴美国时，陈建议再度任命胡适出使华盛顿。他说：“这是最重要而且最关键的岗位中的一个，胡适能博得美国官方和公众两方面的尊敬。在美国，他是友好的源泉。美国人相信他。如果派他去华盛顿，他将殚精竭虑地工作。”

“至于我自己”，陈光甫附带说，“我将乐于和胡适合作，尝试再次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作为老朋友，我将准备承担您认为对我适合的任何紧急任务。”

谈话中，张群没有暗示陈光甫，战争将会立即停止，军费将被限制。陈光甫得出的印象是，政府改组之后，在政策方面将不会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因此，陈光甫告诉张群：“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我将尽个人之力帮助您，但是，我将不参加国府委员会，不能以国府委员的身份尽职。”

胡适——自动出面的说客

在张群之后，胡适继续充当说客。不过，他并非出于张群授意，而是自动出面。

蒋介石要改变一党专政的形象，拉拢胡适参加政府自然是个好办法。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与傅斯年谈话，拟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胡适希望保持在野的独立地位，声称不入政府则能为政府之助力，一再力辞。3月13日，胡适到南京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蒋介石两次召见。他同意胡适不当考试院院长，但一定要胡适作为无党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19日，胡适到上海，住国际饭店，陈光甫来访，二人之间有过一次长谈。这次长谈，有位偶然在座的年轻人作了记录。

胡适首先叙述了他和蒋介石的会见：

我在南京，蒋先生找我去吃饭，他就对我说，不是不体念我的地位，非到国家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坚持要我出来的。他对我这样说，要我参加这次改组，态度很诚恳，颇使我为难。后来要离开南京，蒋先生又召见我，坚嘱我勉为其难，出任国府委员，并且说，只要来南京开开会，不会怎样影响北大的工作，如果不能每次到会，来几次也可以。

胡适接着说明了这次改组的背景：

这次改组当然与美国有极大的关系，当时马歇尔在华，就口口声声地说，希望中国的自由分子出头。他到底还是洋人，不明了中国情形，到处谈话的时候，举出胡适之、胡政之、莫德惠来作为中国今日自由进步的分子。我们在北平也见过面，他对我说：“自由分子应该请出来参加政府改组。胡博士，你当然应该头一个出来。”所以这次政府对于改组人选的考虑，显然的，很受马歇尔的影响。

中国封建传统深厚,清朝统治者、北洋军阀、南京蒋介石集团都不喜欢民主、自由。他们有时候也要搞一点民主、自由的摆设,但是,骨子里酷爱的是专制和独裁。南京政府末期,旧的一套愈加不行了,他们不得不加点新东西。不过,可悲的是,这点新东西还是洋人逼出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劝说蒋介石放弃一党专政,扩大社会基础,接纳自由主义分子,按照西方的模式改组政府。马歇尔、司徒雷登不断地和自由主义分子谈话,敦促他们行动起来,组成“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对政局施加影响”。^① 马歇尔等企图利用自由主义分子抵制中国共产党,同时敦促国民党进行改革,并对国民党注入活力。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时称:“情势之挽救,唯有使政府中与小党派中之自由分子居于领导者的地位。”^② 蒋介石要争取美国的援助,不能不敷衍美国人。当年3月开始的南京政府改组正是马歇尔意旨的部分体现。

马歇尔的提名没有包括陈光甫,胡适感到不满,认为马歇尔对中国的事情还是“十二分的隔膜”。他积极支持陈光甫参加政府改组,劝陈说:

如今听到,政府有意思要你老大哥参加改组,我倒真觉得胆壮得多。光甫先生,我认为你对于国府委员这件事倒是值得考虑的;当今的问题,最严重的还是经济问题,如果我胡适之懂得经济,懂得财政,没有问题的,我一定参加。

^①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6, Vol. 10, *The Far East: China*, 1972, p. 633.

^②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70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抗战期间，陈、胡二人合力在华府争取美援，这一段经历，不仅对陈光甫来说是难忘的，对胡适也同样如此。胡适认为，当时情况的严重不亚于抗战初期，力劝陈光甫“就范”。他说：

今天是国家紧要关头，严重的程度可以和抗战初期相比。在当时，不得已，政府把你找出来，到美国去。在今天，情形也还是如此。正如蒋先生说，非得政府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坚持要我们这班人出来。你和我，都还有点本钱，所以政府要向我们借债。抗战初期，情形那样的困难，政府不得不向我们借债，渡难关；在今天，也还是如此，向我们借用我们的本钱。从责任一方面看，我们是应该就范的。这并不是跳火坑，没有那样严重。

当时，国共谈判决裂，内战的烽烟燃起，中国的前途决定于两大党派之间血与火的角逐。胡适看出了这一点，他称之为“国家的紧要关头”。尽管胡适的政治信念与价值观和国民党并不一致，但是他寄希望于国民党的改革。他自信像他和陈光甫一类自由主义分子还有影响力，“都还有点本钱”，他要用这点“本钱”帮助蒋介石。

按照1946年1月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大会应在内战停止、政府改组、训政结束、《宪法草案》修正完成之后才能召开。同年11月，国民党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悍然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一部“人民无权，独夫集权”的《中华民国宪法》，这次会议遂被称为“制宪国大”。南京国民政府于1947年1月1日宣布，该宪法于同年12月25日施行。胡适据此怂恿陈光甫说：“这次参加政府改组，只是暂时的、短期的。在今年12月25日，宪法施行，整个的政府要改变，制度也要更改，充其量，国府委员的寿命只有九个月，所以，形势并没有像跳火坑那样严重。”

胡适完全明白,蒋介石要陈光甫出来,除了装点门面外,还要利用陈和美国的关系争取美援。他说:

当年你我在华府替政府做事,我们真是合作,因为你和我同是没有半点私心,一心一意地做我们的事。这次政府要你出来,担任国府委员,也许还要请你再去美国多跑几次,打通美国这条路。财政部的人是变了,不过财政部和进出口银行都还有你的老朋友在。还有一点,不但政府是要向我们借债而要我们出来,而且请我们参加政府是最容易的,最便宜不过的,我们不会有任何条件的。

1946年11月的“制宪国大”曾有中国青年党和中国民主社会党的代表参加。这两个党以此为条件向国民党要官要权,闹得颇为不堪。胡适谈起青年党,尤其是民社党来,连连摇头。

胡适接着按自己的理解为陈光甫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他说:

今天的大局,或者可以这样看法:从整个世界的形势来说,如今是美、苏对峙的局面,民主政治和集权政治的抗衡,没有,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只是武装和平——Armed peace。这是大宇宙(macrocosm),而中国是小宇宙(microcosm),情形也一样。最多只能做到一种国共对峙下的武装和平,做不到一般人所希冀的真正和平和统一。唯一的希望是由这双重的武装和平中慢慢的产生一种方式,而运用这种方式逐步取得真正的和平。

胡适认为:当时世界上的政党只有两种。在英美,政党的组织要 Loose(松散)得多。党员人数究竟有多少,没有人知道,碰到选举时,党员的

Vote(选票)和党员的数目不会相符,常常会 Cross the party line(越出党的行列),而投票拥戴他们自身认为满意的候选人。在苏俄,政党组织极严密,有很浓的 Indoctrination(灌输),党员应以党为至高无上,对党纲绝对遵守,对领袖绝对服从。胡适声称:孙中山是受过英美思想熏陶的人,他建立国民党,原意要建立一个英美式的政党。但是,同时,他又看到苏俄共产党组织之严密,于是有民国十三年改组,希望借鉴共产党的优点。孙中山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创立一个类似第一种政党,采取第二种政党的部分作风只是一个过程,一种办法,于是才有先训政而后宪政之说。

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长期奉行的一党专政政策,它是中国和平民主力量的一次重大胜利。会后,国民党一方面企图在实际上推翻或篡改政协协议,一方面则将政协的部分主张、口号接过来,装点独裁统治。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宣称批准政协协议。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声称,就要“实行宪政”,“贯彻我们结束训政,还政于民的夙愿”了。胡适看不出这只是个骗局,以为他梦想多年的“民主政治”就要实现了,兴奋地对陈光甫说:

这次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正是针对着这个问题,会中最重要的题目就是训政结束,宪政开始。从国民党本身的立场上来说,就是放弃这许多年所掌握的政权,亦就所谓还政于民。要一个政党吐出他已有的政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是反自然的。政党的目的是要取得政权,而不是放弃政权。所以这一次国民党的还政于民,实在是有史以来,中外政党史上从来未有的创举。

胡适实在是太天真了。蒋介石声称“还政于民”，嘴上说得诚然漂亮，然而何曾真正实行过！不要说“还政于民”，1949年初他宣布引退，让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又何曾让李宗仁真正地“代”过。

国民党内有一帮顽固分子，他们不理解蒋介石的苦心，连口头上、纸头上的“还政于民”也不赞成，1946年11月的“制宪国大”开得乌烟瘴气。胡适回忆说：

我相信蒋先生对于这件大事，他是有诚意，而且也有决心的。记得我在南京开国民大会，那真是个鸡群狗党，什么样的人都有的聚会。国民党的极右、顽固分子，猖獗非凡，有几天看情形简直黯淡得很，蒋先生找这班人去，又是痛骂，又是哀求，希望他们要认清国大的意义，这样才能有最后通过的宪法，而这宪法在大纲上是维持政治协商的原议的。这次在南京，蒋先生召我去见他，他也反复申述他还政于民的苦心。谈话中，我曾对他说，他的一大错误就是在抗战初期尽力拉拢政府中一般无党无派的人如翁咏霓、公权、廷黻等入党。蒋先生对于这一点也认错。从那天的面谈，我相信他对于结束训政、开始宪政的态度，是非常诚恳的。

胡适看出并且承认，“制宪国大”是个“鸡群狗党，什么样的人都有的聚会”，这是他老实的地方，但是，胡适还是太天真了，即使翁文灏、张嘉璈、蒋廷黻等几个人抗战初期不被拉入国民党，南京政府里有了这几位“无党无派”的人士，难道就“实行宪政”，“还政于民”了吗？

胡适非常欣赏西方国家的两党制。1945年8月，胡适在纽约时，曾经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中共能“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他对陈光甫说：

现中国最大的悲剧就是缺少一个第二政党。我曾写过一封信给毛泽东,力劝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像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一样的在野党。这就是一个观念上的错误,我没有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它根本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要它变成英美式的在野党是不可能的。

接着,胡适笑着说:“中国今天缺少一个由陈光甫 finance(财政支持)胡适之领导的政党。”

胡适批评马歇尔对中国的事情“十二分的隔膜”,其实,要求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的“在野党”,或者,由陈光甫、胡适之一类自由主义分子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都同样表现出对中国的事情“十二分的隔膜”。

“美国这条路非打通不可”

胡适本拟3月20日乘机返平,然而飞机因雨停航,胡适不得不折返国际饭店。他托人带话给陈光甫:

请你看见光甫先生的时候对他说,如果到美国去,在那里有郭泰祺先生,是他 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的老同学,还有刘锴,他们都可以像我当时在华盛顿一样的帮他忙。

郭泰祺,号复初,湖北广济人,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部长,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联会议。刘锴,广东中山人,曾任外交部常务次长。

当时二人都在美国，胡适相信他们可以帮助陈光甫获得美国的支持。

胡适讲了抗战时期与陈光甫在美国借债时的一段故事：

是1938年10月底，我们正在华府商谈借款的事，消息传来，广州失守（10月21日），紧接着就是汉口沦陷（10月25日）。当然我们觉得很忧虑，心里非常不痛快。就在那天下午，我正在双橡园家里，财长毛根韬有电话来，约我和光甫先生晚饭后八点多钟去他家 Have a drink together（一起喝点什么）。我们约定先在双橡园一同吃饭，饭后同去财长家里。我们一进他家，就觉得空气很异样，财部的要员都在。毛根韬的书记 Miss Klotz 手里拿着纸和铅笔，好像有公事要办的一样。财长看见我们，就说，借款的事已经成功了，罗总统也已经 OK 了。顺手又指着桌上的纸张，那就是借款协定的草案，接着说，这两天中国的消息不好，希望这笔借款可以有强心针的作用。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总统要知道中国政府是否仍坚持抗战到底的原议。

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真令我们又兴奋，又惊异。稍坐一下，我们就匆匆告别。本来是应约去喝杯酒的，可是根本既没看到酒，也没喝到一滴酒。只一人喝了一杯冷开水。美国政府要帮助我们，怕这两天战事失利的消息太馁人了，所以给我们这一帖兴奋剂。

和毛根韬话别后，马上拍电报去重庆，报告经过，并要求政府继续抗战的 Reassurance（再保证），好给罗总统一个答复。

就这样，向美国借款的命运大致定了。

1938年9月，陈光甫抵美。10月6日，胡适到华盛顿驻美使馆视事。二人立即合作，向美国政府洽商以桐油作抵押，换取美国的借款。最

后,经罗斯福批准,达成借款 2500 万美元的协议。这是抗战开始后美国对中国的第一次经济援助,因此,陈光甫、胡适都特别兴奋,蒋介石也致电胡适表扬,声称“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多年以后,胡适旧事重提,意在鼓励陈光甫出任国府委员,重赴美国争取援助,挽救处于危机中的南京国民政府。

陈光甫听人转达胡适的话和这段故事时,一面听,一面摇头,笑着说:“不成,不成,今天的情形和当年也大不同了。”他接着解释道:

(一)环境不同。当年去借款,在美国方面是财长毛根韬,我和他有 1936 年白银协定的经验,而我之去借款是由于他的建议(毛氏本人是一个以个人为出发点的人,所以这几年来,我和他只做到朋友,谈不到深交)。国内一方面,在家有孔庸之当家,要给我便利不少。我和他虽然也说不上是深交,可是我们是老朋友,他相信我,让我放手去干,牵制也较少,成功的机会也比较大。

(二)美国政局的不同。当年借款,正是罗斯福执政。他为人有远见,有卓识,有打算,有通盘计划。他知道要中国为世界民主国家向独裁武力集团继续抗战,美国就非得想办法接济援助不可。至于用哪一种方式,决定多少数量,那是另一件事。所以借款给中国是不违反他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今天中国再向美政府借款,对象可不同了。一方面有 Truman - Marshall 的 Team(杜鲁门—马歇尔的合作),一方面有共和党多数的国会。现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几乎完全取决于国务卿马歇尔一人,而他在离华调停失败,对我们政局的声明,很显然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要打通 Truman - Marshall 这条路,就得顾虑到他的声明所举出的几点条件不可。另一方面,要取悦于共和党操纵的美国国会,我政府势不得不取消大部分的统制,尤其

和美国商业相抵触的管制,以求迎合共和党传统的经济政策。

(三)自己本人地位的不同。如果再唱去美国谈借款的戏,我在这出戏的地位和上次迥异。上次,我是主角,胡大使是配角(很好而重要的配角);而这次如果旧调重弹,主角是张岳军、胡适之,而我只能配合他们把这出戏唱起来。

陈光甫最后说:

这些是几点主要的不同,可是,不论怎样,从国家一方看,美国这条路非打通不可!

可以看出,陈光甫所说的几点不同并不和胡适的意见对立,只是对形势作了一些比较和分析。显然,胡适的话打动了陈光甫,他准备出来“唱去美国谈借款的戏”了。

然而,后来陈光甫又有点犹豫,在上述谈话记录上写了几行字:“现在在中国情形不好。美国人有一点觉得我们政府是法西斯,打仗后又不知上进,自己人打自己人。”抗战期间,陈光甫赴美请援,是为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赴美请援,则是为了帮助国民党“自己人打自己人”。陈光甫这里才隐约地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当时,执政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属于民主党,陈光甫担心第二年共和党人要上台,“恐怕美国有大变动,军人要抬头”,因而,他认为,赴美借钱或派往谈借款的人,“必须带有政治色彩之人方为合格”。

在和胡适谈话之后,陈光甫决定出任国府委员。胡适自己本来也准备接受,但后来傅斯年劝他,不要往“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胡适听了他的话,托词身为北大校长,国府委员是特任官,不宜兼任,拒绝了。

成为国府委员之后

张嘉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政府的巨大财政赤字。据估计,当年南京国民政府短缺经费将达法币 10 万亿元。怎么办?开动机器印钞票。老资格的银行家张嘉璈、陈光甫都懂得,这个办法极为简便,但却极为危险。张嘉璈和陈光甫、李铭商量后,决定发行公债。由于法币早已失去信用,张嘉璈将新公债定名为美金公债和美金短期库券。前者发行 1 亿元,以外币或金银购买,以外汇还本付息;后者发行 3 亿元,按牌价以法币折合美元购买,还本付息时按当时美元牌价付给法币。陈光甫积极支持张嘉璈的这一措施。3 月 31 日,他带头表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愿购买美金公债 100 万元,以为提倡。这一举动,可以视做陈光甫对国民政府改组的一份礼物。

1947 年 4 月 17 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名单。在 29 名委员中,国民党 17 席,青年党、民社党各 4 席,社会贤达 4 席。陈光甫与莫德惠、王云五、包尔汉赫然同列为社会贤达。蒋介石宣称,这就是“多党之政府”了。同月 23 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行政院各部会人选,在 26 人中,非国民党员占 9 人。陈光甫从上海来,参加了这次国府委员会会议。当晚,他兴奋地对王世杰说:“国民党今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然而,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政府改组既不能解决国民党面临的严重政治危机,也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鉴于美金公债、美金短期库券的销售额都不会很大,所以,南京国民政府的眼光主要盯在美援上。4 月下旬,外交部长王世杰提出,直截了当,要求美国政府提供 10

亿美元的援助。陈光甫觉得王世杰的胃口太大,4月28日,他对张嘉璈说:“此时情况与战时情形迥异,大量财经援助,恐不可能。”1946年4月,马歇尔曾致函蒋介石,声称中国和平统一有望,为促进中国的经济复原及发展,美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对中国国营事业及民营企业提供5亿美元信用贷款,作为向美国采购物资、器材之用。陈光甫建议,不如就此题目继续做文章,说明该款之五六成,将用以在美购买棉花、麦子、肥料,其余四五成,用以购买急需的交通器材。陈光甫并提出,前者可由纱厂、面粉厂组织代表团,后者可由交通部派代表,一切照商业借款手续办理,张嘉璈问陈:“如果政府希望阁下赴美一行,有无可能?”陈答:“可任代表团团员之一。”

4月29日,陈光甫写了封英文长信给张嘉璈,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争取美援的意见,其大略为:

一、目前向美政府进行政治借款的可能性,殊属渺茫,其理由是,政府刚刚改组,绩效如何,必须经过时间证明,方足使美政府有所认识。其次,经济方面,中国无论财政、金融,均去安定甚远。

二、中国经济急需复员,而非兴建。最主要者为不断获得原料供应,使现有工厂继续开工,提高民众就业机会,缓和恶性通货膨胀,吾人应遵照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愿望,使此项贷款,基于自力偿还原则,而运用于各项计划。

陈光甫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国民党坚持内战的不满,他说:两年前,美国政府曾希望中国在经历了战争残破局面之后,转变为远东的一种安定力量,但是,现在形移势换,此一希望已成泡影,而代以怀疑与失望。因此,陈光甫力主由中国企业界代表出面洽商此项贷款。信中,陈光甫并就谈判之前的准备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30日,陈光甫又补寄了两份资料给张嘉璈,一份是他所拟的贷款谈判节略,一份是贷款还本付息表。

王世杰不同意陈光甫的意见，他对张嘉璈说：“就政治观点而言，仍应（对美国政府）作较大之要求，且看对方反应再说。”5月7日，国府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当晚，陈光甫再次面晤王世杰，说明此项美援必须是“纯商业性借款”，王世杰仍然不同意陈光甫的意见，说是“即令前后予所能借贷者是一种商业贷款，此时亦不能不以政治理由为建议之根据”。他一面向蒋介石建议，任命陈光甫为政府代表，赴美求援；一面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直接向马歇尔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5月9日，顾维钧电告王世杰，马歇尔“亟欲予我借款，只候一适当机会，现我政府已扩大改组，可说机会已到”。顾称，困难在于美国财政部等有关方面担心中国局势未定，想知道此次政府改组后，能否确实保障借款用于中国经济，“不为党方阻挠，致我政府新政不克贯彻”。12日晨，张嘉璈将顾维钧报告内容转告陈光甫。同日，陈光甫致函张嘉璈，再次陈述对争取美援的意见。

陈光甫称，马歇尔在杜鲁门政府中，对经济援华，有一言九鼎之势，因此，必须先对他说明：1. 政府今后的政治方向；2. 翔实披露经济的严重危机，同时提供切实而合理的计划。他说：“今日我国之经济情况，已濒绝境，物价不断上涨，早已引起人心不安；抢米风潮，学生罢课，工人聚众游街抗议，层见叠出；社会秩序，殊难维持。”但他又认为，只要在两三个月内运入大量物资，问题不难解决。对于王世杰推荐他赴美谈判一事，陈光甫表示感谢，但他表示，王世杰本人最为合适。信中说：“赴美谈判事项，不只局限于工商经济方面，它包括整个国策，若非对于政治全局有深切认识之大员主持，难以胜任。愚意除王外长外，实难觅合格人物。”

陈光甫之所以不愿去美国谈判，除了在借款数额、性质上与王世杰有分歧外，主要是他感觉到，美国政府、商界中都有不少人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得不到民众拥护，对中国政治与军事现状流露出愈来愈多的不

满,不愿在无把握的情况下提供援助。7月4日,王世杰约陈光甫谈话,询问他是否愿意赴美谈判借款,陈态度模糊。当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一月以前,彼尚热心,现则又现犹疑之意,盖美国对政府之态度不佳使然。”

陈光甫既不愿去美国谈判,他所能做的便是核定外汇汇率了。当时,由于法币大幅度贬值,各方竞相抢购外汇,导致黑市猖獗,美元对法币的兑换率愈来愈高。为了稳定汇率,张嘉璈于8月18日成立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以陈光甫为主任委员。但是,这个委员会并无任何基金,要稳定汇率根本做不到,于是,只能核定。每天早晨,中国、交通两家国家银行,花旗、汇丰两家外资银行的代表共4人,根据国内物价、出口贸易和黑市汇率等情况,商定当天的汇率,然后,由陈光甫召集平衡基金各委员和中央银行的外籍顾问审核。这是件很难讨好的工作。由于黑市汇率高,委员会定低了,没有人愿意出手外汇;定得接近黑市,又会造成物价上涨。委员会从成立到结束,9个月之中,共调整汇率18次,从1美元兑换法币3.8万元涨到1美元兑换44.4万元,还是远远落在黑市汇率后边。

在赤字愈来愈大、物价狂涨不已的情况下,蒋介石曾于1948年1月下旬召见陈光甫,陈表示:1.美援多少,现时不必计较,一经开始,可徐图增加;2.政府支出,必须减少;3.对于财政金融,不必过于悲观,致乱步骤,等等。这些意见,有的根本做不到,有的纯粹是空话。由于国民党坚持内战,经济状况早已病人膏肓,任何高手都无能为力了。

同年3月29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民大会”。4月,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5月22日,成立总统府。其后,翁文灏取代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俞鸿钧取代张嘉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这样,陈光甫的国府委员、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主任等头衔就自然取消,他的新头衔是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这是个闲职,没有多少事可做了。

安排退路

翁文灏内阁被称为“行宪内阁”。它一上台,物价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涨。美元1元兑换法币400万元,银元每枚值法币200万元,米每石2000万元。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外汇,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为了强行推行此令,蒋介石任命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为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经济管制区的督导员,派蒋经国到上海任协助督导员,有行政及警察指挥权,企图以政治高压手段克服经济危机。9月6日,蒋介石又在南京扩大纪念周上宣布,各大商业银行必须在本月8日以前将所有外汇自动存入中央银行。第二天,蒋特派专人赴沪,强迫商业银行交出全部外汇。

《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加剧了国民党政权和广大人民的矛盾,也加剧了其与上海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蒋经国到上海坐镇时,陈光甫认为自己的银行要完了,惶惶不可终日。但是,经济问题不是用政治高压手段可以解决的。一时货物奇缺,交易停顿,黑市猖獗,各地纷纷发生抢购风潮,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限价,准许人民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11月4日,蒋经国辞职,紧接着财政部长王云五、行政院长翁文灏相继辞职。11月26日,孙科出任行政院长。

南京政府不仅经济上全面崩溃,军事上也一败再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11月2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辽沈战役结束。同月6日,华东、中原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先后歼灭黄百韬、黄维兵团。30

日,蒋介石命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率部突围,但杜随即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

上海的资本家们坐不住了,纷纷飞往香港,观察风向,安排退路。12月初,陈光甫也到了香港。

陈光甫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不见报馆中人,也不见政界人物。但是,《大公报》还是发表了有关消息,在陈光甫头上,还加了“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领袖”等字样,这使他很不舒服。1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查此项名称之由来,乃日本人所创造。当国民军北伐之时,中交两行垫付军费,颇具努力。而银行主持人如张公权、钱新之、周作民、吴鼎昌、李馥荪等,皆为留日学生,日本工商金融界联络吾国银行家,有时亦邀余在内。自中交两行增加官股后,其大权已握于政府之手。即所谓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内部亦各自独立,不受任何人之支配,虽有每周之聚餐,亦仅谈谈人事之待遇与应付政府之法令而已。并不若美国摩根集团等等,可以指挥投资途径,性质完全不同。共产党以此项名称有刺激性,不问其内容如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称谓,而一般记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财团、四川财团、广东财团等名词以刺激人心也。

江浙金融资产阶级是影响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的一股重要力量,它可不可以称为“财阀”或“财团”,多年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问题。陈光甫的这段日记也是一家之言,可供参考吧!

香港报纸左倾的多。住了几天后,陈光甫感到,当地报纸对于有钱人逃难到此并不同情,甚且取攻击态度。宋汉章、卞伯眉等银行家到此后,都销声匿迹,不敢声张。这种情景,使陈光甫感到,有类于清末遗老

纷纷逃难至上海、青岛一般。

香港当时已经很繁荣,街道整齐,工商业发达,资产阶级财力雄厚。陈光甫认为,这是由于“英人政存宽大”,“地方官员办事精神”,加上居民奋斗,“运用天才”所致。他在日记中写道:“吾见香港,并非要看其居民之享受,街市之繁荣,而见其太平。太平二字,吾将在何处求之乎?”反过来,他对于国民党政权更加不满了,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政府近年处处消灭人民的创造力,私人企业不发达。”虽然只有寥寥两句,却反映出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曾经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江浙金融资产阶级转为它的批判者了。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香港设有分行。陈光甫对香港进行了考察,又和分行负责人谈话后,认为由于通货膨胀,内战不息,上海与长江一带分行已无法发展,香港分行将是唯一维持业务的重心,因此,又制订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准备觅地建屋,开设新的分行,中国旅行社亦同时进行,此外,还要经营房地产业。陈光甫估计,“三四月之后,上海富家必来此,需要房子,有利可图”。

12月5日,香港英文报纸 *Morning Post* 登载了“中共及各团体”的一份宣言,声称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陈光甫感觉宣言内容和济南解放后的情况一致,内心略感安慰,认为自己的事业尚可维持一短期,但方针必须配合新的社会环境。这样,他就打消了原定在香港住下的计划,决定将家留在上海暂时不搬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一来搬家费事,二来共党政策不扰动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依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12月6日,他制订了一项近期计划:1. 家不搬,仍住上海;2. 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3. 时局不好仍回香港;4. 时局好仍回上海;5. 香港房子要准备。

有时,陈光甫想起1927年的情景,又有点紧张。12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宁汉分裂之时,汉口共党政府主动,组织各业工会,清算

銀行方面首先驅逐經理，由工役組織委員會開始清算，其時我還是
 上海好，還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頗難欣賞，故還是不看見的好，其
 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覺幼稚。
 社會主義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產。叫人做工，叫人努力生產，(一)要叫
 人賺錢，(二)逼迫做工，派人押得他做工，如古時之奴才，除兩個法子之外，別
 無他法。
 中國生產政策試辦有成效者，唯有上海的办法。
 一、鼓勵投資，保護投資，香區學感印是此法也。
 二、合理工價。
 三、鼓勵外人來華投資及其技術。
 四、外匯自由，不加管理。
 五、外人可在長江內河航行，借此我們向他學習管理辦法，亦可限制中國

陈光甫日记手迹(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斗争，颇有令人难以终日之苦。”他又进一步设想共产党进入上海之后的情景：“共党号称为人民解放军，先从工人主政入手，即如银行方面，首先驱逐经理，由工役组织委员会，开始清算，其时我还是在上海好，还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颇难欣赏，故还是看不见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觉幼稚。”陈光甫认为：社会主义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产。在他看来，中国生产政策试办有成效者唯有上海的办法。他列举了十二条：1. 鼓励投资，保护投资；2. 合理工价；3. 鼓励外人来华投资及其技术；4. 外汇自由，不加管理；5. 外人可在长江内河航行，借此我们向他学习管理办法，亦可限制中国人跋扈，公务员猖狂，如此真正

为人民服务；6. 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发展生产，不受中央控制；7. 行政多用外国人，减少官样文章及不负责任行为；8. 速办学校，教育公务员而成文官 Civil Service，切切不可用党治学堂去办；9. 币制独立，换而言之，即不用发行弥补赤字；10. 裁兵，以省下之钱做救济难民工作；11. 大学由人民办，小学、中学为强迫教育；12. 此外一切新花样、新议论，严禁宣传，严禁不负责任之演讲，以免人心骚动。陈光甫的上述意见，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正确的部分，它们代表了一个金融资本家的要求和设想。陈光甫自夸：“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

陈光甫在香港没有待多久，即因事回到上海。

拒绝参加“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

香港报纸透露的中共对私人企业的政策使陈光甫略感安慰，他决定保留上海的家，自己尽可能坚守上海，直到非走不可的时候。但是，刚进入 1949 年没几天，淮海战役就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被歼达 50.5 万人。这样，京沪一带就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范围之内，陈光甫又有点坐不住了。他制订了一份个人应急计划，准备在必要时和妻子一起出走香港，在那儿安家，然后去新加坡、曼谷、仰光、菲律宾、美国等地旅行。他已向南京政府申请了护照，并且在设法取得去马尼拉的签证。

然而，就在这一时刻，发生了新情况。

1949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22 日，李宗仁发表声明，宣称“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关于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

他并称：“为集思广益，众擎易举，宗仁更已分电邀请全国各党派及社会上爱好和平人士，共同赞助。”为了试探中共方面的反映，李宗仁决定动员几位在全国公众中有影响的人士，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在南京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搭桥。在这几位人士中间，就有陈光甫。

副總統用笺

光甫吾兄勛鑒：弟出膺艱鉅，勉維現局。現決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促成和平之實現。惟茲事體大，尚待共籌。吾兄高瞻遠矚，嘉謨特派劉仲容兄代表趨詣，而達鄙意。

李宗仁致陈光甫函(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1月24日，李宗仁命刘仲容持函赴沪，面见陈光甫，函云：

蒋公引退，弟出膺艱鉅，勉維現局。現決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促成和平之實現。惟茲事體大，尚待共籌。吾兄高瞻遠

曷，必有嘉谟。兹特派刘仲容兄代表趋诣，面达鄙意。卓见所及，希不吝惠示，并盼即日命驾入京，俾得朝夕承教，至所企幸。

刘仲容(1913—1980)，湖南益阳人。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后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参议。抗战期间，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又积极为国共和谈奔走。刘仲容抵沪后，还没有来得及会晤陈光甫，就接到急电赶回南京，此函遂由章士钊转交。

1月30日，李宗仁再次派甘介侯赴沪，重申邀请之意。函云：

和平为全国人民一致之呼声，政府亦决以最高诚意，谋求和平之实现。唯前途艰巨，尚待各方共同努力，始克共济。为民请命，谅荷同情。兹倩甘介侯兄代表前来，面陈鄙悃，敬希鼎力支助，俾速其成。余情统由甘介侯兄详述不备。

甘介侯，江苏宝山人，清华大学毕业，其后又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这时，已成为李宗仁的亲信，因此，被派到上海游说陈光甫等人。

1月31日，李宗仁又偕邵力子、程思远等赴沪。当日上午，在中国银行召见社会贤达及各界名流，出席者有颜惠庆、章士钊、冷遹、江庸、陈光甫等二十余人。行政院长孙科、副院长吴铁城等也参加了召见。关于这次召见，陈光甫在日记中写道：

当夏历新年之际，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我参加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目的是寻求和平，但并不需要和共产党人谈判和平条件。更确切地说，其主要任务是使在北平的共产党领导人认识人民的苦难以及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代表团不代表官方，它将为政府

的正式代表团与赤色分子的谈判铺平道路。

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

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点，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

召见之后是午餐。餐后，李宗仁邀请邵力子、颜惠庆、梅贻琦、冷遹、章士钊、江庸、张嘉璈、陈光甫等少数人座谈，讨论派遣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李说，计划中的代表团是“和平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向世界证明他对和平的渴望，从而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个使团可以称为“敲门使团”——敲开和平之门，希望得到共产党人的响应，打开门，从而为两党之间的谈判铺平道路。李并附带说，司徒雷登大使已经让他了解，虽然没有蒋，但华盛顿仍将支持政府。

李宗仁最后几句话激起了陈光甫的强烈兴趣。一段时期以来，陈光甫听到了好几项消息。一项消息说：张群见过蒋介石，蒋透露，5年之内不打算出国，准备留下，隐退，献身于党的改造，并且训练国民党的新人。据说，蒋希望建设一个一元化的、恢复活力的党，如果现在的和平努力归于失败，就在李的后面支持他和共产主义战斗。陈光甫并被告知，这项消息已经传给了李。陈光甫听到的另一项消息是，张群即将回到四川，恢复原职，担任指挥部总指挥官，张嘉璈正计划配合此举在西南各省建立一种地方货币系统。陈光甫还听到，美国政府采取的姿态是，将不援助共产党中国。

将这些消息和李宗仁所述联系起来,陈光甫似乎感到,李宗仁计划派遣和平代表团去北平时,他的眼光注视的是华盛顿,希望这一行动将招致美国更多的财政援助。换句话说,和平攻势实际上是为了争取美国并且借此延长他的政治生命。

陈光甫赞赏李宗仁依赖美国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在中国的国家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没有美国的援助,上海的商业,包括他自己的银行早就破产了。在他看来,司徒雷登的话意味着,美国可能对一个反共的没有蒋的中国政府,或是对联合所有派别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某种“联合政府”增加援助。当时,南北之间的面粉和煤炭的交换还在继续,但是,陈光甫感到,由于共产党人取得北平,这种交换可能停止。陈光甫认为,其结果将是悲惨的:北平人民缺乏食物,上海电力公司因缺乏燃料停止发电,整个城市将瘫痪。

基于上述考虑,陈光甫认为:如果代表团能促进和平临近,从而导致某种类型“联合政府”产生,那将有益于千百万人民,如果代表团未获成功,至少也会带来美国人的同情和援助,这种援助,过去已经证明,它有益于千百万人民。因此,尽管陈光甫估计,代表团不会做成任何事情,并且他本人已经表示拒绝参加,但他仍然认为,和平代表团是有价值的,为了拯救上海和千百万人民,他应该为和平作出努力,这样一想,他又倾向于赴北平一行了。

31日晚,国民党中央社宣布:“李代总统决定,推请此间无党派之社会领袖颜惠庆、章士钊、冷遯、陈光甫、江庸等5人以私人资格即飞北平,与中共方面接触,即请推派代表,指定地点、时间,洽商和平。”

但是,想来想去,陈光甫还是决定不参加代表团。2月3日,他写了一封信给李宗仁,说明他的决定;同时,他又要求吴忠信去南京为他作出解释。

陈光甫致李宗仁函如下:

前聆赐教，欣幸何似！承嘱北访呼吁，仰征致力和平，无微不至。弟属国民，敢不勉竭绵薄，供效驰驱。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业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藉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除面托礼卿、介侯两兄分别代为转达外，谨此奉陈，敬乞谅解。

和李宗仁讨论经济问题

由于陈光甫拒绝参加，冷遁又因江苏省议会开幕在即，不克分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的人选不得不有所变动。2月6日，南京政府方面宣布，代表团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凌宪扬（沪江大学校长）、欧元怀（大夏大学校长）、侯德榜（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六人组成；代表团之外，邵力子、甘介侯以私人资格参加。甘介侯根据李宗仁的意思宣称，代表团的唯一任务为“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平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7日，中共方面广播称：“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是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如果按甘介侯所说前来“敲门”，则“和平商谈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广播称甘介侯是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以“和平攻势”为招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种货色。广播并称：“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代表团原订2月8日飞平，这样只好临时改期。

李宗仁从北平方面得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

望”。为了动员陈光甫，并且讨论日益严重的上海经济问题，2月8日，李宗仁再次飞沪。

抵沪后，李宗仁立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陈光甫、张嘉璈、钱新之、徐寄庠等上海资本家并共进午餐。召见情况，陈光甫记载如下：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

召见主要讨论经济问题，李宗仁要求陈光甫、张嘉璈等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当时，蒋介石正在秘密下令将上海库存金银秘密运往台湾和厦门，因此，座谈首先涉及这一问题。陈光甫记载说：

公权是我们的代言人，详细地讲了当前的经济形势。他将这一问题分为两部分：当地和全国。他说，实际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解救办法，不过，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应该要求中央银行将其金银保存在上海。当财政部长决定发行金圆券时，公权提出过此点。结果，同意将金银交由一个委员会保管。他说，这一步是必要的，并且是反对将金银运往南方的好理由。

陈光甫同意张嘉璈的意见，他进一步补充说：

中央银行大约现存4500万银元，按照战前的汇率计算，大约

相当于1500万美元。两个星期以来,由于物价飞涨,金圆券,这种现在的法币早已濒临崩溃。在此意义上,金圆券将立即丧失它作为交换手段的价值。部分米商早已拒绝接收金圆券,相当大的一部分公众将失去支付能力。我们可以想像,当人民无力购买基本生活用品时,情况将多么严重。

陈光甫继续说:

最严重的问题是,上海附近地区大约有20万士兵,这将是麻烦的根源,他们为饥饿所迫,将开始抢劫,从而使全市陷入混乱。这样,尽管实际上共产党人尚未入侵,上海也将很容易地崩溃,并且在事实上瓦解。

陈光甫建议,要求中央银行通过指定的银行抛售银元,以之作为吸收纸币、控制物价的办法。所有与会者都同意陈光甫的意见。

但是,陈光甫认为抛售银元只是一个临时的办法。他说:永久性的、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必须依靠美国的援助。这种援助可以在政府严格地改组并且赢得人民的信任之后开始。从华盛顿获得援助要比严格改组政府容易得多。对此,与会者也都表示同意。

黄绍竑参加了全部讨论并且同意陈光甫抛售银元的意见。他说,这一步骤将首先加强士兵的战斗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

午餐很精致,优质的白兰地酒打开了陈光甫的话匣子。他告诉李宗仁:代总统现在的职务吃力不讨好,而且坦率地说,不可能保持很久,终究必须离开这个位置,因此,必须利用机会,做自认为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他鼓励李宗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只要自认为正确的事就做。

陈光甫并向李宗仁建议，每周举行新闻发布会，让世界知道他的意图和活动。陈说：此项发布会此前在中国还无人举行过，值得一试。“关于现在中国的代总统，世界知道得太少了。代总统每周召集新闻发布会将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世界将更多地知道李宗仁是怎样一个人，反过来，李宗仁将拥有全世界的听众。”

当日下午，陈光甫去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京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的事情。甘介侯在座。他希望陈光甫重新考虑不去北平的决定，陈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问为什么，陈答：赤色分子宣称，如果代表团希望参观北平，不准备讨论和平条件的话，他们将愿意接待。我不喜欢共产党的这种广播。

这时，代表团成员之一章士钊，将陈光甫拉进另一个房间说，他已经收到北平的电报，大意是，共产党人渴望陈参加代表团，陈光甫再次向章说明了不参加的理由。

陈光甫说：上海的财政形势变得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自然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今天这种状态，眼前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我们所有的财政问题只能依靠美国的财政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人们似乎还不了解，过去两年，我们从美国大致得到了15亿美元的援助。正是由于这种援助，上海，事实上，中国才得以存在。这是我的真诚的信念。由于赤色分子持续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不能想像，我如何能愉快地和共产党人谈话。这条路线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不过，这是很明显的，在共产党人和我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且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如果我和代表团一起去北平，我当然会说出我的信念——除了美援外，我看不出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陈光甫还对章士钊说：如果共产党人对上述仅仅是纲要性的阐述有兴趣，可以打一个电报给我，我将赴平。

会上,侯德榜、凌宪扬、欧元怀也表示,不参加代表团。欧元怀并声称:共产党既采取如此姿态,在如此关键时刻,他没有空闲去做诸如此类的事情——浪费时间在北平参观。

欧元怀的话激起了陈光甫的反共情绪,他立即离开了会议。

何以不去北平

2月13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终于启程了。龙华机场人头攒动,盛况空前。邵力子笑咪咪地对记者说:“敲门是应在门尚未开的时候,我们却是去推开那个仅是虚掩着的门,我们希望的是和平之门大开啊!”说得大家都笑了。

2月14日,陈光甫在日记中再次说明了他为何不和颜惠庆等同行的原因。他说:两个星期之前,当他首先得知组织代表团的提议时,他的反应是50%愿意去,50%不愿意,甚至可以说,略微多地倾向于去。最后之所以决定不去,可能受到朋友们的影响,不过,主要出于个人考虑。陈光甫说:他不是一个年轻人,退休计划早已酝酿。去年,政府几次和他商量,要他担任这种或那种公共职务。每次,他都试图拒绝。虽然这些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却值得重视,他有可能过一种退休生活了。他认为这些有限度的成功使他有可能实现个人自由。例如,拒绝不希望担任的工作;不想说什么的时候能保持缄默;希望走动的时候能离开上海,等等。他写道:“一个人可以声称反对国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经享受并且实现了这种或类似的个人自由。”陈光甫对即将面临的共产党人充满了恐惧,担心可能失去他的上述自由。他说:“正是这些思想,使我决定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如果我和

代表团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将使自己卷入，从而中断退休计划。”

陈光甫并称，他正在考虑离开上海，以避免卷入代总统领导的现政府。他写道：“愈来愈清楚，共产党人将来到并占领上海。与其说我不喜欢他们的革命，毋宁说是因为我的个人考虑。”

在日记中，陈光甫还记载了几个朋友对他的劝告。一个姓文的将军(音译)说：和平难于实现，代表团的工作注定没有结果。如果陈随代表团前去，将可能遭到共产党人的攻击。

胡适也劝陈光甫不要去。他说，除了颜惠庆可能是例外，其他人都不重要人物，和他们一起去不值得，代表团将不会有任何收获。

另一天，乔治叶来看陈光甫，听到陈拒绝去北平后很高兴，他告诉陈，不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中国，政治将长期混乱。陈代表着两家成功的企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旅行社，不应该使自己卷入，从而损害了这两家企业发展的机遇。

陈光甫写道：

我感谢这些和别的朋友们，他们关心我的幸福。在他们的劝告和鼓励下，当李代总统2月9日来到上海要求我重新考虑的时候，我才能作出明确的答复。

对于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来说，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议上，我太“滑头”了。是的，“滑头”，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个褒义词，它的意思是见风使舵，利用形势以达到自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记中澄清这一点，我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滑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我可能完全不了解形势的错综复杂和后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议。

看到了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2月14日飞抵北平，陆续与叶剑英、聂荣臻、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诸人共同或个别洽谈。22日，应邀赴石家庄中共中央所在地会晤毛泽东、周恩来。24日返平。27日带着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信飞返南京。4月1日，南京政府所派和平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等一行抵达北平。同月15日，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8条24款。中共代表宣布，南京政府必须于4月20日前表明态度。4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和平谈判破裂。

4月21日，谷正纲、潘公展、赵棣华自溪口回上海，由杜月笙以请吃茶的名义邀请上海资本家座谈。这几个人“带来蒋先生的话”，其内容据陈光甫记载，大致是：“北伐时上海这班人帮他的忙，如今重新表示感谢；今后如北伐时一样，还要希望我们这群人(颜骏人、钱新之、我等)帮他的忙。如今和谈决裂，共产党对内无 Principle(原则)，对外要走亲苏的路线，与过去外交中立，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决心破坏20年来国民党的政绩，而所提的条件直似无条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只有继续作战。蒋本人表示决不出来，全力支持李德邻。”会上，谷正纲并提出口号：“拼命保命，破产保产。”

北伐时期，陈光甫等上海金融资本家曾以财力支持过国民革命军；“清党”时期，陈光甫等又曾以财力支持过蒋介石反共；谷正纲提出“拼命保命，破产保产”，无非是要陈光甫等再次拿出钱来支撑国民党的残局，然而，时代不同了。

陈光甫没有吭声,他知道自己情绪不好,说出话来不会好听,心里在想:

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

陈光甫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从这一页日记可以看出,连他心中也积郁着对国民党的深刻怨愤,并且,连他也看出了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这一事实雄辩地说明,中国历史上天翻地覆的时代快要来到了。

会议开得很冷清,说话的人不多,也没有新意见。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蒋介石的“慰问”与北平的邀请

——读陈光甫档案之二

1949年春。

人民解放军于4月21日横渡长江。23日，占领南京，降下了“总统府”大门上空飘扬多年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解放军官兵人不卸甲，马不离鞍，风卷残云般地扫荡长江下游三角洲上的残敌，迅速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

4月下旬，陈光甫丢下了苦心经营多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安乐舒适的家，匆匆逃到香港。一个月之后，上海解放。

当时，像陈光甫一样逃到香港的上海资本家颇不乏人。蒋介石觉得这是一批可以争取的力量。于6月底派“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携带他的亲笔信到港“慰问”。信谓：

当北伐之时，上海工商各界一致拥护赞助，政府得力颇多，此次退出上海，政府未能为工商界安排，闻受损甚大，殊为抱歉，派洪来慰问。倘工商界有需政府协助之处，当为办理云云。

7月2日晚，杜月笙为此在寓所设了两桌筵席，邀请潘公展、吴开先、宋汉章、钱新之、周作民、石凤祥、王启宇、唐星海、吴坤生、刘鸿生、杨管北、陈光甫等出席，大多是上海资本家，也有少数CC分子。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接到了请帖，但没有出席。席间，首由洪兰友致词。他声称：

蒋总统与李代总统意见已趋一致，颇为融洽。今后政治上有团结之重心，一切俱转好象。

军事上现在中共供给线拉长极远，千里运粮，已背孙子兵法，为兵家所大忌。而且中共占领上海，问题甚多，背上此大包袱，足够其头痛。政府已拟有作战计划，切实布置，中共顿兵，所以不敢轻进。

当时，蒋介石正在乞求美国出动兵舰封锁大陆各海口，因此，洪又称：

外交上美国对于封锁共区海口一事，复文谓遇有损失，须照赔偿云云。彼既只谈赔偿，事即好办，封锁可顺利进行。英国态度虽然强硬，亦不至采取干涉行动。

洪并称：“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将发生，是以政府可得最后胜利。”洪兰友之后，原《申报》董事长、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原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接着讲话。由于蒋介石信中有上海工商界“受损甚大”一类的话，因此吴开先要求台湾方面“最好首先做几件事情，有所表现，不至像过去之徒托空言，方可告慰于在座诸位”。陈光甫觉得这一天晚上，只有吴开先的话“尚堪动听”。他最反感的是洪兰友说的一套，当日在日记中写了一长段驳论：

政府向来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来一次，未免难受。洪述各点，皆不符于实情，蒋、李（宗仁）两人之隔阂甚深，当竞选副总统时，蒋自居于家长身份，属意孙科，而李竞选成功，蒋极不满，从此即不融洽。蒋退位后，李出任代，毫无实权，蒋仍暗中指挥，例如白崇禧拟就防御计划，需要宋希濂部

队合作，白亲到广州与何应钦面洽。何当与宋通电话，告以应遵照白之计划办理。宋答尚未接到彼之命令。何又告以此乃本人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之身份所发命令，宋仍答以须待彼应得之命令。何放下听筒，与白相对无言。又如胡宗南守西安有部队 20 万人，其时中共尚未向之进攻，胡接蒋令退守汉中，西安各界劝胡勿退，谓汉中缺粮，而西安可得供应，胡仍照撤。胡之撤防交由马步芳接收，马因不能及时赶到，告胡稍迟一星期再行，胡亦迫不及待，急速撤守。迨马步芳与中共接战，共军后退时，胡部又复进驻。如此情形，何能抗共！兵法首重攻心，其次攻坚。今不闻筹谋如何攻心之法，而指挥更不能统一。退位者仍握权不放，使当政者莫能展布，实谈不到转好现象。

这里所说的“退位者仍握权不放”，指的正是蒋介石。对于洪兰友所称“中共补给线过长”问题，陈光甫认为：“中共组织颇好，有其刻苦耐劳之精神，亦不难有克服之方。”这样一分析，陈光甫觉得洪所称军事上、政治上俱有办法云云，实不足信，只有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问题，陈光甫不能拿得很准，但他问过这几天正在香港的美国华人领袖李国钦，李称，纽约的看法，近 20 年间或不至发生。这样一想，陈光甫觉得，这不过是国民党人的幻想和期望而已。

1948 年 9 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收购金银、外币时，蒋介石也在南京发表过一次谈话，痛斥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只知自私，不爱国家”，严令各银行在两天内将全部外汇资产移存中央银行，不得稍有隐匿。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陈光甫记忆犹新：“辞令严厉，有若疯狂”，“令人难堪，亦令人不解”。但是，曾几何时，蒋介石又派洪兰友“慰问”来了。思前想后，陈光甫颇有啼笑皆非之感。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皆出于蒋一时之冲动。蒋于国事，无论懂与不懂，一切必须亲为裁决，不旁谘博询，不虚心下问，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

陈光甫这里偏重个人责任，并没有正确说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致成今日之局面”的真正原因，但是，江浙金融资产阶级长期支持、信任蒋介石，陈光甫的这页日记说明，蒋介石立脚的地块动摇了。

在洪兰友抵港前后，北平方面也在争取陈光甫。

和陈光甫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的李国钦原是长沙人，毕业于伦敦皇家矿业学校，获得矿冶工程师学位。1915年归国，在湖南从事采矿事业。其后，历任华昌矿务公司纽约总办事处经理、华昌贸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政府财政部及农商部驻纽约代表等职，长期生活在美国，和美国官方及工商各界均有广泛联系。这时，正在香港通过章士钊的关系，想赴北平会晤毛泽东。章士钊积极为之联系，并拟动员陈光甫、李铭二人同行。7月1日，陈光甫日记云：

昨天6点半左右，章士钊和我约定，他和他的第二个妻子一起来，问我是否准备和K. C. Li(李国钦)一起赴北平。他说，他已经向李提出建议，有李铭参加也很好。

我告诉章，现在，我不能作这次旅行。他说，毛泽东正在等待他的关于我们三人能否北上的电报。我既已拒绝，章希望知道，将用什么理由回答毛。我解释说，理由很简单。我现在还有营业机构在尚未被共产党人“解放”的地区。如果我赴平，将被蒋主席理解为一种敌对行动，他将很可能对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广州和台湾等地的分支机构搞点动作。章听了我的解释后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他将打电报告诉毛上述大意。我必须说，章的话听起来很像毛在香港的特别代表。

我提醒章，此地天气过热，李铭和我，很可能去日本观光。

尽管陈光甫并不热心前往北平，但他却很希望李国钦能够成行，并且希望通过李，在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联系。他对章士钊说：

李是一个充满色彩的人。他可能希望处于这样的位置——在他回到纽约之后，能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在中国见到了毛泽东，我更认为，比起李铭、侯德榜和我来，李是最适于和毛接触的人。我们在中国都有商业利益。不像李一样能够以中间派的身份说话。作为一个商人，他最能使毛认识到一项受到西方民主国家援助的工业化计划的重要，李可以告诉毛，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由于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各种关系，如果共产党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进并且为得到他们的承认而进行谈判时，李最有资格成为新政权的代言人。

陈光甫长期反对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但是，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如日之东升一样，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他又在为新中国设计了。陈向章士钊建议，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府如果名为联合政府，那就应该包括像李国钦这一类的人，以便驱散西方国家的怀疑。他可以担任外交部长或驻华盛顿的大使，这样，就会逐渐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章士钊同意陈光甫的意见，但认为李不会接受此类提议。陈光甫却不这样想。

章士钊告诉陈光甫，毛泽东将乐于见到他。陈认为，这不是毛的主意，而是章对毛的建议。这次谈话使陈光甫感到，章正在动员他认为有价值的人为共产党人效力。

当晚，陈光甫举行家宴，参加者有李国钦、侯德榜、张嘉璈、李铭等。

陈光甫听说，侯德榜第二天早晨就要乘轮赴津了。章士钊曾计划安排一架飞机，但未能实现。

7月4日晨，陈光甫接到了留守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伍克家打来的电报，其中包含着黄炎培的电报，转述了周恩来对陈光甫的劝告，电云：

利孝和兄转世丈：归自北平。先悉兄已离沪。临行恩来兄嘱为劝驾早归，共为新中华努力，其意甚诚，特为转达，不久通航，亟盼握谈。炎培。东。家。

同日，陈光甫复电伍克家，请伍代他表示对黄炎培的感谢，说明因健康原因不能归去。电文如下：

上海家弟，接孝和兄转台电洽悉。兄因头晕，在港诊治，医嘱尚须长期疗养。任老盛意，极深纫感，即烦代为转申谢悃是荷。绶。

此电说明，尽管陈光甫的思想感情发生了若干微妙的变化，但是，他对于回到大陆仍然顾虑重重。

当时，北平方面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新中国建立的各项大计，中国共产党自然希望陈光甫这样有影响的银行家归来，共襄盛举。1949年9月12日，李济深派李绍程携函赴港，面见陈光甫，函云：

迩近人民革命军事空前胜利，全国各地完全解放指日可期，百年来帝国主义所予中国经济发展之桎梏，已因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崩溃而告解除。今后新中国经济建设，将在中共毛主

光甫先生賜鑒：

適近人民革命軍事空前勝利，全國各地完全解放指日可期。百年來帝國主義所予中國經濟發展之桎梏，已因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統治崩潰而告解除。今後新中國經濟建設，將在中共毛主席領導之下，由人民共有的國家資本，和民族工商業的私人資本，分工合作，有計劃有步驟地促進民族產業之發展，新民主主義之實現。

新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係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命駕北來，共商一切，則集思廣益，眾擎易舉，未來經濟建設進展之順利，蓋可預卜也。尚此佈臆餘由李同志面達，尚希

惠予賜教，不勝感幸，尚此頌頌

台綫

弟李濟深

李濟深致陳光甫函（采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

席領導之下，由人民共有的國家資本，和民族工商業的私人資本，分工合作，有計劃有步驟地促進民族產業之發展，新民主主義之實現。

新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係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達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凡有利國計民生之私營經濟事業，均堅決保護，鼓勵積極經營及扶助其發展。對於產業金融界諸耆宿及以往有經驗的企業經營專家，尤能望推誠合作，共策進行。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集會於北京，商討成立人民民主聯合政府，並規劃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方案，久欽先生領導民族工

商业界，夙著勋猷，今后国家经建大业，需助正殷。特就李绍程同志南来之便，略贡所知，祈能命驾北来，共商一切，则集思广益，众擎易举，未来经济建设进展之顺利，盖可预卜也。

当时，中共的许多统战工作是通过民主人士来做的，因此，这封信不应该看做一种私人行为，而是代表了中共方面对陈光甫的争取。函中所称坚决保护“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愿与“产业金融界诸耆宿及以往有经验的企业经营专家”推诚合作等，也正是中共的政策。这封信多少打动了陈光甫，10月31日，陈光甫复函李济深云：

久别时念，居恒阅报，仰见勋猷懋著，弥切钦敬。日前李绍程兄来，交到惠函，详示各节，诸承盛意，纫感无既。弟与绍程兄晤谈一切，均经奉悉。惟以在港养痾，因失眠症颇觉严重，且耳鸣头晕，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继续就医中，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辱荷垂注。除托绍程兄代为面达外，谨此布复。

此函虽声明病源待查，继续就医，但表示“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显然，在北京的邀请面前，陈光甫怦然心动了。原稿中还曾有“自维虽届衰年，顾一生致力于服务社会，此志不懈，自当为新中国效微劳以竭余力”等语，更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陈光甫心中所激起的波澜。但是，陈光甫考虑再三，还是把这几句话勾掉了。

北京方面感到了陈光甫的变化。11月10日，章乃器致电林仲容，邀请陈光甫、李铭等人北上。11月11日，陈光甫复函云：

弟年近七旬，精力就衰，4月间因疗养方便来港就医，头晕耳鸣之病源尚未查出，复有失眠，病态严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

离。迭荷友好邀约，均无法应命，心中至为歉悵。惟望健康稍复，即行首途，届时自当访候聆教。

这封信和复李济深函的态度一样，对于北上邀请，不拒绝，但也不准备在近期就道。

就在此际，在上海的商业储蓄银行业务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和人民政府之间出现冲突。11月19日，陈光甫约李绍程吃饭。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事现在要通天，讲一个道理。我想共党人士的作风，亦是如此，但沪行人员已存恐惧之心而软化，迭次来电云：我方有责任，并意赔千数，冀可早日了事。具此心理，何能折服对方。可虑！

从这段记载来看，陈光甫不满意沪行人员的“软化”对策，他要“通天”，据理力争。

此事的具体情况及后来的发展，现在还不清楚，但陈光甫北上的念头，大概从此放弃了。

1950年10月，有两个自称“潘忠尧、张惠农”的人来访，二人携带具名周恩来的一封信，内称要在香港办一份报纸，希望陈光甫帮助。函云：

久仰渠范，弥切钦迟。国步维艰，胥凭英杰作中流柱，共挽狂澜，翘首云天，咸盼出岫。潘忠尧、张惠农同志因公赴港，特着晋谒崇阶，希予延见，代为致意。伊等拟在港筹设日报一所。惟创办伊始，尚望海外贤达，时赐匡助，使此文化事业，俾底于成，党国前途，实深利赖。

这封信所用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用笺，共两页，手写，并有签名，但均非周恩来手迹；签名下盖有“周恩来”印章一方。其中“党国前途，实深利赖”等语，不像中共和周恩来的语言。现在看来，大概是台湾方面对陈光甫政治态度的一次试探。

1954年，陈光甫在观望几年之后，终于去了台湾，在台北成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于1976年7月1日病逝在那里。

原载《团结报》，1992年5月2日，略有修订，今据拙著《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收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从大举进攻到全面败北 ——读蒋介石致熊式辉手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有蒋介石致熊式辉手札多件，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的重要资料。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向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军发起进攻。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即将成为事实。10日、1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及其他命令，要求各解放区部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接受日军投降，并令在冀热辽边区的部队迅速深入东北。与此同时，蒋介石则下令各解放区部队“原地驻防待命”，并在美国的帮助下抢运部队，接受沦陷区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于是，国共两党间一面在重庆举行谈判，一面开始了紧张的角逐。

8月31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同时将原东三省划分为九省二市，分别任命了省长和市长，以示其对于东北的统治权。10月18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积极准备进攻东北。与此同时，共产党也针锋相对，积极准备抗御国民党军。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19日，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打击和阻止国民党军北进，控制东北。此后，陆续派遣10名中央委员、10名候补中央委员率领2万名干部和11万部队进军东北。10月下旬，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名东北民主联军，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政治委员。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生死较量首先在东北展开。

大举进攻

当时,东北处于苏军控制之下,蒋介石要接收东北,不得不和苏方交涉。1945年9月4日,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协助熊式辉进行谈判。最初,蒋经国等根据蒋介石的意见,提出以大连港作为国民党军登陆的地点,但苏方强烈反对,不得不改变计划。10月23日,熊式辉与蒋经国会见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在葫芦岛及营口的登陆计划。10月29日,蒋介石致熊式辉函云:

刻与美军商定,我军决在秦皇岛先登陆一军(即十三军)(先头运输),至另军约须下月初旬到达葫芦岛,如形势未能变更,亦仍在天津登陆,由铁路向东北运输也。惟与苏军仍应继续交涉,要求其负责协助我军在葫芦岛登陆也。一面必须要求其由沈阳至山海关段铁路,负责保护,协助我运输,此应作为主要交涉也。

蒋介石担心新计划仍然会遭到苏方的反对,因此,作了两手准备:一面以已为美军控制的秦皇岛作为登陆地点,一面命熊等和苏方交涉,如苏方不同意以葫芦岛为登陆地点(即函中所云“形势未能变更”),即在天津登陆,利用北宁路向东北输送。蒋经国1945年10月29日日记云:“下午一时会见马林斯基,彼对重要问题,皆不作正面之确定答复,即关于葫芦岛我军登陆一事,俄方亦不愿作安全之保证。”^①指

^① 《五百零四小时》,《蒋经国自述》,14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的就是有关交涉。

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国民党军队第六十军曾泽生部、第十三军石觉部、新一军孙立人部、第七十一军陈明仁部、新六军廖耀湘部等先后到达东北,和共产党的矛盾日形紧张。蒋介石 1946 年 3 月 30 日致熊式辉函云:

东北执行组方针及我方应取之态度,特派范汉杰同志来锦面详一切,并留其在东北协助一切可也。

1945 年 12 月 20 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华。次年 1 月 7 日,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商讨国共两党间停战及整编等问题。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停战协定,但国民党坚持不包括东北在内。14 日,国民党、共产党、美国政府三方代表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2 月 25 日,军事三人小组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3 月 27 日,通过《东北停战协定》,规定停战期七天。29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发表公报,决定派四个执行小组赴东北。次日,蒋介石决定派范汉杰赴锦州,向熊式辉传授机宜,并留范在东北策划。本函即作于当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以最快的速度消灭中共在东北的主力,尽量占据有利地位。对此,郑洞国回忆说:“我们的方针大致是,乘三人小组未到东北之前,尽可能扩大占领地区,首先要控制铁道沿线的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将来停战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①这段回忆是符合蒋介石当时的思想的。

4 月 6 日正午,蒋介石致范汉杰转熊式辉函云:

^① 《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20 辑,57 页。

我军应在四平街以南地区与赤匪决战，以期彻底消灭其主力，则今后东北即易为力矣。如兄等同意，则新一军暂缓北进，即在现地整顿，而调新六军、第五十二军以及其他有力部队，全力北进，予匪以歼灭之打击，并准备用空军临时助战，以期一网打尽，为东北根本之图也。希以此意转示郑、梁各副长官、赵参谋长、各军师长参谋长可也。

四平街当时是辽北省政府所在地，为东北交通、工业及军事重镇，中长、四洮、四梅等铁路在此交汇，东北郊山峦重叠，西南郊河流纵横，为通往长春的咽喉要道。蒋介石决心在这里和共产党人打一场恶战。同日16时，蒋介石又致熊式辉函云：

望于本月10日召集师长以上之高级将领在锦州或沈阳开会，此间当派何总长、白副总长或陈部长来锦参加会议，面达机宜也。惟要旨仍不外附函中所述方略，请照此预备，但须极密，尤不可以派大员来锦事为任何人所知也。集会当以兄之名义分别电召，亦不可言明开会也。何人来锦，约8日下午可决定电告。兄如接“敬(修)(健)兄后日起飞”，即知何总长10日来锦矣！万不可派人到机场迎接，必须极秘，勿为共党探悉为要！

何总长，指何应钦，时任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白副总长，指白崇禧，时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陈部长，指陈诚，时任军政部长。蒋介石布置熊式辉在锦州或沈阳召开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并拟派何应钦等参加，可见他对该会的高度重视。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谈判期间，因此，蒋介石叮嘱熊式辉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特别要注意“勿为共党探悉”。

附函共三份,细致而具体地提出了作战方略。机密(甲)第 9349 号云:

我军应集中所有全力,凡最有力之部队,皆应向北抽调,先击破四平街以南之匪部,故应从速调整现在散漫之部署,至于新到后续部队,应全部控制于北宁路全线,而津滦空虚,更应从速负责增强其兵力与防务为要。

机密(甲)第 9350 号云:

新一军方面战况如何,无时不在深虑之中。详察我军在东北部署,散漫薄弱,而在北宁全线后方基地尤为空虚,此最为不可。应即重新调整,尤应将第五师归还津滦方面其本军之建置,切勿再事延宕,贻误大局。如我军决心向北挺进,则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对法库、康平方面,是否应用七十一军全部前进,亦应研究。中极不以现在此种散漫部署为然也。目前匪部主力全在沈北,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匪部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而今后新到之六十军等,应全部控制于北宁路全线,万勿再忽视后方交通基地。此次东北作战,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则全局皆危,国脉将断。希兄负责审慎,勿使有万一之挫失也。

机密(甲)第 9351 号云:

沈阳、锦州应派机保护基地,前方如有需要,应派机侦察匪情,协助我陆上作战,若在紧急战况,或发现重要有利目标,亦可对匪

射炸。然此只可偶然为之，不可常用。惟苏军所驻地点及其附近上空，应避免进入，以免发生波折，故侦察机北至四平街以南为止，对沈阳、海城以南，则不可用飞机侦察也。若炸射动作，则仅以前线作战最激烈之地点为限也。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军在上党、邯郸有过战斗，国民党军都处于下风，蒋介石决心在东北打出个局面来。“东北作战，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全局皆危，国脉将断”云云，可见东北战场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国民党军由铁岭、法库分别北犯，中共方面则以十四个师(旅)的兵力阻击并守卫四平街。17日，蒋介石派白崇禧到沈阳视察，白对杜聿明说：“只要将四平街打下，对中共的和谈即有面子。”^①18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四平街。21日，蒋介石致熊式辉函云：

东北军事甚为焦虑，特再派员前来授旨，务希照办为要。

函末，蒋介石附言云：“汉杰同志可先回渝面报。”军事上的大忌是“遥制”，蒋介石身在重庆，却要“遥制”千里之外的东北战场，不仅派员“授旨”，而且要求“照办”，在这种情况下，其部属是很难指挥作战的。

当时，马歇尔正在调停，蒋介石企图争取时间，占领长春，四平街在所必得，因此，一再采取措施，力争速胜。而中共中央则希望在四平街给予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以便争取较好的谈判条件。5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林彪说：“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

^①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47页。

尔、民盟和我党三方面同意的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那时，便可求得有利于我的和平。”^①5月3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林彪和彭真，要求坚决保卫四平。但是，由于力量悬殊，东北民主联军伤亡8000余人，被迫于当月18日撤离四平街。22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28日进占吉林。蒋介石兴奋之至，于24日飞抵沈阳视察，30日返回北平。31日致函熊式辉云：

途中研究东北内部，以人事之关系最大。中意如兄以行政长官兼辽宁主席，则沈长人选是否以徐箴为宜，亦希考虑详复。道儒来平时拟另予位置。在其任务未发以前，暂以梁华盛代理省主席名义行之如何？

徐箴，字士达，安东（今辽宁）新宾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时任辽宁省主席。从本函看，蒋介石一度考虑以熊式辉兼辽宁省主席，而以徐箴改任沈阳市长。道儒，指郑道儒，天津人，原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时任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广东茂名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从本函可以看出，由于国民党军占领长春、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地区，蒋介石以为东北大事已定，在调整人事安排了。

^① 转引自陈沂：《四平保卫战》，《辽沈决战》（上），224页，人民出版社，1988。

停战烟幕

尽管各界人士强烈呼吁东北停战,但是,却迟迟难以实现。现在,国民党军攻占四平街及长春等地,占了大便宜,蒋介石终于点头了。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协议,在东北停战15天。6月7日,蒋介石致熊式辉函云:

2日函悉。近日回京事忙,不能详加研究,一俟稍暇,再行商讨。惟行营此时不能取消,兄亦不能摆脱此重任也。停止前进令既下,我军在此十五日之内,必须绝对遵守令旨,勿予匪方稍有借口之资料。匪必不能在此短期内就范,则十五日之后,我军仍须照预定计划,一举而收复安东、通化也。安东省主席赵家驤、赵公武皆可,届时当再决定。惟现主席高惜冰应予安置。中意高任沈阳市为最宜。董文琦调永安市长,而现任长春市长,一望而知为弱不胜任者,亦应从速决定人选,希详报。郑道儒决调关内任事,彼亦甚愿也。

赵家驤,字大伟,河南汲县人,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兼沈阳警备司令。赵公武,时任第五十二军军长。高惜冰,辽宁凤城人,毕业于美国麻省罗惠尔理工学院。1945年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次年9月任安东省政府主席。董文琦,吉林双城人,毕业于日本名古屋工业大学。后曾任东北水利总局局长,1946年1月任沈阳市市长。“现任长春市长”,指赵君迈,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42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用牋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用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六日

不能取消 又在不能
 擺脫此重任也停止
 前進令既下我軍
 在此十五天內必須
 絕對遵守命令吉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六日

天翼主任 主任勳
 二日函奉 道日回京
 事忙不能 詳加研
 究一俟稍暇 再行
 商討惟行 業以時

蒋介石致熊式辉函手迹(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年任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12月任长春市市长。此函表明,蒋介石的停战令不过是掩人耳目之计,一场新的进攻正在酝酿。

同函,蒋介石将6月6日致马歇尔备忘录附寄熊式辉,要他和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详阅”。

蒋介石致马歇尔备忘录云:

阁下5月26日大函所示之建议,余根本上极表赞同。为使阁下建议之意见及目的更为明晰起见,特为提出下列数点,尚祈鉴照。余过去五个月来所获痛苦之经验,使余于应付共产党时更为准确切实,诚盼阁下对于下述各点予以充分之谅解与支持。

(一) 阁下建议余下令国军停止前进攻击及追击共产党,此固不仅为阁下之愿望,余最近前往东北时亦抱此愿也。是以,余近日

已下令在东北之国军自明日正午起，至6月21日正午止，在此15日内准停止对共产党之一切攻击、前进及追击，并盼在此时期中对于业已签订各协定之详细实施办法均能完成，惟须请阁下自共产党方面获得保证，将整军协定立即在东北首先实行，并请阁下在此时期内议订实行2月25日所订整编及统编军队之整个计划，并将实施之具体办法示知为荷。至于阁下暨中共代表所建议派遣执行部前方小组往东北一节，自可派往长春先作准备工作，俟具体办法解决之时再行开始其任务。

(二)关于修复铁路及恢复交通一节，余认为有关此事之决定权应赋予美方代表，即由其决定最后完成修复之时期及进度，否则，即无从保证其实现。

(三)余特为强调一点，即政府接受东北之神圣职责不应久延，是以，1月10日停战协定中所规定政府对于收复主权保持自由行动一点，应始终予以维持。例如倘共党仍继续其目前所为，在长春以南之海城附近攻击国军，则国军仍保持其反攻之权。此应特别声明也。

5月26日，马歇尔曾致函在沈阳的蒋介石，建议立即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同时发出在24小时内停止国民政府军队前进和追击的命令。马歇尔声称：“如果你不能做到上述两点，就将违反你最近向共产党提出的建议。”^①29日，马歇尔致电蒋介石称：“国民政府军队继续在满洲前进，你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停止冲突”，“使我作为一个可能的调解人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也许不久实际上陷于不可能了”。^② 蒋介

① 《马歇尔使华》(一)，102页，中华书局，1979。

② 同上，104页。

石无奈,同意在东北停战 15 天。备忘录即是对马歇尔 5 月 26 日信件的回答。备忘录中,蒋介石特别强调,“接收东北”不应久延,政府“保持自由行动”云云,都是为了重新挑起内战埋下伏笔。蒋介石要熊式辉、杜聿明“详阅”,也是为了要他们注意这一点。

6 月 17 日蒋介石致熊式辉、杜聿明函云:

停战令期满以后我军行动应重加研究,切勿稍有疏忽,免误全局。否则,功亏一篑,不能不为之戒慎恐惧,尤以东北地位与处境,不可不熟虑深思,期无万一之错失,以东北兵力在此两个月内无法增加与补充也。故照现有兵力,在停战期满以后积极攻取安东与通化,同时并进,及其占领以后,是否更觉防广兵单,此其一也。

以战略与政略论,我军对哈尔滨之进退取舍之方针最为重要。我军此时如能用全力占领哈尔滨,先打通哈尔滨至沈阳一段铁路,于外交与政治上自为有利先,而且不患共匪破坏该路。如此比较,先取安东、通化为安全,而且兵力亦容易集中与运用。预料此时进占哈尔滨时,外交上不致发生困难。故此时先占哈尔滨,而致安东于缓图,亦一方案,应加考虑。此其二也。

但安东、通化不先收复,则匪之山东来源不能断绝,而且我沈阳侧背时受威胁。中意在此二案之中,必须决定一策,否则期满以后,暂时不动为宜。故派至柔兄前来面商一切,望详加研讨后决策呈核,再行实施可也。余不一一,皆由至柔兄面达一切。

至柔,指周至柔,蒋介石的亲信,原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时任空军总司令。按蒋介石的本意,15 天之后要立刻恢复进攻,但是,是先进攻哈尔滨,还是先进攻安东、通化,蒋介石踌躇难定。在进占四平街、长春、吉林之后,国民党军战线拉长,已经感到兵力不足。本

函中,蒋介石明确地告诉熊、杜二人:“东北兵力在此两个月内无法增加与补充”,并担心攻占安东、通化后“更觉防广兵单”,倾向于“期满以后,暂时不动为宜”。可见,蒋介石已经感到背上包袱的分量了。

转入守势

蒋介石的“暂时不动”维持了四个多月。10月中旬,蒋介石觉得修整得差不多了,又着手布置新的进攻。他一面发表声明,提出所谓八项停止冲突条件,作出和平姿态,同时制订了一项“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计划,企图集中兵力,首先消灭或逼退南满的中共部队,切断东北解放区和华东解放区的海上联系,然后进攻北满,控制整个东北。18日,蒋介石致函熊式辉、杜聿明云:

前函谅达。收复安东,未知时间能及否?巴黎和会结果,欧洲与近来重要问题并未有所解决,俄国对我国东北之干涉尚非其时,故吾人尚有豫余时间策划北满。但安东能在此次停战令以前收复更妥,否则盖平、岫岩应可相机收复也。自中声明以后,中共尚无反响,惟我军仍应作其不接收条件之准备。即使停战令发表,亦必有三五日之犹豫时间耳!天翼兄如能于下月初来京一叙,甚盼。否则请公权兄先来协助国大之召开。请先准备为荷。

巴黎和会,指中、苏、美、英、法等28国代表于当年7月29日在巴黎召开的会议,目的在于审查对德国的欧洲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等五国的和约草案。会议至10月15日结束,未能就全

部条款取得协议。蒋介石分析会后国际形势,估计苏联不可能出面干涉中国的东北问题,要抢在新的停战令发布以前攻占安东,至少也要攻占位于辽东半岛的盖平和岫岩。19日,熊式辉、杜聿明根据蒋介石的部署,调集九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分三路大举进攻南满。同月下旬,相继占领安东、通化等城市。公权,指张嘉璈,银行家,时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召开国民大会,要张回南京参加筹备。

蒋介石的国民大会预定于11月12日召开。11月6日,蒋介石致函熊式辉、杜聿明云:

国民大会决如期召开,在开会期间,不能不暂时停战,故决日内下令,定于本月11日正午起,关内外全面停战。但匪心决难望其诚服,故我军在停战之时,更应积极准备,严防其突击,并乘机整补,万勿因此懈怠。将来命令虽不明定停战期限,但不久匪必向我乘隙进攻,望密告各将领,切戒与严防勿误。

同函蒋介石又附言说:“将来第二期进剿目标,东则敦化,西则白城子,请积极准备为要!”要开“国大”了,为了装点门面,蒋介石不能不“暂时停战”,但是,他深怕熊、杜等人“因此懈怠”,特别提出“第二期进剿目标”,要他们“积极准备”。敦化,在今吉林省东部;白城子,在今吉林省西北部。

1946年12月6日蒋介石致函熊式辉云:

东北今日之急务,应速修复古北口至锦州铁路。凡有枕木、钢轨,应以此为最优先使用,请全力督成为盼!东北今日之形势,无论政治、军事与交通各业务,皆应以西重于东,南重于北。故必须

在辽西尽力拓展与巩固，则进占退守，皆可确保安全。请照此意旨努力实施。如果宽甸河口之电厂俄军尚未交还，则对辑安暂缓进取亦可。并请转告光亭长官是荷！

光亭长官，指杜聿明。从本函看，蒋介石除恢复“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计划外，又增加了“西重于东”的内容，企图巩固与扩展其在辽西的统治，以便确保关内外的联系，进可攻，退可守。但是，其进攻重点仍然在东线。自12月17日起，国民党军先后四次集中兵力，进攻位于吉林东南部的临江，均未成功。在此期间，国民党军被歼6万4千余人，丢失城市11座，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转入守势。东北人民解放军则转入主动。

当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失败之际，在山东却取得了一次使蒋介石极为开心惬意的“胜利”。1947年2月20日蒋介石致熊式辉函云：

临沂收复以后，黄河南岸之共匪势如破竹，不难于一个月内肃清，此后关内仅为黄河以北之问题，务望关外亦能积极整训，期于今春南满与热北之残匪同时肃清也。

1947年1月，蒋介石调集53个旅31万人，进攻鲁南地区。其中，以8个整编师20个旅为突击集团，自台儿庄、剡城、城头一线进攻临沂，以3个军9个师自明水、周村进攻莱芜，企图南北夹击，迫使华东野战军在临沂地区决战。2月上旬，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放弃临沂，主力秘密北上，准备歼灭自北南进的李仙洲集团。蒋介石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还完全没有察觉中共的战略意图，以为打了一个极大的胜仗，梦想在一个月肃清黄河南岸的中共部队。基于这一估计，他也要求熊式辉在当年春季肃清南满和热河北部的中共部队。但是，蒋介石

好梦不长,李仙洲集团迅速被歼,这样,他在东北战场上不得不谨慎一点。3月7日致熊式辉、杜聿明函云:

奸匪败窜以后,其死伤与损失程度究竟如何?如我军乘胜进占哈尔滨,只就东北原有兵力布置,能否足用?如以为可,则进占哈尔滨亦无不可;否则,仍照原定方针不如暂缓也。请兄等决之,并详报计划候核为要!此次保卫德惠与松江桥头堡之各主管长官,希即详告,并先晋一级,其所部官兵皆应重奖。望拟定办法,一面呈报,一面发表。如只一团,则应命名为德惠团,或中正团亦可。特致立人一书,望转交为荷!

立人,指孙立人,当时率新一军驻守长春,该军第五十师则驻守长春北部的德惠。2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力跨过松花江,奔袭城子街,包围德惠。长春国民党军派出12个团的兵力赴援,民主联军撤回江北。其后,杜聿明乘机宣扬:“德惠大捷,歼灭共军10万!”但是,有了临沂之役的教训之后,蒋介石持保留态度了。所以本函要求了解民主联军的真实损失情况,对熊式辉等进攻哈尔滨的打算,也倾向于“暂缓”。事实上,当时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已经感到兵力不足,捉襟见肘了。

3月17日蒋介石致熊式辉、杜聿明函云:

关于收复旅大政权方案,已囑董参谋长面达不赘,第二次匪部反攻长春,其意在演成拉锯战,俟我官兵疲劳,而后彼乃乘机伺隙以袭长春。故第三、第四次之反攻亦将继续而来,因之我军对长春据点之固守,必须指定部队,使之专守长春核心工事,切勿如过去市内防务之空虚。不仅长春,即沈阳亦应如此。兹决定在已成立之保安团队中,长春与沈阳各调集四个至六个团,专

供防守市区核心之用。除步兵轻武器已配发者外，所需重武器必须配给之种类数目，希详报候批。惟此八个至十二个保安团应即派定，一面调集沈、长二市，一面呈报番号，以备四五月间中来东北时亲自校阅也。

3月8日，民主联军再次跨过松花江，在靠山屯等地歼灭国民党军第88师全部及第87师一部，包围农安，准备歼击长春、德惠援敌。本函所称第二次“反攻长春”，指此。从函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军往日气势汹汹的进攻姿态已不复再现，蒋介石开始和熊式辉等讨论“固守”及抽调保安团一类问题了。其间，杜聿明曾派郑洞国赴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增加两个军，同时要求将划归华北的第53军调回东北。蒋介石愁眉苦脸地对郑说：“各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够用。”^①

败局已定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已发展至46万人。为了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场的形势，打通南北满，民主联军于当年5月13日发起夏季攻势，攻击长春至四平街两侧地区及沈吉路中段之敌。至6月初，南北满民主联军会师，吉林、长春以南，四平街以东广大地区国民党军被肃清。同月11日，以24个师的兵力进攻四平街，以切断沈阳、长春之间的联系，孤立长春、吉林的国民党军。6月13日蒋介石致熊式辉函云：

^① 郑洞国：《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70页。

光亭病状如何？无任系念。第五十三军集中沈阳后，当可打通四平街铁路线，未知由四平打通至长春一段有否把握？务希切实估计详报，下列各点亦希妥筹密报。

一、长春与永吉两地能否固守三个月？

二、此时大石桥与营口应可派正规军固守，尤以营口为然。究派何部及如何决心与计划？

三、锦州与葫芦岛防务应积极加强，并指定得力部队固守核心工事，以防万一。如何计划？

四、闻四平街士气最低落，如飞机仍可降落，应由兄或派高级人员以中名义前往视察与慰勉。

五、东北将领之生活与旧习应彻底改革，自高级军官本身做起。一面组织整顿军纪督察组负责执行，先由沈阳做起。如何实施希详告。如欲收复失土，完成革命任务，非从本身之精神与修养做起，则不足再言剿匪矣！希告我各将领，共同一致，努力实施。

六、长春、吉林、四平街、新民、铁岭各地部队，请派专员与王副司令叔铭为我前往慰劳，并勉其作三个月之固守准备，以防万一。如兄或光亭兄能亲自慰勉更好。

七、第五十三军集中后之全般计划，希函告。

八、各地守军应下决心，作固守三个月之准备。

九、此时必须增强北宁路后方联络线之防务，尤以营口、锦州、葫芦岛三地为然，务希即速着手布置勿忽。

光亭均此。

王叔铭，山东诸城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时任空军副总司令。本函充分反映出，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的处境日益不妙；杜聿明身患重病，国民党军士气低落，所占领的城市成了孤岛，蒋介石

石自己也失去信心，只能提出打通铁路线、“固守三个月”之类的要求了。

6月20日蒋介石致熊式辉函云：

来书详悉。凡可能之事，皆已督促各部照办勿念。关于四平得失，无任系虑。沈阳增援部队应即向四平前进勿延，不必待五十三军之集中。但其后续一师必令另迅速车运无误。关于作战意见，已嘱孙副长官面详不赘。顺颂光亭长官均此。

蒋介石懂得四平街战略地位的重要，因此，命令沈阳增援部队迅速前进。6月27日，民主联军曾一度攻入四平街城内，但由于兵力不足，自沈阳驰援的国民党军又已迫近，遂决定停止进攻四平街。

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至6月30日止，历时4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8万余人，收复城镇40余座，广大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军只保有中长路及北宁路的少数点线。

同年7月，杜聿明因病离职。8月，熊式辉被免去东北行辕主任职务，黯然离开东北。12月，被任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熊式辉档案中，还保存着蒋介石1948年1月26日的一封信，中云：

一、保密。

二、防奸(清查)。

三、封锁消息(检察)驻地及行进通过道路之两侧地区(十五公里以内)，通过前后各一日皆应事先派便衣队密布要路口，禁止行人来往。对匪所在方向之交通道路，更应特别封闭，无论何时，皆不准人民出入来往。

四、情报组织与技术之加强。

五、团以上各级指挥部新闻处，设置登记丁粮、组训民众之专员及人民服务队，负责编训地方各级武装自卫队。

六、通信工具机构与技术之加强与监督考察，及每月赏罚及其成绩之呈报。

七、伪装假情报与反间等技术之加强与每月赏罚之评定呈报。

八、参谋业务之加强与调查研究督导工作及其方法之不切实不敏捷与判断识别之不明晰与判断之不正确，决心与实行之不坚定，皆应彻底改革纠正。

以上各条，请择要编入于新剿匪手本之内。

本函反映出，由于在全国战场上屡遭惨败，蒋介石已经无计可施，只能借助于特务手段，加强控制了。

原载《团结报》，1993年4月17日、21日、24日



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

一份“极机密”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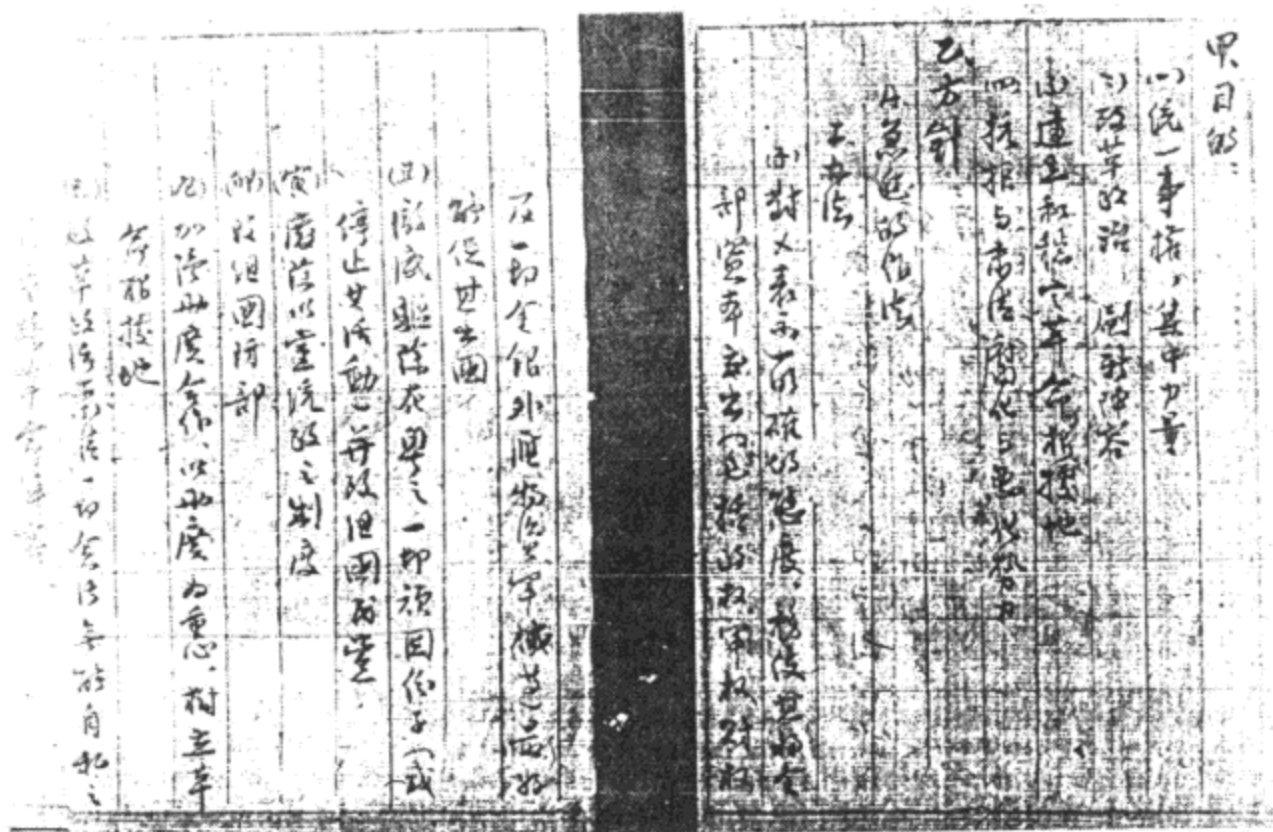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张发奎档案(微卷)中,有一份标明“极机密”的文件。稍加研究,便可以发现,它是1949年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制订的一份秘密计划。

文件共8页,以毛笔写成,分甲、乙、丙、丁四部分。甲部分为目的,共四条:

- (一)统一事权,集中力量。
- (二)改革政治,刷新阵容。
- (三)建立和稳定革命根据地。
- (四)抗拒与肃清腐化与恶化势力。

乙部分为“方针”,分“急进的作法”与“缓进的作法”两项。所谓“急进的作法”,共六条:

(子)对×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务使其将全部资本交出(包括政权、军权、财权及一切金银、外汇、物资、军械等),最好能促其出国。



李宗仁的“极机密”文件(1949年)

(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丑)澈底驱除在粤之一切顽固分子(或停止其活动)并改组国民党。

(寅)废除以党统政之制度。

(卯)改组国防部。

(辰)加强两广合作,以两广为中心,树立革命根据地。

(巳)改革政治,肃清一切贪污无能自私之分(子),重整革命阵营。

这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所谓“对×表示一明确的态度”,其中的×,指的乃是蒋介石。文件接着叙述采取“急进”作法的理由,共五条:

(子)×之原则既决不肯轻易放手,不如与之作具体的最后谈判,使之无法推诿。

- (丑)必须迅速处理一切,才能争取时间。
- (寅)必须澈底改革,才能争取民心与国际援助。
- (卯)必须澈底改革,才能肃清内部一切矛盾,达到集中与统一。
- (辰)必须澈底改革,才能破灭×再起之幻想。

其后,文件叙述“顾虑与困难”,也是五条:

- (子)与×破裂,无法获取其拥有之资本。
- (丑)×可能即调兵入粤,以图镇压。
- (寅)目前军政费无法自给。
- (卯)立法院顽固分子之势力甚大,仍可能利用立法院牵制政府。
- (辰)两广兵力不足以应付共军或×军之侵入。

以上各处的×,也均指蒋介石。

文件提出的“缓进的作法”共三条:

- (子)对×作较温和之表示,仍请其将全部军政权及资财交出,以便统一指挥。
- (丑)对顽固分子逐渐隔离。
- (寅)一切改革措施,均采缓进,使力量充实,基础较稳固后再进行上述“急进的”各项办法。

文件的制订者认为,取“缓进的作法”理由如次:

- (子)希望诱致×交出若干资本。
- (丑)×或可不至即派兵入粤。

(寅)对×不即时决裂,留有斡旋余地。

但是,文件的制订者又认为,这种作法也有其弊端:

(子)时机迫切,不容许获得逐渐改善之机会。

(丑)由于×之高度警觉性,决不肯交付全部资本(甚至一部分亦不可能)。

(寅)由于×之高度警觉性,可能仍派兵入粤。

(卯)不能即时有所表现,无法争取民心,提高士气。

(辰)与×不绝缘,不能获得国际之信赖与援助。

(巳)无坚强明朗之态度表现,新的分子不能号召集结,反动分子无法肃清。

文件的制订者在比较权衡之后,认为“急进的作法”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文件最后部分为“一般值得研究的实际问题”,计六条:

1. 两广兵力如何充实(包括肃清土共问题)?
2. 财政问题如何解决?
3. 以党统政之制度如何废除(包括非常委员会)?
4. 立法委员如何争取?
5. 与×“摊牌”之方式如何?
6. 对中共之战略部署。

文件未署日期,也未说明起草人姓名及有关情况。

文件形成的背景及其产生经过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但蒋在“引退”之前,即在人事上作了种种布置,同时下令将国库中大量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引退”后,仍然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掌握着种种实权。因此,李宗仁就职后,事事遭其掣肘。他曾命行政院将运往台湾的国库金银及外汇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有关人员拒不奉命。他企图改变长江防务布局,撤换指挥将领,但无法执行。这样,李宗仁的左右就经常发牢骚:“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张治中见此情况,便动了劝蒋介石出国的念头,以便让李宗仁放手做事。他征得李宗仁等同意后,于3月3日偕吴忠信访问溪口。见蒋后,蒋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的报纸已经登出来了!”又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说得张治中开不得口。张、吴溪口之行虽然没有成效,但要求蒋介石出国的呼声却日渐公开化。3月12日,南京《救国日报》居然以《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为大字标题,发表评论。

当时,南京代表团正在北平与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李宗仁感到,有蒋在,势难接纳和议。4月9日,李宗仁召集白崇禧、程思远、邱昌渭等人会议,认为蒋、李只能有一人主政,如果蒋不出国,李就应当辞去代总统;维持现状,和战均将无望。4月12日,李宗仁委托居正、阎锡山赴溪口,面交蒋介石一函,声称如蒋不采取步骤,终止目前的混乱局势,则他自己唯有急流勇退,以谢国人。14日,蒋介石通过张群传话,

邀请李宗仁、白崇禧赴杭州面谈。形势发展出人意料地快。4月20日,和谈破裂,华东野战军陈毅所部迅速渡过长江。22日,蒋介石再邀李宗仁及何应钦、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王世杰等在杭州会谈。会前,白崇禧对李宗仁说:“今后局势,如蒋先生不愿放手,则断无挽回余地。蒋先生既已引退下野,应将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政权全部交出。”李宗仁正准备在会上与蒋介石“摊牌”,白崇禧的话正合李宗仁的心意。李宗仁完全没有想到,会议却通过了一项提议,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非常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凡政府重大政策,先在党中获致协议,再由政府依法定程序实施”。李宗仁满肚子不高兴,快快返回南京。当时,行政院等政府机构已经迁移广州,但李宗仁决定不去。23日,李宗仁偕程思远、邱昌渭、李汉魂等人飞抵桂林。当日,李宗仁决定派程思远去汉口接白崇禧返桂,派邱、李二人去广州会见美国公使衔参赞刘易斯·克拉克(Lewis Clark)及张发奎。

克拉克当时在广州主持美国大使馆驻广州办事处。他对邱昌渭说:美国已对蒋介石失去信心,即将重订对华政策。目前国民党政府要求美国立即援助,情势上实不可能,除非有事实显示,李代总统确实是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者,蒋介石确实不再干预政治,才能逐渐转换美国人的视听。其后,克拉克并亲赴桂林,和李宗仁谈了五个小时。

张发奎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李宗仁托李汉魂、邱昌渭带了一封信给他,函称:

和谈因中共不能改变其武力征服全中国之企图,终告破裂。刻共军已渡江,威胁京沪,此实为本党及国家生死存亡之最后关头,非革新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自救。吾兄爱党心切,忧国情殷,知必具有同感。弟因广州住所尚待修饰,兼以连月劳烦,须稍事休

息，拟在桂勾留几日后即来穗面商种切，共策进行。兹嘱伯豪、毅吾两兄代表趋诣，面达鄙悃，诸惟鉴照。

李汉魂于1949年3月初到南京任总统府参军长，后任内政部长，他向张发奎诉说了到南京工作后的苦衷：“在最高控制之下，致全局的人事及军事，殆俱不能调整，政治亦难改革，全部之守江计划，同时不能实施，坐令对共无法阻止。”29日，张发奎飞往桂林。他劝李宗仁作出抉择，或者公开声明，他出任总统只是一场滑稽戏，然后辞去总统职务，请蒋复位，或者从蒋介石手中夺过全部权力，组织战时内阁，争取美国的支持。5月1日，张发奎飞返广州。

据程思远回忆，张发奎返抵广州的当天中午，白崇禧、张发奎、程思远三人在马仲孚家里午餐，张谈道：

在桂林时曾由李宗仁约李品仙、甘介侯、韦永成、韦贻唐、黄雪村、李新俊、尹述贤等同他会谈两次，由黄雪村记录，最后订定甲乙两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出权力来。

张并强调指出，无论实行甲乙两案中的任何一案，都必须清除广州阵营里的CC分子。程思远的这段回忆写于1980年，记忆不可能完全准确，但是，所谓甲乙两案及“促蒋出洋”，“要蒋交出权力来”，等等，正与上述“极机密”文件相合，因此，可以判明，该份文件乃是1949年4月29日至5月1日张发奎飞桂时的产物。它反映出当时李宗仁等企图索权、逐蒋，以两广为基地反共。

又一份秘密文件

政府在广州，代总统却在桂林，这总不成局面。5月1日晚，白崇禧访问何应钦。二人认为，李宗仁不愿来广州，是因为对杭州会谈的结果不满意，决定请居正、阎锡山出面劝解。同晚，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推吴铁城、李文范赴桂，催促李宗仁来粤主持政务。5月2日，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联袂飞桂。当晚会谈，形成了一份《谈话记录》，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鉴于频年战祸，民苦已深，弭战求和，成为举国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之失败，其根因所在，即由于政治之不修明，贪污腐化，遍于全国，遂造成今日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全盘糜烂之恶果。故自主政之日起，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詎料时经三月，虽殚精竭力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禁，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牝，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

（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决无转危为安之能力。为今之计，与

谈话纪录

卅八年五月
於桂林

(一) 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鑒於國事艱難，民苦已深，新我
謀和，成為舉國一致之渴望，而以任政府一切軍事、政治、經濟
之失敗，其根因所在，即由於政治之不修明，貪污腐化，過於全國，遂
造成今日民怨沸騰，士氣凋殘，公憤糜爛之惡果，故自去政之日起，
為順從民意，針對時弊，決以謀取和平與革新政治為當前兩大急
務，以冀有所匡救。詎料時局不靖，舉國若狂，以致和平與願建終
致毫無成效，如談失敗，固由於中共所提條件過於苛刻，使政府無
法接受，不特政府拒絕，我方亦不承認。一步驟之不能一致，如政
府謀和措施之不能執行，未能示人以誠，亦不能不承認為一重大因素。
至於革新政治，端欲以形格勢禁，在現有局勢更趨更趨言廢成以
革因之不能，努力，急已付諸度外，由於李宗仁德學能辭不克

桂林《谈话记录》(1949年)(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俾实效，莫若即日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宗仁身为国民党员，与总裁久共患难，决不敢存临危退避之心，仍当竭尽协助之能力，并拟以副总统之资格，出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此种办法，在国际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据目前之局势，亦确乎有此需要，同时宗仁既可获得为国家效力之机会，亦可与总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欲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为保障今后政府之命令能彻底贯彻，达到整

饬部队，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国之使命，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

(1) 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2) 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

(3) 所有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4) 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5) 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6) 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四) 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唯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党国。

文件原件共四页，油印，用墨笔标有“密”字，亦见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张发奎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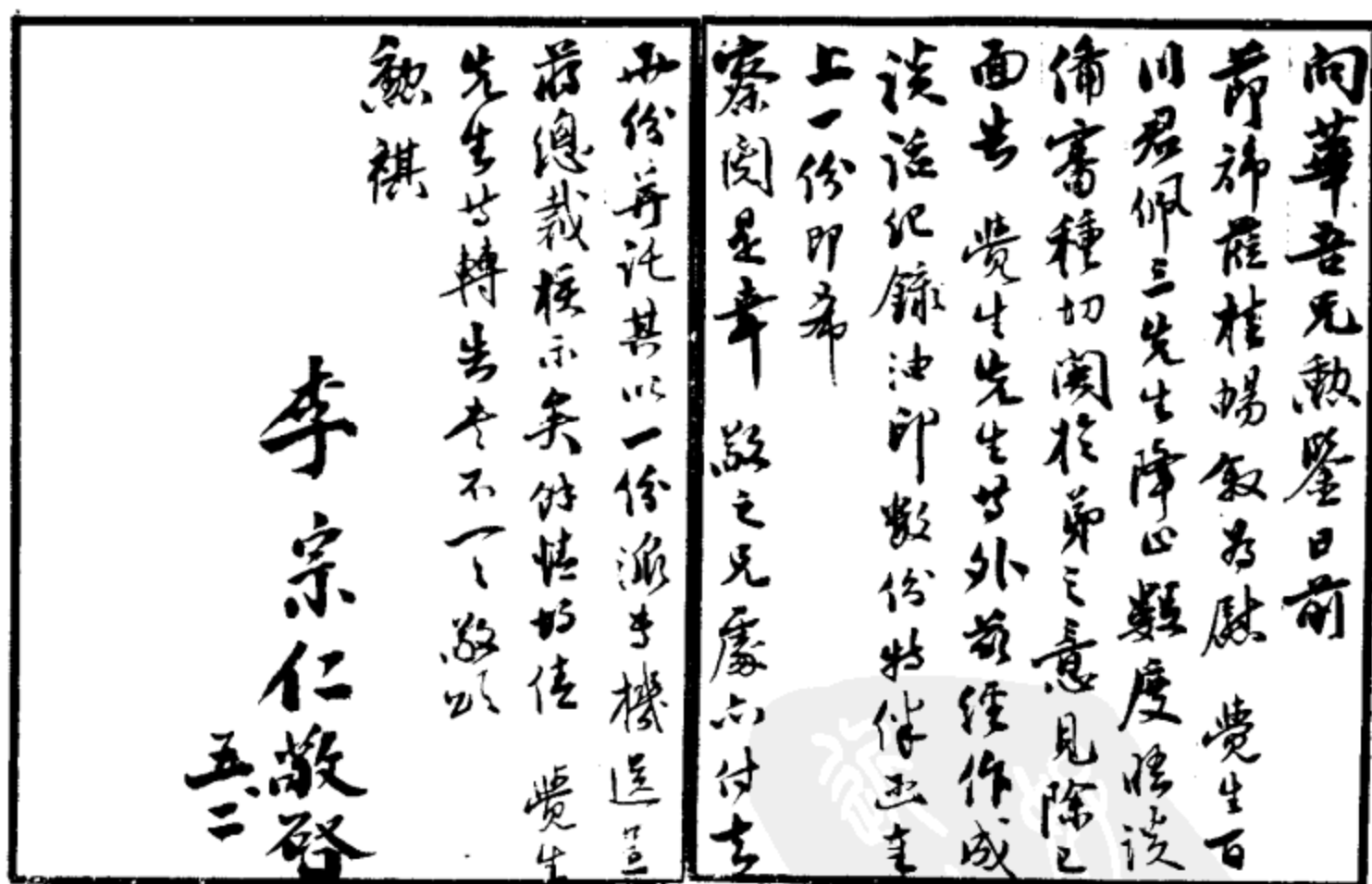
上述文件表明，李宗仁经过深思熟虑，并与各方商谈，决心将“极机密”文件付诸实施，不仅索取全部权力，而且要求蒋介石“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言辞虽温和、婉转，而态度则相当坚决，可以视为对蒋介石的一纸通牒。

《谈话记录》产生，同日，李宗仁再次致函张发奎，函称：

日前节旆莅桂，畅叙为慰。觉生、百川、君佩三先生降止，数度晤谈，备审种切。关于弟之意见，除已面告觉生先生等外，兹经作成《谈话记录》一份，油印数份，特伴函奉上一份，即希察阅是幸！敬之兄处亦付去两份，并托其以一份派专机送呈蒋总裁核示矣。余情均倩觉生兄等转告。

据此，可知这份记录只有几份，一份给了张发奎，两份给了当时的行政院长何应钦，其中之一由专机送给了蒋介石。

總 統 府 用 箋 總 統 府 用 箋



李宗仁致张发奎函(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蒋介石的答复

5月3日,蒋介石在上海见到了李宗仁的《谈话记录》,非常生气,立即复函何应钦,要求何转达李宗仁及国民党中央诸人。信中,蒋介石要求李宗仁“莅临广州,领导政府”,说明他本人“无复职之意”,对于李宗仁六项要求中的前四项,蒋介石一一表示同意。他说:

(1)总统职务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2)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产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具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3)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核。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4)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对于李宗仁要求中的第五项,蒋介石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说:非常委员会之设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会复议。对于要求他出国的第六项,蒋介石坚决反对,他说: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碍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责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

中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他并称,自引退以来,政治责任虽告解除,而革命责任自觉无可逃避。凡李宗仁有垂询之处,无不竭诚答复,但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

函末,蒋介石表示:

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

蒋介石此函于5月5日以专机送到广州。6日,国民党中央会举行临时会议,推阎锡山、朱家骅、陈济棠三人赴桂迎接李宗仁。李宗仁向蒋介石提交《谈话记录》,目的在索取权力,蒋介石既已答应了六条中的前四条,李宗仁觉得面子挣到,目的已基本达到。8日,李宗仁飞广州,继续履行代总统职权。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仍然是个空头,蒋介石并未交出任何权力,也并未“遁世远引”,而是积极活动,多方安排,在作复职的准备。

原题《提交蒋介石的最后通牒——李宗仁桂林〈谈话记录〉》,刊于《团结报》,1990年12月8日。1991年增补改写。此据拙著《寻求历史的谜底》收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附录一

蒋介石“复职”与李宗仁抗争

——读居正藏札及李宗仁档案

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急于恢复“总统”职位，从幕后走到幕前。但是，“代总统”还在美国就医，并无交出权力之意。于是，蒋、李之间再次展开了一场斗争。

1950年1月20日，台湾“监察院”致电李宗仁，催其回台，语多指责，实际上是对李宗仁意向的一次“火力侦察”。同月29日，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复电台湾“监察院”，声称病体尚须休养，不能立即返台。2月2日，再复一电，声称“赴美就医未废政务，接洽美援，仍可遥领国是”。2月4日，台湾《中央日报》、《扫荡报》、《中华日报》等同时发表社论，向李开火，要求“蒋总裁”复出，“综领国事，统率三军”。其间，居正曾托女儿带给李宗仁一函。2月6日，李宗仁复函居正，函称：

觉生先生勋右：病中承令爱惠临，并携来手教，欣慰无似。自弟出国疗治胃疾，不意转瞬间，西南半壁竟遭赤匪席卷，举世震惊，群情悲愤。今国军孤悬台琼，既无餉械，复乏外援。闻美国政府对我总裁成见极深，曾一再声明，不以军事援助台湾，今更公开嘲骂。在此情形下，吾党负责同志应警惕国家之危亡，不再感情用事，权衡利害，改弦更张，以挽回既失之民心，俾友邦对我增加信心，乐于相助。倘仍固步自封，一意孤行，逆料美国民主党主政期间，有效援助决无希望，则反攻大陆，扫荡赤氛，更为空谈，即希冀固守台

為坐針氈有何留戀
 權位之足云每感
 蝼蟻無能難勝重任
 早擬引退以謝國
 人無如再四思維弟
 若下野依法由行政
 院長代行職權為時
 僅限三月今既年
 法召開國大選舉
 總統則代理其逾
 三月法定任期屆
 中為違憲或曰可敦
 蔣公復職殊不知
 不以此代者為總統
 職權而非代理蔣公
 本人國家名器何
 敢私相授受譬言
 女宣統遜位後復
 復辟國人群起聲
 討之事制時代尚
 不能視國家私產
 蔣公首倡制憲安
 可自負

李宗仁致居正函手迹(居蜜博士贈)

琮，勢亦難持久。言念及此，不寒而栗。凡有血氣，愛黨忧國之士，
 諒有同感。

日前接監察院電，對弟似有誤會，頗為惋惜。察其言外之音，
 別有作用，醉翁之意，路人可知。本黨廿餘年來政治暗潮中，此種
 現象履見不鮮，固不足怪。際茲國脈如縷，民不聊生，且政情複雜，
 積弊已深，雖思革新，與民更始，無奈障礙橫生，阻力重重。名為元
 首，實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針氈，有何留戀權位之足云！每感蝼
 蟻無能，難勝重任，早擬引退以謝國人；無如再四思維，弟若下野，

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时仅限三月，今既无法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则代理如逾三月法定期间，即为违宪。或曰可敦请蒋公复职。殊不知弟所代者为总统职权，而非蒋公本人，国家名器，何能私相授受！譬如宣统逊位后贸然复辟，国人群起声讨之。专制帝皇，尚不能视国家为私产；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毁宪之责！弟何忍为个人安逸计，而陷本党于创法始而毁法终。少数同志倡斯说者，不仅毫无宪法常识，抑且故意歪曲理论，以乱视听，实属荒谬，贻害至深。国事败坏至此，诚非偶然也。先生明达，未卜以为然否？

弟创口虽已平复，惟元气大伤，尚须休养一个时期。现正与美国朝野接洽反共复国计划。盖美国虽对我政府现状、措施表示不满，然在其反苏政策下，并未放弃中国。事在人为，宜群策群力以图之。国家前途，尚大有可为也。

纸短情长，笔难尽意。敬祈不遗在远，时赐教言，以匡不逮。专此顺叩勋安！

李宗仁拜启

二月六日^①

12日，台湾“监察院”指责李宗仁滞留美国，遥控台湾政局，决议提请“国民大会”弹劾。1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次日，李宗仁复电，以医嘱不能远行为理由拒绝。15日，李宗仁的私人代表甘介侯到华盛顿会见驻美“大使”顾维钧，声称：李宗仁对来自台湾的攻击十分恼火。如果蒋停止诽谤，李就回台，商讨如何把权力交给他；如果蒋继续和李捣乱，李自有回击的武器。

^① 美国国会图书馆居蜜博士赠。

18日,李宗仁托孔祥熙转告蒋介石,最好以和解方式安排交回总统职位,否则他就不客气了,公开反对蒋复职。21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其三日内返台,否则放弃“代总统”职务,如不照办,则由蒋介石复行“总统”职务。同日,李宗仁再电台北“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声称“个人地位无所留恋,惟必须采取合理合法途径,以免违宪之咎。国事至此,安可再生枝节,自暴弱点,以快敌人”。电称:

希兄与各方接洽,从速寻求于宪法上说得过去之方法,仁自可采纳。若图利用宣传,肆意攻击,则仁当依据宪法,公告中外,于国家,于私谊,将两蒙其害。^①

23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请蒋介石复职。于是,李宗仁就决定摊牌了。28日,李宗仁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介石。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保存着该信的英文本,现据英文本回译于下:

亲爱的将军:我很遗憾,不得不告诉您一项消息:自我来美就医以来,您周围的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就阴谋篡夺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无论根据宪法原则,或是根据人情,我都不能相信这些不断来自不同渠道的报告。

我的健康恢复期已满,正在准备回国,出乎意料地从文件中得知,您宣布将于3月1日恢复总统职位。

您应该记得,您于1949年1月21日引退后,我即根据宪法规定,接管总统职务。所“代”者为总统职权,并非阁下个人。更进一步说,您自引退后,已经成为一个普通公民,和总统职权没有任何

^① 美国国会图书馆居蜜博士赠。

关系。不经过国民大会选举，您没有合法的理由再次成为中国的总统。同样，除非国民大会决定，授予我的权力也不能由任何个人或任何政府机构以合法理由废除。

您的高压的、独裁的行为不能被宪法证明为正确，也不会为人民所赞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您的巨大的错误将极大地影响我国的命运。袁世凯的下场将是您的殷鉴。

为了保护历经许多困难而制订的宪法，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严重警告您，不要甘冒海外民主世界之大不韪。

李宗仁

又，依据中国宪法，如果现职人员必须辞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没有任何意见——法律没有规定，引退的蒋介石总统可以复职，但是却规定由行政院长执行总统职权三个月，在此期间，召集国民大会，选举新总统。

我极不愿意叙述下列情况：自我来美就医以来，蒋介石将军及其亲密的追随者，如著名的 C. C. 系利用我缺席的机会，阴谋篡夺我的政治权力。我一时不在国内成了 C. C. 系无理攻击的借口。然而，没有一部宪法规定可以反对一时缺席的国家元首。威尔逊总统有几个月不在美国，逗留在战后的欧洲。最近，菲律宾总统也像我一样来美就医。

不仅如此，我们是内阁制政府，总统只有有限的权力和责任。在总统缺席期间，政府和立法院、行政院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

通向民主的道路没有播撒玫瑰花。在中国，为民主而斗争的40年来，我们为引进宪法进行了两次艰难的努力：一次，被想当皇帝的袁世凯破坏了；另一次，就是现在，将要被想成为独裁者的蒋介石所破坏。

上周五,休养期已满,我准备回国。于是,选择了这个时候来进行这一狡诈的冒险行动。

只有真正的民主思想才能有效地和正在扩展的共产主义潮流斗争。在我们和共产主义斗争的时候,这一对民主制度的完全背叛将引起深深的痛惜。作为中国合法的国家元首,我有责任领导我国人民保卫我们的宪法。

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文告,宣布复职。同日下午,李宗仁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一项声明(原文为英文):

在中国为成为民主国家而斗争的时刻,传来了一项不幸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台湾方面公告,蒋介石将军已经宣布“恢复”中国总统职位。

人们记得,1949年1月,蒋介石将军辞去总统职位,成为普通公民。他在引退后的两个公开声明中宣布,五年中,他将不使自己卷入政治,也许将避开下届总统选举(中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6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刻,他认为适宜于使自己不经过选举就成为总统,这是令人惊奇的。

这是荒谬的,超出想象的,一个普通公民能宣布自己成为国家总统。这样,蒋介石将军就向世界暴露了一个可悲的事实,作为独裁者,他能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可以根据兴致抛弃或者捡起。

蒋介石将军引退时,我依照为人民所接受的中国新宪法的规定,被迫继承这一空缺。在美国,有过非常类似的情况,副总统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空缺,直到下届选举。

在中文里,“代”的意思是指,我的任职时间为从上届选举到下

A STATEMENT

ISSUED BY ACTING PRESIDENT LI TSUNG-JEN

On the "Resumption" of the Presidency by Chiang Kai-shek

The press report from Formosa to the effect that General Chiang Kai-shek has announced his "resumption" to the Presidency of China came as an unfortunate surprise at a time when China strives to become a democratic nation.

It will be remembered that General Chiang Kai-shek resigned from the Presidency in January, 1949, and became a private citizen. In two public statements after his retirement he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ot concern himself with politics until five years later, implying that he might want to run for President at the next electio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provides a six-year term of office for the President.) It is astonishing how at this time he sees fit to make himself President without an election.

It is fantastic, beyond belief, that a private citizen can announce himself as the President of his country. By so doing, General Chiang Kai-shek has exposed the lamentable truth to the world that as a dictator he can consider the nation as his private property, which he could lay down, or pick up according to his whim.

When General Chiang Kai-shek resigned from office, I was constrained to succeed to the vacated pos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new Chinese constitution, adopted by the people. An almost similar case took place in this country when the then Vice-President Truman succeeded to the post vacated by President Roosevelt until the subsequent election.

The word "Acting" is mean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indicate my office during the interregnum, from the last to the next election. And it can never be construed to mean as acting for an outgoing predecessor who no longer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presidency.

The return to the Presidency as announced by Chiang Kai-shek is the most unconstitutional act in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The article 49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is deliberately misinterpreted in his declaration today for his own purpose.

李宗仁声明(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届选举,它永远不能被解释为,代替即将离职的已不再做任何事情的前任总统。

在民主的历史上,蒋介石的复职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在他的声明里有意曲解了中国宪法第49款。^①

① 李宗仁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当晚,李宗仁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蒋要李以副总统的身份做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1949年5月,李宗仁曾要求蒋介石出国争取外援,企图将他逐出中国的政治生活;曾几何时,现在轮到蒋介石报一箭之仇了。

还在当年1月下旬,台湾方面就得悉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准备邀请李宗仁到华盛顿商谈中国事务,非常紧张。当月31日,“外交部”部长叶公超致电驻美“大使”顾维钧,要他“密探实情及美方意向”^①。2月下旬,李宗仁派甘介侯赴华盛顿拜会艾奇逊,接洽会见时间。同月末,杜鲁门决定在3月2日邀请李宗仁到白宫便餐,艾奇逊、顾维钧、甘介侯作陪,台湾方面更为紧张。3月1日,台湾“外交部”打给顾维钧一通“最速”电,电称:“蒋总统已于今晨十时视事,2日白宫宴会,李代总统仅能接受副总统待遇,希遵办并电复。”^②3月2日,再电顾维钧,指示说:“李副总统如系以副总统身份赴白宫宴会,自应陪往;如竟以代总统身份前往,应不陪往。”^③当日上午,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杜鲁门,将按什么身份接待李宗仁,杜鲁门答:“作为中国的代总统。”记者又问,他是否知道蒋介石已经复职时,杜鲁门答,他一直没有同蒋直接联系。在下午的宴会上,杜鲁门称李为“总统”,连“代”字也没有用。宴会结束后,出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杜鲁门带着李宗仁到小客厅谈话,顾维钧本欲跟进,却被艾奇逊拉住。艾一面表示要和顾在大客厅谈话,一面将甘介侯推进小客厅,让他充当杜、李之间的翻译。^④这一切,使李宗仁、甘介侯风光之至。

① 顾维钧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顾维钧回忆录》卷7,606页,中华书局,1988。

蒋介石非常关心白宫招待李宗仁的情况，特别是杜鲁门如何称呼李宗仁，是否称他为“代总统”等等，当晚就指令叶公超向顾维钧了解。顾维钧据实作了报告并作了分析。他致电王世杰说：

今日白宫午餐招待，国务院曾先告我，纯系交际，并非正式，故并无招待代理元首之特别表示，一切谈话未及我内部政治问题，故尚称融洽。惟今后美方态度仍宜注意。^①

顾维钧毕竟是个老外交，他不认为美方的表现有什么特别异常的地方。李宗仁心里明白，但故弄玄虚。次日，李宗仁致电邱昌渭、居正、于右任、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王宠惠、陈诚等人称：

仁昨到华府。事前顾大使已奉台方令通知国务院，仁仅以副总统名义代表蒋先生往聘，但杜总统向记者宣称，仍以代总统地位对仁。招待午宴席间，与杜总统及国务卿、国防部长畅谈甚欢，举杯互祝，三人均称仁为大总统。餐后，杜单独与仁谈话，不令顾参加。内容未便于函电中奉告。^②

当时，蒋介石已在台湾掌握实权，而李宗仁孤身在美，杜鲁门是不会真正支持一个光杆司令的。在和李宗仁单独谈话时，杜鲁门说：一切都了解，来日方长，务必暂时忍耐。杜并劝李，和他保持接触。^③显然，这是杜鲁门在承认蒋介石之前对李宗仁作精神上的安抚。这些，李宗仁自

① 顾维钧档案。

② 美国国会图书馆居蜜博士赠。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下)，1036页，广西政协，1980。

然未便“奉告”。果然,3月2日下午晚些时候,白宫新闻发布官声明说:国务院收到了蒋介石复职的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又称:杜鲁门无意决定“谁是中国总统这一重要的外交问题”云云。^①

附记:本文所引李宗仁致居正函及致邱昌渭、居正等电报,均系美国国会图书馆居蜜博士赐赠,谨此致谢。

原载《团结报》,1992年12月2日、9日



^① 《顾维钧回忆录》卷7,612页。

50年代在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种力量

——读张发奎档案之一

1952年,香港地区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名为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它的发起人有张发奎(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君勱(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顾孟余(前北京大学教授,国民党改组派重要成员)、童冠贤(前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张国焘(前中共领导人之一,后被开除)、李微尘(自由知识分子)等。其成员共约二三百人,分布于香港、北美、日本、澳洲、印度以及中国大陆地区。它以第三种力量自居,是个反对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也反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秘密政治组织。

一

战盟存下来的主要文件有《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言》(张君勱起草)、《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筹备期间之组织纲要》(童冠贤、李微尘起草)、《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公约》、《中国自由民主同盟生活公约》(张国焘起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项。

《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言》是一项政治宣言。它表达了这个组织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其矛头首先指向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宣言称:“人类历史正进入20世纪这个自由、民主、文明的新时代,而背逆时代潮流的新奴役制度,却在苏联创建起来,以阻碍人类社会向前的发展。斯大林利用近代进步的科学和组织技术,配合帝俄残暴专制的传

力亦大公無私，寬宏七度，辨別是非，堅持正義，決不抹殺是非，也不口是心非，歪曲事實，有我無羣，進有後言，或尖刺設法，總之，一切傷害感情，損傷羣體之事，均須予以糾正。

張君勱
 張發奎
 李勉
 李勉
 李勉

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之治國的
 本同盟認為改革中國之社會，必須有主動
 倡導的力量，這個主動倡導的力量，必由少數
 社會意識最警覺的人士所成，這些人門，須認
 清中國社會之病，願滿首行政改革的方案。但
 這些人，是與其心一切人，一樣是中國屬社會
 的產物，一樣是受環境的影響所轉成，因此
 第一步，他們須認定一個共同的士口，或總
 為理想，最少在個人行為操守上，須有一個公
 認而遵守的尺度，大家才可過于，以定其志願

张君劢等组织的第三种力量的公约

(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统，使这个新的奴役制度控制了整个俄国，统治了整个东欧。”它继称：“今日人类的历史任务已经很明显的在终止这反常的局势，制止克里姆林宫的病狂人物及其傀儡们的罪行，彻底摧毁今日正在威胁人类的新奴役制度。”^①很显然，这里所说的“新奴役制度”乃是指当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宣言》提出了五项原则：1. 人类最主要的活动目的，在于获得自由——个人生活的自由与人格发展的自由。2. 人类思想之所以进步，文化之所以发展，得自互异的多方面的发展，统制文化，统制思想，只能冻结人类创造的活力，窒息人类发展的生机。3. 自法、美革命以来，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主潮，无论任何形态或假借任何名义的独裁，任何主义下的极权制度都违反着这主潮和倾向。

① 张发奎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本文所引文件及信函，均同。

4. 私有财产与人类文明同时俱来,迄于今日,私有财产制度在原则上还有其存在的理由,各个人保持有限度的私产与平均财富之政策实可并行。5. 国家的职司,对内在于调协人民间的利害,使之趋向大体上的和谐,保证国人安康;对外在于调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维护国人利益。

根据这五项原则,《宣言》指责中国共产党强迫中国人民信奉“斯大林所曲解的马克思主义”,强行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互相对立的阶级”,强行“摧毁文化传统”,强行推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它又提出了“十二条原则”,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在政治上,它提出要推倒中共所谓的“一党专政与极权主义”,“实现人民主权,各党并立,崇尚法治”;在经济上,它主张“自由与管理配合”,“保障自耕农”,“推行合作经营制度”,“鼓励人民在国家协助下,普遍集资,自行经营,劳资合作,实行民主企业制”;在思想文化方面,它提出,“保障学术研究自由,反对任何党派统制思想”。一言以蔽之,它全盘提倡自由化。

二

战盟是在美国部分人士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据张发奎回忆,当他1950年流亡香港时,前岭南大学校长香雅阁博士(Dr. J. Henry)表示要见他。二人在香港旅社见面。香雅阁询问张发奎,是否在领导大陆反共产党人的游击战争。香雅阁并称:许多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感到,如果张发奎能站出来,将能团结华南人民。香雅阁同时表示了对蒋介石的不满,认为他过于专制。谈话中,张发奎表示:有主义、有声望的人应该建立一个新的秘密团体,形成一种新的力量;为了未来的工作,应该训练

年轻人。关于这一团体的成员，张发奎提到了顾孟余、童冠贤、张国焘、李璜、李微尘、伍宪子，香雅阁提到了张君勱和许崇智。这以后，张发奎、许崇智共同会见了香雅阁，香雅阁称：“在我回到美国以后，将访问华盛顿，可能碰到某些人”，“如果事情有所发展，我将写信给你们”。^①

几个月之后，一个美国人带着香雅阁的信来到香港，自称不代表美国政府，而代表美国人民。这个美国人，据程思远先生回忆，名为哈德曼。他对张发奎说，此次到香港，完全是为帮助建立第三势力，并称，美国人准备在菲律宾的海军基地中拨出一个小岛来供其使用。^② 其后，哈德曼又介绍张发奎、许崇智会见了另外两个美国人。其中一人曾是陈纳德的部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昆明和南宁的空军基地工作；另一个是年轻人，看起来是助手。他们询问张、许二人，谁是香港的民主力量，应该做什么，美国人民将如何帮助你们？张、许二人向这两个美国人提供了一份计划。两个美国人表示，我们无权决定，必须提交美国人民批准。二人并称，可以提供金钱资助。此后，战盟及其主要成员即在美国资助下进行活动。它的后台，应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战盟设执行委员会，委员 11 人，其中伍宪子、顾孟余、张发奎三人为常务委员。后来，伍宪子因访问台湾被开除，由张君勱增补。执行委员会下设组织、财政、政治、军事、宣传等部。当时，张君勱还在印度，他声称认识马歇尔，希望通过马歇尔更好地了解美国，并且希望马歇尔能够帮助战盟。张发奎和两个美国人商量后，决定派张君勱去美国。1952年3月，张君勱自印度抵达香港，和张发奎等进行了两周左右的讨论，然后经日本赴美。自此，张君勱即成为战盟在美国的外交代表。他曾出面，在美国司法部为战盟登记。

①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 - K'uei,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② 程思远：《政坛回忆》，21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战盟的总部在香港。1952年5月,顾孟余因香港政府不允许在港从事政治活动,离港赴日。其后,战盟曾准备将总部迁往日本,但未能实现。

战盟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不少人是教师,也有少数学生、工人和商人。它的基层组织是小组。香港一地约有十几个小组。

战盟的主要活动是文化宣传。它拥有四个刊物:《独立评论》(顾孟余主编)、《再生》(张君勱主编)、《中国之声》(张国焘主编,1952年9月以后由李微尘主编)、《华侨通讯》(主编不详)。此外,它并赞助、支持几种报纸,还曾准备编辑丛书,开办大学。战盟的另一项活动是联系华侨。它曾派人分赴澳洲、印度等处,企图在华侨中扩大影响。

战盟也曾企图联络亚洲反共力量,并曾企图以越南为基地。1954年9月23日,张发奎致函张君勱,内称:“如能得吴庭琰氏同意,诚为最好良机”,“吾兄与吴交厚,一言九鼎,倘能促成,不但可助越吴反共,而吾人亦可藉彼之助,奠反共复国之业”。张发奎还曾和韩国驻南越公使崔德新联系,支持他组织所谓“中、韩、越三国军事同盟”;函称:“倘由此三国军事同盟逐步演化而为自由亚洲同盟,以与自由世界配合呼应,则苏俄侵略野心之戢止,中共政权之削弱,固易如反掌矣!”

据说,战盟还曾派人到大陆进行地下活动。

三

战盟一成立即矛盾重重。

首先是意见分歧。1. 在成立时间上。1952年10月10日,张君勱在美国发表了战盟宣言,正式宣告战盟成立,顾孟余认为过于匆忙,战

盟成立为时尚早。这成为二人之间矛盾的发端。2. 在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态度上。伍宪子因访台被开除,但台湾召开“国民大会”时,仍有不少战盟成员赴会。顾孟余更提出:“台湾政治虽有许多不满人意之处,但它此时,在国际间尚是自由中国的象征”,应该“支持并鼓励台湾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之间的斗争”。顾的意见遭到张君劭等人的反对。

其次是经费困难。1953年,战盟要削减《中国之声》的经费,张国焘即退出战盟。

第三是大陆和台湾都反对。特别是日内瓦会议后,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战盟日益失去人心。1954年7月5日张君劭函云:“一二年来,台湾专以毁战盟为事。经周氏(指周恩来——笔者)日内瓦会议之后,即劭再去印度、印尼、马来,欲求昔日之得华侨欢迎而亦不可得。”这封信是战盟当时困难处境的生动写照。

最后是美国政府态度不积极。1955年2月23日张君劭函云:“美国政府以援台为事,同仁中盼望劭稍有收获,其奈至今渺茫,毫无事实可言。”这样,战盟主要成员的劲头也就一天天减弱下来。

台湾方面一直企图渗入战盟,因此,顾孟余怀疑战盟内部有奸细。1953年10月31日,顾孟余致函张发奎,要求彻底改组。1954年1月1日,顾致函张发奎、童冠贤,认为战盟“以往表现不好”,要求在组织内部肃清间谍、一切破坏分子、一切投机政客、个人出风头、妄言妄动者。同月31日,顾再次致函张发奎,要求战盟停止活动。他认为,当时“只宜由少数稳健可靠同志,相互作精神上之联系,而不可为形式上之组织;只宜作事实与理论上之研究,而不可为公开之号召”。同年3月下旬,张发奎派童冠贤赴日,和顾孟余商量战盟改组问题,顾孟余要求改名中国自由民主同盟,提出改组意见七条。张君劭同意顾孟余清除内奸的意见,但反对改名,反对停止活动。他说:“旗号一旦树起,不应退缩。”张发奎同意顾孟余的七条改组意见,但对改名一事持怀疑态度。8月

18日、27日，张发奎等在香港集会，决定“彻底改组”，成为联合性的组织，但保留战盟名义。会议并决定成立改组筹备委员会，负责改组事宜。9月8日，顾孟余复函张发奎，认为“今兹决定，与当时所商根本不同，弟不得已只得退出公司，以后一切概不负责”。随后，张君勱也在美国宣布退出战盟，并去美国司法部撤销登记。

至此，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遂宣告结束。它只存在了两年多。

50年代北美和香港地区的第三种力量还有以李宗仁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复兴同志会，以李大明为首的中国民主立宪党，以谭护为首的洪门致公总堂，以谢澄平为代表的自由阵线，以陈中孚为代表的中国民主大同盟。他们在1954年曾联合组织自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但影响和作用都很小。

本文为提交1990年在美国华李大学召开的“20世纪中国的在野党”国际讨论会的论文。英文稿发表于 *Roads not Taken*, Westview Press, 1992, 此据拙著《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收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海峡两岸争取张发奎

——读张发奎档案之二

张发奎，字向华，广东始兴人，民国史上的重要军事将领。武昌起义后当兵，参加过讨袁、讨桂、两次东征诸役。北伐时任第十二师师长，在进攻汀泗桥、贺胜桥、克复武昌等战斗中屡建功勋，被任命为第四军军长，该军被誉为“铁军”。抗战期间，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在广东、广西等地指挥部队与日军苦战，多次获胜。1949年李宗仁任代总统后，他曾出任陆军总长，但不久即辞职寓居香港。

由于张发奎的历史地位重要，因此他寓居香港后，海峡两岸都做了不少工作竞相争取他。

1950年，台湾国民党当局举行党员重新登记，张发奎接到通知，和孙科商量后，将通知扔进字纸篓里。1954年2月，国民党在台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陈济棠、余汉谋、陈诚利用老关系连续致电张发奎，邀请张赴台与会，陈诚并表示：“此间无事不可相商”，均为张拒绝。11月14日，陈诚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发奎，声称“中央迁台后，检讨大陆之失，其主要原因在于党内派系之私与党员之日趋腐化，故企主改造本党，一切从头做起。”又称：“今日在台，上自总统，均具赎罪补过之决心。”此信的主旨仍在动员张发奎赴台，“共图匡复大业”，但张仍然不为所动。其后，张发奎一度准备离港远行，需要护照，台湾当局通知张，必须赴台并与“蒋先生”进行一次谈话，张发奎再次加以拒绝。

大陆方面最初争取张发奎回归的是叶剑英。当时，叶任广东省主席。他通过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副党代表李朗如及李章达二人转告张

張向華先生親啟

行政院陳

向華吾兄勛峯前年九月二十五日

來書忠憤耿耿溢於字裏行間讀之令人感

動憶自政府遷台後近年來各種措施其

動機與立場要皆十分純正但以局外人不明

真相遂間有見仁見智之不同而吾

兄遠處海外亦難免傳聞失實之虞

來書云云真摯質直肺腑之言足以發人

深省其中應行政建者謹當存為圭臬云

陈诚致张发奎手迹(采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

发奎，希望张到广州作一次旅行。其后，何香凝给张发奎写过一封信。由于言辞比较激烈，效果不好，于是，再由李济深出面转圜。李信原件今存张发奎档案中，全文如下：

向华吾兄有道：

久不通候，至念。其伟自穗来及许多友人前后自港穗来，得知二三年来，吾兄革命之意志，以机缘未许，至埋没苦心，未尝不时以为痛惜也。在侪辈中，童年即兵，革命精神，屈指有几人哉！不幸中国革命大业，多所顿挫，除顽固自私如袁世凯、蒋介石及其死党外，或左或右，或前或后，而时有错误，或为环境所束，而陷于反革命之途者，比比皆是。我在清党时，自己做了反革命，一时尚不知，即是一例也。此盖因我们都是出身小资产阶级，而失却正确领导之人如我总理者所易有也。此间同人均能谅兄之心，知兄之苦，故常以兄为念。前者廖夫人以老卖老，致函吾兄，不善属辞，云要兄认罪，要兄认错，兄性情好胜，当然不能接受。然而严格言之，其言不能说是无理耳，我意吾人应服理，闻兄说：“我是国民党，不能向共产党投降。”我想兄此言仍有意气用事，门户之见，宗派观点。你能说弟向共产党投降乎？你若这样说，我也不服。其实我们向革命投降，向真理投降，向总理革命主张投降耳。向革命、真理、总理革命主张，或今日所谓向人民等等投降，我想是应该的、光荣的、革命的。禹闻善则拜，子路闻过则喜，这也叫做投降吗？因此我希望吾兄再三长思也。

以一个生性革命的人，从小就有革命历史，大革命时代更有光荣历史，且为革命同人所共知共谅，而当此真正大革命时代，而仍如小孩子意气用事，客气好胜，埋没了一生，我想这是不该的，可惜的，不革命的。若真这样下去，即以前所谓革命，恐怕尚有问题也。

邵力子兄、张治中兄亦常以兄为念，兄前所领导之琪翔、其伟，及四战区之同事，大半都在今日革命战线之内，兄何又独个人固执如是。此我又所不解。他们昔日追随你，可知认你是可以革命的，同情革命的，何以到了今日，真真实在的翻天覆地大革命时，你又退缩不前，这恐你也无以自解罢！至盼你毅然决然，表明是不赞成蒋介石反革命，赞成今日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即孙总理所主张的革命，至所盼祷者耳。一切托其伟夫人面及。连夜书此，即颂康健！

弟 济 深 上

七·一九

其伟，当指吴奇伟，张发奎的战友和老部下，曾参加北伐、抗日诸役。1949年2月在香港通电起义，后回到大陆。李济深的这封信，由奇伟夫人面交张发奎。信中，李济深现身说法，情词恳切，但对张发奎仍然没有发生作用。

1956年11月，蔡廷锴受周恩来委托，继续做张发奎的工作。蔡托其子绍昌带了一封信给张发奎，函云：

向公赐鉴：

久不致候，殊多渴念。小儿绍昌来京，得悉我公佳况，至以为慰。兹藉小儿南归回港之便，特嘱其前往问好，并祝起居。

晚 蔡廷锴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显然，蔡廷锴总结了此前的经验，信中不谈政治，他还通过其子给张发奎带去了口信：尽管彼此的政治观点不同，但私人关系不应该改变。此外，蔡绍昌还带着李朗如的一封信：

向公賜鑒 久不致候殊
多渴念小兒紹昌東京
得悉我公佳况至以為慰
茲藉小兒南台回港之便特
囑其前往问好並祝
起居 晚
蔡廷鍇 用 鑒
十一月十六日

蔡廷鍇致張發奎手迹(采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

向兄：

蔡賢初先生此次由京到粵，系承周恩來總理囑托，對兄傳達周總理意見，請兄回祖國觀察一下，並請兄有所指教。弟對於周總理此舉，十分贊成，敬希兄回國一行，茲特托賢公令郎紹昌世兄致函，對兄表達弟意，並致敬禮！

弟李朗如敬啟

十一月二十一日

贤初、贤公，均指蔡廷锴。李信转达了周恩来的邀请：“回祖国观察一下”，讲究策略，委婉而不强人所难，恰是周恩来风格的表现。

在蔡廷锴之后，受命继续做张发奎工作的是程思远。程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并说，周希望张能想起一张照片；抗战期间在汉口，合影者为郭沫若、陈铭枢、叶挺、黄琪翔、张发奎——周称之为“五虎将”——五个人站得很靠近，手互相搭在肩上，看上去非常亲密。周称，除了叶挺故去，张发奎在香港外，其他三人都在大陆。

周恩来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所提到的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春，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但是，张发奎已经完全想不起这张照片，他也不愿意改变多年来形成的立场和观点。在程思远之后，似乎就没有人继续动员张发奎回归了。

原载《团结报》，1990年12月19日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读张学良档案

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有文字和口述两种类型。文字型主要有四种：1. 由蒋经国修改定名的《西安事变反省录》；2. 《杂忆随感漫录》中的有关章节；3. 《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4. 《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口述型有两种：1. 唐德刚的访谈录；2. 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谈录。以上六种回忆录分别完成于20世纪50—90年代。今年7月，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阅读了新近开放的张学良档案，本文将以之为据，阐述张学良上述回忆录的产生经过，同时探讨张学良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及其变化经纬。

张学良奉命回忆

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是，他的发动者张学良很快就处于被软禁状态，长期保持沉默。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写回忆，始于1956年11月，完全出于蒋介石的命令。当时，蒋介石已退守台湾，正在着手写作《苏俄在中国》一书（实际由陶希圣执笔），企图借此总结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1956年11月20日张学良日记云：

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

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

老刘，指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是张、蒋之间的联系者。张学良接到蒋的这一指示后，“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但是，他已多年不再回忆此事，不知由何下笔。当日，他曾向刘乙光谈西安事变经过约两小时，谈完又后悔，觉得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所立“寡言”之誓。这一天晚上，张学良“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睡好。

从西安事变送蒋返回南京之日起，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软禁了近20年。此际，正软禁于高雄西子湾，处于重重看守中，但是，蒋介石对张还是不放心。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向张宣布蒋的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张闻听之后，颇有震雷贯耳之感，“反复思维，深自反省”，决意自11月16日起，“寡言，读书，默思”，“死里求生，改头换面，作一番复活功夫”。他对西安事变的回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12月5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写成，不过，那其实是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函，首云：

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多年来，更不愿自寻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戒。

在长函中,张学良回忆了他和李克农、周恩来等人的联系,但声明发动事变并未和共产党“征询商议”。“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在写作前,蒋介石曾通过刘乙光向张询问杨虎城的情况。张称:“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

张学良写这封长函,自称“主旨在真实”,除记忆上的讹误外,没有故意在史实上说假话,但是,长函只写到他本人发动事变为止,事变发生后的情况,如拘留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来西安和周恩来谈判以及周恩来和蒋会面等情况均略而未谈,他本人和共产党的关系也谈得很肤浅。张学良怕蒋介石责备,于12月6日补写了一段,特别说明:

假如钧座对于某事内容或某人之言谈,或另有其他之事,欲详细知道,请明加指示,再专就该一事详细陈述,如记忆不清者,再详为回忆。良补此书者,是惟恐钧座对某一事件,良或漏书,或欠清楚,认为良有意规避。然内中也有诸事,尽力简述,或觉于正题无关,或觉此时不当再为提起,并非有不录真实之意也。

当夜,张学良将长函抄好,于6日交给刘乙光,要求务必于当日送达台北。

蒋经国要求写出西安事变的全过程

12月10日刘乙光自台北回到高雄西子湾,向张学良交回长函。

据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要张学良完整地写出西安事变全过程,至蒋介石与张学良等离开西安后三日为止。刘并称:总统的着意之点在于,“真实知道共党是如何的作到了这项工作,以为反共斗争研究资料”。张学良听后,觉得十分为难,日记云:“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所谓“长者”,当然是指蒋介石。张学良当夜再四思量,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真而讳可也”。

蒋经国急于看到张学良的修改稿,于17日电催刘乙光到台北。当日,张学良续致蒋介石一函,说明回忆西安事变时的考虑:

良未写事变当时之事,非有他,实有不忍言者:自愧行为过于丑劣,再多关钧座于良个人者为多,实难下笔;而其中事实,钧座多已知之矣。钧座已知之事,俯乞万死,庶良不再为追述,兹谨就钧座未知之事,略陈如下。

张学良为“有所不写”找到的理由是:“钧座已知之事”,何必要我来写!函中,张学良着重叙述了和蒋在华清池两次谈话之后的冲动心情,很快就转入自我批判:认为“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他检讨自己:1. 满腹忧患,固执己见,不计利害;2. 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函称,本人之所以犯错误,原因在于:痛恨日本人,“澈底确认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而对共产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者不同,权利之事,今日可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最后,张学良总结称:共产党“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而后所喊的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是同道好友,自堕其彀中”。同时,张学良批评国民党的宣传,“本主观之点,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

张学良所欲为“长者讳”的，正合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始终是一份缺少关键之处的不完整的记录。

蒋介石要求驳斥“成交”说

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宋子文二人曾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等谈判，达成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等9项协议。蒋介石也曾在与周恩来会面时表示，要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在这一情况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结束，张学良才主动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但是，这一经过，蒋介石始终不愿公之于世。他的《西安半月记》仅在12月23日简单地记载：“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对于他本人和周恩来的见面与谈话，竟一字全无。

1955年，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西安事变感言》一文，对所谓张、杨阅读蒋的日记后受到感动，因而幡然悔悟一说表示质疑，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蒋与张、杨之间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他本人也是“见证人”中的一个。蒋介石对此文很不满意。1956年12月18日，刘乙光到达台北，将张学良的回忆长函面交蒋介石。同月20日，蒋即传唤刘乙光，声称“（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已有进步，我甚安慰。他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同时命刘将郭文转交张学良，要张在回忆录中加以驳斥：“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谈之间，给刘的感觉是，蒋“需要甚急”。

郭增恺是何人，张学良已不复记忆；在回忆录中驳郭，必须说假话，张学良感到“甚难写，弄的不三不四”。思考再三，张学良仅将回忆修改

两小段,另写《慨中国文人之无行》一文,中云:

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说不到什么条件成交,更谈不到见证,就是有见证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

此文重点仍在于论证送蒋返京,出于受蒋日记之感动,而非“条件成交”,企在体蒋之意,维护其“伟大领袖”的形象。同时,张学良并于12月21日致蒋一函,声称读郭文之后“可气亦殊可笑”。函云:

此人为谁,良诚已忘却,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对,彼乃一小丑角色。他不是共党,他是属于共党尾巴的第三党,在第三党中也不是什么重要者。当年曾为杨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亚也。在回忆文中难将其人撵入,兹仅就其胡说之处,针对如上,以证其无的之言,另写一纸以驳之,未审可用否?

12月21日,张学良将写好的文与函交给刘乙光,立送台北。与刘约定,如认为不妥,先来一电话,以便准备再写。

函上,蒋介石没有再提出新的要求。郭增恺方面,则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伊雅格出面斡旋,由张签付美金支票6100元,郭遂不再说话。

张学良要求“受训”

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回忆和对郭增恺文的处理都使蒋满意。12月24日蒋将自著精装《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及1957年日记本一册交给刘乙光,作为对张学良的奖赏,同时要刘传达两句话:“共产党必败”,“(张)对反共抗俄,有贡献处”。张学良得悉后,“中夜反复自思”,决定给蒋介石及宋美龄各写一信。次日,张学良将信函交给刘乙光,请他派人送往台北。刘认为信件重要,表示必须本人亲送。

国民党对担任高级职务的党员有轮训制度。张学良在1929年加入国民党,担任过中央监察委员、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职。1951年11月,张学良致函宋美龄,“请示党员归队”。1954年10月,刘乙光调台北阳明山受训,张学良也想争取受训机会,曾致函张群,但未有下文。此际,张学良揣摩蒋的意思后,再次向刘表示受训心愿,要刘上达。刘为了避免说错话误事,要求张学良写一份节略给他。1956年12月25日,刘乙光到台北,蒋介石于当夜9点接见。对张的受训心愿,蒋连说好好。刘追问何时?蒋答:须布置布置。同月27日,刘乙光尚未起床,蒋即电话召见。蒋称:张受训一事,贸然从事,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张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趋。其办法是,张先写一书,叙述个人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党)的观感等,公开发表,改变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蒋的意思是要张通过亲身经历,公开反共。张学良得知后,情绪激动,一夜未能成眠。次日,情绪更为激动。日记云:

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赵四亦加劝言。下午睡过，自感矛盾，即决从事反共，又何顾小小颜面问题。总统赐给机会，准我由九一八以前写起，这是何深用意！同时外间是有人怀恨切深。把信改书，嘱老刘明早去台北。余稚气太胜，须力加痛改。

29日，刘乙光向张表示，信中仍有不妥之处，张学良此时情绪已经平静，立即改写信件，交刘送往台北，并且写了两句诗：“昨夜一阵潇潇雨，狂风吹去满天云。”

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

自1957年年初起，张学良即遵照蒋介石之命，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稿一部分回忆张作霖，题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忆自己，题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变的有《我之与国民党》与《出洋归国与管束》两节。该稿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张并在致蒋函中声言，本人对该稿并不满意，请蒋指示修改之处。23日，张将该稿交刘乙光送往台北。5月1日，刘自台北归来，告张已将该稿交蒋经国，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同月5日，蒋介石召见刘乙光，声称张所写“系历史重要文件”，“有价值，有贡献”，“如不到台湾，无此文”，要张亲笔写一份。同时，蒋并称，张前所写回忆西安事变的函件，须加编整，由张亲笔抄写，交高级将领参考。同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声称总统已将张的函件交

自己修改。5月10日,蒋经国将修改稿及《杂忆随感漫录》原件退给刘乙光。张学良收到后发现,蒋经国已将自己去年12月5日和17日写给蒋介石的函件合并,改为一篇文章,题名《西安事变反省录》,但内容并无重大变动。

5月11日,张学良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至19日抄毕。自20日起,抄写《杂忆随感漫录》。6月10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张学良即将《反省录》抄稿交刘,要他在必要时呈上,请刘同时声明:张“不满意这本,写的不整齐,假如不急用,请带回再缮”。刘乙光到台北后,向蒋介石说明张意,蒋称:“留下我研究研究。”蒋并表示,拟将张迁至较近之处。蒋经国还送了一些芒果给张。6月24日,刘乙光再次被召到台北,蒋经国将蒋介石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交刘,要他转交张学良。

6月30日,张学良抄完《杂忆随感漫录》。致蒋介石函称:“楷书能力太低,日仅千余字,又不整齐,时有错漏,请罪。”第二天,刘乙光去台北,为张学良选择新住址,张学良就将信函及书稿一起交刘。

自7月3日至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工工整整地又抄了一遍。

奉命撰写《苏俄在中国》读后感

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在叙述西安事变时采用了张学良回忆的部分内容。1957年8月上旬,蒋介石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读过该书没有。刘答称:张在未收到此书前已每日在收音机上听过,收到书后又立即读了。蒋询问张读后“怎么样的说法”?刘答:“张叹惜未能早

读这样的书。”与此同时，蒋经国也同刘长谈过一次。蒋经国提出，张学良可以写一点读《苏俄在中国》的感想，将西安事加进去，以便公开发表。

对蒋经国的意旨，张学良不敢怠慢。8月14日，张学良与刘乙光商量，想请他转商蒋经国，请人帮忙，尽快写成。他对刘表示，自己“决心做到诚、敬二字，不作乡愿”。但是，张学良很快又改变主意，决定仍由自己动笔，简短点，写成后送蒋经国阅后再定。

8月18日张学良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一文写成，交给刘乙光。刘重申蒋经国的意见，要张将西安事变写进去，但张学良却表示：“利用读总统之著作而来叙述自己的私事”，“不大合宜”。他要求刘先将此稿交给蒋经国一阅，如不合适，拿回再写，或者径由蒋经国将西安事加进去。张称：“我恐怕时间太久，如果发表，有点失却时限。”

该稿仍有部分篇幅涉及西安事变。关于延安会谈，该稿称：“我当年同周恩来在延安初次会见之时，他那和美言词今日犹在我的耳中。”“他的态度十分诚恳，使我深受感动。”与《西安事变反省录》不同的是，张学良进一步回忆到了毛泽东，声称“毛泽东为加强我的信念，曾经写了一件东西，亲自签名于其上，表示抗日合作，绝对服从的诚意”。该稿还回忆了所受章乃器、黄炎培、张季鸾等人的影响：

当年使我心情激动者，章乃器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向他劝募“献机”捐款。章说：“你们若是真为了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去买飞机，但是，你们从事内战，杀害自己的同胞，我绝对的一个铜子也不出。”

有一次黄炎培经过洛阳，去慰劳绥远的军队，我在欢宴的席间，对黄笑着说：“黄先生，你们上海各界有点不公平。我们西北驻军多年辛苦，你们未曾慰问。”黄立即答曰：“你们是剿匪，打内仗，我们不

但不愿意慰问你们，我们是反对这个内战，也就是反对你们，谁来慰问你们哪！”这些言词和那爽直的态度，使我心中甚受刺激。

关于张季鸾，该稿称：“我同共产党在陕北的会谈，张季鸾是知晓的。这是因为一位过去的共产党，在我部中服务的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曾经告诉我，张季鸾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曾到过莫斯科，写过颂扬苏联的文章，共产党看张季鸾和戈公振是一样的人物。所以在当时，在蒋委员长尚未到西安之前，曾同张季鸾详谈过，征求他对于‘停止剿匪，联合抗日’的意见，他十分赞成，认为蒋公到来，我应当破釜沉舟，痛切陈述。”

这些地方，都是张学良前此回忆西安事变时未曾谈到过的。此文经刘乙光送到蒋经国处以后，蒋经国只说了一句：“放在这里。”

主动撰写《敬告世人》书

蒋介石父子关心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本意为为反共政策服务。1958年3月10日，刘乙光告诉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回忆已秘密在高级干部中公布。刘估计，蒋介石前言张学良受训，须先有“布置”，此事可能是“端倪”，要张“应有准备，而无荒疏”。

5月17日，宋美龄突然到张学良的寓所访问，约谈半小时。张称：对总统我非常想念，渴望看一看他。今日看见夫人，我十分快活，但又悲伤。张并表示：“对人生已看透彻，对名禄之心毫无，而罪人受此优渥，十分不安。如仍能于人类与国家有贡献，则不计一切，只不过今日余已为过去之人，不知能贡献什么？”张的这一番话，旨在探询自己恢复自由的可能性。宋美龄告诉他，自己即将去美。对张的试探，宋只表

示：“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张学良继续设法争取自由。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前东北大学秘书长周鲸文的一份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篇东西，请刘乙光向蒋经国处“探听探听高峰的意旨”，并且“想请一个人帮一帮文字上的忙”。8月4日，张学良早晨六点起床，开始动笔。他听说蒋介石要南来，想在蒋到达高雄西子湾时递上去。同月24日，张学良听说蒋已北返，决定慢慢写。此时，张已将该文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两天后，文章写成，交给刘乙光，刘要他签名以示郑重。

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誉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声称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澈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在回忆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承认自己受到身边共产党人的影响。他说：“在那时，我左右已有共产分子渗透，而我不自知，以为这些人是抗日爱国分子，对于他们喜悦而加以亲信。他们已确实知道我的一切，那自然就是共产党知道了我的一切。他们不断的鼓动我立即抗日；慢慢的提出来剿匪是消灭抗日的武力问题；再进一步提出来，要是真正抗日，必须停止剿匪，联合共产党。另外共产党的外围，‘民盟’和‘救国会’的分子，对我加以鼓励和刺激，使我自动的感觉着：对于报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对于雪东北沦陷，世人诟病我‘不抵抗’的耻辱，对于国家争取自由平等，非联合共产党而抗日不可。这实在是共产党对于我施用攻心战术无比的成功。”张学良还提到杨虎城身边的共产党人——“小家伙们”对杨的影响。关于此，笔者拟另文叙述。

9月2日，刘乙光到台北，呈交张文。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当时，张学良正闹眼病，蒋经国要张移住台北治疗。

10月17日蒋经国召见张学良。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张向蒋经国表示：“富贵于我如浮云，唯一想再践故土耳！”其后，经蒋经国斡旋，蒋介石于11月23日在大溪召见张学良。这次会面，据张学良记载：“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蒋问张近来读些什么书，张答以读《论语》及梁启超文，蒋称：“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张学良沉吟之后，问蒋：“我可以陈述陈述我的话吗？”蒋答：“可以！可以！”张即向蒋检讨：“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了救中国。”“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无识。”张并向蒋表示：“我知道我们将来都是会写在历史上的，我自己奋勉，不只是为了自己，同时是为了二位。”接着，张声称自己“现在读书有点费力，很想请教一位有道之士”。蒋要张提出人选，张即提出钱穆、陈大齐、劳干等人。张又问蒋“应该看什么书”，蒋推荐《大学》和王阳明的《传习录》。其后，蒋谈到西安事变，声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称：“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蒋随后表示：“我到高雄，我们再谈。”会见结束后蒋并将张送到廊外。

蒋氏父子的先后接见使张学良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学良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1959年4月下旬，张学良眼疾复发，不能读书，卧床不眠，曾经胡乱诌了几首诗：

不肖听人唤，聪明空自负。
一觉黄粱梦，忏悔向谁诉！
空负怨天愿，罪孽罄难书。
圣明怜未弃，夕阳照征途。

诗中除明显的悔过语言外,还可以看出,张学良不仅希望蒋氏父子能给予他自由,而且希望出来之后做点事。不过,蒋氏父子并没有满足他。6月15日,蒋介石到高雄西子湾官邸,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近况和身体情形,却没有实践在大溪时和张见面再谈的诺言。蒋经国则表示,此行太忙,也许不能来看张,答应赠张汽车一辆。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

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了。1961年6月26日,张学良到刘乙光家,刘告以“1. 受训事,目前不可能;2. 尔后安静生活”。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金石之言。”

《忏悔录》风波

张学良平静下来了,但是,1964年,一件意外的事却引起了他的激动。当年7月1日,台北出现了一本题为《希望》杂志的创刊号,该刊“特载”栏有一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内容就是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只不过作了删节。同月7日,这篇《忏悔录》又被台北《民族晚报》分段转载。张学良从报上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创刊号全数收回,黑市由每本台币10元涨到100元。蒋经国当时已担任“国防部部长”,《希望》杂志是蒋经国所掌握的军方政治部办的。多年以后,张学良对此事的解释是:蒋经国“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公开给他们看,说我这个人,过去说这些事,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有人就偷着把这个信发表了”。张并称,他和蒋介石

之间“暗中约会(定),我们俩应该守秘密的事”。张学良被软禁之后,他和蒋介石并无多少见面机会,不可能有什么“暗中约定”。倒是西安事变期间,双方有过默契:不发表协议及谈判经过。1936年12月27日、28日,西安《解放日报》及中共方面相继公布了谈判中的六条协议,引起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强烈不满,批评这一做法“无信义”,两宋并通过宋庆龄转告中共代表,“无论如何不得再宣布他们的谈话内容”。看来,张学良的所谓“暗中约定”指的是西安事变时期达成的相关默契。

回归本真

为了恢复自由,张学良按照蒋氏父子的意旨,对西安事变说了相当多的忏悔的话,也作了若干反共表态,但是,张学良还是没有能恢复自由。自此,他就缄口不言了。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1990年6月1日,以“总统府资政”张群为首的80位友人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张学良庆祝九十大寿。此后,张学良基本上恢复了自由。同月17日及8月4日,他两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访问,第一次向媒体公开谈论西安事变。1990年1月25日,他开始接受美国唐德刚教授的访问。1991年12月17日,开始接受美国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问。这时,在对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看法上,张学良才逐渐回归本真。

在20世纪90年代的访谈中,张学良仍对中共经历的二万五千里艰难长征表示敬佩,自述当年曾和部下讨论:“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试试!”“他能这样子,你不能小看他。你不能,他这伙人怎么能这样?”张学良肯定,共产党得民心,而国

民党不得民心。他说：“大部分(民众)支持它,那厉害。”“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把这地方消灭了,那个地方又起来了。”他毫无遮掩地坦率表示:“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激烈辩论。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政权),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张学良批评蒋不能容忍共产主义,“思想顽固至极”,甚至借端纳的话批评蒋是“骡子”,“很难把他说服”。这些地方,已经完全和幽禁期间诚惶诚恐、口口声声自称“罪人”的张学良完全不同了,可以说,大体上已经恢复了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的本真状态。蒋介石关了他几十年,但是,对张学良的思想影响收效甚微。张学良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不过,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张学良仍然坚决不说。当张氏姐妹询问有关情况时,张学良表示:“要知道西安事变怎样解决的,现在我决不说。”“现在都知道了怎么回事,何必还要我说呢?”“何必非要出自我之口呢?”“出自我的口就是伤人。”“我伤害任何人就是损失我自己人格。”对蒋介石的看法,张学良也不愿多说,更不愿深说。某次访谈中,张学良批评蒋,刚说了一句:“他这人就是为他自己的”,马上警觉地询

问：“你没有录音吧？”又一次，张谈到“蒋先生很窄小”，准备举例说明时，赵四小姐插言说：“你不要在这讲这种话！”张学良也就立即打住，不再往下说了。

张学良虽自命新潮人物，甚至被张作霖视为“左倾分子”，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保有中国传统伦理的浓烈成分。西安事变后，他在南京一再表示：“如蒋先生命我作什么皆可，他人余不接受。”其所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还在“为长者讳”，自然还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作用。

原载《百年潮》，2002 年第 9—10 期



附录二

我和民国史研究

我年轻时从未想过会研究历史。记得最初的理想是当钢铁工程师,因为那时候,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建设鞍山等钢铁基地。后来,想当数学家;再后来,想当作家,所以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想像苏联的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一样,从记者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不过入校以后,知道新闻学专业只有四年,要学《布尔什维克报刊史》一类我不喜欢的课程,便改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五年学完,被分配到北京南苑的一所农业机械学校。两年后,转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教员。直到1978年,我才正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从事专业研究工作。

初涉学术之途——研究中国文学

我初进大学时,热衷于写诗、写小说。不过,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没有什么生活底子,转而想研究美学和艺术理论。当时,我曾为自己确定了“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美的本质与美的理想”等两三个研究题目,为此,大量读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也曾跑到哲学系,去偷听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的美学课。不过,我也很快发现自己的中外文学史、艺术史底子太薄,一下子就研究美学和艺术

理论是不相宜的,于是,决定先从研究中国文学史做起。

那时候,我正痴迷于唐诗。于是,一边听课,一边跑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在旧书摊上淘书。唐代诗人,如陈子昂、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李贺、李商隐、杜牧、皮日休等人的集子都被我淘到了,也真读。不仅读唐人别集,也读唐以前的,记得明人张溥编辑的《汉魏百三名家集》,厚厚的好多函,我是从头到尾读完的。

从大学三年级起,学校里搞教育革命,学生批判老师,不上课,自己编书。我们年级首倡编写《中国文学史》,几十个人突击,用几十天的时间完成,这便是那曾经名盛一时的北大中文系 1955 级的红色《中国文学史》。现在看起来,这部书“左”得很,其名声完全是适应形势需要,哄抬起来的。我最初参加隋唐五代组,初稿写成后,阿英同志提出,近代文学部分不可不写南社,于是,临时调去支援,补写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一节。没有想到,这便成了若干年后我进入近代史研究所的因缘。

红色文学史出版后,我们奉命继续革命。我选择了“虫鱼之学”,编注《近代诗选》。这样,我便大量阅读鸦片战争以后的诗文别集和近代报刊的文艺栏目,总看过几百种吧!做注释,可不像发几句革命议论那样容易。好在那时,师生关系已经有所改善,季镇淮教授直接参加编选组,和我们一起工作。此外,我还常去请教游国恩、吴小如两位先生,在他们指导下,我逐渐学会了使用《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骈字类编》等工具书、类书和各种引得,懂得了搞注释的门道。编注诗选期间,我们对红色文学史作了一次重大修改,比较地可读了。这次,我撰写的是近代文学。

《近代诗选》拖拖拉拉,搞了好多年,一直到我毕业后,在南苑那所农机学校看传达室时,还在修改。该书出版后,我便和同学刘彦成君合作,写了一本题为《南社》的小册子。初稿完成后,蒙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召见,给予亲切热情的鼓励。其后,当时《南社》的责任编

辑傅璇琮同志要求我再写一本,我选择了《黄遵宪》。

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坛云翻雨覆,文坛也跟着波澜迭起。《南社》因为写的是“资产阶级文学团体”,虽然排出了校样,却一直不能出版,自然,《黄遵宪》也就压在我的抽屉里。这两本书,是“文革”结束后才由北京中华书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的。

我从1958年起研究南社,积累了大量资料,进入近代史研究所后,遍阅清末民初的各种报刊,有几种报纸,可以说是一天天、一页页翻过的。在此基础上,我和王学庄同志合作,编成《南社史长编》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探求天人之道——研究中国哲学

我在研究中国文学的过程中,逐渐觉得只研究文学本身不够,例如,要分析作家思想,必须懂得当时的社会,特别是当时的思潮。于是,我便啃一点哲学和哲学史方面的书籍。诸如《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书,我都是比较认真地读过的;侯外庐等编著的《中国思想通史》我也是比较认真地读过的。《中国思想通史》在分析司马迁时,特别强调他的“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觉得,这十个字,是研究学术的最高理想,也是研究学术的必要条件,否则,鼠目寸光,所见极短、极小,是难以深探学术堂奥的。

这样,我就对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有兴趣了。一个偶然的¹机会,我读到了明代泰州学派传人韩贞的《韩乐吾先生集》。韩贞是窑匠,以烧砖制瓦为生,后来师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多年来,人们一直将

他作为泰州学派具有人民性和异端色彩的有力证据。我读了《韩乐吾先生集》后,觉得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的思想相当消极,于是,便写了一篇短文——《韩贞的保守思想》,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上。文章发表后,受到了侯外庐先生的注意,也受到了侯先生的弟子杨超、李学勤等先生的注意。杨、李二先生不耻下问,到我当时工作的师大附中来借阅韩贞的集子,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其后,我进一步研究王艮,于1963年在《新建设》杂志发表《关于王艮思想的评价》一文,完全和侯先生以及嵇文甫、杨荣国诸大家唱反调。《新建设》编辑部将校样交给侯先生审阅,侯先生不仅同意发表,而且提出,要调我到 he 手下,当时历史研究所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当然,未能调成,那是一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我在大学里是“白专道路”的典型,如何能通得过各种人事关卡呢!

转眼到了“文革”时期,我无事可干,但又不甘寂寞,便研究鲁迅,同时偷偷地帮吴则虞先生编《中国佛教思想文选》,明知当时此类书不可能出版,但权当是一种学习吧!再后来,毛泽东提出,要批判先验论,学点哲学史,中华书局找人写一本《王阳明》,找来找去,找到了我。那时,我在师大附中教语文,还兼一个班主任,但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书很快写成了,也很快出版了,一下子印了30万册,而且很快就售罄,但我只拿到了30本书,那时,是没有稿费的。有朋友开玩笑,要是在这两年,我就发大财了。

《王阳明》出版后,我又应中华书局之约,陆续写了《泰州学派》、《朱熹及其哲学》二书,分别于1980年、1982年出版。

哲学是哲学家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与思考。研究哲学,有两条路子:一条是还原,研究哲学家提出的各种概念、范畴及其体系的现实出发点;一种是上升,研究哲学家提出的概念、范畴及其体系的理论意义与价值。我倾向于前者。例如,宋明道学的基本范畴“理”,我认为,在

朱熹那里,是规律和伦理的综合;在王阳明那里,是人的生理本能、生理功能和伦理的综合。由此,我对于理学史上的“心性之争”,也就是“心学”和“理学”的区别,包括“禅学”、“心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它的消极和积极作用等问题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别集,我曾经读过好多种。1989年,我在《朱子学刊》发表的《禅宗的“作用是性”说和朱熹对它的批判》一文可以代表我对上述问题的部分思考。该文是我原来想写的《理学笔记》的第一篇,不过以后因为忙,就再也没有写下去。我的《王阳明》、《朱熹及其哲学》等书,也想有机会重写,是否能抽得出时间,只有天知道了。

三迁乃至归宿——研究民国历史

我走上研究民国史的道路,完全出于偶然。

我在研究南社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南社作家,在其初期,大多很有创造精神,提倡戏曲革命、诗界革命,写白话文,写新体小说,主张“融欧亚文学于一炉”,然而,到了辛亥革命前夜,正式成立南社时,却大力提倡传统的诗、文、词、骈文,古色古香起来。我研究其中的奥妙,发现是流行一时的国粹主义思潮作祟,于是便写了一篇《论辛亥革命前夜的国粹主义思潮》,发表在1964年的《新建设》上。文章发表后十年,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的同志编辑南社资料,发现了我的这篇文章,便将他们的初步选目寄给我,我认真提了意见;他们又约我面谈,并且邀请我参加协作。于是,我便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近代史所从事研究。这样,从1974年协作到1977年,其间,因王学庄同志介绍,我又得李新教授同意,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

写作。大概是觉得我还行,近代史所便提出要调我到所工作。左折腾,右折腾,那经过,是可以写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的。但是,沾了拨乱反正的光,我终于在1978年4月正式调进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一偿多年来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夙愿。

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后,除和几位研究者合作完成《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下两册外,又于1982年起,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主编并主撰该书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靠了几位年轻合作者的共同努力,该书出版后颇蒙国内外学界好评。

在写作《中华民国史》的同时,我还写了二三百篇各种各样的文章。其中,有40篇编为《寻求历史的谜底——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第二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了繁体字版。另60余篇,编为《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近期出版。还有一百多篇札记、随笔、小品,编为《横生斜长集》,交给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此外的若干篇,已分别编辑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等书。目前,我正在主持编写多卷本《中国国民党研究》。

民国史是我二十多年来的主业,主要集中于辛亥革命史、北伐战争史、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抗日战争史等几个方面,现分述之。

一、辛亥革命史。

在我编写《中华民国史》第一编时,黎澍同志提出,可以研究一下革命党人的派性。我觉得这是个好题目,便动手收集资料,中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凡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料,都努力搜寻。在此基础上,写成《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一文。我提出,在同盟会成立以后,曾经发生过两次“倒孙(中山)风潮”。第一次反映出日本社会党分裂和日本无政府主义派别对同盟会的影响,第二次反映出同盟会内部的经费和人事纠纷。此后,我又陆续写成《龙华会章程主属考》、《章太炎与端

方关系考析》、《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等文，系统地清理并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内部矛盾的真相。

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迅速占有半壁江山，但是，孙中山很快让位于袁世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很快归于失败。为什么？旧说大都照搬领袖人物的政治结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我认为，这是政治分析，而不是历史分析，因此，陆续写了《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急》、《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等文，揭示出孙中山本有进军北京，彻底推翻清朝政府的宏愿，但由于财政拮据，借贷无门，不得不忍痛议和，从而使革命半途而废。

武昌起义后，原湖北咨议局局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宣布拥护革命，出任军政府参议，但是，湖北地区多年来流传，汤化龙曾暗中联络黎元洪等，联名密电清廷，要求清军南下，扑灭革命。由于提出此说的多为当时的革命党人，因此，此说几成铁案，汤化龙也就从此戴上了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我对此说持怀疑态度，经过周密考证，终于证明，此说是一种讹传。

辛亥革命时有三大思潮：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我对这三大思潮都作过考察。

多年来，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我不同意此说，认为这一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共和知识分子”，并由此论述了维新、共和、共产三代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历史嬗变中的作用，自以为这一说法较为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二、北伐战争史。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近代史上的一大谜团。我根据蒋介石日记、中山舰事件案卷、蒋介石汪精卫来往函件等多种未刊资料，写成《中山舰事件之谜》一文，提出了与旧说不同的新解。该文谬蒙胡乔木同志

肯定,认为是一篇具有“世界水平”的好文章,并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优秀科研成果奖。继上文之后,我又发表《中山舰事件之后》一文,论证当时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源自苏俄方面。

北伐战争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次成功的战争。我在国内外先后发表的论文有《北伐时期左派力量同蒋介石斗争的几个回合》、《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四一二政变前后武汉政府的对策》、《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战略策略》、《蒋介石与二次北伐》,以及《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等文。这些文章,力图展现北伐期间高层斗争的复杂历史面貌,实事求是地评价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作用。

北伐战争为时不过两年,但我和合作者用于编写《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这本书的时间却超过十年。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收集各方资料,国内、国外;正面、反面;中央、地方;此派、彼派;在此基础上,力求摆脱过去党派斗争的影响,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一切,从而准确、公正地再现当时的历史。这本书出版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发表评论,认为“这部近60万字的巨著,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比前人又有新的突破。它是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李云汉教授也发表评论,认为该书“内容充实,体系完整,能脱出旧窠臼而能运用多方面的史料”,“除对蒋中正尚是斧钺交加外,其他叙述都甚平实可信”。

三、抗日战争史。

我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日蒋谈判。在这方面先后发表的论文有:《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开端》、《黄郛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等文。前三文研究全面抗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开

端与发展,后二文揭示日蒋间多次秘密谈判的内幕。除了阐述还隐藏在重重历史帷幄中的情节、过程外,我力图揭示在这些虚虚实实、风云诡谲的谈判后面所隐藏的复杂目的。我认为,这些谈判,不只是如人们所理解的反映出蒋介石对抗战的动摇,更多反映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对日和对汪精卫的一种斗争策略。

西安事变关涉国共关系史和抗日战争史,多年来有不少史家涉足,出版了许多优秀成果。在这一领域,我只做了一点资料性和考订性的工作,发表的资料、文章有《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未刊电报》、《孔祥熙西安事变期间未刊日记》以及《西安事变史实订误》等。

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所从事的地下工作尚未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在这方面,我曾根据台湾“中研院”所藏朱家骅档案,写过一篇《吴开先与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敌后抗日工作》,初步展示了该项工作的一个侧面。

四、国民党派系斗争史。

国民党派系复杂。可以说,不研究派系,就不可能全面了解国民党。在这一领域,我的已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孙、黄矛盾,蒋、胡斗争,孔、宋斗争和蒋、李斗争。

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表现于中华革命党时期。我曾根据日本外务省所藏档案及宫崎滔天家藏资料写成《“真革命党员”抨击黄兴等人的一份传单》、《跋钟鼎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书》、《何天炯与孙中山》、《邓恢宇与宫崎滔天夫妇》等文,揭示了孙、黄在反袁斗争中形成的分歧及其发展,补充了前人所不知的若干史实。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大量胡汉民晚年往来未刊函电,我于1990年访问美国时读到这部分资料,立即意识到它的巨大史料价值。这部分资料的特点是使用了大量隐语、化名,没有相当的中国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很难破译。例如,以“门”、“阿门”、“门神”、“蒋门神”指蒋介石,以“水云”、“容甫”指汪精卫,以“不”、“不孤”指李宗仁,以“香

山后人”指白崇禧,以“马”、“马鸣”指萧佛成,以“衣”指邹鲁,以“跛”、“跛哥”指陈铭枢等。我在反复琢磨一一破译之后,发现九一八事变之后,胡汉民曾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秘密组织“新国民党”,积极谋划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30年代的许多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孙殿英西进等,背后都与胡汉民有关。因此,写成并发表了《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一文。1996年,我访问台湾,在国民党党史会和“国史馆”查阅有关资料,进一步有所发现,因此,又陆续写成并发表了《3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的反蒋抗日潮流》、《一项南北联合倒蒋计划的夭折》、《1935年国民党内部的倒汪迎胡暗潮》等文,比较深入地揭示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隐情。

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国民党中的两大家族。他们是姻亲,但又是政敌,其互相争斗情况很少为人所知,但又是研究30年代至40年代国民党政权所必须解决的课题。在《豪门之间的争斗》一文中,我对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所藏宋子文档案中的若干电函作了释读,从而揭示了这两大民国政要之间的深刻矛盾。与此相关,我又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藏孔祥熙档案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藏傅斯年档案,分别写成《蒋孔关系探微》和《傅斯年攻倒孔祥熙》二文。前文揭示了蒋、孔之间密切关系的奥妙,后文揭示了孔祥熙这一民国政坛上的不倒翁屡受攻击、终致倒台的状况。

关于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我的研究重点在1949年李宗仁成为“代总统”之后。在《李宗仁的索权逐蒋计划》一文中,我根据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所发现的资料,揭示了当时李曾经有过向蒋索取政权、军权、财权,并要求其出国的计划。后来,又写过一篇《蒋介石“复职”与李宗仁抗争》,揭示蒋介石到台湾后的“复职”经过及其与李宗仁的新纠纷。

五、胡适的社会关系。

胡适是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大家。研究民国史，不可能不涉及胡适。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胡适的社会关系，先后发表过《胡适与国民党的一段纠纷》、《胡适与钱玄同》、《胡适与杨杏佛》、《胡适与陈光甫》、《胡适与柳亚子》等文。它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勾勒出胡适的性格与面貌。

民国史之外

我做学问，反对浮光掠影，主张深入沉潜；但是，我也不主张过于狭窄，所以，在以主要精力从事民国史研究之外，我也做一点其他方面的研究。其中，稍可一述的是戊戌政变和政变后的改良派的研究。

1985年，我在日本阅读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那时，我正研究辛亥革命，在连续多日读了十几卷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后，本可得胜收兵了，但是，我突然觉得，应该看看戊戌变法的有关档案。于是，转动卷轴，继续搜寻。忽然，阅读机的屏幕上出现了毕永年的日记——《诡谋直纪》。在这份资料中，毕永年以当事人的身份揭露了康有为曾经有过的一项“武力夺权”密谋——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我意识到，我有了重大发现，心头一阵惊喜，立即将它复印下来。回国后，我广泛查阅相关资料，经过多方考证，确认了毕永年所述真实性，于是，写成《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一文，发表于1985年9月4日的《光明日报》上。这篇文章，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广播。它迅速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有人誉之为“将迫使戊戌变法史作重大改动”。

证明戊戌时期康有为确有“捕杀西太后”的密谋之后，紧接着便发生了一个问题——康、梁生前多次矢口否认此事，为什么？我又继续查阅相关资料，终于从梁启超写给康有为的一封密函中了解到，原来，二人在事后订了“攻守同盟”，决定终生保守秘密。这样，这一事件就板上钉钉、铁案如山了。

除了坚持不懈地找寻相关资料外，还要善思，寻找各种资料之间的联系。我在日本国会图书馆中找到过唐才常写给日人宗方小太郎的一封信，表面上谈的是到湖南“开办学堂报馆事”，但用词颇重，有“此举颇系东南大局”等语。我以为其中必有隐情，于是，进一步查阅宗方小太郎日记，终于查明，原来指的是维新派的一项“举义”计划——在湖南发动，然后引军北上，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再移军北上，几乎和太平军的进军路线一模一样。

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还有几封情报人员暗中抄录的梁启超等人的信件。信中用了不少隐语，抄录者辨识中文草书的能力又低，满纸讹误，但是，我粗读之后，即感觉不是寻常信件。于是反复阅读，反复揣摩，终于弄明白，那是1908年光绪皇帝去世之后，改良派秘密动员在北京的满族亲贵诛杀袁世凯的密札。

我对改良派的研究一直断断续续。1996年，我访问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读到了那里收藏的康梁未刊信件，其中有一通梁启超函札引起我的特别注意，经研究，那封信反映出，辛亥革命时，康有为曾企图联合满族亲贵，推翻袁世凯内阁，控制中央政权。

政治斗争有时以赤裸裸的形式浮现于世人面前，有时则深藏于铁幕之后，当一个历史学家能将藏于铁幕之后的政治斗争拉到光天化日之下时，我想，那一定是很愉快的。

关于青年鲁迅，我曾将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写过《斯巴达之魂与近代拒俄运动》等札记，解决了鲁迅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除了写书、写论文之外,我有时喜欢写点小文章,就某些历史事件、人物、现象,或议论,或叙事,或考证,颇得纵横挥洒之乐。此类文章约一百余篇,已结集为《横生斜长集》,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99年10月出版。

我的历史追求

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一切,因此,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任务。但是,历史本相并不是一眼可见、一索可得的。它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充分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因此,我在国内外访问,所至之处,第一任务都是收集资料,特别是未刊的函电、日记、档案等手稿或未刊稿。当地有什么,我就看什么,从不为自己的研究划地设牢。因此,我的大部分文章都建筑于此类资料之上。经验告诉我,资料浩如烟海,是研究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的困难,但是,也是其方便和幸运所在。只要细心访求,锲而不舍,许多谜团、疑案常常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说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再现历史本相,不意味着历史学可以不要思想,没有观点,纯客观地记录一切。相反,历史学需要说明历史、解释历史,寻找规律,作出价值判断。但是,首先必须弄清、写清史实。对历史的解释可以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但是,历史事实却只有一个。我认为,历史家笔下的史实要能经受不同立场、不同时期的读者的挑剔和检验,争取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的史实。

民国史充满着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当时,没有一个党派不认为

自己是真、善、美的化身,不认为政敌是假、恶、丑的典型。今天的历史学家有条件超脱一点,也有条件看到各党、各派、各方留下的资料,因此,看问题要力求全面、公正,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丑说丑,既不盲从前人,也不看风向,不避时忌。既往的观念、认识、结论有的正确,有的则需要根据可靠的史实重新审视,加以修正。民国史上这样的问题很多。当我们只面对史实、面对科学时,民国史的面貌是会有大的变化的。

原刊《学林春秋》三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略有修改。



进一步发展中华民国史学科

——访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

记者:和许多古老学科比较起来,中华民国史还是个比较年轻的学科,您能否谈谈这一学科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董必武、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就提出要编纂《中华民国史》(同时重修清史)。1956年,国家首次将《中华民国史》列入全国科学发展规划。1971年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再次指示,要编纂、出版《中华民国史》。1972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报请国务院批准,通过当时的“出版口”将此项任务下达给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当时的副所长李新接受了这一任务。李新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到过延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当过吴玉章同志的秘书,有眼光,有魄力,曾组织陈旭麓、孙思白、彭明等编写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获得好评。他接受任务后即在近代史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室),制订编纂计划,采取“来者欢迎”的办法,吸纳了不少所内的年轻学者参加工作,同时,又联合全国多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开展协作。今天中华民国史这一学科能发展起来,不能不感念李新的开拓之功。

记者:为什么老一辈革命家在建国以后就提出要编写《中华民国史》?在您看来,建立和发展中华民国史这一学科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答: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有悠久的史学传统。从《尚书》、《春秋》、《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到《元史》、《明史》、《清史

稿》，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大量的历史著作。它们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依靠这些著作，我们民族的生存、发展历史般般可考。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始，到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时间不过37年。但是，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段落——一个客观存在、不可否认的段落。自然，这一段历史也不可以没有记载。缺了这一段的记载，我国历史的发展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倡编写《中华民国史》，其原因我想主要就在这里。

至于建立和发展中华民国史学科的重要性，我想不外两方面。一个是学术，一个是现实。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外抗列强，内谋解放，争取国家独立、富强和现代化的斗争。在孙中山领导下建立的中华民国实现了中国国家政体的变革，是这一斗争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是一个更重要的里程碑。历史不能割断。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是昨日中国有关方面的发展。两者之间有着切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了解昨天，才能更好地发展今天，预见明天。我们要建设新中国，就必须了解此前的中国，认真清理民国历史，总结有关的经验与教训。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处理对日关系时，常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里所说的“前事”就包括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在内。不了解民国时期中日关系中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如何能发展新时期的中日关系！最近中日两国外长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会晤，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有关共识，决定根据“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展中日双方的共同历史研究。其内容包括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史、近代不幸历史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多年的中日关系发展史。这其中的“近代不幸历史”，就包括民国时期在内。中日关系如此，中外关系的

其他方面,中国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如此。

建立和发展中华民国史学科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这就是实现民族和谐,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

民国史上,国民党曾经是革命的、爱国的政党,有过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护法、北伐、抗日等光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对于国民党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贡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有助于促进民族和谐,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历史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去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胡锦涛同志在肯定共产党的抗日将领时,也肯定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国民党将领;在肯定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的同时,也肯定了国民党人的“八百壮士”。胡锦涛同志的这篇讲话在海内外获得了广泛的良好反应。当年我在台北参加有关方面举办的学术活动时,就曾亲耳听到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欣喜地说:“胡锦涛主席也充分肯定我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了。”

毋庸讳言,民国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分裂,双方曾刀兵相见,不共戴天,因此彼此之间有许多隔阂、分歧、矛盾以至敌意。研究民国史,对相关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说明和阐释,揭示历史真相,剔除其中那些谬误的、不恰当的、被误解了的或被夸张了的成分,有助于消除隔阂,化解怨仇,减轻敌意。这一方面,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大有用武之地。“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近年来,两岸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不少共识,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一些原来坚持反共的人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记者：您从学术和现实需要两方面谈到建立和发展中华民国史学科的重要性，很对。但是，从需要出发，人们就可能根据需要剪裁历史，解释历史，使历史成为任人梳妆的女孩子。怎样防止这种状况，保证民国史研究在最大程度上的科学性？

答：您的这种担心有道理。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还原历史真实，揭示历史本来面目，因此，首先要遵循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恩格斯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之下才是正确的。”恩格斯的这段话指明了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而不是先前就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某种“原则”。自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也必须如此。

举例来说，辛亥革命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怎样认识这一历史现象？通常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有着天然的妥协性，因此，从这一“原则”出发，人们很容易认为，孙中山让位一事是中国资产阶级妥协性和软弱性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就会发现，孙中山当时完全懂得，只有排除袁世凯，“坚决以武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才能“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孙中山之所以让位，主要是因为革命党人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使得南京临时政府连维持自身运转的经费都难以筹措，一直到南北和议签字前夕，孙中山还在企图以“举借外债”的方式解决北伐所必需的巨大军费。只是在借债无望的情况下，孙中山才忍痛接受和议，让位于袁世凯。两相比较，显然后者比较接近于历史真实。

人们当然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去选择自己的研究计划，但是，却不能根据现实需要去装扮、改造历史。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将科学性放在

第一位,一切违背历史真实的成分都要赶出历史著作。

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而且也是检验历史判断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对于既往的民国史,人们有许多判断、观念和看法,它们大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这就要根据客观存在的史实加以检验。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修正,不完整的要加以补充。

记者:记得您在什么地方说过,历史如流水,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人们怎样以这种“消失了的过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答:不错。历史确实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看不见,也摸不着了,但是历史又常常有大量遗存。这就是历史资料,包括档案、文献、实物等。人们正是通过这些历史资料去研究并确认历史事实,重建历史。

民国时期由于距离现在较近,因此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大量历史资料。研究古代史,常苦于史料不足,文献无征。研究民国史,则常常苦于史料太多。据说,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民国档案能铺几十公里长。将全国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所收藏的民国档案、文献加起来,其总件数也许要以亿万计。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档案有八十万件,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个人档案约三十万件,阎锡山档案有二十余万件。美国胡佛研究所近年来大力收集民国档案,除长达五十三年年的蒋介石日记外,宋子文档案有六十余盒,孔祥熙档案、陈立夫档案最近也已成为该馆馆藏。要研究民国史,这些档案都必须利用。近年来,我曾五赴日本,六赴美国,七赴台北,目的大都在于收集和研读民国档案,但是所读仍然很有限,真可谓“渺沧海之一粟”。为了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孔祥熙和日本方面的秘密谈判,我曾先后访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日本外务省史料馆、国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以及台北“国史馆”等处,才收集到比较齐全的资料,从而得出孔祥熙是国民党内汪精卫之外的最大主和派的结论。胡乔木同志曾经提

出,历史研究要掌握相关的全部资料。这一点对民国史研究者来说可能很难做到,但仍然要尽最大可能,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

记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掌握资料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很好理解,但是,资料有真有假,利用假资料,其结论不就大错特错了吗?

答:是的。充分掌握资料之后,必须以辩证的方法进行检验、鉴别、考证和分析。有些资料,看上去是铁证,其实靠不住。我举一例,许多资料都记载,武昌起义时,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一面表示拥护革命,出任湖北军政府总参议,但同时却秘密串连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布政使连甲、鸦片商李国镛、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的弁目张振标等多人,密电清廷,要求出兵镇压。众口一词,言之凿凿,而且有柯的文案林某作证,因此历史学家们将汤化龙定为反革命两面派。然而,此说有一个明显的破绽,即汤化龙、连甲等有身份、有地位的官绅怎么会在向清廷上书时,邀请鸦片商、弁目等一类人物联名?循此考索,破绽愈多,并且最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找到了连甲以个人名义打给清政府的电报,终于证明,此事与汤化龙无涉,为汤摘掉了“反革命两面派”的帽子。

民国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十分谨慎地使用资料。特别须要警惕的是,不对纷纭歧异的众多资料作全面的、辩证的考察,就轻率地取己所需,这种情况,常常会造成对历史的误判和误断。

记者:听说民国史学科刚刚建立时,由于“禁区”多,“雷区”多,因此许多学者不敢踏入这一领域,有“险学”之称。过了若干年,研究者愈来愈多,又成了“显学”。是不是这样?

答:是这样。民国史学科初建时,反对的人、想不通的人颇多,还有人主张解散刚刚建立的民国史研究组。但是,当时李新顶住了。他说:我们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展工作的。你们要解散,拿批件来。反对的人拿不出批件,自然,民国史研究组照常工作。在逐渐做出了成绩以后,原来反对研究民国史的人也就不反对了。此后,研究民国史的学者

愈来愈多,原来害怕涉足这一领域的人逐渐解除顾虑,研究的范围也愈来愈开阔,民国史确实从“险学”变成了“显学”。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民国史的研究没有任何危险了。习惯成自然。有一些错误观念,是人们在多年中积淀下来的,不容易一下子改变;也有个别人还不习惯于通过“百家争鸣”的办法去对待学术上的不同认识。因此,我觉得,要进一步发展民国史学科,还需要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双百方针”,建设宽松的有利于学术创新的环境,鼓励大家坐下来,深入地掌握资料,深入地进行研究,我相信,民国史学科必定有一个大的发展。

记者:您谈到20世纪70年代,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务院“出版口”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交给了近代史研究所,现在这个任务完成得怎样了?

答:当时,我们计划写几部大书:1.《中华民国史》12卷;2.《民国人物传》12卷;3.《中华民国大事记》39卷;4.《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专题资料)600题。三十年来,我们在人力、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截止到目前,《中华民国大事记》和《民国人物传》都已出齐。《中华民国史》已出版8卷,另4卷初稿亦已完成。已经出版的部分,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资料翔实、严谨求实、风格清新、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著作。但是,已往编纂工作也存在较多不足。其一,上述著作,成于三十多年中,出于多人之手,有加以修订、统编的必要。其二,近年来,大陆、台湾地区以及英、美、日本、俄罗斯所藏民国时期档案大量开放,有进一步加以利用的必要。其三,编纂计划制订于三十多年前,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我们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还存在较多缺陷,例如,原计划以反映民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历史为主,以政治史为主,而未能充分反映民国时期的历史全貌;又如,缺少中国历代史书必不可少的“志”与“表”等

重要体裁。其四,因人力、财力不足,《中华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专题资料)在出版近 50 种后即行夭折。上述不足,倘不加以克服和弥补,那么,它将很难成为代表国家和时代水平的学术巨著。借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 年 12 月 14 日

